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第四章（中）

2020年9月

目录

追溯近现代中国起源与历史

——现代化中国的起源与简史，以及东西方世界

【一个基督徒的视角】

【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现代化起源、历史、思想、轨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法律、民情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明体系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冲击、影响、等复杂关系】

2020年9月

===

。。。。。。。。。。。。。。。。。。。。。。。。。。。。。。。。

。。。。。。。。。。。。。。。。。。。。。。。。。。。。。。。。

。。。。。。。。。。。。。。。。。。。。。。。。。。。。。。。。

。。。。。。。。。。。。。。。。。。。。。。。。。。。。。。。。

。。。。。。。。。。。。。。。。。。。。。。。。。。。。。。。。

。。。。。。。。。。。。。。。。。。。。。。。。。。。。。。。。

。。。。。。。。。。。。。。。。。。。。。。。。。。。。。。。。

。。。。。。。。。。。。。。。。。。。。。。。。。。。。。。。。

。。。。。。。。。。。。。。。。。。。。。。。。。。。。。。。。

。。。。。。。。。。。。。。。。。。。。。。。。。。。。。。。。

。。。。。。。。。。。。。。。。。。。。。。。。。

第四章

1911年-1937年

===============================

关于宋美龄一生的反思

。。。。

历史功过，任人评说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没有一个家族，是像宋氏家族这样显著、影响巨大；宋氏弟兄姐妹，尤其是宋氏三姐妹，在中国近代史、民国政府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自从1949年以后，由于中共以暴力战争革命的方式，夺取了中国统治政权，因此，直至今日，中国内地一直以许多诽谤的言辞，来评述宋氏家族。【甚至，在一向以客观中立、专业著称的维基百科网站上，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种夹杂着无端诽谤、污蔑、贬低、歪曲事实、攻击谩骂的中文言辞。这是因为，一些维基百科的中文作者，往往是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翻墙”（中国大陆至今仍然处于极其严厉的官方舆论控制之下；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蒙蔽、谎言、无耻罪恶之统治的环境中；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世界实际上是被严密封锁、掌控钳制的内联网）出来写作的御用文人。】

我们并不是说，宋氏家族本身是洁白无瑕、无可指责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宋氏家族中，无论是宋霭龄家庭，还是宋庆龄、宋子文，或是宋美龄家庭，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内在性缺陷、弊病、罪恶、谬误、等等。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宋美龄等人的身上，看到其瑕不掩瑜的美好品格、真挚贡

献；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指出宋氏家族成员们个人身上的各种严重错误，并进行严厉的批评谴责。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我们都应当秉持公平、正义、客观、全面、公道的立场。

二十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充满了许多的悲剧、遗憾、缺失。在宋美龄的一生中，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悲剧、遗憾与缺失。但是，总体而言，在宋美龄的一生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幸福、真挚、纯洁、与良善。或许，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宋美龄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婚姻。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高统治政权中的最高领导人们，无论是帝王朝代中的许许多多皇帝，还是民国时代的袁世凯、乃至中共时代的毛泽东、或是中共高层的历代诸多所谓"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往往以女性为附属品、玩物，或是妻妾成群，甚至享受奸淫之乐。他们或是三妻四妾、后宫佳丽无数，或是奸淫无数、劣迹斑斑、偷情不止、放纵淫荡；他们都没有幸福、专一、诚挚、心心相印的婚姻。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统治政权的领导人历史中，或许，唯独有两个例外，那就是孙中山与蒋介石。

与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已经是有妇之夫，甚至男女关系很混乱，有过好几个女人，以及婚生或非婚生子女。而且，与孙中山

宋庆龄夫妇一样，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没有生任何子女。

但是，自从后来结婚以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好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真挚、专一、幸福、温馨、彼此敬重恩爱、持久的爱情婚姻关系。

甚至，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比孙中山宋庆龄夫妇的婚姻更为长久、令人瞩目、更应当令我们深思、从中学习到有益的功课。【孙中山的年龄比宋庆龄大27岁；他们在结婚以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孙中山在与宋庆龄结婚十年以后就去世了；32岁的宋庆龄从此一直守寡，直到88岁去世；官方记录显示，宋庆龄在余生中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成为生活在中共政权统治之下的一名无神论者】。相比于孙中山宋庆龄的短暂十年婚姻，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自从1927年结婚，彼此恩爱专一，直至蒋介石1975年逝世（享年87岁），长达48年。宋美龄直到2003年逝世，享年105岁。宋美龄在一生中持守着基督教信仰，甚至在1960年代以后在信仰上更加敬虔、专诚、热忱、谦卑。

在政治上，在国家事务治理上，在许多公私事务中，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都有着很多缺点、谬误、短视、甚至自私、无能之处。当然，他们也更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夫妻合一地成就了许多伟大的事业，为近现代中国历史

作出了杰出的、不可抹煞的贡献。例如，在1927年至1937年的中国十年黄金发展时期，蒋介石夫妇为中国的政治经济稳定成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宋美龄以杰出的才能与聪明智慧，辅助丈夫，在许多的国家建设事业上，做出了点点滴滴的奉献。当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险。宋美龄不顾个人安危，前赴西安，与丈夫共进退、同生死、共患难。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宋美龄积极地配合丈夫、协助丈夫，为中国将士坚守抗战、全国人民鼓舞士气同仇敌忾，为中国的国际环境、外交拓展、等等，都做出了重要的、突破性的贡献【因而，也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做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贡献】。在1949年以后的台湾经济建设中，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也有着很多可圈可点的成绩果效【尽管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就开始实行严厉的独裁政治体制】。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进行反思【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港台地区的文化出版物方面已经有很多的、很好的总结与记载】。而是，当我们注目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注目于宋美龄的内心挣扎、成长、信仰、泪水、盼望、精神的时候【1950年代、1960年代以后，当宋美龄蒋介石以及整个中国国民党避难台湾的时候，这是他们最灰头土脸、失败气馁的时候，但也正是宋美龄在内心中、在信仰中、在上帝面前、在十字架恩典面，最谦卑、真挚悔改、热忱、敬虔的时候】，——我们看见，蒋宋夫妇相濡以沫，真挚相待，感情专一，互相尊敬恩爱的婚姻生活与生命信仰。他们在信仰上彼此心意相合，都愿意谦卑俯伏在上帝恩典的面前。就这一点而言，在中国几千年政治统治的政权历史中，在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历史中，的确是非常罕见的。毋庸置疑，他们彼此认真专诚地对待婚姻的态度，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有着至关重要的关

系。

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彼此相爱的结合，是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恩典制度，其中有着上帝的圣洁、恩慈、智慧的美好心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婚姻家庭】

关于爱情婚姻

==================

两情相悦的爱情

在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系，比如，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恋人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关系，邻舍关系，同学，朋友，路人，同乡，以及社会上更广阔范围内的各种各样行业或领域之间、公众之间、数不胜数、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些不同的关系中，有着很多共同点，因为不论是哪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最终会涉及到人的观念、生活、事业、思想、情感、等等。

在所有这些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男人（丈夫）与一个女人（妻子）之间的爱情。

无论对于个人的心灵与人生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氛围来说，亦或是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传承来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情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因为，这决定了人是否会有幸福的婚姻，是否会有美满的家庭；决定了儿童、青少年是否会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健康积极向上地成长。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奸淫泛滥，或是处处盛行着禁欲主义、摒弃和蔑视夫妻之间的恩爱之情，那么，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人们一定普遍地不会有

幸福童年、美好青少年时期，一定普遍地不会有健康、乐观、向上、积极的性格与人格；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就往往会流行抑郁、暴怒、戾气、争吵、仇恨、猥琐、欺谎、好勇斗狠、蝇营狗苟、甚至战争和生灵涂炭。

____

男女之间的爱情，不仅是美丽的、幸福的，而且更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它不仅是意义重大的，而且更是神圣的；——在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中，在丈夫与妻子的婚姻中，有着上帝美好、恩慈、圣洁的旨意与心意；人在婚姻中，在家庭中，能够学得敬虔、温柔、恩慈与圣洁。

爱情与婚姻如此重要，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和，二人成为一体。"

++

++
++
++
++
++
+

引述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相关内容以及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圣经创世纪2章18-25节：

18耶和华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19耶和华　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样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把牠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牠们叫甚么名字；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20那人就给各样牲畜、空中的雀鸟，和野地的各样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21耶和华　神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　神取了他的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22然后，耶和华　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她到那人面前。23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她当称为女人，

因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25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这里我们看到，I。造物主对人的看顾和慈父般的爱。神给了人诫命，也让人看见他的恩慈，对人顺从神的鼓励，他把人也当作朋友，自己的最爱，和他对人的关心。1。神不愿人孤独：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虽有天上的天使和地上的走兽，人，却真的是孤独的。神给人造一个配偶：（1）这不只是为他的舒适，更为他可以跟自己的同类交流情感和知识，更为他可以更明白爱与被爱。这里神说的是起初的亚当，在（传4：9）里，所罗门也说道了所有的人类。如果，在这世上只有一个人，他该是多么孤独寂寞！完全的孤独能让乐园感觉象沙漠，宫殿象深坑。因此，这世上只顾自己独居的人是不智的。（2）这也不是因为神要从亚当增加人的数目，使人口众多。如果神愿意，他完全可以一下子造出全世界的人，就像他造天上的天使：他愿得敬虔的人，他更愿人彼此相爱。2。神的恩典愿意人在一起：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配偶，跟他同样为人，与他接近，和他同居住，在他的眼前，是他所喜悦满足的。（1）在这世上

即使是最好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彼此的帮助，我们都彼此为对方的肢体，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林前12：11）。我们都应愿意并喜乐地接受和给予帮助。（2）唯有神能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并满足这些需要（腓4：19）。我们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帮手也只能从神而来。（3）合宜的妻子是从神而来。夫妻间的互相帮助，就是应当彼此持久相爱，相助，相鼓励（林前7：33，34）。（4）家庭的氛围，如果彼此和谐，就是孤独的最好良药。满足于神和他的慈惠的人，就是最幸福的，而且有确定的保障。II。

管理众活物的权能给了人。作为一个明证就是，他可以随意给这些起名。神把各样活物带到他的面前，看他叫什么。1。这是人知识的证据。人是这样一位被造物，他有理性和语言。（伯35：11）神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2。这是人的权能的证据。起名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主权的表现。若亚当一直持守神的诫命，我们可以肯定这些活物迄今仍可以听他的呼唤，回答他的声音。神给白昼和黑夜以名字，给大地和海洋起名，也以众星的名称吩咐它们，但是他让这些活物由亚当来命名和管理，因为人是以他的形象所造，人也因此有他的尊严和荣耀。III。人是这些活物的主人，这之中却没有一样可以成为他的配偶，他的帮助。我们看见，1。人性的尊严和高贵。在全地没有一个可见的生物，象人那样，甚至不能和人同等。所有在地上海里天空中的生物，没有一样可以和人相比，能够和人相配。2。世上全地的空乏。把它们都放在一起，竟没有一样能满足人灵魂的渴求，对公义的向往，对爱的渴望。神为人造了一样新的，成为他的配偶，他的伴侣。

21－25。

这里我们看见，I。创造女人，及她成为亚当的配偶。这是第六天发生的，与安置亚当在伊甸园里是同一天。这里是补充上一章关于神创造人的更多

细节。1。亚当先被造，然后是夏娃（提前2：13），她是从男人造的，也是为男人造的（林前11：8，9），这都一般地涉及到女性当有谦卑，温良，安静，顺从的品格，尤其对丈夫应有的顺从和尊敬。然而，正如人是所有生物中最后被造的，人也是生物中最好和尊贵的一样；女人在男人以后被造，女性也应有特别的尊贵，女人更是男人的荣耀。（林前11：7）。如果男人是头，女人就是丈夫上面荣耀的冠冕。男人是直接从尘土造的，女人则是从已精炼的土而来。 2。神使亚当沉睡。人并不曾告诉或建议神这样作（赛40：13）。亚当没有感受痛苦，而是躺下安睡，他把事情都放在创造者的意志和智慧之中。耶和华以勒，让主为我们预备安排。我们所有的帮助其实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感恩地歇息在主里，他就会为我们亲自作一切的工。3。神让亚当深睡，就可以在打开他的身体时不弄疼他；虽然亚当这时还不知道罪，神也留心不让他有痛苦。当神的子民面临肉体的疼痛时，他不仅抚慰他们身体的伤痛，更安抚和安静他们的灵。4。那女人是由亚当的肋骨所造。不是用他的头所造，来管辖他；不是用他的脚所造，来被他踩踏；而是由他的肋骨所造，与他平等，被他的膀臂所保护，贴近他的心被他所爱。亚当少了一个肋骨，这并没减少他的力量（当然，也不会有伤疤），但多了一个配偶帮手，大大超过他失去的：神从他的子民那里拿走一些什么，他必会以更加的丰富给予。这里（以及圣经中其它很多很多地方），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因为在基督（那第二个亚当）的身体里，他的配偶，即是教会被形成；他在深睡时，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有宝血流出，血是为赎他的百姓子民、教会，洗净教会，使教会成圣（弗5：25，26）。II。那女人与亚当的婚姻。婚姻是一件荣耀的事，但是这个婚姻是最荣耀的，因为是神亲自引领。这都是神的工作：他用大能造了他和她俩人，又使他们合一在一起。他们的婚姻是在完全的纯真之中设立的，从那以后再没有婚姻象那样。1。神，那女人的天父，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仿佛亚当的另一半，并真的是亚当的配偶帮手。神造了她，并没把她弃之不问，而是象慈父对自己的孩子一样。2。从神（亚当自己的天父）那里，亚当接纳了那女人：“这是我骨中的骨，现在我有了我的配偶和

帮手，是我在这世上所有的生物中都不能找到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应以谦卑和感恩的心接受，并信靠神在其中的智慧和美意。III。婚姻的设立。在人的纯真状态时，有两个制度的设立。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了教会的持守；婚姻是为了人类后代的延续。 1。看神的旨意是多么强烈：婚姻的力量甚至超过自然的天性。我们和自己的父母的自然关系该多强呢？然而儿子会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女儿会离开父母，跟丈夫结合。（诗45：10，11）。2。可见子女多么需要在选择婚姻时与父母商量，否则他们会多么难过无奈；而子女如果一意孤行又是多么不负责任，多么谬误。3。可见在决定婚姻的大事上我们多么需要祷告和谨守，因为夫妻间的关系是这样亲密持久，相伴一生。4。可见婚姻的联系是多么强烈，决不应以多妻制来瓜分和削弱这种感情（玛2：15），或轻易以离婚来破坏。5。看夫妻间的感情应该多么亲热和亲密，以至于二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弗5：28）。他们有两个身体；以及合一的灵。IV。赤身露体，恰说明他们的纯真和纯洁。他们不需要衣服，冷和热也不能伤害他们；他们也不需修饰，即使所罗门的华丽衣服也不如这伊甸园。害羞感在今天也许是有品德的表现，在那时却不是出于纯真的表情。那在良心里没有罪的人，在脸上和心里也不会羞耻。

+++
+++
+++
+++
+++
+++
+++
+

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妻子舍命；并且妻子要敬重和顺服丈夫。

圣经以弗所书5章22-33节：

22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象顺服主一样，23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象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24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25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好象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27可以作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甚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象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象基督对教会一样，30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31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3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象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

在每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应当是两情相悦的，是由衷而相亲相爱的。同时，在男女之间有不同的角色与特点。

曾经有一个针对婚姻中的丈夫妻子关系的问卷调查统计。问卷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婚姻关系中，如果在'被疼爱'与'被尊重'两者之间，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而不得不放弃另一个，那么，你愿意选择哪一个？"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是：——有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丈夫们都回答说，宁可妻子不疼爱自己，也要让妻子尊重自己；而至少百分之七十的妻子们则恰恰相反，都回答说，宁可丈夫不尊重自己，也要让丈夫疼爱自己。

____

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在夫妻之间，在婚姻关系中，如果要得到长久而

幸福的感情，那么，男女二人就必须要认识到彼此在恋情、婚姻中的角色不同、情感需要、以及各自不同的特点。

男人应当疼爱女人，呵护她，怜惜她，以温柔、恩慈与忍耐的心对待她。甚至，丈夫应当愿意为妻子舍命。丈夫应当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勤勉而努力地工作，在家里面也尽可能地多承担一些力气活、从事一些需要耗费体力的家务劳动等等；而不是好吃懒做、慵懒懈怠、自私自利、只顾自己。

丈夫应当以饶恕、原谅的心，对待妻子，而不是严厉苛刻、颐指气使、呼来喝去。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中已经得到了上帝的饶恕之恩典，如果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真心信靠基督救恩、真诚承认悔改己罪而得到上帝的赦免，那么，我们难道不应当以真挚而恩慈的心，饶恕妻子的错误与过犯吗？

在婚姻中、恋情中，女人应当敬重、尊敬、顺服男人；应当以谦卑顺服的态度，为对方着想，跟从对方的引领，尊敬并顺从于对方的意见，口中经常说赞美和服从对方的意思和话语，行动上常常去做与对方喜好和意向一致的事情。最重要地，也应当是以饶恕、原谅的心，对待丈夫，而不是严厉苛刻、颐指气使、呼来喝去。

显然，在上述所说的男女婚姻恋情关系里应有的这些态度中，它们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难无比。或许，其中最困难的，也是最基本的起点，就是饶恕、原谅的心。

我们每一个世人都是不完美的，都是充满缺陷与罪性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中，不是充满着本质性的罪污；没有一个人未曾在心里说过谎、未曾在心里犯过奸淫、未曾在心里有过不当的愤怒、未曾在心里不贪恋别人的东西，等等。如果世上没有法律惩戒那些作恶的人，如果社会中没有舆论谴责那些违犯道德的人，如果这个世上任何人可以作恶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那么，我们一定会震惊地看见，世人心里有多少罪恶会反映在他们的言语行为之中。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本质上有罪的人，所以，夫妻双方只有互相包容、原谅、饶恕，才可能有真正的爱。但是，饶恕与原谅，绝非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而必须是以心换心、心心相印，必须是建立在诚实地面对错误的基础上。只有在真诚而诚实的饶恕、包容、原谅的基础上，丈夫才能真正地疼爱妻子，妻子才能真正地尊敬丈夫。

【引述 圣经 爱的真谛】

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引述 圣经 关于饶恕】

圣经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引述 圣思录 爱的初探】】】

《爱的初探》：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罗12：9）。

【第一部分】对人来说，这世上最难的事是什么？是工作吗？是生活吗？是旅行吗？是时空的间隔吗？这世上有几种所谓“难”：

1.知道该怎样做，但做起来很费力；

2.知道该怎样做，但做起来很耗时间；

3.不知道该怎样做，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去做，没有固定的具体章程或是程序，但却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去做，付出极大的心情去做；而且，在做之前，甚至不知道能否成功；

4.知道肯定做不成的事情。

第一种，需要勇武的力量，需要勇气。第二种，需要顽强的毅力和恒心。第三种，唯有出于爱。第四种，反而心无牵挂，无憾无悔。

【第二部分】这世上最难的事，是爱。不是吗？人与人之间，家庭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路人之间，最难的，是爱。不是吗？

那么，什么是爱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13:5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13: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13: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13:8 爱是永不止息

爱，不但是这世上最难的事，而且，更是使这世上因此而有了颜色与意义的事情；爱，使人的生命因此而美丽。爱，使人的生命而成其为生命。

【第三部分】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爱的里面，包含着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恨恶恶，亲近善。也正是因此，而使爱成为这世上最难的事。

在对方的身上，善意地指出缺点和恶的方面，鼓励地看待对方正确的、良好的品行。不为对方的恶而气馁，不为对方的善而高山仰止。不卑不亢；因为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的受造之物。朋友，夫妻，亲人，恋人，同事，邻舍，路人的相处之道，应当是怎样的呢？

【第四部分】爱的源头是什么呢？爱的本质是什么呢？爱的归宿是什么呢？爱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神是爱。

他的公义高及诸天，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基督的舍命之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5:13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15:14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15:15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

听 见 的 。 已 经 都 告 诉 你 们 了 。

=================

纯洁而美丽的、两情相悦的爱情，是这个世界上、在人生中最迷人、最令人感到幸福和兴奋、最能够长久的情感之一。然而它是平凡的，并不需要上刀山、下火海去取得；也不需要我们像到天上摘月亮那样困难、那么费力。它所需要的，只是两颗纯洁良善而敬虔的心灵。它使我们的人生不再像是孤独的旅程。它使丈夫与妻子成为终生的伴侣、心心相印的一生挚友。在爱情中，最大的智慧，就是诚实，就是认识到：——真心地为对方好，真心地想对方所想、急对方所急，真挚地做对对方有利的事情，——就是对自己好。

对于基督徒夫妻来说，双方之间的爱与饶恕，不是一句空空的话语，而是真诚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在婚姻生活中的真实体现。是的，我们的天父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中饶恕了我们的罪、接纳了我们；耶稣基督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身体、所流的宝血而向我们显明了他对我们深刻的爱；——那么，我们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饶恕对方的罪与错呢？为什么不能真诚而诚实地向对方承认自己的罪与错呢？为什么不愿意向对方悔改自己的罪与错呢？

两情相悦的爱情，一定是建基于诚挚的饶恕。爱情，不是一个海市蜃楼，也不是一个梦幻泡影，而是真实的每日生活，是一生的相濡以沫。在这样的持续一生的情感中，有欢笑、有泪水、有幸福、也有烦恼，但一切的一切是最真实的。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牵手，立约，盟誓，忠诚而喜乐地走过一生，这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事情。这样的情感，固然需要认真地去思索，去经营，去规划，但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眷恋与挚爱。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眷恋与挚爱，是建基于互相的了解、倾诉、长谈，建基于互相的体谅、帮助、提携、包容、扶助。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一个人行走是孤单的，而两个人牵手走过，则会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充实的人生体会与真情。

爱的里面，包含着"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不仅是一些一般性的道理，更是关乎到我们生命的实际光景、实际事务，包含着事情的真相，

包含着真的事情、真的话语、真的心意、真的行为。爱的里面，不仅是双方为了对方的一般性益处着想，更是要以信仰、公义、恩慈为根基。

真正的饶恕与悔改，也是如此。饶恕不仅是忘记对方的罪与错，更是要以恩典慈爱的心，对付对方的罪与错。真正的饶恕与悔改，唯有是建基于信仰、公义、恩慈。

饶恕与悔改，这是一生的旅程之事。饶恕对方，需要以诚实的心去面对对方，而不是对于对方的罪与错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饶恕，需要坦诚的交谈、诚挚的交换意见、掏心掏肺地倾诉心肠。在两个人牵手走过的一生婚姻旅程中，需要一辈子的相互磨合，需要一辈子的彼此相互饶恕，需要彼此一辈子地在对方面前承认并悔改自己的罪与错之事。

爱人之间的心心相印，不是文过饰非，不是虚以委蛇，不是言不由衷，而是坦率、诚实、开诚布公、温柔、恩慈地彼此相待。真正的爱情，需要以一生的时间，以热忱而谦卑的心，去在其中精心呵护、滋养、经营、沟通、交流、饶恕、悔改。

真正的爱情，既需要脚踏实地，面对日常生活的平淡与繁琐，面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面对日日年年的平静与重复，面对长年累月的生活单调；——也需要心胸的大格局，需要理想、浪漫、情调、默契、以及共同之信仰中的热忱与激情、泪水与感恩。

____

没有什么言语，能够倾诉尽爱情的真谛；正如没有什么言语，能够全部讲述我们的信仰中的忠贞，我们对于上帝的真挚之爱。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4章

1亲爱的，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　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了。2你们可以这样认出　神的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

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是出于 神。3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 神，而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听过他要来，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4孩子们，你们是属于 神的，并且已经胜过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5他们是属于世界的，因此讲论属世的事，世界也就听从他们。6我们是属于 神的，认识 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于 神的就不听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辨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了。

神是爱

7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 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 神生的，并且认识 神。8不爱人的，就不认识 神，因为 神就是爱。9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而活； 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10不是我们爱 神，而是 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11亲爱的， 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2从来没有人见过 神，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

13 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14父差遣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见过的，并且现在作见证。15凡承认耶稣是 神的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 神里面。16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已经明白了，而且相信了。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 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17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到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怎样，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18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可以把惧怕驱除，因为惧怕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完全。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20人若说“我爱 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 神。21爱 神的，也应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 神领受的命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

十里洋场与上海、江浙、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京津、等地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E5%8E%86%E5%8F%B2

上海历史

1843年11月17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抵达上海到任，标志上海正式开埠。当年从广东来了最早的一批英国洋行：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记洋行等，他们发现上海是五口中最靠近丝绸和茶叶产地的一个港口，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当时中国主要的供出口的生丝是产于浙江省湖州南浔镇附近的辑里丝，从南浔到上海的内河航运极为便利。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经过协商以后，划给英国商人经商居住的地段是县城以北的黄浦江西岸，从洋泾浜（1916年填没成为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向北到李家庄（今北京东路）的一片荒滩——外滩，不久，沿着江边供纤夫拉纤的泥泞的道路旁，建成了最初的一批洋行建筑，一般为2层外廊式建筑。李家庄以北到苏州河的地块上则建起了英国领事馆。在上海开埠的第一年，除了商人和领事以外，1843年，属于伦敦会的英国传教士也迅速进入上海。

清朝政府希望根据以往在广州的惯例，在上海也同样实行华洋隔离居住的政策，于是在1845年11月29日，由上海道台和英国驻沪领事共同商定了第一次土地章程（也称“地皮章程”）。这份土地章程被视为上海租界存在和运作的依据法理。次年，在上海的英国侨民成立了自治机构——道路码头

委员会，并修筑界路（今河南中路）以明确租界的西部界限。上海开埠初期，英租界内严格实行华洋分居，界内只有少数世居此地的中国农民，英美等外国侨民共有约300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人。界内修筑成方格形的道路网。

1848年，伦敦会的英国传教士前往青浦县传教，引起纠纷。作为补偿，11月27日，英租界第一次扩充，西界从界路（河南中路）扩充至周泾浜（今西藏路），面积也相应扩展到2800多亩。

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内容参照了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也开始前来上海。与英国侨民以商人为主不同，美国侨民中传教士的比重较高，包括1845年来到上海的美国圣公会、1847年来到上海的美南浸信会、1848年来沪的美南监理会、1850年来沪的美北长老会等。由于传教士的目的是向中国居民传教，所以他们并不聚居在租界，而是分散居住在县城内外的各个角落，如美南浸信会的晏马太立足于老北门外护城河边，美南监理会立足于不远处的郑家木桥，美北长老会立足于大南门外。美国圣公会在城内立足后，1848年，主教文惠廉又请求上海地方官府允许美国侨民在虹口开辟租界，但并未正式划定界限。上海开埠初期，虹口美国租界由于有苏州河的阻隔，甚为荒凉，只在江边建成少数的船坞、码头，和为水手们服务的娱乐场所。1846年，第一名美国商人吴利国（Ltentry G.Wolcott）进入上海，被委任为代理领事，在英租界九江路自己的洋行升起美国国旗，这是租界内第一面升起的外国国旗（当时英国领事馆还设在上海县城内），此事引发了英国领事的干涉。此后，绝大多数美国洋行都设在苏州河以南的英租界内。19世纪美国在上海最著名的商业机构是旗昌洋行。

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签订。1848年，法国领事开始驻扎上海。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宣布将紧邻县城北门外，北到洋泾浜的986亩土地辟为法租界。不过，法国来华经商的商人始终寥寥可数。因此，开埠初期

的法租界虽然拥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却几乎没有什么开发。只在江边有一两个法国的洋行（主要经营瑞士钟表），法国领事馆寄居在天主教会的一处中国式平房内（四川南路），县城北门外的小街上（河南南路）有两排中国人的房屋。其他地方则仍然保持着乡村本色。

与之相比，来自法国的天主教传教机构则显得相当庞大。耶稣会早在上海开埠之前的1842年，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秘密潜入上海附近浦东、松江等地的乡村。1847年，他们选中上海西郊的村庄徐家汇建立天主教江南传教区的总部，此后在附近地段陆续建成包括大、小男修道院，2所女修道院（拯亡会和圣衣会），藏书楼，气象台，土山湾印书馆，男子中学，女子中学，育婴堂等数十个教会机构，形成一大片教会区。以此为基地，将教务开展到江苏、安徽2省。1851年建立了一座公用的中型教堂圣依纳爵座堂，外形属于希腊风格，可能是中国第一所西式教堂，教堂以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命名。

租界发展

1853年9月7日，活跃于广东和福建籍水手中间的秘密会社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烧毁了上海县衙和海关等处，杀了上海知县，囚禁了上海道台。1855年2月17日，小刀会退出上海县城。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占领南京。4月12日，上海租界内的外国人迅速做出反应。在英、法、美三国领事的倡导下，召开上海租地西人大会，通过由侨民组织万国商团（义勇队）的决议，实行武装中立，以维护租界的安全。1854年4月4日，清军企图通过租界进攻占领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万国商团在英、美海军的协助下以武力强行阻止清军过界，史称泥城之战。

1854年7月11日，上海外国租地人举行大会，通过第二次土地章程，成立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

1860年8月17日，太平天国军队首次攻打上海。1862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军队第二次攻打上海。1862年8月，太平天国起义军第三次攻打上海；太平军仅攻至今日城隍庙及石库门一带即攻击受阻，无功退返。

1862年5月1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成立，为了保全上海法租界的独立性，法国驻沪领事爱棠宣布法租界退出工部局，代之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

1862年11月，在沪外国商人提出将上海开辟为自由市的计划，不受制于任何国家。此项计划由各国领事报呈各国驻中国的公使，最后被各国公使以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为由驳回。1863年9月21日，美租界与英租界正式宣布合并。

1864年5月1日，上海会审公廨成立。1869年，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公布。

租界的初步繁荣

1933年的上海市中心区，大体上也就是1899年上海的全部市区范围：南市的华界，北部苏州河两岸的公共租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法租界

从1860年以后，上海开始进入初步繁荣的时期。《北京条约》签订以后，随着长江和中国北方沿海口岸向外商的开放，上海地处长江口、居中国南北海岸线中点的区位优势日益明显，更多的外商——以英国商人为主，其次是美国商人，后来又加上欧洲大陆普鲁士、丹麦、荷兰、瑞典、比利时等国的商人，以及1871年以后的日本商人，都纷纷选择上海作为他们在中国的贸易基地，并设立了领事馆。在这一时期来沪最著名的外商机构，如英资太古洋行。

自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到1906年，鸦片买卖合法化，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鸦片输入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转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海形势也趋于紧张，碍于各国在上海的势力，日本暂对外宣布上海为中立区域，并许诺不将战火蔓延到上海。中国战败后，日本不仅得到了朝鲜的宗主权和台湾，也得以成为在华列强之一，在汉口、天津乃至重庆、苏州、杭州开辟了一批租界，但是其在上海开辟租界的企图归于失败。此外，根据战后的《马关条约》，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开办工厂，此后，日本、英国等国在黄浦江下游的杨树浦地区陆续开设众多的近代企业。上海也迅速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1893年，上海美租界正式划定。1900年上海法租界扩展。1900年8月17日，上海进入警备，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影响不断扩大，在上海的外国势力开始组织自己的防御力量。

中外冲突事件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日趋加快，对土地的需求剧增，四明公所位于法租界的边缘地段，是旅沪宁波人的同乡会兼公坟。1874年，法租界认为有碍卫生，计划将其迁出租界，原址开辟道路，于是强行收缴四明公所的地产，发生暴动，死伤数人，为四明公所事件，此后筑路一事逐搁置。1898年，上海发生鼠疫，法租界当局重提筑路一事，与公所民众发生冲突，死十二人，形成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1905年，由于公廨错审黎黄氏案件，上海民众发生暴动，围攻巡捕房。

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

1911年 辛亥革命，清朝迅速灭亡，上海一时变得无政府化，会审公廨的司法权遂完全操纵在领事手中。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由于改朝换代，清朝的遗老遗少有不少人选择避居上海租界。民国的新势力尚且稚嫩，从中央到地方，军阀当道，社会呈现出一片无序混乱的状态。然而就在同时，上海的租界却有如国中之国，独享着一份特别的平和，甚而，租界在经济、人口等各方面都进一步加快了其发展的速度，由1912年开始至1936年可谓上海租界高度繁荣的一个阶段。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战场远在欧洲，但在上海租界内，列强原有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了，在上海租界占据优势的英法等国迅速将德奥排挤出租界的权利机构和社交生活，英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则得到允许，获得德国人留下的空位。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并且宣布废除德、奥在华的一切特权，收回两国在汉口、天津的租界，并关闭驻在各地、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内的领事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在上海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自从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大扩展之后仅仅十余年，由于上海经济的飞速发展，新发展的北区（商业区）、西区（住宅区）和东区（工业区）的绝大部分地段已经建成新兴的市区。1915年1月27日，公共租界工部局又推出《推广租界草案》，3月4日刊登在《工部局公报》上。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趋于扩大化的影响，此次的扩张计划被搁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租界问题，未果。1919年5月7日，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义勇队戒备租界。

1920年代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成立。1921年7月23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民国初年，上海虽然在行政上属于江苏省，但驻防上海的历任松沪护军使事实上受治于浙江督军，先杨善德，后卢永祥，均属于皖系。1924年9月，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福建孙传芳、安徽张文生，向卢永祥发动进攻。9月18日，齐燮元的军队攻陷杭州及浙江全省，卢永祥退往上海。10月，两军在上海近郊发生激战。13日，卢永祥下野东渡日本，江浙战争结束。这次战争破坏相当严重，造成规模不小的难民潮涌入上海租界。

1925年1月齐燮元又被奉系军阀邢士廉赶走。10月孙传芳又将邢士廉赶走。上海处于孙传芳控制之下。

1925年5月，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厂主枪杀罢工工人代表顾正红。5月30日，上万名工人、学生、群众前往租界组织大示威，部分学生在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涌到老闸捕房门前交涉，印度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13人，打伤40多人，工部局宣布戒严。造成五卅惨案。事件引发中国社会各界对外国在华势力的不满情绪，各地普遍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要求。在上海，由于中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大规模越界筑路宣告终止。

1927年2月下旬，孙传芳与奉系联合对抗北伐军，让奉军毕庶澄部驻防上海，孙退守扬州。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员钮永建和共产党员周恩来等组织上海工人纠察队暴动，占领了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1927年初，中国国民党右派对左派控制的武汉政府的容共政策和鼓励工农群众运动的做法日益不满。3月24日，北伐军攻入南京时，发生杀害外侨和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的南京事件。

4月2日，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国民党元老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要求阻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势力膨胀，进行“清党”。而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组织右派工会“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与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对抗。上海两租界也深恐1月份收回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的事件和3月24日南京事件在上海重演，在蒋保证不以武力改变租界现状后答应提供援助。

4月11日夜，杜月笙诱捕并杀害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4月12日凌晨，“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成员从上海租界冲出，攻击华界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白崇禧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对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会后，10万多工人、学生到宝山路国民革命军第26军第二师周风歧司令部请愿。士兵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共产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及支持者，逮捕千余人，并将首要份子枪决。至15日，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史称四·一二事件。

此后，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上海法租界秘密成立）的中央机关仍然隐藏在公共租界中区闹市的云南路达数年之久，直到1933年江西苏区稳固后才

迁往那里。193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并被杀。

1930年代

在1930年代，上海的繁荣达到鼎盛时期。在1920年代，汉口、广州、香港几大商埠都因为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繁荣大为减色，不少中外商人转往上海发展。1928年，南京被确定为中华民国首都，原来大批聚集于北京、天津的政客又纷纷南下，其中很多都选择在上海租界中定居。

自1925年以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停止了越界筑路，上海租界的平面扩张态势受到扼阻，于是租界内开始大规模兴建高层建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18日，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外，发生了日本僧人被工厂纠察队殴打致死的事件，日本侨民大肆报复，焚毁三友实业社，砍死租界华人巡捕，袭击华人商店。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从北四川路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国军十九路军的猛烈抵抗。1月29日凌晨，日机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中日两国在上海闸北区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方投入总兵力达三个师团七万人，中国方面，张治中指挥的第五军也加入上海作战，甚至南京国民政府也暂时迁移到洛阳，以示决不屈服（年底才迁回南京）。直到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中国军队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开始撤军，次日宣布停战。

1932年5月5日，中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国军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

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在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韩国人反日人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海军中将野川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史称虹口公园爆炸案。

1937年8月13日，蒋中正调动大约70万中国军队（包括他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在上海附近与日军展开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虽然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最终实力占优势的日本军队击败了中国军队，武力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在淞沪会战期间，闸北华界几乎全部被毁，而上海公共租界的北半部，即今虹口、杨浦两区作为日军防区和日本势力范围，和华界一样受到重创。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自从1937年淞沪会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则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孤岛时期。

1930年代，大批文化名人聚集在上海。鲁迅从1927年起，定居虹口公园附

近（上海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达十年之久，发表许多杂文和翻译作品，与内山完造等一批日本侨民结为好友，直到1936年病逝。此外还有一批左翼作家，1930年代，美国好莱坞影片在上海大行其道，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和法租界霞飞路上的国泰大戏院（Cathay Theatre）都开设于这一时期，设备豪华，专门放映好莱坞影片。二三流影院也放映国产片，当时中国的电影业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5个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艺华影业公司、新华影业公司。同时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明星，如周璇、阮玲玉等。周璇的名曲《何日君再来》后来被许多歌手一再翻唱，直到1980年代由邓丽君翻唱时，又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再度掀起热潮。当时的著名舞厅集中在静安寺路，包括仙乐斯舞厅（Ciros）、百乐门舞厅（Paramount）等。

1940年代

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对英美宣战。次日清晨，日军自虹口经过苏州河上各桥梁开进公共租界。中区（西藏路以东）由日本海军管辖；西区（西藏路以东）由陆军管辖。为了维持上海国际都市的形象，日军让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照旧运转。此后陆续将英美等敌国侨民拘捕至集中营，工部局也完全由日本控制。待情势稳定之后，日军又解散了万国商团。由于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向德国投降，因而日军并未占领法租界。

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6月5日，汪精卫政权先收回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7月30日，汪精卫政权收回最为重要的上海法租界，改称第八区。上海法租界宣告结束，历时近百年。（8月1日，汪精卫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10月10日，更改原租

界地区240条路名。

1943年8月，日本将已有百年历史的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权，美英也宣布放弃租界。

1945年，蒋中正政府从日军手中接管上海。次年，国民政府统领的国民革命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爆发大规模内战，战斗起初在北方地区进行，对上海尚未造成影响。但是随着战事扩大，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逐步崩溃。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击败国军后控制上海全境，此间，许多与国民政府及海外机构有关的人员和机构追随国民党撤离上海。

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创办的上海《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性刊物，是当时中国进步民主运动的一面重要旗帜。《观察》的被查封，标志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悲歌啼鸣至此。标志着近代中国一些民主人士希望在中国实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彻底破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文艺界趋向沉寂。这一时期，富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张爱玲发表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初期

1949年5月27日，陈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攻占上海。陈毅担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1950年代，原有的直辖市陆续被裁撤，最后只剩下上海和北京2个直辖市。1950年代上海的另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在1958年，将江苏省的松江专区的上海、嘉定、宝山、松江、金山、川沙、南汇、奉贤、青浦9县以及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共10个县划归上海市，使上海市辖区范围从636平方公里猛增到5910平方公里。保持了中国工业中心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

1967年1月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王洪文领导。1967年1月6日，在王洪文、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即“一月风暴”，夺权运动席卷全国。

改革开放后

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南方许多城市，尤其是经济特区的挑战。在1989年六四事件，上海各界市民和学生也积极参加了反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多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6月5日，上海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且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

罢工抗议行动。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当天晚上8时30分，来自北京的161次列车撞死在光新路道口5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晚上10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并导致造成交通中断，而群众也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且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也因为发表激进文章，而被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下令关闭。

进入1990年代后，上海重新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及贸易中心。1993年，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了城市发展速度。目前保持年人均GDP6%以上的增长。目前，上海正向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的目标迈进。浦东与浦西连接通道的建造进程也标志着上海的发展进程，为浦江两岸的共同繁荣奠定了基础。1991年12月1日，上海第二座跨黄浦江大桥南浦大桥通车，1993年10月，杨浦大桥竣工通车直到2003年6月28日卢浦大桥的建成，黄浦江上已经有了6座大桥；同时1970年9月，打浦路隧道建成；1989年10月24日延安东路越江隧道通车至2003年9月29日大连路隧道通车。越江通道的发展，使得处在市中心金融贸易区的陆家嘴发生着显著的变化，1994年11月，东方明珠电视塔完工；1999年3月18日，金茂大厦正式开张营业；1999年8月，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开业。

21世纪

上海自从浦东开发后承办过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增加了其国际影响力，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大陆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

2001年10月21日，上海承办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06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此外，每年还有各种主题的大小展会在上海大量举行。会展业已经成为上海的重要产业之一。

2006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法挪用32亿社会保障基金，借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因此北京中央政府100多名调查人员前往上海，调查非法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的大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此被撤职查办。

2008年，已平顶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成为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最高大厦（后被赶超）。

2009年11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宣布上海迪士尼乐园项目申请已获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次年开始动工建设。

2009年11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第一站即上海。在上海期间，奥巴马发表演讲，并与中国青年对话。

2010年4月30日，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这是在中国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至10月31号结束。

2010年11月15日，静安区胶州路728号一幢28层的公寓大楼发生一起重大火灾，共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事发后，市民自发举行哀悼。

2013年8月，当前世界第二高摩天大楼、也是现时中国第一高楼的上海中心大厦结构封顶。

2014年12月31日（跨年夜），外滩陈毅广场之台阶处因大规模人流对冲发生重大踩踏事故，共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

2016年6月16日12时，位于上海浦东的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幕。

2017年12月31日，黄浦江两岸合计45公里滨江岸线公共空间全线贯通，正式向市民开放。

2018年12月30日，上海地铁已开通运营16条线路、413座车站，运营里程

676公里，是全球范围内线路总长度第二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5%8E%86%E5%8F%B2

浙江历史

越国及吴越融合

马桥文化发展成越国和吴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认为越王勾践世是大禹的后代。东汉时史学家编写了《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来描写这段历史，两书的作者都认为吴越两国地理相接，习俗相同，语音相通。《越绝书》所谓“吴越同俗”。

吴国在消灭了江北的邗国（今苏北扬州）、淮夷等国后，与楚国爆发激烈冲突。吴王阖闾时，以越国不协助吴国攻打楚国为由而入侵越国，结果阖

闾中箭身亡。继任吴王夫差同越王勾践进行了20余年的战争，最后越王勾践于前473年吞并吴国，并迁都东海琅琊（今江苏连云港境内）。

由于受到楚国持续打击，勾践的子孙越王朱句被迫把国都迁回到吴国灭亡时的首都——句吴（今苏州阖闾城），此后四代越王都以吴为都，直到楚国克吴，越国灭亡为止。

越王无强时，越国发兵向北攻打齐国，向西攻打楚国，与中原各国争胜。齐威王使说客成功说服越国不打齐国转攻楚国，遭到楚威王的军队反击，越国大败，导致越国由盛转衰。

鲁班对楚国进行了技术援助，导致越国的惨败。早期吴国同楚国打仗，多以吴国取胜。由于吴越同楚国的战争多在长江上以舰队方式展开，居于下游的吴越舰队能够借助水势撤退，而楚国舰队的撤退以及进攻都需要人力对船的控制，因此楚国舰队常处于弱势。鲁班设计的新型船勾解决了这一问题，致使长江水战对下游的越国舰队不利。到公元前306年，楚国占领江东地区，越国迁往钱塘江以南固守。

同时，浙江南部的东瓯国（都于今浙江温州境内）是越国的一个封臣（见南宋罗泌《路史》引《越绝书》佚文），从封建法律关系来讲，虽然东瓯国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但名义上仍是越国的一部分。

越时中原各国多推郡县制，越国境内是否实行不详，楚国侵吞越国西北部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后，设立江东郡。

楚、秦、汉时期

前306年，楚国攻占越都后，越国退守钱塘江。楚在浙西设立郡。秦国灭楚国以后，旋即进入两浙，“降越君，置会稽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两浙成为秦会稽郡的一部分，郡治在吴、越两国故都吴县（今苏州）。

秦二世元年（前209），天下反秦。流亡江南的原楚国淮北贵族项羽在苏州袭杀秦会稽郡太守，率领8000江东子弟起兵。刘邦建立汉朝后，两浙仍置会稽郡，并一度为封国吴国的范围。浙江东南部的东瓯国在吴王刘濞叛乱以后被闽越国灭亡，后来也属会稽郡管辖。

这一时期两浙属于秦帝国和汉帝国的边陲地区，尤其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太湖流域和宁绍地区与岭南等地一样，是罪犯流放之地。

到东汉时期（25年－220年），会稽郡治所迁往山阴（今绍兴），苏州成为新设的吴郡治所。

秦国占领浙江后，将原越国本部设立会稽郡，行政中心位于今天的苏州，此前相继为吴国、越国的故都。浙江省当时主要属会稽郡，西北一部属丹杨郡，南部温台丽地区属于东瓯国，大片地区仍未为郡县覆盖。下面是位于浙江省内的郡县。

六朝

东汉末年，浙江曾为军阀王朗和严白虎所据，后来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孙坚及其子孙策、孙权逐步统一长江下游地区。此后直到589年隋国南下吞并陈朝时，浙江以及邻近的太湖地区（即秦时的会稽郡辖区），为吴（东吴初以曹魏为正）、晋、宋、齐、梁、陈六朝领地。此时古会稽郡已经逐渐分为会稽郡、吴郡、吴兴郡、义兴郡、临海郡、东阳郡、永嘉郡和新安郡，合称为“会稽八郡”。

东吴时期，孙权认为曹魏对江南的入侵是要使“江南人民为奴婢”，孙权以此刺激江南人民反抗曹魏的勇气。当时浙江西部和皖南等山地仍为山越部落，与平地的两浙人有所不同，为增加吴国人口和兵力，吴国对山越进行征抚，并且大搞屯田，以增强吴国的国力。

280年，浙江在吴降晋后转归晋国统治。318年，由于中原发生五胡乱华，

晋皇室南迁至前吴国故都南京。与此同时，大量中原贵族和士大夫南迁，也就是所谓的衣冠南渡。此时的南下中原人口主要居住在南京周围和太湖以西地区，会稽八郡并不是这次中原士族南迁的最主要居住地，不过东晋时的望族谢氏则主要居住于八郡，王氏（王羲之家族）也定居山阴。

东晋隆安年间，由于对上层士族的门阀统治不满，会稽八郡发生以五斗米道教主孙恩为首的起义。

隋唐

公元589年，在陈为隋所并后，浙江再次进入中原王朝统治时期。隋朝修建了大运河，将太湖流域和洛阳连接起来。

武德九年唐军进入浙江地。从贞观元年开始，太湖流域由于物产丰厚，战争时期粮食大批被征调到北方。唐高宗年间，两浙已经有一定比重的北方氏族移入，经济也向纵深发展。由于江南茶业的发展，唐时增设了多个山地产茶县。安史之乱后，因为河北沦陷，关东失守，两浙在全国赋税来源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北方局势的混乱也使更多北方文人迁入两浙。

吴越国

黄巢革命彻底摧毁了唐朝腐朽的统治。军阀董昌在镇压黄巢的过程中加剧了吴越地的割据，他的部将临安人钱镠在杭州建立了吴越国，在中原经历五代十国纷争的百年动荡中，吴越国保持了东南的稳定和繁荣。为两浙成为日后中国繁庶之地奠定了基础。吴越国时期人口达到55万户。钱氏“善事中国（五代政权）”“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也成为浙江的重要政治文化。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宋王朝，取代了后周。978年，宋以武力消灭了南方八个国家，吴越国第五任 国王 钱弘俶根据先祖“善事中国”、“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的遗训，主动上书“纳土归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将所13州， 86县55万户及11.5万兵卒全归北宗王朝，成为十国中惟一不通过战争手段而和平统一的地区。

两宋

978年，宋国大军压境，吴越国君臣在经过商议后为保全两浙民生，北宋和平统一吴越国（960年－1127年）。北宋在原吴越国和南唐东部地设立两浙路，下设14个州：苏州、常州、润州、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台州（临海）、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梅城）、温州和处州（丽水）。两浙路基本继承了唐代的两浙道。

当北宋灭亡以后，宋室在杭州建立南宋（1127年－1279年）今天浙江的省会杭州，当时称做“临安”，就成为南宋的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临时首都）。

由于两浙多年未受战火侵袭，这段时期 两浙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并凭借粮食、茶叶和丝绸等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赋税重地。

明朝

朱元璋的明朝军队在1368年击败今浙江境内方国珍的武装，占领浙江全部，设立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朱元璋后将首都应天府（今天的南京）和龙兴地中都凤阳组成一个新的行政区划——南京（南直隶），将原宋朝浙西路的苏州、松江、湖州府、嘉兴府地划予南直隶；后因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实在太小，1381年，湖州府、嘉兴府地划予，从此太湖流域分属两地，而浙江省范围于此后700年间未有太大改变。明朝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设立11个府、1州、75县。

明朝时浙江是全国赋税重地之一。此时嘉兴、湖州发展为生丝的主要产地。对外贸易也极其活跃。但是朱元璋对两浙人支持张士诚和方国珍对抗

明朝向来不满，遂对包括浙江在内的沿海实施封闭锁国的海禁政策，使商业文明和重商倾向较明显的浙江备受压制。海禁严时更有“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并实行“迁海令”，沿海居民一概内迁，严重威胁沿海居民生计。洪武十九年(1386年)舟山46岛居民30000余人被强遣入内地，次年全国唯一的海岛县昌国县（今舟山市的前身）废除。故有明一代沿海渔商民及倭人冲击海禁的事件频频发生，到嘉靖朝时终酿成所谓的大倭患。

明朝在1368年赶走蒙古人，设立了浙江布政司，从此浙江的边界线至今变化很小。明朝的浙江布政司下辖11个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宁波府、绍兴府、台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温州府、处州府（丽水），至今仍大体保持稳定。

清朝

清兵入浙后，于康熙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为浙江省。由于浙江曾积极抵抗清兵，满清对对江南文人采取高压政策，野蛮的文字狱、明史案即发生于浙江。在浙江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捕杀曾静等事件。

清朝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月5日，英军炮轰定海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翌日城陷，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率军抵抗后阵亡。根据战后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宁波成为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1861年，太平军从江西进入浙江省，除最南的温州地区外全省各地都受严重影响。由于江浙地区是官员和绅士的主要来源地，这一地区对于儒教的信仰致使民团不断与太平军作战，造成浙江全省除最南的温州地区外，人口损失惨重，尤其是浙江西部的湖州、杭州两府各县，人口损失多在2/3以上，尤其武康、孝丰、安吉3县，人口损失在96%以上。太平天国战争导致

大批江浙人士进入上海的外国租借避难，对上海的开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同时，湘军的势力开始在浙江迅速扩张，1861年后的多任浙江巡抚由湘军把持，直到葛毕氏案发生后，湘军的力量才大为削弱。

中华民国时期

浙人治浙（1911年—1917年）

辛亥革命以前，浙江是革命党活动活跃的地区，浙人章太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成立光复会，影响波及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1911年11月，杭州新军起义，时任浙江谘议局议长汤寿潜被推举为首任浙江都督，周承菼为浙军总司令，宣告浙江独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浙江省省会仍定于杭县（原称钱塘）。1月都督汤寿潜改任中华民国首任交通总长后，浙江各界又公推蒋尊簋为浙江都督。但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蒋尊簋被迫辞去都督，袁遂任命朱瑞为浙江都督。

1916年4月12日浙江省宣布独立，布告安民。5月，公推吕公望为浙江都督兼省长，倡导"浙人治浙"，加入反袁护国运动。省议会议长沈定一召集被袁世凯解散的省议会复会，恢复《临时约法》，行使省议会的权力。但由于局势动荡，吕公望无力掌控浙江政局。1917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杨善德带兵来杭任浙江督军，齐耀珊任浙江省长，浙江各界虽力拒，但终未挽回局面。

历任浙江都督：

汤寿潜（1911年11月-1912年1月）

蒋尊簋（1912年1月 – 1912年8月）

朱瑞（1912年8月 － 1916年）

吕公望（1916年）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7年—1927年）

杨善德就任浙江督军后，浙江省被正式纳入北洋军阀势力范围。杨去世后，卢永祥接任浙江督军。杨卢2人均属皖系军阀。因当时的江苏省为直系军阀统治，所以浙江督军节制同属皖系的上海地区。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属直系军阀的江苏督军齐燮元联合江西和福建进攻皖系的卢永祥。10月战争结束后直系获胜，驱逐卢永祥。浙江进入直系军阀统治时期，督军为孙传芳，直至北伐战争结束。

历任浙江督军：

杨善德（1917年1月- 1919年8月13日去世）

卢永祥（ － 1924年）

孙传芳（1924年 － 1927年8月）

历任浙江省长：

吕公望（1916年-1917年1月）

齐耀珊（1917年1月-1920年6月24日）

沈金鉴（1920年6月24日-1922年10月29日）

张载扬（1922年10月29日-1924）

夏超（1924年-1926年11月21日）

陈仪（1925年10月 － 1927年7月）

清末民初时期，浙江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和开埠较早，较早的接触了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并且投入到推翻清朝的统治的斗争中。孙中山后期的革命经费大部都是浙江湖州的丝绸商人筹集和捐赠的。蒋介石就是依靠江浙财阀的势力上台。湖州人当时就占国民党中常委的1/3，控制了当时的政权。浙江人还较早参与了当时上海的开发，宁波人大量移民上海，湖州人控制了当时上海大部分码头和租借大半房产，并建造了百乐门，和平饭店等知名建筑。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1937年）

1927年2月底，北伐军占领浙江全境，7月27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浙江开始了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十年建设，其间多项重要基础设施竣工。1927年，杭县分拆出杭州市，仍为浙江省省会。1929年，张静江在杭州成功举办了第一次西湖博览会。

国民政府时期历任浙江省主席：

张静江（1927年7月27日推举为省主席）

何应钦（1927年10月5日任命，1928年11月7日免除），1928年5月14日后省主席之职由蒋伯成代理

张静江（1928年11月7日任命，1930年12月4日免除），二度就任。

张难先（1930年12月4日任命，1931年12月15日免除）

鲁涤平（1931年12月15日任命，1934年12月12日免除）

黄绍竑（1934年12月12日任命，1936年7月25日免除）

白崇禧（1936年7月25日任命，1936年9月6日免除），实际为其本人拒绝，由徐青甫代白崇禧省主席职

黄绍竑（1936年9月6日任命，1936年12月2日免除），二度就任

朱家骅（1936年12月2日任命，1937年11月26日免除）

黄绍竑（1937年11月26日任命，1946年3月26日免除），三度就任

沈鸿烈（1946年3月26日任命，1948年6月22日免除）

陈仪 （1948年6月22日任命，1949年2月21日免除）

周嵒 （1949年2月21日任命，1949年5月逃离大陆）

胡宗南（1952年10月19日任命，1953年7月23日撤往台湾）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

浙江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一直属于第三战区。

战争爆发后，浙江北部的嘉兴、吴兴、长兴等地是前期淞沪会战的主要战场之一。1937年8月14日14架日军战机从台北起飞，跨海进入浙江，企图突袭杭州笕桥机场，爆发八一四空战。中国空军在装备性能、数量和技术都相对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在杭州笕桥上空与日军飞机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击落日机数架，取得空战大捷。8月下旬，浙江境内成立杭州湾北岸守备区和浙东守备区。

11月14日，嘉善失守。18日，嘉兴失守。21日，吴兴失守。25日，长兴失守。年底杭州亦失守，日军大举进攻浙江。日军对浙江的侵略主要沿铁路线展开。为阻缓日军行动，国府对浙江实行焦土政策，包括毁弃铁路和公路，撤出城市居民和物资等。期间朱家骅担任浙江省主席，赶在日军进入杭州前撤出市民、机关、学校、工厂，炸毁钱塘江大桥，形成敌我隔钱塘江对峙的浙江正面战场。

1939年3月21日拂晓，日本侵略军为进犯江南，扫荡浙东，策应正在进攻南

昌的日军，土桥一次师团一部在富阳周家浦偷渡。抗敌自卫团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奋战三天两夜，取得东洲保卫战的胜利。1940年1月，日军土桥师团乘雪天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

1940年7月16日，日军调集炮舰及登陆舰30余艘、航空母舰1艘、飞机30余架和3000余兵力，从海上进攻镇海，威胁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和抗日前哨宁波。时第194师师长兼宁波防守司令陈德法指挥其所属部队和增援部队，在戚家山争夺战中大败入侵之敌，毙伤日军1000余名，击落日机一架，日酋萍乡月蜀切腹自杀，取得抗战中的第一次反登陆海防战大捷，是为镇海大捷。

1942年5月，省政府南避云和。

期间，浙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要受害地区之一。目前，在义乌和衢州分别建有细菌战纪念展览馆，反映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犯罪史实。

1945年9月4日第3战区参谋长张世希与驻杭州的日军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在富阳宋殿村（今属富阳区受降镇）举行洽降会谈。

汪伪政权的浙江省主席（省长）

浙江沦陷后，日军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命浙江省省长，到1940年编入汪伪政权。汪伪的浙江省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先沿用省主席之称，后于1943年1月改称省长。历任省主席（省长）有：

汪瑞闿（1938年6月任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浙江省省长，1940年3月任汪伪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24日病亡）

梅思平

傅式说

项致庄

丁默村

浙江在国共内战期间（1949年-1950年）

国共内战后，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据点尽失。1949年5月，温州、杭州、宁波等浙江大陆各城相继易守。但中华民国政府仍继续有效统治浙江沿海诸岛，国民政府的浙江省政府迁至舟山，登步岛战役后国共方正面冲突减少。1950年5月，浙江省政府等驻舟山各机构及大量人员随中华民国国军由舟山撤退台湾，省政府及浙南行署等皆因之撤销。随后解放军进驻接管舟山群岛。

国民政府弃守舟山后，仅有在浙江东南的大陈列岛（台州列岛）、一江山、披山、头门山、渔山、南麂等岛而由国民政府控制。，而撤退到岛上的县政府包括温岭、临海、黄岩、平阳、三门、乐清、玉环七县。

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遂派胡宗南，在1951年9月赴大陈岛成立"江浙总部"，并以江浙总部为基础，相应重设"浙江省政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

1952年，浙江省政府七县合并为温岭、临海、平阳、玉环四县，改三门县为"渔山管理局"，并设立"竹屿管理局"，该两管理局原是与大陆直接贸易之特区，但一年后随即裁撤。

1953年，蒋中正决定改采守势作战，浙江省政府迁至台湾，当地再设立"大陈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治理，行政督察专员则由原政务处长沈之岳担任。

1955年1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陷一江山岛，国民政府见大势已去，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将大陈岛上的军队和居民全部撤退至台湾，随后更撤离南麂，而浙江省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在台湾的浙江省政府亦

随之撤销。浙江省至此全境易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建国初期，因为抗日战争、通货膨胀的打击，浙江的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底层民众穷困潦倒。中国共产党在接收国民党资产后，进行了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垄断金融业；又将农村作为工作中心，积极清剿土匪，恢复秩序，颁布农业生产优惠政策，推动土地改革运动；但由于处于国防前线，浙江省在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没有引进任何重点工业项目。1958“大跃进”起，浙江经济受到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响，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省内债务负担增大，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

改革开发初期，浙江制定了“扬长避短”的经济战略，大力发展纺织业，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浙江农村率先开始工业化。80年代开始，各类商品市场开始活跃，民营经济开始赶超国营经济并占据经济半壁江山，涌现出一批经济强劲的乡镇及村，义乌小商品市场、海宁服装皮革城以及绍兴全球纺织市场中心等一批大型市场逐渐建立，浙南还出现了以家庭工业为特点的“温州模式”。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改制，私有制企业取代集体企业成为浙江省新的发展热点。在宽松的政策背景下，浙江逐渐成为中国大陆民营经济GDP占比最高的省份之一，形成了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导的“浙江模式”。

当前浙江是中国大陆民营经济最发达、县域经济最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北京、上海两大直辖市，位居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区第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33年保持省区第一。浙江亦是建国以来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地：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1956年，温州永嘉县率先试行“包产到户”。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杭州西湖畔的刘庄（今西湖国宾馆）草签了中美上海公告。1979年，温州市颁发了中国第一本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1985年，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在嘉兴海盐县动工建设。2008年，宁波舟山港成为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嘉兴乌镇。2016年，G20峰会在浙江杭州召开。2022年，杭州亚运会即将召开。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8%8B%8F%E5%8E%86%E5%8F%B2

江苏历史

春秋末期，吴国在吴王寿梦在位时成为强国，在前484年击败位于今天山东的北方强国齐国，称霸中原。前473年，吴国被位于今天浙江北部的越国所灭，前306年，越国又被西面的强国楚国所击败，最终越国为秦国在前222年所消灭，形成统一的中国。

秦朝，西楚与汉朝

秦汉之际，项羽曾以此西楚为国号，号称西楚霸王为当时中国国家元首但未正式称帝。西楚以今天江苏淮安楚州为中心，范围大概是今苏北与皖北；而最大城市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以东到海被称为东楚；楚国历史上的中心，江陵到寿春被称为南楚。楚汉之争后项羽失败自刎，汉朝建立。

汉初在江浙一带设立同姓诸侯国荆国，后"上患吴会稽之轻悍"（汉高祖刘邦害怕吴地、会稽的人不服从他的皇权），于是派遣刘濞为吴王，统治（或者说镇压）今江苏淮河以南和浙江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刘濞统治会稽郡、丹阳郡、广陵郡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刘濞狼子野心，后来他发动七国之乱，其叛乱失败后逃往位于今浙江省温台地区的东瓯国，然而东瓯惧于汉朝压力杀了刘濞，刘濞的儿子又逃往位于今福建省的闽越国（东越国），并且鼓动闽越王进攻曾杀害他父亲的东瓯。后东瓯为闽越所灭，汉朝帮助东瓯移民迁于江淮之间的庐江郡（今属安徽）。

汉朝的江苏绝大部分属于2个州：长江以北属徐州刺史部，长江以南属扬州刺史部。今江苏北部设有楚国4县（都城在今徐州）、泗水国2县（都城在今泗阳附近）、广陵国4县（治所在今扬州附近）、临淮郡18县（治所在今泗洪附近）、东海郡13县（治所在今山东郯城）、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诸城）赣榆县。扬州刺史部（非今日之扬州市）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大部、浙江、江西和福建，在今江苏南部设有会稽郡7县（治所在今苏州）和丹阳郡5县（治所在今安徽宣城）。

六朝

三国时期，江苏南部属吴国 (222年－280年)。中部及北部属曹魏。317年，西晋遭受外族侵略，汉族权贵逃亡到江南，在建康(今南京)先后建立起东晋和随后的4个朝代 (南朝，420年－589年)。江北地区则成为南北进行拉锯战的场所，时而属于南方，时而又属于北方。

隋唐

589年隋朝灭陈，重新统一南北，并完成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隋代起初对南朝遗民采取高压政策，包括苏南地区在内的南方许多地区出现了萧条景象，后来经过南方地主的斗争，隋朝终于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南方政策，使得苏南及其他原陈朝统治的长江以南地区出现了复苏的景象。但六朝旧都建康在战争中受破坏过于严重，整个唐代不见起色，加上晚唐建康处于淮南、浙西、宣歙三大藩镇交界之处，很容易受到战争的破坏，直到南唐立国江宁，南京城才开始恢复六朝盛事。

在隋末大乱中，军阀沈法兴先破坏了扬州城，然后攻入江南，对江南经济造成不小的破坏。其势力最远曾到达杭州。

唐朝(618年 – 907年) 是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唐代皇室粮食供应需要依靠江南，唐王朝规定每年二月江南运粮船集中于扬州，于是扬州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商业城市。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属江南东道，长江以北、淮河以南部分属淮南道，淮河以北属河南道。 晚唐中国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问题，江苏也长期出现了淮南节度使（驻地扬州）和浙西观察使（驻地镇江）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五代、杨吴、南唐和吴越

五代、杨吴、南唐和吴越都是晚唐藩镇割据的产物。其时今江苏省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属五代，今苏州地区属吴越，其余地区属杨吴和南唐。892年，淮西（今属安徽）人杨行密在扬州建立吴国，937年徐州人李昪代杨吴自立，建立南唐，定都江宁。吴越的建立者钱镠因镇压黄巢流寇有功，受到唐朝统治者的嘉奖，因而成为浙东军阀。976年，宋朝大军攻入江宁，同时吴越军队攻入常州，淮河以南最后一个阻碍宋朝统一的政权——南唐灭亡。

宋朝

宋朝(960年-1279年) 时，富裕商人阶层和新兴的市场经济得到发展，苏州

和江宁等主要城市成为新兴商业中心，成为富裕的代名词。

北宋在今江苏省长江以南部分置两浙路（上海和浙江省杭嘉湖地区同属这一路），今南京地区属江南东路，长江以北大部分属淮南东路。 今天徐州地区属于南京应天府所在的京东西路。

1127年，女真族的金国征服了华北等汉族地区北部，流经江苏北部的淮河，成为北方的金国和南方的南宋的边界线。京东西路被撤销，淮南东路，江南东路，两浙西路仍然存在，在边界有了微调。

元朝

13世纪末，蒙古人控制了汉地全境。元朝初期，江苏属江淮行省；后化江而治理，长江以南与浙江，福建，皖南同属江浙行省，长江以北与皖北，湖北，河南同属河南江北行省。

明朝

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汉族明朝，赶走了占据汉地的蒙古人，起初定都南京。今天整个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在后来的江苏省境内共设有7个府，其中位于江南的有5个：应天府（南京）、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和镇江府；位于江北的只有2个：扬州府和淮安府。

1421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此后南北两京和两直隶并立200多年，江苏南部苏州等地，由于繁荣的纺织工业继续成为全中国的经济中心，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大小市镇星罗棋布，地价之高、赋税之重名列全国之首。同时这一带的文化水准也是全国最高的，产生的状元人数在全国科举考试中长期稳占一个很大的比重（清代的数字是全省占40％，苏州府占20％ ），对全国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味带来深远的影响。扬州和淮安2座府城因为是京杭大运河上漕运（南方粮食运往京城）

和食盐贸易的控制点，因而名列中国长江以北少数几个最繁荣的城市之中。

清朝

1645年，满族清朝军队攻占扬州和南京，俘虏南明弘光皇帝，随即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最初设一位江南布政使司（驻江宁府），以及三巡抚(江南巡抚、凤庐巡抚和操江巡抚)。根据康熙年间的《大清会典》，布政使为一省之长。因此江南布政使的到任，可以认为江南省成立。清军在扬州、江阴和嘉定等地遭到激烈的抵抗，发生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剧。

顺治十八年，江南布政使分为左、右两位，分驻江宁府、苏州府。右布政使辖宁、镇、苏、松、常，左布政使辖余下地方。然这两位布政使仍冠以“江南”头衔，所以不可能认为江南分省。

康熙五年，江南右布政使增领扬州府、淮安府和徐州，左布政使则相应减少。因此左、右两布政使辖境已经和现在安徽、江苏两省十分接近。康熙六年，左、右布政使分别改为安徽布政使、江苏布政使（这是“安徽”、“江苏”这两个省名出现之始），依然分驻江宁府、苏州府，但江宁府本身属于江苏布政使辖境。此后，清代典籍里面“安徽”、“江苏”出现次数逐渐增加，但“江南省”字眼仍十分常见。康熙朝也并未有记载“分省”。所以这里的两个布政使辖境还只是两省的雏形罢了。另外，康熙二十九年，分定江南、浙江洋汛，嵊泗地域划归江南省江苏布政使司的崇明县。

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从江宁府前往安庆府。同时，江苏布政使一分为二——江宁布政使（驻江宁府）和江苏布政使（驻苏州府）。江苏省境内形成了一巡抚两布政的格局。不过，从清朝中期开始，巡抚逐步取代了布政使成为一省之长，所以江苏内部分两个布政的情况并不被认为是“分省”，毕竟名义上还有“江苏巡抚”统辖坐镇。至此江苏、安徽两省官僚体系完全定型，在清代文献中出现频率逐渐高过“江南”的频率，因而坐实了分

省的事实。

在清代，江苏巡抚驻扎在苏州，安徽巡抚驻扎在安庆，在南京则设有节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江苏、安徽两省的乡试，则始终共用同一个江南贡院（在南京）。1780年以前，管理安徽民政的安徽布政使也长期寄驻在南京，1780年安徽布政使迁往安庆以后，在南京另设江宁布政使一职，管理江宁（南京）、扬州、淮安、徐州4府和通州、海州2直隶州。江苏学政驻扎在江阴。另外在淮安府城驻扎有漕运总督，府城西北15千米处的清江浦（今淮安市主城区）则驻扎有南河总督（江南河道总督）。两淮盐运使驻扎在扬州，负责管理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两淮盐场，规定的销区包括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省（称为“扬子四岸”）、河南省南部、江苏省江宁府以及长江以北各府；不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的盐则来自浙江余姚、岱山，上海松江等地，盐商的店牌也由驻地杭州的巡抚盐漕部院两浙江南盐运使司颁发。

清代江苏省在沿海地区增设了3个直隶州：太仓直隶州、通州直隶州（南通）和海州直隶州，并将徐州由直隶州升为徐州府。由于人口大量增加，江苏南部许多县都一分为二，造成许多2个县共用1个县城的情况（民国以后消失），苏州城内甚至同时有3个县的县衙：吴县、长洲县和元和县，为全国唯一的特例。

1840年代，江苏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1843年，江苏东南部原来一个不知名的小城市上海根据《南京条约》被辟为通商口岸，以后又设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迅速发展成贸易、金融和国际化的大都会，到20世纪初已经拥有数百万人口，在1927年，终于正式脱离江苏成为独立的院辖市。镇江和苏州也分别设立了英租界和日租界，其规模较小，其中镇江租界曾经一度较为繁盛，拉动城市向西扩展。

晚清时期，江苏南部受到太平天国(1851年 – 1864年，发源于遥远的广西，扰乱大半个南中国的基督教异端教派，1853年定都南京，改名天京）

的重创，强烈影响达十余年之久，苏州的经济中心地位被当时的新兴城市上海取代。

1864年7月，曾国藩弟曾国荃率湘军攻破天京后纵火杀掠。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死亡人数有争议）。”是为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

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建立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起义并宣布独立，于3天后成立沪军都督府；十五日（11月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并于当日建立江苏都督府。十月十二日（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江苏都督府迁往南京。在此之前，松江、无锡、镇江、嘉定、南通、扬州、徐州、江宁等地相继建立军政分府及都督府。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在此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9日，江苏都督府迁回苏州。此后废镇江都督府，置江北都督、徐州军政长，为江苏都督府的军政分府。沪军都督府改置为民政等厅。临时政府北迁之后，江苏都督府再次迁往南京。11月19日，置江苏民政长，为全省民政长官。12月，军民分治，省行政公署成立。

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成果，于2月15日，被参议院选为临时大总

统，随后孙中山正式宣布解除自己临时大总统职务，临时参议院决定将政府迁往北京，是年3月，临时政府北迁之后，袁世凯就此篡夺了中华民国最高权力，开始他的黑暗统治。袁在4月军事会议，制定全国裁军计划，要求第一步把全国军队裁减一半。袁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处留守，主要目的就是想利用黄兴替他遣散军队，而黄竟以为建设时期已到，通过民主方式即可约束袁氏，因而大刀阔斧地在同盟会势力所及的江南地区积极裁军，如南京附近的革命军队，仅两个月时间就三去其二，只编成 3 个师。因而在袁世凯准备以武力消灭革命党人之时，革命党人就已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况之中。

反袁起义

民国二年（1913年）初，由同盟会联合其它团体组成的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着手组织内阁时，于3月25日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孙中山由日返沪，商讨对策，坚决主张对袁世凯进行讨伐，但党内意见极不统一，黄兴等人以为军事上不足与袁世凯抗衡，因而主张法律解决，党内只有李烈钧等少数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4月和5月，国民党曾在上海两次召开秘密会议，但未能统一意见，做出决策。而此时袁世凯则于4月26日与五国银行团签定2500万英镑的借款协定事之后，立即准备对国民党进行讨伐。北洋军兵分二路，东路由第2军军长冯国璋率第4、5两师及张勋、雷振春、倪嗣冲等部由津浦路与河南向南京、安徽进迫，另派海军由郑汝成率领在上海登陆，抢占上海制造局。在部署基本就绪之后，于6月撤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都督职。孙中山见战争迫在眉睫，不顾党内反对意见，毅然决定发动讨袁战争。在7月12日李烈钧发布讨袁檄文及通电后，原不赞成武力讨袁的黄兴，因遭到党内激进派的责难，自告奋勇赴南京，与李烈钧互为回应，于15日宣布讨袁，被推为南京讨袁军总司令。随后，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于7月23日宣布通缉孙中山。

江苏方面，江苏讨袁军冷遹的第3师驻守徐州，与北洋军张勋等部在利国驿一带激战，互有进退，后因北洋军兵力增加，而讨袁军中则有部队被北洋军策反，致使战线崩溃，7月24日放弃徐州。原计划前线各军在临淮关设防再守，但后因江西及徐州战事失利，军心涣散，各师相继自行撤退，冯国璋即率北洋第2军很快渡江，黄兴于万不得已中一走了之。驻守南京的革命军在没有领导和统一指挥下，进行了天堡城保卫战，人自为战，血战20余天，至9月11日，终因兵力悬殊，南京失守。上海方面，陈其美于7月22日率蒋中正、刘福彪等部进攻北洋军盘踞的上海制造局，但久攻未下，被迫撤退。居正、钮永键防守的吴淞炮台，在北洋海军的攻击之下，坚持到8月13日终于失守。其他各省，或败或降，江南基本上落入袁氏之手。大批革命党人惨遭杀害，孙中山、黄兴等人被迫流亡日本。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云南护国军起义反袁，随着北洋军全线崩溃及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使袁遭到沉重打击。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去世。

江浙战争

袁世凯死后，全国陷入军阀割据状态，江苏此时为直系军阀冯国璋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江苏的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无锡、南通和常州的纺织工业得到较大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到十四年（1925年）之间，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陆续通车，徐州作为铁路枢纽，再度成为一个重要城市。

直系军阀独揽北京政权以后，咄咄逼人，不可一世。各种反直势力深感压力，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正式组成反直同盟，双方又在寻找新的战机。浙江督军卢永祥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原为皖系，而江苏督军齐燮元为直系将领，直系千方百计想将上海和浙江划入自己势力范围，因而此一战势不可免。9月，齐燮元借口卢永祥收容了直系军阀孙传芳击败的福建皖系臧致平、杨化昭部队，向卢发动进攻，战端即开。直系为打败卢永祥，动员了苏、皖、闽、赣、鄂、6个省的直军共5个

师5个旅，共4万多人，由齐任总司令，分路向上海、长兴等地发动进攻。卢永祥则将其所属部队及从福建退入浙江的皖军组成淞沪联军与之对抗。9月3日，两军在黄渡相遇，战争爆发。上海为两军争夺焦点，因而双方均将主力集中于淞沪周围，反复激战于黄渡、安亭、浏河、南翔、罗店、青浦、嘉定之间。后孙传芳率部由闽入浙，防守仙霞岭的卢军一部倒戈，浙江战场激变，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9月25日孙传芳进入杭州。之后，齐燮元指挥各路直军全力进攻淞沪，扫清上海周边，直抵龙华。10月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14日齐燮元军队进占上海，江浙战争结束。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在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自任浙、闽、皖、赣、苏五省联军总司令，分兵进攻奉系军阀。奉军为缩短战线保存实力，将部队从上海、南京一带撤至徐州，从此东南五省成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北伐战争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在两湖击败吴佩孚取得胜利之时，准备在江西开辟新的战场，实现消灭孙传芳的战略目标。8月下旬，孙传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抽调兵力，组成援赣军，任命卢香亭为总司令，率兵进入江西，孙传芳随后赶赴江西亲自督战。11月上旬北伐军进入南昌，孙传芳潜逃南京。孙传芳在江西战场投入的10万兵力，绝大部分被北伐军歼灭，动摇了孙在东南五省的统治。

在北伐军取得重大胜利之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决定出兵援助孙传芳及吴佩孚。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即先攻取浙江、淞沪，消灭孙传芳主力，然后合攻南京。北伐军编为3路，东路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以第一军为主，辖6个纵队，分2路由赣东和闽北进攻浙江，夺取杭州、上海。2月下旬，北伐军在浙江战场取得胜利之后，立即进军苏、皖，攻取沪、宁，以

东路军的第1、2、3纵队沿沪杭线进攻上海，第4、5、6纵队及中路军的第二军进攻苏、锡、常一带，两路协同围歼浙沪之敌，而后与江右军会攻南京。此时孙传芳将余部 2 万余人全都布署在上海周围的松江、青浦、苏州一线，准备决战到底。直鲁军也派万余人分赴上海、松江、南京、镇江等地助战。3月13日，两军在蜀山、张诸、溧阳一带展开激战，14日北伐军攻克张诸、蜀山、宜兴，占领溧阳，至20日，各纵队分别占领沪宁线上黄村、奔牛、吕城、常州、丹阳等地，切断上海与南京的联系。北伐军此时重新布署，东路军由白崇禧率领第1、2、3纵队进攻上海，第4、5、6纵队配合，主力进攻松江之敌。北伐军与直鲁军激战两昼夜，于3月21日夺取松江，上海门户已开。何应钦即命各部向上海进攻，第一师攻占龙华，第二十六师至梅家街，第二十一师进占苏州，海军进攻吴淞，上海已为北伐军四面合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国民党钮永建和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并建立起一支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3月22日，白崇禧率部进入上海。

3月20日，中路军的程潜命包围南京的各部队向南京周边各据点发起猛攻，经过3日激战，陆续攻克陶镇、秣陵关、龙都镇、江宁镇，直逼南京近郊。何应钦所率东路军也到达镇江。3月23日，程潜下令总攻南京，当天即突入南京城，孙军与直鲁军仓惶溃逃，北伐军俘虏4000余名，缴枪300余枝，炮百门，夺取南京。

蒋介石控制东南五省及宁、沪等地后，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携手，准备发动清党行动，消灭共产党，建立其自己的独裁统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进行大屠杀。事后，亲共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在4月15日于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二届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严厉声讨蒋介石并决定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南京十年

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定南京为首都。民国十七年（1928年）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在名义上完成了统一。并在10年之内，同时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建设，包括修建了早期的公路网。国民党政府正式定都南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南京和上海脱离江苏省成为独立的院辖市，江苏的省会则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迁往镇江。

抗日战争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中断了中华民国的黄金时代。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沪宁铁路沿线的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2月13日，南京陷落，3个月之久遭受日军残酷的南京大屠杀。沪宁铁路沿线的镇江、无锡、苏州等城市的商业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镇江陷落以后，国民党江苏省会迁往苏北。南京成为中国东部沦陷区汪精卫政权的伪都。汪精卫政权在苏州设伪江苏省政府，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曾以徐州为中心设立了伪淮海省。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新四军则在江苏北部的农村地区立足，在盐城设立军部，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5万人，为敌后抗日游击战奠定了基础。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战争结束时，部队发展到40万人。新四军收复了清江浦（淮阴），作为苏皖边区政府的首府。

全面内战

战后，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而中国共产党则控制了部分苏北地区。11月30日，在淮安成立苏皖边区政府。不久，国民政府依持其军事上的优势，企图一举消灭立足于东北与华北的中国共产党政权。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7月，国军调集重兵向苏中和苏北的新四军驻地发动进攻。解放军在华东司令员粟裕的指挥下，对国军发起苏中战役，与国军激战到12月底，国军攻占了苏北全部城镇，解放军被迫退出苏北。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国民政府为了避免徐州部队重

蹈东北部队全军被歼的覆辙，决定将主力收缩到津浦路的徐州至蚌埠段两侧，采取攻势防御，以阻止解放军南下。必要时将放弃徐州，凭借淮河进行抗击，以确保南京、上海的安全。同年底，国军、解放军在徐州附近一带进行的淮海战役，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军近60万大军，并攻占了长江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政府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主要兵力丧失殆尽，首都南京及金融中心上海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同时，由于此战国军黄埔军系损失大半，造成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内之地位动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之桂系借此对他攻击，使蒋介石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底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

到了同年4月，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国、共双方和谈宣告破裂。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迅速渡过长江，占领江阴要塞，并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南迁至广州。同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镇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都北京。建国初江苏省曾分设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1953年苏北行署、苏南行署与南京直辖市合并，成立江苏省，省会南京。 与安徽省的省界有小幅的调整：盱眙县和泗洪县划归江苏，作为交换，江苏徐州的萧县和砀山县划给了安徽。但这又使得历史上长期隶属于扬州的天长县成为伸入江苏境内的一个锲子。

改革开放后

1980年代，江苏南部就以乡镇企业著称。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起初的热点集中在南部海岸的广东省，迅速将江苏抛在后面。

1990年代开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得到重视，江苏南部与上海联系紧密的两个城市苏州和无锡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均超过省会南京，名列全国十强。而南京经济总量大约在全国15名上下。 苏南形成了常锡一带的民营重工业，苏州地区的民营纺织业和民营水产养殖业，与上海、浙江一起形成了苏浙沪民营产业中心，这是一个同广东珠三角地区并列的中国两大民营经济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苏南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是近30年来苏南经济转型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以南京老市区的江南部分为代表，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和华东第二大中心城市，集中江苏省内的重大国有项目；目前苏州市区（不含昆山五个县级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及一般预算地方财政收入已经逼近南京主城。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4%BA%8C%C2%B7%E4%B9%9D%E8%BF%90%E5%8A%A8

华北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指1935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发动的要求“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致对外抗日”的学生运动。中共对之定性为抗日民主运动、爱国民主运动、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重要一页。

狭义的“一二·九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请愿游行，以及12月16日北平市更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活动，和1936年1月初“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还包括同时期受北平12·9、12·16游行的影响在全国20多个城市掀起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响应。这一阶段是受中共《八一宣言》思想影响下，以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为领导核心发动起来的学生运动。广义的“一二·九运动”还包括1936年2月1日成立的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运动很快扩大为全国及海外并历时三年的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民先”停止发展，“民先”成员符合条件的可以入党。广义的“一二·九运动”是直接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之下，包括1936年1月底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下属的学联党团、1936年4月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学生工作委员会，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

背景

日本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继续向华北步步进逼。1933年爆发长城抗战，热河省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对日本之态度，激起中国国内许多人士不满，给正遭围剿的中国共产党有机会扩大影响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一直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围剿镇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势力，对日本对中国进行的不断侵略处于被动状态，导致中国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与热河省被日本军队全部占领。日本当局操控“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逼迫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不断退

让，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从华北撤出党、政、军、宪、特力量，成立以宋哲元为首的推行“华北高度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在这种局势下，北平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走上街头，抗议国民政府不对日本进行反击，请愿要求国民党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成功透过潜伏在燕大、清华和东北大学的地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他们所设立的学生组织，鼓动学生的爱国热忱，在国内制造尽快与日本开战的舆论。胡适等学者曾用了二十多日劝喻学生“安心求学”，以失败告终。在期间，胡适甚至收到来自一名热血青年的恐吓信。

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局势日益危急。1935年6 、7月间，日本通过《秦土协定》控制察哈尔省，10月指使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在河北省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李守信与德王筹备蒙古军政府，大力策动“华北特殊化”、“华北五省自治”。何应钦为首的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宪兵三团于1935年9月撤出华北，由29军宋哲元部主政，计划于1935年12月成立宋哲元为主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知识界的反应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一则《敦睦邦交令》，宣布“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防害邦交罪论处”。

1935年11月18日由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公开发表宣言：

近有人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天津、北平国立学校全体教职员二千百余人，坚决反对。同时并深信华北全体民众均一致反对此种运动。中华民国为吾祖先数千年来披荆斩棘艰难创造之遗产，中华民族为四万万共同血统，共同历史，共同语言文化之同胞组成，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吾人当以全力向政府及地方当局请求立

即制止这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的组织情况

1933年3月，国民革命军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对共产党、共青团及外围积极分子大逮捕，在国民革命军的镇压下，解散了北平二十多所大中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的抗日活动陷入沉闷。一二·九游行爆发时，整个北平还保持着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仅有9人，连共青团员不到20人。北京大学甚至没有学生会（直至12·9请愿游行次日，即1935年12月10日才成立北大学生会）。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彭涛，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撤退回北平后于1934年考入辅仁大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与彭涛过去在平大附中的同学谷景生取得联系，又找到共青团员周小舟（1935年夏从北师大毕业，在北平两专女中任教员），在北平的大中学校开展工作。1935年1月，时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工委），同时恢复共青团北平市委，许子云任市工委书记，王学明（身份为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任团市委书记。1935年5月，周小舟加入中共。1935年7月，市工委再遭破坏，团市委未遭破坏。河北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党的组织，派李常青到北平，宣布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实际上是以团市委代行中共市委职权，任命王学明为临委书记，杨子英为组织部长，彭涛为宣传部长。谷景生为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分盟（"左联"）的党团书记。杨子英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书记，周小舟任北平分会宣传部长并主编《抗日新闻》后调去搞北平教师联合会的工作，由黄敬接任负责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工作。此后在北平大中学校建立20多个武装自卫会分会、会员有500多名，成为后来的北平学联与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5年9月，冷楚接替杨子英为组织部长。1935年10月，随着登载了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文件及中共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八一宣言》的英文版《莫斯科工人日报》与《国际工人通讯》，中文版的《救国时报》传入北平，

北平的党组织与大中学校学生了解到要与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原则精神，这促进了河北、北平党组织对时局的估量和斗争策略与方式上的转变。1935年12月7日，中共河北省委派出特派员李常青来北平，进一步了解情况，与王学明、彭涛、姚依林、黄敬都谈了话，但未表明态度。 一二·九运动初期实际负责人是彭涛并起主要作用，实际前线工作以经验丰富的黄敬为主，谷景生主要做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和负责左联工作。1935年12月20日河北省委把王学明与彭涛同时调走，正式派遣林枫到北平成立北平市委，林枫任市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

1935年10月，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出版的载有中共《八一宣言》的《救国时报》传入北平。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直接促成了北平地下党组织与学生运动的转向。

但这时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尚未召开，上述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尚未自上而下按照组织系统传达、贯彻。

准备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下游山东境内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北平分会在西山召开会议，参加者包括彭涛（市临委成员）、周小舟（武卫会宣传部长）、黄敬（北大代表，数学系大一学生，党组织关系尚未接上，22岁）、郭明秋（女一中代表，团员，18岁）、姚

依林（清华暑期同学会代表，化学系大一学生，18岁）等人，会上决定在北平组织发起“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赈济会”，8月29日正式成立，总部设于女一中。女一中学生会临时主席吴闺箴被推举为赈济会主席，姚依林担任赈济会秘书，并在北平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登记备案，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在北平市20余所大中学校组织了赈济会的活动。姚依林后来回忆说：“这个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募集所得大约有二千来元(白洋)。我们送了大部分捐款给山东赈灾，……留下约五百元备用。这笔钱即后来‘一二九’运动的经费来源之一。”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促进了群众性抗日活动的开展，联合了北平的进步学生，是组建北平学联的前奏。不久，郭明秋担任女一中学生会的正式主席，接任赈济会主席。

1935年10月22日，燕大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决定，授权学生自治会请哲学系研究生高名凯草拟电文，发给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要求政府开放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在征得清华大学、北平师大、女一中、贝满女中、北平汇文中学，以及天津的汇文中学、法商学院、河北女师、中西女子学院等校学生会的支持后，此电文作为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联合宣言》，连夜印刷，寄送到全国各大中学校、报刊杂志社。并于1935年11月初发表在天津的英文报纸上。

1935年10月底，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基本结束。彭涛与黄敬、郭明秋、姚依林开会，一致主张成立一个公开合法的学生群众抗日团体，将救灾活动变为政治活动。以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为基础，11月18日北平11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为便于掩护和公开活动，推选北平市立女子第一中学为“总务”单位，女一中的学生杨彤与郭明秋（共青团员，市团委宣传部长，18岁）先后任执行主席，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姚依林（18岁，1935年11月入党）为学联秘书，镜湖中学学生孙敬文（19岁，中共党员）为总交通，东北大学俄语系学生邹鲁风（23岁，次年入党）为总纠察使，

燕京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黄华（22岁，燕大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36年1月入党）为总交际。实际领导人为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组织部长彭涛（辅仁大学学生，22岁）。姚依林事后回忆：“‘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复”。

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脱离中国政府,其区域甚至包括北平近郊的昌平、顺义、通县，情势十分危急。这逼得宋子文让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曾养甫，通过铁道部科长谌小岑找到中共外围的进步教授吕振羽、再找到北平地下党周小舟，传递国民党要就联合抗日开展国共谈判的消息。11月下旬，北平学联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1935年11月27日，清华全校学生大会未能通过“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在12月3日的全校大会上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

北平学联主要负责人在盔甲厂13号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客厅开会并写信给当时民众十分尊敬的宋庆龄，请她指点北平学生应该怎么办。12月初，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转来宋庆龄的答复，明确建议北平大中学生采取行动，说最重要的是行动起来!

1935年12月3日，学联第三次代表会通过发起请愿游行活动，并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反对任何脱离中央或类似之华北自治组织。“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以此为口号争取占大多数的中间派学生投入抗日请愿游行。

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动员全国对敌抵抗，提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华北为核心的九项政治纲领，呼吁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此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于是学联于12月7日决定将请愿活动

定于12月9日。12月8日，清华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校代表来到政治气氛宽松的燕京大学男生体育馆开会，会议由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讨论了如何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请愿，布置了口号、行动策略和请愿的六条纲领，对游行的时间、地点和路线都作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当有人提出“不到八百人是否可以取消游行”时，彭涛回答说：形势到了，就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就会燃烧起熊熊大火来。彭涛提出，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要由那些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首先上街，造成声势，然后就可以到进步力量较弱而又被学校当局严密控制的学校进行动员，喊他们出来参加游行。请愿六条纲领是：

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

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

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

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会后，各校代表回校分头动员。燕京大学为了不走漏风声，在8日晚21时才敲钟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在学生会主席张兆麟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次日到北平城内请愿游行。蒋南翔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清华大学学生会于8日晚召集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12月9日群众游行示威的决定。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孙敬文等北平学联领导人于8日晚又在女一中碰头开会，检查准备情况，并作了次日请愿游行的指挥分工。

1935年12月7日或8日，中共河北省委派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了解中共北平临时工委成员的分歧情况，但未直接表态。

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被散发，其中说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经过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当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女生陆璀（21岁）手持大号扩音筒，站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一个站台上，向学生和市民群众讲话。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6期采用拍摄的陆璀喊话照片做了封面，并且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一二・九运动的报道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与世界各国，这张新闻照片也成了一二・九运动学生形象的代表。事后，陆璀被清华大学开除学籍，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在北平学联策划、组织、领导下，针对国民政府即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请愿游行。北平学联设立行动指挥部，姚依林和郭明秋坐镇西单北亚咖啡馆负责各校游行队伍的联络协调；孙敬文任总交通，指挥各校步行与骑车的交通员；黄敬在游行队伍中参与一线指挥；而彭涛则作为此次游行的实际幕后领导人不在游行队伍中露面。

城外参加游行的学生主要来自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他们计划从这两所大学出发，逐渐壮大队伍，但不料当局关闭了西直门，于是燕大、清华游行学生未能按计划进城到中南海居仁堂面见何应钦并由燕大学生作代表当面递交请愿书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

燕京大学男女学生共编成六个大队，每队九十人。清华学生早晨5时集合出发，学生队伍沿平绥铁路线于8时在西直门与燕大学生会合。北平大学农学院20多学生，弘达中学、成达中学的100多名同学也陆续抵达西直门外，聚集已不下两千人，就在城外的空地当作会场，开起群众大会。燕大学生会

主席张兆麟、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燕大学生赵志萱等演讲，控诉日本兵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明确表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领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陆璀回忆：

“那天一早，天还蒙蒙亮，我们就集合了。到了西直门呢，城楼上、城门旁边都有军警在看守，就是不让我们进城。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决定，就在西直门城墙旁边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很巧的，我们就把它用来当主席台。同学们临时推举我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讲讲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事先也没有准备，但是那种悲愤的心情是大家共有的。所以当我说，北平是我们中国人的北平，现在呢，中国人不能进去，反而日本人在城里横行霸道，请问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谁的天下呢？说到这里，我自己也禁不住声泪俱下了。那么，同学们就举起拳头喊，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这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西直门外的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3时，何应钦的代表、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在西直门由门缝中向城外对各校学生代表们说：“诸位的各点要求，已转达何部长，他已全盘接受，请同学们赶快回校……”各校同学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分别整队返校。

12月9日清晨，位于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传达了北平学联的决定，选举该校政治经济系大二学生在宋黎（东大地下党支部书记，24岁）为“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总指挥。这时，交通员传来消息，西直门关了，城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被阻于城外，这种情况下，东北大学孤军出动，经新街口、北沟沿转到西四北大街、西四牌楼、府右街前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门前，与东北中山中学队伍会合，其它学校的学生三五成群突破封锁，在新华门前会合了2000多人，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宋黎、董毓华、陈泽云（于刚）等12人被推选为请愿代表，向何应钦当局提出了北平学联的六项要求。何应

钦的秘书侯成作为代表和学生进行了对话，说：何代委员长不在北平，代表们提的要求可以转达；学生们要谅解政府的困难，好好地读书救国；并拒绝了学生代表提出打开西直门让清华、燕京学生进城参加请愿的要求。宋黎当场决定，请愿改为游行示威，并考虑到城内许多学校被军警围堵，学生队伍没有完全拉出来的情况，为了集结同学、壮大队伍、宣传群众、扩大影响，决定游行路线由新华门出发，沿着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沙滩、王府井大街，然后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一路上冲击遭军警包围的中国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弘达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女一中、女二中、志成中学、成城中学、镜湖中学、汇文中学、艺文中学、河北高中、孔德中学、竞存中学、精业中学、辅仁大学（刘达等100多学生）、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和两吉女中等学校的同学加入游行行列，人数扩大至六、七千人。游行队伍经过北大红楼时，北大历史系同学汪德昭仓促从课堂中跑到楼下打钟，所以北大参加“一二·九”游行是临时参加的。北大化学系大一学生刘居英（18岁）跑到东斋，拿起床单撕开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用两个竹杆挑着就出去参加游行。北平当局以为游行队伍要去东交民巷冲击日本使馆，调来大批军警队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救火车堵塞了街口。最终游行队伍在此地被消防水龙头与军警冲散。宋黎、黄敬等立即决定：“同学们到北大三院集合去!”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商讨了下一步的行动，决定从10日起全城总罢课。

12月14日，北平的部分报刊登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6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决定12月16日再度举行游行示威，确定的示威游行路线是：先到天桥集合召开市民大会，然后进前门，经天安门，向东单行进，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各校学生队伍分为四路。第一路共 8 所学校，由东北大学任领队学校。第二路领队学校是中国大学。第三路领队学校是北京大学。第四路城外各校，领队是清华大学，并汲取一二·九当天城外的学生队伍未能进入西直门的教训，决定除了大队学生由西便门的铁路门入城外，燕大、清华还各派三十名同学

提前一天进城，一定要代表燕大、清华和城内各校的同学一齐参加游行示威。12月16日9时，燕大、清华学生代表在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宿舍集结，燕大三十人在前，清华三十人居中，后面是二百多人的东北大学的学生队伍，从西直门内北沟沿出发，一面游行示威，一面发动沿途学校的学生来参加，在锦什坊、石驸马大街等地联络、接应了被军警包围校门的北平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镜湖中学、平民中学、师范大学、民国学院、民国学院附中等，于上午11时会集到天桥召开市民大会。这天游行中黄敬仍担任随队的第一线指挥，黄敬站在北平天桥的有轨电车后面的铁梯上讲演，宋黎在下面撑扶，被新闻记者照了下来公开发表了，这张照片差不多是一二・九的象征，在全国以至世界上都流传甚广。因而在历史叙述中黄敬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和代表人物。在天桥的大会结束后开始示威游行，队伍绵延两里地。当游行队伍到达珠市口时，燕京、清华、平大农学院、孔德中 学等城外的学生队伍经西便门的铁路豁口进城赶来会合。北平已经有6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参加。此时，游行队伍已达两万多人，比12・9请愿游行的规模大数倍。前门已被军警关闭，并两次鸣枪威胁。游行队伍不得不绕道和平门，遇阻又直奔宣武门。这次学生游行，宋哲元的北平当局有了准备，天近黄昏时，在骡马市大街，军警宪兵以棍棒、大刀背、水龙头，清场驱散学生，各校受伤者二百五十多人，还有二十二人被捕。12月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北平学联在这里举行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血淋淋铁的事实”7个大字下面，500多件学生的血衣令人触目惊心，到会两千多名各校学生代表一致要求发表文告，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被捕学生一个星期后没有受审讯，便被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其他几个大学校长联合保释。

后续学生行动

1935年12月20日，北平当局“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呆不住，便转移到了汇文中学。这时邓力群正在汇文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担任学联开会时的保卫放哨等工作。 为抑制学生

运动迅猛发展，北平当局宣布各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限期离校，以使学生分散，孤立各校2000多积极参加的学生。彭涛、黄敬、郭明秋、姚依林、高慧如等在位于辟才胡同“同一个”洋车厂的彭涛住处开会，接受了黄敬的建议：为保持学生运动的势头利用寒假发动学生到平、津以南的河北省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工农群众，同时在平津学生队伍中锻炼出一批经得起考验的骨干。北平学联一共组织了四个扩大宣传团，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500人左右。设不公开的党团，书记彭涛，与黄敬带队南下，姚依林与郭明秋在北平留守组织后援；同时设总指挥部，由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大三学生董毓华（27岁）、北平师大学生江明（姜文彬，24岁）、东北大学学生宋黎组成，均为党团成员。

第一团由北平东城的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各校同学组成，团长为北大物理系大三学生韩天石（北大学生会主席，21岁）。

第二团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西城、南城各校同学组成。团长为北平师大的江明（姜文彬）。1月15日，第二团在新城县的辛立庄，遭到北平侦缉队特务和保安队的堵截，除一部分团员突围出去寻找第一团外，其余的人都被特务绑架到卡车上，押送回到北平。

第三团由西郊和别处同学组成。由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燕京大学的黄华，辅仁大学的曹嵩龄组成指挥部。1936年1月4日上午在蓝靛厂集结出发。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以及几个外国记者，按事前的约定来拍照、采访兼送行。美国米高梅公司还有人来拍了电影。

第一大队：清华五十个同学编成

第二大队：燕大同学四十六人，贝满女中、华光女中同学三人编成

第三大队：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和市一中等校同学五十多人编成

第四团由北洋工学院等天津同学组成。负责人南开大学李明义(后改名李哲人）和北洋大学徐瑞恩。

学生步行南下，每到一个集镇人多之处，即张贴标语，演讲，唱歌，演街头短剧，召开群众大会。南下学生也看到北方农村的经济凋敝、贫穷落后，农民受到极残酷的剥削，对国家大事闭塞无知，但纯朴憨厚，热情直率，在明白抗日的道理后，即坚定表示决不做亡国奴，要打走日本人。

1936年1月8日，四个扩大宣传团由不同路线来到固安县城会合。固安县长边应侨紧闭城门禁止学生进入。四个学生宣传团只好住在四门城关的大车店。1月9日由董毓华代表平津学生扩大宣传指挥部作了总结报告。第三团学生继续南下至高碑店，遭到县局警察和北平侦缉队便衣警察的围困搜查，被迫乘火车返校。第一、二团走到了保定后返校。1月下旬，北平市委书记林枫（1935年12月20日由河北省委任命并到任）与姚依林、黄敬等开会，决定以“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为基础组建全市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由黄敬任“民先”党团书记；设立北平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已经由团员转党）、黄华（当时称王其梅），姚依林任书记。[12]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民先”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有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大会决定把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并入“民先”。通过了“民先”的“斗争纲领”和“工作纲要”。民先北平总队部第一任总队长敖白枫（高锦明）。1936年5月，高锦明调任中共北平西区区委书记，清华学生李昌接任总队长，组织北平各级民先组织层层选举，并于8月召开北平民先代表大会，动员同学利用暑假回乡发展民先组织，至1936年10月已在30个县市有了民先组织，包括里昂、东京、巴黎等国外6个城市。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多人，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支地方队伍，大会决定在原名“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前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为全国性的

青年骨干组织，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全国民先”。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李昌为全国民先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等七人共同组成全国总队部，由北平学委领导。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民先”作为中共外围组织，在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中宣传鼓动，吸收成员，为抗日青年投奔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宣传、组织上的准备。

1936年2月中旬，南京国民党政府认识到全国各地学生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抗日救亡运动烈火燎原，于是颁布了《维护治安紧急治罪法》，又发布命令取缔平、津学联。北平当局对各校学生大逮捕了二百多人。北平的河北省立高中高二丙班18岁学生郭清被捕后受刑挨打，于3月9日庾死狱中。北平学联于3月31日上午9时在沙滩的北大三院礼堂召开郭清的追悼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东北大学学生王庸从棺材铺借来一口空棺材放在礼堂中央，到会一千多各校的民先队员和积极分子，被地方军警包围，学生抬棺冲出到北池子大街游行，被军警冲散，53名学生（包括17名女生）与1名记者被捕羁押于北新桥炮局子陆军监狱，为“三三一事件”。另，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支持学生请愿并参与筹备召开华北各界救国会，在1936年2月29日北平军警宪兵包围清华大学大搜捕时被抓，当年5月被冯玉祥保释出狱，这时张申府也与“三三一事件”被捕学生关押于同一囚室。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也被关在这所监狱与两名“三三一事件”被捕女同学在另一间小牢房内。北平党组织负责人王世英做了取代何应钦主政北平的宋哲元的工作，以各校校方名义陆续在半个月后保释被捕学生。

1936年3月，北平学联与天津、上海、杭州四地学生代表在杭州召开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大会筹备会，成立“全国学联筹备会”，并决定出版相关刊物《学生呼声》，宣传全国学联抗日救国主张，由清华大学女生陆璀、北大学生唐守愚任编辑。1936年5月29日与30日两天，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召开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的成立大

会，与会者有广州、南京、 上海、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温州、徐州、武汉、杭州、厦门、香港、巢县、宜兴、苏州、广西等地学联代表28人，全国学联定名为定名为 “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通过了各项救国主张，选举北大历史系学生刘导生（23岁，中共党员）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全国学联参加了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出面号召的“全国各界救国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全国学联宣传部长陆璀出席了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向大会作报告宣传中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全国响应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一二·九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杭州、广州、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太原、桂林、重庆、西安、开封、南昌和香港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广大师生纷纷上街游行集会，通电支持北平、天津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攘外必先安内，一致抗日。 一·二九”运动消息次日传到杭州，浙大又率先响应北平的斗争,浙大学生冒雪游行示威,成立“学联”,运动影响全国。

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党员朱纪章、 郝金贵等，与进步教授杨秀峰、温公健决定，由法商学院的学生牵头，12月18日在天津举行请愿、游行、示威，得到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北洋工学院、天津师范学院、扶轮中学、河北工业学院、震中中学等校学生的积极参与，并顺势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宣布从12月19日起天津市各校总罢课。朱纪章等人与北平学联取得了联系，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

北平学联派遣清华大学中文系大二女生韦毓梅（22岁）到上海串联，12月17日，在上海51所中学的代表成立上海中学学联会议上韦毓梅介绍了“一

二·九”运动的情况。12月18日，上海80多所中学学生组织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华北自治。12月19日当晚上海各大学、中学学生举行游行。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同盟和中央文委决定，以上海各界救国会筹备会名义于12月24日举行一次社会各界参加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文总党团负责人王翰担任总指挥。12月24日，复旦大学学生组织请愿团从上海站乘火车去南京“请愿讨逆”，在无锡被当局拦截押送回沪。无锡学生赶到火车站声援，顺势成立无锡学生救国联合会。

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事实上并未有屠杀）、逮捕爱国学生。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也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

12月2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通令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戒严，禁止游行罢课，否则以犯法论处。

评价

余英时认为，这场运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带来压力，改善了中共的处境。

毛泽东对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多次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反对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说法，一再讲，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1936年7月，毛泽东会见随同埃德加·斯诺去陕北的黄华时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还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

哇。“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在1939年12月9日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说：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月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

”

埃德加・斯诺在《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一书中这样记述了这场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

影响

一二九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大中学校的骨干，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生力量。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的有23人：

谷景生

李伟：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李东野：北平东北大学

吴恺：南开大学和中央航空学院

吴涛：中国大学

谢云晖：北京大学

刘居英：北京大学化学系，1955年少将

王振干：东北大学边疆政治学系俄文组大二学生

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后来成为省部级以上的有：

康世恩：河北省立北平中学高三学生

袁宝华：北京大学

黄华：燕京大学经济系

黄敬：北京大学数学系

宋黎：东北大学经济系大二

邹鲁风：东北大学边政学系俄文组大三学生

关山复：东北大学边政学系俄文组大三学生

王一伦：东北大学边政学系俄文组大三学生

胡焜：东北大学经济系大四学生

高锦明（又名敖白枫）：东北大学预科补习班学生

林一山：北平师大的大一学生

杨秀峰：北平师大教授。

于刚：北平师大历史系大二学生。

张连奎：北平师大体育系大三学生

江明（姜文彬）：北平师大体育系学生

1935年，东北大学体育专修科音乐教师阎述诗亲身经历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阎述诗谱写了歌曲《五月的鲜花》，一问世就在中国民众中引起强烈共鸣，迅速传唱全国并流传至今。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一些学校会在每年的12月9日举行纪念活动，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二・九合唱；复旦大学的一二・九歌会，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二・九诗赛，山东经济学院的一二・九长跑等。

一二・九运动之后，反对中国共产党推动分裂主义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新学联”，与“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相互对抗，其主张：“中国无条件的统一，真正的统一，实质的统一”，被中共形容为“反党的小团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徐芸书（原共产党党员）、高阮等”。

一二・九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后来成了中共历史上的有重要影响的人。譬如黄敬后来和女青年李云鹤交好，而李云鹤则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黄敬本人的儿子俞正声是中国当代的高级干部，中共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曾在六四事件中支持对学生的镇压，并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谷景生则后来成了

有望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的岳父，他的女儿谷开来的案件牵扯出一大批人物。

目前，在北平辅仁大学校园旧址（今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定阜大街），留有一座辅大教授启功落款的“一二·九运动纪念碑”。在北京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修建有彭真题字的“一二九运动纪念亭”。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7%9E%E5%8E%86%E5%8F%B2

广州历史

明朝初期，一改宋、元时期的对外开放政策，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向大部分国家的唯一开放的通商港口，重新成为全国第一大港。1368年（明洪武元年）设广州府，为广东布政使司、广州府及番禺与南海县治。

洪武八年（1375年），广州设卫所。弘治（公元1488—1505年）初，诏治屯田之法。广州卫所分左右前后四卫，卫各置所。左卫三所九屯，即田步、官桥、明经、石碁、官涌、沙涌、榄山、石头、新桥，附在番禺县沙湾、茭塘两巡检司。前卫设五所十五屯，坐落东莞县，其中大步七屯、昆城二屯、东村一屯、东向二屯、小享三屯。

明弘治元年到二年（1488-1489），增城的土豪劣绅还有官兵大肆袭扰瑶山民众（蓝田寒山），烧杀劫掠，瑶民于是推举谭观福（横潭峒主）做首领，揭竿起义，声势震动增城、新丰、博罗、花县等地。

广东布政司刘大夏率兵镇压了起事瑶民后，向朝廷请建县治称“从化”，县署就初设于花都横潭村，以加强官府对上番禺地区的管治。1494年从化县衙迁马场田（现街口）。

外贸交流

1517年（正德十二年），葡萄牙商人首次来到广州出售毛织品，广州棉布亦运销海外。

1578年（万历六年）明政府重新允许外国商人进入广州进行贸易，东南亚各国商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就不再停留澳门而纷纷直接前往广州贸易，贸易重心转移。广东地方官员亦制订详细办法，管控当地增长的外商和外贸活动，包括要求外商仍要在指定场地居留，必须有同业组织指定的富有华商做“担保”，而不遵守的外商有机会无法获得当地服务和生活用品。转变中代为外商服务的牙行不断壮大，万历后朝贡贸易的变体公行逐步形成：即专门代理外贸的买办商人十三行，市舶司的外贸具体业务也为牙行所操纵。

1582年（万历十年），葡萄牙教士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华传教，8月7日到达广州香山澳（澳门），宣传天主教教理，在广州城时下榻怀远驿，翻译西洋学科数种，往返广州与肇庆。这是天主教与西学首次在广州传播。

商文娱发展和粤剧萌芽

明初岭南诗派南园前五子之首孙蕡曾作广州歌，记述了广州城南濠畔一带歌舞曲艺兴旺，当时归德门外食肆众多，歌舞艺伎如云，其中就不少是土腔女伶，规模比秦淮河更繁盛几倍。

但在1521年（正德十六年），钦差提督学校广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魏校（江苏昆山人），正式宣布演戏违法。广州城内原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有几座金花夫人庙演戏比较兴旺，演期可长续几个月，但魏校禁戏后庙就被拆光，只剩下城外河南一间金花庙。

而广州城中外来的封疆大吏集中驻扎，同系的外来商人资本涌入，支持同系外来戏班在当地有实力组织梨园会馆，排挤本土戏班。本土戏班在被边缘化之下，转群集至相对少外来官吏驻扎的佛山镇，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成立琼花会馆，为本土戏班行会发端。

清朝

1646年（清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五），清军占领中原后，南明绍武帝朱聿𨮁在广州建都，这是广州在历史上第三次建都；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兵攻入城内，绍武帝自缢而死（一说被杀）。

1650年（清顺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指挥清军的汉军镶蓝旗，围攻广州城达10个月之久，动用荷兰炮手及楼车攻城，终于在11月24日攻破广州城，此后直到12月5日的12天内，在广州城及其附近四十里内进行大屠杀，死亡人数超过十万至七十万，号称庚寅之劫。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英国在远东开办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将藤料运到广州，又从广州购进藤制品运回英格兰。

雍正三年（1725年），裁并各卫所，其屯田粮丁并归附近州县。以前卫屯

田俱坐落狮子洋，属番禺县境内，是以拨附番禺管理。位于东莞县内的原前卫五所十五屯从此划归番禺鹿步巡检司，成为飞地，改为十五屯堡。

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宣布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并由指定的广州十三行代理全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口通商”使当时的广州（欧洲商人称Canton）得以独揽全国外贸，国际知名度迅速提高，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次于当时的北京，英国的伦敦之后），是广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直到上海开埠前，广州一直是东南亚的贸易中心，西方各国都在这里设立商行。不过户部除粤海关（及其口岸）以外的江浙闽三海关及其下属各口岸，仍有维持运转。

1801年，有部分外国商人在广州联合组织了一个临时保险协会，对每艘船所载货物提供保险，承保限额为1.2万银元。这是外商在华经营海上保险业务的开始。随后，一些印度加尔各答的保险机构也在广州设立代理处。

1805年（清嘉庆十年），英商渣甸（即怡和洋行）与宝顺两家洋行为主，在广州创建谏当保安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亦称广州保险社或广州保险协会，经营水火险和意外险。这个是外商在大中华设立的第一家保险公司。

1814年（嘉庆十九年）前后，广州城郊沙贝村乡民用东南亚藤编织的藤笪、藤席、藤织件、藤家俱，花色品种多达五千余种，在广州市场大受欢迎。

1830年（道光十年），广州水域出现第一条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英国福士号商船，外国商船开始进入广州水域营运。

1836年左右，有丹麦人于十三行地头开设了广州第一间咖啡厅，也是大中华第一间咖啡厅，可同时接待华洋人士。

1839年，林则徐担任两广总督，开展禁烟行动。同年4月22日，林则徐于虎

门海滩销烟。

1840年夏，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1841年五月，广州城郊三元里发生民众自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随后广州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随着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此条约迫使清政府了开放除广州以外的四个港口，分别是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

近代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实施“五口通商”，广州随即失去了对外贸易的独特地位，居于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自1845年后，广州港进出口货物总值不断降低，从咸丰三年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已大部分转向上海，广州港在外贸上的中心地位，已为上海港所取代。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辟为自由港，逐渐代替广州成为货物的集散地。此外，由于《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只能和十三行贸易的规定，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逐渐为外国在广州的洋行所控制，广州港的外贸自主权逐步丧失。

1854年6月10日广东天地会首领何禄在东莞石龙墟起义，7月5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自称“红巾军”，号召“反清复明”。红巾军于7月20日率会众10余万攻打广州，围城历时10月。后守城清军在香港总督支援下击退了红巾军。

1855年（咸丰五年），广东航商受传入外国蒸汽船吸引，率先购买美国造“威拉特” 、“星火”、“金发” 3条轮船，悬挂美国旗航行于省河（珠江广州地区河段）一带营运，史称“诡寄”经营。

随着洋务运动发展，广州地区开始出现近代工业。同治十一年，暹罗（今泰国）华侨陈启沅在南海西樵首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革新了广州地区的缫丝业。同治十三年，两广总督瑞麟办的“广州机器局”成立，制造枪炮、轮船；两年后，购买了英国人办的黄埔船坞，用以修理舰艇。此外棉纺织、造纸、印刷、船舶修理等工业也有发展。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广州永成航业公司在广州去梧州的航线上第一次采用花尾渡为运输船用。

民国时期

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率千余名新军于燕塘起义，被镇压。1911年4月27日，黄兴等人在广州发起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但以失败告终。1912年（民国元年），国民政府废广州府，成立广东军政府。

1917年7月初，孙中山抵达广州准备另立国民政府。8月25日，约百名原北京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行使中华民国行政权，展开护法运动。

后因“非常国会”倒向桂系，于1918年以七总裁代替大元帅，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同年，设立广州市政公所。1918年10月19日，市政公所发出第一号布告，宣布将拆除全部城墙，将旧城墙基开辟为马路。 市政公所成立后，着手规划建筑公共街市，于1919年在禺山原关帝庙处（现名盛广场），落成投入第一座市营公共街市（亦为民国年间唯一公营街市）禺山市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粤侨返乡带来不少侨汇，时值广州市实行市政改革，兴起地产风潮，大批侨资入市，促进了东山地产的开发。

1920年，陈炯明指挥粤军进攻广州驱走滇、桂两军。孙中山于11月底重返广州，重建军政府，第二次护法运动开始。1921年4月，非常国会声称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在广州就职。

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广州市政厅成立，孙科任广州市首任市长，广州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市。同期，广州市政公所改为市政厅工务局，负责规划新辟街道、公园、市场等工程事项。首届市政府成员组成充分体现市政管理人才专门化原则：市长孙科系孙文之子，系美国加州大学市政科毕业生；市政厅属下工务、卫生、教育、公安、财政、公用六局，局长三人为美国留学生，两人为日本留学生，一人为法国留学生，时人就此评价市府为“洋化机关”。市政府其余职员中都有20几人有西方大学教育背景，政府中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占89%。因此人言：“广州市长局长，尽留学专门家，其他职员有专门学识者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其汲引新人才，可谓至矣”。

1922年夏，徐世昌下台，陈炯明要求孙中山下野。6月16日，发生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开广州，二次护法失败。

1923－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广州曾是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的中心。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同年，孙中山在广州长洲黄埔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国民革命军培养军事人才。

1923年（民国12年），南华置业公司以南益堂名义，经市政府批准于一德东路建设南益市场，其于1925年（民国14年）6月落成投入，为当局批准的首个商营公共街市。

1923年1月，陈炯明被驱走后，刘震寰的桂军、杨希闵的滇军以及谭延闿的湘军进驻省城。当时形成局面是，西关和老城由谭的湘军、杨的滇军占据，东北关由刘的桂军占据，河南一带则仍是本地的李福林主持。

1924年3月，驻省城的湘军、滇军联合成立办事处，组织联合巡察队，维持广州的治安。

1925年6月19日，在广州爆发漫长的省港大罢工。6月23日，当罢工工人从广州东校场游行至沙基路面时，遭到英法军警开枪扫射，即为后所称“沙基惨案”。罢工一直持续到1926年10月，历时16个月。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4日，广州市政委员会成立，伍朝枢任委员长，行使市长职权。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带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一时期，毛泽东、彭湃等人在这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骨干力量。1927年4月15日，“四・一二”事件之后，李济深在广州戒严，发起“清党”，持续逮捕处决两千多名所谓“共产党员”。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乘广州防务空虚，策动部分张发奎部队同人力车工会等工人，于广州发起暴动，其间占据省会公安局，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张太雷暴动期间于街头，被广州机械工会纠察队击毙。后张发奎撤退到河南地，会同李福林协同回防粤军等，三日后平息暴乱。

1928年11月11日，广东航空处处长张惠长等3人驾驶广州号飞机，由广州起飞，经汉口飞南京、北平、沈阳、天津，成功完成大中华历史首个长途飞行。

1929年，陈济棠开始主政广东。是年夏，桂军进犯，于粤东与粤军交战，广州一度告急。1931年5月，孙科、陈济棠、唐绍仪等在广州通电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12月宁粤和谈，蒋介石下野，广州国民政府撤销。1929年至1936年为陈济棠主政广州时期，广州的经济、文化、交通和城市建设

有显著发展，留下了海珠桥、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五山新校舍、爱群大厦等著名建筑。1930年，广州曾一度改设特别市，同年改省辖市。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全国抗日讨蒋，发动两广事变，广州金融动荡。7月反蒋失败，广东空军叛投南京，中央军进驻广东，陈济棠离开去了香港。粤汉铁路也在同年修通。

1936年11月广州天河机场（今天河体育中心一带）开辟广州到越南河内的航线，此为大中华民航史首条国际飞机航线。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其后至沦陷前，广州的外贸和生产直接向北方供给军需和日用消费，直接支援北方的抗战，因而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之一。9月起，日军无差别轰炸广州不断，财产损失、平民死伤皆无数。1938年10月14日，日军第18师团、及川支队、第104师团自大亚湾登陆，广州市进入战备状态，市政府撤至粤北。10月20日增城会战中，中国军队失利，日军突破守军防线，进攻从化、花县。是日晚，第4战区在广增公路两侧布防，阻击日军。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市区。至10月29日，广州全线失守。12月21日，日军组织成立日占广东省政府。此后半年国军与日军于广州市被多有争夺战，至“良口战役”后陷入相持状态。

广州沦陷之前人口超过120万，沦陷后减至30万，绝大部分逃至香港，工厂亦随之迁移。1942年香港沦陷后发生粮荒，又有逾46万人回穗。广州沦陷期，各类抗日活动不绝。日军进城初期大肆烧杀奸掠，后实施高压统治，致使经济文化萧条。1943年广东大旱，饿殍遍地，将死者爬入海珠桥底桥洞呻吟等死，被称为“升仙洞”。

日军占领期间，日军的秘密8604部队（731部队的支队）曾经在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原中山医科大学）进行对囚犯进行细菌试验。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8月16日，国军进入广州，广州光复。

国共内战与中共上台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长江，国民政府南迁广州。10月14日，解放军陈赓部击败了守卫广州的中华民国国军，占领该城。此后广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广东省人民政府驻地。

因对中共政权存有顾虑，故不少教育机构开始迁往香港，例如真光中学和珠海学院等，私立岭南大学亦在后期在港复校，剩下学校的校舍或组织均被解放军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所有私立或教会学校从此荡然无存。

1954年6月19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广州并入广东省建制，改为省辖市至今。1956年，当局开始推行公私合营，措施使所有私人经营的商号都被充公，变成“国有”，大量商人逃往香港，形成今日穗港两地均有同一老字号的局面，由家族后人真正持有的百年老铺在广州绝迹。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量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而受到迫害，引发第一次大规模以知识份子为主的逃港潮，使香港人口的粤语广州话使用者大增，香港政府亦推动广州话作为香港的通用语。

1958年当局发动大跃进，令广州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市内各餐厅和单位只能改以番薯作为主要粮食，至8月份由居民、集体伙食单位和饮食行业购买的的番薯达272万斤，比上月节约大米68多万斤，这种“以番薯当饭食”的情况直至1965年才结束。1960年8月起，当局开始推行布票，每人每年亦一丈三尺六，这个长度一般仅能制作一个成人的一条长裤和一件短袖衣。那时的俗话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其他民生用品，诸如粮、油、糖、蛋、鱼、肉、柴、煤，亦全部需凭票定量供应，而鸡蛋只供给孕妇，需提供婴儿出世纸。商店的大部分橱窗空空如也，即使有货也标明是“陈列商品”。因广州人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香港，故不少家

庭经常收到港澳和海外亲戚寄来的物品。中苏友好大厦是领取海外副食品邮包的最大物流中心，不少香港人每次回穗都携带大量包裹和行李以接济亲友，其中不乏牙膏、番枧、花生、豆子等日用品和食品，不少物品需打重税也在所不惜。

1962年6月1日，由于坊间传闻“英国女王生日，大赦边境3日，没通行证也可进入香港”，上万市民与其他省的民众群聚广州火车站（大沙头站）一带，意图乘火车去深港边界，原本直行可通广九小学的白云路满是人潮，史称东站事件。无票滞留的人后期鼓噪，部分人冲击了东站警署，警方派的宣传车也被民众推翻。到6月2日凌晨1时起，当局宣布戒严，警方出动民众散去。后来高官开内部会，陶铸定之为所谓敌我矛盾，促成决定出动军队。到6月6日，当局派出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封锁车站两头，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士兵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在场用高音喇叭广播。行动中有几十人被拘捕，大部分冲火车站的民众被驱散。至当天晚上，有1600多人被捕，火车站外被戒严部队把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市内陷入混乱状态，经济近乎瘫痪，所有学校停课搞“阶级斗争”，后来学生在校园“复课闹革命”，但很多学校已被“读书无用论”的风气笼罩，文化课学习极不规范，老师上课缺教材和讲义，并且文化课经常变成“革命大批判”的政治课。文革期间，历史建筑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彩色玻璃全被打碎，甚至变成垃圾场；光孝堂的书籍被焚烧；光孝寺和六榕寺的百年佛像和神像被打烂，后者的大部分庙宇被拆；琶洲塔的寺庙被拆；华林寺的五百罗汉像全部被毁；四牌楼被砸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碑文几乎全被破坏；在广州昔日园林寺观中，保存下来的古代匾额数之不尽，仅光孝、六榕两寺庙，往日匾额对联多不胜数，但在经历文革后均荡然无存。大量的地名和商号也被改名，如莲香楼被改成“东升楼”，六榕路、朝天路、米市路三条路，变成南北“朝阳路”等，像北京路至今没有恢复原名。

1967年8月，广州掀起打“劳改犯”运动，当局的文革思想是人们应对“阶级敌人”充满“阶级仇恨”，而“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在广州城内的德政路被杀的人最多，当时只要有人叫一句“这是劳改犯”就立刻会有一群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铁管甚至用枪去将其打死。据报，吊死、砸死、打死和打死后抛进珠江的人数几乎达到200人。

1972年，广州有5376人偷渡到香港，其中947人逃出。

1973年，4893人偷渡到香港，其中454人逃出。

1974年，6074人偷渡到香港，其中755人逃出。

1975年，3809人偷渡到香港，其中408人逃出。

1976年，因上山下乡运动运动而被迫上山下乡的广州知识青年有8万多人，是文革十年中人数最多的一年，下乡是很多人一生中的转折点。同年，广州有2967人偷渡香港，其中379人逃出。

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6年至1977年，每年被羁押逃港者有7000多人，约占羁押总数的60%。

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

1979年，广州偷渡香港之人数为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是中共建政后最大值。其中东郊的沙河公社、东圃公社、员村、沙河、五山等地据计有1400多人企图越境。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当中约2万人是步行越境，第二是扒出口火车。第三是用小艇偷渡，多是郊区和水乡民众采用。1978年和1979年被羁押的逃港者剧增至2 .4万人和5 .3万人，1981年后才大幅度下降。这个时代广州人以督卒指代过境，取自象棋术语，比喻过河卒子，有去无回。

1984年10月，划为国家计划单列城市。在2000年花都市和番禺市被撤销，

成为广州市属区。其后陆续添并从化、增城，从化和增城成为广州的县级城市。

1990年10月2日，广州市白云机场发生一起空难事故，导致128人死亡，52人受伤，两架飞机被毁，一架飞机严重受损。

1995年代到90年代尾，广州市不断改变国有、集体企业结构，期间依照上级部署，搞大规模裁员以及 “关、停、并、转、 破“（解散企业）,致使国有、集体企业大幅度减员，产生大量失业人员需要重新安置。与此同时，外来劳工来穗占据了大量岗位，本市失业者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能单一，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97年，全市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职工总数为4.5 万人。

1998年，当局提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大变”的发展规划。同年全市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职工总数为6.85万人。

1989年，“广佛同城化”成为讨论的热点议题，另外电视台、电台、电信等相互落地，并草拟撤消两地收费站，以后将使两地人民交流更加密切。

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与国家调控层面的冲击，广州的商务写字楼被大量空置、积压，空置率达到27.2%，销售基本停止，市道低迷。同年全市国有、集体企业失业职工总数为4.27万人。

1991—2000年间，广州市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逐年累计达到1’547’503人，每年登记失业数据徘徊于3%左右。

21世纪

200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花都市和番禺市，设立花都区和番禺区，成为广州市属区，从化和增城成为广州的县级城市。其后陆续添并从化、增城。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6%B4%A5%E6%AD%B7%E5%8F%B2

天津历史

明朝时期

明建文二年（1400年），镇守北京的藩王朱棣为了同他的侄子明惠帝争夺皇位，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后来朱棣作了永乐皇帝，为了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历1404年12月23日，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之渡口之意，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天津设卫筑城，称天津卫。卫是军事建制，而不属于地方行政区划。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

由于燕王扫北，朱棣将安徽、江苏一带的移民驻守天津卫，由于土著数量有限，移民所操的南京官话遂成为天津社会通语，经过在包括与华北方言

在内的诸移民方言交融，逐渐形成今日的天津话。

永乐三年（1405年）正月十七日，平江伯陈瑄请准在直沽重建天妃庙。

宣德二年（1427年），在天津卫城东北角重建玉皇阁，成为明清时期天津人重阳节登高的胜地，现已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季，天津地区发生蝗灾。次年春季出现饥荒，史书中称“人民相食，尸骸遍野”。

清朝时期

晚清时，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驻地，也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和发展北洋势力的主要基地。

开辟商埠前

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三卫合并为天津卫，设立民政、盐运和税收、军事等建置。雍正三年（1725年）升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1731年）升天津州为天津府，辖六县一州，分别是天津县、静海县、青县、南皮县、盐山县、庆云县、沧州。

清朝移民继续保持以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三省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人口来源结构，这三省的人口约占当时天津社会的人口的六成，其余还有湖北省、湖南省和山东省移民和来自几乎全国各地的移民，由于天津具有明显不同于周边的文化体系，故当时少有河北移民。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经嘉庆帝准许由天津登岸进京，要求进行贸易通商，遭到清廷拒绝。

天津开埠以前，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曾先后数次发动针对大沽口的战争。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向炮台侧面登陆，清军发炮

反击，杀伤近联军士兵百人。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弃守逃亡，使南北炮台陆续被攻占。清政府被迫与俄英法美四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6月20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被清政府要求从北塘登陆并由清军保护到北京换约。英法联军拒绝并进攻大沽口展开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清军发炮反击击沉英法联军4艘军舰，使英法联军遭受重创撤退，是晚清时期对外作战罕见的胜利。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出动军舰30多艘和陆战队5000人在北塘附近顺利登陆展开第三次大沽口之战，陆续攻下新河、塘沽和大沽口北炮台。咸丰皇帝下令放弃南炮台，剩余清军撤退到天津，大沽口沦陷。

开辟商埠后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政府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清朝增开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年底，清政府在天津设立三口通商衙门，命崇厚任通商大臣，至此天津正式开埠。

天津开埠后，西方各国先后在天津设立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并在租界中进行吹泥垫地，疏浚海河航道，改善了天津的投资环境，使天津逐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双方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签订《中英续增条约》（《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是英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的依据。12月17日，天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因而英租界及此后在这周边的德租界等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称。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和清政府签定《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

款》，划定天津法租界，面积为439亩，在英租界以北、靠近天津城。

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为加强海防，李鸿章在天津兴办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是近代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用于修理北洋水师的军舰，1890年始造军火。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为结束中法战争于天津签署《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李鸿章创设天津武备学堂，培养新式陆军军官的著名学校，意在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新型军事人才。

光绪十二年（1886年），由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与英商怡和洋行总理笳臣集资并创办于英租界《中国时报》，是天津第一份英文报纸。同年11月6日，中文版《中国时报》发行。

光绪十四年（1888年），天津修成第一个火车站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光绪帝御笔钦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任首任督办，校址在天津北运河畔大营门博文书院旧址。1896年10月，北洋西学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1898年8月29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天津日租界，南临天津法租界，西北与天津老城相望。

1900年7月5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组成“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即“天津都统衙门”。

光绪三十三年（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的海

河北岸开始开发的新城区，即河北新区，在新城区的规划建设中，率先在中国采用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也称“北洋新城”。20世纪初的天津，近代教育、司法、民族工业和市政设施建设发展迅速。

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起于1912年，止于1949年。北洋政府时期，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贸易与金融中心，在中国政治舞台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北洋政府的政客官员及其家属大多均在天津定居。同时，天津作为国际都市，前清时期诸多遗老也在清帝退位逊入天津生活，或利用天津租界的特殊进行地下政治活动。其中包括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前清废帝溥仪。

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起于1912年，止于1928年。1912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1913年4月，撤销天津府，只保留了天津县。

20世纪初叶，由于长江以北连年蝗灾，江淮地区农民大量涌入以上海为主的江南地区，而华北地区农民则大量以流民身份涌入天津，一度达到天津人口半数，而不同于上海的江北难民在上海租界外围建立起长期的棚户区据点而永久居留于上海，华北难民大部分由于没有在天津谋生的能力而绝大多数在蝗灾后返回原籍地。但自租界时代中期开始，华北人在天津的影响与日俱增，虽然当时天津社会上层还是由天津老移民（多为南方裔）和宁波人与广东人垄断商界、政界和文教界。

1914年，范旭东在创办久大精盐厂的基础上，决心“变盐为碱”，在天津开始兴办“永利制碱公司”，开创中国制碱工业的先河。

1916年10月20日，老西开事件爆发。天津人民组成“维持国权国土会”，数千人举行示威。1916年25日，八千余人举行公民大会，决议罢工、罢课、罢市，抵制法货，惩办汉奸，要求全国人民声援。1916年11月，天津法租

界工厂工人、夫役、人力车工人、女佣工、职员群起罢工，迫使法商企业停业，电灯厂停电。后来由于北洋政府的妥协，老西开归“中法共管”。1917年，中国与德、奥宣战，收回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奥租界。

1919年4月，南开学校大学部校舍在南开学校南端动土兴建。5月，开始制定学校规章制度，招生工作起步。9月7日、8日，南开学校大学部举办招生考试。10月17日，首次开学典礼举行，标志着私立南开大学正式成立。1921年，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更名为“天津私立南开大学”，设文、理、商科。

1920年代初，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创办了英国文法学校，但只有外国纳税人子女可以入学接受教育。

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将民国政府迁往天津，实际是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设立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

1926年，天津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金奖，被誉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

1927年，时任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联合锺憲生、冯仲文等人发起先生筹三万四千两白银创办服务英租界纳税华人的英式精英学校，初名为“天津公学”，隶属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是耀华学校的前身。在1920年代末“教育中国化”的浪潮中，由英租界华人完全接管，成为私立学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天津特别市”。1929年8月，比利时签订了交还天津比租界的约章。1931年3月，正式举行交接典礼，比租界改为天津特别行政区第四区。

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的天津市。同年11月，因河北省省会由北平迁至天津，天津直辖市改为省辖市。

1933年5月31日，华北朱军代表熊斌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定塘沽协定。

1935年6月，河北省省会迁往保定，天津又改为直辖市。

日本占领时期

日本占领时期起于1937年，止于1945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7月12日，日本占领天津各火车站。7月24日，南开大学物资开始疏散。7月29日，中国军队进攻日租界海光寺兵营，日军飞机对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天津重点目标进行轰炸，秀山堂、芝琴楼等建筑被毁，木斋图书馆受损，由于日军迅速南下增援，日军占领天津华界全境，仅天津英租界、天津法租界、天津意租界三国租界成为相对安全的孤岛。7月30日，日军攻占南开大学进行劫掠、纵火、炮袭，木斋图书馆被烧毁。天津英租界人口由战前的2万余人增加到7.2万余人。8月1日，日本扶立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任命高凌霨为委员长。12月17日，高凌霨又出任河北省省长兼天津特别市市长。

次年1月17日，潘毓桂任天津特别市市长。5月6日，《庸报》报社第三次遭到爱国人士轰炸。8月8日，晚10点，天津第三监狱犯人越狱暴动，246人逃跑，其中30余人被抓回。9月11日，国民党配合中统局，刺杀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受轻伤。

1939年4月9日，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被刺，6月14日，日军对英、法租界进行时间长达一年的武装封锁。7、8月，因连续暴雨和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

灾民。11月20日，日商公大纱厂工人组成二十六友，伺机破坏生产，全数被杀。12月20日，警察局公布天津市全市人口为146万8246人。

1940年4月25日，市长温世珍在全市发起献铜献铁运动。6月20日，日军解除对英法租界的封锁。7月12日，入夏以来，瘟疫盛行。日军防卫司令部下令封锁市区，严禁百姓出入。患病者连同房屋一起烧毁。天津市公署把塘沽、大沽划为霍乱疫区。

1941年，治安强化运动开始施行。11月28日，德意志第三帝国在天津设立总领事馆，魏德曼任总领事。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占天津英租界。12月25日，市长温世珍为了支援友军圣战，设立天津特别市圣战献金运动总会、妇女献金协会和同业公会献金支会等机构，强迫百姓捐款。

1942年6月20日，日本接管天津法租界。9月1日，华北牛羊油由日军统筹分配。11月1日，警察局公布，租界人口除外，全市人口为145万8665人。

1943年，白面、大米被列为禁品。百姓苦不堪言。3月19日，王绪高继任市长。1943年8月8日，意大利向盟国投降，从日本盟国变为敌国。驻扎天津的日军立即封锁天津意租界，并于9月10日协助汪精卫政权天津政府强行接收管理意租界。10月17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免除王绪高市长一职，派遣财政局长李鹏图兼理市长职。11月15日，华北政委会改天津特别市公署为天津特别市政府，任命张仁蠡为天津特别市市长。

1944年1月16日，全市燃料定量配给。6月9日，天津市举办第四届华北都市交欢体育大会，由北平、天津、保定、青岛、济南、开封、太原中日运动员参加。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民国政府收复天津及各大租界。9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委任：张延谔为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为副市长，兼任第十一战区北宁铁路线区护路司令。10月8日上午九点，在驻津美军司令部门前广场举行在津日军签降仪式。

国共内战时期

国共内战时期起于1945年，止于1949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10月22日，北洋大学正式复校开学，茅以升任校长，设两院十二系。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解散，南开大学改私立为国立后开始筹备返回天津复校。10月，南开师生于开始返回天津八里台复校。复校后的国立南开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4个学院16个系，另设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9年1月15日，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林彪部攻占天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林彪部攻占天津，天津市由中共军队接管。1949年6月，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在天津市军管会接管原“天津证券交易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市被定为中央直辖市。11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马思聪任首任院长。11月2日，苏联在天津设立总领事馆，吉多福为代理总领事。

1950年代

1950年8月1日，天津张贵庄机场首次开辟了“天津-北京-汉口-重庆、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两条民用航线，史称“八一通航”。

1951年6月24日，天津医学院成立，朱宪彝担任首任院长，7月6日，开始第一届招生。8月24日，政务院第九十九次会议决定修建塘沽新港，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批准成立塘沽建港委员会。塘沽建港委员会于1951年9月5日

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天津市一区（今和平区）赤峰道5号天津区港务局。时任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兼任主任委员，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等三人为副主任委员。

1951年天津投资公司发行的天津投资股份公司股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股票。1952年7月，交易所撤销，交易并入天津市投资公司，后又改为交通银行兼管。1956年公私合营后，股票交易停止。

1952年，天津县划归天津市，次年改设东郊、西郊、南郊、北郊4个郊区，汉沽市也划归天津市，更名为汉沽区。在1949年至1958年2月这段时间里，天津市为中央直辖市。10月17日，塘沽新港举行开港典礼，第一艘万吨巨轮“长春号”驶靠新港码头，标志着天津港正式由河港转型为海港。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题词：“庆祝新港开港，望继续为建港计划的完成和实施而奋斗。”

1958年2月11日，后因“大跃进”和天津良好的工业基础，天津市被并入河北省，河北省会迁往天津时间达八年，期间天津大量工厂和高校外迁河北，给天津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非常不利影响，且河北方面大量随企业亦或政府迁来天津的人员时常与本地人产生文化冲突。同年，天津专区与沧州专区合并，划归天津市。天津市除原有8区外，还辖有武清县、霸县、任丘县、静海县、河间县、沧县、黄骅县、交河县、献县、盐山县、吴桥县、宁津县等12个县。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迁往北京。同年，天津医学院升格为天津医科大学。

1960年代

1960年，蓟县、宝坻县划归天津市。

1961年6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天津专区建制。天津专区隶属河北省与

天津市双重领导，以天津市领导为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津市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正常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南开大学等天津市的高等院校的教学基本停滞，正常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4月，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等高校青年汇集南开大学发生万人武斗事件。

1967年1月2日，因“备战、备荒”和担忧天津会成为战场，河北省遂将省会迁回保定，天津市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并保持至今。

1970年代

1970年4月7日，在向中央政府申请拨款建地铁未果的情况下，天津市决定自行筹款以备战通道名义立项，在改造市区旧墙子河基础上修建。1973年7月16日，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等5个县正式划归天津市管辖。

1976年7月28日，天津周边的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的7.8级强烈地震，天津市因地震死亡24,345人，重伤21,497人，超过六成的建筑物遭到地震破坏，近70万人无家可归，超过三成企业和北大港水库、于桥水库遭到严重破坏。同年10月10日，天津地铁1号线的前身、全程3.6公里的天津市地下铁路通车运营。

1976年文革结束后，据南开大学统计，该校3000多名师生在文革中，共583人被非法立案审查，437人被牵扯进158件集团性冤假错案，246人受到各种程度的冲击，化学家陈天池等21人被迫害致死。

1978年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南开大学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同年，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指导下，天津市成立了八所走读制大学，以增加天津市的大学招生名额。日后，这八所走读制大学经过兼并，成为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职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天津城建大学等五所天津市属高校的前身。

1979年1月23日，天津机场举行民用航空机场的开航仪式，波音707型客机进行了试航。

1980年代

1981年，海河上游为供津冀用水而修建的密云水库为保障北京用水，停止向津冀供水，导致津冀用水困难。同年，中国国务院决定兴修引滦入津工程，解决天津市的用水问题。

1984年，改革开放伊始，天津被国务院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同年12月，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在天津东部沿海的盐碱荒滩上建立。

1986年8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总理赵紫阳先后到天津视察天津开发区、天津港等。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邓小平亲笔题写“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题词。同时，邓小平指出天津“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1988年，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

1990年代

1991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天津港保税区正式设立。

1992年，摩托罗拉宣布在天津开发区投资1.2亿美元建设生产基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外资独资和外资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在当时经济仍不开放的社会上引起轰动。1992年8月，中国大陆首次拍卖破产合资企业天津辛普森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在浦东新区成立后，天津多次向中央政府申请在天津成立国家级新区失利后，天津市决定自主开发滨海新区。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的基础上“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此后，天津市便开始工业等产业的战略东移，举全市之力打造滨海新区，这也是天津东部沿海的开发区域第一次以“滨海新区”这一整体区域的概念出现。同时，天津市成立了滨海新区建设领导小组。

1995年，天津市增加了滨海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设置。

199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合并浪潮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希望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合并，教育部和天津市以第十个入围985工程的名额等条件向两校施压。但是，合并计划最终失败，两校的办学方针调整为“各自独立办学、相互紧密合作”，两校之间连通的天南街也筑起了围墙。

2000年代

2000年10月，天津武清撤县设区。

2001年9月，天津宝坻撤县设区。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把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十一五”规划和国家发展战略。

2006年3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将天津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从此京津之间的经济中心之争，终于落下帷幕。同年5月，国务院批准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6月12日，天津地铁1号线经过扩建正式开通试运营。同年6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公布，明确：“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6月8日，经过与多个城市共同角逐，最终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落户天津空港经济区。同年7月，国务院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天津市要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

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8月31日，国务院批复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2007年6月3日，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6月23日，天津赢得了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的举办权。11月18日，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签署框架协议，决定在天津兴建中新天津生态城。

2008年5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1航站楼投用

2008年5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结束，T1航站楼投入使用。同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天津站经过改扩建投入使用。同年，天津市作为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协办城市协办了足球项目部分赛事。与此同时，夏季达沃斯论坛自2008年起开始落户天津，每两年举办一届。同年，天津地铁腐败案因天津地铁的党委书记与总经理互相举报而案发，引发舆论关注。

2009年11月9日，天津市调整行政区划，撤销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滨海新区，以原三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标志着滨海新区正式从经济区的概念成为统一协调的行政区。

2010年，在天津市区的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了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

2010年至今

2011年6月30日，随着京沪高速铁路的开通，新建的天津南站和改扩建的天津西站投入使用。8月16日，天津成功取得第十三届全运会的主办权。同月，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开发的天津南港正式开港投用。

2012年5月，天津大剧院、天津博物馆、天津图书馆文化中心馆、天津美术馆、彩悦城及银河购物中心等一批大型公共建筑组成的天津文化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同年，天津地铁2、3、9号线建成通车，天津市轨道交通正式联

网运营。

2013年10月，天津市举办了第六届东亚运动会，是天津首次独立主办国际综合运动会。12月1日，津秦客运专线通车。

2014年，覆盖天津市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8月，天津滨海国际机场T2航站楼落成启用。9月10日至12日，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召开。同年，南水北调工程一期通水，天津用水情况得到改善。同年12月，国务院批准天津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15年4月21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4月27日，中国北方首家民营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正式开业。8月12日，天津港内一家危险化学品仓库发生了一起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9月初，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和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在海河教育园区内正式启用。9月20日，京津城际铁路延伸线和位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于家堡站正式启用。12月28日，由津霸客运专线、霸徐铁路构成的津保铁路正式开通。

2016年初，天津市大型国有企业渤海钢铁集团陷入债务危机，总规模1920亿元，相当于天津市全年财政收入的72%。6月，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

2017年7月底，天津市静海区等地区发生多起因传销而引起的案件，引发舆论关注。8月，天津市主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基运动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E%E5%9F%BA%E7%9D%A3%E6%95%99%E8%BF%90%E5%8A%A8

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知识界众多派别于1922年到1927年间反对基督教的运动。非基督教运动起源于共产主义的影响，迅速受到新文化运动（宗教被视为“赛先生”－“科学”的敌人）的支持。1924年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掀起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支持者包括继承中国文化的国民党、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以及主张“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中国政府通过此项运动取得了对教会学校的控制权。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体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也彻底没落，中国政府收回体育权。

过程

第一阶段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定于4月4日，借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年会。3月9日，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组织，通电反对这个年会在中国召开，呼吁支持。3月11日，北京学生响应上海的呼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蔡元培等人均予支持。

3月21日，由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为数77人的学者名流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指出：“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3月31日，北京的五位大学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

4月4日至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年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如期召开，受到大批军警保护。4月4日，李石曾、李大钊、邓中夏、萧子升等12人在《晨报》上发表《非宗教者宣言》。陈独秀、李大钊、罗章龙、萧子升分别发表文章，批判宗教。4月8日，年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3千多人参加。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宗教分离。

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第三院正式成立。6月，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罗章龙编辑的《非宗教论》一书， 该书收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萧子升、周太玄、朱执信、罗章龙等人写的31篇批判和否定基督教的文章。

第二阶段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在苏联的支持下，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北京政府的“大革命运动”，将非基督教运动视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

1924年8月，在国共两党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员唐公宪担任执行委员（主席）。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同年12月，该同盟策动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在圣诞节期间，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反基督教的群众拥上街头分队讲演，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有些人则教堂和教会学校捣毁设施，围攻教士。

1925年5月30日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中国反帝运动高潮。教会和教会学校受到了很大冲击。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发生多起反基督教的事件，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占用或毁坏。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部分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六位

传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国共内战代替反帝运动成为焦点。同年12月1日，国民党领袖蒋中正与基督教美南监理会牧师宋耀如的女儿宋美龄结婚，对国民党对基督教态度有重大影响。

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开展了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受到严重影响。1922年来华传教士达8,300人，经过非基督教运动之后，1928年降至3,150人。由于教育主权的收回，随着许多外国传教士的陆续撤离和外国教会势力的削弱，武装冲突事件的发生，蒋介石主导的政府的态度变化，共产党武装革命引起长期的内战导致矛盾和冲突焦点的转移，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非基督教运动的风潮逐渐平息下来。

近期研究

陶飞亚根据近年俄罗斯解密的历史档案记载指出，总部设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和推动此运动。其目的是排除英、美的基督教教会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俄共及共产国际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及其事业，以及在中国青年中滋长的亲美思想，视为中国人走俄国革命道路的障碍。因此，发动非基督教运动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削弱西方影响，唤起中国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在青年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们通过反对基督教教会实现反帝目标的策略在实践中获得一定成效。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毕竟与东正教在俄国的情况有很多差别，共产国际代表以俄国革命反宗教斗争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不免有过左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直到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才开始被纠正。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https://china20.weebly.com/214532252230563259453681621160.html

反基督教运动

从明、清海禁到义和团，中国朝野对基督教，及其代表的现代文明始终抗拒，不断制造暴力排外事件，在1900年酿的义和团运动中屠杀了数百西方传教士，以及数万中国基督徒。基督教世界没有因为中国人的暴力排外而放弃，更多的传教士前赴后继，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中国知识分子与义和团拳民一样，对基督教在中国城乡影响日隆深为不满。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与义和团拳民一样的反基督教立场。《新青年》刊出一批抨击基督教的文章，其中包括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胡适等的《不朽——我的宗教》等等。

苏俄在建立政权后立即开始向中国输出革命，投入巨额革命经费，通过李

大钊等代理人在华成立革命团体数百个，创办宣传共产革命的期刊数百种。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策动在世界各国展开所谓反帝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苏俄在中国布置的反基督教运动迎合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拒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情绪。

中国文化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深入骨髓，蔡元培、胡适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牢笼的代表。作为科举出身的进士，蔡元培西方求学，主要接受的是无神论、进化论和革命思想。他的"取代论"要点是反基督教。基督教知识分子刘伯明反驳蔡说：美育并不能代替宗教塑造人的价值观。胡适在留洋之前已经是无神论者。他后来在《四十自述》——《从拜神到无神》一文中写道："有一天，我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反对佛教的故事说：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我先已读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了，所以我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可见，他无神论观念确立来自《资治通鉴》的教化。根据易竹贤的《胡适传》，胡赴美前曾闹过嫖妓醉酒袭警等丑闻风波，赴美时抱着浪子回头的决心，在美接触了西方的基督教，读《圣经》，一度想成为基督徒。他为自己改名胡适，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为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胡适终于把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对立的关系，成为毕生抗拒基督教的无神论者。

策动五四运动的同时，苏俄通过其在华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起名为宗教问题讨论，操纵国内学界掀起反基督教运动。革命党人朱执信发表《耶稣是什么东西》等一系列文章，称"宗教是慢性精神的自杀"，声称社会主义与宗教势不两立，鼓动青年学生反对基督教；恽代英发表《新无神

论》、《我的宗教观》、《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文，重复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论述声称“我们既学了点宇宙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世传说，我们既经学了点生物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造人类传说。”“今日已成宗教的末日，宗教已成过去之物！”

中国知识分子以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武器，传承义和团民“灭洋教”诉求的反基督教潮流成为共产国际“反帝运动”的一部分。

1922年春，来自３２个国家１４６名代表及中国５５０余名代表在北京的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WSCF）第十一届大会。徐世昌总统在公府举行开欢迎大会，安排代表们游三海和颐和园。北京政府担心引发另一次排外仇教的义和团运动，安排巡警高度戒备清华园，以保卫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的安全。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期间，共产国际指挥在华各路人马展开“反基督教运动”。共产国际扶植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声称“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和走狗，现代基督教及教会是我们的死敌”。共产国际在华代理人李大钊率陈独秀、李石曾、汪精卫、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李石曾、萧子升等学者名流通电，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称：“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说，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发表《力斥耶教三大谬》为反基督教运动助威。

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浪潮中，周作人教授预感到运动正在以“多数人的暴政”伤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领衔北大五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反对“非基督教和非宗教同盟运动”，声明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信仰应当有绝对自由，除去法律制裁的以外，信仰自由不受任何人干涉。陈独秀致周作人等人公开信为非宗教运动辩护，批评周等“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周复信申明其宣言重点不在宗教问题，而在于担心“对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乃德发文支持周作人说：“非宗教同盟标榜以科学反宗教使人感到拳乱时代士大夫的脑筋如今又重现于这一群自名为拥护科学真理的现代知识阶层当中。”基督徒胡簪云发表《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一文反驳“反基督教运动”的污蔑写道：“第一基督教义教人类相爱，帝国主义主张强权，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批评基督教在历史上罪恶如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等，是把基督教和罗马教混为一谈，说的都是罗马教的事情。而近代基督教恰恰是反对罗马教而建立。第三鉴于当时主要传教国早已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基督教在华事业与帝国主义无直接关系。其实各国来中国的传道会，俱由各国信徒自己组织，与各国政府无涉、因此反帝不必混扯上基督教，反教不必混扯上反帝，并且说基督教是侵华先锋乃国人成见。因为问非其罪，反足激起无知的下级人民蠢动，演出一种卑劣、无理、可叹之悲剧结局而已。义和团其前车也。”

周等微弱的理性声音无力阻止苏俄背景的反基督教运动。国共两党于4月 9日在北大召集三千多人举行反基督教大会，宣读蔡元培要求宗教与教育完全脱离的讲演词，随后在广州、长沙、武汉、南京、杭州、南昌、宁波等地成立“反教大同盟”，发表一系列宣言激烈声讨基督教。其中，陈独秀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宣布反对基督教的两条理由一是提倡科学就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二是反对资本主义就要反对资本主义附庸基督教；武汉《反教大同盟》宣言声称“抵制比日本侵略还可怕的《基督教学生同盟》”；长沙《反教大同盟》宣言声称“福音书多印一章，中国人多死一个，礼拜堂多建

一座，无产阶级身上的肉就多割一方。”受到流行的科学主义、达尔文进化论蛊惑，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反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同盟”的骨干来自苏俄资助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幕后操纵者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俄国人C·A·达林。达林根据共产国际指令通过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大支部指挥着中国的“反帝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利金（V. V. Lidin）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报告反对基督教运动计划写道：“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 根据共产国际安排，非宗教大同盟反基督教时不打马克思主义旗号，让蔡元培、陈独秀、王星拱、吴虞等学界名流，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出面，安排北大教职员数十人加入非宗教大同盟，以掩盖共产国际的操纵之手。通过“反基督教运动”，共产国际在华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引导青年和知识分子转向激进左倾，为其赤化中国的计划作着准备。

随后几年中，苏俄一面策划武力北伐推翻民国政府，一面通过国共两党指挥着“反基督教”运动。1924年，国共两党以广州英国圣公会所属圣三一学校学生名义发表宣言，提出校内集会结社自由、“争回教育权”等要求，然后策动徐州、南京、福州等地的教会学校学潮和 “反基督教”，在上海成立“非基督教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提出“收回教育权”口号，策划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10届年会，通过“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及“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案”两大议案。在共产国际指挥下，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收回教育权”的舆论潮流。12月，国共两党策动 “非基督教同盟”在全国主要城市组织在圣诞节期间搞“非基督教周”活动，指挥学生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讲演，指挥赤化分子进教堂捣乱，破坏礼拜，

围攻传教士，掷石袭击教堂，使得基督教活动被迫停止。1925年，共产国际通过制造“五卅惨案”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同时推动反基督教运动升级。奉共产国际之命，国共两党大力宣传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指挥暴民冲击教会，在各省制造教会学校学潮数十起，指挥属下势力霸占教堂，殴打传教士和教徒，驱赶外国教师和传教士离境。1926年，共产国际指挥国共两党在北伐军所到之处掀起迫害基督教的狂潮，霸占教堂教产、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为党军、党部场所，造成各地教会的浩劫。1927年3月，共产国际通过国民党北伐军的中共党代表指挥军队攻击劫掠英、美领事馆，杀害六位传教士，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南京事件”。在赤化浪潮的迫害与驱赶之下，数千传教士被迫离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恺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演中“我们反对基督教，是拿政治立场反对的”之语道破苏俄在背后策动中国反基督教运动的真相。周作人关于“反基督教”浪潮灾难性质的警告不幸言中。左派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反基督教运动”成为中国走向极权主义和全面赤化的原因之一。

（引文结束）

==============

http://www.pacilution.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84

共产主义与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作者：丁祖潘

关键词：　共产主义 基督教青年会 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是难忘的一年。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WSCF）第十一届大会拟于当年4月4日至9日在北京的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召开。届时，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日本、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近东地区各国的学生代表，连同600名中国学生代表，将齐聚北京，共同商讨基督教学生工作，可谓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会议。<1>

同盟脱胎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创立于瑞典，为一跨宗派之普世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旨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徒学生运动。<2> 这次大会适逢一战结束后各国成员首次聚会， 因此定下会议主题为“基督与世界的改造”，加上此次会议距离上届会议时隔9年，又在5月初召开的全国基督徒

大会之前举行，是故中国方面极为珍惜举办是次国际会议的机会。〈3〉

大会筹备会总干事顾子仁（1887—1971）显得异常兴奋，距离大会召开还有两个月，就马不停蹄奔赴全国主要城市，向基督徒学生介绍同盟情况及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所到之处均得到学生热烈响应。

他们感到这既是一份荣誉，也是与外国人士加深友谊的机会，无不表示欢迎。负责大会筹备的基督教青年会更是全力以赴积极筹划，唯愿届时各国学生代表欢聚一堂，交流分享，尤其希望各国与会代表能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日益受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学生面前，展现基于彼此了解、互助服务的国际友爱精神。〈4〉《清华周刊》于大会开幕当天，刊发“双四特号”，代表清华学生欢迎各国学生代表。一位与会的中国学生以轻快诗意的笔调记录了这次大会的盛况：

春光明媚，“水木清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开大会于清华。会期四月四至九日；与会代表，都八百人，所代表之国，不下三十有二：真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修多士，冶五洲万国于一炉，勖勖青年，鍊百信千条于“万有”，此固远东空前之盛举，亦即世界无二之大会也。会程重要，秩序井然，清华高级生任招待，童子军为向导；任劳任怨，蔚然大国之风光，“脍炙人口”，能为校园而争荣。闭会后，各国代表，复分游各省名胜，借资实地研究吾国文化及国民的愿望，则将来归国报告，其宣传效力，固不仅影响于基督教已也。徐总统特开欢迎大会于公府，余亦躬逢其盛，惟时间短促，未及遍游三海耳。颐和园亦随往参观，其结构之宏壮，设备之完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羊肠屈曲，蚁孔通光，足见有清末叶，备极奢华，是亦倾颓之预兆也。抚今思昔，颇感慨于无穷，沧海桑

田，藉凭吊夫未已。<5>

然而，这篇纪略所描绘的会议期间轻松愉快的氛围，对大会成果的乐观预估，其实并未掩盖笼罩在本次大会周围的乌云。纪略提到民国总统徐世昌（1855—1939）为各国学生代表开欢迎大会，显示北京政府对大会主办方及来宾的礼遇，却未提及，就在作者连同八百余名与会代表畅游颐和园、发思古之幽情时，步军统领正派“游击队多名”在颐和园门外巡视警戒。同时，清华学校当局另派校内巡警维持校园秩序。<6> 北京政府有理由担心，本次会议召开以先就已在舆论界激起讨伐基督教的轩然大波，会不会引发又一次排外仇教的义和团运动？一场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纸上战争”（paper war）<7> ，早已硝烟弥漫，会不会导致三年前五四学生运动的重演？当时的中外基督徒，很少有人预料到这次基督徒同盟大会的召开，竟是波及全国、持续五年之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他们原本欢欣期待是次大会，将促进基督徒对中国基督化议题的深入思考，从而预告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全新时期的到来。<8>

二

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确到来了，却不像当时大多数基督徒期待的那样，以为基督教在中国的“黄金时代”还会继续。在中国文化和社会朝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基督教曾经是一股重要力量，进入20世纪后，西方来华宣教士虽不复19世纪一度具有的全国性影响力，但依然在地方公共卫生、教育和乡村建设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9>事实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得以在清华学校召开，本身就表明基督教特别是大会赞助方基督教青年会在国内公立和私立学校广泛的影响力。自1895年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1870—1949)作为第一位青年会干事受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差遣来华算起，25年来，青年会通过办讲座、福音聚会、组建查经班、开设体育课、组织运动会等方式，在中国发展迅猛。到了1920年，基督教青年会在21省中有17省建立30个城市分支机构，会员32，330人，学生青年会170个，成员14，200人。<10>1900年后，中国青年会受北美社会福音派影响，日益强调社会服务，鼓励成员参与针对社会底层群体开展的各项公益事工，为要最终“在地上建立天国” <11>，因此在20世纪头25年逐渐热衷于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政治重建。青年会的领袖们相信基督教能改变中国，只是需要与当前国家救亡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结合起来，用救亡的眼镜来寻找圣经对于拯救中国的启示，从传统文化和宗教的遗产中寻找与国人共同行动的基础。<12>

基督教青年会在此时期的中国取得飞跃性进展，有赖于其在传播新知（西方文化）、开启民智方面的积极努力，与提出“人格救国”的口号，切合了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渴望引入西方思想和学说，为陷入危机的中国寻求出路的时代思潮。只是随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知识界日益卷入政治运动，青年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1884—1968）认为，1920年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外国人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角色削弱，中国基督徒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步上升。<13>

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聚集起来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有海外留学背景，致力于替中国寻找现代化方案。他们高呼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一方面讨论各种社会、政治、宗教、文化上的问题，一方面介绍西方新的思想、学术、文学和信仰，其目的用胡适（1891—1962）的话说，为要一点一滴地解放和改造文明。<14>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乃至宗教是否适应现代社会成了争议性的问题。以提倡科学精神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1日，不到两年，便于1920年底在北京接连举行三次宗教问题演讲大会，其会刊《少年中国》据此刊出的相关文章和演讲词，大多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持批判态度，认为宗教在进化的现代社会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反教言论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宗教批判的兴起，由此掀起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15〉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主要是因为基督教有违传统儒家的世界观，而在20世纪初，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基督教并未因儒家传统受到批判而改变受排斥的命运，相反，基督教此时却因其“非科学”或者落后于时代进步而遭到抨击。进入20年代，先前对宗教问题研究讨论的阶段业已结束，如何对待宗教成为现实问题。在这次反教运动中，民主、科学、宗教自由等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价值理念，逐渐被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盖过，基督教面临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又一次严峻考验。

由于共产国际的介入，非基运动从一开始就体现出相当程度的组织化，并非仅是“学生团体”延续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宗教的批判，而是从文化批判转向政治运动。〈16〉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初试啼声，结果一鸣惊人。进入20年代，日益卷入政治的学生发现学运若要取得成效，必须寻求其他群体的支持，而新兴的政党为求自身发展计，则视学生为可利用的资源。学生与政党便存在结合的可能。具有动员性格的政党，在“谁有青年，谁有将来”理念的推动下，自然会想尽办法渗入学界，操纵学生，最终“争取”到这一新生力量，为己所用。学生运动遂变成运动学生。〈17〉新一轮的反教运动中，率先向基督教发难的，正是上海一群由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的青年学生。

三

此时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经从苏俄受训回国奉命组建少年共产党的张太雷（1898—1927）整顿之后，恢复活动，但已不复设立之初成员混杂、信念混乱的局面，而是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注重对青年团成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以使思想更为统一，组织更为完善。〈18〉由于中共刚刚成立不久，国民党组织涣散，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代表在20年代的中国政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他们的意见对于缺乏斗争经验的中共尤其重要。早在非基运动发动之前，青年共产国际就把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看作眼中钉，将反对基督教青年会作为远东革命青年组织的重要任务。〈19〉曾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工作的俄国人C·A·达林（C.A. **дАлин**，1902—？），在1922年春到达上海见到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1879—1942）和瞿秋白（1899—1935），并在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中谈到基督教青年会和即将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认为“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亲美派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力求揭露基督教青年会的亲帝国主义实质”。〈20〉

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下，重新恢复活动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反对基督教作为一项主要任务，盖因基督教是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的一环，故首先遭到攻击。〈21〉曾任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的俄国人利金（V. V. Lidin，1895—？），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记载了共产国际拟定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之计划：

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22〉

其中除了第4点没能成功派人潜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搞破坏之外，其他计划均基本实现。一些青年学生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议和领导下，于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设立章程，规定同盟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并于3月9日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通电，号召包括清华学生在内的全国学生，起来反对将于4月4日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其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次同盟大会是现代基督教的产物，而现代基督教是帮助资本家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助纣为虐的“恶魔”，因为要反对这“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因而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资本主义，所以理应反对基督教及其产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更何况这次大会是一次“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23〉

宣言除了把资本家划为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外，又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由成熟而行将崩溃，各国资本家为求自保，先后涌入中国加紧经济侵略。显然，这是承袭自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即帝国主义阶段，其实进入了“垂死”阶段，为了争夺原料产地、资

本输出和势力范围，必然加紧对殖民地的掠夺，进而加剧资本主义世界彼此间的斗争。<24>最后，宣言将矛头指向基督教青年会，斥之为意在中国"养成资本家的善良走狗",号召学生、青年、劳动者奋起抵抗。就所指控的内容来看，宣言明确反映了当时苏俄马列主义的宗教观，即认为宗教是阶级压榨的工具，不过是一剂麻醉剂，以牺牲人类的价值为代价，使资本的奴隶得到暂时解放。<25>

年幼的青年团成员照搬俄国老师对宗教的看法，以此反对基督教和教会，其理据实在经不起推敲，特别是对同盟大会会议议程的指控，连当时为会务提供服务的清华非基督徒学生也看不下去，称之为"捕风捉影的话"。<26>经验丰富的《生命月刊》基督徒编辑们，一眼就看出这篇煽动性的攻击基督教的文字，其论调"像初学布尔（什）维克的口吻"，笔法稚嫩，全凭意气，不讲理性，仅代表布尔什维克对基督教的激进立场，于基督教则"无益亦无害"，因此根本不值一驳。<27>

这些基督徒编辑们主要是燕京大学的教职人员，其中不少人与基督教青年会关系密切。他们以师长的身份宽容地看待激进学生的表现，尊重其言论自由，同时大度地全文转载这篇宣言，提醒参加同盟大会的基督徒同道们借此自省，然而却低估了他们眼中这些激进学生的能量，尤其是未能意识到这些学生背后不但有现代党团组织的引导支持，更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准确说是列宁式的民族主义（Leninist nationalism）作为反对基督教的理论依据。具体言之，这种世界观认为造成中国长期以来的贫弱和分裂，罪尤不在内而在外部的各国资本家；这些资本家主导了各个列强的政府，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而展开激烈竞争，不惜扶持国内军阀和宗教机构以巩固自身地位；故此，中国人应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打倒它们的奴仆军阀和基督教。<28>

四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就已通过日语文献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讨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将目光转向东方，从而在东亚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之后。<29>早期的中共党员并非都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世界观后才入党，而是往往在对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追求中，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马克思主义对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大体上有现实和思想两方面的原因。

凡尔赛会议决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致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失去对西方国家的信任。与此同时，莫斯科两次对华宣布愿意废除沙皇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其展现的友好姿态与傲慢贪婪的西方帝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这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殖民、反资本主义的呼声。特别是，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有如洪水般涌入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的混沌不清与新文化运动以来诸般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使得具有综合体系的马克思主义颇具吸引力。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后共产主义完美世界的允诺，似乎提供了根本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方法和对未来时代的信心。这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对于信奉它的人而言，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知识革命”。这种“知识”以其综合性和自成体系，号称具有无所不包的理论解释力，以及为革命运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指导。<30>

如果说3月9日上海的青年学生发表的反教宣言还显稚嫩，不值一驳，那么6天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第四号发表的一组反对基督教的文章，就不能等闲视之了。该组文章的论点和论述中所用的阶级分析词汇，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无分轩轾，同样充满火药味。<31>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篇是共产党员罗绮园（1894—1931）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篇是陈独秀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

（一）

罗绮园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中引用马克思著名的“宗教鸦片论”，攻击宗教是性灵的桎梏、思想的障碍、资本家的护身符，用“精神上的镣轭去毁灭人的个性”。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与作为谬说迷信的一切宗教互为仇敌。随后，他将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相提并论，认为：

“共产党的战略对于党员规划了一定的举动。而每个宗教的道德对于信徒也一样的规划了一定的行为。在共产主义战略上的命令与宗教戒律之中，每每有许多地方证明是相反的。一个共产党员，倘若他抛弃了宗教的戒律，照党底计划行事，那末他已经停止他的信徒资格了。一个人，他既信仰上帝而又自称为共产党员，不能抛弃戒律以从党规，那末他已经停止他的党员资格了。”<32>

这其实是将共产主义对党（团）员的要求，拉到了与宗教对信徒要求齐平的层次，党规与宗教戒律互为排斥，党（团）员与信徒不可兼顾。将共产

主义宗教化，以培养所谓革命家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积极入世、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最终目的是完成改造社会的革命大业。正所谓“革命家有革命家的人生观，革命家有革命家的特质特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主义牺牲一切。什么刀锯鼎镬，枪弹刺刀……管他哩！”<33>

共产主义者有意将主义宗教化，借助信仰的力量实现政治目标，似乎与苏俄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做法一脉相承。较早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北大教授李大钊（1889—1927），同意《泰晤士报》记者威廉（Harold Williams，1876—1928）的观察，即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带有宗教权威的群众运动，并且相信“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进而对十月革命的意义之解读，充满了某种千禧年即将到来的色彩。<34>国民党元老戴季陶（1891—1949）曾把苏俄革命的成功，归功于民众信仰共产主义的虔诚。他后来认为中国反宗教的革命之所以成功，其实仍是“反宗教的宗教力”的成功，是信仰的成功，“要那样热烈信教的国民，才产生得出那样热烈的反宗教的革命。”<35>章士钊（1881—1973）对当时国内共产党评价道：“盖共产党者，新造之宗盟也。……彼信共产为教，较之回回之奉可兰，耶徒之崇福音，有过之无不及。一切性命以之。故天下以性命报之也。”<36>

某种主义或者意识形态要求像宗教那样去信仰，以给主张者提供坚定信念、使命感，甚至是组织和行动的力量，这是五四之后“主义化时代”的一个特征。<37>所谓信仰，其对象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某种学说或者主义。这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阶层的普遍共识。比如梁启超（1873—1929）给宗教下的定义是个人信仰的对象，而信仰的对象可以是人或非人，主义或事情，“凡对于一种主义有绝对信仰，那主义便成了这个人的宗教”。所

以，在他看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可称之“马克思教徒”。 <38>蔡元培（1868—1940）就宁愿把“宗教的信仰”称之为“哲学的信仰”，并认为宗教的本质不过是对于一种“哲学主义的信仰心”，这种信仰心因个人的哲学不同而有异，随哲学思想的进步而改变。<39>顾颉刚（1893—1980）认为信仰是一种拥有坚决信心的心理状态，最好的信仰对象“乃是这个人他自己。一个人最好能够自信。其次的，便是信别人，或信宗教”。 <40>戴季陶在其著作《日本论》（1928年）中明确指出，信仰的对象可能带有“宗教性”，却不一定是宗教：“宗教是信仰的一个表现，而信仰不一定是宗教，这是在今天说明信仰时所必须具备的知识。所以信仰这一种心理，许多学者用‘宗教性’一个名词来说明他，这是在宗教堕落和宗教革命期中的适当用语。”<41>

孙中山（1866—1925）的三民主义就带有某种“宗教性”。他在阐述什么是三民主义时说道：“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42>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中国逗留期间，就贬称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即与基督教、佛教、回教并列的“马克斯教”，因为“在科学中如马克斯的社会主义，一般信仰者死守了成见，就可以说他是宗教的了。……如果持马克斯主义的，还捧了他的书，保守住他的宗旨，把他的话当作了‘佛音’，看成了‘圣经’，那就不是科学中的态度了”。 <43>

这种将“主义”宗教化的做法，其实是将超越性意义上的宗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44>，却也正契合了五四期间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之后对秩序、意义等价值理念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接受它的知识分子来

说，马克思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提供了一套世界观和行动力，填补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传统世界观（宇宙论、道德和历史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45>动摇之后留下的信仰空白。在这个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五四期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带有类似宗教信仰的特点。这是当时有些基督徒回应罗绮园的文章时可能没有加以重视的。如果只是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物质的分配，仅属于“外部的、制度的、社会的”层次，与作为灵界信仰的宗教可以共存甚至互补<46>，就仍未看清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共产主义，将自身“宗教化”，正是要借助信仰的力量推进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把共产主义称为宗教，因为他们视宗教为历史的残余，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消亡，而奠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乃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故而“和一切宗教的谬说是不能妥协的仇敌”。共产主义者和基督徒信仰上的不可调和，如同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所说，就像共产主义者不可能信仰上帝和基督一样，基督徒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受彻底的无神论影响下的世俗宗教，相信人类的命运将在这个世界中得到彻底实现。<47>

（二）

陈独秀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一“新宗教”，从而一改此前对基督教的好感，在1922年的非基运动中发表《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批评基督教教义不合逻辑，历数基督教会古今种种“罪恶”，迅速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反教人士。

在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号反对“孔教”乃至宗教的思想领袖中，陈独秀较早意识到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宗教的积极意义，并一度被基督教吸引，主张用耶稣的人格精神和美学来补中国文化缺乏情感力量之不足，以此更新中国人麻木不仁的精神面貌。<48>他几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已反思新文化运动中除了科学，新的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之外，还要加上新的宗教。新宗教的定义很模糊，只要除掉旧宗教附会的传说和迷信，就是新宗教。重点不在于给新宗教下定义，而在于改变过去对宗教，准确说是宗教之功能的忽视，认识到宗教在新文化运动塑造国民人格、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陈独秀修正了此前主张废弃宗教的看法，“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49>

这种对宗教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清末梁启超，后者曾一度提倡宗教或者信仰在塑造国民、产生“群治”凝聚力方面，能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1899年，梁启超避居日本期间，受日本哲学会邀请发表演讲，阐发乃师康有为（1858—1927）的孔教思想，认为

“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50>

这里的“宗教”指的是孔子的学说，表明这个阶段追随康有为的梁启超尚未将宗教与西方概念中的religion区分开，只是把宗教当做救国的方法之一，而没有认识到宗教有不同于其他思想类型的特质。也就是说，此时的梁启超对宗教的理解仍然是传统儒家的：宗教即入世教化，儒教的宗教性不构成争论的问题。<51>尽管三年后通过广泛阅读日文文献，梁启超终于意识到现代意义上的宗教观念来源于西方，仅指信仰的、神圣的、和出世间的领域，他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宗教等同于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同义词，而是接受以科学真理和思想自由来对抗宗教生发的迷信和奴性<52>，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包含的修身、牺牲、感化等等内容，还是与被视为非科学的宗教活动分割开来，或作为改造国民性必须的精神受到积极提倡——受梁启超的影响，或是以“主义”或“信仰”的面目出现，为主张者提供坚定的信念、使命感乃至组织和行动的力量。

几乎在对基督教抱有好感的同时，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过起初并未将其当做“包医百病的学说”和普世不易的真理<53>，同时也关注到劳动运动问题，思想上倾向参与现实政治。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接受李大钊介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建议，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

在发表于《先驱》第四号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中，陈独秀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待基督教。与两年前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国人》相比，这篇文章没有引用一句圣经经文，与其说是研究基督教和教会，不如说是一篇针对基督教和教会的控诉文。不过二者均以科学的名义拒绝基督

教教义中的神迹，比如童贞女生子、耶稣的神迹与复活、创世说、三位一体说等等。陈一反此前主张基督教普世的博爱和牺牲精神，要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排除在外，他几乎将中世纪一切牵涉教会的罪恶悉数归咎于教会，斥责现在的基督教会是殖民主义的工具，“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恭维权贵、交欢财主、猎人钱财”。总之，基督教教会“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 <54>此论一出，对于许多中外基督徒而言，陈独秀迅速由昔日朋友变为敌人。<55>

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种好战的姿态，一方面是把基督教问题与资本家联系起来政治化和道德化的结果，基督教非友即敌，再无容忍的可能，被彻底否定，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在反对宗教的同时自我神圣化的表现。张申府（1893—1986）曾致信陈独秀说：“许多人说马克斯主义是一种宗教，其实在最细微的地方，没有点迷信，什么事也作不成。”陈独秀颇在回信中颇以为然：“不但革命事业非以生命来换不可，在这种邪恶的社会里，要想处处事事拿出良心来说实话办实事，也都非有以生命来换的精神不可。吴稚晖先生也说过，罗素谓此时俄人列宁等行事有些宗教性，此话诚然不差，但无论什么事不带点宗教性，恐怕都不能成功。”<56>

平心而论，《基督教与基督教会》虽将教义与教会作区隔分别批判，却失之以偏概全，尤其反映出陈独秀对教会历史与现状了解有限。<57>或许是该文代表了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后中共早期领袖反对基督教的声音，因此被收入1922年6月中共党员罗章龙（1896—1995）编著的《非宗教论》文集中。而后者大致所反映的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反教理据，则远不止马克思主义。<58>

五

由于共产党在背后积极筹划，上海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快得到北京积极响应，就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发表两天后，3月9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这可能与北大学生、中共党员金家凤（1903—1979）从中协调有关。〈59〉但北京的响应者发现反对基督教过于狭隘，因此把运动的目标扩大为反宗教，并成立非宗教大同盟，“以发挥科学真理、解脱宗教羁绊为宗旨”，更是立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60〉3月21日，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及通电。比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其通电，这一次的宣言和通电试图把非基督运动扩大到学生和知识阶层的圈子外，因而名义上反对的是一切宗教，但考虑到“人类所受过基督教的毒害，比其他诸教都重大些”，因此北京的非宗教同盟与上海的非基督教同盟一样，实际上反对的对象均为基督教，区别在于反对的理据：前者为社会进化论、科学和人本主义，所谓“本科学之精神，吐进化之光华”，扫除宗教迷信，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故此，即便北京的非宗教宣言仍有情绪化表述和好战的措辞，比如把宗教比作“洪水猛兽”，声称“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信教与非教中无两可之地”，看似杀气腾腾，但是比起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宣言，总体上还是稍显缓和。

基督教青年会同样受到攻击，只是这次的“罪名”不是资本家的走狗，而是“煽惑青年学生”的“基督教预备学校”和“基督教徒养成所”。甚至为了掩盖政党操纵和排外的印象，宣言和通电一再强调非宗教同盟的宗旨仅非宗教，不牵涉一切党派，无种族国家老幼之别，“凡不迷信宗教，或欲扫除宗

教之毒害者”，即可入会。从通电回信的联络信息和主要署名人来看，北京大学是这次非宗教同盟的发起中心，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是非宗教同盟的核心人物。<61>

早在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北大学生在校内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倾心于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青年学生。李大钊参加了学会主办的演讲会，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周围聚集了一批学生追随者。5月，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随后建立起附属组织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之一罗章龙后来回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中坚分子大多成为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而非宗教同盟的基本成员，主要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均是非宗教同盟成员。1922年春的非宗教运动，正是由当时中共北方区领导发起，参加非宗教同盟以北大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为公开对外代表人物，实际主持与组织者为中共北大支部。<62>

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提供资助和指导。共产国际的代表们看到，主要成员为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小组，脱离中国工人群众，“积极活动能力较差”，却在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力。借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加之五四学生运动的经验，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能够轻易在激进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开展大规模运动。<63> 年幼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缺少群众基础和政治活动的经历，在反基督教运动期间所能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是出版和宣传，借此联合新文化运动中其他反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64>故此，非宗教大同盟的反教理念就不能打出马克思主义的大旗，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深入众人心中的科学信念。

3月24日以后，蔡元培、王星拱（1887—1949）、吴虞（1872—1949）等学界名流加入非宗教大同盟，此外还包括汪精卫（1883—1944）、胡汉民（1879—1936）及北大教职员数十人。尽管与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相比，北京发起的非宗教同盟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甚至广州有27名工人参加了非宗教运动，但总体而言，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仍未脱离知识界的圈子。<65>《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通电发表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通电响应，连篇累牍”，短短十多天里，除了北京、天津、上海以外，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直隶、山西、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省都成立了类似的同盟或同盟支部，基督教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函电纷驰，声势汹涌”。各大城市报纸不时刊登非宗教文字，为这次非宗教运动鼓与呼，对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口诛笔伐。<66>4月9日，也就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集会，与会者多达千余人，大多数为青年学生。至此，非基督教运动俨然成为一场群众运动，这让新文化阵营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周作人（1885—1967）心生不安。

六

周作人虽不是基督徒，但向来同情欣赏基督教，认为近代文艺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一半出自新约圣经。虽然他认为文学与宗教二者根本精神相同，但并不认为艺术或科学可以取代宗教在普罗大众中的地位，觉得“要一心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67>因此，当他从报纸上读到非宗教同盟宣言时，立刻感到困惑不安，便于3月31日，领衔北大五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反对非基督教和非宗教同盟运动，声明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信仰应当有绝对自由，除去法律制裁的以外，信仰自

由不受任何人干涉。<68>

两天后，陈独秀致周作人等的公开信为非宗教运动辩护，他将原本属于个人权利范畴的信仰自由，换作政治现实领域中双方的不同地位：是强者对弱者的自由，还是相反？由此武断地批评周作人等是在“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69>周作人在回信中针锋相对，重申五教授的宣言重点不在宗教问题，而在于担心“对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他从陈独秀的回信中看到了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并且敏锐地预感到，“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70>周作人担心俨然成为群众运动的非基运动，会以“多数人的暴政”伤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事实上，他清楚意识到，与这场非宗教运动相比，五教授的声音只是少数。确实，北大的同事们虽说大多数都加入这场非宗教运动，但仅有少数人公开表达同情基督教<71>，而周作人选择反对非宗教运动，不惜与昔日同道笔战，分道扬镳，表明其至少在理论上以自由主义的立场，来与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划界。周作人后来对政党的警惕，早在这场非宗教运动中就已埋下了根源。<72>

其实，周作人诉诸法律保障信教自由，来反对非宗教运动，这与当年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以信教自由来反对设立“孔教”为国教<73>，二者的思路并无不同。然而，此时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却对保障信仰自由的法律和约法嗤之以鼻，视法律为资产阶级的掠夺工具，而援引法律捍卫信教自由的北大五教授，则“不啻自己表明是资产阶级中的强盗或者是资产阶级盗贼的奴才”。<74>这种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和道德化的做法，并未正面回应周作人对群众运动中以强凌弱、压制思想自由的担忧，周作人也未再回信，这场笔战也就此结束。陈独秀继续为非宗教运动辩护，对基督教

的批判更为坚决，除了指称基督教是人造出来的迷信外，这时又转而认为博爱、牺牲两种基督教美德可脱离基督教自成伦理，而现在的教会在资本制度下已经资本化了。要反对资本主义，自然当反对资本主义之下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使劳动者天天为资本家做奴隶，不起来运动反对，大家和和平平过去，好使资本家安逸地得利”。 <75>5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过支持非基督教及非宗教的决议。<76>这就意味着，由于政党正式介入，非基运动在名义上从思想文化论战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

陈独秀对非宗教运动的反省和评估也变得更为实际。他在《先驱》上发文，一方面批评北京非宗教同盟所持宗教非科学的反教论调不够彻底，不若非基督教同盟目标清晰，容易为群众运动所把握——这确实遭到时人诟病<77>；另一方面拿教会学校和公私立学校的学生做比较，警告非基督教同盟的学生相比之下社会服务甚少注意，纪律和卫生训练差，学校与社会脱节，若无此觉悟和改革，非但不能战胜教会学校，还会让教会学校的势力蔓延全中国。<78>这似乎预先划定了非基督教运动下一阶段斗争的对象——教会学校，以及收回教育权的目标。

七

1922年6月，喧嚣一时的非基督教运动草草收尾，声势已减，“生气几尽消沉”。 <79>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基督徒学生大会并未受影响，顺利闭幕。在这次非基运动中，基督教青年会的回应以简又文（1896—1978）最为深刻有力。简又文在15岁时，受老师影响，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1913年，简又文赴美留学，1917年在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获得文学士

（Bachelor of Arts）学位，旋即回国在广东岭南大学讲授英语和圣经，同时担任该校基督徒学生会秘书长。第二年，简又文再次赴美，入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专攻宗教学，于1920年获宗教教育科硕士学位，同年秋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专攻基督教思想史。1922—1924年，简又文担任上海一间教会的代理牧师，同时也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干事，编辑《青年进步》月刊，编译《宗教研究丛书》，号召宗教界响应当时风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简离沪赴京，担任燕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副教授，直至1927年。〈80〉

从简又文的学术背景看，其神学思想倾向自由派。因此，当他于1922年4月10日连同其他四位基督徒，代表基督教青年会知识分子发表《对于非宗教运动宣言》，以回应气焰正炽的非宗教运动时，无怪乎该文通篇充满“科学”与“进化”的字眼。

该文以宗教学专家的眼光，批评非宗教人士对基督教历史和宗教学缺乏科学研究，对基督教的认识及宗教前途的判定，往往是承袭外来旧说，表达先入为主的成见。这种对待宗教非科学的态度，与非宗教人士主张的科学精神相违背。简又文又指出，就实际的社会贡献而言，基督教在教育、慈善等社会服务领域给中国带来许多实际的益处。相反，非宗教人士不但在这些领域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反而起到消极的和破坏的作用。“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教盲哑，洗麻风，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并且足令外人之真心拯救吾民于水火者灰心丧志。”〈81〉这一辩驳相当有力，如上文所说，陈独秀也承认在社会服务方面，公立学校不及教会学校。

简又文后来撰文将非宗教人士攻击宗教和基督教的理由总结为八点<82>，批评这些立论非但站不住脚，而且反映出这些反教学者领袖自身之缺陷。比如他们在知识结构方面，宗教学知识不足，却往往以权威自居，武断判定宗教的前途，乃至对于“社会上学术上任何问题，不问是自己专门研究的范围不是，几于无一不书，无一不道，复在处处都妄用同等的威权以作不易的结论”。 <83>这些非宗教运动的领袖及作者，尤其是反对宗教最为积极的，几乎是受社会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反对基督教的影响。另一方面，简又文叹息一般青年眼见国家贫弱思救国之方时，无暇专心治学，往往于国外输入的种种学说、主义，未经消化，不顾是否符合国情，便欲用来解决社会上各种问题。“所以无论何国何世纪何时代何学者何时期所主张的何主义和何政策，一入吾国，简直变了救急扶危起死回生的‘万应膏丹丸散’。唉！近代中国学者们所标榜的主义‘多如牛毛’了，何以不能见实行呢？如今这非宗教的运动，又藉非教之名，以宣传‘共产主义’与‘鲍雪维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引者按）了。”<84>

其实，正如前文所说，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共产主义不但以反教之名广泛传播，吸引大批激进青年和知识分子，而且本身被赋予类似宗教的特点，以激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革命大业投入战斗，勇于牺牲。宗教化了的主义，为主张者提供信念、使命感和坚持不懈的动力，也为政治动员和组织提供行动力量。由共产国际通过中共及其辖下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发动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表面看起来是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学生运动，似乎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但其用意主要还是政党为扩大影响力，吸收新成员而与基督教青年会争夺青年的政治运动。

这场运动以非宗教为口号，带有群众运动的特点，进一步分化了新文化运动阵营。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理念在救国、革命大义面前日益边缘

化。同情基督教的周作人等人越发感到自己势单力薄，坚决反对基督教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袖则要将铲除非科学的宗教进行到底。在时人看来，这种感情用事和带有排外色彩的非宗教运动，与其说是以科学之名反对宗教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非宗教的“宗教运动”，或者“宗教的非宗教运动”，因为非宗教人士鼓吹科学，却没有以科学方法对宗教进行足够研究，所发表的反教言论都是“门外汉的反对”。〈85〉

对于理性的研究者而言，或许与科学对立的宗教是消极的，但对于致力于行动的革命者而言，经过改头换面之后，宗教比科学能提供更大能量。在此意义上，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表面上以反对基督教为目标，实际上却看似矛盾地转化为对另一种信仰（主义信仰）的热烈追求，进而形成20年代特别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精神”或“革命信仰”。〈86〉而后来的历史证明，革命大潮之下，20世纪的基督教无论怎样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自我改造中国化，均洗不掉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原罪”。一个强调进化、与科学和政治同舞的基督教，没有十字架令人讨厌之处，无论在反教运动中如何自省改造，服务社会，都注定是一厢情愿。

注释

〈1〉“Editorial: World Students in Conference”, in The Chinese Recorder(CR), Vol. LIII., March,1922., No.3.,152.

<2>谢扶雅，“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二十五年小史”，《青年进步》，第50册，1922年2月，第14—22页。

<3>“本会消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青年进步》，第49册，1922年1月，第90—91页。《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称大会主题为“世界重建中的基督”（Christ in World Reconstruction）。

<4>顾子仁，“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宣言”，《青年进步》，第50册，1922年2月，第1—4页；查时杰，《中国基督教人物小传》（上卷），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83年，第189页。

<5>陈徐秀葆，“同盟大会纪略”，见《清华周刊》第244期，1922年，第41—42页。

<6>“补录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纪略”，收入真光杂志社编，《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第322—323页，见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东传福音》第二十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649页。

<7>“纸上战争”这一提法，见Jessie Gregory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28(Notre Dame: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INC., 1988), 61、76。

<8>“Editorial: World Students in Conference”, in CR, Vol. LIII., March,1922., No.3.,152.

<9>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73—574页。

<1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57), 250、253.

<11>同上，第270页。

<12>刑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赵晓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1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Foreign Work and World Service of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272.

<1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15>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77页。少年中国学会成立的时间和宗旨，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223—225页。

<16>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收入氏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17>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1919—192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47—249页。

<18>“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先驱》发刊词，1922年1月15日；邵鹏文、郝英达，《中国学生运动简史（1919—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82页。

<19>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68、77页。

<20> 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侯均初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9—60页。

<21>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28,61.

<2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2页。

<23>“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及通电”，见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研究科参考材料，1927年，第187—189页。

<24>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全集》第27卷（1915年8月—1916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437页。

<25>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26>以童子军身份为这次大会提供服务的清华学生胡竟铭（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桥梁建筑工程师），本人不是基督徒，在《清华周刊》撰文反驳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指控：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既非帮助资本家的组织，也

非被欧美各国摒弃的集会，而是“世界大同”的先锋和曙光。胡竟铭，“我对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所得的感想”，见《清华周刊》第244期，1922年，第31—34页。

<27>《生命月刊》“社论”，第2卷第7册，1922年3月，第8页。

<28> Jessie Gregory Lutz,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0-28,57-58.

<29>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30>同上，第2—3页。

<31>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于1922年1月15日创刊，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最初三期由北京地方团出版，后因北京政府禁止，从第四期开始转归上海临时中央局出版。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12页。《先驱》第四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发布的署名文章有：赤光，《基督教与世界改造》；卢淑，《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绮园，《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哲华，《基督教与妇女》；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以及（戴）季陶的诗《阿们？！》。

<32>绮园，“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33>凯旋，“共产主义者所应取的态度”，《先驱》第2号，1922年2月5日。

<34>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35>戴季陶，《日本论》，上海民智书局，1928年，第144—145页。

<36>章士钊，“论共产教”，《甲寅周刊》第1卷第43号，1927年，第5、8页。

<37>王汎森，“‘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见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7—205页。

<38>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62页。

<39>蔡元培，“北京非宗教大会演讲之一”，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00页。

<40>顾颉刚，“信仰”，《顾颉刚通俗论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1937年，第8页。

<41>戴季陶，《日本论》，第144—145页。

<42>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184页。

<43>罗素在演讲中认为宗教代表守旧的态度，妨碍进步和发明，见罗素，“宗教问题演讲之二”，章廷谦记，《少年中国》第28期，1921年2月，收入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74页。

<44> Larry Shiner, “The Concept of Secularizat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6, No. 2 (Autumn, 1967), 214-215.

<45>参见邓军，《觅“信”的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宗教感”》第二章，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46>均默，"'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是这样说的么"，《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第80页。

<47>参见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81页。

<48>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陈独秀从圣经经文中解读出耶稣三方面的人格精神特点，但因其释经方法有问题，得出的结论大多缺乏说服力。其释经方法忽视神学重点，未考虑经文上下文的关联，从而产生许多误读。这方面的辨析，参见拙文《救国视野下的耶稣形象——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变化》，收入《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第130—152页。

<49>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50>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59页。

<51>关于"宗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参见陈熙远，"'宗教'——一个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关键词"，《新史学》（台北）第13卷第4期，2002

年，第37—66页。

<52>巴斯蒂，“梁启超与宗教问题”，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00—457页。

<53>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3月1日。

<54>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55>“Etorial: Church Under Fire”, in CR., Vol. LIII., May, 1922., No.5., 294-295.

<56>“通信”，《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57>参见亦镜，“与陈独秀先生说‘基督教与基督教会’”，《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全编》，第191—213页。

<58>《非宗教论》文集起首罗列了18位近代“非宗教大家”的肖像，略记其

言行，“以便参考和瞻仰”，表明非宗教同盟借用的思想资源主要是17世纪以来的英、法、俄思想家，尽管这些所征引的外国思想家并非都反对宗教。（见非宗教大同盟出版，《非宗教论》，1922年）周策纵（1916—2007）先生认为，非宗教人士征引这些思想家的言论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信教人士引用其他外国思想家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者所争论的问题及其各自的观点和理由，几乎是重复了过去三四百年间西方所进行的有关宗教争论。（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陈永明、张静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310—311页。）

<59>1920年8月22日，在陈独秀倡议下，俞秀松（1899—1939）、金家凤等八人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通电标明的联络人正是金家凤。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第123页；《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通电》，见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196页。

<60>“非宗教大同盟章程”，见萧子升编辑，《近世界非宗教大家》附录，上海求实学社重印，出版日期未知；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193页；C. S. Chang, “The Anti-Religion Movement”, in CR, Vol. LV, August, 1923, No. 8,459。

<61>《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通电》，见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193—196页。通电文末说明回信联络人为北京大学第一院金家凤（1903—1979，北大学生、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之一）收。署名人包括李石曾（1881—1973，时任北京中法大学董事长，后来加入国民党）、萧子升（1894—1976，此时留学法国，后加入国民

党）、李大钊（北大文科教授，中共创始人之一）、缪伯英（1899—1929，中共女党员）等79人。

<62>罗章龙，《椿园载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7、91页；“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第122页。

<6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86—87页。

<64>同上，第88页。

<65> C. S. Chang, “The Anti-Religion Movement”, in CR, 460；简又文，“非宗教运动与新教育”，见《青年进步》第54期，1922年，第2页；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113—114页。

<66> North China Herald, April 15,1922，转引自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118页；简又文，“非宗教运动与新教育”，第1页。

<67>周作人，“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见《生命月刊》，第2卷第7册，1922年3月，第1—2页。

<68>“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转引自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199页。

<69>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7日，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33页。

<70>周作人，“周作人致陈独秀”，《晨报》1922年4月11日，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1919—1922）》第二卷，第433—434页。

<71> Chen Yiyi, “Peking University’s role in China’s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1922-1927”,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XXXI, No. 1, February 2010, 184-197.

<72>钱理群，《周作人传》（修订版），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周作人与陈独秀在1922年的公开决裂，以及反对非宗教运动对周作人的影响，参见尾崎文昭，“陳獨秀と別れるに至つた周作人——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運動の中での衝突を中心に”,《日本中國學會報》, 第35集, 1983年, 第232—244页。感谢詹洪兄帮助翻译日文。

<73>赵清，“从反‘孔教’运动到‘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反宗教道路剖析”，《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33—734页。

<74>赤光，“莫名其妙的滑稽宣言”，《先驱》第6号，1922年4月15日。

<75>陈独秀，“‘宗教问题’演说词”(1922年4月21日)，《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25日。

<76>记者，“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纪略”，《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1日。

<77>比如同时期的梁启超就郑重其事地提醒非宗教运动人士，他们反对的对象应该包括中国的民间宗教。宗教学者傅铜也认为非宗教运动应该扩展，反对各种迷信。见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58—259、270页。

<78>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79>简又文，“非宗教运动与新教育”，见《青年进步》第54期，1922年，第2页。

<80>简又文的生平事略，我参考了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1,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C. Howard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366-367，以及周敏，《卅载潜心醉太平，纵横研究几经营——太平天国史学先驱简又文》，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8—9页。

<81>简又文、范子美、杨益惠、应元道、邬志坚，“对于非宗教运动宣言”，见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09页。

<82>这八点理由包括：1、科学真理与宗教迷信绝不相容；宗教在国外已颓废或过时，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无地可容；2、基督教的教义和圣经，有多处违背科学原理与事实，不能立足于现代新文化中；3、基督教在历史上曾犯下许多罪恶，如迫害科学，束缚思想等等；4、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及现代中犯有许多罪恶，如充当外国奸细刺探国情等等；5、基督教与资本主义联盟，以侵略中国，要除掉资本主义，就要除去拥护资本主义的基督教；6、基督教在中国所办的教育事业束缚青年，危害中国；7、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迷惑青年，施害学生，为资本家的走狗；8、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在京召开，传播教毒于学界，促进资本主义。见简又文，“非宗教运动与新教育”，见《青年进步》第54期，1922年6月，第1—2页。

〈83〉同上，第10页。

〈84〉同上，第11页。

〈85〉傅铜，“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张钦士选辑，《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256页。

〈86〉石川祯浩，“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收入氏著《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4—185页。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11期（2020年夏季号）。

（引文结束）

====================

https://posts.careerengine.us/p/5be838fee0124d52c48f6bbb

民国知识界发动“非基运动”的前因后果

前言

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这百年巨灾是民国非基运动播下的种子；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自由是个神学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在悖逆神的地方，暴君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锁链。

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定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校园召开，为配合这次会议，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教会机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例如：《青年进步》、《中华归主》、《生命》等教会刊物均推出“基督和世界改造”之类的专号，表达了基督教能带来新时代的愿望。这些宣传激起了中国学生和知识界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开会的反对。一般历史学者都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作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索，也就是说，这只是引发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诱因，至于这场运动的根本原因，必须追溯到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上海出版，《新青年》创刊之时，正值国内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论白热化之际。因着这个原因，《新

青年》的作者们也热切关注宗教问题，杂志刊登了一批讨论宗教的文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新青年》1917年7月1日出版)、胡适的“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1919年2月19日出版)和陈独秀的“基督教与中国人”(《新青年》1920年2月1日出版)。

1920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巴黎支部因禁止有宗教信仰的人入会，在会员中引发了一场宗教问题的讨论。为此，少年中国学会组织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演讲与报告，机关刊物《少年中国》连续三期刊载这些演讲与报告，作为宗教问题讨论的专刊。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是一个积极的角色，他不但为此写了大量文章，还向法国一些著名学者发信询问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并将此寄回国内，以证明西方学者亦多不赞成宗教。李璜反教的根本原因有两点：一，研究人类行为的是理性和科学，不是神秘的宗教；二，宗教信仰天国和不朽的观念障碍社会进步，人们需要对改进世界多做努力。这两点是当时国人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道理。

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影响下，宗教问题成了当时学术界、青年学生中讨论的热点，许多有影响的期刊都纷纷发表文章，参与宗教问题的讨论。在这期间，政治因素逐渐渗入到宗教问题的讨论当中，尤其是在涉及到基督教的问题上。

1920年朱执信撰文《耶稣是什么东西》，对基督教进行猛烈攻击，他还写了另外的文章，鼓动青年学生反对基督教，他提醒学生，宗教是“慢性精神的自杀”，不可不防。在他的影响之下，许多人开始撰文批判基督教，他们以苏联对待宗教的态度为借鉴，认为社会主义与宗教势不两立。总之，国内学界对基督教的批判，从1920年起，已经开始从政治的角度进入，揭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因此，当青年学生得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北京清华校园开会时，便组织了起来，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3月9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发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

盟”，通电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了措词严厉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其中写道：

“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段，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压迫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我们认定，这种残酷的、压迫的、悲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非人道的，非另图建造不可，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美、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的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学生诸君!青年诸君!劳动者诸君!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罪恶?我们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现在眼见这些资本家走狗在那里开会讨论支配我们，我们怎能不起而反抗!”

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通电，得到了全国知识界的积极响应。1922年3月20日，北京知识界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非宗教大同盟”成立第二天，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各界有识之士“依良心之知觉”、“本科学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校园召开年会，共有79人在通电上签名，其中包括李大钊、李石曾、萧子升等。3月28日，“非宗教大同盟”又公开发表了《非宗教大同盟简章》，表明他们以科学为反对宗教束缚的思想武器，简章指出“非宗教大同盟…‘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4月2日，该同盟再次发表宣言，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在上海、北京两地的影响下，广州、南京、杭州、长沙、厦门、福州等地也纷纷组织起来，反对基督教，使得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

北京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气势磅礴： “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说，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1922年6月，非基督教运动逐渐沉寂下来。从爆发到沉寂，前后仅三个月。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大革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再次普遍高涨。4月间，广州英国圣公会所属圣三一学校的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遭英国校长否决。学生与校方对抗，并发表宣言，争取校内集会结社自由，而且提出“争回教育权”的主张。在他们的带动下，徐州、南京、福州等地的教会学校也出现了学潮。教会学校的学潮的高涨，促进了非基运动的再起。当年夏天，几个被上海基督教浸会书院勒令退学的学生发起非基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响应。8月间，在国共两党的支持下，新的“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成立，执行委员（主席）由共产党唐公宪担任，而同盟的规章制度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草拟。同盟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对基督教发动全面猛攻。

国民党将9月7日定为“国耻日”，将该周定为“反帝周”。此外，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呼吁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为此，

运动的重心渐渐转移到反对教会教育和收回教育主权上来。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召开第10届年会，通过了“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及“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案”两大议案，使“收回教育权成为全国一致的舆论”。同年12月，非基督教同盟组织了一个“非基督教周”活动。12月22日，长沙、广州、济南、武汉、九江、上海、苏州、徐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非基督教周”行动开始，反教群众拥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讲演；一部分人涌进教堂捣乱，破坏礼拜，围攻传教士，甚至以飞石掷击教堂，行动非常激烈，掀起了非基运动的新高潮。

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全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怒潮，非基运动再起，基督教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帝国主义的走狗”，教会受到空前的压力。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老板杀害中国工人，同月30日，上海学生示威游行，声援工人，遭英警开枪狙击，造成大量伤亡，史称“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反应强烈，掀起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在这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中，一向被大多数国人视为“帝国主义先锋”的基督教遭到巨大的冲击，教会学校中的学潮波涛汹涌，从“五卅”到年底，各省出现的教会学校学潮多达43起。

1926年，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所到之处，反基督教的事件多有发生，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多被军队或党部占用，教产被随意使用或破坏，教会的损失极为严重。1927年3月24日，国军第六军攻克南京，一部份军人袭击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有六位传教士被杀，其中包括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五千名新教传教士逃离中国，传教工作基本宣告停顿，许多地方的教堂关门大吉，信徒流失的情况空前严重。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内战大兴，非基运动逐渐远离国人注目的焦点。同年12月1日，蒋介石与有浓厚基督教家庭背景的宋美龄结婚，虽然他当时还不是基督徒，但这一婚姻的缔结影响到整个国民党对基督教的态

度。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学潮受到限制，与学生运动不可分割的非基运动也就沉寂下来。

在1949年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1922年—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两次运动都引发了东西方冲突以及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中国北方的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以一种非理性的排外运动宣泄了下层群众的仇恨情绪，这种愚昧偏狭的心理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演出了一场“扶清灭洋”的闹剧，导致深重的灾难。义和团杀害了241名西方传教士与23000多名中国基督徒，引来八国联军征讨，迫使清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白银32,939,055两。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多让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事件，是因为没有读多少书，没见过世面，太愚昧了。在明恩溥等传教士的鼓吹下，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大部分退还，在中国办了12所大学。

1922年—1927年，以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打着“科学”的旗帜再一次发动反基督教运动，他们霸占教会学校，禁止传教士教书，赶走传教士，拥抱苏共无神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民国知识分子无论读了多少书，但因不敬畏上帝，本质上与义和团一样。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这百年巨灾是民国非基运动播下的种子；而今，又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到，自由是个神学问题，而非科学问题，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基本权利，在悖逆神的地方，暴君已经为你预备好了锁链。

（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讲述基督教信仰与真理的相关书籍】

关于基督教信仰证据的讲座

原著：WILLIAM PLUMER等

原著出版日期：1854年

。。。。。。。。。。。。。。。。。。。。。。。。。。。。。。。。

。。。。。。。。。。。。。。。。。。。。。。。。。。。。。。。。

。。。。。。。。。。。。。。。。。。。。。。。。。。。。。。。。

。。。。。。。。。。。。。。。。。。。。。。。。。。。。。。。。

。。。。。。。。。。。。。。。。。。。。。。。。。。。。。。。。

。。。。。。。。。。。。。。。。。。。。。。

===

===

=============================

去地狱的道路是容易的，因为人们只要闭着眼睛就可以进去。——CASTRUCCIO CASTRACANNI

那些不问青红皂白、容忍一切观点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不问是非、不论对错，并不是对人真正的友善。——BURKE

无知的人在观点上骄傲、在精神上傲慢；有真知的人，一定谦卑。——洛克

事实是，人们并非总是有心情来接受别人的劝勉。——LOGAN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　神的国的，决不能进去。——耶稣基督

人间律法的两个基石是，自然的定律与上帝的启示。——BLACKSTONE

寻求真理，不仅是一件很困难、费力的事情；而且，当人们找到真理的时候，若发现真理与自己的理念不合，那么，就宁愿相信谎言也不相信真理。在人的心里面，有一种自然的、败坏的品质，那就是，人更喜爱谎言、虚谎。——培根

当人们没有任何信仰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信。当他们不信上帝先知的时候，他们就相信迷信和占卜；当他们没有敬虔信仰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巫师；当他们关闭了属神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打开了交鬼、行恶的洞穴。——CHATEAUBRIAND

如果让我选择一件最令人喜悦、最有益处的事情，那么，我就一定会选择：真正的敬虔信仰。——HUMPHREY DAV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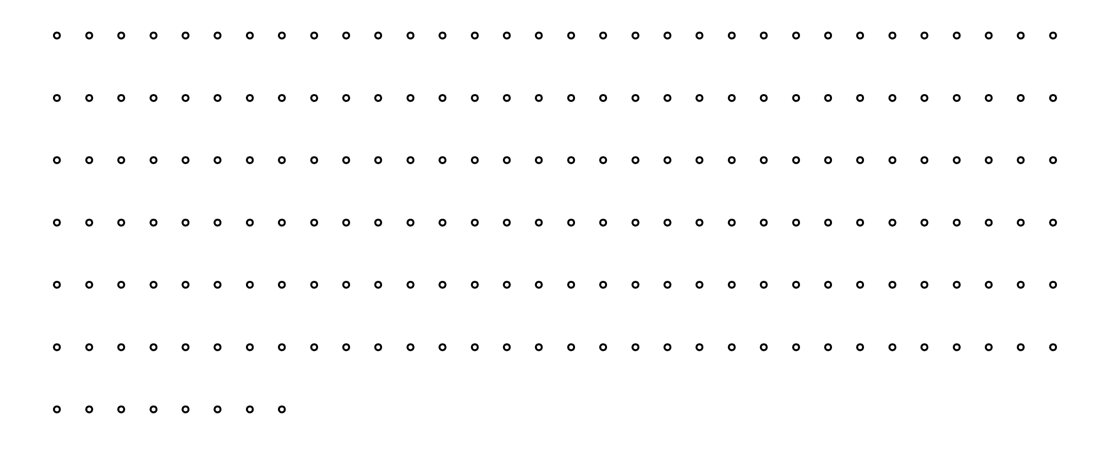
。。。。。。。。。。。。。。。。。。。。。。。。。。。。。。。。

。。。。。。。。。。。。。。。。。。。。。。。。。。。。。。。。

。。。。。。。。。。。。。。。。。。。。。。。。。。。。。。。。

。。。。。。。。。。。。。。。。。。。。。。。。。。。。。。。。

。。。。。。。。。。。。。。。。。。。。。。。。。。。。。。。。



关于基督教信仰证据的反思

原著：ARCHIBALD ALEXANDER

原著出版日期：1832年

。。。。。。。。。。。。。。。。。。。。。。。。。。。。。。。。

。。。。。。。。。。。。。。。。。。。。。。。。。。。。。。。。

。。。。。。。。。。。。。。。。。。。。。。。。。。。。。。。。

。。。。。。。。。。。。。。。。。。。。。。。。。。。。。。。。
。。。。。。。。。。。。。。。。。。。。。。。。。。。。。。。。
。。。。。。。。。。。。。。。。。。。。。。

第一章

正确地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任何人都应当有权利和义务，来深入地、理性地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显然的道理；没有人会对此质疑。

如果没有理性的思考，就不可能有真诚的信仰；我们在探索和明白真理的每一步过程中，都需要理性的帮助，无论是考查关于启示的证据，还是在明白启示的意义与内容方面；无论是明白信仰中的教义，还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践行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在思索和查验基督教信仰的证据的时候，我们恳请世人用诚实的理性来聆听真理；理性是人生的各样能力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在关于信仰的事务上，我们应当正确地使用理性；真理与理性，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信靠那无限全能之上帝的话语与启示，信靠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和应许，而不是信靠我们自己的软弱、有限、充满了罪性的心思意念；——这本身，就是理性的、合理的。

这正如，一个没有受过很多科学教育的人愿意仔细地聆听天文学家的分析，从而相信和明白，天体虽然看似每天在围绕大地而转动，但实际上，这个现象是由于大地在动、而不是由于天体在动。又或者，我们通过天文学的研究而知道，太阳在冬天的时候，比夏天的时候离地球更近；等等。这些事实虽然看起来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直觉相反，但是，我们相信天文学家的分析，这本身，却是一件非常理性的态度。如果我们在天文学的有关问题上，愿意相信天文学家的见证；那么，难道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岂不更应当愿意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见证与启示吗？上帝是全能、全知的；他是信实的，毫无欺谎。

许多人声称，他们的观点和观念都是来自于理性的思考；但这如果真的都是事实，那么，世上就不可能充满了那么多谬误、荒唐、危险的错误认识，世人心中也不会充满了那么多荒谬顽梗的心思意念。

事实是，世人的心思意念中常常没有正确的理性，而是被各样盲目、偏见、罪恶败坏的态度所误导。

很多人由于对宗教信仰抱着肤浅、轻视、急躁、鲁莽的态度，因此，不能够看清、明白、信靠那些在信仰中的、正确的真理，所以，他们与幸福失之交臂；他们的生命与灵魂遭受最大程度的损失。

很多世人看到，在现代社会、以及古代社会中，在世界上，在关于宗教信仰的事务中，充斥着各种迷信、欺谎之事、观点纷争、各执一词、许多虚假之事、许多光怪陆离、危言耸听之言辞，等等。因而，很多世人在没有认真思考、谨慎分析、慎思明辨的情况下，就匆匆地得出了一个鲁莽的、一般性的结论，说："所有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都是虚假骗人的。"他们草率地说，宗教信仰都是一些糊弄人的把戏，都是一些人想要愚弄、统治、利用另一些人的工具。而对于所谓的"上帝的启示"，他们甚至都不屑一顾，根本不愿意去认真仔细地思考、勤勉地查验，不愿意去看一看那是不是真实的。

难道，上述态度就是理性的态度吗？显然不是。真正的理性，一定是勤勉地寻求真理的，一定是诚实的，是高贵、荣耀的。遗憾的是，世人常常被淹没在许多赝品之中，而忘记了那真正的真理、诚实、荣耀的品格，是何等可贵。

另外还有一类世人，自称很有理性，自称对于宗教信仰的问题很有研究；但是，他们的"理性"中却包含着极其强烈而顽梗的偏见。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求、聆听任何反对宗教信仰的言辞；他们热切地阅读任何反对宗教信仰的书籍；然而，他们一门心思地、偏执地反对宗教信仰，却不认真地去想一想，仔细地了解，宗教信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们的理性是扭曲的、而不是诚实的；他们的心灵沉浸在黑暗之中、而不能自拔。

还有第三类人，虽然常把理性挂在嘴边，但是，却在心中存有许多恶意、野心、贪婪、欲望、复仇。这样品格的人，不论多么聪明，不论知识多么丰富，都不可能公平理性地来思考关于信仰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心里总是把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看作最为重要的事情。事实上，由于真正的宗教信仰一定会严厉地谴责人的罪性与罪行，并宣告上帝的终极审判与惩罚，所以，这些沉浸在肉体血气中的人，往往都会非常憎恨宗教信仰。正如一位作者写道："那些沉浸在肉体血气中的属世之人，一定会憎恨上帝所启示的宗教信仰；因为上帝所启示的宗教信仰，一定会坚定地反对他们。"

一个以这个世界中的属世利益为终极依归的人，一定不会用理性来公平地、平静地思考关于信仰和真理的问题；他们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深刻思考中，得到任何益处。他们喜爱罪、喜爱肉体血气和欲望，远胜过他们喜爱真理，远胜过他们对于敬虔信仰的看重。所以，他们总是用嘲笑、蔑视、敌视的态度，来看待一切关乎信仰与真理的事情。

一个沉浸在肉体血气和欲望中的人，在内心中对信仰充满了仇恨；他们恨不得把世界上的任何信仰全都消灭净尽。在这方面，法国的伏尔泰可以算是一个领军人物；在每一个西方国家中，都存在着许多追随他的人们。

还有另外一类人，也喜欢以所谓的"理性"标榜自己；这些人内心冰冷、多疑、狡猾。他们用许多抽象的神秘主义哲学、玄学哲学，来填充他们的怀疑主义思想；他们擅长用很多似是而非的狡辩，来提出各种充满了诡辩的理论。这些人的人数虽然或许不多，但却有时非常有影响力。与其他反对信仰、反对真理的人相比，这些所谓哲学家、诡辩家们提出的说辞，往往更加微妙、更加有蛊惑性；在这些人的欺谎之言中，谬误荒唐的事情，被包装得仿佛像真理一样动人。

若我们相信了那些所谓哲学家的诡辩之词，那么，他们不仅会让我们怀疑信仰与真理，甚至还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感官、乃至我们生命的存在性本身。

那些诡辩之术，无非是靠着：一些狡猾的伎俩，来混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以假乱真的逻辑；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推理；偷偷转换的概念与术语；或者是，探寻那些超过了人类理性与知识能够触及的范围的问题；或是纠缠那些一切知识背后的最基本的原则与界限。

这些诡辩家的动机，往往是出于虚荣和虚浮之心；他们为了争辩而争辩，为了理论而理论；在辩论中总是想要比别人高一头。然而，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诚实寻求真理的态度。在他们的所谓理论和诡辩体系中，真理与理性其实毫无价值。他们质疑一切，试图拆毁一切，但却无法建立起任何有效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系统和体系。他们自己成了真理最大的敌人。可叹的是，许多人坠入了他们精心编织的网罗；许多人把他们的诡辩逻辑当作真谛与至理；许多人被他们误导而进入了谬误的迷宫之中；在他们的虚无主义、诡辩主义、怀疑主义等等谬误观念影响之下，许多人心中不再有美德、价值、隽永之事。

____

上述各种各样的人们，虽然常常标榜自己为推崇理性的人，但是实际上，都是在践踏、歪曲、谬用理性。

在这里，我还想要指出，有一类人，自称为“理性”的基督徒；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所谓的“理性”当作了根本性的基础，即，他们只相信那些他们的理性所能够接受的信仰内容。这些人虽然看似在高举理性的旗帜，但他们实际上所作的，是抛弃了理性；这是因为，当他们面对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他们错误地以人的所谓理性、观点、判断，来检验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正确与否。然而，我们都无可否认地知道，上帝的启示和话语，是最高的真理源泉；人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真正理性的。

当我们面对圣经的时候，应当有一颗公正不偏、诚实恳切的心灵；应当以谦卑而勤勉的态度，来努力认真地明白上帝的启示和话语。我们不应当用自己的好恶来裁剪圣经中的教导，而是要以全面把握圣经、以经解经、认真倾听、深刻思索的心态，来诚恳地聆听、思想、接受上帝的教导与旨意。我们不应当把圣经当作是来满足我们自己理念的工具，而是应当谦卑地把自己的心灵完全敞开，接受圣经对我们的教益。

有的人误以为，信仰与理性是互相矛盾、互不融合的。甚至，在这方面，有些所谓哲学家们错误地宣称，一个人如果接受宗教信仰，就意味着放弃了理性；他们谬误地、似是而非地主张，一个论点只有通过了人的理性的检验，才能够站得住脚。这就是MORGAN、BOLLINGBROKE、伏尔泰、休谟等人喜欢滋滋谈论的话题。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以言简意赅的方式，回顾基督教信仰的证据，驳斥上述所谓理性之人的主张；本书将要显明，基督教信仰不但不是违反理性、与理性不容的，恰恰相反，是合乎最高程度理性的，是合理、确据、无可置疑的。

。。。。。。。。。。。。。。。。。。。。。。。。。。。。。。。。

。。。。。。。。。。。。。。。。。。。。。。。。。。。。。。。。

。。。。。。。。。。。。。。。。。。。。。。。。。。。。。。。。

。。。。。。。。。。。。。。。。。。。。。。。。。。。。。。。。

。。。。。。。。。。。。。。。。。。。。。。。。。。。。。。。。

。。。。。。。。。。。。。。。。。。。。。。。。。。。。。。。。

。。。。。。。。。。。。。。。。。。。。。。。。。。。。。。。。

。。。。。。。。。。。。。。。。。。。。。。。。。。。。。。。。

。。。。。。。。。。。。。。。。。。。。。。。。。。。。。。。。

。。。。。。。。。。。。。。。。。。。。。。。。。。。。。。。。

。。。。。。。。。。。。。。。。。。

第二章

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除去一切宗教信仰；如果真的如此，那就一定会是人类所将要面临的最大灾难

我们在本章不是想要说明，宗教信仰是每一个人的道德职分与义务；我也不是要在这里说，人若没有真正的信仰，就不可能在死后的未来生命中得到幸福；对于这两点，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都会竭力否认。我只是想要在本章阐述，在这个世界上，在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质中，都有着追寻信仰的内在趋向。

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反思人性中的基本原则，并反思人类世界的历史，就能够清楚地看明。人自然地有着道德的情感、价值、义务感；人能够分辨正确与错误；人会为自己所作的错事而自责；会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而害怕将来要遭到的报应与惩罚；并会为了自己所曾经做过的错事而想要做出

某种补偿、悔罪。

这种情感与品质，被称为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质；人也因此被称为具有宗教信仰性质的“动物”。显然，这是人与世上任何其它生物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人的这种属性，存在于任何年龄、背景、性别之中，任何国家民族之中，任何地区、文化、不同的文明程度之中。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里面，我们都不会看不到宗教信仰。想要寻找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比寻找一个没有语言的民族还难。

有的旅人从远方回来说，他们曾经在遥远的偏远地区，遇到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我们若对他们的经历稍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无论在多么原始的部落里，我们都能够看到宗教信仰。

根据我们现在对全世界的了解，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国家中，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

在古代社会，那些最智慧的哲人们也都完全同意这一点。无论是柏拉图，

还是CICERO，都在这些方面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在人性的最深处，宗教信仰的品质如此深刻地存在着，以至于无人能够把这一点除去。人们或许会放弃一个宗教信仰，皈依另一个宗教信仰；但是，人们不可能长时间地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在人的心中除去一个敬拜的对象、精神的支柱，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给自己找到另一个敬拜的对象、精神的支柱。如果世人不认识那真正的造物之主、永生上帝，那么，他们就会给自己发明出许许多多的偶像众神，或是从别的地方给自己找来顶礼膜拜的对象。

世上万国万族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对此否认。人世间的这种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普遍性，清楚地证明了，宗教信仰是人性最深处的一种品质；这正如，人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这件事实，清楚地证明了，社会性也是人性的一种最基本的性质。

那些反对宗教信仰的无神主义者们，总是想要说明，宗教信仰不过是一些骗人的把戏，是神职人员们得利的手段，是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等等；但是，这个论点其实既没有历史见证的支持，也本身是最不合理的；因为，世人如果不是先在自己心目中有宗教信仰的强烈渴望和需求，那么，又怎么可能被宗教信仰所“欺骗”呢？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愚昧、荒谬的宗教信仰形式；然而，它们仍然常常能够在世人心中大行其道；这本身就说明了，在人的心中有着何等强烈的信仰的渴望。

世人心灵中的这种巨大匮乏、需求与渴望，无论在古时，还是今天，还是未来、直到世界的末了，都一直存在着、并将要一直存在下去。

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除一切宗教信仰。

我不知道，这世上的无神主义理念，会传播到多大的影响范围，会多么成功。无疑地，的确，有很多人固执地坚信无神主义，并要竭尽全力地用这样的理念去影响世人，竭力除去人心中的宗教信仰情感。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根据可以显明，他们的那种狂想，不过是脱离现实的痴人说梦。

我们也知道，在这些无神主义者群体本身之中，很多人心里暗暗怀有迷信的恐惧；很多人在遭遇危险、比如海上风暴的时候，会大声呼叫，乞求神灵的帮助。如果这些所谓单纯依靠“理性”的哲学家们，自己心里尚且不能除去宗教信仰的情绪，那么，他们就更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除去世人的信仰。

========================

但是，让我们大胆地假设，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除去世人心中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会面临怎样一个人类社会的局面呢？

当人离开了宗教信仰以后会变得如何呢？他们还会害怕那无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吗？他们还会为罪而忏悔、悔改吗？骗子、假先知们、所谓的“伟人”们，会起来欺骗世人吗？那些宣扬无神主义、大力想要除去世上宗教信仰的人们，显然对于世人的人性中最深刻的品质没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世人的心中失去敬畏的时候，当人们失去了对上天的信仰的时候，就会进入一个多么丑恶、暴戾、猥琐、放荡的境地。

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以为除去了敬虔的宗教信仰，人类就会进入一个“光明”的时代；但是，他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那么，他们将会面临更多的“革命”、动荡、混乱。当世人失去了纯洁、温和、慈善的基督教信仰以后，就会立刻被各种迷信、愚昧、欺谎、荒谬的理念所包围；各种“怪力乱神”就会立刻横行起来。

请看一下异教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在许多人口密集的国家和地区，常常充斥着许多普遍的迷信观念，充斥着许多占卜、算命、荒唐、甚至很多罪恶可鄙、残酷野蛮的习俗与礼仪。请看一看，多少非洲和美洲的那些原住民，生活在野蛮迷信的习俗捆绑之下。在欧洲，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的正面影响，那么，也同样会充斥着各样偶像与野蛮残酷的迷信。在欧洲人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就都是常常沉浸在败坏的道德、罪恶的偶像之中。难道，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重新回到那败坏的偶像与迷信之中吗？

我们必须要向世界大声地宣告这件事实：——那把我们从罪恶偶像迷信中拯救出来的，正是圣经。

哲学并不能够把人从可怖的偶像迷信中挽救出来。古典哲学的经院思想，从未曾把人从偶像的敬拜与迷信的风俗中唤醒。若基督教信仰真的被从世界上除去，那么，哲学也不可能会有力量阻止人们回到那些野蛮丑陋的迷信中去。

____

现在，让我们暂且不去讨论那些偶像迷信的危害，而聚焦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论点：——若这个世界上真的除去了敬虔的宗教信仰，那么，那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所将面临的最巨大的灾难。

以前，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人们曾经讨论，在迷信主义与无神主义两者之间，哪一个对人类的害处更大。

PLUTARCH、培根、BAYLE、WARBURTON等人曾经仔细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分别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管以前人们是怎么认为的，我想，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众所周知了。就在前不久，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集体放弃了他们祖辈的敬虔基督教信仰；整个国家堕入无神主义的混乱深渊之中。我们也看见，在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当失去了敬虔的宗教信仰的时候，社会会变得多么狂野、暴戾、失序。

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敬虔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的高深学识、精妙哲学、社交礼仪等等，并不能挽救他们；整个社会必然会沉沦到血腥犯罪的漩涡中去。我们在欧洲大陆各国的无神主义思潮泛滥的过程中看到，罪恶的罪犯与罪行，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处处充满了放荡、恶意、残忍、狡猾、

无信。无神主义的社会，就像是一个即将内陷的系统一样，在自己的罪恶中，沉沦塌陷下去。

在无神主义的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没有紧密的联接纽带；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彼此信任的坚实基础。相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彼此猜疑、互相憎恨；人人都是从自私的角度出发；人人都是被个人属世的利益所驱使而去做任何事情。在人与人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深刻联结，也没有真正的感恩和友谊。

对一个无神主义者来说，对于一个没有敬虔宗教信仰的人来说，他做事情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出于惧怕、恐惧的动机。一个无神主义者在自己的内心知道，他并没有什么美德、荣誉、人性的真正根基；在他的内心深处，美德、荣誉、人性等等，都可以被贿赂、被出卖、被购买、被交换，都可以让位给现实的属世利益。因而，很自然地，他也会认为他周围的人，或是他在社会中所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也是如此；所以，他随时做好准备，与人争竞，采取一切手段保护、争夺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坑害他人、除去自己面前的障碍。所以，在一个无神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里面，一定会充满了各种血腥的悲剧，充满了凶杀、复仇、谋害、狡诈、狐疑的品格等等。

在法国，当社会中的无神主义思潮占据上风、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人们凶残地杀害那些无辜的基督徒们，然后又彼此互相残杀；整个社会的伦常秩序都处于即将崩塌的边缘。甚至，婚姻、家庭等等都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况之中。这就是无神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铁的历史事实早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无神论的思想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多么巨大而深刻的灾难。

这就是无神主义与迷信愚昧之间的巨大区别。如果说，人们的愚昧迷信导致许多罪恶，那么，无神主义则更为一切洪水般的罪恶都敞开了大门。如果说，人们的愚昧迷信会阻止他们在某些罪恶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无神主义更加使得世人在一切罪恶面前都毫无顾忌、恣意行恶。这世上绝大多数的宗教信仰，都会包含某种教义，警告人犯罪将要承受超自然的惩罚或恶果；但是，无神主义完全彻底地除去了这些顾忌，使人的内心大胆妄为，不再有任何阻拦和羁绊。从根本而终极的意义而言，无神主义彻底地除去了美德的根基，使人变为牲畜一般趋利避害，沉浸在没有界限的罪恶之中。

____

不过，我们不必设想，全法国的人都在此时变成了无神主义者；事实绝非如此。有许多法国百姓，都对当前的法国社会现状非常心痛、厌恶。然

而，那些无神主义的法国哲学家们，虽然在法国人口中只占很少数，但却给许多人带来了很深的负面影响，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从法国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一个国家的人都成为了无神主义者，都不再受良知与信仰的约束，那么，这样的国家会进入多么可怕的境况。那将会是人类所将要面临的最大的灾难；那将是人间的地狱；人类还有什么，是比这样的社会境况更加绝望、更加充满恶意呢！

。。

第三章

在这世上的一切宗教信仰中，基督教信仰是无可替代的；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把人带入对于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真正的敬虔信仰中

从上章我们看见，就一般性而言，宗教信仰对于人类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对我们更加有着重大、必不可少的作用与意义。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让我们好好仔细地思想。我们可以放眼世界，看一看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宗教信仰可以与基督教信仰相比，甚至取代基督教信仰。

如果有人想要用其它宗教信仰来代替基督教信仰，那么看起来，似乎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进入到异教主义的偶像迷信或传统风俗文化之中（比如古代罗马或古代希腊的众神传统）。第二种是，用伊斯兰教来代替基督教信仰，用可兰经来代替圣经。第三种是，用自然神主义、或一般的敬神畏天的传统，来代替基督教信仰。

就第一种可能性而言，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很少有人真的想要进入到那种愚昧荒唐、注重属世利益的异教主义与偶像迷信中。然而，有些非常知名的知识分子，却荒谬地想要推崇这种异教主义偶像众神的迷信传统。比如，据我所知，GIBBON先生虽然没有明确地推崇那些异教偶像迷信主义，但是，从他所著的罗马帝国兴衰史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处处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古代罗马帝国偶像众神传统的留恋和向往。不过，我很难说，GIBBON是否会真的想要推崇、重建那些罗马的神庙与偶像，推行那些古代荒谬的宗教迷信礼仪。

TAYLOR先生是著名的翻译柏拉图著作的译者。他对古代希腊哲学非常偏爱，以至于，他非常希望能够复兴古代希腊的偶像众神迷信传统。在他眼中，柏拉图主义要比基督教信仰好得多。然而，TAYLOR先生自己清楚地知道，古代希腊哲学与宗教不可能对今天的普罗大众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正如它们不能对古代的希腊帝国中的普罗大众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一样。因此，仅就这一点而言，古代希腊哲学与宗教根本无法与基督教信仰相比；圣经中的福音与救恩，是针对每一个普通世人的；即使最贫穷、没有什么文化背景的人，也同样能够得到基督的甜美福音。

我毫不怀疑的是，尽管许多知识分子表面看起来想要反对基督教信仰，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许多思想都是得益于圣经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他们没有生活在基督教信仰所影响的文明与文化环

境中，那么，他们很多思想、想法、认识，就根本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

在法国革命期间，当无神主义的试验彻底失败以后，DAUBERMENIL想要自己发明一个新的宗教信仰；不过，他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古代波斯人的宗教。他的计划是，用一团不熄灭的火焰来代替神祇，让人们对它敬拜、献香，献上供物、水果、油、盐等等。他说，人们应当每天到庙里来敬拜它，每到第九天的时候要守安息日；还规定了一些节期，所有人都要来载歌载舞地欢庆，等等。在巴黎等地，真的有一小撮人跟从他的号召来敬拜这个火焰神灵；但是，他们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非常有限；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很快就渐渐被人遗忘了。

人们常常把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相比较。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来，可兰经比圣经好在什么地方。只有那些刻意想要挣脱基督教信仰的少数人，才会到处想要寻找替代品，最后落入到那个阿拉伯骗子的网罗之中。关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的深入对比，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讲述。

最后，我们面前的选择，就只剩下了自然神主义，或一般性的敬神畏天的理念。在英国，那些推崇自然信仰的人，把自然神主义鼓吹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念体系；他们觉得，自然神主义既简单、又容易理解，所以非常适合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的人们。然而，奇怪的是，关于"自然信仰"，

或自然神主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信仰体系，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两个人能够彼此同意对方的意见。至今，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仍然在彼此争论不休，无法在许多重要的信仰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核心问题上，他们也存在着许多异见；比如：在对与错之间，是否存在着绝对的分别标准；上帝是否顾念、管理着人间的事务；人的灵魂是否是不朽的；祷告是否是应当的、是否是有用的；我们是否需要外在的、敬拜上帝的礼仪；等等。

显然，自然信仰、或自然神主义充满了内在的缺陷。考虑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的生命中充满了罪性和罪行，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然神主义、自然信仰尤其不适合社会大众。在自然信仰或自然神主义中，我们看不到世人生命与心灵中的罪，看不到赎罪祭，看不到对罪的悔改，看不到上帝对于悔改罪人之罪的饶恕。的确，如果我们诚实地、公正无偏地考虑到，罪恶都应当受到惩罚与审判，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在一般性的敬神畏天理念体系中，罪人是没有盼望的，并且必将受到公义而永恒的审判惩罚。世人若想要按着自己的行为与优点来到公义圣洁之上帝的面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义人，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活在罪的影响与权势之下，没有一个人未曾亏负过良知，没有一个人是纯洁无瑕疵的。

自然神主义，或自然信仰，并不能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得到罪的救赎、饶恕。它们更不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得到更新、悔改、纯洁的生命；怎样除去罪的污染，怎样生活在圣洁的生命之中。自然神主义、自然

信仰，把世人置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心思意念中，然而，人靠着自己，根本不能够抵御罪的试探和引诱。在那些至关重要的生命问题上（比如，上帝的品格是什么；我们的灵魂是否不朽；我们生命的价值和归宿是什么；等等），自然神主义、自然信仰并不能够给我们任何可靠的答案。它们既不能把我们生命的道路与职分向我们清晰地指明出来，也不能告诉世人，一个违逆良善、随从罪恶的人，是否真的会受到永远而终极的审判惩罚。

自然神主义、自然信仰，并不能给一个谦卑悔改的罪人带来真正的信心与盼望。

我们再次强调，如果自然神主义真的是一个有价值的宗教信仰体系，那么，为什么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却从未曾表现出热忱、谦卑、敬虔的信仰呢？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成为真诚地敬拜上天的人们呢？事实是，那些所谓的自然神主义者们，以及那些推崇一般性敬神畏天的自然信仰的人们，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敬虔、真诚、热忱的表现。那些所谓的自然信仰、自然神主义体系，都仅仅是他们头脑中的一些"理念"；在他们的心灵中，并没有真正的敬畏、敬虔。

事实上，很多那些推崇自然神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就是故意不想要敬虔的信仰态度。在自然神主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比，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信

仰与另一种宗教信仰体系的对比，不如说，实际上是，敬虔的信仰与毫无敬虔的信仰态度之间的对比。敬虔而热忱的宗教信仰情感，恰恰是许多自然神主义者们所想要反对的。一个人如果真的有敬虔、圣洁的信仰态度，那么，他一定不会舍弃基督教信仰而去选择自然神主义。

圣经中所带给人的宗教信仰情感，是圣洁、恩慈、仁爱、热忱、火热的，是来自于天上、来自于上帝的真正启示。相比之下，在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的书作中所反映出来的情感，却根本没有这些特点。他们有许多亵玩、调侃的口气，但却毫无认真、严谨的态度。如果我们刚看完圣经，再来阅读他们的书籍，就会立刻感觉到两者之间鲜明的差异；就好象我们刚从温暖宜人的五月，进入冰冷严寒的冬季。

若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真的想要认真严肃地反思他们所谓的信仰，若他们真的想要有圣洁、热忱、敬虔的信仰和情感，那么，他们一定会真诚地发现，圣经就是他们最好的信仰书籍。

有一位非洲王子来到英格兰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当人们问他如何看待圣经的时候，他回答说，他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和启示，因为所有良善人都喜爱圣经，所有罪恶人都反对圣经！

自然神主义之所以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之所以无法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正是由于，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自己都没有热忱而敬虔的精神。这种思潮在一些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泛起一些涟漪，但是，从未曾大规模地对普罗大众的生命与心灵产生任何真正的深刻影响。

____

在英国的第一批自然神主义者中间，有一个人名叫DAVID WILLIAMS；他原居住在利物浦，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他受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们的追捧，于是，他建起了一个房屋，把那里当作是他们聚会、敬拜、赞美造物主的场所。他在那里主持、讲道了一段时间，吸引了一些追随者。但是后来他抱怨说，他的许多追随者最后都变成了无神主义者。这样过了四年以后，他们的聚会就不了了之了。最后，他们既没有了经费、也没有了参加者；这位自然神主义的祭司（DAVID WILLIAMS这样自称）在贫病之中，黯然放弃了他的“宗教”计划。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自然神主义的零零星星的活动；不过，这些活动的规模

很小，不值一提。

FREDERICK二世，是一位笃信自然神主义的普鲁士国王。他曾经在柏林试图建立起自然神主义的宗教信仰，以此来代替基督教信仰；但是，他的梦想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所以从来未曾付诸实施。

最值得观察的自然神主义活动实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所谓“博爱主义”的宗教信仰实验。在法国革命的混乱时代，经过了一段无神主义的失败实验以后，社会公众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社会的作用和意义非常重大。于是，一些法国人集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基于自然神主义原则的宗教信仰团体；他们把这个宗教信仰称为博爱主义；在他们的成员中，有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很多学识渊博的人，也有很多身居政府高位的人士。

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政府高阶人士，名叫LA REVELLIERE LEPAUX；他对这个新的宗教信仰非常积极热情。在他的影响下，法兰西政府允许这些“博爱主义者”使用法国境内的一些教堂建筑，来作为他们聚会和敬拜的场所。仅在巴黎市内，就有十八到二十个教堂建筑，被这些博爱主义宗教信仰者所使用；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

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信条非常简单，主要就包括两个核心条款；第一，上帝是存在的；第二，人灵魂是不朽的。他们的道德系统包括了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爱上帝；第二，爱世人。他们的团体名称就是因此而命名。他们的聚会敬拜仪式包括，祷告、赞美诗歌、等等仪式。这些仪式被写在一份手册中；这个手册被用来作为指导，让大家都遵循其中的礼仪形式来进行聚会和敬拜。在聚会期间，他们会进行一些讲座；并且，经过团体内部同意以后，这些讲座的内容向全社会发布。在上述仪式基础上，他们还添加了一些其它形式，比如在讲坛上奉献花篮、水果篮等等。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使用一些乐器，比如教堂里面原有的风琴等等。

他们大力地推广上述信仰内容；在法国的所有主要城市内，他们都建立起了相应的分支；这种影响甚至还波及到了法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地区。他们的信仰手册被法国内政部长免费发放到全国各个地区。

自然神主义，从未曾有像法国革命的这段时期内一样，在短期内看似受到这么多人的接纳和推崇。他们普遍地蔑视、离弃基督教信仰；他们也认识到，无神主义是不可接受的；法国政府也大力地支持和鼓动自然神主义在民间的发展；社会上那些有学识、有影响力的人士也都推崇自然神主义信仰；这些自然神主义者可以随意使用基督教堂原有的建筑物，用来当作他们聚会和敬拜的场所。在他们当时的自然神主义理论论述中，也看似充满了许多智慧。

但是，尽管当时的自然神主义运动有这么多有利的条件，然而，它却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很快凋零、消失了。

起先，当自然神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法国公众们因着好奇心、新鲜感，而来参加这些博爱主义者们的聚会敬拜；这些人中，很多都仅仅是一些来看热闹的人们。不久以后，他们的兴趣就如同退潮的水一样消失了。很快，巴黎的博爱主义聚会场所，就从二十间教堂建筑减少为四个教堂；在法国的很多其他地区，人们也都不再前来参加聚会。

就这样，博爱主义、自然神主义运动很快就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到最后，法国政府禁止他们再继续使用教堂建筑；而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也就很快地、毫无反抗地、无声无息地停止了他们的聚会。到今天，众所周知，自然神主义在法国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组织化的活动了。

通过仔细地研究上述社会现象，我们会得到许多领悟。当时，自然神主义在法国是处于最好的优势时期。无疑，后来的自然神主义之所以败落下去，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热忱而

敬虔的信仰的精神。这个特点，其实，从博爱主义者们一开始的聚会活动中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参加者的心中，并没有真正的、全身心的投入，也根本没有生死不渝的情感。他们的讲道者或许是一些很知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讲道、讲座，或许包含了一些很精深的、看似高超的道德伦理教导；但是，他们既不是真正具有敬虔信仰的人，也不是真的具有纯洁道德的人。

他们的诗歌曲调或许很优美；他们的音乐或许很动听；但是，那些音乐作品不过是来自雇佣的职业音乐人的创作。

这些信众的捐款金额，也非常有限。这些博爱主义者们发现，会众的捐献金额，与基督教会的捐款金额相比非常可怜。在基督教会中，即使那些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的捐资也会远远地超出这些社会精英人士所组成的自然神主义团体的捐款经费。有的地方的博爱主义者聚会，甚至连二十块钱的经费都没有。很多音乐人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常常拖欠薪资。他们的讲台也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讲员来讲道。

博爱主义团体面临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当这些团体在各地形成分支以后，他们逐渐地彼此分开、各执己见，不愿意再接受原来的敬拜礼仪的小册子的统一指导，而是要各自发展出新的教义、礼节、形式等等。这个困难问

题，其实一点也不难预料；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信仰与教义上的正典，所以，在各种疑难问题上，大家就各抒己见、众说纷纭，而没有权威的信息参照。

一方面，在他们内部，很难形成统一和谐的组织化结构；另一方面，在他们外部，社会上有不少人则向政府抱怨，说他们过多地干预民事事务。

还有的人，说他们内部欺上瞒下，没有自由。而社会上那些不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则被他们排斥在外。这些指责的话语，似乎令那些自然神主义者们很气恼，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次盛大的自然神主义周年庆典；为了证明他们的自由与包容，他们准备了许多旗帜，展示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他们的第一面旗帜上写着"信仰"；第二面旗帜上写着"道德"；接下来的旗帜上则分别写着"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等等。游行快要结束的时候，旗手们互相亲吻、以示友好。而那个举着"道德"旗帜的旗手，是巴黎的一位著名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庆典礼仪上，他们尊荣四位人物，分别是：苏格拉底、VINCINT DE PAULE、罗素、华盛顿。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组合！

———————————————

在上文中，我详细地记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自然神主义运动的许多细节；因为这些事情非常令我们深思，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有教育意义；也强烈地证明了我在本章中的论点。自从法国的自然神主义运动凋零、失败以后，在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组织化的、以自然神主义为基础的宗教信仰敬拜活动了。

然而，在今天的学术界、在知识分子人群中，仍然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趋势，就是，很多知识学人仍然像当年的那些法国自然神主义者们一样，不但没有认识到人生命本质中的罪性与罪行，而且，恰恰相反，总是会误以为，人性能够潜在地、凭借自身的力量进入完美状态。他们以为，人性本善；人性不需要外在的力量或形式，而只要通过世人自己增长足够的知识，只要通过恰当良好的政府、管理、治理，世人就能够解决人间的一切问题。

因而，在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中，热忱、敬虔的宗教信仰，并不占有什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信仰，对于他们而言，就仅仅是与人为善、感恩、等。简言之，他们的所谓信仰，其实仅仅是头脑中的一种知识，而不是心灵里、发自内心深处的委身、挚情、衷心。因此，他们的理念，并不能给人生带来深刻的改变，也不可能会对社会有深刻的影响；这些理论，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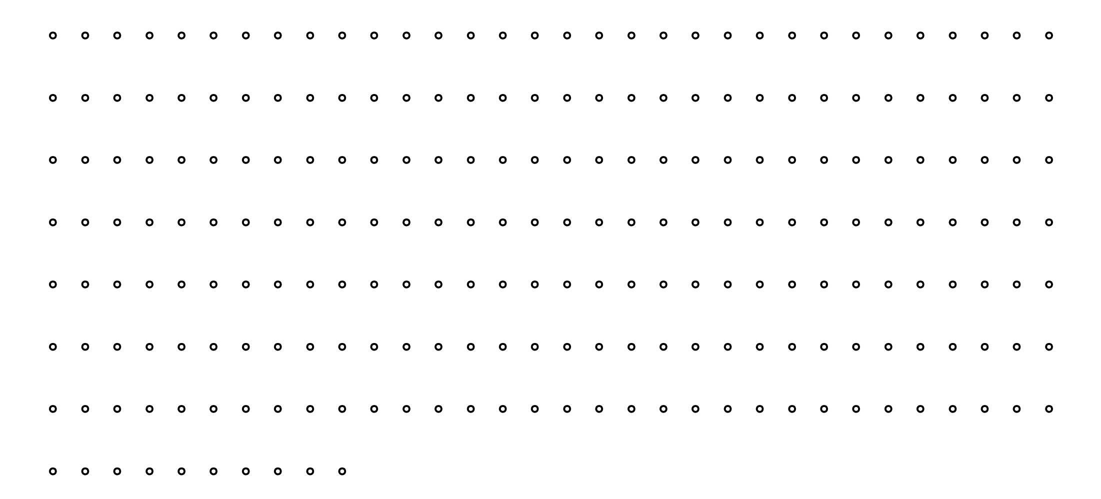
一些看似漂亮的形式主义、纸上谈兵。他们既不能给人生带来安慰，也不能带来榜样。

1802年，当法国正式宣布恢复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一位法国政府官员的发言非常深刻，很有代表意义。这位官员说到："科学只能增加一少部分人头脑中的知识，然而宗教信仰却能够触及到千万人的心灵；自然神主义仅仅是一些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概念，并不适合于普罗大众；只有上帝自己所亲自向我们启示的信仰真理，才能够深深地触动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心灵与灵魂深处。圣经把神圣真理的知识，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中的眼目里；圣经把上帝的权威、圣洁、良善的话语，告诉我们；若没有圣经，我们就不可能在内心明白上帝对我们的良善旨意与心意。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我们国家中基督教信仰的教育被荒废了，所以，在过去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孩童没有了关于上帝、神性的观念，也没有了关于正义、罪恶的观念；因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滋生出许多野蛮的行为与风气，人们也变得愈发暴戾荒淫。这些事情，会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何等深刻的影响。何其可叹！在过去十年中，我们背离了我们祖辈的基督教信仰；我们得到了什么呢？这基督教信仰曾经激励了帕斯卡、TURENNE、FENELON等伟大思想家的写作；而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用许多虚浮空乏的言辞教义，试图取代基督教信仰；我们得到了什么收益呢？！"

。。。。。。。。。。。。。。。。。。。。。。。。。。。。。。。

。。。。。。。。。。。。。。。。。。。。。。。。。。。。。。。

。。。。。。。。。。。。。。。。。。。。。。。。。。。。。。。



真实信仰

——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考查

原著：WILIIAM TURTON

原著出版日期：1910年

。。。。。。。。。。。。。。。。。。。。。。。。。。。。。。。。
。。。。。。。。。。。。。。。。。。。。。。。。。。。。。。。。
。。。。。。。。。。。。。。。。。。。。。。。。。。。。。。。。
。。。。。。。。。。。。。。。。。。。。。。。。。。。。。。。。
。。。。。。。

第一章

宇宙有一位造物主

（A）宇宙的起源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宇宙，是指由一切物质所构成的宇宙，其中包含所有存在的东西（地球、太阳、星体、等等）。我们所说宇宙的起源是指，在某个时间存在一个自由的力量，导致了宇宙的形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由的力量是指，那个力量并非是在同样的境况下就有同样的行为，而是，能够

按着他自己的意愿，在同样的境况下，决定做或是不做一件行为。当然，这样的力量可以完全不同于我们所已知的宇宙中任何既有的力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自由的力量我们并不难理解，因为人自己就似乎拥有这样的自由意志。我们并不是说人真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至少这种看起来能够在各样境况下按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决定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情的能力，正是人自己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因此，一般性而言，大家都能够明白这种自由力量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说到宇宙起源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在某一个时候，宇宙被这样一个自由的力量所导致、产生。换句话说，从终极层面而言，宇宙本身并不是单单在其自然的这种固定、不变的力量作用下而存在的。即，宇宙必需要有一个来自其自身之外的力量，才能导致它的存在。

现在，对于上述这个论点，我们来考虑两种论述方式。一个被称为哲学意义上的论述。另一个被称为科学意义上的论述。

（1）哲学意义上的论述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注意到，如果宇宙没有一个起源，即，若宇宙不是由一个自由力量所导致的话，那么，我们当前所面对的任何事情，都不过是死的、一直存在的循环而已。这是因为，若没有自由力量的话，那么，任何物质与事件都必须是始终一直存在的、循环发生的，而不能从无到有发生。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致对于自由力量的必需性。不仅如此，自然世界的任何力量与物质的性质也必须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在任何时间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致对于自由力量的需要。换句话说，对于当下而言，不可能有任何本质性上新鲜的事件发生。因为那些导致每一个新事件的背后的力量，是没有自由的；那么，既然那些力量能够在现在的境况下导致新事件的发生，就一定会在无限远的过去中，在同样的状态下也曾经导致同样的事件发生。所以，当前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新的，而是过去曾经发生过，从而就成了一个死的循环。

无疑，上述结论是荒谬的，因为我们只要看看人类历史就可知道，其中有很多因自由而导致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说，宇宙不是一直以来在固定不变的自然力量下而自发、没有外在导引因素的。换句话说，宇宙一定有一个起源。而这个起源的原因，一定是来自宇宙之外、之上的因素。而那个因素一定是自由的。

（2）科学意义上的论述

如果，宇宙与世界是处于演化的进程中，那么，该进程就不可能是出自无限远的过去，否则，今天的世界就绝非是今天的光景，而任何进程都应该早已完成。任何进程，都必须有一个开始，故此，宇宙也必须在过去历史中的某一个时间点上，一定有一个开始的时间。而那个开始的时间点本身，其自身并不可能具有什么特殊性质，使得宇宙必须非得在那个时间开始不可。换句话说，一定是由于在那个宇宙开始的时间点，有一个自由的力量，使得宇宙得以开始。而那个自由的力量本身，必须是“自有永有的”，而不能被任何其它因素导致。即，那位造物主本身必须是无限的、终极的，否则，他必需被另外一个自由的、终极的因素所导致、创造。即，后者才是那位真正的、“自有永有”的、无限的造物主。

根据能量的分布与传播定律，这个宇宙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所有的物质会趋于同一个温度，所有能量会趋于均匀分布。当宇宙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它死亡的时间，因为其中不能再有任何变化。这个热力学定律，是被人们所广泛熟知的。比如，太阳中的能量，终会被全部散发出来，分布到广袤的宇宙当中。这样，我们可以设想，最终世界会变成没有任何能量不是均匀分布的死寂沉沉的状况。问题是，如果宇宙没有一个开始时间点，而是自从无穷远的过去就一直存在着，那么，上述死亡状态应该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生了。而反过来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生活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里，是因为，宇宙自身并非来自无穷远的过去，而是从历史中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的。

若宇宙必须有一个开始的时间点，那么，任何开始存在的事物，包括宇宙本身，都必然有一个导致其开始存在的因素。因此，宇宙一定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那个创造宇宙的力量，一定是一位有着自由意志、有着位格的（即，能够有意识和意志，并能够使用自己自由意志的）造物主。因为，那个宇宙开始存在的时间点，本身并不具有“必需性”。即，那个时间点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性，使得宇宙非得在那个时间被创造出来不可。换句话说，宇宙之所以在那个原始时间点被创造出来、开始存在，是出于造物主的自由意志决定的结果。这就像是，上帝在永恒之中坐在他全能的宝座上，并在某一个时间，凭着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从座位上站起来做事一样。

宇宙中任何事物，包括宇宙本身，都必需要有一个导致其存在的因素。那个因素，被称为第一因，因为与这世界上任何其他因素在本质上绝不相同。那个第一因，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因素导致，否则就不是第一因。那个第一因，本身必然是终极的、无限的，而且必须是自由的。自然界中物质性的任何因素，任何定律，任何性质都不是自由的，而是衍生性的。即，它们对这个世界的作用，都可以被看作一种数学函数，当输入变量满足的时候，输出函数的值就是可预测的、可预知的、可研究的。并且，自然界中的任何因素、任何定律、任何性质都不是终极的、本质性的，而都是之前其它因素、定律、性质、或过程所导致的结果。而那个第一因，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而是由其自身所推动的。换句话说，那个第一因是“自由”的。当我们找到了那个第一因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寻找什么其他的原始因素，也根本不存在什么任何其他的原始因素。因为他就是那位终极的、无限的、全能的、自有永有的造物主。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宇宙必需有一个开始。在宇宙开始的背后，必然有一个导致其开始存在的第一因。那必然是一个自由的力量。

（B）宇宙的造物主

接下来，我们思考关于这个第一因的一些问题。首先，那个第一因必然是独一的，因为，现代科学完全揭示了这个宇宙中所有性质的普遍性、遍及性。比如，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元素是普遍存在于各处的。地球上的物质元素，也存在于太阳、行星、以及其他遥远的星体上。另外，像万有引力这样的物质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是在这个地球上，还是遥远的外太空中。我们当然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其它类似的例子。总之，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中的规律、性质、物质是普遍性的。换句话说，宇宙是一个合一的整体。而这毋庸置疑地指向了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第一因”。

我们也可以指出，那个第一因一定是超自然的。这意味着，他与世间万物都不同，因为他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万有引力、分子吸引力、或是化学反应力，是像他一样的。所有那些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都是像呆板的数学公

式一样，只要同样的条件满足，那些力的作用就会相应地、呆板地产生。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第一因，却是与任何自然力、自然规律完全不同的。那个第一因，也不受万有引力、分子吸引力或是化学反应力的束缚。那个第一因，是完全自由的力量。他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他自己所愿意的时间点，创造了这个宇宙。他是无限的、终极的、永恒的。甚至时间与空间本身，都是他所创作出来的。我们强调，他是超自然的，因为显然，他与自然界中任何物质力量、现象、规律都不同。因为后者是不自由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宇宙是被这样一位超自然的、独一的、自由的第一因所创造。他就是那位无限的、终极的、全能的造物主。

。。。

第二章

那位造物主以智慧设计了这个宇宙

前章我们讲述了，宇宙之上有一位造物主。在本章我们思考，这个宇宙是否是由那位造物主所设计出来的。所谓“设计”是指，在这个宇宙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位造物主心中，是否就存在着一个他所预先知道的蓝图。这个宇宙的被创造过程，以及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进程，是否是出于那位造物主的自由意志，以及他以自己智慧所设计的蓝图。

（A）设计的证据

在自然世界中，我们能够看见无数的证据，显明了这个宇宙是出于智慧的设计。尤其在生物世界中，这一点就更为明显。有数不胜数的生物界里面的证据，显明了它们背后的智慧设计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所显出的证据，并不是要证明造物主本身的存在性，因为前章已经清晰地说明了造物主本身的存在。但在本章，我们强调的重点是，宇宙不仅是被这位造物主创造出来的，而且是出于他的智慧设计，是出于他的预先智慧设计的蓝图。

在自然界中，我们无处不在地都能够看见这种智慧设计的证据。无论是在低级的组织形式中，还是在高级的生物体内，我们处处能够看见设计的痕迹。的确，证据是海量的，以致于我们很难对其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描述。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从PALEY所说的关于“钟表匠”的论述开始。我们首先从钟表的上面，看出设计的踪迹。然后，从一个简单的生物器官，比如人的眼睛，也能够看出这种同样的设计踪迹。最后，我们可以把这些自然的证据归纳总结，放在一起观察并得出结论。

（1）钟表的例子

现在，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个机械钟表。我们能够从中看出智慧设计的踪迹，因为它的所有部件与零件，都是被精密地、分毫不差地组装在一起，为要彼此协同合作、完成一个目的。它们被安装在一起，彼此之间缺一不可，使得微小的齿轮能够得到动力，并把动力以均匀而匀速的方式，传递给秒针、分针和时针。而这些指针的运动，则是为了要实现一个预先在图纸上设计好的、特定的功能，即，指示时间。如果那些零部件的位置不对，或是形状不对，甚至哪怕有一丝的偏差，都会立刻使得齿轮无法传动，指针不能移动，从而使得这个钟表无法完成其所应当有的功能目的。

从这样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立刻得出两个论点。首先，这个钟表一定有一位设计者。这个钟表一定是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中，由某位智慧的设计者所设计出来的。第二点是，那位智慧的设计者所进行的设计，不是盲目的过程。而是，他完全知道和理解所要进行设计之对象的结构、内容、功能和目的。正是为此目的，那位智慧设计者才设计出了这样一只机械钟表。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关于上述论点的确定态度，并不需要取决于我们是否真地见过那位设计者本人，也不需要我们亲身经历他设计钟表的过程。我们可能完全不明白那位钟表匠的设计技巧，也根本不懂他设计钟表的概念、技术和过程。但我们只要看一眼那个钟表本身上的设计踪迹，就不会怀疑那位钟表匠的存在，也不会怀疑他所设计之钟表的功能与目的。

我们只要通过对这个钟表的仔细观察，就能够看见，虽然其中的所有零部件都遵循着自然定律，但是，它们被放在一起的方式，彼此衔接得紧密无缝的形式，互相协同的精密性和奇妙性，都说明了，它们的创造与设计过程，不可能是自然本身的茫无目的的结果，而是，其背后必然有着超于自然的意图和智慧。

以上就是关于钟表匠的论述。无论我们在哪里看见了设计的踪迹，我们就知道，在那背后一定有一位设计者。

（2）眼睛的例子

现在我们来思考人的眼睛。这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见智慧设计的踪迹。与眼睛一样，在生物界有着许许多多的器官和机体组织，都具有大量的、丰富的证据，显明了其背后智慧设计的踪迹。如果需要在眼睛里成像，那么，眼睛看见的图像就需要投射在其后部，即视网膜，或光学敏感神经的分布网络。这些神经分布网络负责把采集到的图像信息传递给大脑。眼睛本身，就像是一个光学成像的精密设备。从很多意义上来说，眼睛基本上与望远镜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其中的智慧设计踪迹是大量的、压倒性的。

首先，眼睛与望远镜一样，光线都要先透过其中的“镜片”折射，形成清晰分光的图像。这个功能，在望远镜里面是由其透镜的曲面形状、位置以及透光性来决定和完成的。而在眼睛里面，则也是由极其惊人相似的结构与过程来完成。另外，在眼睛中不同透光性的机体组织可以自动纠正成像过程中的不同颜色所产生的图像弯曲性。在望远镜的设计历史上，这个问题曾一直是一个困难。后来，直到光学专家们用不同材质的玻璃来效仿眼睛

内部机体组织的工作原理，这个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

另外，眼睛的结构使得人可以看见不同距离的对象物体，从几寸的距离，到几公里之外的距离，都可以看见。对于望远镜来说，如果要观察这样大距离范围内的不同物体，就必须要不断变换透镜的镜片，或是不断转换聚焦的方式。但是，这个紧密无缝的自动转换效果在眼睛内部是怎样达成的，还有待进一步详细研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眼睛里面的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人眼睛里面可以看清楚许多不同的对象：从半英寸距离的物体、或是书本上的文字，到好几个英里、很远距离之外的物体。并且，那些物体的大小、形状、颜色、位置都没有失真。

不但如此，眼睛还能够适应光线的不同强度。这个功能是由虹膜和瞳孔来完成的。虹膜的形状是一个环形，并能够收缩与扩张，以改变位于其中央的瞳孔的大小，并且，总是使之保持标准圆形。更奇妙的是，虹膜总是能够自动伸缩。如果光线的强度太大的时候，虹膜就收缩，使瞳孔缩小。反之，虹膜就扩张，使瞳孔放大。无疑，这与照相机的成像原理是一模一样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瞥见其设计者的何等奇妙的原创性智慧。

并且，眼睛能够看见任何方向的物体。眼睛的结构，使眼珠可以飞速地、毫不费力地右转、左转、或是向上和向下转动。为了保持眼球的湿润和干

净，眼睛内还持续地供应一种特殊的液体。而多余的液体则会经过骨头里的一个小孔流进鼻子，并在那里蒸发。另外，人的眼睛结构有双份，这样，当一个眼睛受损了，人仍然可以用另外一个眼睛看见。最后，我们要指出一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这就是，眼睛的结构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人在胚胎状态的时候，其实并不需要用眼睛，但在那时眼睛就已经被造好了。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能说明，眼睛的形成是出于智慧设计的结果。

关于人的眼睛，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细节要点。不过，就上述信息而言，我们已可以足够得出适当的结论。是的，眼睛的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精妙而极具创意的光学设备。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它一定是出于某个智慧设计者的设计。而无论那位设计者是谁，他一定预先知道眼睛所需要达到的用途和内部结构的蓝图。

请注意，上述结论与我们在钟表例子中的论述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对于眼睛内部的所有细节知识，也不取决于我们是否直接知道那位智慧设计者的所有技巧、能力或是全部智慧。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眼睛是被怎样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也不完全理解其中所有零部件的功能特性。但是，我们通过观察眼睛中各个零部件彼此协作、复杂而奇妙的工作机制，就可以知道，它们一定是出于智慧设计的结果。并且，这个设计不是茫无目的的，而是为了完成一个非常具体而专注的目的。这就是，要把自然界的光学图像巧妙地投射在视网膜上，使之成为一个清晰的感知图像，并传递到人的大脑之中。事实证明，那位智慧设计者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类设计望

远镜的智慧。

我们看见，眼睛中的各个零部件，虽然都分别遵循自然规律、是死的自然物体粒子，但是，当它们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具有了奇妙的运动和功能。这些零部件如果是分别独立、彼此无关的，那么，它们就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但是，当它们被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彼此协同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清晰的、整体的目的。眼睛中所有的复杂零件和过程、机制，都是为了这个大的整体目的而服务的。这种协同机制与目的的存在性，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在人的视觉能力与这些复杂零件的组织运动形式之间，一定有着一个智慧设计的关联性。换句话说，其功能性结果一定是被设计出来的。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婴儿是由父母出生的，但是，人的眼睛却不是被其父母的智慧设计出来的。同样，那眼睛也不是由其父母的父母所设计出来的。父母们从未计算过眼睛内部透光体所需要的形状和光线折射率，更没有创造发明过任何虹膜与瞳孔的成像机制。一般来说，父母们对于自己孩子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一无所知。我们从孩子的父母，到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如此一直追溯上去，都不会找到那个智慧设计者，除非找到那位宇宙的造物主本身。

（3）综合证据

相比于上面的论述而言，我们还有更加强烈的证据和更加强有力的论述。我们的综合证据，可以从三个方面展现。首先，眼睛并不仅仅存在与哪一个个别人身上。而是，世上千千万万人的身上，都长着一双奇妙智慧设计的眼睛。在那无数双眼睛中，每一只眼睛都充足地显明了智慧设计的踪迹。每一只眼睛都说明了，它们必是出于同一位大能的智慧设计者。

第二，人的眼睛，只是人身体上许许多多成百上千组织与器官中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人的耳朵还是嘴，都能够显出智慧设计的踪迹。同样，人的肺与心脏也都充足地显出了智慧设计的证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各个器官和组织，并非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它们彼此之间协同工作、互相紧密无间地配搭。如果说，成百上千的器官和组织分别表现出智慧设计的特点的话，那么，它们彼此协作、服务于身体的整体，就更加显出了智慧设计的奇妙。不但如此，人的意识本身，与人的身体一样，也是出于智慧的设计。如果说，从本质意义而言，原子的运动并不能导致人体器官组织的生成与功能的配搭，那么，它们就更不能导致人的意识的产生。是的，的确，在无意识的自然界中，居然产生了有意识、有自我认知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除非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造物主的创造，我们的思想与意识的能力，是来自于造物主的恩赐。

第三，人类的身体器官组织，只是生物界许许多多奇妙现象的很小一部分。在那些复杂、精微而庞大的生物世界里面，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奇妙智慧设计的踪迹。其中，有很多东西，甚至要远远比人类的眼睛更加令人赞叹。

当然，一般性而言，低级生物要简单一些，高级生物要相对复杂一些，看似前者中的智慧设计似乎更少，后者中的智慧设计更多。但是实际上，无论如何，我们在所有的生物种类里面，都能够无处不在地看见智慧的设计。比如，很多植物的美丽花朵，让我们看见了其中无可置疑的设计奇妙。一粒不起眼的橡树种子，居然能够长成高大的橡树。

更进一步说，整个宇宙都表现出了精妙而宏大的智慧设计。如果宇宙是一个混乱拥挤的垃圾场，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造物主并不知道他所要创造的宇宙当如何。但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如此美丽而精妙，为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如此精微的条件，这些奇迹绝非偶然。我们仰望蓝天，俯视大地，更思想那浩大而壮观的星夜，等等，这些事情都让人无可置疑地不得不承认，这个宇宙有一位无限大能、无限智慧的设计者、创造者。他的智慧、能力、全知，远远超过任何世人，远远超过任何被造之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般性结论：自然界中的各样事物与现象，尤其是像人眼这样复杂而精妙的结构，一定是出于智慧设计者的设计。并且更进一步说，自然界的统一与联合，其中万物的运行方式与相互影响的复杂而庞大关系，都说明了智慧的设计。比如，如果没有光线，眼睛就是无用的。这表明，宇宙中若有任何事物是出于智慧设计，那么，宇宙整体也是出于智慧设计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毋庸置疑，那位伟大的智慧设计者，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造物主自己。

（B）关于进化论理论的反对意见

对于我们前文的论述，首先有一个最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进化论理论。进化论者认为，自然界中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自然规律束缚下的演化过程的结果。因而，就算我们在自然中能够看见许许多多的智慧设计的证据和踪迹，但是，那些踪迹却并不一定是真的来自于造物主的智慧设计。在我们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先来看一下，所谓自然规律和自然力究竟是什么意思。

自然规律就是指，在自然界中看见的一致现象。比如，我们观察到，一般性而言，物体受热就会膨胀（除了个别种类的例外情况）。因此，我们称之为热胀冷缩自然定律。但这个自然定律，仅仅是告诉我们热会引致胀、

冷会引致缩的事实而已。换句话说，我们观察到，当热发生以后，胀的现象总是会一般性地随之发生，因此我们假设，前者是导致后者的原因。但实际上，尽管我们将这个一般性现象称为热胀冷缩定律，可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解释，物体为什么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有深刻性和普遍性的意义。自然定律只是对一些需要解释的一致性自然现象的总结，但是，自然定律本身并不能在本质上、终极意义层面上，解释该现象为什么发生。

另外我们还要指出，自然定律本身，也不能导致任何事情发生。定律本身，并不具有使事物发生的能力。比如，万有引力定律本身，并不能移动一颗行星，这正如，罗盘本身，并不能掌控一艘航船。若要自然界中的事物发生，必需要有一个原动力或是原始能力，才能导致事物的发生。我们知道，自然力总是按照一些固定的自然规律而运行。自然力本身，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它们不能在同样条件下，决定做或是不做一件事。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自然条件满足，自然力就必须要按着自然规律所确定的内容，去相应运行。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进化论理论的含义与内容，及其与我们前文结论之间的关系。

（1）进化论的涵义

进化论理论是指，生物的进化，自然选择，以及适者生存。前者是说，地球上所有生物形式，都是来源于简单形式的生物祖先。这样，可以一直追溯到生物的最原始的形式，无论那个最原始形式是什么。而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的理论是指，上述过程是怎样发生的。看起来，在生物体上会发生各种各样微小的变化；而只有那些有利于生物体生存的变化，才会一直存在下去。并且假设，那些微小的变化能够遗传给生物体后代，那么，按照这样的过程，高级生物体就能够逐渐生成了。这个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指出了，生物体可以通过缓慢而非突然的方式，不断演化。比如，猴子不能在一夜之间生出一个人来。

当然，值得注意和指出的是，进化论只是描述了一个过程，但是，并没有讲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程的原因。它只是讲述了事情如何发生变化的可能方式和过程，但并没有从终极意义的层面上解释，为什么会有上述过程，或，导致上述过程的原因是什么。任何微小变化的发生，都有其背后的导致原因。当这些微小变化发生的时候，自然选择理论可以解释，怎么会有一些变化得以延续，而另一些变化则没有延续。但是，自然选择理论并不能解释，那些微小变化本身，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恰恰相反，自然选择只是假设，那些微小变化已经存在了；否则，自然选择的过程就失去了所要进行选择的对象。所以，自然选择理论所带给我们的，不是建设性的理论，而是破坏性的杂草。在生物体中的各种各样可能变化中，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自然选择只是告诉我们，那些不好的变化消失

了，而好的变化得以保存下去。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告诉我们，那些好的变化，究竟是怎么样、为什么发生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在一百个动物中，有五十只有眼睛，五十只没有眼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那五十只有眼睛的动物会存在下去。但是，这仍没有解释，那些眼睛一开始是怎么样、为什么出现的。同样的悖论，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例子。

每一个生物体的变化，一开始是怎么出现的呢？用通俗语言说，这些变化是随机出现的。但是，严格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随机”这个词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在自然界中看见一些现象，不知道、或没有能力解释其形成机制的时候，就用这样一个方便性、简化性词汇来描述而已。事实上，关于上述问题，我们只能有两个选择。或者，那些被选择的生物体自己具有自由意志，从而自己主动地产生那些变化；或者，它们是不得不如此产生那些变化。关于前者，我们后文再谈。现在我们考虑后者。从后者的观点而言，一切生物体都如同机器。它们的行为与变化就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在从前的某个时刻被一个自由的外力（即，造物主）所推动。对于所谓进化论理论而言，这个外力至少是在一开始生命起初的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因此，在自然定律、自然力的作用下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是过去所定之事的必然性结果。

（2）进化论的结果

那么现在，这个进化论理论能够否决我们在前文所论述的、关于造物主、伟大智慧设计者的结论吗？进化论能够否决我们所说的，人的眼睛、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出于造物主的智慧设计的论断吗？我们的回答是：不能。恰恰相反，即使它是真的，也只能是更加确凿地证明了我们前述论点的正确性。简单地说，如果世界上除了造物主自己以外，不存在任何自由意志，并且在世界被造以后，造物主也不对其进行任何干预，那么，地球以及其上的任何物质，都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不论其中的零部件多么复杂庞大，也不论其中的零部件之间关系多么千丝万缕，也不论这台巨大的机器运转了多少漫长的时间，若它最终产生出了生命，那么，这生命一定是出于起初那位创造这台巨大机器的智慧设计者的设计。这就如同，假设一台复杂的机器在运行了很久以后，生产出来一只精美的手表，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只手表是出于那位创造这台机器的伟大设计师的作品。并且，这只手表的被创造、生产出来的过程，不是盲目的，而是那位伟大设计师有意而为之的。所以，即使进化论是真的，它也只能是有力地证明了：生命的出现，正是由于那位起初伟大造物主的智慧设计。

进化论所试图表明的只是，自然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但如果其结果能够被预见，那就一定是在起初的时候就被造物主所预见的。换句话说，正如，自然界的统一性、一致性表明了，其中的事物是出于一位伟大而智慧的设计者的设计；同样，进化论的理论也实际上是在表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是出于那位造物主、伟大而智慧的设计者在太初的时候就曾经设计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自然界中的生物体器官，比如眼睛等等显明了智慧设计的生物体器官和组织，不是被分别设计出来、或是在某个动态过程中被临时性地、灵机一动而设计出来的。而

是：这一切都被包括在那位伟大造物主在起初时的宏大设计之中。

这只能增加我们对那造物主、伟大智慧设计者的仰慕和赞叹。由此可见，即使是以进化论最极端的形式，也不能使我们否定造物主、智慧设计者。同时我们也知道，造物主不仅是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以智慧设计这宇宙，而且，也是在持续地、不断地掌管着宇宙。他不仅是超然于世界之上，而且也是内在于世界之中、遍及整个宇宙。

另外，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和指出的是，许多惊人的智慧设计的结果，比如人眼的出现，是无法用进化论能够解释得通的。在人眼中，包含许许多多极其复杂的零部件组织，这些数量庞大的零部件组织彼此之间密切合作，才能使人有视觉。但是，若把它们拆解分开，则不可能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这些器官和组织具有不可减少的复杂性，因而不能通过逐渐积累、逐渐复杂化的方式产生出来。

。。。。。。。。。。。。。。。。。。。。。。。。。。。。。。。。
。。。。。。。。。。。。。。。。。。。。。。。。。。。。。。。。
。。。。。。。。。。。。。。。。。。。。。。。。。。。。。。。。
。。。。。。。。。。。。。。。。。。。。。。。。。。。。。。。。
。。。。。。。

第三章

上帝的存在

（A）“上帝”一词的涵义

在前两章我们论述了，这个宇宙有一位造物主，并且，这个宇宙是出于他的智慧和设计。换句话说，他创造了宇宙，并在太初的时候就预知一切。我们说，这位造物主、伟大智慧设计者，是有位格的。他是能听、能看、有思想自由意志、自有永有的。我们称他为上帝。

当我们说到“位格”这个词、并把这个词用于人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包含了一些重要性质，比如，自我认知（即，能够思考关于自己的事），以及智慧设计的能力。许多人说到，“位格”这个词至少意味着三件事情：思想，

意愿，意志。但实际上，这三件事情也都包含在“智慧设计”的能力之中。因为，一个人若要进行智慧的设计，就必须首先进行思想，并有想要设计的意愿，而且必须有能够把这个意愿实现出来、把事情成就的意志。我们会在下一章详细讨论人是否具有上述能力。这里我们只想简单提两点。

第一，如果我们承认人是有位格的，那么，我们也就应当明白那位造物主是怎样的。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特殊、最高贵的，因为只有人才能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有智慧和设计的能力。但是，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当然也包括宇宙中最为特殊的人。所以，如果上帝仅仅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存在、仅仅是无知无觉的某种力量的话，那么，上帝就不会有能力创造出有位格的人来。那样一种宇宙中无知无觉的能量，并不能创造出人的意识和思想意志。故此，若我们认识到人是有位格的，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承认，那位造物主、上帝也必然是有位格的。

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所看到的，人的位格意味着，他有思想意识和灵魂。虽然我们不能用物质性的方法发现和观测人的思想意识与灵魂，但是，我们却能够确知其实际存在性。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回应那些否认上帝存在性之人的意见。如果我们能用物质性的方法发现和观测上帝，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呢。然而，我们虽然用天文望远镜无法在夜空中看见上帝，虽然用显微镜无法在人脑里看见人的意识，却可以有充足的、间接的、大量的理由，确知二者的存在性是真实的。用公众熟知的语言，我们可以说，我们所看到的，是房屋，而不是房屋里面的主人。

第二，上帝是永恒、全在、全备、全知的。人的位格是有限的，但上帝的位格是无限的。比如，人的看与听是有限的，但上帝的看与听是遍及的、没有限制的。

（B）上帝的两个重要性质

接下来，我们思考上帝的两个重要性质：智慧与能力。这两个性质都涉及到上帝的位格，与上帝的设计。对于设计而言，本章中的意思是，能够自由地做任何事，并能够在预先计划与安排。因此，当我们用“设计”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是一个位格，能够预先筹划，并完成计划。前者是指，一个意识，能够制定和形成计划。后者是指，一个自由意志，有能力把计划切实地施行出来。因此，一个位格必须能够有智慧来设计筹划，并有能力使之成就。若我们考虑到宇宙的浩大以及其中万物的复杂，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造物主的这两个性质都是无限的，即，上帝是全知和全能的。

全知的意思是，掌握一切可能的知识与智慧。明白和知道一切。全能的意

思是，有能力做任何可能的事情。在上帝而言，他凡事都能。除此以外，上帝还有第三个重要性质，我们会在后面第五章详细谈到。

应当指出的是，上帝不仅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以及智慧设计者，上帝也是宇宙的掌管者与维护者。上帝无处不在的能力遍及宇宙。上帝超然于世界之上，也是内在于世界之中。对于每一个呼求他的人来说，上帝从来离我们不远。

还应当指出的是，上帝若是全在的，他就必须是不可见的。因为，如果上帝可见，他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能够看见的轮廓，并且他会在一时一地，而不能同时在多地。若他是内在于世界的，那么，任何自然力和自然规律就都是他意志的直接效果，并且只要他的意志不变，那些自然力与自然规律就不会改变。因此，若我们观察到自然力和自然规律在当前没有变化、始终保持一致性，那么，我们并不能否定上帝的存在性，而只能否定：一些人心中所以为的那种观念——神是反复无常的。事实是，上帝是大能的上帝，上帝更是智慧的上帝。上帝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有智慧的旨意、计划和目的。

（C）辩驳不可知论者

最后，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来考虑一些人的一个重要反对意见。有一些人认为，人的思想太有限，根本无法思考那位第一因，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思考无限的事情。换句话说，按照他们通常的说法：上帝对我们而言是不可知的。

这个反对意见，在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承认，我们是无法完全了解上帝的。上帝的存在与属性，对于任何人的思想意念来说，都太伟大、太宏大了，以致于超过了我们所能够完全了解的限度，或超过了我们语言所能够完全准确表达的限度。因此，我们的所有结论，即使就其最好的程度而言，也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真理的近似，而不是真理的本身。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存在性。只有上帝才完全地知道他自己，并向我们启示和显明他自己。所以，毋庸置疑，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不能完全地知道关于上帝的一切。

但是，严格说来，我们知识上的这种局限性，其实也适用于我们对于任何一件事情的认识。比如，就我们对于任何人的认识与知识而言，他的真正本质和属性、以及他的整个人生，在外人来说，是无法被全部了解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的确能够真实准确地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一些部分情况。我们对于自然的认识也是如此。自然力本身对于我们是不可见、不可

感知的，但我们可以从它们所产生的效果而对它们有所认知。甚至，当我们研究物质的时候，即使当我们把它们简化为最小的单位，比如原子和电子的时候，它们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迷。然而，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它们完全一无所知。而是，我们的确能够真实地对它们有一些确定性的了解。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说，任何知识都是不完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知识就完全不真实。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上帝的全部本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对于上帝的许多性质和方面有真实的、确定的、清晰的认知。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虽然不能认知上帝的每一件事情，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认知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

应当指出的是，从这个方面来说，基于自然启示的神学与自然科学很有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基于一些对于自然的观察和思考而得出的一些结论。比如，我们看见坠落物体的运动方式，从而得出结论，存在着一种力，我们称之为万有引力，并用这个万有引力来解释很多现象。同样，我们看见在自然界中到处都存在着的智慧设计的踪迹，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说，存在着一位大能而智慧的伟大设计者。在上述两个情况中，我们都是从对于现象的观察中得出分析与结论。我们都没有对于那个现象背后之原因的直接知识。一般性而言，神学的知识，并非不如自然科学的知识那么确定。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都真实地、清晰地认知到我们自己的存在，认知到我们自己的意识与自由意志。从而，我们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那位创造了我们的上帝，他的位格、他的认知、他的自由意志是什么样子的。但当我们研究自然力和自然规律的时候，比如当我们研究万有引力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无法形成对于这种力的直接认知，而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我们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

综上所述，我们的任何知识都不是完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知识。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更加重要的一点。我们的不完全的、部分性的知识，无论是科学（我们对于自然的知识）还是神学（我们对于上帝的知识），这就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所有知识。我们的这些知识，虽然不是完美的知识，但是，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充足的知识，足以指引我们的生命、实践与行为。无论万有引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至少知道，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不应从悬崖上跳下去，否则就会摔死。我们在神学上的知识也是如此。无论上帝本身的全部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至少真实地、确定地、清楚地知道，上帝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创作者，是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主，因此，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详细谈到的，我们的生命将要对上帝负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指引我们生命的实际知识，这也是我们所能够确定地得到的真实知识。

更进一步说，虽然我们的理性能力或许在获取关于上帝的知识过程中非常有限，但是，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生命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对于我们的每日生活、对于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

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并愿意寻求他，愿意明白和了解他给予我们的启示？还是，我们关闭自己的心灵，仅仅以我们不能完全地认知上帝而作为借口，否认我们对于上帝所应有的一切知识？甚至，因此而不愿意去寻求他，而是顽梗地背离他？这就像是，当一个小木船快要沉没的时候，小木船上的乘客面对赶来救援的一艘巨大的蒸汽船，有着各种不同的态度。船上的一个乘客说，他不确定蒸汽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也不知道蒸汽船能不能把大家安全地运载到陆地上去。于是，他坚持呆在小船上等死，坚决拒绝大船上派来的营救人员。所以，当我们坚称，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认识上帝，并因此而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毫无理性地坚信，上帝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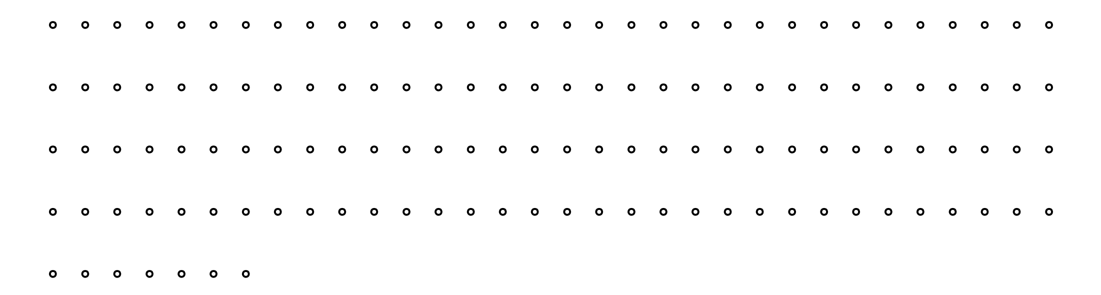
从纯粹理性的角度出发，当我们面对是否应当相信上帝这个对于我们生命至关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坦率地说，我们在理性上真地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困难吗？无疑，一个诚实而勤于思考的人，不会忽视，人在理性上认识上帝过程中的有限性和困难性。但是，那些有限性和困难性，却并非是选择上的困难。当理性面对一个问题的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择最合理的那个选项。比如，相信这个宇宙有一个起源，比不信它有一个起源更合理。我们并不是说，要把上帝的存在性完完整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不是说，在我们的理性中认识上帝，就没有任何局限和困难。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虽然有那些局限和困难，但我们仍然能够实实在在地知道上帝的存在性，仍然能够明确地解释宇宙的起源与当前状态。所以，综上所述，即使从纯粹的理性角度出发，上帝的存在性也是完全合理、完全可信的。

（D）总结论述

这里我们重申本章的论述要点。首先，这个世界有一个起源。这个世界，是出于一位自由的、无限大能之造物主的创造结果。他有着超自然的能力。自然界的力与自然规律，都是无自由的，是按照固定的轨迹和模式运行，然而，那位造物主则有着自由意志。自然界的一致性和自然规律的普遍性，指向了，只有那一位独一无二的造物主，那位超自然的力量与主宰者。

这位造物主预知他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作为在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后果。我们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智慧设计的踪迹。那位伟大的造物主和智慧设计者，一定是有位格的，即，他能听能看、有思想意志、是自有永有的。他既有智慧进行设计和筹划，更有能力成就他所计划的事。

简而言之，宇宙是一个“果”，它并不能自我生成，而是，它必需有一个“因”。这个“果”是普遍性的、一致性的、规律遍及性的，所以，它的“因”只有一个。在这个“果”中，处处都显明了智慧设计、筹划、安排的踪迹，因此，那个“因”一定是有智慧、能力和计划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宇宙的背后，一定有一位大能的创造者、设计者、掌管者，就是那位独一无二的永生真神、全知全能的上帝。



。。。。。。。。。。。。。。。。。。。。。。。。。。。。。。。。
。。。。。。。。。。。。。。。。。。。。。。。。。。。。。。。。
。。。。。。。。。。。。。。。。。。。。。。。。。。。。。。。。
。。。。。。。。。。。。。。。。。。。。。。。。。。。。。。。。
。。。。。。。

第四章

人的自由与位格

前面几章讲到，我们在自然的启示中，能够明白上帝的存在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自然而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自然中所得到的那些启迪，是否就足够了？我们是否不再需要，对于那位全知全能、独一永生之神、上帝的更进一步的知识？没有人会否认，若我们能够更多、更深地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归宿，那会更好。但我们真地可能得到那更进一步、更深、更广、更全的认识吗？

所以，这就引向了我们接下来的话题：——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信仰。这就是说，上帝要把他自己的启示告诉我们。在这其中，我们首先要思考，人的本质与品格是什么。人是否配得到上帝的启示。另外，我们也应当思考，上帝的本质和品格是什么。上帝愿意把关于他自己、关于我们的事情，启示给人吗？我们在本章中要专注考虑前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分别思考，人的思想与道德的性质。

（A）人的思想性质

人的思想性质是指，人的意识、思想、感知、情感、感觉等等。毋庸置疑，这些性质与组成人肉体的那些物质的属性是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有大

小尺寸，重量，颜色，形状，软硬度等等。人的思想意识则没有这些物理性质。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无法用大小、尺寸、重量、颜色、形状、硬度来衡量。在我们人里面，同时存在着物质和意识这两样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感知到，我们自己的思想是什么。这被称为意识。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清楚地感知到，那些在我们眼前移动的、能够被我们观察的东西。这被称为物质。物质与意识，是两件本质完全不同的事物。这不是一个实体的两个名字，就如同，一个图形不能既是圆形、又是三角形。若我们要思考人的思想性质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聚焦于我们内在的意识。意识如果真地现实存在的话，就一定不是物质性的，因为其与物质的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无法在实验室里或是显微镜下，来研究意识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还要记住，在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于自己的意识更加确定的知识。我们的意识本身，是一切其它知识的基础。即使欧几里德几何公理，也是我们意识中的内在知识的衍生品；因为我们在本能的意识中知道，整体大于部分。

面对人类的这种复杂性质，人们会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和理论。一种称为意念主义，另一种称为物质主义。

意念主义者认为："人所拥有的，仅仅是思想意识中的意念而已。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物质这种东西。我们的生命本身，其实就是一场春秋大梦"。在今天的社会上，已经很少有人持这种荒谬的理论观念了。所以我们不在此多谈。

今天，有很多人相信物质主义。物质主义者认为："意识并不是一个真实地、实际存在的实体。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依附于物质，是第二性的。我们所谓的思想、情感、感知、意识等等，都不过是大脑中的分子复杂运动而已"。的确，没有人能够否认，意识与大脑是紧密相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说，意识与大脑之间是完全相等的一回事。大脑可以仅仅是意识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意识通过大脑来支配身体、采取行动。尽管，就我们所知而言，意识从不能离开大脑而单独行动，但是，意识可能与大脑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实体。而也许，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意识会离开大脑，以其他的方式采取行动。事实上，在我们的经验之外，我们可以轻易想象出一个不在大脑里面的意识，正如，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出一个在大脑里面的意识。我们想说的是，在我们经验范围内，大脑与意识这两个不同的实体，看起来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若仔细思考物质主义者的观点，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困难。一个重大困难是，为什么思想、意志、意识、感知、知识与情感等等特性，单单是大脑这种物质的特性？为什么这不是物质的一般性的性质？如果说，只有大脑这样的物质才能够有意识特性的话，那么，这个解释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有效的解释。当大量的水结冰的时候，会有感觉和思考吗？当大量氢气燃

烧的时候，或是当大量氮气与其他物质大规模地结合、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会有思想与情感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为什么水、氢、氮这些相似的物质组成了大脑的时候，就突然有思想、有认知了呢？因此，若我们断言说，只有大脑这种物质才能有意识，那么，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效的说法。

反之，若我们断言说，任何物质都有意识的能力，那我们就是荒谬的。有的人以为，所有的物质元素都有意识的能力，只是以一种很稀释的方式存在着。比如碳、氢、氮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而当它们组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有思想。换句话说，我坐着写字的桌子有意识，我使用的钢笔和墨水有思想。而当物质的组织非常复杂化、就像我们大脑那样结构复杂的时候，思想就会以一种极其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无疑，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却毫无逻辑、证据、感知与经验的支持。这个理论的荒谬性，就像是意念主义者把人生中一切实际经验都当作是一场虚无的春秋大梦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综上所述，无论是意念主义还是物质主义，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深刻地承认和认知，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物质性的身体，而且，在我们的身体中，更有一个真实地存在着的、完全不同于物质的、在本质上具有非物质属性的实体存在，就是我们的意识。这是人本质中的一个最终极性的事实。我们对这一点的确知，甚至超过我们对于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的确知性。

在这里，关于物质主义，我们还要再说一点。如果一个物质主义者不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他就不仅要否认在人里面意识作为一个实体的实际存在性，而且还要声称，任何非物质性的东西，都不能实际存在。物质主义者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物质以外，别无所有。但是，这种观念却是与我们头脑中的记忆相违背的。我头脑中的记忆告诉我，现在的我，与十年以前的我，是同一个人。可是，我们知道，在人身体里面、包括我们的大脑里面，所有的微观粒子、细胞及其所构成的机体组织都是在不断地新陈代谢着、持续地变化着。在十年当中，我们吃了很多很多饭食，身体的粒子构成和内部组织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如果我的记忆和意识告诉我，我与十年前的那个人仍然还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身体里面，一定有着一个非物质性的、稳定的、经年累月仍然不变的东西。虽然沧桑变化、岁月如梭，但是，我还是十年前的那同一个人。这是我们在意识中，关于身份性、位格性的另一个深刻认知、证据和表现。

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今天的这棵树，与十年前长在同一位置、从未移动过的那棵树是同一棵树。固然，在树的内部，分子构成、细胞构成和机体组织在十年中也发生了很多新陈代谢的变化，其所发生的变化也使之今非昔比。但是，就我们所知而言，今天的树与十年前的这同一棵树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连接关系，因为今天的树既记不得十年前的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或是十年前发生了什么。然而，人与树的深刻区别就在于，我们不但记得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更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身份、位

格有清晰的、无可置疑的认知。虽然，今天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和分子，都早已不是十年前我们身体里的那些原子和分子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一定有着除了原子、分子之外的东西，并且那种存在的实体，一定是非物质性的。物质主义者的谬误，就是正在于这一点上的荒谬无知。

（B）人的道德性质

在前文分析了人的思想性质以后，我们在这里思考人的道德性质。

（1）人有意志

首先，按着人们的通俗语言说，人类有意志。其实，严格地说，意志并非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东西，比如像人所拥有的一条狗那样。意志，是出于人自己。或者说，人具有拥有意志、使用意志的能力。不过，既然公众的语言常说“人有意志”，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用这样的说法。我们之所以说“人有意志”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人有意识”。人自己的意识能够感觉

到，在他里面有一个意志，是与身体和思想都不同的。意志尽管与身体和意识两者都紧密相连，但是，意志与后两者不同，并且能够控制这二者。比如，我决定要举起右手，于是就这样做了。又比如，我想要思考欧几里德的逻辑问题，于是我就这样去思想了。在上述两件事情中，我都能够感到自己的这个意志，并且这意志本身是与实际的行动和思考活动不同的。因此，从我们的意识而言，无可置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意志，正如我们有身体和思想一样。

（2）人的行动部分地取决于他的意志

接下来我们论述，人的行动以及他的思想，都常常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人的意志，能够控制自己的四肢，所以，能够凭己意举手或是抬足。故此，人的意志就有了控制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人的意志能够直接移动自己的四肢。四肢是由控制四肢的身体肌肉直接拉动的。而肌肉则是由神经而刺激运动的。人的神经则是传导来自大脑的指令。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来自人的意志为原动力。意志加上各种上述因素，就能够完成所要作的行动。

上面所描述的这种行动的过程，是所有人类普遍的经验。无可置疑，人能够凭己意控制和移动自己的四肢。的确，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一个健康人

是否有能力、凭着自己的意志走过一个房间。然而，意志究竟是怎样控制物质的，这实在让人费解，因此，很多人想要找出其它的解释原因。

但是，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对于我而言，我想要移动我的身体，于是我就这样做了。我的意志与行动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这两者之间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我们相信，二者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或者是意志导致了大脑中某种分子的运动，从而激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刺激肌肉牵引手臂或腿脚运动。或者，是大脑里的某种变化导致我产生了意志，并在同时也刺激了肌肉和骨骼相应的运动。我们无法想象，非物质性的意志怎样能够控制物质性的分子，又或者，物质性的分子怎样能够影响非物质性的意志。但总的来说，前者的解释更加合理一些（即，意志导致了物质性分子的运动）。这有两点原因。

第一，一般性而言，意志总是在人的行动之前。即，我首先想要举手，然后才真地这样去做。而不是，我先举了手，然后才有这样的意志。如前所述，举手的动作来自于大脑里面的分子运动产生的指令，传导给神经，刺激肌肉，拉动骨骼，等等。但是，这个指令本身的出现，是在人先有了想要举手的意志之后。

第二，如果说，人大脑中先有将要行动的指令，而这种指令在传导给运动

神经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的意志的产生，即，不是意志导致了大脑内部分子运动变化，而是大脑内部分子运动变化导致了意志，那么，意志就不是人行动的原因，而是人行动的副产品。而这是不符合所有人类的经验的。人的意志可以远在行动的很长时间以前，就产生出来。人的行动，可以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情。显然，意志发生在先，并导致大脑内部产生指令信号。

（3）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接下来我们论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与前面的问题非常不同。前文讨论了，一个人的行动，比如举手，是他意志的结果。在这里我们讨论，这个想要举手的意志，是否能够出于人的自由决定，亦或是，人的任何意志都是不得已的、毫无自由可言。后者的观点，被称为宿命论主义。意思是，人的任何行动都不是自由的，而全都是不得已的，是预先都被固定好了的。

当然，无论是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也好，还是相信宿命论主义也罢，大家都同意，人的意志取决于若干动机或原因。人的行动总是服从于那个最大的动机和原因。换句话说，最占优势的动机最终决定了人的行动。但问题是，我们所说的“动机”，究竟都包括哪些？影响人意志的原因和因素都包

括什么呢？这些动机，都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吗？还是，有些因素和动机，是纯粹来自人心灵内部的？更进一步说，在那些不同的动机和因素的互相比较中，是什么决定了哪一个因素的优势更大，哪一个动机更加强烈？比如，一个人的意志能否决定，是顺从自己肉体的欲望？还是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我？在这两者之间，意志能否选择，把哪一个动机看为更加重要的因素呢？如果有人认为，意志是被动的，没有真正的能力去作分辨和抉择，那么他就是一个宿命论主义者。反之，如果有人认为，意志是主动的，能够在各种各样因素中做出抉择，并以此控制和影响自己身体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自由意志论者。

当然，每一个人的出生、教育、成长环境都不同。这些传统和环境方面的不同差异，都会对人的抉择产生极大影响。这就像是一个投球手，在各种不同的机遇下，尽力把球投好。所以说，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尽力利用手上的各种机会，争取把事情做到最好、最满意。重要的问题，并非是说，人的意志是否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而是，人的意志，究竟有没有任何自由？

我们论述的理由，仍然是从意识出发。在人类的意识中，我们普遍性地都认识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可以说，这是人意识当中最确定的一件事。这个信念，来自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经验。比如，我可以切实地感觉到，我想要举手、或不举手的意志，是自由的。我的这个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我不需要理解，人的意志怎么会是自由的。我也不需要跟人辩论，我到底是不是自由的。我只是清楚地知道，在举手或是动足这些事情上，我

有自由。关于这一点，若有任何人来用逻辑辩驳、否定我，我都知道他是错误的。

正是由于人的自由，才使得人的行为与自然界的物体非常不同。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物体在物理和化学定律的束缚下，表现出完全一致性的、一成不变的反应模式。然而人的行为模式却是变化多端的，并且即使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反应方式。这就是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区别。人的意识，人的认知，人的经验和经历，都证明了人的意志自由性。

有人试图对此辩驳说，如果人真地有自由意志，那么，人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异数。——因为，自然力总是按着固定的自然规律运行的，而如果真地存在一个自由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的本质在自然界中是不可知的。若人真地有这样自由的力量，那么，不论他所拥有的自由多么有限，他也至少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因为他不完全在自然规律的束缚之下。

这样的说法，真地那么令人难以置信吗？不，这其实是非常可信的。——因为，创造了世人的上帝本身是超自然的。上帝拥有自由意志。他完全可以凭他自己的意愿，在创造世人的时候，使他们具有这个特别的属性，使人在一定程度中、一定范围内，拥有自由的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无疑，这对于一位研究物理科学的人来说，人的自由意志是一件非常匪夷所

思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律师、法官、政治家们来说，人若没有自由意志、而仅仅是一台上了发条的自动机器，那才是一件更加不可思议、更不可能的事情。

以上的分析，在原则上不也同样适用于其它情况吗？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寸草不生的岛屿上研究无机化学，那么，树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异数。但我们能够就因此说树木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吗？事实上，化学之所以分成两个分支，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就是为了分别研究不同领域的问题。有机化学的定律，并不适合于无机化学的对象，因为后者是无机的。人是有生命的。人的意识和经验都显明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虽然人的这种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性质在宇宙中是独特的、是异数，但我们并不能就因此反对说，人的意识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也不能说，人的自由意志不存在。——因为我们对此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两者的存在性。

正是因着人的这种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特性，才使得人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高级、最重要的存在，才使得人与任何其它物质、或是任何其他植物、动物之间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最后我们还要记住，关于自然力、自然规律的不变性，仅仅是出于我们理性的推论。事实上，我们对于自己意识的认知，以及对于我们自由意志的

认知，要比我们对于周边环境的认知更多。正是由于我们意识的经验，才推论说，自然界具有一致性的性质。我们的意识和意志，是我们得到任何直接知识的唯一方法。严格说来，我们对于任何自然规律的认识，比如万有引力定律，都是来自于我们对所观察事物的假设。而且，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自然界中的各种力和定律，都是来自于那位伟大造物主的自由意志。因此，在一切力量与能力的背后，真正的源泉是来自于自由的意志。

综上所述，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这与我们的意识和经验相吻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的行为如此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人的这种特质，在自然界中是极其特殊的。

（4）人知道自己的意志是自由的

前文论述了，人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这里我们强调，人的这种自由意志性，在他自己的意识里面是完全知道的。正是因此，人才能够为自己设定目标与计划，并努力工作，朝着计划的目标前行，竭力去完成所要计划的事情。换句话说，人是自由的，并且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所以有设计、筹划、工作、实现的能力。这使人具有位格性，即，他有意识和意志，有思想和计划，能够完成智慧的设计与谋划。毋庸置疑，人的这种

位格性与设计的能力是普遍的。

在人的语言和交谈中，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许多像“我要”“我选择”“我决定”“我不干”“我觉得”“我不同意”等等这一类的词汇用语。如果没有这些词汇，我们其实就根本无法讨论一个问题或是进行一场热烈的辩论。如果“我”只是代表了一堆分子结构组成的一些机体的话，很难想象，“我”还能够与别人讨论或是辩论一些问题。

人们在心里面都知道自己意志上的自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无需辩驳的。

（5）人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

接下来我们论述，人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前文讲述了，人凭着意愿使用自己的自由。因为，人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在这里更进一步说，在人类的意识里面，普遍地有着一种责任感。当然，在社会人群中会有一些极其个别的、例外性的个体，但是就全人类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责

任感是普遍存在于人的内心的。

并且，在人的内心最深处、甚至是潜意识里面，人的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于上帝的责任感，或者换句话说，对于某种超然性存在的责任感。无疑，人对于自己的同胞、亲人、家人也负有责任感，但若我们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人对于同胞的责任感并非是最本质的、第一位的。因为人的责任感首先是针对创造自己的造物主、自己生命之赐予者的，然后才是针对自己的同胞。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孩童总是先针对自己的父母负有责任感，然后才是对于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亲人有责任感。所以，既然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的责任感就首先应当是针对上帝的。并且，由于上帝把我们安置在世人的中间，并期望我们参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对于社会、同胞、家人和亲人也负有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放置于我们内心的、对于他人的责任感。如果我们有对于上帝的爱，就会有对于他人的弟兄般的爱。

（6）人关于“对与错”的道德感

接下来，我们论述人类所普遍具有的、关于对与错的道德感。无疑，人在这个自然界是极其特殊的，因为人有着非凡的能力，可以分别行为的好坏对错。一个行为被看作是好、或是坏的首要前提条件是，那个行为一定首

先是出于自由的意志。人们可以鉴别，从道德意义而言，一个行为是对还是错。错误的行为被称为“罪”。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道德上的罪，或是道德上错误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表明了人意志的自由性。如果人没有自由的意志，那么，他的行为也就没有对错可言。人所作的任何错事，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罪。若没有自由的意志，其实就没有犯罪的能力。如果人没有自由的意志，那么，他所作的错事就要算在上帝的头上。显然，这个结论是荒谬的。如果人没有自由，那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罪，因为一台机器是不能犯罪的，正如一个钟表不可能对创造自己的钟表匠犯罪一样。

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是一个不完美的存在体，正如同一个钟表，虽然精美漂亮、运动精确、分毫不差，但却无知无觉、无爱无恨。如果人真地没有自由意志，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好人与恶人。但是，很少有人会说，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恶人。

现在，因着人具有这种能够区别道德意义上的对与错的特性，我们把人称为“有道德感的存在体”。人有道德感，并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错的。

人的这种道德感，可以与我们的另一种感官的认知相比较，比如，视觉。

人能够看见道德的对与错，就像是能够看见视觉中的黄色、绿色或蓝色一样。人的这种区别颜色的能力是一件客观事实。又例如，人的舌头能够品尝出不同的味道，苦味、甜味、咸味等等。尽管，不同的人会对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看法与喜好，不同的人会对于不同的味道有着一定倾向，但是，这些都不能否认人能够辨别颜色与味道等等客观事实。同样，人能够区别道德上的对与错，这本身也是一件客观事实。

另外我们也应当指出，人们关于道德上对与错的认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喜欢对的事情，不喜欢错的事情。道德上对或错的事情，并不等于我们想要或者不想要做这件事情。比如，我不想把手伸到热水里面，是因为我以前有过被烫伤的经历，而不是因为把手伸到热水中本身是一件道德上错误的事情。道德上的对错，不等于一件事情是否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方便、福利，或者，是否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利益的想法。一件事情可能对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便利，甚至，这件事情可能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然而，这件事情却可能是在道德意义上正确的事情。简而言之，一件事情，就算许多人喜欢，或就算没有什么便利，然而，这些因素都与此件事情在道德意义上的对错无关。

人类的道德感，虽然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暂时看似卑微、甚至有时被一些人嗤之以鼻，但是，从本质意义上说，绝不可被忽视，更绝不可被摒弃。

（7）人的良知

最后，让我们来讨论一下人类的良知感。良知常常与道德感互相混淆，但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具有道德感，能够把各样事情按着道德的意义化分成正确与错误的两类。然而，人的道德感本身并不能让人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都准确地判断出是对还是错。有时，人可以用理性来思考和分析一件事情在道德上的对错。事实上，当我们碰到疑难棘手的局面的时候，常常这样陷入沉思。不过，一般性而言，我们并不需要沉思。人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能力，称为良知。人心里面的良知能够直觉性地告诉一个人，这件事情是道德正确的，那件事情是道德错误的，等等，而不需要理性的辩论和演算。所以，良知就像是人的道德感的器官，正如眼睛是人的视觉的器官。眼睛能够告诉人，哪一个物体是红色的，哪一个物体是绿色的，同样，人的良知能够告诉人，哪一件事情是道德正确的，哪一件事情是道德错误的。无论是人的眼睛还是人的良知，都能够针对事情或对象作出直接的、直觉性的感知判断，而不需要人理性的推演才能得出结论。请注意，良知本身并不能使一件事情成为正确或错误，正如眼睛本身不能使一件事情成为红色或是绿色。它们仅仅是把所观察到的对象属性，以客观中立的方式、不偏不倚地告诉我们。

毋庸置疑，任何人的心里面，都具有良知。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穷人还是富人，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有文化的人，受过教育还是没有受过教育

的人，都具有良知。不论是什么时代、哪一个国家、还是哪一个种族的人，都具有良知。我们所有人都有良知。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良知似乎是独立于我们自己的意志，也不受我们自己的思想摆布。我们无法更正良知，而是，良知常常更正我们。良知不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对错，而且，鼓励我们去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阻止我们去做道德上错误的事情。的确，良知在我们的心里面带来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效果就是，当我们做了道德上错误的事情以后，它给我们的内心带来深深的羞耻感，使我们对自己的罪产生深深的愧疚和懊悔。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遍及所有人的人生经历。当然，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人的意志的自由性质。如果人的意志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他怎么又会为自己所作的错事而懊悔呢？

综上所述，人是有道德属性的。即，人的意识是自由的，然而人是有道德感、责任感的存在体。

（C）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

人与动物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的道德属性。人有着自由的意志，但是动物却没有。如前文所述，人的自由意志，不仅有他自己的意识和知道为证据，还有许许多多其它方面的证据。人正是因为有自由的意志，所以才能够在其行为中表现出计划性、目的性、意义性。换句话说，

人有设计、筹划和思想的能力。即，人的行为，是朝向一个特定的、可以预见的目标而努力前行的。而在动物的行为中，则完全没有这些特质。虽然有些动物在某些具体事情上看似有“设计”的能力，但是，那些设计却非它们本身所发动的。这种无意识的“设计”能力，被称为本能。这种动物性的“设计”是无知无觉、没有意识的。而人的设计，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意图、有计划、有创意的。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四个原因指出，在动物与人之间，在能力与属性方面所存在着的区别，是本质性意义上的区别。

第一个原因是，人的设计，与动物的“设计”，在智力上、智慧上存在着天壤之别。

第二个原因是，动物的设计，只能针对一些具体的个例情况。比如，鸟在搭巢的事情上看似有令人惊讶的能力，但是，它们却不会搭建任何其他东西。同样，蜜蜂可以按着完美的数学原则建筑蜂窝。它们可以用最少的材料，搭建出完美的六角形蜂窝结构，从而得到最大的建筑空间。但是，蜜蜂却不会把这个数学原则应用到任何其他事情上，或是应用于任何其他东西里面。蜘蛛会编织出非常好的蜘蛛网，可是，却无法编织出任何别的东西。动物们的这些工作，虽然精美，但是却不是出于它们的自由的、有意识的设计，而仅仅是本能而已。它们只能从事那些具体的事情，却不能做出任何一般性的、举一反三的、有真正创意的任何事情。它们不具有自由的意志。只有人的自由意志，才能使人在一件事情上理解一些原则，并主动性地把那些原则应用到其他事情上，从而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设计性工作。

第三个原因是，动物的那些所谓“设计”，如果真地是出于它们自己所发动的，那么，它们一定会具有很高的智力水平。但事实是，在很多方面却显明，它们的智力实际都很愚蠢。比如，一只蜜蜂虽然能够建筑出精美绝伦的蜂窝，但是，常常却在偶然飞进一个打开的窗子以后，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无助地、嗡嗡地乱飞，找不到回去的路径。并且，动物们的那些本能，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而不是像人的社会一样，在有的地方比另外一些更加发达先进一些。显然，人的行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理性、谋划、意图、决心、创意，但是动物们却仅仅是按着无意识的本能行事，并没有任何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

第四个原因是，在动物的“设计”中，并没有逐渐改善的过程。比如，一只蜜蜂所建筑的蜂窝中的最后一间六角形单元，与其平生所建的第一间六角形单元是一模一样的。并不更好、也不更糟。事实上，这些六角形单元几千年都是如此，并无任何改善，或是从坏到好的学习积累过程。在这个工作过程中，蜜蜂并没有学习到什么。这个经历也不能给蜜蜂带来任何智力上的益处。蜜蜂从来不会在所作的事情上，做出任何改变，来试错，或是总结经验教训。人却不是如此。人知道自己有自由的意志，也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并总是尝试着做出什么有创意的事情。而且，在以前所作工作的基础上，试图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更高效、更省力，等等。一只动物就像是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或是机器人的一个手臂，仅仅是简单机械地完成所分派给它的任务而已。而人却会像是一个创造者那样，首先确定并评估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意图，然后，制定技术路线图，并一步一步地

筹划和实施。最后，还要进行效果总结，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为把将来的事情做得更好而现在努力增加知识。而动物则总是只会做他们本能要做的事情。显然，动物的本能技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学习和创造而得来的。动物凭着本能所作的"设计"，并不能归因于它，因为并不真正是它所发动的。这正如，人的眼睛和其他器官，并不能归因于其父母的设计。因为，那些都是出于伟大造物主的智慧设计。

以上论述，也可以从动物没有责任感和道德感的事实，得到证明。动物并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也不知道道德的对错。这些观念，只有来源于人的自由意志。当然，我们可以由于我们不喜欢一条狗的行为而对它略施惩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求那条狗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的略施惩罚的措施，只是为了要让狗建立起一种条件反射，使它知道，以后当它再做某事时，伴随而来的就会是疼痛感。狗和其它动物一样，都有一种避免疼痛的自然本能，所以，为了避免将来的疼痛感，它就不会再做某事。然而，这并不等于，狗就在它头脑里面知道，它所作的事情是错的，更不要说，道德意义上的错误性。所以，我们从不会认为，狗要为它自己所作的事情担负道德责任。我们也更不会认为，它所作的什么事情是"罪"。

从上可见，道德属性，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动物没有自我认知，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自由意志。因此它们不能像人一样从事智慧设计。所以它们没有位格性。

人的自我认知、自由意志与道德性质是不可否认的，这就像是人的视觉、听觉、记忆能力一样，是确定存在的客观事实。

（D）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结束本章的论述。显然，人有身体，但更有思想与道德的性质。人的身体与思想都在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控制之下。或者说，人的生命在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的掌控之下。他的心灵与灵魂，就是他真正的“自己”，就是他的“位格”。所以严格说来，人不仅是一个生物机体而已，而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体。他的身体与思想，应当服务于他的灵魂。身体与思想都是人所拥有的，但是，身体与思想并非是他的全部定义。他是一个位格性的存在体，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意志。他的意志，或他的灵魂，掌控着他的生命。

我们现在所得出的结论很清楚显然。我们指出了，人是自由的存在。正是人的这种自由性质，使他与世间万物都不相同。人的这种自由特质，使他具有某种超自然的性质。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存在。他知道自己的自由，并知道自己与动物之间本质的区别。他有一个独特的本质。在这个星球

上，没有任何它物与他相似。他的自由属性，使他能够进行设计性、原创性的工作。这使他具有独立的位格。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具有他的这种特点。只有他是与上帝相似的。

。。。

【引述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第一卷 序言部分】

信仰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认识、热爱、敬畏我们的造物主、神，并在我们一切的事情、行动和交谈中以热忱的情感仰望他，遵守他的诫命（传12：13）；无疑地，这才是一个人的全部意义；这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在《传道书》中的许多讲述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就在于此；所以，我也把这个原则当作是整件事情的根本基础。一般性地，这是对一切人类所必需的；这世上如果没有信仰，那么，人的荣耀也就无处得以保守；人类社会的秩序也根本无法得以保持。具体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

说，我们也必需要有敬虔的信仰；否则，我们就无以回应我们受造的目的所在，无以回应我们造物主对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内心也不会安稳轻省，更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一个人，被造物主赐予了心灵和理解的能力，能够明晓、服事、享受自己的造物主；但是，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眼目和心中却全然忘记了神，那么，他就是日光之下的一只最可鄙、最可悲的动物。

。。。。。。。。。。。。。。。。。。。。。。。。。。。。。。。。
。。。。。。。。。。。。。。。。。。。。。。。。。。。。。。。。
。。。。。。。。。。。。。。。。。。。。。。。。。。。。。。。。
。。。。。。。。。。。。。。。。。。。。。。。。。。。。。。。。
。。。。。。。。。。。。。。。。。。。。。。。。。。。。。。。。
。。。。。。。。。。。。。。。。。。。。。。。。。。。。。。。。
。。。。。。。。。。。。。。。。。。。。。。。。。。。。。。。。
。。。。。。。。。。。。。。。。。。。。。。。。。。。。。。。。
。。。。。。。。。。。。。。。。。。。。。。。。。。。。。。。。
。。。。。。。。。。。。。。。。。。。。。。。。。。。。。。。。
。。。。。。。。。。

【引述 《剖析老子》】

。。。。。。。。。。。。。。。。。。。。。。。。。。。。。。。。
。。。。。。。。。。。。。。。。。。。。。。。。。。。。。。。。
。。。。。。。。。。。。。。。。。。。。。。。。。。。。。。。。
。。。。。。。。。。。。。。。。。。。。。。。。。。。。。。。。
。。。。。。。。。。。。。。。。。。。。。。。。。。。。。。。。
。。。。。。。。。。。。。。。。。。。。。。。。。。。。。。。。
。。。。。。。。。。。。。。。。。。。。。。。。。。。。。。。。
。。。。。。。。。。。。。。。。。。。。。。。。。。。。。。。。
。。。。。。。。。。。。。。。。。。。。。。。。。。。。。。。。
。。。。。。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不是常“道”(“道”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它并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不是常“名”(“名”也是可以说明的，它并非普通的“名”)。“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

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终极）。“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远。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远又深远，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从“有名”的奥妙到达无形的奥妙，“道”是洞悉一切奥妙变化的门径)。

==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精髓中，以《老子》（或称为《道德经》）为核心基础的道教思想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影响力。所谓中华传统思想，包含了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道教思想三大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也互有矛盾；它们试图回答关于人生、世界、道德、信仰、价值方面的一系列、许多根本的、重要的问题。

在这三者之中，以《论语》等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教思想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主流、统治地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历世历代的科举制度中，都以儒家经典及其思想体系为唯一标准内容；孔子甚至被称为是至圣先师，以至于，在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的中国人都笃信：“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然而，虽然儒教中包含着许多光辉的思想，例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等等，并且，儒教极力地推崇人生应当精诚求索、“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儒教却无法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是一个宗教，因

为它所表达的内容，仅仅是没有超越性、没有超自然根基的道德伦理主义而已。

任何人，无论多么良善、或是多么罪恶，都要不得不面对死亡。在死亡面前，无论多么华丽的道德言辞，都是无能为力的。如果离开了永恒的、超越性的、超自然的、超越死亡的根基、权柄、源泉，那么，任何道德就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甚至是滑稽的。如果离开了道德法则的永恒颁布者，那么，道德法则本身也就失去了隽永的、内在的、持续到永远的、价值与意义。

在世人的内心深处，都先天性地知道上天、永远、永恒这些概念；在世人的生命之中，都本能性地有着追寻真相、追求真理、寻求信仰、寻找心灵依靠与精神支柱的渴望。在人的内心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天自己才能填满。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却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儒教非常强大、一直牢牢地占据着统治地位，以至于读书人如果不读儒家经典，不读《论语》、不读《孟子》、《大学》、《中庸》、《礼记》等四书五经，那么，就不可能光宗耀祖、金榜题名、出相入士、进入上层社会，也不可能有效地为国家、社会、群族、县乡治理等等社会事务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儒教自身具有着深刻的缺陷和漏洞，以至于历史上的中国人不得不到佛教和道教思想中去寻找那些关于超越性、超自然性、超越死亡的许多方面之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儒教本身仅仅是关注于此世的问题、价值与意义；因此，儒教

无法在终极的层面上，在超越死亡的层面上，讲述人生的真正意义，以及道德的真正价值。

虽然，儒教中包含着许多重要而宝贵的道德伦理，也讲述了许多对于社会秩序、家庭、人生具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话题，但是，儒教既无法给出那些指向永恒、超越死亡之人生问题的答案，也无法讲述世界的本质、起源、性质、未来等等话题内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尽管如此重要、如此占据统治地位、主流地位，却始终无法完全取代、抹煞、消除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的重要影响。

后两者，正是要试图思考关于人生与世界的那些超越性的问题；在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层面上，它们试图要给出关于人生与世界之本质的超越性的、超自然的答案。可是，佛教思想与道教思想也各自包含着深刻的局限性、谬误性。

佛教思想属于泛神主义的思想范畴；它不是把人带入以上天为中心的信仰之中，而是恰恰相反，使人远离上天，甚至主张“人定胜天”（人若能够禅定、安定、安静、看破红尘，那么，即使是天也能够被胜过）。在佛教的经典中，清晰地否认这个世界上有那样一位造物主、主宰和安排一切的“上天”。佛教并非是要把人带入热忱、执著的信仰与真挚之爱中，而是要反对一切执著，否认爱的真实意义，甚至否认一切事物、以及人生的真实意义。佛教的主旨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即，一切事物的表象，在本质上而言，都是空的；空本身，从本质上说，就是一切事物的表象）；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主张，人应当放下一切执著，看破一切，悟透人生，从而不被一切事情、一切人所羁绊，才

得以进入涅磐、寂灭；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佛教曾经大力提倡割亲、出家，即割断世人与亲人、父母、家人等等之间的关系；因此，曾经受到以孝悌为核心理念的儒生们的激烈反对。

总而言之，佛教常常是以这种空灵、放弃、舍得、看破、了脱等等思想，作为其核心色彩；而不愿意主动地涉足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等领域的活动和理论建树。因而，虽然，佛教在中国民间受到很多欢迎，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等地区，自古寺庙云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人历史上的一些慈善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杀人放火等罪恶昭昭的犯罪行为（佛教以因果和轮回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人去犯那些罪恶昭昭的行为；以烧香拜佛、敲木鱼、念经、积功德等等形式，间接鼓励人对他人行善和捐助等等）；但是，佛教从未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取代儒教的主流统治地位。

事实上，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心中敬虔、真诚、真挚的、敬神畏天的信仰。在佛教历史与信仰实践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许许多多形式主义、信仰虚伪的和尚尼姑们，信无所信，敬无所敬；他们以虚无主义、否定主义（即，否定世上任何事情与价值的真实与隽永的意义；甚至否定“否定”本身）为所谓的信仰，但实际上，却仍然是生活在自私、自利、清高、自义之中。

相比于佛教，道教作为一个宗教的形式，显然影响力要小很多。这部分地是由于，道教的经典不像佛教经典那么冗长繁杂，也部分地是由于，道教不像佛教那样有着相对而言比较组织化的宗教形式、以及比较系统化的教义。但是，以《老子》为核心的道教思想，自古以来，对于中国人的影响

却是非常深刻、广泛、普及的。在思想、哲学、文化、社会层面，道教思想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佛教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今天，我们在现代中国人心中普遍流行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中，仍然能够深刻地看见，以“无为而无不为”为代表的道教思想的影响，广泛地遍及各处。这种影响，与《周易》以及风水理念、八卦理念等等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思想中的一道风景线。它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了许多普通中国人心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中的一些主要特征与理念。

我们在《关于论语的联想》以及《从金刚经说起》两本书中，曾经专门讨论和剖析了儒教与佛教的一些主要特征、特点、缺陷等等。在本书中，我们继续深入地思考、评介、剖析以《老子》为核心基础的一些道教思想与理念。

==

在《老子》书中一开始的内容，就开宗明义地指向了世界以及其中万事万物的起源。我们可以基本上说，在老子看来，天地、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都是源于“道”。“道”，正是《老子》一书的主题：——

“道”如果可以用言语来表述，那它就不是常“道”(“道”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它并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辞去命名，那它就不是常“名”(“名”也是可以说明的，它并非普通的“名”)。“无”可以用来表述天地

浑沌未开之际的状况；而“有”，则是宇宙万物产生之本原的命名。因此，要常从“无”中去观察领悟“道”的奥妙；要常从“有”中去观察体会“道”的端倪。“无”与“有”这两者，来源相同而名称相异，都可以称之为玄妙、深远。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奥，而是玄妙又玄妙、深远又深远，是宇宙天地万物之奥妙的总门。

我们如果通篇仔细地详读《老子》，就会看见，对于老子而言，“道”是在宇宙世界、人生当中最本质的、最本源的。

+++
+++
+++
+++++++++++++++++++++

【引述 圣经 创世纪 道德经第一章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比较】

1起初，　神创造天地。2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4　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

6　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7　神造了穹苍，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了。8　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

9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10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这是好的。11　神说："地上要长出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在地上的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12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又长出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这是好的。13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

14　神说："在天上穹苍中，要有光体来分昼夜；这些光体要作为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15它们要在天上穹苍中发光，照耀地上！"事就这样成了。16于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体，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了星星。17　神把这些光体安放在天上穹苍中，照耀地上，18管昼夜，分光暗。　神看这是好的。19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

20　神说："水要滋长生物；地上和天空之中，要有雀鸟飞翔！"21于是，神创造了大鱼和在水中滋生各种能活动的生物，各从其类；又创造了各种有翅膀的飞鸟，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22　神就赐福给牠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海洋；雀鸟也要在地上增多！"23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

24　神说："地上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爬行的动物和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25于是，　神造了地上的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各种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　神看这是好的。

26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27于是，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　神的形象创造了他；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29　神说："看哪！我把全地上结种子的各样蔬菜，和一切果树上

有种子的果子，都赐给你们作食物。30至于地上的各种野兽，空中的各种飞鸟，和地上爬行有生命的各种活物，我把一切青草蔬菜赐给牠们作食物。”事就这样成了。31　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
+++
+++
+++++++++++++++++++++

从上述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与老子第一章的对比中，我们能够看见，神（上帝）与老子的道，有着以下的异同。

1.神（上帝）的位格性：——《老子》里面的道，是没有位格的；但上帝却是有位格的。所谓“位格”是指，一个主体有着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这样的主体正如每一个世人都是有着身份位格的。上帝是无限而完美的；他能听、能看、能言；他是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在他里面有无限的丰盛。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造物主，更是创造世人生命之主。他有意愿、意志、思想、情感、智慧、计划、旨意、目的、作为；他更有公义、圣洁、恩典、慈爱。【圣经中更向我们清晰地指出：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2.神是能看的：——上帝创造了世人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光明；他创

造了光明本身，正如同他创造了雨露、彩虹、星夜。他自己更能够看见一切事情，看见一切世人的心灵深处的光景。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在他的眼前被隐藏；他洞悉一切，鉴察一切。

3. 神是能言的：——上帝不仅是能听、能看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自己说话，能够把他自己的启示、话语和旨意，清楚无误地、完整清晰地向世人显明出来。圣经是上帝完全的话语、启示、全备的旨意。

4. 神是全能的：——上天、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既创造了宇宙世界，那么，这个宇宙世界中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高于他，也没有任何势力、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的旨意。他的能力显明在一切被造之物的身上；他使百兽在大地上奔跑雀跃，使雀鸟有美妙的声音，使百合花有美丽的衣服，使大雁能够迁徙万里而不迷失方向；他更把生命赐给人，使他们有情感、理性、意识、意志、认知、智慧、思想、道德的能力。

5. 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万有。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人能够给他提供原材料，也没有什么人能够给他提供蓝图、钢筋、架构、支撑。他的创造，完全是出于他自己无上的智慧与能力。他的创造，完全是凭着他自己的话语。

6. 神是秩序的、审断的，喜悦良善与美丽：——从神的创造之工中我们能够看见，他是秩序的神，而不是混乱的神；他是审断的神，有着审美、价值判断、等等能力与权柄。他喜爱良善、秩序、与美丽的东西，而憎恶罪恶。

7. 神是智慧的，并有着设计与计划的能力：——从神的创造之工中，我们也能够看见，他有着无限的智慧。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是出于他的美好旨意、计划、设计。他不是无知无觉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恰恰相反，他的一切作为都有着清晰的计划与目的。他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无限的智慧与圣洁的旨意和目的。

8. 人的本质；——人是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世人虽然是有限的，虽然在生命的本质中已经堕落犯罪、悖逆离开了神，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人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作为与恩典和公义。人有着心灵与灵魂，有着思想、意识、认知与意志、意愿的能力。在人的里面，有着这个宇宙世界中最为独特的东西，就是人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

9. 为什么说上帝是存在的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 一书开始的相关内容】

++

++

++

++

++
++++++++++++++++++++++++++++++++++

“造物主”的意思是什么

“造物主”的意思是：那位终极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创造者和主宰。他是公义圣洁的，是慈爱恩典的；他把生命赐给人，把阳光雨露以及地上丰富的物产赐给人；他是道德律法的给予者，是道德世界的终极审判者。他把道德法则先天性地放在人的良知之中，使每一个世人都在内心深处知道诚实、公义、公平、正直等等道德品格的含义。

____

他创造了宇宙天地以及其中的万有，更创造了世人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听、看、思想，使他们有理性、智慧、道德与情感的能力。

他创造了人的耳朵和口舌，使他们有语言表达和理解的能力；他自己更能够把自己的旨意向世人显明出来。

他使人能够听见和明白话语的声音；他自己更能够听见世人的呼求和祈

祷。

他使人有眼睛能够看见光明；他自己更能够鉴察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人内心的一切真实光景与境地。

他使人有思想、智慧的能力；他自己更有着无限的智慧、思想、意志。

他是有“位格”的，即，他有完美的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过去、现在、未来所作的一切事情，以及为什么作这些事情。在他的一切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都有着无限智慧、圣洁的旨意与目的。

他把智慧与思想的能力赐给人，更把生命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即，使每一个世人也成为有位格的存在体；使他们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的能力；使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作的事情、所说的话语；使他们能够在他们自己的作为、话语、意图、计划中，常常包含着智慧的设计，以及道德的属性。

因此，人在这个世上与其他一切动植物、花花草草、鸡犬牲畜都存在着本质上深刻的不同。一株树木，虽然高大、参天、美丽，但是，却不能说话，更不能表达自己的任何感受与思想；在它的里面，没有“位格”，即，它没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换言之，在它的里面没有一颗真正的灵魂。

____

就严格意义而言，对于生命的真正定义，正是在此。一个无知无觉的存在体，就像是一个数学公式、或是科学研究中的黑盒子一样，在给定了输入信号与输入条件、系统状态的情况下，只会有确实的、不变的、一致的、死板的、甚至可观测研究的输出信号或是反应方式。换言之，在它的内部，没有一种驱动机制，使它可以自己自由地、自主地决定，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去内在性地选择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自由的意志与自我的认知与意识，只有人才会有，正如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可以想要举手、或是不举手，或可以想要计划做一件事情、或是计划不做一件事情一样。

这种意识、意志的能力，在这宇宙世界中，是人所特有的。我们如果越是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就越会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深邃而奇妙。这世界中的一切物体，都是由"死"的原子、分子等微观粒子所组成的；所有的物体与粒子，都按着牛顿运动定律等科学法则而运行；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它们都只能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状态；——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死"的；它们不可能有意识、自我认知，也不可能有意志、自由意愿。（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正是以造物主为中心的信仰与世上那些万物有灵、盲目迷信等等世俗宗教之间的重要分水岭；这也正是现代科学之所以诞生于基督教信仰为文化中心的欧洲的根本原因。我们将会在其它书籍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人却不是如此。虽然，人生活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受到各样有限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资源、健康等等的限制；但是，在人的里

面，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与灵魂。人的心思意念能够不受时空的限制，“飞”到遥远的天边；人的情感与思念能够遥“寄”给远方的亲人；人的心能够在复杂纷繁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深刻的思考、抉择，计划自己的行动目标，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更重要的是，在世人的里面，都普遍地有一种追寻真相、追求真理、寻找信仰、倚靠精神支柱的强烈倾向与信念。这些，都往往是人生命中最珍贵、最伟大、最高尚的组成成分。

从宗教、哲学意义而言，人因着这些极其特殊而宝贵的品性、属性，而被我们在这里定义为“生命”。生命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活的、有内在生命的存在体，才能够谈得上去“爱”一个对象；这正如，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对他而言，道德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会审判菜刀或是手枪，给它们判定杀人罪，而是会审判、刑罚那使用菜刀或手枪的人；——因为工具本身是“死”的，是无知无觉的，所以它们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一个有自由的、有生命的主体，才会具有道德的性质。

这样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宇宙世界中无中生有出来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而是，我们回答说，这样的生命，正是来自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的主宰，来自那位创造生命、把生命赐给世人的上天，来自那位全能、智慧、有无限权柄的造物主。

____

虽然，在人的生命中，充斥着许许多多的罪恶，甚至，人的生命从本质上就犯罪背离了神；

虽然，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人的生命是如此渺小而短暂；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人的身上，想见那位无限全能之造物主、永生之神的品格与属性；

这正如，我们能够从这个浩瀚宇宙的本身之中，能够看见那位全能、全知、全在、全备之上天、造物主的能力与属性一样。

____

任何人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从社会与人类的历史，从对于客观世界的观察中，从对于我们生命自省的过程中，都能够明白、理解、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物体、存在体，其背后都有导致其存在的因素、原因、作用力、机制、法则或导因。我们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浩瀚的宇宙，以及其中如此浩大、纷繁、复杂、美丽、奇妙的万事万物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在这些所有事情、事物、事件的背后，一定有那样一位极大能力、极其智慧、极其伟大、高尚圣洁的造物主。

宇宙是浩瀚无限的，因此，那位造物主就必然更是无限的，有着无穷的力量，更是生命的永远泉源。

虽然人是有限的，然而，由于人的生命有认知、意志，有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意愿、管理、恩慈、公义等等有限的能力或属性，从而，我们从人的生命中也能够知道，那位创造人生命的造物主，更有着意识、意志、价值判断、审美、秩序、知识、旨意、管理、恩慈、公义等等至善至美的能力与良善属性。

他掌管全地，鉴察人心，颁布道德法则，赏善罚恶，赐人生命，以公义和恩典待人，把救恩赐给万民。他是秩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是喜爱良善之人的全能者，是公义圣洁的审判官；他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喜爱人的真诚、敬虔与谦卑，不喜爱人的虚伪、亵渎与傲慢、自义。

那造耳朵的，自己岂不能听见呢？

那造眼睛的，自己岂不能看见呢？

那赐人心灵与头脑的，自己岂没有思想、情感与意志呢？

他喜爱公义与良善，并将要终极地、公义圣洁地审判与惩罚世上的一切罪

恶以及刚硬不悔改的罪人。

____

他创造的宇宙世界，何其浩瀚而美丽。如果，我们在夏天夜晚，凝视那清澈的星空，仔细地眺望那悬挂在夜空中的无数璀璨的星体；如果，我们在清晨的海边，看朝阳破晓，从天边磅礴而出的绚丽霞光；如果，我们俯视金色的麦田与浩渺的大地，或是遥望那雄伟翠丽的高山峻岭，或是奔流的大河之中的滔滔江水；——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惊叹于那位全能之造物主的创造之工是何其伟大而奇妙。

====================

关于造物主之存在性的辩论

从一些基督教护教学书籍以及一般性哲学书籍中，比如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论述，或甚至是从中国古人的书籍比如诗经、甚至论语（尽管孔子并不愿意接受关于超自然信仰的思想理念，但是，孔子仍然在论语中时常提到上天）中，我们都会看到对于上天、那位超越一切之上、眷顾世人之造物主的论述。

一般而言，那些相信造物主、上天、上帝之存在性的信仰者的思辨性论述，可以简单粗略地举例如下。

____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包括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就不可能有终极的意义，而仅仅成了一个属肉体血气的存在体；在这个宇宙世间，人的生命就既不是可贵的，也不值得珍惜；人生命的意义，就仅仅成了或是虚无主义、或是弱肉强食的存在体而已。

____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的生命、心灵与灵魂，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盼望，因为必将面临死亡而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每一个人所作的一切，就仅仅是为了在这个属肉体血气的社会中活着，并不得不面对冰冷的坟墓。

____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人间社会的道德，也不可能有任何真正坚实的根基与权柄的源泉。所谓道德，就仅仅是怎样维持社会秩序与运转

的、功利主义的、伦理体系，而没有其内在的、终极层面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样的体系下，道德的力量是苍白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世界的起源。有人说，这个宇宙世界是自我存在的，从亘古就是如此。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没有经过谨慎严格的哲学思考与逻辑思索。一个认真深思的人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被造的，而是亘古以来就是如此自我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从无限远的过去就一定早已演化完结而进入彻底的寂灭。

———————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通过理性而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普遍的、一致的、确定的、规则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之所以能够被数理以及逻辑的科学体系所研究，之所以是秩序的、而不是混乱的，正是因为，它是被这样一位智慧而全能之造物主所创造的。

———————

若没有那全能之造物主，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宇宙世界中观察到如此浩瀚而庞杂的、美丽而奇妙的、精确地调制的现象。比如，宇宙中有大约十个左右的基本物理常数，例如万有引力系数，电磁力常数，等等。这些常数直接影响到分子之间、原子之间、以及万物之间的各种作用力的大小。这些常数如果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于现在的数值，那么，这个宇宙中就根本不可能形成如此瑰丽的星空、数量巨大的星系，也根本不可能有生命，更不可能有我们这个美丽奇妙的蓝色星球。

+++
+++
+++
+++
+++
++

==

【引述 圣经 约伯记35章】

+++
+++
+++

+++

+++

+++++++++++++++++++++++++++++++++++

1以利户回答说：

2“你说：‘我在　神面前更显为义’，

你自以为这话有理吗？

3你还说：‘你有甚么益处呢？

我不犯罪有甚么好处？’

4我要用言语回答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朋友。

5你要往天仰望观看，

细看高过你的云天。

6你若犯罪，你能使　神受害吗？

你的过犯若增多，你又能使他受损吗？

7你若为人正义，你能给他甚么呢？

他从你手里能领受甚么呢？

8你的邪恶只能害像你的人，

你的公义也只能叫世人得益。

9他们因多受欺压而呼叫，

因受强权者的压制而呼求。

10却没有说：‘ 神我的创造主在哪里呢？

他使人在夜间歌唱。

11他教导我们过于教导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智慧胜于空中的飞鸟。’

12因为恶人骄傲的缘故，

他们在那里呼求， 神却不回答。

13真的， 神必不垂听虚妄的呼求，

全能者也必不留意，

14更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你忍耐地等候他吧！

15但现在因为他还没有在忿怒中降罚，

也不大理会人的过犯；

16所以约伯开口说空话，

多说无知识的话。”

++

++

++

却没有人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世上许多人追问关于造物主、上天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像道德经的作者这样，追问关于人生与世界的真谛。但是，却没有人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人们看待这个世界、以及那位创造世界的神，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样；世人更不会去思想，自己与那永生之神，本应当有着怎样亲密而神圣的关系。

【引述 圣思录 却没有人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

《真理之光》

5/26/2015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4:15 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但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4:16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4:17 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第一部分】

全地的百姓，人类的历史

———————————————

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

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辖制原文作膀臂）便求救。

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

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

（1）

千百年来，人类的历史，就是在追寻信仰、追寻价值、追寻灵魂的历史。

他们在浩渺的天地面前，惊叹于宇宙和世界的宏大；

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扪心自问，回首往昔，感悟人生的价值；

他们在世事的繁杂中，领会着那些灵魂的韵律，寻找着那些永存的辉煌。

他们有太多的疑问，无处诉说；

有太多的遗憾，无处抚慰。

面对上天，他们有着数不清的话，想要询问和倾诉------

他们像屈原在《天问》里那样，追问宇宙的起源，万事万物的根基，

像孔子在《论语》里那样，讨论应该怎样祭祀。

他们想要追寻天命是什么，想要寻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在人生苍凉、百受挫折的时候，感叹着命运的不公，

在受人欺压，走投无路的时候，呼天抢地，寻求安慰。

可是，他们虽然会寻求“神在哪里”这样的问题，

却很少问：-----“那造我的神在哪里”？

他们不愿意把“神”当作是“造我的神”，-----

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离弃了神，已经失去了与神的亲密关系和感情。

虽然：他们对万事万物的起源有兴趣，也想要寻求人生的意义，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神所造、所赐予，自己的命运是神掌管，

可是：

他们却很少对神感恩，而想要敬他而远之。

他们没有去想：

是他，

使人有聪明，有灵魂，

“教 训 我 们 胜 于 地 上 的 走 兽 ， 使 我 们 有 聪 明 胜 于 空 中 的 飞 鸟”。

他们更没有去想：

是他，

使人夜间歌唱；

他使我们即使在黑夜来临的时候，即使在身处黑暗、苦难之中的时候，

仍然有盼望，

仍然有渴求，

光明必将来临，

晨曦必将洒满大地。

（2）

全地的人，都像是坐在黑暗里的百姓，像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

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自己的柴米油盐，为了自己的面子，

为了自己的骄傲，为了自己的思索，为了自己的雄心，

为了自己的名利；

他们的未来，就是死亡。

每一个人都害怕死亡的阴影，因为那是一去不能回还的境地。

任何只要还活着的人，就仍然可以抱有希望，

因为不管今天是什么境地，

明天太阳仍然会重新升起，

每一天都是新的。

然而，若一个人，不认识永生之神，不寻求神，离弃那造物主、生命的创造者，

那么，他在死去的时候，就会毫无盼望，毫无安慰。

这是何等大的、黑暗的死荫之地。

【第二部分】

真理之光，照在死荫之地的人们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他是那大光，照在我们这些坐在黑暗里面的，死荫之地的人们。

他使我们灵魂的眼睛，能够打开，

让我们看见自己-----

看见我们属灵的光景，

看见我们人生的利益，

看见我们真正的幸福之路。

他是道路，是神所赐的生命之路；在他里面，我们得到无以伦比的平安与安慰。

他是真理，是真实的实际，是这宇宙天地、也更是我们生命灵魂的主宰。

他是生命，在他的旨意和爱之中，我们得到永远幸福的圣洁生命。

【第三部分】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基督所传的道，是要告诉我们：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为什么“天国近了”，我们就“应当悔改”？

因为-----

（1）

这罪恶充满的世界，以及其中的罪恶之事，就快要满盈。

这世界将要如同衣服，渐渐旧了，渐渐腐朽败坏。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国家要兴起，与别的国家敌对。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充斥着更多的，更激烈的冲突、自义、战争。

地震的消息，和打仗的风声，将要越来越多，愈演愈烈。

遍地要有饥荒和灾祸。并非是因为他们的缺乏和贫瘠，而是由于他们的贪婪和暴力。

全地的人，要在罪恶、骄傲、仇恨、亵渎之中，大声吵闹喧嚷，彼此为

仇。

（2）

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也如同衣服一样，渐渐旧了，渐渐朽坏，渐渐破败不堪。

无论一个人多么强壮，多么长寿，多么富贵和健康，

他的生命，终有尽时。

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当一个人在病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世界对他而言，就是如同末日一样；

他一切的属世的盼望和慰藉，都要离他而去；

他看不见儿女将来之事，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将来会如何；

世界，仿佛在他眼前崩塌。

（3）

可是，世界与人生的结局，并非是如同灯灭，一了百了；

而是，必将落在永生之神的大能审判之下。

死亡之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

神的审判台前，人一切的罪恶、隐秘、阴谋、腹诽，

人一切隐而未现的罪，一切猖狂的罪恶，一切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嫉妒争竞，

都将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面临神终极的审判和永恒的惩罚。

（4）

天国来临的日子，就是罪恶终结的日子，

就是神的终极审判和永远刑罚来到的日子。

在天国里，神的百姓，神所拯救、救赎的万民，那些心中谦卑、悔改己罪、接受神救恩的人们，将要永远圣洁和幸福。

那是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

在那里，再也没有罪恶，没有私利，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哀愁，没有死亡使人分离。

在那里，不需要日头，因为神的公义如同明灯，永远长明。

在那里，没有黑夜，没有寒冷，没有贫穷，只有无限的丰富与富饶。

在那里，基督与属他的百姓们一同作王；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宝血和生命救赎了他们。

（5）

神的国度，何等美好。

天国已经近了。

所以，我们应当悔改，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赐我们的重生的生命之中，

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身，

来寻求他，信靠他，来祈求他的恩顾和祝福。

我们祈求的根基，来自于基督对我们的舍命之爱；

在他里面，我们更有那永远美好的盼望。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福音。

+++

+++

+++

+++

+++

+++++++++++++++++++++++++++++++++++

==

道德经看到了什么：——老子看到，神的创造之工，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他看见了神的深邃与奥妙。然而，老子却表现出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甚至认为，真正的永恒之道，是无法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真正的永恒之名，也是无法用言辞能够称呼的。在老子的眼中，"道"虽然是一个极其奥妙的东西，但是，却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即，道本身只是一个本源性的对象、门、道理、玄妙，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活的"、有思想、有生命的主体。

道德经没有看到什么：——老子没有看到的是：——那永生之神的位格；

神的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神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神是什么。神既然创造了宇宙天地，既然创造了人的身体、心灵、生命与灵魂，那么，神自己岂没有听、看、言的能力呢？神自己岂没有思想、意志的能力呢？神自己岂没有那永远的生命呢？

道德经的盲点（以及基督教信仰之外的许多哲学与宗教信仰思想体系的盲点）：——“却没有人问，人是从哪里来的；那造我的神在哪里？”

老子的盲点，正是在于，只看见了那外面的世界，却没有看见人里面的心灵；只思考外面世界的本源与玄妙，却没有思考人自己心灵与生命的来源与奇妙。

如果，人的生命本身，真的是来自于老子所说的“道”，那么，这“道”自己岂没有思想、生命、话语、旨意呢？这“道”岂没有意志、权柄、智慧、荣耀呢？

===

+++

+++

+++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

+++++++++++++++++++++++++++++++++++

===

什么是真正的奇妙：——的确，在这个宇宙世界中，有许许多多形态万千的事物、景色，有许多奇妙的动物、植物，更有那宏伟而壮观的天文物体与现象；然而，这个世界上最为奇妙的，却是人自己。人的眼睛、瞳孔如此微小，但却能够令人震惊地看见整个浩瀚的星夜，看见何其浩大磅礴的无数群星。在这个宇宙中，人虽然是渺小、有限的，人的身体与生命虽然是软弱的，但是，在人的里面，却有着整个宇宙世界所没有的、极其独特的东西，那就是人的生命、认知能力与自由意志。人是属灵的，因为在人的里面有一颗指向永恒不朽的灵魂。人是那永生之神、无限全能的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本应当是天父的儿女；人本应当与那永生之神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应当本为弟兄姐妹。

。。。。。。。。。。。。。。。。。。。。。。。。。。。。。。。。

。。。。。。。。。。。。。。。。。。。。。。。。。。。。。。。。

。。。。。。。。。。。。。。。。。。。。。。。。。。。。。。。。

。。。。。。。。。。。。。。。。。。。。。。。。。。。。。。。。

。。。。。。。。。。。。。。。。。。。。。。。。。。。。。。。。

。。。。。。。。。。。。。。。。。。。。。。。。。。。。。。。。

。。。。。。。。。。。。。。。。。。。。。。。。。。。。。。。。

。。。。。。。。。。。。。。。。。。。。。。。。。。。。。。。。

。。。。。。。。。。。。。。。。。。。。。。。。。。。。。。。。

。。。。。。。。。。。。。。。。。。。。。。。。。。。。。。。。

。。。。。。。。。。

【引述 圣经 罗马书1-3章】

罗马书.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

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

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

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或译：“以大能显明他是　神的儿子”）。

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

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

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作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

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

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

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

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　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

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

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

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

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

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

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

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

母的、

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

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罗马书.

2.

你这判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 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 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为自己积蓄 神的忿怒，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所要发的忿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耐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报应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而顺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愁苦加给所有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与平安赐给所有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因为　神并不偏待人。

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因为在　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

没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辯护。

这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　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你身为犹太人，倚靠律法，仗着　神夸口，

而且明白他的旨意，又从律法得了教导，能够辨别什么是好的，

自信是瞎子的向导，在黑暗中的人的光，

愚昧人的导师，小孩子的教师，在律法上得了整套的知识和真理；

你既然教导别人，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吗？

你说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吗？你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吗？

你既然以律法夸口，自己却因犯律法而羞辱　神吗？

正如经上所说的：〝　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列邦中被亵渎。〞

你若遵行律法，割礼固然有益处；但你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不是割礼

了。

这样，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遵守律法所规定的，他虽然没有受过割礼，不也算是受过割礼的吗？

那本来没有受割礼却遵守律法的人，就要审判你这有仪文和割礼而犯律法的人。

因为表面上作犹太人的并不是犹太人，在肉身上表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

唯有在内心作犹太人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仪文。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　神来的。

罗马书.

3.

这样说来，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的确很多。最重要的，是　神的圣言已经托付了他们。

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　神的信实无效吗？

绝不可能！　神总是诚实的，人却是虚谎的，正如经上所记："你在话语上，显为公义；你被论断时，必然得胜。"

我且照着人的见解来说，我们的不义若彰显　神的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降怒的　神是不义的吗？

绝对不是！如果是这样，　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但是　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

为什么不说："我们去作恶以成善吧！"（有人毁谤我们，说我们讲过这话。）这种人被定罪是理所当然的。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

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

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赎罪祭〞原文作〝蔽罪所〞），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

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样，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

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

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 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

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

。。。。。。。。。。。。。。。。。。。。。。。。。。。。。。。。。

。。。。。。。。。。。。。。。。。。。。。。。。。。。。。。。。。

。。。。。。。。。。。。。。。。。。。。。。。。。。。。。。。。。

。。。。。。。。。。。。。。。。。。。。。。。。。。。。。。。。。

。。。。。。。。。。。。。。。。。。。。。。。。。。。。。。。。。

。。。。。。。。。。。。。。。。。。。。。。。。。。。。。。。。。

。。。。。。。。。。。。。。。。。。。。。。。。。。。。。。。。。

。。。。。。。。。。。。。。。。。。。。。。。。。。。。。。。。。

。。。。。。。。。。。。。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

暨——

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是欧洲而不是中国等地？

（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之起源背后的基督教信仰文化思想根源）

（中国古代世界观、人生观与西方世界观、人生观的异同）

===

===

。。。。。。。。。。。。。。。。。。。。。。。。。。。。。。。。。

。。。。。。。。。。。。。。。。。。。。。。。。。。。。。。。。。

。。。。。。。。。。。。。。。。。。。。。。。。。。。。。。。。。

。。。。。。。。。。。。。。。。。。。。。。。。。。。。。。。。。

。。。

第一章

背景介绍

==============================

圣经 传道书7章29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

人 原 是 正 直 ， 但 他 们 寻 出 许 多 巧 计 。

圣经 哥林多前书9章26节：所 以 我 奔 跑 ， 不 像 无 定 向 的 。 我 斗 拳 ， 不 像 打 空 气 的 。

========================

本书的内容概要与目的

本书的主旨是想要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以及思想层面的反思与思辨，来探寻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是什么；为什么现代科学发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等其他地区？

为此，我们将要追寻那些现代科学开创者们的思想与书籍，看一看当年，在他们的头脑中曾经在想些什么；看一看他们是受到了哪些前人的影响，得到了哪些方面的什么启迪；看一看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是什么，梦想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们可以打开他们的陈年旧作，看一看其中所讲述的—他们的世界观、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方法论观念等等是什么。我们可以重温他们探索宇宙自然世界、发现科学的旅程，并从中得到深刻的教益与感悟。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言论、著作、思想、方法、成就，与中国古代思想家、技术家、哲学家的言论、著作、思想、方法、成就相比较，看一看他们的异同是什么，看一看中国思想家的优点是什么，缺失是什么，成果是什么，遗憾是什么，以及他们与西方思想家的这些异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在今天的影响是什么，等等。

============================

本书所想要说明的历史事实

—本书所想要说明的，是这样一个深刻的事实：现代科学的起源，是出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必然内在因果

关系。

很多世人常常误以为，现代科学之所以得到开启与发展，是由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欧洲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影响。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偏颇的、片面的、不完全符合事实的；一个简单的反驳是，在非洲、在南美，在南亚、印度，在东亚、中国、日本等地，并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所谓宗教信仰的"束缚"；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那些地方被开启、独立发展起来呢？换言之，在那些地区，科学发展的真正阻碍，是来自于什么呢？一般性而言，在古代世人心中的世界观、信仰观、人生观里面，有着哪些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因素？

而且，更进一步说，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发展，恰恰是在马丁路德基督教宗教改革以后，是在圣经被广泛地翻译、传播、大量印刷发行以后呢？在基督教改革、圣经的广泛传播，与现代科学的开启之间，有着什么内在的联系呢？现代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开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与基督教所产生的文化土壤之间，与基督教信仰中所包含的世界观之间，有着什么内在性的联系？这种内在性的联系，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偶然的关系？

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后第三日复活、成就那美好救赎恩典，正如圣经旧约在那之前的将近一千八百年中的无数预言。从基

督的十字架救恩以后，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临到世界，至今已经两千年了。今天我们的公元纪年，就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时间为坐标原点。耶稣基督从三十岁开始公开传道，到三十三岁半被钉十字架、成就了那美好的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在三年半时间中所成就的伟大事工，胜过了这世上无数伟人的事业，胜过了这世上无数思想家的哲学，胜过了这世上无数开疆拓土的君王们所建立起来的王国。

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信仰所产生的文化土壤，能够直接地导致现代科学思想的开启和建立，那么，为什么一直到公元十六世纪，而不是在之前更早的时间点，现代科学的曙光才开始显现、并开始爆炸性地大规模发展呢？固然，这与过去两千年中的生产力发展进程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更深一步说，从思想的角度而言，在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发展背后，还有着什么更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单凭物质性的生产力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或促成现代科学思想的建立与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科学思想的开启和建立，才导致了现代生产力、工程、科技水平的爆炸性的发展。那么，在现代科学思想体系的开启、建立和发展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至关重要性的导致原因呢？这也正是本书试图努力探讨和思索的问题。

============================

科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简述

在现代社会，很多世人心中流行着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在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矛盾性的张力关系。人们经常误以为，科学正是证伪了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却总是想要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在当今时代，很多世人以为，宗教信仰是迷信的、愚昧的、违反理性的，而科学则是昌明的、智慧的、理性的，等等。

然而，世人往往不知道、或故意无视的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思想家们，无论是牛顿、开普勒、培根、波义耳，还是笛卡尔、莱布尼兹、哥白尼、伽利略、法拉第、麦克斯韦、普朗克、等等数不胜数的伟大科学家们、科学思想巨人们，都是基督徒，甚至是非常敬虔而真挚的基督徒。直到今天，在所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间，基督徒们也都占了绝大多数。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方面，的确，在世上许多宗教信仰中，充满了许多荒谬、愚昧、迷信、光怪陆离、野蛮甚至愚蠢的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在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之间，却有着深刻的、看似难解难分的关系。因而，我们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是，现代科学的诞生，究竟是由于因宗教信仰而导致的原因，还是由于克服了、胜过了宗教信仰的原因？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地思考两个方面的题目。第一个题目是，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究竟在于什么？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涵义、定义是什么？科学的内涵、外延、作用、影响、局限、积极意义分别是什么？第二个题目是，当我们说到"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到底何谓宗教信仰？宗教信仰的内涵、外延、作用、影响等等是什么？在宗教信仰的比较中，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或是错误的？究竟什么是信仰的真理？

在本书中，我们着重于思考上述第一个题目，但也会涉及到上述第二个题目。关于后者，在一些关于基督教信仰护教学书籍中（例如《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有更加深入的探讨和介绍。

==========================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简述

所谓基督教信仰是指，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基准的、以耶稣基督救恩为中心的信仰。众所周知，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的基督教信仰体系，是世上（至少在名义上）信众最多的宗教信仰体系。虽然基督教信仰在历史上以欧洲为主要文化土壤，但是，就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言，它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信仰系统。今天，在非洲至少有一半人、将近六亿人是基督徒；在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大多数人也都是基督徒；在亚洲，基督徒的数量也早已经达到数亿人以上。在世上七十亿人口中，基督徒的数量有二十三亿。在这个世上，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自称为基督徒。

今天，圣经是世上最畅销的书籍，是印刷量、发行量、传播量最大的书籍，是被翻译成世上人类语言最多的书籍。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极其深刻、巨大、深远的影响。为了简单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仅仅以几件现代人所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例：一夫一妻的婚姻法律制度，教育男女学生的公立学校系统，以及照护医治普罗大众的公共医院系统；这些都是由基督教信仰体系而导致、建立、推动、确立的。

那些把基督教信仰体系当作是迷信、当作是过时的东西、当作是落后思想的人们，显然往往是由于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调查、分析和了解。事实上，基督教信仰正是现代文明的根基而发源所在。

基督教信仰体系对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法律、哲学体系等等的发展，都有着千丝万缕、无远弗届的关系。今后，我们会在其他的书籍中，对于那些话题试图进行仔细的阐述。而在本书中，我们则聚焦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大量的历史事实而言，为什么说，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的启动、产生和建立？

固然，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上，科学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甚至缓慢的、水滴石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每一个国家、民族、文明，都对其有所重要的贡献。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指南针、火药等重要的技术；阿拉伯人、中东人在数学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古希腊人、罗马人在数学、物理、逻辑哲学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建立在那些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础之上的。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科学体系与古代科学技术之间，有着清晰明显

的区别。前者是系统化的，而后者往往是零散的、支离破碎、停滞不前的。前者虽然是后者的继承者，但却在量与质上产生了飞跃，上升到了体系化的世界观层面，并给人类社会的面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革命，给现代工程、技术、生产力状况带来了与古代技术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境界。从某种程度看，在现代科学来临以前，相对于近现代的人类物质生活面貌而言，人类在从前几千年中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面貌基本上是变化很小的。而现代科学的来临，不仅对全人类各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体系在思想上带来了巨大的撞击，而且，给世上无数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上的造福，深刻地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方式与物质生产力面貌。

因此，本书中所聚焦讨论的问题，即：现代科学的意义与起源、以及现代科学的开启历史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深刻关系，非常值得世人注意思想、深入思考。

而本书全部内容中想要说明的论点正是：—现代科学的开启与建立，正是以圣经为直接根基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体系，所直接导致的结果。这正是为什么，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当圣经被翻译、印刷、广泛传播以后，现代科学得以诞生、开启，并得到爆炸性的发展。

==========================

简述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其他宗教信仰体系的异同

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但是，成体系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有系统化经书正典的、有悠久历史与渊源的、在世界人口中占据可观主流地位的、以超自然思想和教义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也许可以再加上印度教，但印度教往往缺乏统一的教义与经典和历史文字传统、礼仪典章等等），即，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一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规模的、零散的、局限于某个较小地域范围的、或是历史短暂的、所谓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各种偶像迷信风俗等等。

在这些各种各样宗教信仰中，有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

着深刻而广泛的、本质性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在于，不论一个宗教信仰多么看似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或是看似多么肤浅、零散、支离破碎，这些宗教信仰都在试图回答一些关乎以下某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活着？我们死了以后要去哪里？我们的生命来自何处？我们的世界本源是什么？世界的本质与价值意义是什么？道德的本质和本源，以及正确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信仰中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应当是什么？

尽管世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与上述问题有关，且都想要给出超自然的回答与教义，并且，它们在很多重要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多数宗教信仰中的教义都认为，人的生命应当是良善而圣洁的；善将要得到奖赏与祝福，而恶则将要受到惩罚和咒诅）；但是，世上的宗教信仰在教义层面，却更有着天壤之别的内容。例如，在中国南方、港台等地，或是南亚等地区，有许多"拜拜"的传统；他们敬拜妈祖、观音、关公等传说中的、神话性质的人物，甚至敬拜一些动物、牲畜，祈求他们、她们或它们，来保佑自己的娶妻生子、家人平安、升官发财等等诸如此类各样的属世之事、属世之利。然而同时，在佛教的经典书籍中，则反对把神佛当作是具体的音、声、相；甚至佛教教义自身常常会陷入矛盾状态，一方面反对实相，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教义为核心，另一方面则建筑各种各样的庙宇、制作各样雕塑，来敬拜那些长着卷发与垂耳的、酷似印度人的各样佛像。

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与佛教信仰体系三者之间，前两者都属于一神主义，而佛教则属于泛神主义思想。换言之，基督教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造物主在掌管、主宰；这位造物主、上天、上帝、真主，应当是世人所敬拜的对象与信仰的核心。而佛教则认为，在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无限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造物主在掌管、主宰；而是，这个世界是由因果、因缘所驱动的（即，这个世界并非是被那样一位无限伟大的、能看、能听、能言的创造生命之主所创造和管理的）；不但如此，人生和世界究其本质而言，其终极的真实性都是应当被否定的，是虚无的、虚空的、虚乏的、虚浮的；人生在本质上是苦的；并且，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与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虽然它们都认为这个世界之上有着那样一位无限全能、全知全在的造物主；但是，它们两者对这样一位上天的认识却非常不同。在伊斯兰教看来，那位造物主是无限地高高在上的；世人只能远远地对他顶礼膜拜，却不能近身来到他的面前；而只能通过穆罕默德这位真主的先知来明晓真主的旨意和话语；世人必须要通过顺服，必须要通过遵守真主的诫命，才能够成为一个圣徒。在伊斯兰教中，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繁文缛节；人们必须要遵守那些各样的规定，以及每日按时祈祷等等，才能够被称为合格的穆斯林。简言之，伊斯兰教信仰体系是一种因行为称义的信仰；人必须在真主面前俯伏敬拜、五体投地、遵守许多繁文缛节，才能够得到真主的悦纳。这种因行为称义的信仰有两点问题。第一点是，一个真正内心诚实而谦卑的人，一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知道，自己绝非是毫无瑕疵的；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的贪欲、撒谎、奸淫、自私、不恰当的怒气、自我中心等等根深蒂固的、本质性的毛

病与罪错；在这世上，任何一个被造之人在造物主面前，都无法说自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即，一个内心真正谦卑诚实的人，一定会在内心深处知道，人无法以自己的行为在上天面前称义。第二点是，一个因行为称义的信仰，一定往往会导致人心中愈演愈烈的自傲、自大、自义之心；因为，既然是以行为称义，那么，信徒们就会在彼此之间、或是与其他世人之间，进行某种"行为意义上"的比较，因而，（尤其是那些看似信仰敬虔的人们）有意无意地会认为，自己比别的人更加高尚、圣洁、敬虔。

基督教信仰体系的独特之处是在于，它是所谓"因信称义"的信仰；即，人应当、且只能够以信心，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人只有凭着那来自于上帝自己的救赎恩典，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这救赎恩典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且死后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成就了永生的救恩；凡是真心相信和接受基督救恩、真心承认和悔改己罪的人，就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得到无限美好的永生，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属天的上帝国度。

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信仰诞生于公元一世纪（耶稣基督与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世；三十岁开始传道、三十三岁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日复活；圣经新约随后很快诞生）；伊斯兰教信仰诞生于六百年之后的公元七世纪；而它们两者都与更早之前的、犹太人的旧约圣经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系（然而，伊斯兰教的可兰经虽然时常提到圣经旧约的摩西五经，也提到圣经新约中的耶稣，但显然，穆罕默德并没有真正完全了解圣经新旧约全书的内容，而是产生了许多一知半解的误解，以及许多支离破碎的扭曲式理解；例

如，穆罕默德完全没有明白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预表与涵义）。圣经旧约是在从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大约公元前四世纪的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跨度中、由数十位先知笔者们所写成的、包含39本书籍的书集。圣经旧约的内容具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圣经旧约的核心主旨就是，上帝以犹太人民族为百姓、为记者，以大量的历史、文字与预言向世人表明了，将要有那样一位造福全人类的救赎主来到世上，成就那无限美好的救赎恩典，建立那属天的、永远的、圣洁的、上帝的国度。整本圣经（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全书；它包含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前者是对后者的预言和预表；后者是对前者的实现与成就）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

基督教信仰的简史与涵义

在世上的三大宗教信仰体系，即基督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佛教信仰体系之间，基督教信仰有着可考的、最古老的历史；它诞生于公元一世纪（而圣经旧约的历史则更为古老；圣经旧约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甚至是从这世界被创造时的历史开始记述的）。伊斯兰教次之，诞生于公元七世纪。

佛教脱胎于泛神主义、神秘主义的印度教思想，但是，佛经的梵文原典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已不可考，而只剩下了佛经翻译的文字（因而，我们甚至无法知道那些佛经的真伪性，也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知道它们是否由后人假名所作；尽管，我们可以从教义的角度，来分析那些佛经内容彼此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这些翻译的佛经文字大多始自公元六七世纪以后。

公元元年左右，耶稣基督降生；他从三十岁的时候开始传道，并于三十三岁半被钉十字架、且死后第三日复活、成就了那美好的永生之救赎恩典；这些正如圣经旧约在过去千百年中、从创世以来所预言、预表的。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正是罗马共和国开始强盛、取代之前的希腊文明体系的时候；此时，罗马共和国（即，由罗马参议院和恺撒共同执掌国家权力）逐渐转变为罗马帝国（即，由恺撒皇帝大权独揽）。罗马帝国东征西讨，权力几乎遍及了当时罗马人已知的所有世界。然而同时，从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以耶稣基督十二使徒为代表的初代基督徒们，以谦卑、和平、温柔、忍耐的方式，把基督教信仰传遍了罗马帝国境内的几乎每一个角落。

但是，在从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三百年中，无数基督徒们也常常经受着痛苦、患难、逼迫、迫害。直到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帝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并以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无数基督徒们所受的患难与逼迫才稍微缓解。在这三百年中，由于有许多罗马帝国的公民成为基督徒，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文人哲士，因此，有海量的历史文献记录，使我们可以看见圣经新约正典的成书过程、广泛传播，以及基督教信仰的历史真实性。

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帝王把罗马帝国的首都向东迁至一个名叫拜占庭的城市。拜占庭位于海陆交通上的一个枢纽、瓶颈位置，是连接欧洲大陆与亚洲大陆的关节点。君士坦丁迁都以后，拜占庭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帝国，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延续了上千年以上的和平时期而没有经过改朝换代，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王国。这个王国自称为罗马帝国，也称为基督帝国，但被十五世纪以后的历史学家称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

与此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或被后世称为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今日。以罗马为中心、影响遍及整个西欧各国的西方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影响遍及整个东欧各国以及近东地区的东方教会，虽然彼此有一些争竞，但她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平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元一千年左右。西方教会（即后来所称的天主教）与东方教会（即后来所称的东正教）在教义上是一致的；她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上帝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恩典为信仰的中心、核心；但双方之间在教会的权柄与治理的事务上，常会有一些争议。公元一千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相互指责对方，彼此不承认对方的权威。

公元五世纪，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攻陷，西罗马帝国正式

灭亡。然而，罗马天主教廷忍辱负重，以坚定而忠贞的信仰面对一切痛苦与患难，并最终使得整个西欧众民族皈依基督教信仰。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的早期历史中，恰好具有某些相反的特点。在西方教会，没有统一的君王，但有着统一的教会组织结构；在东方教会，有着统一的君王朝政，但各地的众教会基本上具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围绕着君王和平相处。

公元九世纪，以俄罗斯为主的民族、斯拉夫民族以及其他东欧各民族开始在东方教会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信仰。同时，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北欧等诸民族开始在西方教会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信仰。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陷，后来成为了伊斯坦布尔；那附近的地区成为了后来的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以后，东正教的中心后来逐渐移到莫斯科。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历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东正教的影响日渐衰落；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逐渐因海上贸易而先继纷纷崛起；中世纪正式结束，人类社会在过去五百年中开始全面地进入现代社会。

公元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在德国指出：天主教中的一些重要教导内容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德国、英国、荷兰、以及北欧各国、还有法国部分地区为代表，各地的基督徒们纷

纷摆脱天主教的影响，回归圣经。以加尔文为代表的一大批基督徒领袖们、基督教改革先驱者们，激烈地反对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他们提出"五大唯独"的原则：——"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

公元十六世纪，英国正式脱离罗马天主教会，成立了英国国教教会，即英格兰教会。公元十七世纪初，英国的清教徒天路者们首次来到北美大陆，并最终于150年后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从此，现代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等，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角落。

============================

简述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之间的关系与异同

严格地说，在纯粹核心教义的层面上，天主教、东正教以及马丁路德基督教改革以后的所谓基督教新教（实际上是回归圣经、以圣经为唯一权威与根基

的纯正基督教信仰）彼此并无本质性的不同。它们都以同样的一本圣经为上帝的话语、启示、旨意，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为信仰的中心。因此，无论是在天主教、东正教还是在基督教新教中，都会有真挚、敬虔、属神的基督徒们，有紧紧地信靠和仰望基督救恩的人们。

事实上，导致和推动西方基督教改革与更正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得一大批东正教人士带着希腊文原典的圣经新约以及其他历代基督教文献来到西欧。进而，这使得许多西欧天主教人士们认识到，在天主教拉丁文的圣经译本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翻译错误，从而间接引发并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更正运动。

因此，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之间的不同，并非是在于核心教义的争执，更不是在于经书正典的争议，而是在于，教会的组织路线、以及一些具体教导内容的缺失与谬误的方面。例如，天主教与东正教之中，都错误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把她看作是上帝之母，对她敬拜、向她祷告祈求等等；或是，把历代基督教圣徒当作是敬拜和祷告祈求的对象等等；这些错误的教导内容，对于任何一个熟悉圣经的人来说，都是明显地不符合圣经、甚至直接地违背圣经所教导的内容的。关键是，在天主教和东正教中，圣经却都往往被教会神职人员们束之高阁，从而使得普通民众无法能够容易而方便地读到圣经。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中，虽然其核心的教导并非不是以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为基础与中心，但是，在信仰实践上，许多天主教人士们、东正教人士们却往往并不熟悉圣经，也并不真正明白圣经中所讲述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的真正涵义与内容；因而，很多信徒们在信仰

中是冷漠、冷淡的，而不是真挚热忱的。

在天主教中，在关乎宇宙观、世界观等方面的问题上，罗马教廷仍然是以基督教信仰之前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等人的宇宙世界观念为基础。我们将在本书后面详述这一点；并指出和分析这一点对于现代科学之起源的严重阻碍作用。

============================

以色列人的简史

根据圣经历史，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以撒是雅各的父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向他们应许了弥赛亚的救恩；上帝清晰地告诉亚伯拉罕，世上万国都要因他的那位后裔而蒙福。

雅各的十二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在短短数百年内，就在埃及成长为一个人口至少上百万的极大的民族。然而，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的奴役。上帝拯救他们，使他们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并要进入那美好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富饶的迦南地。在他们离开埃及的前夜，上帝告诉他们，要在每一家的门框、门楣上，撒上羔羊的血，这样，上帝的公义惩罚就会越过他们、不临到他们的家庭；而其他埃及人家中的长子都要死亡；这被称为以色列人的逾越节。

（这表征了：我们因罪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被奴役者；世界成为了我们的被奴役之地。迦南地预表了每一个属神之人所将要去的美好天国；在那里有无限的丰富与幸福，更有着永远的生命。逾越节，既预表了一切世人所将要面临的、圣洁公义之上帝的终极审判，也更预表了，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得以承受上帝的饶恕恩典，而得到永生的救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因着他为我们所尝清的罪债，得以与上帝和好，得以能够在上帝面前因他的救恩而称义。）

以色列人在摩西与约书亚的带领下，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美地；上帝与他们立约，并把十诫律法赐给他们。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在士师们的率领下，在众先知的带领下，敬虔地活在上帝的面前；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常常犯罪背离神。上帝差遣先知们责备他们、警诫他们；并在他们中间设立合乎自

己心意的王。大卫是以色列人中的第一个伟大的、信仰敬虔的王。大卫王的时代，是公元前一千年。

（大卫王本身，就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表；在大卫治理下的强盛以色列国，是对于上帝百姓之国度的属灵预表。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百姓的君王，是天国的元首，是天父的儿子，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大卫王以后，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以后，以色列国民因罪而分裂为南国和北国；南国称为犹大国，其中包含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北国称为以色列国，其中包含以色列其余是个支派。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北国以撒玛利亚为中心。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南国和北国因罪而背离上帝，并被亚述国与巴比伦国掳掠。然而，上帝不断地差遣先知告诉以色列人，向他们预言说，他们将要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他们在被掳七十年以后，真的得以归回到迦南地。

这一切历史都记载在圣经旧约中。在圣经旧约的历史书、律法书、智慧书、先知书、诗篇等等内容中，都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中心；那就是，上帝将要差遣那位弥赛亚来到世间，把属神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上帝的国度将要在世人中显明出来；那是指向永远、永生的无限美好的国度；那就是弥赛亚（即，希腊文中的基督）的国度；世上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

更令人震惊的是，圣经旧约预言了，若以色列民持守在良善之中，那么，上帝的祝福将要护卫着他们、不离开他们；但是，若以色列民犯罪、沉浸在罪恶中而不悔改，那么，他们将要被抛撒在万国之中，并将要成为世人的惊骇和笑谈。

在圣经旧约最后一本书、玛拉基书以后的几百年之后，公元元年，耶稣基督降生。他以神迹和大能，在以色列人中间传道，对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并且，他清楚地告诉世人，自己就是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就是圣经旧约所预表的一切之事的中心、弥赛亚、基督。然而，在以色列人心中所盼望的弥赛亚，却与耶稣基督非常不同；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不是那个圣洁美好、属灵的天上国度，而是地上的强盛政权与国度；他们所期望的，是上帝差遣的弥赛亚带领他们在地上重建如同当年大卫王治下的强盛以色列国。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在那些假冒为善、只注重外表形式主义的犹太人宗教精英人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老等的鼓动下，弃绝了耶稣基督，甚至把他交在罗马官府的手下，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基督却在死后第三日复活，并向众门徒等许多人显现，并勉励他们，让他们到普天下去传

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与救恩，直到地极。

正如耶稣基督自己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曾经预言的（公元33年左右），以色列人在不久以后、因反叛罗马帝国的治理、于公元70年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下彻底亡国；以色列人被掳到欧洲各国等地。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开始了长达近两千年的亡国历史，直到1948年回归迦南地、重新成立以色列国。从以色列在公元70年亡国以后，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像圣经新约福音书所记述的那样，通过家谱来显明自己是大卫的直系后裔；而圣经新约福音书清晰地显明了耶稣基督的家谱、显明耶稣是大卫的直系后裔；圣经旧约曾经预言了，弥赛亚将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国度，正是对于上帝百姓国度的属灵的预表，是对弥赛亚国度的属灵的预表。这正如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我的国不属乎地上，而属乎天上。"【关于这一点的深刻涵义，关乎到我们怎样看待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以及怎样看待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社会体制等等；我们会在本书的后文中略有提及，并会在其它书籍中深入讨论。】

============================

今天，以色列人虽然只占世上人类0.2%的人口，但却占据2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数。两千年来的历史中，虽然多数以色列人不愿意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始终忠实地持守着圣经旧约正典；这本身就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角度证明了圣经旧约正典的历史真实性，也显明了圣经旧约的内容的真实性。随着历史的演进，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中，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成为相信和信靠耶稣基督的、上帝的百姓。

============================

科学的来源

在十六世纪以前，虽然人类中间也曾有许多重要的、基础性的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发现，但是，这些古代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仅是零散的、零星的、个别的、支离破碎的事件，而不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层面的、大规模的、爆炸性的科学革命与发展。

并且，在十六世纪以前，世人往往沉浸在主观臆想的世界观体系中，而并不真正地重视任何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思想。（至于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也会在本书的后面进行深入的讨论。）

起源于十七世纪的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分水岭是，在现代科学背后有一整套深思熟虑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这些深刻的科学思想与方法论，以及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思辨，是来自于何处的呢？

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阐释，这些科学思想与方法论方面的深思熟虑，以及哲学方面的思考与思辨，正是因着圣经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那些现代科学开创者们的生平著作，回顾那些现代科学之父们的苦苦思索，就能够清晰地、轻易地看见这个结论。在本书的后面，我们会向读者详细地阐述有关方面的内容。从这个结论中，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若没有基督教信仰，若没有圣经的广泛印刷、发行与传播，那么，就不会有现代科学在思想层面的开启与革命。

简单地说，现代科学的开启，正是被这样一群笃信宇宙世界是出于那样一位无限大能而智慧的造物主之手所创造的基督徒思想家们所推动的。正是由于他们在信仰上的、对于上帝的坚定信靠，才使得他们坚信，这个宇宙世界虽然看似纷繁复杂，但是，在世界之上，却一定有着简洁美丽的、井井有条的

秩序；并且，这样的规律与秩序一定是普遍的、一致的、遍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狂躁不羁地变化的。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这样一种系统化地建立知识、并对于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的方式；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知识，是可以被检测的、是可以理性地解释的、是能够对于宇宙自然事物进行预测的。

正如一位著名科学家所说的："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在于，它是可以思议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以科学性的、系统性的方法来研究和思考这个自然世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是出于造物主的无限大能的、智慧的设计与创造，而不是像一个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垃圾堆一样。

============================

科学的局限

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广泛影响早已经深入人心。科学系统观念的开启与发展，带来了技术与工程的不断更新与革命，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每一个角落。今天，每一个早晨吃牛奶面包、坐地铁汽车出门、穿西服革履在高楼大厦上班的人，每一个在宜人的田野别墅生活的人，每一个享受着现代化科学技术果实的人，都应当深深地感谢科学，尤其深深地感谢那些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因为若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现代化的富足生活与环境条件。

但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究其本质而言，科学并非是万能的，也不可能回答所有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在本质层面上，科学有着自身固有的一些局限。例如，这些局限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并不能研究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一次性的事件。在本质层面上，由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重复、可检测、可分析、可观察、可测量的现象和事件，那么对于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就其本质是属于一次性的事件，科学就无能为力。例如，关于这个世界的终极性起源，神迹，以及这个世界的终极性结局、归宿，科学是无法做出任何可验证的、可检测的分析与判断的。这并非是因为科学家的能力有限，而是因为科学就其根本定义而言，无法触及到那些在本质上属于一次性领域的问题。

第二，科学并不能回答关于（终极）意义的问题。就其深刻涵义而言，所谓（终极）意义就是指，一件事情的终极性目的与价值。在实用层面上，科学可以描述一个现象、事件、对象等等的机理、运作过程和机制，但是，科学却无法指出那个现象、事件、对象等等的本质性意义、终极性目的与价值。举一个不是非常恰当的简单例子，例如，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麦克风，那么，说话的声音就会被麦克风转变为计算机系统能够读取的数字信号；这些数字信号可以在计算机系统屏幕上显示出语音的波形图，看起来就有点类似于心电图那样的图形；并且，计算机系统可以根据固有的算法，把所说的语言转变成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等等。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麦克风记录的那些语音波形图的背后，仅仅是一连串冰冷的数字、符号、数值；而在那语言中所包含的深刻爱情、涵义、价值、意义、信仰、等等，却是科学所无法触及的。无论一个科学多么复杂、多么先进、多么高深，它都无法面对关于终极意义这样的问题。

第三，科学无法回答那些在这个世界上无法看见、或是无法以可见的方式来验证、重演、展现的一般性问题。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关乎信仰领域的问题，是超越生死的问题，是在本质上属于超自然性质的问题；例如，人的生命来自于何处，死亡是否就是人生命的终点，永生是什么，等等。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关乎信仰领域的问题，虽然是科学无法研究、无法展现、无法验证、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人无法用理性思考、无法知道真假的问题。在关乎超自然性质的问题上，虽然我们的思想与理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但是，当上帝的启示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的良知就能够在上帝的启示面前，谦卑而诚实地明晓、认识到上帝所启示和显明的真理。关于信仰的真理、信仰的真实性问题等等，我们建议读者可以查考许多基督教信仰的护

教学书籍，例如《基督教的证据》《基督教之大众证据》等书籍；本书就不在这里过多地赘述。

第四，科学无法回答关于永远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称为美好，又将永生（永远）放在人的心中。"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民族、文化中，人们虽然没有看见过"永远"，但是，在所有人的心中，都知道、明白关于"永远"这样的概念。在人类所有的语言和文字中，都有像"永远"这样的词汇。这正如中国诗人李白所写的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可是，关于"永远"的事情，却是科学所无法研究的。在科学的领域内，既无法测量、分析、观察"永远"，也无法对之进行展现、实验、操作、掌控等等工作。

类似于上述的科学局限性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深入展开详谈。例如，科学无法回答关于"我"的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们的自我认知究竟来自于哪里？我们的自由意志究竟是什么样的能力？我们真的能够凭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决定是否举手、是否抬足吗？亦或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举手抬足等等行为，仅仅是一些分子、原子在死板的物理定律作用下、电磁场力等物理力的作用下，而进行的一些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我们所无法掌控的过程的结果？我们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什么？—还有：世界的本源（导因、意义、方向、目标等）是什么？道德的本源是什么？价值的基准在于什么？信仰的真理在于什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科学所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

我们怎么知道客观世界是真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看见、听见、触摸到、闻到、感受到的一切事情，不是我们的感官系统在欺骗我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体会和经历的一切，不是像庄周梦蝶那样、仅仅是一场春秋大梦而已？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一觉醒来，以至于不知道哪一个世界是真实的、哪一个是虚幻的；不知道自己的此世生命，是否仅仅是蝴蝶做梦变成了自己的梦境而已。

事实上，我们如果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去思想科学的本质，就会立刻认识到，科学必须建立在一些重要的、极其深刻的、隐含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些前提假设包括：—我们必须相信和承认，这个世界有着内在性的、普遍的、一致的、连续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换言之，这个世界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躁乱地、毫无规律可循地变化的，而是秩序的、明确的、可理解的、可以用理性来认知的。例如，为什么位于一个地点位置的分子或原子，要和另外一个遥远距离之外的地点位置的分子或原子，遵循同样的规律、甚至通过遥远的空间而彼此互相之间具有力的作用与反作用？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本质性回答，只可能是，这个浩大的世界是出于那位无限大能的造物主的创造，并且，这世界随时随刻地在造物主的掌管之下。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假设前提、深刻信仰，那么，人就无法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本书后文所将要阐明的，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够被开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那些敬虔的基督徒思想家们，在现代科学体系被真正开启之前，就已经深刻地、深思熟虑地认识到，科学能够研究什么，科学不能够研究什么，科学的目的是什么，科学的局限在哪里，等等。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若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往往应当首先（相对而言）清楚地知道，该事情的方向、目标、界限、局限等等；这样，在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在什么领域和范围内专心致志，并知道进退、行止；这样，才能够真正把那件事情做好。现代科学的开启，正是如此。在十七世纪之前的数千年中，在人类的历史上，无数哲人、思想家、文士们，试图思考我们的人生与这个世界；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往往沉浸于那些主观臆想的论题、形而上的玄学中；他们试图以臆想的概念，去思索生命的本质、心灵的归依；然而，他们并不能凭"智慧"认识神；他们所作的，只是费尽心力失去了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那些现代科学之父们，正如同人类历史上那些第一个发明了车轮、门轴、窗户的人；他们虽然是不完美的，他们的知识也不是毫无瑕疵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是真正深邃的；他们就如同是聪明的建筑师，搭起了一个宏大的框架，使后人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盖起科学的大厦。他们思想的深邃之处正是在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诸般能力（包括理性、智慧、认知、价值、意义等等）的局限在哪里；这正如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的著作中所说的：——"人若不像是小孩子，就不能进入天国；同样，人若不在心思意念上像小孩子，就不能认识这个世界。"——这句话，正是出于培根在圣经中所受到的启发。

对于现代科学之所以被开启的深刻原因，我们会在本书后文中继续深入讨论。

==========================

科学的影响

今天，科学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影响如此深入而广泛，以至于无人能够否认。大到航天飞机、人造卫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小到每一个人手中的手机和汽车遥控钥匙，以及餐桌上的各样丰富食物与各种材料的用具等等，这些在我们生活中数不胜数的东西，都在展现着科学的力量。

对于现代人来说，科学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影响深刻地体现、反映在人的思想层面上。正是因着科学，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认识到，那些古老的、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迷信、偶像（即，世人常常把那些人手所雕刻的金像、石像、木像等等看作是有灵气

的、人所应当五体投地敬拜乞求的对象）、臆想、愚昧观念等等是错误的。

============================

一个例子

例如，在今天的世界里，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文化、民族中，所有的初中生都要学习牛顿运动定律。

1687年，牛顿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开启现代科学体系之里程碑的著作中，牛顿陈述了几个重要的基本运动定律。这被后人称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

牛顿第一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在这个著名的惯性定律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世界观：即，这

个物质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死"的；它并没有原发性的本质能力；换言之，那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说，人生命的盼望、价值、终极意义，不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在那属天的、属灵的、永恒的上帝国度之中。】

牛顿第二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下，其加速度与所受的外力成数学意义上的正比关系。【在这个著名的加速度定律背后，同样隐含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世界观：这个世界的本质与人的心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关系；这个世界中的物质和现象背后，有着精确的规则与定律；在这个世界的本质之中，包含着重要的、只有人才能够明白和掌握的数学性质与原理；换言之，在造物主与人之间，有着一种极其深刻而特殊的关系：——理性、数理、逻辑等等，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才能够有的能力。】

牛顿第三定律是指，任何物体在受到作用力的同时，也会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反作用于施力方。【在这个著名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里面，隐含着这样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是地位均等的被造之物；并没有什么地点、物体，具有与其他地点、物体不同的特殊性和特殊地位；换言之，在造物主之下的自然世界中，一切事物、人、东西都是来自于那造物主的创造与智慧设计，因而都是彼此在本质层面上平等的。】

（引述百度百科）——牛顿三大定律：牛顿运动定律包括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和牛顿第三运动定律三条定律，由艾萨克·牛顿在1687年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总结提出。其中，第一定律说明了力的含义：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第二定律指出了力的作用效果：力使物体获得加速度；第三定律揭示出力的本质：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牛顿运动定律中的各定律互相独立，且内在逻辑符合自洽一致性。其适用范围是经典力学范围，适用条件是质点、惯性参考系以及宏观、低速运动问题。牛顿运动定律阐释了牛顿力学的完整体系，阐述了经典力学中基本的运动规律，在各领域上应用广泛。

============================

科学的影响，打破了世上的那些偶像假神、愚昧迷信，打破了世上的那些盲目的宗教信仰体系，促使人以理性、诚实和认真谦卑的态度，深思自己的信仰。无论是那些在日本靖国神社门前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升学、娶妻、生子的日本百姓，还是印度庙里那些向偶像与牲畜跪拜的印度教徒，亦或是那些闭关灵修、想要大彻大悟的佛教徒，亦或是在非洲原始宗教中敬拜各样被造之物的愚昧迷信者，如果他们是内心诚实的，那么，在科学的影响面前，他们都不得不在内心深处反思自己的所谓信仰，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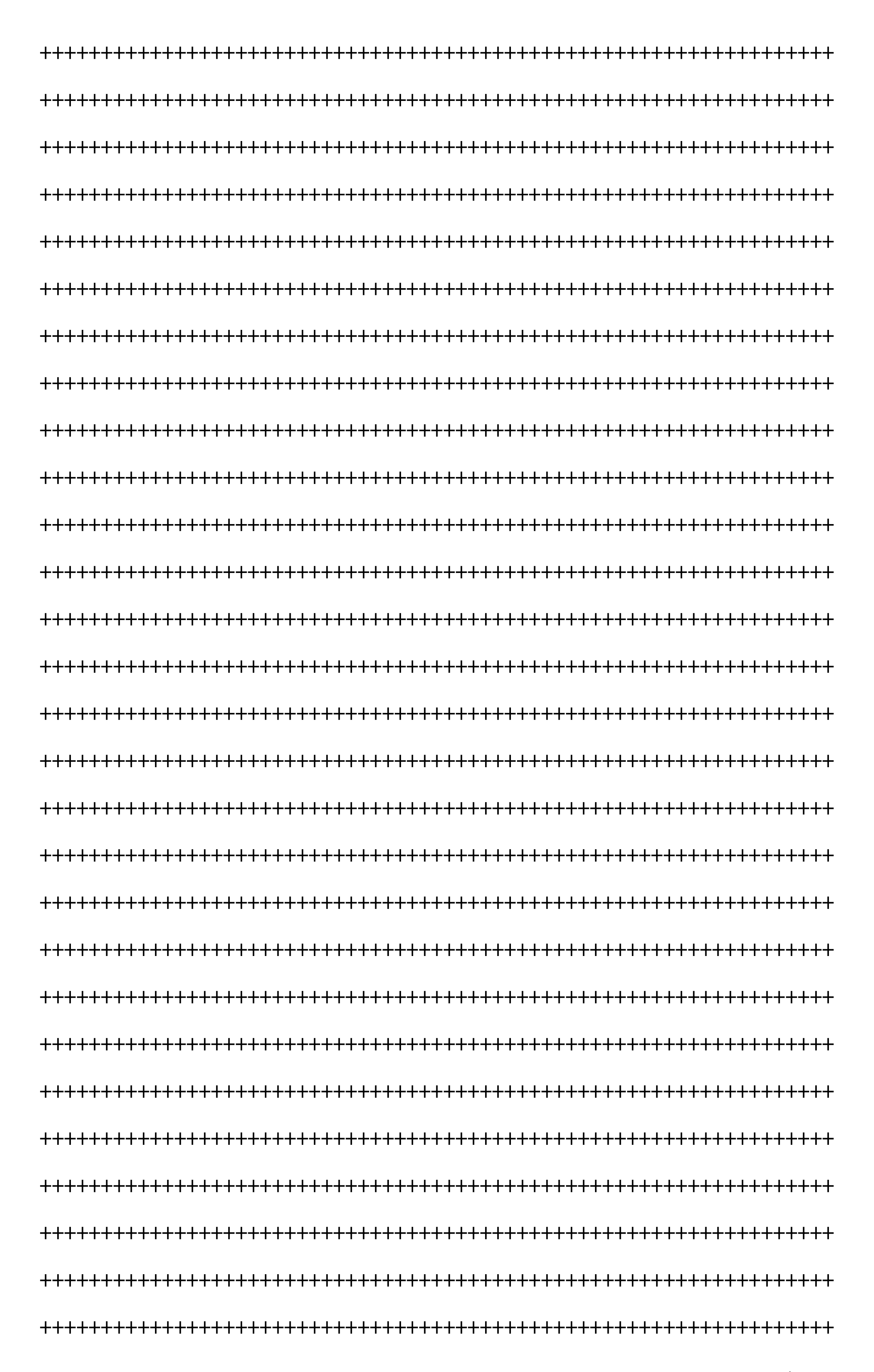
科学的影响，打破了古代各样人类传统中偶像的风俗、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以及迷信愚昧的、怪力乱神的、所谓"到处拜拜的"、民间宗教信仰传统。从根本上说，科学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层面带来了两个可能的后果。第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误以为，在这个世界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造物主；一切物质现象、事件、过程，都仅仅是在物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而已。第二个可能的后果就是，人们摒弃那些怪力乱神的偶像、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多神主义，而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之上，有、且仅有一位神（否则，世界就不会如此秩序、和谐、并且有着无远弗届的规律），就是那无限大能的、超乎一切之上的、圣洁公义的永生之神；人生的真正意义与盼望，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真正寻找到。

在上述两个后果中，前者是肤浅的、盲目的，是没有经过深思、没有谦卑思索的结果。（一个简单的反驳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的认知、意识、"自我"，来自于何处？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自于何处？） 后者是任何一个诚实而谦卑的人，都必会得出的结论。在本书的后文中，在关乎现代科学之意义与起源的讨论中，我们将要继续深入思考这个话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元培、胡适之、严复、鲁迅、等文化知识分子，及其观念、思想、观点与影响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1%E5%85%83%E5%9F%B9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仲申，又字鹤卿、民友、孑民，号隺庼，小名宜哥，小字意可，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馀，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25岁成进士，被点翰林院庶吉士。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学研究的先驱。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把中国文化教育“从封建专制时代摆渡到民主自由时代”。手定教育方针，创立现代教育制度。把北京大学学术化，奠定中央研究院之基础。提倡军国民教育、实

利主义、公民道德及人生观、世界观、美学教育。倡导自由思想、民权与女权，致力革除“读书为官”之旧俗，开科学性研究风气。

生平

蔡元培于1868年1月11日（清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即今绍兴）。

祖父蔡嘉谟在当地经商，并且有七个孩子。长子蔡光普为钱庄经理，也就是蔡元培的父亲。蔡光普，字耀山，对人十分厚爱，与周氏结婚，育有七个孩子，蔡元培排行第四。

蔡元培一生凡三娶。1889年3月与元配王昭（仲明）结婚。1900年，王氏病逝，翌年续娶黄世振（仲玉）。1921年1月，黄氏病逝。1923年7月，续娶周峻（养浩）。周氏于1975年8月病逝。他们共有五子：蔡阿根、蔡无忌、蔡柏龄、蔡怀新、蔡英多；二女：蔡威廉、蔡睟盎。

蔡元培6岁入读私塾。11岁丧父后，由曾经念书的六叔蔡铭恩（茗珊）指导学习《史记》、《汉书》、《文史通义》等等。

1883年，17岁的蔡元培考取秀才后，开始博览群书。

1884年，18岁的蔡元培设馆教书。

1885年，到杭州参加乡试。

清光绪16年（1890年）庚寅恩科贡士，因故未参加当年殿试，光绪18年（1892年）壬辰科补殿试，中二甲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马关条约》签订后，蔡元培深受震动，开始广泛涉猎译本书报，留心时事，学习日文

和西学，同情维新派。

革命生涯

1898年秋（清朝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杀害了他所崇拜的谭嗣同，使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无可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郡中西学堂（今绍兴市第一中学前身）总理，提倡新学。1900年秋，因不满于守旧派的反对和校董的干涉，辞职。

1901年夏，蔡元培来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传播爱国民权思想。次年在上海与章炳麟、蒋智由、叶瀚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并担任会长。同年秋创办爱国女学，组建爱国学社接收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由于爱国学社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引发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后前往日本留学，因为中国学生遭受无理压迫，愤而伴送被放逐的吴稚晖等归国。1904年2月，创办《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提倡民权，倡导革命。

1904年11月，蔡元培与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建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密谋武装起义。次年加入同盟会，藉学校和报纸培植革命力量。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到德国留学。在柏林一年学德语，1908年秋，在莱比锡大学研究了3年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应陈其美来电催促，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12年1月，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第三天就任命蔡元培作教育部长。2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表决确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派专使迎接袁世凯来南京就任，蔡元培任“迎袁专使”，另有欢迎员八人，包括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汪精卫和唐绍仪一同前往北京。27日，蔡元培抵达北京与袁世凯会面，次日袁世凯开茶话会，表达南下愿望。29日夜，驻扎北京

曹锟所部陆军第三镇发生兵变，肆意开枪放炮，沿途挨户抢劫，金银点十室九空，蔡元培等人驻地也遭抢劫，损失了部分行李文件等物，个别欢迎员走失。蔡元培次日早餐移居六国饭店以防不测，后致电南京等处报告所有欢迎员平安无恙，并向孙中山报告相关情况，并要求返回南京面陈各项事宜。4月，蔡元培与汪精卫等人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勤俭苦学之风，以助其事之实行也。”同时，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校。同年，蔡元培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提出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摹仿西方教育制度，任上蔡元培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并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规模。7月，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而辞职。

1913年旅居德、法，从事教育、哲学和美学研究。蔡元培在法国与汪精卫比邻而居，期间袁世凯、克定父子透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精卫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国任高级顾问被拒绝。1915年汪精卫回国后将子女托寄给在波尔多的蔡元培照看。蔡元培还在里昂创办中法大学。

1915年与李石曾等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次年与吴玉章等组织华法教育会。

北大生涯

蔡透过以下两点改变北大：

五四中心

1916年12月回国。1917年1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敦聘专门学者，提倡自由主义的科学研究。组织进德会，挽救奔竞和游荡的旧习。改革北大领导体制和学科、学制设置，创办科研机构，倡导平民教育，首行男女同校。他采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大量引进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众家。北大很快即开学术研究、思想自由之风气。他还

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复古主义，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终使北大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共产主义

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由于延聘和支持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辜鸿铭等人任教讲学，使北大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研究中心，而且由于他们这些教授作为或激进，或左倾，或保皇等不同思想的代表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摇篮。五四运动中同情学生爱国斗争。1919年7月，蒋梦麟答应代表蔡元培个人，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暂主北大校务；9月，蔡元培重回北京大学主持一切，蒋梦麟任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法国，委蒋梦麟代理校务。1921年11月，蔡元培同意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漫游欧洲

1907年自费留德，他在驻德使馆中兼职，还担任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的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由于没有柏林大学要求的中学毕业证，1908年转投莱比锡，在那儿读了三年书。因为辛亥革命才在1912年回国。

1915年参加德法勤工俭学（Work-Study programm）项目，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一职。

1923年1月，因为愤慨于当时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的不称职无耻，辞职又去漫游欧洲。

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到德国求学，专攻民族学。

1926年2月回国，参加中国国民党主持的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与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

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紧急全体会议，讨论清除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蔡元培亦有参会。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体监察委员20人，仅到8人，不过半数)，蔡元培任主席。

4月9日，蔡元培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

同年8月13日蒋介石被迫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蔡元培等人一同辞职与蒋前往上海。后任代理国府主席。

12月1日，蔡元培在上海大华饭店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上担任主婚人。当年还任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

创办大学院、推行大学区制

1927年，蔡元培倡议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10月任为首任院长。除仿效法国大学院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外，在这期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成立国际出版品交换处。11月27日和萧友梅于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即现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高等音乐院校。

创立国立艺术院

1928年于杭州西子湖畔创立国立艺术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的最高美术学府。林风眠为首任院长兼教授，并聘任潘天寿、方干民、吴大羽等人担任教授。学院参照外国美术学院的模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初设立中国画、西画、雕塑、图案四个系及研究部和预科，后又增设建筑、音乐专业。

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并在新文化的激越浪潮中创办国立艺术院。在1928年4月9日补行开学式的讲话中，他说：“大学院在西湖设立艺术院，创造美，使以后的人都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蔡元培认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在1928年大学院制订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中，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在他看来，“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鉴于“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他认为“应在长江流域再设一所国立艺术大学”。1928年，国立艺术院成立。

从政

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0月以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蔡元培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四大佬”在上海劝说李济深前往南京调停，结果李济深遭到蒋介石扣留，使蔡元培十分气愤，开始疏远南京政府。

1928年8月，蔡元培举家南下，定居上海，先后租住多个地点。最初租住公共租界慕尔鸣路（茂名北路）升平街243号。约在1930年租住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42-44号）。1933年租住静安寺路（南京西路）1025

弄静安别墅52号。1937年10月移居海格路175号（今华山路303弄）16号。一个月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30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上海与杨杏佛、胡适、曾孟朴、叶恭绰、宗白华、徐志摩、戈公振、谢寿康、林语堂、郑振铎、邵洵美、唐腴庐和郭有守等14人发起中国笔会，蔡元培出任首任理事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倡导抗日。12月15日，蔡元培在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遭北平请愿学生绑架，并遭殴打致伤。1932年12月，与宋庆龄、鲁迅和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政府的特务政治，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抗日活动，拥护国共合作。他被选为副主席。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与陶行知、李公朴和陈望道等100多人在上海举行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讲，对马克思表达敬意，严厉抨击了中国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同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前身），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抗战爆发初期，蔡元培与厉麟似、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此外，蔡元培还与厉麟似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

1936年，与陶玄、张静江和李石曾等人在上海创办世界学校，实行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把学生从小培养成出国留学及有用的人才。

香港生涯

1937年11月27日，由庄长恭、丁燮林2位研究员陪同，从上海到香港。妻周峻（养浩）和子女在12月29日也到香港。

1938年5月20日，“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圣约翰座堂）举行美术展览会。宋庆龄邀请他出席并且公开发表演说。时任港督为罗富国爵士。

1940年3月3日，年迈的蔡元培于寓所失足跌倒。3月4日便被送入香港养和医院。3月5日病逝，卜葬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

其著作辑有《蔡元培选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9%81%A9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读书时曾取名洪辝，又改为适、适之。一生用过笔名有：希彊、自胜生、铁儿、冬心、臧晖之主人、臧晖等。中华民国作家。安徽绩溪县人，祖籍绩溪县上庄。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张少谈主义，主张先疑后信，主张科学佐证，尽信书不如无书。他拥有三十六个博士，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博士学位的人之一。

胡适是中国著名学者、哲学家、教育家、文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作出一定贡献。在哲学上第一个介绍美国的实用主义到中国，在政治上一直主张改良否定革命。

生平

早年经历

胡适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经胡，自古传说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适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时，家业茶商，家道殷实。

1891年12月17日未时，胡适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胡适父亲胡传（一说为胡珊）一生娶3位妻子。元配冯氏在太平天国之乱时罹难，胡传续娶曹氏，胡传在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人后，放弃科举之途，在中国东北宁古塔结识宁古塔边务钦差大臣吴大澂后，受吴大澂推荐走上仕途，后追随吴大澂，先后前往海南、协助治理黄河。胡传曾任上海的淞沪里卡（税收机关）总巡。胡传再娶胡适生母冯顺弟，是胡传第三房妻子。所以胡适出生之时，父亲胡传已经50岁。

189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兼办安嘉总馆，办理台南盐务，此时2岁的胡适才随母亲去台湾胡传任所居住。1893年，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也随父母亲前往台东。然而，因清廷甲午战争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年胡适随母亲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未久，父亲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13岁的胡适在家人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江冬秀虽为乡村女子，但却是书香门第，虽不是博闻强识，也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之后，胡适跟随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胡适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十年后才正式取得学位），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中年经历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

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5年至1936年胡适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胡适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袭，众人在此常常讨论时局，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于是为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与当时主战派及民众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高调。

蒋介石于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5日，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由美国返回中国抵达上海。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同日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事件电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称，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游行"查系有人鼓动反政府及反美运动"；"此系美兵个人行为，纯属法律案件，并非外交问题。现美军已将凶犯交军事法庭审判，自应听候依法解决。诚恐有人扩大煽动，特电注意防范"。1月6日，对北大今后学生运动，胡适称：不应以罢课为手段。1月24日，蒋介石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58页）5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电请教育部调查教授待遇。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委员会比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及人文科学、教育、大众传播、图书馆及博物馆、艺术与文学6个专门委员会，并选出执行委员胡适、朱家骅、吴贻芳、朱经农、梅贻琦、杭立武、竺可桢、张道藩、萨本栋、瞿菊农等10人。9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向达、孙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该校校长胡适称："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更谈不到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请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阁揆，胡适也同意了，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选总统而变卦。

11月，中共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蒋派专机接运留在北平之学人胡适、陈寅恪、钱思亮、李济、劳干等到南京。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3日时，本来还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南苑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孤臣已无力可回天。4月，胡适在美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

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4月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发表谈话，略谓：“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次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仍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6月19日，新任阁揆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短期的中文图书管理员，来源：唐德刚《胡适杂忆》45页）。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介石的政权，不过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当时美国对蒋完全丧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以对抗共产党扩张，因胡适无此兴趣而不了了之。

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曾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介石讨论后，遭到蒋介石的反对，以致组党的事胎死腹中。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为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

1956年9月20日，陈源依老友周鲠生之托，致信胡适。然而，胡适并不相信

周鲠生所说的话，他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下面划线，并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7年11月，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晚年经历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介石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

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2月出院。

逝世及后事

1962年2月24日，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湾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蒋送来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李氏望族后裔），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A%B4%E5%BE%A9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乾，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愈壄老人，福建福州人，祖籍河南固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曾为复旦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校长，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生平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舰”、“扬武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员”官衔，事出有因：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

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

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

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

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

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

著作

天演论序

专栏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翻译

《天演论》，赫胥黎，光绪丙申（1896）译序，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出版，清光绪24年（1898年），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27年（1901）（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以《天演论悬疏》为题在《国闻汇编》刊载。原著书名为Evolution and Ethics，1893初版，依1894年再版译。）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10月（原著书名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版）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译，南京金粟斋出版，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12再版（原著书名：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lnductive，1843）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緒二十九年

（1903）（原著书名：On Liberty，1859）

《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斯宾塞，上海文明编译书局，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订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原著书名：The Study of Sociology,1874）

《社会通诠》，甄克斯，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原著书名：A history of politics，1900）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光緒三十年（1904）至清宣统元年（1909）（法语：De l'esprit des lois,1748，译依Thomas Nugent英译本The Spirit of Laws,1750）

《名学浅说》，耶方斯，上海商务印书馆，清宣统元年（1909）（原著书名：Primer of logic.1876）

丛书

《严几道诗文钞》

《愈壄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他人汇编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2%81%E8%BF%85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本名周树人，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后改字豫才，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浙江绍兴人，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山巨匠，亦是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主要成就包括杂文、短中篇小说、文学、思想和社会评论、学术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古代典籍校勘与研究、散文、现代散文诗、旧体诗、外国文学与学术翻译作品和木刻版画的研究，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蜚声海外，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界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韩国文学评论家金良守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与日本著名的“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齐名。鲁迅更被誉为中国的“民族魂”。

生平

早年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周家西门口西轴线上，今属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

鲁迅故居西次间楼下，鲁迅纪念馆西侧）的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祖父周福清，同治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捐内阁中书。

鲁迅童年生活于百草园、咸亨酒店、外婆家一带的农村等地，成为后来鲁迅的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散文集《朝花夕拾》的重要素材来源。鲁迅颇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爱读新思想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

1892年（光绪18年），10岁就读于家乡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

1893年（光绪19年），周福清因为向浙江乡试主考官殷汝璋行贿，谋求其子周伯宜录取，被殷汝璋举报，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科举舞弊案判处了“斩监候”，周家为了使周福清得以活命，每年花费大笔资金疏通官府，直到八国联军事件之后，周福清才被赦免。但这八年的支出，周家家道衰落，同时期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8年，鲁迅后来在自叙传略写道：“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1898年4月，鲁迅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进入金陵“无需学费的学校”：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因为远房的叔祖周庆蕃（号椒生）在这所学校教汉文，兼当管轮堂监督。并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候考学堂本不难，只要有人去无不欢迎，所以鲁迅考入水师，本来并不靠什么情面，不过假如椒生不在那里，也未必老远的跑到南京去。”鲁迅后来这样回忆起当时离家的情景：“我要进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8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

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件事，终于到N进了K学堂了。”

5月份入学，经过三个月的试读后补为正式生，分在管轮班。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段经历有相当多的描述：“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现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教师思想太陈旧太迷信，只会照本宣科，有位汉文老师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让鲁迅哭笑不得。海军学校学生按理应天天习水，学堂原有大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还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来镇邪。第一学期期末，学校新来一个派头十足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他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装成学者的架势。有次上课点名，他把学生“沈钊”的名字念成“沈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后来鲁迅和同学们都称这位教员叫“沈钧”。于是总办在两天之内宣布：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再犯一次小过，就得开除了。1898年10月，转考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于1899年2月开学。该学堂实际也就招生了一届（1898年10月至1902年1月共24人）。与陈衡恪结下友谊。学校的主要目的是采煤，所以学校的功课以矿务为主，鲁迅感到非常新鲜。鲁迅自学了《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和先前父亲生病时医生的议论和方药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在该校三年学习，鲁迅掌握了德语，后来据此翻译了《死魂灵》；很刻苦的整本抄地质学的讲义，学了些科学知识；教员中有新党，喜欢看时务报，鲁迅也受到维新和革命的影响。三年时间里鲁迅学了《矿学》、《地质学》、《测算学》和《测图学》等课程，考试成绩优秀。鲁迅散文《朝花夕拾》回忆：

“到第三年我们下矿井去的时候，情况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有点漏水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鬼一般工作着。”

1902年1月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鲁迅的毕业执照（毕业证）写着：

“学生周树人，现年廿一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

毕业后考取了“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奏奖五品顶戴”的官费对日留学生。鲁迅后来回忆说：“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留学日本

鲁迅与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著名作家都为留学日本派。1902年2月，20岁的鲁迅赴日本，在写给弟弟周作人的信中，他说自己要入读成城学校——日本为留学生开设的一所陆军士官预备学校。当时凡进成城学校的留学生，均由中国留学生陆军监督审批，所以鲁迅未能进入。只好先入东京弘文学院（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速成性质的学院，普通科二至三年，速成科有六个月、八个月、一年、一年半不等），入编江南班（班次以学生省籍编排）。鲁迅是江南班中第一个剪掉辫子的。

鲁迅与许寿裳、陶成章等浙江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浙江同乡会，会上决定出版百科全书式的月刊《浙江潮》，成为留日学界宣传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鲁迅从创刊时起，就订购保存并积极撰稿支持。所撰稿子除了从德文版翻译各种欧美小说，还有矿物地质论文等。

1903年，鲁迅参加了鼓吹革命的“浙学会”。在《浙江潮》上，鲁迅以笔名“索子”于1903年发表近万字的《中国地质略论》，是中国首次使用“侏罗纪”、“白垩纪”等地质年代中文名称（从日文翻译），中文首次使用“猿人”、“化石”，明确提出地质学一词并下定义“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在前文基础上，1906年鲁迅与路矿学堂同学顾琅合著完成著作《中国矿产志》，此书被晚清、民国初期的教育部门指定推荐为“国民必读”和“中学堂参考书”。这两部作品是中国人写的最早地质专业论文之一（实际上在数月前已有地质文章发表）。1903年，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序言中的《说鈤》一文，刊发于《浙江潮》刊物上；这里的“鈤”是指化学元素“镭”，距玛丽·居礼获诺贝尔奖只隔了半年。

习医

1904年4月，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获得“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文凭。按清政府给予的官费资格，鲁迅应该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鲁迅决意学医，理由是：

西医对日本的维新有助力；

毕业回国后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中医误治的病人的痛苦，还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因看不惯一些留日学生的吃喝玩乐，所以选择远离东京、地处东北偏僻小城镇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改制东北大学医学部）。中国驻日公使兼留学生监督杨枢向该校校长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校。鲁迅成了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学制四年，学校不收鲁迅学费。在仙台给鲁迅影响最大的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鲁迅对医专生活的印象，第一是死记硬背：“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第二是课时太多，无暇译述：“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

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1904年年底，鲁迅成为光复会第一批会员。

习文

1906年鲁迅在医专课堂上观看老师播放的日俄战争的幻灯片，里面有中国人给沙俄当坐探，被日军逮捕以间谍罪枪毙砍头，大量本地中国人围观。鲁迅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决定弃医从文。

1906年3月，医专作为大二生退学。告诉许寿裳：“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再次旅日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蹈海自尽，鲁迅参加了陈天华追悼会。

1906年，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鲁迅被母亲鲁瑞用“母病速归”的电报召回，在7月26日遵照母亲的意见而与时年28岁的朱安结婚，但一生几未与朱安有行夫妻之实（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称“多年来只有两三次”）。新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又和二弟周作人等东渡日本（相传为鲁迅住了三天就前往日本，但参照周作人日记，鲁迅当年并非婚后第四天东渡，而是住到秋天才动身的，八九月份之间） 。鲁迅非常不喜欢这位传统的妻子，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浙江绍兴老家，鲁迅都尽力防止与朱安见面，而朱安大部分时间就是照顾鲁迅的母亲。在日本的数年，鲁迅在东京居住，职业不明。

1908年，章太炎流亡东京，鲁迅在章太炎家听《说文解字》《庄子》《楚

辞》等，成为章太炎的学生。1908年8月和12月，受章太炎影响，鲁迅于《河南》杂志发表《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

回国任职

1909年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优级生理学、初级化学教员，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学教员，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今绍兴文理学院）校长等职务。后写出第一篇小说《怀旧》（文言文小说）。

1912年，鲁迅到中华民国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1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沉迷于收集研究拓本之中。后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

1914年，鲁迅与其他章太炎弟子钱玄同、许寿裳促成教育部通过章太炎的记音方案，作为国语的标音符号，即今日仍在台湾通用之注音符号前身。

发表创作

1918年，36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史上第一篇用现代形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他还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24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等人创办同人周刊《语丝》。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紫禁城，北京方面安排鲁迅与泰戈尔会见且合照。当时中国文坛对于泰戈尔访华的评价趋于两极化，鲁迅将其访华评价为“做了一瓶香水”。

在教育部

鲁迅共做了14年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公务员，主要的业绩有：担任国语

统一会教育部代表，协调制定注音字母（与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共同提议并执笔文案“统一读音，不过改良反切，故以合于双声叠韵的简笔汉字最为适用”）；与钱稻孙、许寿裳2位科长合作中华民国国徽设计案，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说明书全文详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并设计了当时北京大学的校徽，系“北大”二字的美术字体；分管图书情报（图书资讯）业务：督导京师图书馆（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等。1925年4月章士钊章受北洋政府任命成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支持当时被任命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压制反对其校务施政的学界浪潮。鲁迅在当中是非常积极带领学界与章多次交锋抗争，而被章免职。

到8月章强令关停北京女子师大，为此鲁迅向中华民国平政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胜诉，依法可以复职，但他选择离开政府体系。好友易培基接任教育总长后，签署了让佥事周树人复职的命令，并以兼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身份发出新的教授聘书。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易培基等都被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通缉，不过鲁迅并没有被通缉。蔡元培将教育部改革为大学院期间（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工资300圆。大学院改回教育部后，这笔工资名义改为“教育部编译费”，仍按月支付，4年鲁迅共领薪水14700圆大洋。1932年起，鲁迅不再兼任教育部“特约编译”。

1919年11月，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宅，合力购置北京西城八道湾11号三进的四合院，全家居住于此。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写信与鲁迅绝交。据称兄弟失和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调戏弟媳羽太信子，而另外的说法，是因为鲁迅对羽太信子持家奢侈不满。随后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居住。

在厦门和广州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抗议三・一八惨案，对北洋政

府失望，于是南下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数月后，1927年1月16日，45岁的鲁迅离开厦门，18日抵达广州，19日晨在孙伏园等人的陪伴下移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并与自己29岁的学生许广平同居。

当时是中山大学校长朱骝先（朱家骅）请鲁迅到校，朱在中山大学欢迎会上尊称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不久又聘顾颉刚来校，顾北大毕业才6年就当研究教授，鲁迅很不服气，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2月18、19日，赴香港在上环基督教青年会礼堂举行两场题为“无声的中国”及“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

在上海的晚年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是谓四一二事件，几天后又发生了广州四一五事变，来到上海的鲁迅开始批判国民政府。

1927年10月，鲁迅搬至上海居住9年左右，他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区域（所谓“半租界”，是指今天虹口区北部鲁迅公园一带），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保护他写作避免遭到迫害，还有他不少的日本友人。鲁迅在虹口先后有三处寓所：横浜路景云里、拉摩斯公寓以及施高塔路大陆新村。

眼见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国民政府不顾民众意愿肆意行事，于1930年2月13日，鲁迅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鲁迅与左联部分成员有很多思想上的冲突。1927年到1936年间，鲁迅创作了很多回忆性的散文与大量思想性的杂文，翻译、介绍外国的文学作品。

鲁迅在上海期间，和宋庆龄、陈赓有交往。鲁迅所主持的文学团体和郭沫若、郁达夫主持的文学团体有矛盾。鲁迅扶植奖掖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白莽、萧军、萧红等，批评过当时笔名为“狄克”的张春桥。自1931年起，鲁迅大力倡导木刻版画，是为中国创作版画的先锋。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1月30日，鲁迅和周建人两家共十口人躲进鲁迅的密友内山完造创办的内山书店的三楼避难。2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一家以及仆人等十人又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分店避难。

1933年4月，内山完造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替鲁迅租下大陆新村的住所（今上海鲁迅故居）。鲁迅自1933年4月11日至逝世前一直居住于此。

逝世

1936年10月19日清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荐的沈钧儒、李公朴二人。在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他一个文艺界人士举行前所未有的隆重的葬礼。出丧前一天（10月21日）下午16时，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沈钧儒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去办好"，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办好。姚士彦决定用大幅白绸幛，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于是，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店赶制。绸幛送到治丧委员会后，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

1936年10月21日下午，参加鲁迅葬仪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虹桥万国公墓。鲁迅灵柩上覆盖写有"民族魂"的白旗，轰动一时。到达万国公墓墓地时，现场人山人海，约两万人。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立在高台上，由蔡元培、宋庆龄先后致悼辞后，沈钧儒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万国殡仪馆启灵（抬了鲁迅先生的灵柩放入墓穴）时的抬棺人共12人，分为左右两排，最前面的两个是李尧棠（巴金）、鹿地亘，后面依次为胡风、曹白；黄源、

张天翼；靳以、姚克；吴朗西、周文；萧军（田军）、黎烈文。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1956年，鲁迅墓迁移重建于上海虹口公园。

鲁迅的遗嘱共有7条，其中前几条交代丧事从简；第5条交代幼儿周海婴"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第6条是对别人应许的事物不可当真；最后一条是万勿接近"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关于鲁迅之死，亦有一些争议。鲁迅之子周海婴曾撰文，怀疑是其信任有加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致其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早死，后经证实，鲁迅的真实死因应该为由肺结核和肺气肿诱发的严重气胸。

著作

鲁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灵活，风格鲜明独特。在他的人生中，创作的作品，体裁涉及小说、杂文、散文、诗歌等。有《鲁迅全集》二十卷1000余万字传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如《记念刘和珍君》，《祝福》，《少年闰土》《阿长与山海经》等，对新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小说

鲁迅以小说创作起家。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深远。其后，鲁迅连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鲁迅逐渐放弃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鲁迅后期小说结集为《故事新编》。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名篇迭出。他前期的小说往往没有离奇曲折的剧情，而是以清末民初的底层百姓生活为主，注重细节描写，能在点滴间以白描手法鲜明刻画人物，并挖掘微妙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底层人民思想的麻木愚昧和生活的艰辛。“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后期作品则以借历史典故映射现实生活，风格从容充裕、幽默洒脱，大异前期。

代表作有《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故乡》等。主人公阿Q、祥林嫂、孔乙己、闰土等在中国妇孺皆知。

特色

鲁迅小说主题多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传统，反迷信，反映人性的阴暗面，善于讽刺，用笔深刻冷隽而富幽默感，善于创造典型人物，描写人物的面貌言语、心理和行动，并善于描写环境、场面及渲染气氛。

鲁迅深受日、俄文学作品影响，体裁新颖独创，句法简洁峭拔，故事多以故乡为背景，且多属有所本者。

杂文

鲁迅首创了以论理为主，形式灵活的新文体——“杂文”，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杂文数量极多，题材广泛，形象鲜明，论辩犀利，文风多变，毛泽东誉之为“匕首”和“投枪”（匕首投枪一说本于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的《小品文的危机》），深入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

鲁迅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题材广泛，对社会的黑暗面、民族的劣根性，观察深刻。形式灵活多变，有多样风格和笔法，有的隐晦曲折，有的幽默诙谐，均能在使人会意的一笑中达到讽刺的效果。有的沉郁严峻，在似乎从容的叙述中，蕴藏着对敌人的无限愤懑。

鲁迅杂文感情炽热，汪洋恣肆，咄咄迫人，冷隽辛辣，说理透彻，结构严密，简炼含蓄，善用比喻，形象性强，富于逻辑性，气势恢宏凌厉。

代表作有《二心集》、《华盖集》等。

华夷之辨

鲁迅杂文多次批评中国人攀附满蒙战功。1929年7月中俄为东北铁路战斗时，清惧。《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一文称，成吉思汗诸子陷莫斯科，有欧亚混一之势，是“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鲁迅回一篇杂文《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认为当时中俄两国境遇正一样，都是被蒙古人征服，反问为何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满脸光彩地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倘照此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包有中国的版图。1934年9月鲁迅所写《中秋二愿》，讥讽“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之说法，“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之做法，鲁迅之中秋愿望是“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同年《随便翻翻》、《拿破仑与隋那》亦有蒙古西征非中国荣光之说法。

鲁迅杂文又指满清入关实乃中国人被歼灭、做奴隶。1925年《忽然想到》说：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1934年《算账》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散文

鲁迅散文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鲁迅在空虚失望之余以小品文吐露心声，反映时代。主要作品结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

《朝花夕拾》以追忆儿时往事为主，笔调优美，感情沉郁，平易晓畅，风趣生动。代表作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野草》则以尼采式的散文诗形式，以抒情为主，"是散文，是诗；既有思想，也有诗的感情和意境，诗的美。而又既不是散文，也不是诗，是思想感情集中的散文诗"，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批判反思，反映了作者当时虚无主义的悲观心境。语言色彩艳丽而冷峻峭拔，意象独特而富有暗示性，意境晦暗幽深，被誉为鲁迅"最伟大的艺术品"。对日后中国白话散文诗的发展有着一定影响。

诗歌

鲁迅并不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其诗作传世无多，主要以旧体的近体诗为主，多有佳句。早期诗歌深受古诗影响，多吟咏离情感伤。留学日本时作《自题小像》，"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真切动人，境界大开。《四一二事变》一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写出乱世友人遭逢政治迫害情景，令人为之动容；赵聪《三十年代文坛点将录》说，时人称"三百年来无此作！"

1922年创作《彷徨・题辞》："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描述文学创作路上呕心沥血孤行，也是著名代表作之一。 相较同时代的其他诗人，鲁迅的诗歌在当代被引用的频率很高。"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题三义塔》），是常被引用来表示国共和解，和海峡两岸和解的名句，如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是否会对台湾释出更多的经贸优惠政策"，

温家宝回答中引用这句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则常被引用以自况。

学术研究

鲁迅在学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

译作

鲁迅也以译作著名。在鲁迅留下的1000多万字作品中，有一半是翻译文字。他在前期主要翻译欧美文学及日本文学作品，如尼采、凡尔纳等，后期则主要翻译东欧文学及苏联文学的革命文学作品。他的翻译强调忠实原文，有时甚至连原句的结构也不加改动，以“硬译”风格闻名。他曾希望借引入欧式的长句，来增加汉语对复杂关系的表现力。据统计，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

此外还有《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等存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下》】

中国近现代的科技思想观念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观念被赋予了强烈的富国强兵、“落后就要挨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色彩。

从晚清时代开始，大批留学生回国以后，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与思想带回了中国。然而同时，许多西方思想中的糟泊也被带回中国，被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误认为，或是被曲解为是真理。这些误解，影响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超过一百年。

其中最为典型代表的，就是严复先生。当年，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在晚清引起巨大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给当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带来巨大冲击。该书虽然以生物进化论为内容，但却讲述了一个看似非常有道理，并看似非常具有时代契合意义的概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二十世纪初，这个概念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中国“有识之士们”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像胡适之（即后来的中华民国的著名政界、知识界人士胡适）这样的人，专门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适之”，以表明“适者生存”的思想精髓。

严复先生译作思想中所宣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影响了过去一百多年中、很多代中国人心中最深刻的思想意识，甚至直到今日。例如，就在严复译作出版以后不久，孙中山先生提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此呼吁中华民族推翻满清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民主政治是世界的潮流，中国人如果不急起直追，赶上这个潮流，就会被世界甩在后面。

几十年后，毛泽东先生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是基于这样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权即真理、用实力说话”等等中国大众所共同拥有的潜意识思维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有另一句著名的话：“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并且，中国共产党建国所依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建基于这样的“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历史，正如人从猿不断由低向高进化一样，不断地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由低向高发展。那个曾经在西欧大陆上空飘荡的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所说的），却在东欧俄罗斯、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等地开花结果了。

我们将在本书后文、第十二章中简要地涉及西方现代思想学术界的现状，

也将会简单地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中的糟泊及其影响。在这里，让我们继续聚焦于中国在近现代的主流思想观念。

严复所翻译、提出的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影响如此之深刻、如此之广泛、如此之深远，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中国人的言谈中，在媒体舆论中，处处看到它的影子。例如，中国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很多中国人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以实力说话”；等等等等。

【关于达尔文进化论，我们以后将在其它书籍中专门讨论和反思。在这里，我们仅仅是简单地指出一个事实：——不论达尔文进化论看似多么高深、多么有道理，但是，直到今日，却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无论是实验室证据，还是考古学证据，化石证据等等，能够证明生物物种之间的进化。】

严复所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国家政治局面背景，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个思想之所以在中国受到如此巨大的欢迎，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确与中国古代所谓“天人合一”思想是不矛盾、甚至是很契合的。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生的哲理就是在于，人应当效法自然世界、应当与天地之理合一。所以，现代中国人认为，既然，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进化、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所主导的世界，那么，每一个世人就也应当如此，不断地努力奋进、拼搏奋斗、争取成为人生的赢家。

——————————

固然，人应当勤勉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努力地做好各样所应当做的事情，努力地秉公行义、以恩慈待人，努力地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等等。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所谓道理，真的是真理吗？难道，这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吗？让我们接下来，继续深入回顾和反思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观念背后的深层次、本源性问题。

================================

严复的《天演论》与《原强》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乾，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愈壄老人，福建福州府侯官县（民国初年与闽县合并为闽侯县，今福州市）人，祖籍河南固始。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曾为复旦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校长，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维基百科）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严复所写的两个著名段落。

一句话是出自严复的长篇议论性文章《原强》，总结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

状态："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

另一段话则更为著名，是严复所翻译的赫胥黎原著《天演论》之导言的开篇段落：——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列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上述文字的大致意思是：——赫胥黎坐在室内，眺望窗外的山坡草地，联想到，在这些草原上，在两千年前凯撒大帝来到英伦之前，是怎样的情

境；在那草木之中，虽然看似平静，但却充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充满着弱肉强食的生死之战；这些灌木丛林，不仅要互相争夺土地和生存空间、彼此争雄，而且要与严寒酷暑的天气相争，与四面吹来的海风搏斗，承受鸟兽的践啄与蚁蝝的啮伤；如此"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如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有谁会在乎它们呢？有谁会关心它们呢？有谁会诘问它们呢？

——————————————————

上述令人触目惊心、发人深省的文字，就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一大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第一代中国留学生所带回给中国人的"西方思想"。

在过去一百年中，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把这样的思想视为至宝，更把中国古代文人哲士的所谓"天人合一"观念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从此，——中国人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金科玉律，是不可动摇的科学真

理；把人生看作是竞技场，是你争我夺的赛马场；把世界民族之林看作是彼此争雄、互相别苗头、互相争风吃醋、互相为己国争光、互相不服气的、丛林法则所主导的世界；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列强争霸、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把真理看作是强权的丫鬟，把输赢看作是人生的至理，把“活着”看作是人生的最大目的。甚至，思想深刻的诗人会这样写下万般无奈、深深悲哀、流传广泛的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在现代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中，一定对于这样的话语非常陌生：——

圣经—诗篇

8:3 我 观 看 你 指 头 所 造 的 天 ， 并 你 所 陈 设 的 月 亮 星 宿 ，

8:4 便 说 ， 人 算 什 么 ， 你 竟 顾 念 他 。 世 人 算 什 么 ， 你 竟 眷 顾 他 。

=================================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另一方面，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虽然折服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大批中国留学生们【这些中国留洋学生，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新学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大中城市里院校的毕业生们，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等等无数从事政治、干革命、深深改变了中国近现代代史的政治家们、军事家们】从西方所引进介绍的斗争哲学、进化论思想、等等"现代人类科学文明与先进思想"；——但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他们却从未放弃过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八个字出自晚清洋务运动时期。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百度百科）

在过去的一百八十多年中，在大批的、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家国梦想中，其实在道德意义上，他们从未真正重视、了解和尊敬过西方文明。

之所以如此，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但却非常复杂的深刻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往往好坏参杂；有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肯定；有的则有深刻的错误，需要清楚地指出。

____

中国自身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深刻思想传承的、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复杂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的思想文明体系。

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非常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是一个坚定而稳固的思想文明政治体系。欧洲则是一个不断分分合合、吵吵闹闹的众多小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称外国人为“夷人”，正如古罗马帝国称北方民族为“蛮族”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近现代以前，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外交政治，因为中国的那些邻国、外国，在政治经济影响上，在人民文明与富裕程度上，都是中国人眼中所谓的蕞尔小国。自古以来，华夏汉族自视为中央帝国，而外族都是前来朝拜、万国来朝的、偏远地区的、尚未完全开化的百姓而已。

中国有着光辉的思想文字历史，有着像《论语》《老子》《周易》《诗经》那样古老的、深邃的、明哲的人生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传承。这些古代文字所代表的深刻思想，所表达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孝敬、忠

诚、诚实、顺服、忍耐、坚韧等等精神，对于社会、家国、人间道德社会的纲常秩序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显然的、无可置疑的重大意义。这些古代文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对于人生思考的重要助益，在人类历史上，绝不亚于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西塞罗、托勒密等哲学家的思想，甚至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许，它们的重要意义、深远价值、重大教益，就人类整体历史而言，仅仅次于圣经本身。

中文是一种表意文字，而不是像西方文字那样是字母拼写文字。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虽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绵延辗转数千里，虽然有许许多多的方言，甚至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县市、隔着大山的不同村落，都有自己的口音方言，但是，却“书同文、车同轨”。相比之下，西方的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等，由于都是以字母拼写为形式，因此逐渐地，各自发展成为独立、平等的语言、邦国、文化体系。

中文的表意文字，相比于西方的拼写文字，虽然对于孩童来说更加艰深难学，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高文盲率，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导致文字出版和印刷自动化更加困难复杂，但是，却是一个重要的、意义重大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这个纽带使得整个大中华主义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断开的思想文化整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力极强的文化传承体系。

———————————————

力量与真理

第二，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曾经有过大量的碰撞、摩擦、互动过程，以至于今天的中国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革命与变化；但是，其实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从未进行过真理层面的、坦诚的、直接的冲突与对话。

虽然，中国在近现代史中，曾经多次是西方军事的手下败将，甚至曾经是西方文明的"学生"、日本的手下败将，但是，恰恰因此，那些复杂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军事历史，没有导致中国人在道德意义上尊敬、重视西方文明，反而是，更加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乃至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忧国忧民、同仇敌忾的心志。

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日之战、以及一系列的被迫开放国门的条约，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

国的八年抗日战争，等等复杂的近现代历史，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内心伤痛、满怀屈辱。

这些复杂的、许多因素缠绕其中的、饱受屈辱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一方面让中国人对于当年的清朝政府、民国政府、腐败官员、糊涂政治决策等等痛恨得咬牙切齿，另一方面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以及深受西方文明影响、明治维新之后"以西方为师"的日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

今天，在普通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那些见识过外面世界、内心诚实而开放的普通中国人心中，人们对于西方文明的复杂心态，包含着互相矛盾的、很难调和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思想体系是璀璨的、是博大精深的，是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的，是文明的。看起来，西方文明中包含着很多好的"哲学"，很多好的思想、内容、政治体制、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科学、等等。因此，许多功成名就的家庭都梦想着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常青藤大学去留学、接受深造，等等。

第二个方面是，人们不可能忘记那些屈辱的近代历史，不可能忘记那些窝囊的战役、羞辱的条款，更不可能忘记，中国的大门正是被洋人的枪炮所打开的。换言之，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从道德意义层面而言，中国文明从未曾真正地被西方文明打败过。那曾经打败中国的，仅仅是枪炮与科技而已。这正如，在五胡乱华的时代，或是华夏文明败于蒙古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败于满清八旗军队的时代，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是因为蛮夷人有更高的文明、有更温良恭谦让的仁爱，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加野蛮而已。

虽然，在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常常在表面上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在良心深处中都知道，其实，强权、力量、武力，绝不简简单单地等于真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认为，中国文明在近现代历史中从未曾被真理打败过，而仅仅是被强权、力量、武力打败过。这样的历史，既绝不能够说明中国文明不好，也绝不能够说明西方文明好。恰恰相反，对于许多重视民族主义、有强烈家国梦想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好，西方文明不好。

在这里，我们不必去分析所谓鸦片战争的复杂来龙去脉，也不必去探讨八国联军侵华的起源，而仅仅是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可的历史文化层面上，探索为什么中国人至今对西方怀有敌意或蔑视，以及，这样的心态正确在何处，错误在何处。让我们接下来继续分析。

———————————————

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泊"

第三，当面对西方文明的时候，当思考如何吸收西方先进科技与文明体制的时候，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但是，普通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思想家们，却从未曾认真地想到过、反思过、辩论过，在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中，究竟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泊、以及为什么。更进一步说，甚至，中国人很少去认真思想，所谓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常常大而化之地以为，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就是那些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发明等等。一些内心开放的中国人，还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法律、经济等等方面的内容，也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但一般而言，这就仅此而已了。

而关于西方文明的糟泊，中国人则常常误以为是，自由散漫、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吃苦，或者从更深层意义说，也包括西方历史上曾经有的宗教专制、封建愚昧等等。在这方面，很多现代中国年轻人追随、仰慕西方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个人解放，甚至性解放、性自由等等。

简言之，中国人很少去深刻地、公道地、客观地研究，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其中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主要构成要素是什么，等等。甚至，中国人大多数虽然都听说过、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于西方文明的核心意义，但是，却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了解极少、乃至不知所云。

这固然是由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有机体，而绝非是一个单纯的、静态的、内容一致的铁板一块；但也是因为，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历史的局限、现实政治环境、思想环境的局限性等等原因，从而导致了，那种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面认知，还没有、或很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隔阂状态，不仅是在中国大陆如此，即使在资讯自由流通的香港和台湾，也往往是如此。例如，我们从现代著名文化人南怀瑾的著作中，就能够看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西方的了解和认知，仍然有着很多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想，与实际的西方现状、文明状况等等，有着很大差异。

——————————————————————

中国古代文明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错

第四，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互动、来往等等过程中，中国人其实并不真的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什么错。

当清朝灭亡以后，很快就爆发了五四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直接催生了现代中国白话文书面语言的正式诞生与系统性普及。五四运动期间，一个重要的主旨就是，要砸烂孔家店，反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精髓，反对以孔子论语为核心代表的儒家思想。清末民初，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孔的情绪，是因为人们实在痛恨和反感清朝末年的官吏腐败、政治专制、政策愚蠢的局面。人们常常把这些专制弊端归因于孔子的儒家思想。

但是，这种反孔子、反传统的情绪是肤浅的、也是短暂的；很快，到了1920年代以后，社会上就重新兴起了对于曾国藩等传统儒士著作以及整个儒释道中华思想传统的重视。从根本上说，很多中国人并不觉得，在近现代史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古代文明传统的系统性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

人们在切身生活感受上，仍然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把儿女送到海外留学的父母们，也不希望儿女因抛弃了传统价值，而失去了顺服、听话、孝敬、尊老爱幼等等品德。

人们在国家凝聚力上，仍然深刻地、警惕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等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让中国知识分子们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加强和强调传统价值思想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愿意在西方文明面前，抱以重视和尊敬的态度；反而是，有意无意地贬低西方文明的重要地位，而特别地强调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伟大意义。

____

凭什么因为需要尊敬别人的技术、需要学习那些技术，所以就要尊敬和学习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第五，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中国需要认真、勤奋、扎实、痛下决心地尊敬和学习别人的科学技术。这一点，很少有中国人会怀疑。但是，很不显然的却是，凭什么因为要尊敬别人的技术，所以就也要尊敬别人的思想体系呢？

这正如，汉人在历史上曾经要学习胡人的骑马射箭技术，但是，汉人却从来没有必要学习胡人的什么思想体系。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思想体系，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深邃，要远远地胜过胡人的思想文化传统。

换言之，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技术与思想体系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学习和效法先进的技术，绝不等于要学习和效法别人的思想体

系。这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常识来说，都显然是正确的思路。正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很深刻，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仍然刻下深深的烙印；——尽管，我们今天或许很少直接用这八个字来表达我们对待西方时的想法与政策方针。

对于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技术与科学是一回事，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两件事之间并不一定非得有必然的联系不可。不但如此，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常常是那些不文明、野蛮的民族和国家，才往往长于技术，尤其是那些杀人放火的军事技术；而那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和国家，则看起来，往往是和平的、是与世无争的；——至少，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眼中，就常常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虽然，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中，中国知识分子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因此都认识到、都同意，需要认真而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因此而重视和尊敬西方文明，——尤其是关乎道德意义上的文明而言。

————————————————————

凭什么一定要服气

第六，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历了许多失败、羞辱、挫折、失落，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们凭什么就要因此而在心灵里投降、就要因此而在西方文明面前俯身膜拜、就要因此而服气呢？

难道，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中，没有坚强的脊梁吗？我们岂能有奶就是娘呢？我们固然可以接受和学习别人先进的技术、科学、甚至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管理经验等等，但是，难道我们接受西方，就等于要摒弃文明老祖宗的光辉而璀璨的文明礼制、思想传统吗？

如果说，当面对西方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当摒弃我们自己的文明思想体系传统，反而应当更加坚持和发扬那些古老的文明与悠久的思想、品德、信仰；——那么，这难道不就正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西方文明面前卑躬屈膝，也不需要在道德意义上重视他们、尊敬他们。

———————————————————

技术体系与思想体系的根源关系

第七，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中，虽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都认识到科学技术的深远而伟大的意义，但是，却很少有人认识到、也很少有人同意、甚至很少有人会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即：——那些科学技术与西方思想体系本身之间有着什么深刻的根源性关系。

人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因此，若有人说，在科学与西方文明思想体系之间，甚至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性的、根源性的关系，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令人难以同意的说法。

所以，当人们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类的、对待西方文明体系所应当采取的策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点头称是。但是，当听说“现代科学的开启与爆炸性发展，与西方思想文明体系，尤其是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着深刻的本源性关系”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会立刻声色俱厉地反驳说道：——中国古代也曾经有非常璀璨的科学技术历史，并且，在西方历史上，宗教信仰正是压制科学技术诞生的重大阻碍因素。

——————————————————

不卑不亢，亦或是应当俯视还是仰视？

第八，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常常是有两种极端态度，而很少有中肯的、平衡的、不卑不亢、实事求是的、公道公平的态度。这两种极端态度分别是，主流的、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往往对西方文明抱着俯视的态度；而少部分中国人则抱着崇洋媚外、甚至试图要全盘西化的态度。

一般而言，那些越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思想体系熟悉并深感骄傲的人们，就越会以鄙视的态度、俯视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文明，甚至根本不愿意静下心来去了解一下，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什么。

反之，那些越是想要崇拜武力、喜欢时髦、看重力量、喜好外在物质的人们，则就越会以仰视的心态，去看待西方文明，而把自己的中华文化看得一无是处。

上述两种立场，其实都不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明哲的心态。他们两者，也其实并不真的懂得，所谓西方文明，到底是在说什么。

直至今日，许多中国人都肤浅地把所谓西方文明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骑士精神、资本主义、个体主义、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百花齐放、自由烂漫等等的代名词。很多人喜欢西方的那些故作高深的哲学，还有的人喜欢西方的竞争与创新，更多的人则仅仅是把西方看作是物质经济发展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已。

至于圣经、基督教信仰，很多中国人或是对此完全无视、忽视，或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信息资源去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外延、历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演化有着什么深刻而内在的关系。还有的人，则简单地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划上等号，大而化之地把西方文明体系看为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用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熟悉的那种念经敲木鱼的宗教观念，去看待和揣摩基督教信仰，甚至鄙夷地把基督教信仰看作仅仅是洋教而已，等等。

涉及到现实民主政治与权力斗争

第九，在过去大约一百八十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不重视、不尊重、不了解西方文明体系内涵的另一个非常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经历着自古以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局。动荡的政治现实与权力斗争，阻碍了知识分子们深刻思考历史、反思文明的客观环境条件。

过去的一百八十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满清政府、民国政府、以及中共政府。在专制政权的环境下，政治宣传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维护本政权的生存与稳定性，为此，许多政治宣传内容就是有意识地进行反西方的信息灌输。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政治宣传对人思想的毒害影响至深，使人无法认识到历史、事实与世界的真相。

麦子与稗子

第十，在西方世界内部，存在着复杂的、好坏参杂的情况。

马太福音

13:24 耶 稣 又 设 个 比 喻 对 他 们 说 ， 天 国 好 像 人 撒 好 种 在 田 里 。

13:25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13:26 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13:27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阿，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

13:28 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13:29 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13:30 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

13:36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

13:37 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13:38 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13:39 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13:40 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13:41 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

13:42 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13:43 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中的内容 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能划等号】】】

虽然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影响如此广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化思想与文明体系简单地当成了基督教信仰本身，或者，如果我们简单地仅仅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划等号，那么，我们就犯下了严重的、望文生义、不认真负责、偏离事实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只要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三百年来，虽然有很多好的事情，比如现代科技革命的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民主自由制度、法治、自由经济、平等贸易、社会大分工协作、医疗、教育等等，还有无数的、具体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来自西方；但是，也有很多坏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神论主义、进化论哲学、性解放、放荡主义、离婚泛滥、家庭破碎、甚至同性恋等等，也都是来自西方。

显然，如果我们刨根问底、认真查考、追本溯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明白，西方世界绝不是铁板一块，西方人也绝非全都是纯洁无辜的、敬虔谦卑的圣徒。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事实上，即使我们撇开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哲学史等历史领域的角度不谈，单单从宗教信仰、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西方文明体系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极其复杂的、甚至分裂的、内部景况；——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西方文明体系绝非简单地、直接地等于基督教信仰本身。

基督教会的简史

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与教会历史中，在大约公元15世纪以前，基督教会一直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由来

东方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是从大约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归依基督教信仰以后，把罗马帝国从罗马迁都至当时的拜占庭市开始的。拜占庭市位于欧洲与亚洲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节点。它后来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这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称为拜占庭帝国；她从公元四世纪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是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没有改朝换代的重要国度之一。公元八世纪左右，这个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基督教国家，开始不断地把信仰传播到后来称为俄罗斯等、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各个国家。俄罗斯这些国家曾经在很长时期一直处于农奴制度状态（俄罗斯的农奴制度一直到后来十七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效法西方工业革命等等的时候，才开始被完全消除）；然而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把社会文明和人道关怀制度带给俄罗斯等的广袤土地。

西方教会以罗马为中心，在君士坦丁大帝迁都君士坦丁堡以后，延续和保持了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注：耶稣基督于大约公元元年左右降生，于公元三十三年左右被钉十字架）、使徒彼得时代以后建立的教宗制度。在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上千年历史中，以罗马教宗制度为核心、以拉丁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西方众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以拜占庭帝王为政权中心、以希腊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东方众教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在公元一千年以前，东西方教会基本上是兄弟般的关系。他们——都以圣经新旧约全书为共同的信仰根基与中心教义的基础；都相信和承认，圣经、也只有圣经，是上帝的全备话语、是上帝亲自的、超自然的启示与默示；都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都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

但是，在公元一千年之前，在东西方教会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既合作、又有纷争的状态。两者在各自教会权威、教义细节等等方面都有很多争议、互相对对方不服气。这种状态持续到公元一千年，终于矛盾完全爆发，互相之间彻底决裂，互相否认对方的信仰合法性。

中世纪

公元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后来称为土耳其人的突厥民族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是源于突厥人的伊斯兰信仰。从此，拜占庭帝国正式覆灭。然而，东方教会，此时已经自称为东正教，逐渐开始向莫斯科方向迁移、直至后来以莫斯科为其中心，继续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天主教会体系分庭抗礼。大约在同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体系（自称为天主教系统），于公元十五世纪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一种近现代文化革命运动。

值得指出的是，从大约公元四、五世纪至十五、十六世纪的一千年，被后世称为的所谓“中世纪”，其实并非人们所常常误以为的、专制主义压迫的黑暗时代。事实上，任何诚实的历史学家都会承认，尽管在这期间发生了几次针对中东的十字军东征、回击伊斯兰的进攻和劫掠，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大约一千年的漫长历史年代中，整个欧洲，包括西方教会影响下的西欧，和东方教会影响下的东欧，在政治与军事上，基本上是处于和平时期，几乎很少有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很少有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改朝换代的时期。在许多乡间、市镇、经贸中心，人民安居乐业，许多地

方治安良好、常常夜不闭户。

在中世纪的长达一千年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各有特色、短长、优缺点。

东方教会所处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帝王及其家族笃信基督教信仰。东方教会分成各个教区，众教区的各级牧者、长老等等围绕着拜占庭帝王，彼此和谐，处于互相和平、长达几乎一千年的安稳状态中。事实上，拜占庭帝国这个名称，是后世的历史学家给起的；当时的人们从未曾这样称呼。他们这个国家，一直自称为"基督之国"、或"东罗马帝国"。

而在西方教会，随着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时代在公元四世纪、公元五世纪的解体与破败，罗马教宗体系饱经风霜、生死存亡、无数的患难、危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一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圣徒、奥古斯丁，以及他的《上帝之城》。这本书讲述了，根据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所谓上帝的国度、上帝之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长达上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中，西欧从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但是，却有一个统一的教会体系，就是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教会体系。

我们会在其他文字中，继续深入讨论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历史之间的比较，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短长、利弊、得失；并从中反思，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以及，基督教信仰与世上国度、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文明体系之间的深刻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分水岭

公元十五世纪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式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近现代历史的开始。此时，一方面，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突厥人攻陷，因而，整个欧洲大陆与东方地区之间的贸易枢纽、中枢节点被强行隔断。从此，西欧各国开始大兴海上贸易，从而使得曾经位于西欧文明边缘地带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为海上强国，纷纷在经济政治上依次崛起。

另一方面，从公元十五世纪，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为中心，因着一个开始于美第奇家族的长达约两百年左右的统治，开始了——被后世称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文化运动，以及，与此同时的、罗马天主教体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美第奇家族供养了许多后来极为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人。这些艺术家回归基督教信仰临到欧洲之前的时期的希腊艺术风格，以绘画和雕塑人体为美、为荣。美第奇家族积极地涉足政治与宗教领域，甚至有的家族成员自己成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教皇。美第奇家族的奢靡与腐败之风，加重了罗马天主教本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的弊病。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谬误

自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当圣经新旧约全书被从原文（旧约是希伯来文，新

约是希腊文）翻译成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后，罗马教宗系统就开始逐渐把圣经束之高阁，使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触到、阅读到圣经。在公元十六世纪以前的长达一千年中，西欧各国绝大多数人民，都只能从教会的神职人员那里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教义，而没有机会自己去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

在教义方面，天主教系统添加了许多圣经本身没有、甚至是圣经明文反对的内容，例如，不恰当地高举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地位，甚至称之为圣母、上帝之母，以及，把历世历代的许多基督教使徒们、圣徒们当作偶像崇拜、向他们顶礼膜拜、祈祷、祈求庇佑（在这些方面，东正教与天主教存在着同样的谬误，即，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圣经本身的教义和教导，而在后世添加了一些违背、偏离圣经内容的教导、信条）。而且，天主教还在后世自行添加了一些伪经、次经，以及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敬拜的玫瑰经，等等。

好在，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纷争与分裂状态，虽然是一件很不好、极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这种状态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可信地保证了，圣经新旧约全书本身，一直被精心地、忠实地保存着，直至后世，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双方之间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互相监督、有力督责的效果。

并且，尽管天主教与东正教中存在许多谬误和偏差，但是，我们仍然要说，他们的主流信仰、主干教义、主要信条，例如“使徒信经”等对于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总结，是正确的。所以，在天主教与东正教里面的信众，如果真心地、真诚地、热忱地寻求和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以耶稣基督

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么，我们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良善的、真诚的基督徒——尽管，我们应当诚实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圣经的广泛翻译传播，以及近现代时代的开始

公元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堡被突厥人攻占、拜占庭帝国灭亡，东方教会保存的希腊文的圣经原典以及许多其他希腊文写成的著名基督教历史文献和著作，被教会人士抢救、传播到西方教会体系。这些希腊文的文献以及圣经原典，开始让西欧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罗马教会的圣经拉丁语译本，在一些重要教义方面的词汇概念上，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失误或偏差。

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许多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事情。我们仅举以下三件极其重要而著名的事情为例。

第一件事情是，金属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大规模、迅速地、廉价地印刷、传播纸质书籍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第二件事情是，罗马教宗的教义上的谬误，以及财物方面的奢侈腐败作风，终于激起了教会各级神职人员以及普通基督徒们的反抗。以德国的马丁路德为代表，一大批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反抗教廷、传播圣经、传播真正纯正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语，极

大地推动了圣经在社会中的普及化、广泛传播。

第三件事情是，英国的丁道尔开始把圣经翻译成英语。这些圣经翻译运动本身，直接导致了现代德语书面语、现代英语书面语等等的诞生，因为在那之前，西欧的书面语言只有一种，就是拉丁语。

圣经的广泛传播，使得欧洲的无数普通人开始真正地、详尽地明白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原则、精髓；这些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深刻地革新、更正了欧洲各国人民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方面的许多认识与观念。这样的革新与更正，直接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开启；以及，现代民主自由政治运动、法律、经济等等许多方面的变革，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

这些事情，推动了、构成了过去五百年来的欧洲近现代史，并进而，对于全世界的文明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影响作用。今天，每一个出门坐火车汽车飞机、早上吃牛奶面包、上班穿西服革履、住在高楼大厦或四季温暖如春之庭院别墅里的人，都要感谢培根、牛顿、波义耳等现代科学的开启者们，更要感谢那些舍生忘死地传播圣经、传播基督福音的敬虔基督徒们。

基督教会简史的总结与反思

从上面的简史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基督降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每当人们贴近圣经、寻求圣经、明白圣经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展现出热忱、敬虔、谦卑、真挚、积极的信仰，他们的生命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与国家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也发生极其巨大的改变；上帝的祝福就极大地、温暖地、令人震撼地临到他们。

反之，当人们沉浸在自己的罪性与私欲中，沉浸在彼此的纷争中，当人们没有真诚地、认真地、热忱地寻求上帝的话语、信仰的真理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生命就显出冷漠、消极、惰怠的样式，他们的道德就不断滑坡，他们整个社会与国家就充满了许多动荡、败坏之事。

从基督教会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反思。

一，上帝的国度，虽然表现在地上的教会中，但是，从终极的意义与层面而言，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地上的任何地方，而是属灵的、属乎天上、那永远的国度与家乡。

二，然而，这并不是说，基督教信仰在这个地上就没有：——确定的、明晰的、任何人都无可否认的见证。事实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道主义、人的生命与自由被极其重视，到艺术文化、经济与科学的大发展等等，——在无数的层面上，现代人类文明都被深深地刻下了基督教信仰的烙印。（读者可以阅读《基督教的果实》《基督教信仰之大众证据》《基督教信仰之证据的反思》等系列书籍，进一步查考这些方面的

事实与信息。）

三，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之间，是无法划等号的。前者固然在极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后者，但是，后者中包含着许多其他方面的成分与因素，甚至包含了无数的糟泊、不义、败坏、奢侈、贪婪、淫乱，等等。

那些感叹"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没有全部改变欧洲人、使全体西方人都成为基督教圣徒，或是为什么没有彻底消灭那些罪恶的恶人"的人们，并不明白：——上帝是公义、圣洁、慈爱与恩典的，他的终极道德审判必将来到，他的终极惩罚是永远的；然而，他以恩典与慈爱，给世人悔改己罪的时间与机会，使他们真心地、真诚地、而不是被强迫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上帝的无限公义与权柄，到那终极的审判日，必将昭然地显明在一切世人的眼前。

四，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对于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不太了解、不求甚解的人，常常把这两者看为同等呢？

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世人并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正主旨、福音的真正涵义：——"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人在世上应当勤勉而敬虔地生活、工作，但是却不应当把心系于这个世界，以这个世界、或其中任何被造之物为心灵的归依"；尤其是不了解基督教信仰、与世上之国关系的教义：——"基督的国度属乎天上，而不属乎地上；真诚、谦卑的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把基督的爱带给世人，见证福音

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伟大、圣洁的爱；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温柔的福音，是圣洁的福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烛火他不吹灭。”

另一方面是由于，世人因着自己生命中的罪性，因着自己的心系于这世上的国度与荣华，所以，常常误以为，神的作为和果效，是要终极地显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中。他们把世上的荣华璀璨、建筑物的宏伟绚丽、人群的华盖云集，错误地当成了天国里的永远荣耀。他们总是以为，非得要通过外在的、表面光鲜的“荣光”，来看待那些属灵的、属天的、属乎道德的事情。

五，基督教信仰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影响最大，特点也最独特的宗教信仰。它虽然指出，我们不应当以这个被造的世界或是其中任何被造之物、被造之人为我们心灵的依归，而是要单单地敬拜那位创造宇宙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它不是像佛教那样抱着虚无、万事皆空、不垢不净、不生不灭、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诸相皆虚妄的态度，以否定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一切世事。它告诉我们，应当积极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谦卑、温柔、真诚、和平的心，以勤勉、专诚的工作，去面对一切事情、一切世人。

它虽然指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造物主、生命之主、永生之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上帝是我们道德律法的颁布者、是圣洁公义而全能的终极道德审判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耶稣基督谦卑地降身为人，生在马槽里，生在律法下，取了奴仆的样式，甚至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接受他救恩的人，得到永生，得以进入那永远的天国、得享那永远的幸福与美好。

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用火与剑传教、荼毒、劫掠，而是用谦卑、慈爱、怜恤与和平的方式，把福音向世界分享。它不是像伊斯兰教那样推行、奉行政教合一的教义与制度，更不是要在地上建立起什么伟大的、属世的国家；它不是要以严刑峻法来统治臣民，更不是要让整个社会万马齐喑、丧失活力与创造力。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基督清楚地说道："我的国属乎天上，而不是属乎地上"。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基督教信仰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良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有目共睹的。

+++
+++
+++
+++
+++++++++++++++

____

人的罪

第十一，毋庸置疑的是，在每一个世人的生命本质之中、在心灵深处，都充满了骄傲自义、自私自利等等各样的罪性与罪行。因此，当人所属的原有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就会倾向于，本能性地抗拒、排斥、反抗。

在人的心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往往就是自以为义；即，人总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所属的团队是好的、正义的，包括自己的家庭、社群、祖国、思想传统等等。当人遭遇失败、挫折、落于下风的时候，往往会怨天尤人，而很少会反思自己；甚至，人常常会迁怒于外界各样的因素；以仇恨、苦毒、猥琐、自私、自义、心骄气傲的心理去看待世界。很少有人愿意接受挫折和失败。很少有人愿意面对痛苦的反思与深省。

———————————————————

地上的国与神的国

第十二，当人的心背离上天、上帝、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的心灵与灵魂系于这个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并且，世人常常会有一种深刻的误解，就是认为，上帝的圣洁国度和地上的国一样，充满外在的虚浮样式。

因此，这就往往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常常会把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政治混为一谈；而且，会把西方政治中的某些缺陷、不完美、不好的地方当作借口，对基督教信仰嗤之以鼻；并且，不但如此，反过来也对西方文明抱着蔑视的态度。

==
==
==
==
==
==
==
==
================================

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是被很多中国人所认同的、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原则和战略战术。直至今天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也是如此。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没有去认真、谦卑、诚实地去思想，西方人的长技究竟在于什么，其背后的原因、起源在于什么。

不但如此，直至今天，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仍然莫须有地、不实事求是地、不认真考察地、主观臆想地认为，在西方世界，存在着一股反对中国人的强大势力。【值得指出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在西方人反对中国人的历史中，固然有许多错误和弊端，但是，西方人往往并非是——因为对方是中国人而反对中国人，而是因为针对对方各样的错误言行而反对。】

因而，一百八十年以来，虽然屡败屡战，但是，中国人的战略出发点、战略原则、战略目标，从骨子里就一直是想要怎样制夷，——怎样打败、制服、压过那些西方来的“野蛮人”。

如果，中国人不深刻地、不真诚而诚实地面对客观事实（尽管客观事实或许非常复杂），那么，即使《大学》中所说的心诚、格物、致知，也必将令中国人羞愧。

================================

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与科学技术：——结果是什么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又一次进入了类似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改革开放运动。其中的主旨，仍然是类似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这一次在很多名义上都换了称呼，号称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然而，在骨子里面，中国仍然是抱着对于西方所谓亡我之

心不死的、莫须有的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固然是出于当政者的政治私利而导致的政治性宣传和欺骗，也实际上与普罗大众的骄傲和排外情绪深有关系），在国内进行信息资讯的封锁与政治宣传，使中国人在内心思想上，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敌意越来越深。这样的罔顾事实、缺乏公正与公道的集体心态，必将把中国政治又一次带入崩溃与混乱之中，重蹈百年前的秩序崩塌的覆辙。

=====================

一战与二战的背景和起因；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争竞；（后起与先发之间的争竞；英美之间的和平争竞；英德之间的武力争竞）；法兰西共和国的动荡历史；等等

我们并不是说，西方文明在整体上就是无可指责、没有瑕疵的。事实上，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固然在过去几百年中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消除了很多地区与人民的饥饿、贫穷以及许许多多的疾病，给全世界许多国家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的清明政治；但是，在西方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许多麦子与稗子的人和事。

从十七世纪开始的现代科学与技术革命，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然而同时，很多西方人在这样的科技革命运动中，开始变得不那么谦卑，而是变得盲目乐观、自信、自傲、自义。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都开始隐隐然处于一种非常骄傲自豪的情绪之中。首届世界博览会在维多利亚女王丈夫的推动下，在伦敦开幕。此时的英国，处于日不落帝国的巅峰时期。而欧洲的德国，则处于急起直追的状态。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人民自豪感情绪高涨。法国的人文主义哲学、甚至享乐主义，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张力，崩得越来越紧，谁也不服谁。

这样的状态与冲突，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原有的秩序世界被很大程度地改变。战败的德国人在心理上，与西欧各国的裂痕越来越深；这种局面终于在几十年后促成了希特勒这样人物的上台，并导致了规模更大、毁灭性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战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俄罗斯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并使得后来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深深影响了东亚、南美等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以及西方国家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关于西方国家左翼知识分子的发展、影响与现状，我们将会在本书后文中继续介绍和讨论）。

一战与二战的历史，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国家既非铁板一块，也非纯

洁无瑕；而是，在西方世界中存在着复杂的元素、张力以及善与恶的成分。固然，我们必须要清晰地看到，在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与人民文化中，有着大量的、美好的、良善的成分，并且这些因素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祝福【这些因素，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果实，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直接的、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西方国家政治与人民文化中的缺点、缺陷、罪恶的成分【关于这些缺点、缺陷、罪恶成分的复杂起因、机理，我们不应当主观臆断、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而是要仔细分析、谨慎鉴察、认真剖析】。

限于本书的篇幅与题材范畴，我们不在这里对那些各个方面的成分与元素一一进行展开阐述。

==============================

公义，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道德意义而言，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哲学的最大盲点就

是，它几乎彻底地无视、忽视、甚至否定了公义。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下，真理变成了强权的丫鬟，道德变成了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附属品；真理、公义、道德失去了绝对的、超越生死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思想观念，对于人类社会以及政治面貌的发展是危害巨大的。这样的观念，不仅对于西方政治与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意义深远、危害巨大，而且，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危害和影响也都非常巨大。这样的思想观念，多年以前就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民，并产生出了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口号；直到今天，这样的思想仍然在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深深地毒害着我们的灵魂。

==============================

正义、力量、输赢、争竞、道德、与信仰

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化的优异成分；看不到西方文明给人类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看不到现代人要在何等广泛而深刻的程度上，感谢——培根、波义耳、牛顿、等等无数科学家、哲学家，以及源自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现代医院体系、现代教育体系、现代经济法律制度等等；看不到在西方的无数的、大批的、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们，在科学、文化、政治、法律、医疗、教

育、服务、信仰领域，为社会、为人类所作出的可歌可泣的杰出贡献；看不到在西方各国有那么多、数量巨大的信仰敬虔、谦卑诚实、热忱真挚、敬老爱幼、爱人如己、勤奋工作、热心服务于大众和全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真诚基督徒们；——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没有良知、没有诚实态度的人。

另一方面，任何思考东方、西方文明体系比较的人，如果，看不到——西方文明中的错误、缺憾、谬误成分，比如，在诸如法国为首的、遍及西方各国的、打着人文主义旗号、放荡不羁的淫乱主义、性解放主义；在诸如德国为首的、遍及许多国家的民族自大主义、好战主义；在诸如俄国为典型代表的信仰虚伪主义、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起源于英国等国学术领域的达尔文进化主义，和盛行于德国的唯物主义、泛神主义、自然神主义、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那么，这样的人就一定不是仔细思考与观察、真诚寻求真理的人，而仅仅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武力与物质繁荣，而在心中没有正义、没有饥渴慕义之心的人。

若我们仔细地观察与分析西方历史和现状，就会看见，在欧洲各国中同时包含着许多善恶、好坏、麦子稗子参杂的情况。那些善、好、“麦子”的方面，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影响；这些有益的、良善的影响，遍及世界，尤其是在过去四百年来给整个人类都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这些益处如此深远，以至于今天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得益于这些良善的影响，尤其是表现在科学与民主所带来的生活、教育、工程、交通、职业、平等、人权等等方面的改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着许多恶、坏、“稗子”、杂草的方面。这些方面正是由于那普遍地存在于世人心中、也包括存在于欧洲人心中的罪。我们在欧洲的近现代历史中，能够清楚地看见，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之中，在英国的人文学术界中，常常会出现那种偏重于力量、输赢、争竞、好勇斗狠的文化。在欧洲内部，这种文化构成一种明显的张力，与正义、道德、信仰的力量，彼此进行拉锯战。正是由于这种坏的方面，导致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中的达尔文进化哲学，导致了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放荡奢侈的文化，导致了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土壤，导致了今天弥漫在欧洲的无神主义文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很多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明影响的时候，仍然把那些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混为一谈；或者是，把洗澡水和孩子一同倒掉、因噎废食；或者是，想要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甚至，以坏为好，以好为坏，以善为恶，以恶为善；——效法西方文明中的糟洕，丢弃西方文明中的精华。这就常常是过去一百八十年中，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互动的历史。这是多么令人遗憾、令人可叹。

当我们在口中喊着“取其精华、去其糟洕”的时候，最好要俯身、谦卑、低肩负重、认认真真地好好研究、深刻思索，真正地明白西方文明的历史、脉络、本质、与详尽而公正的全面信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洕，而不要望文生义、想当然、人云亦云，否则，结果

就一定会南辕北辙，变成了“取其糟泊、去其精华”。

西方文明中的精华，固然在于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等等，在于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体制等等，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更在于公义、正义、道德、基督教信仰。（西方的基督教会本身，尤其是天主教、东正教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关于“麦子”与“稗子”的人和事）。

而西方文明中的糟泊，则在于无神论思想和文化，在于人文主义中的进化哲学、达尔文哲学、存在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否认个人的自由、尊严、以及个体生命本质中的高贵意义，否认人的心灵、灵魂、精神、超自然信仰的重大意义，否认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并应当真诚地寻求、敬拜、归向上帝】等等，在于好勇斗狠的争竞，在于功利主义、成败论英雄、自私自利主义，等等。

____

我们应当怎样认识西方，以及西方的文明体系？我们既要谦卑而认真仔

细、一丝不苟地从大局、全局、主流、以及其中的机理、机制、体系去看，同时也要儆醒、谨慎、小心地从支流、细枝末节、各个方面、各个侧面、好坏兼有地去看。这样，我们才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才能够公道中肯，才能够真正从中得益。

如果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个巨大的麦田，那么，其中既有麦子，也有稗子。而我们应当怎样呢？是把麦子当作稗子吗？还是把稗子当作麦子呢？我们应当怎样认情本质、分辨主流与支流，分辨良善与罪恶呢？我们应当怎样面对西方社会文明体系整体呢？

—————————————————

我们所应当寻求、信靠、倚靠的对象，应当单单地是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的造物之主，应当是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赐我们永生的、三位一体的上帝。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

我们不应当以这世上任何被造之物、受造之人为我们的偶像、为我们所敬拜、寻求、倚靠的对象，而应当单单敬拜事奉我们的主。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上帝，并应当爱人如己。

======================================

信仰的见证，麦子与稗子，买椟与还珠

“买椟还珠”的故事是说，一个人去买珠宝，但是在珠宝商那里看见，那个包装珠宝的盒子看似很精美，但珠宝本身却看似朴实无华，于是，他把珠宝盒子留下，把珠宝还给了珠宝商。

这个故事说明了，在这世上，有很多人并不认真地、深刻地、谦卑真诚地

思考，而仅仅是看重事物的表面现象，仅仅是注重外在的华丽与虚浮，从而常常犯下非常荒谬的错误，以次为好，以好为次，有眼不识那重价的珍宝。

难道，在过去一百八十年的历史中，在我们面对西方文明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的固有思维模式中，我们所犯的，不正是这样的“买椟还珠”的错误吗？我们许多人仅仅是看见了那些船坚炮利的虚浮表面现象，就心生羡慕；我们看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物质文化，就急起直追；并且，在小有成就以后，就往往容易沾沾自喜、俾倪天下。——但是，我们不过就像是那个买椟还珠的人，以为自己已经买到了天下最华丽珍贵的东西，甚至骄傲自满、内心自高、自义；——然而，我们所作的，仅仅是愚蠢地把盒子当成了珠宝，却把珠宝弃之如蔽履。

____

固然，基督徒们的信仰见证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绝不应当把基督徒们的信仰见证，尤其是那种好坏参杂的、并不百分之百纯洁的见证，误认为是基督教信仰本身。我们应当仔细地分辨麦子与稗子，仔细地看清主流与支流，看清楚全局、大局、本质，也应当看清噪音、杂音、杂草。我们应当内心谦卑、诚实、求索，这样，我们才会有公道而公正的心；否则，我们

的眼睛就会欺骗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就会被自己的诡诈、欺谎、私利、偏邪所绊倒。敬畏上帝，是人智慧的开端。

=================================

什么是我们应当想要的麦子，什么是我们不应当想要的稗子

麦子，就是那些关乎敬虔、真诚、恩慈、仁爱、喜乐、和平、圣洁、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有是来自于那真正的、真挚的、真理的信仰。这样的信仰，只有是来自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之主、上帝自己的启示。

稗子，就是那些关乎亵渎、亵玩、私利、暴戾、凶恶、残忍、不公不义、欺压、强迫、强权即真理、贪婪、好勇斗狠、为私利而争竞、等等的事情。这些事情，正是出于人生命与心灵中的罪性与罪行。这些事情，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毁坏；不是良善与幸福，而是死亡与战争。

==============================

信仰与功利主义

真正的信仰，不是心系于这个被造世界中的属世之利，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真正的信仰，不是人在心中自以为义，不是功德主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而是单单地因信称义；因为，人只有靠着上帝的白白恩典、救赎，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些以功利主义看待世事的人，一定会沉沦在自私自利的世界观体系中。真正的成功与幸福，一定是与圣洁紧密相连的。但是，人如果以为，看一件事情是否是正确，取决于这件事情在短暂的此世之中的成败输赢，那么，这样的人生观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样的人生观中，人看不见道德的隽永价值和真正意义，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与公义圣洁；这样的人，必将在这个世界中沉浸在罪恶深渊里，必将会在罪恶与暴戾中碰得头破血流。

==================================

想要得到什么，却失去了它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又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在这个世界上，想要追逐成功与幸福，但是，他们所作的努力的结果，却常常是失去了成功与幸福。他们急功近利、功利主义、以成败论英雄、以力量论输赢、以力量论真理、以力量为价值判断的基准和出发点。然而，他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与真理渐行渐远，与成功与幸福渐行渐远。这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那根本、本质的事情，看不到道德的隽永价值，看不到信仰的珍贵意义。

=============================

目标与手段之间，可以割裂吗（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说开去）

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生之中，在许多事情上，尤其是在关乎真理的思想体系上，目标与手段是不可割裂的。否则，人们就会常常欲速不达，甚至南辕北辙。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思维方式，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如果是内心诚实、谨慎、谦卑的，如果愿意对这个问题仔细地深思咀嚼，那么，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想要得到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采取的手段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吗？我们的手段是正当、有效、正确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会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买椟还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4%8B%E5%86%9B%E9%98%80

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是中华民国早期最重要的民国军阀势力之一，由袁世凯培植的北洋新军的主要将领组成，袁世凯执掌政权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的主要将领雄霸一方，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因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及政权，从而导致各领导人以所据地方割据，导致分裂，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地建立势力范围。北洋军阀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权实际上就是由北洋军阀中不同派系的实力较强军阀或军阀集团所控制，在紧张时期各派人马的抢夺下，导致北京政府对各地的军阀势力的实际控制比较薄弱，形成了实际上军阀割据的局面。故而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的称呼。也就在事实上造成北洋军阀通常仍有北洋政府颁发的正式官衔，如都督、巡阅使、经略使、镇守使或军政长官等。

北洋新军

北洋新军的正式名字叫做新建陆军。原名定武军。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主要军官由袁世凯亲友、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留学军校生与淮军旧部组成。新军的教官和学生，是后来北洋军阀人物的主要来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8%BB%8D

新军全称“新建陆军”，是清朝政府于甲午战争之后编练的新式陆军军队，为清末新政的一部分。这支军队的特色是完全使用西式的军事制度、训练以及装备，是清朝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军。新军为中国军事制度带来根本性变革，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肇端。

1911年，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各地新军成为辛亥革命主力之一。最终，袁世凯凭借北洋新军拥兵倒逼溥仪退位，清朝灭亡。故中国学界将新军称为清朝的“掘墓人”。

成立经过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在天津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分别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马兵二百五十人、和工兵五百人，一共四千七百多人。次年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袁世凯接手“定武军”，在天津小站训练部队（人称“小站练兵”），改为“新建陆军”，一切依照德国与日本的制度，由德国人为主的

洋人监督，更把规模扩至七千士兵，参照德国陆军制度进行编制，并分立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之后，被编为武卫军“前后左右中”五路中的武卫右军，跟随袁世凯到山东去镇压义和团运动。在那里，袁世凯将三十四营旧军改编，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令武卫右军扩大至两万余人。在新建陆军成立的同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编练了一支名叫自强军的新军。这支军队也依照西式军队编制步、马、炮、工等13营，共二千余人。后来自强军由刘坤一接办，到最后被袁世凯所收编，划归其武卫右军。庚子事变中，武卫军诸军损失惨重，惟袁世凯所部右军及右军先锋队得以保存实力，成为清朝北方仅剩的新军武力，1902年在武卫右军基础上组建北洋常备军。

1905年2月28日，袁世凯等奏请统一全国新军番号，提出“以陆军编号通国一贯，脉络相连”，并呈请将“所有常备军各镇拟即一律改为陆军各镇，以符名实而遵定制”。即全国各镇统一数字番号。新的陆军营制在北洋常备军营制的基础上略加变化而来，一镇计步、马、炮、工、辎共二十营，与日本师团的组织相似。第一批即以北洋、京旗两支常备军改编为北洋六镇。1906年，新建的陆军部拟订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至1911年清亡时，共计成立十四个镇、十六个混成协、禁卫军2协，以及几个独立标、营。

新军采取的是行省（城市）加上番号的方式，如第一镇是“近畿陆军第一镇”，第八镇是“湖北陆军第八镇”（不是湖北地方部队，仍属中央国防军系列）等。混成协在中国不算是战时编制，因为编练新军对于各省来说，财政花费实在太大，因此从河南新军开始，采取了变通办法，先成立混成一协，以后再扩为一镇。这个办法后在全国各地推广，于是出现了一批混成协。通常混成协按清廷定制，一般是步队一协、马炮各一营、工辎各一队，实际情况各省略有差别，不完全一致。

各省各自编练新军达到协的标准，呈请练兵处（1906年并入陆军部）批准

成协，如果审批通过则授予无数字番号的混成协（如“陕西陆军混成协”）或有数字番号暂编混成协（如“四川暂编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一部分混成协是以上的两种番号都经历过，如河南先成“河南陆军混成协”，再改称“河南暂编陆军第二十九混成协”。大多数混成协是准备将来扩编为镇的，所以都加“暂编”二字，只有从北洋六镇中划出驻守东北的陆军第一、二混成协不在此例。各省编炼新军达到一镇的标准，报陆军部审核后授予暂编镇番号，如“四川暂编陆军第十七镇”。陆军部派员亲临校阅，若合格则去掉“暂编”二字，成为正规的陆军镇。至清亡，只有北洋六镇和湖北第八镇、南洋第九镇等几个镇是通过校阅的正规镇，其余各镇全属“暂编”镇。

北洋新军

北洋新军的正式名字叫做“新建陆军”，原名“定武军”。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主要军官由袁世凯亲友、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部组成。编制机构及其人员：

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河南卫辉人

参谋营务处及兵官学堂监督：江朝宗，安徽旌德人

督操营务处总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冯国璋，直隶河间人

督操营务处提调：段芝贵，安徽合肥人

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姜桂题，安徽亳州人

步队右翼第二营统带：吴长纯，安徽庐江人

步队右翼第三营后队：雷震春，安徽宿州人

马队第一营后队队官：吴凤岭，袁世凯家佣人之子，从小在袁家长大

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段祺瑞，安徽合肥人

炮队第一营管带：张怀芝，山东东阿人

工程营统带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直隶正定人

工程营统带兼行营中军：张勋，江西奉新人

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曹锟，直隶天津人

基层军官：王英楷、张永成、赵国贤、何宗莲、李纯、陈光远、李厚基、王占元、卢永祥、王汝贤、杨善德、田中玉、鲍贵卿、陆建章、田中玉、钟麟同、马龙标、孟恩远等。

戊戌变法前夕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跟武卫左、前、后、中，通于归属总督荣禄管辖。

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

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

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

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

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

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

1907年，从六镇各抽调一部分官兵，编成第二十镇。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任第40协第80标第三营管带。

1909年，袁世凯被开缺回乡。北洋六镇高层，有所调整。

第二镇统制：马龙标

第五镇统制：

第六镇统制：吴禄贞

新政中的军事改革

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决心推行新政，进行军事改革。光绪二十九年十月成立总理练兵处，并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负责训练新军；并且裁减原有的旧军（防军、练军、绿营），剩下的精选若干营为常备、后备军及巡警营（即宪兵）。清政府原订计划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各省的新军为地方军，一共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到清朝覆亡的时候，全国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其中装备与训练为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最佳，遍布直隶、山东与东北。

近畿陆军第一镇：驻北京仰山洼

直隶陆军第二镇：驻保定、永平等府

近畿陆军第三镇：驻吉林吉林、长春、宁安、延吉及奉天锦州等处

直隶陆军第四镇：驻天津马厂

近畿陆军第五镇：驻济南、潍坊、昌邑等处

近畿陆军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河南暂编陆军第七镇：驻防河南

湖北陆军第八镇：驻武昌

南洋陆军第九镇：驻江宁

福建暂编陆军第十镇：驻福州、福宁、延平等处

四川暂编陆军第十七镇：驻成都

云南暂编陆军第十九镇：驻昆明

奉天暂编陆军第二十镇：驻沈阳

浙江暂编陆军第二十一镇：驻浙江

吉林暂编陆军第二十三镇：驻吉林

广西暂编陆军第二十五镇：原驻广西桂林，后因第二十六镇被遣散迁驻广东，改称广东陆军第二十五镇

广东暂编陆军第二十六镇：驻广州，后因起义被遣散

第一混成协：驻东北新民，协统王化东

第二混成协：驻沈阳，协统蓝天蔚

第三混成协：驻永平，协统王占元

第十三混成协：驻江苏江北，协统杨保善

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武昌，协统黎元洪

第二十三混成协：驻江苏苏州

第二十五混成协：驻湖南长沙

第二十七混成协：驻江西南昌

第二十九混成协：驻河南，协统张锡元

第三十一混成协：驻安徽安庆，协统余大鸿

第三十三混成协：驻四川成都，协统钟颖

第三十五混成协：驻新疆乌鲁木齐

第三十九混成协：驻陕西西安

第四十三混成协：驻山西，协统谭振德

广东混成协

广西混成协

甘肃混成协

伊犁混成协

直隶混成协

黑龙江混成协

编制

按《陆军营制饷章》规定，国家常备军的编制以两镇为一军，两协为一镇（一镇官兵12512人）、两标为一协（一协官兵4038人），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镇还辖炮队一标（官兵1756名）、马队一标（官兵1117名）、1个辎重营（官兵754人）、1个工程营（官兵667人）。步、炮、工兵每队均为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两排，每排二棚；辎重队三排，每排三棚。常备军的编制与中国传统营制已完全不同，成为一个步、骑、炮、工、辎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单位，这是一种适合形势需要的现代化编制。

建军初期，全军由一名总统（即袁世凯）统率，有左右两翼（相当于旅），每翼有一名翼长、一名统领和两名分统负责；翼下面为营，有统带官和帮统官各一名；营下面为队（相当于连），由一名领官管理；队下面

为哨（相当于排），由一名哨官和两名哨长负责；最下面为棚（相当于班），有正副头目各一名。（每棚十二人）

新军机关以总部为首，其下有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等。

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后，新军改为常备军制，并因人数的增加，故以改编作镇、协、标、营、队、排、棚，各级军官改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每镇额设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仍有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军官大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较以往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文规定。

新军与革命

在组建和训练新军的时候，由于使用西方军队方式编练、采用西式装备，需要从军者拥有文化知识，故对知识分子优先录取。而在清末新政、废除科举的背景下，更促成知识分子加入新军，以谋求个人出路。一些开明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端方等，注重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入伍，和招收留学生任军官如蔡锷、阎锡山、许崇智等，这些知识青年读过书见识广，敢于持有不同政见，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同时革命党人如黄兴、宋教仁等注重开展兵运，秘密向新军中输送革命分子，如吴禄贞、赵声、孙武等。这些军内革命党人待命伺机发动起义。

1911年武昌首义是新军起义，然后响应的陕西、湖南二省，是新军起义。接下来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是新军起义。除上海、广东、广西辛亥革命起义是以民军商团为主之外，其他各地起义均为新军起义为主。辛亥革命也可以说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新军大起义。

https://zhuanlan.zhihu.com/p/54644800

北洋军阀以及各自的地盘

所谓北洋军阀，是指袁世凯掌握政权以后，北洋新军的主要将领所组成，但在袁世凯谢世后，没有哪个人有足够的威望和力量来掌控整个北洋新军和政权，导致国内军阀派系横立，不断陷于混战的局面，自老蒋发动北伐战争，才重新统一了中国。

北洋新军各领导人，以所在省割据，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当然，他们在名义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真正称得上北洋军阀的也就是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大系。

皖系军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人而得名，代表人物主要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吴光新、曲同丰、陈树藩等人。

自袁世凯死后，皖系以北洋正统自居，段祺瑞一度曾操纵政局，声势显赫，但却好景不长，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尽管后来段祺瑞又曾出山担任“执政”，不过是有职无权，因此，在北

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

其势力范围，也即通常民间所说的地盘，主要是在北京、甘肃、陕西、山东、安徽、上海、浙江、福建一带。

直系军阀，大多出身直隶省，在许多政治理念上存在共鸣，政治上亲英美，代表旧地主，故称为直系，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等人。

1926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吴佩孚、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直系到此消亡，其军队大部分被国民革命军或收编或遣散。

其主要地盘是在直隶、湖北、江西、江苏等一带，在此割据，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

奉系军阀，以首脑张作霖出生在奉天省而得名，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有姜登选、郭松龄、韩麟春、张宗昌、李景林等所谓的五虎将，也有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等元老。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张作霖皇姑屯炸车案中以身殉职，其子张学良

执掌东北军，以后“东北易帜”，归顺中央政府，奉系军阀不再存在。

其势力范围，也即地盘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绥远等一带。

此外，除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大系以外的军阀有西南滇系军阀，领军人物有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等，其势力范围为云南、贵州、四川南部等。

旧桂系军阀，主要领导人有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沈鸿英，其主要地盘包括广西、广东、湖南南部等地。

定武军，以张勋为头领，以徐州为中心，势力遍及苏北、皖北部等地。

湘系，主要将领有谭延闿、汤芗铭、程潜、唐生智等人，(1928年后，鲁涤平、何键相继主政，地盘就是湖南省）。

粤系主要将领有龙济光、陈炯明、许崇智、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地盘广东省。

川军，主要人物有胡景伊、周骏、刘存厚、刘湘、田颂尧、邓锡侯、刘文辉，势力范围四川省。

西北军，头脑是冯玉祥，要将领有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韩复榘、孙连仲、石友三、吉鸿昌等人，地盘主要在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晋系军阀，以阎锡山为首，1916年袁世凯死后，投靠段祺瑞门下，遂开始掌握实权，最初仅有山西一地，1928年二次北伐以后，势力遍及华北；核心人员有商震、徐永昌、楚溪春、孙楚、杨爱源、傅作义等人，中原大战，遭重创；后借抗战再起，但派系遭分化（商、傅等人脱离），实力有所下降终在解放战争中被消灭。

https://www.sohu.com/a/343098245_99892961

（有编辑删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军阀比较统一，各地军阀也纷纷宣布接受北洋政府的领导。然而袁世凯被欲望冲昏头脑，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发全国人民的声讨，即使是北洋军内部也激烈反对。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地紧随其后，相继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袁世凯被迫

取消帝制，并在身体以及精神的双重打击下抑郁而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分裂伊始，以段祺瑞主导的皖系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占据上风。冯国璋主导的直系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与皖系争锋相对。奉系不是袁世凯的嫡系，所以它的实力一开始远不如皖系和直系，但它借助日本人的扶持，盘踞在东北三省，伺机而动。

除北洋军阀分裂出的皖、直、奉三大派系以外，当时的中国还存在许多地方军阀。在山西等地，阎锡山被称为“土皇帝”，掌管晋军大权。冯玉祥、杨虎诚等则盘踞在陕西、察哈尔等地，在苏联的扶持下实力强劲。四川更是军阀林立，刘湘主导着军政大权。蔡锷将军去世以后，唐继尧继续领导着滇系军阀，陆荣廷则领导着桂系军阀。在袁世凯去世以前，这些地方军阀在名义上归附中央，但等到袁世凯一死，北洋军阀内部分裂，他们便趁机独立，发展自己的实力，经营各自的地盘。

皖系、直系、奉系尽管前身都是北洋军阀，许多人还是同门师兄弟甚至是师生关系，但在政治斗争与权力博弈面前，三大派系依旧常常兵戎相见，而直皖战争与两次直奉战争便是例证。

1920年7月14日，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不满皖系的段祺瑞独揽大权，与奉系组成反段联盟，讨伐段祺瑞。最终皖系战败，直、奉两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皖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以后，直系与奉系共同控制国内政权，但很快两派的关系就势同水火。张作霖上台以后，极力推荐亲日的梁士诒出任内阁首领。梁士诒向来与直系不合，英美扶持的直系也不能允许亲日的梁士诒上台，所以吴佩孚等人坚决不同意梁士诒出任总理。直系的不配合令张作霖十分愤怒，他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于是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然而这场由张作霖主动挑起的战争，却以奉系的惨败告终，奉军被迫撤出关外。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以援助卢永祥为名，再次进攻直系军阀。战争初期，双方各有胜负，但直系军阀冯玉祥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于是临阵倒戈，导致直系全军溃败。最终，冯玉祥与张作霖等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当然，实权其实已经落入奉系手中。

这几场战争对于国内的局势影响深远，它不仅决定了三大派系的势力范围以及政治格局，还让民众认清北洋军阀的黑暗性。在战争当中，不论是皖系、直系还是奉系，都是为争权夺利而挑起战争，军队时常发生抢劫百姓的恶性事件。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人们群众反对北洋军阀的呼声愈发高涨。

而且，在北洋军阀乱战期间，国民革命政府在南方成立。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组建“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讨伐兵力数倍于自己的北洋军阀。在北伐军英勇作战以及人们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连战连捷，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西北军的冯玉祥以及山西的阎锡

山审时度势，加入北伐军，一起攻打最为强大的奉系。1928年，北伐军攻克北京，张作霖被迫撤回东北，并在路上被日本人刺杀身亡。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中央领导，自此，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实现统一。

（网文引述结束）

（以下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4%8B%E6%94%BF%E5%BA%9C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全称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是指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京兆地方为

首都的中央政府，因政权绝大部分时间由北洋军出身的军阀所把持，故而被后世以此名称之。

北洋政府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一个被国际所承认继承中国法统的政权。民国2年（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象征着北洋政府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结束。从民国元年（1912年）3月至17年（1928年）6月，北洋政府体制多次于内阁制与总统制两者之间徘徊不定。

北洋政府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定《卿云歌》为中华民国国歌。在北洋政府主导下，1917年，北洋政府对德意志帝国及奥匈帝国宣战，加入英法美协约国阵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1919年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但因五四运动抗议山东问题而未在《凡尔赛和约》签字。

虽然北洋政府为国际认可的唯一合法中国政府，但其即使在最强势的袁世凯时期亦未曾一统南方革命党势力，在袁世凯死后更是连北方北洋军自身内部都未能统一，分裂成大小派系军阀混战。1926年，割据广州的的国民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动北伐，北洋政府战败后欲退据东北，但最后一任领袖张作霖途中遭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在继承政权后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统治，北洋政府正式宣告灭亡。

沿革

袁世凯执政时期

1912年2月12日临朝称制的满清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在北京全权组建临时政府。2月13日，孙文遵守南北议和时的承诺，向参议院辞职，并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2月15日，袁世凯被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

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北京临时政府举行第一届国会大选，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获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

1913年3月22日，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身亡。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段时间里，袁世凯吸纳北洋系人士、社会菁英和少数革命党人组成新政府，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体制逐渐确立，并于10月6日进行大总统选举，袁世凯成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并于10月10日就职。

1913年7月，孙中山以宋教仁被刺及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即向西方各国进行“善后大借款”丧权辱国为由，发动二次革命反袁；8月即以失败告终，随后流亡日本。

日本以《二十一条》刁难袁世凯，民国成立后各种混乱的背景下，“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言论不断在社会上传播，各方建议袁世凯施行君主立宪来巩固国基；袁世凯最终于1915年12月12日同意开始筹备君主立宪制的中华帝国，定1916年登基改年号为“洪宪元年”。但在蔡锷的护国军、孙文的中华革命党及前清遗老的宗社党围剿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尚未登基即宣布撤销帝制，中华帝国从未成为正式的国名，洪宪年号也从未被正式使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

军阀割据时期

袁世凯逝后无人有声望和能力统御整个北洋军，北洋军遂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等三大割据势力，统称北洋军阀。而在护国战争后，各地军阀亦成形，如桂系、滇系、粤系、川军……等。各地军阀在名义上仍受北京的中央政府支配，但实际上各自为政，有如独立王国。从1916年6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央政府实际为皖系军阀所控制，后来分别为直系、皖系、奉系军阀轮流掌握。

之后，北洋政府的国会在各系操控下，形式上选举北洋系人物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总理，

1924年冯玉祥发动甲子兵变推翻大总统曹锟后，形式上的总统选举也取消。

1925年，中国国民党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并由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的军政府瓦解。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

1928年12月29日，奉系领袖张学良降下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通电南京的国民政府，表示服从管辖，史称东北易帜。至此，北洋政府结束运作，北洋系退出历史舞台。

政体

北洋政府先后制定五部宪法，包括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案》（又称《天坛宪草》）；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10月《中华民国宪法》；1925年12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即由大总统、议会、内阁、法院所构成的政权体制。大总统并非实际的政府首脑，仅是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

民国2年（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草案）。这部草案的基础是临时约法，其中的规定使当时执政的袁世

凯非常不满，因此他不让国会讨论这部草案。

袁世凯于民国3年（1914年）解散国会，成立“约法会议”，并于同年5月1日公布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同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将行政、司法权力集于总统一身。

袁世凯逝后，民国5年（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施内阁制。

民国8年（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民国12年（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民国14年（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又提出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三权分立

北洋政府时期建立三权分立制度，以此为基本原则，限制大总统权力，防止个人独裁，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和保障。1917年5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问题上，国务总理段祺瑞提参战案，而国会拒绝合作。段不断对国会施压，国会则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最终大总统黎元洪在国会要求下解除段祺瑞的职务。当时的国会真正起到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的作用，并非“橡皮图章”、“表决机器”。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指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后被国共史学家描述为府院之争。

宪法同时保障司法独立，规定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1913年国民党

理事长宋教仁被杀案中，地方检察厅可以公开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又如1925年10月京师地方监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金佛朗案”事件，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前司法总长章士钊全被审查，期间，中央政府没有干涉，反映出当时司法的独立性。

大总统府

第一任　　袁世凯　　1913.10.10－1916.1.1 中华民国大总统，定都北京

洪宪帝制　袁世凯　　1916.1.1－1916.3.22　　袁世凯称帝，1916.6.6病逝

继任　黎元洪　　1916.6.6－1917.7.14

代理　冯国璋　　1917.7.6－1918.10.10

第二任　　徐世昌　　1918.10.10－1922.6.2

第三任　　曹锟　1923.10.10－1924.10.30 通过贿选当选。日军占领天津后拒绝与日本合作

临时执政　段祺瑞　　1924.11.24－1926.4.20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曾三次出任国务总理

北洋安国　张作霖　　1927.6.18－1928.6.3　　中华民国安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议员于1927年6月16日入主北京建立北洋安国军政府。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身亡。

内阁

袁世凯政府初期实施内阁制，于1912年4月21日成立，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内阁（即国务院或议事堂）行使国家一切行政权力。凡总统公布一切重要法律、命令，都要经过内阁成员副署，否则在法律上不发生任何效力。自1912年3月到1914年5月，前后二年多，经过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六易（不包括代理总理在内）内阁。

1916-1928年期间，北洋政府的内阁变更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此外还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过执政权，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内阁列表

第一次唐绍仪内阁　1912年3月13日－1912年6月27日　1912年3月8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

第一次陆徵祥内阁　1912年6月29日－1912年9月22日

赵秉钧内阁　1912年9月25日－1913年7月16日

段祺瑞临时内阁　　1913年7月19日－1913年7月31日

熊希龄内阁　1913年7月31日－1914年2月12日

孙宝琦临时内阁　　1914年2月12日-1914年5月1日

徐世昌内阁　1914年5月1日-1915年12月21日

第二次陆徵祥内阁　1915年12月21日-1916年3月22日

第二次徐世昌内阁　1916年3月22日-1916年4月22日

第一次段祺瑞内阁　1916年4月22日-1916年6月29日

第一次段祺瑞内阁改组内阁　　　1916年6月29日-1917年5月23日

伍廷芳临时内阁　　1917年5月23日-1917年6月12日

江朝宗临时内阁　　1917年6月12日-1917年6月24日

李经羲内阁　1917年6月25日-1917年7月2日

第二次段祺瑞内阁　1917年7月14日-1917年11月22日

王士珍内阁　1917年11月30日-1918年3月23日

钱能训1918年2月20日，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第三次段祺瑞内阁　1918年3月23日

钱能训临时内阁　　1918年10月10日，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钱能训内阁　1918年12月20日

龚心湛临时内阁　　1919年6月13日　　，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靳云鹏　　　1919年9月24日　　，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第一次靳云鹏内阁　1919年11月5日，（1920年5月14日请辞，7月2日奉准免职）

萨镇冰临时内阁　　1920年5月14日　　海军总长代理总理

第二次靳云鹏内阁　1920年8月9日

第三次靳云鹏内阁　1921年5月10日

颜惠庆　　　1921年12月18日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梁士诒内阁　1921年12月24日（1月25日请假出京，5月5日被免职）

颜惠庆临时内阁　　1922年1月25日，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周自齐临时内阁　　1922年4月8日，教育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第一次颜惠庆内阁　1922年6月11日　　，7月31日请假出京，8月5日辞职

王宠惠　　　1922年7月31日，司法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第二次唐绍仪内阁　1922年8月5日

王宠惠内阁　1922年9月19日

汪大燮内阁　1922年11月29日

王正廷临时内阁　　1922年12月11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张绍曾内阁　1923年1月4日

高凌蔚摄政内阁　　1923年6月14日，摄政内阁总理

高凌蔚临时内阁　　1923年10月12日

孙宝琦内阁　1924年1月10日

顾维钧临时内阁　　1924年7月2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第二次颜惠庆内阁　1924年9月14日　　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黄郛摄政内阁　　　1924年10月30日，摄政内阁总理，教育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段祺瑞临时执政内阁　　　1924年11月24日　　临时执政

许世英内阁　1925年12月26日

贾德耀　　　1926年2月15日，陆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贾德耀内阁　1926年3月4日

胡惟德临时摄政内阁　　　1926年4月20日，内阁摄行临时执政职，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第三次颜惠庆内阁　1926年5月13日

杜锡珪临时内阁　　1926年6月23日　　海军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顾维钧临时摄政内阁　　　1926年10月5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顾维钧摄政内阁　　1927年1月11日

胡惟德　　　1927年6月16日，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潘复内阁　　1927年6月20日～1928年6月3日

国会

中华民国议会，最初为一院制（临时参议院→参议院），后改为两院制（国会）。1912年4月29日，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取名参议院。

中华民国国会（1913年－1925年）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民国二年（1913年）4月8日正式于北京成立，由参议院与众议院共同构成，两院设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3个委员会。国会主要依据《临时约法》执行议会权力。第一届国会成立后，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规定，1913年7月12日在天坛祈年殿成立由6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宪法起草工作。

1914年11月10日，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正式下令解散国会。中华

民国国会此后经历多次解散和重新召集。最终于直皖战争后，因段祺瑞声明废弃法统，而宣告终止。

安福国会是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1918年8月12日－1920年8月），在选举过程被“安福俱乐部”所控制。1920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宣布解散安福国会，并进行第三届国会的选举。

地方政府

沿革

1920年11月北洋政府宣布筹备地方自治，之后颁布一批地方自治条文。规定地方政府官员不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本地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1920年至1925年，中国各地依据美国联邦制的普世性原则，掀起联省自治运动，社会精英在报刊上发表大量关于联邦制的文章，呼吁联省自治。湖南省公民投票通过的《湖南省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付诸实行的省级宪法，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决议案中宣布中共的目标之一是联合蒙、藏、疆等地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923年10月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一部联邦制宪法，但因曹锟贿选，这一宪法遭到反对。1926年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各省宪法和省议会随之流产。

架构

北洋政府建立的地方机关大致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政机关和特别行政区机构。

地方立法机关分为省议会和县议事会。

地方行政机关分为省行政机关、道行政机关、县行政机关和基层政权。

地方军政机关分为省军政机关、地区性军政机关、临时性军政机关。

特别行政区机关包括京兆特别行政区政府，热、察、绥特别行政区政府，川边特别区政府。

区域

皖系　1916-1925　安徽、浙江、上海　段祺瑞、倪嗣冲、徐树铮、段芝贵、卢永祥

直系　1917-1926　北京、直隶、山东、江苏、江西、湖北、福建　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

奉系　1916-1928　奉天、黑龙江、吉林、热河　张作霖、张学良、张作相、郭松龄、张宗昌

新疆自治省　1911-1944　新疆　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

西北军　1921-1930　陕西、察哈尔　冯玉祥、韩复榘、宋哲元、杨虎城

川军　1919-1949　四川、西康　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

黔军　1920-1926　贵州　袁祖铭、王家烈、王天培、周西成、刘显世、彭汉章

晋系　1911-1949　山西、绥远　阎锡山、傅作义

旧桂系　　1916-1925　广西　陆荣廷、沈鸿英

滇系　1916-1949　云南　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

湘系　1916-1937　湖南　赵恒惕、唐生智、何键

粤系　1920-1949　广东、海南　陈炯明、龙济光、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余汉谋

马家军　　1872-1949　甘肃、宁夏、青海　马鸿逵、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继援、马仲英

新桂系　　1922-1953　广西　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评价

正面评价

王铁群认为北洋政府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开端，办报自由如欧美，各省文化大放异彩。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创造的一系列经济奇迹也是有赖于北洋政府所作出的努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5%88%9D%E5%B9%B4%E5%9B%BD%E4%BC%9A

中华民国初年国会

1913年4月8日至1925年4月24日间存在的中华民国国会，是指中华民国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民国二年（1913年）4月8日正式于北京成立的立法机关，由参议院与众议院共同构成，主要依据《临时约法》执行议会权力。此外，第一届国会还负责起草宪法。由于政治原因，中华民国国会作为法统，多次解散和重新召集。最终在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于1925年4月24日声明废弃法统，宣告终止，长达13年的初年国会结束。

国会之前的临时机构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武昌代表会议时期，1911年11月30日-1911年12月4日。武昌起义后，11月9日黎元洪发出通电，呼吁各省革命军派代表集议武汉，讨论成立革命政府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状态，此电于11月15日方抵达上海。而在11月12日，沪督陈其美倡议，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附和，三人联名通电，呼吁在上海召开会议，到11月15日为止，已经有7省代表抵达。代表一致认为上海比较安全，向武昌方面建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但是武昌方面坚持要在武昌开会。11月30日，共有11省代表齐集汉口，在英租界召开第一届“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12月3日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4日会议接到攻克南京捷报，于是决定转移到南京继续开会。

南京代表会议时期，1911年12月16日-1912年1月28日。12月16日在南京继

续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到会代表45人，共代表苏、浙、湘、鄂、川、滇、晋、陕、皖、赣、闽、粤、桂、奉、直、豫、鲁17省。会议推选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福建代表潘训福为书记。12月29日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在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后，该会结束。

临时参议院

临时参议院是在正式国会成立之前的临时议会机构。民国初年出现过两次临时参议院。

第一次是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成立，到1913年第一届国会成立之前。林森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4月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至北京，4月4日议决该院迁至北京。4月29日在北京行开院典礼。5月1日，参议院改选议长，选吴景濂为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第二次是1917年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到1918年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正式成立之前。王揖唐为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第二次临时参议院原本是研究系梁启超的主张，但是研究系临时参议院梁善济竞选议长失败。

第一届国会（民元国会、老国会）

成立

民元国会，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1912年8月27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布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成立办事临时机构“筹备国会事务局”。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员，22行省，每省各10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学会选出8名；各地华侨选出6名。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274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80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10人，人口不足800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22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46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10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596人。

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0人。

1912年12月初至1913年3月，全国各地根据选举法选出参众两院国会议员。登记选民共四千万以上，占全国人口9.98%。选出的议员，主要包括政治活动家、自由职业者、原清朝官吏等；其中，国民党籍议员约占45%左右，是国会第一大党。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地点在原财政学堂。议员们首先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此后数月内依法进行议会议长选举以及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国会全院委员长林森、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副议长陈国祥。9月11日，通过熊希龄内阁名单。10月6日，两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10月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赣省内乱制造者李烈钧与国民党本部及国民党国会议员有密电来往勾结之实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导致国会由于人数不足无法运作而休会，袁世凯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取代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解散国会。2月28日，袁世凯进一步下令解散各省议会。5月，根据《中华

民国约法》，袁世凯成立参政院，行使立法职能。

国会第一次复会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6月29日继任的总统黎元洪申令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8月1日，国会在北京重行开幕。黎元洪宣誓就任总统。冯国璋被选举为副总统。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副议长王正廷，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副议长陈国祥。

广州国会非常会议

1917年5月发生府院之争，总理段祺瑞被黎元洪解职，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也跟随辞职，吴景濂继任众议院议长。6月黎元洪邀请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张勋逼迫黎元洪于6月13日解散国会。数日后张勋复辟满清帝制并失败，但段祺瑞主张“再造共和”，拒绝恢复国会，重新建立“临时参议院”，另行选举“安福国会”。

1917年7月，吴景濂、王正廷等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率领130多名议员南下广州。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选吴景濂为议长、褚辅成为副议长。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开始了护法战争。1918年4月10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该大元帅被七总裁代替，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开广州赴上海。

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陈炯明控制下的广州。1921年4月，部分国会议员在广州再次召开国会非常会议（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陈炯明驱逐孙中山。大部分议员也离开广州赴天津、北京。

国会第二次复会

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提出

“恢复法统”，于8月1日重新恢复老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副议长王正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并于1923年10月5日由老国会选举曹锟为大总统。

1924年9月15日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30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内阁司法部长章士钊令法庭检举贿选案。12月13日北京临时政府取消曹锟宪法，消灭国会机关。1925年4月24日，段祺瑞正式下达取消法统命令、同时宣告临时约法失效。民国第一届国会终于消失。

上海国会非常会议

1923年6月曹锟制造政变，非法驱赶大总统黎元洪，200多名国会议员抗议曹锟政变，南下上海，在上海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人数不足法定数额，最后失败。

北京国会非常会议

1924年11月22日，反对曹锟贿选的279名国会议员在北京成立国会非常会议。1925年2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开会，主由该会起草国民会议组织法。3月19日国会非常会议第三次宣言，主张依据临时约法解决国是，反对国民会议。

1925年4月26日非常国会议员拟在北京集议，反对取消法统（4月24日段祺瑞宣布取消法统令），为北京警察驱散。

第二届国会（民七国会、安福国会、新国会）

安福国会是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1918年8月12日－1920年8月），也称新国会，因其选举过程被“安福俱乐部”所控制，故称为“安福国会”。安福俱乐部因设在北京安福胡同，所以叫“安福俱乐部”；其成员也被称为安福系，相当于一个政党。

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联合奉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大总统徐世昌无奈宣布解散安福国会，并进行第三届国会的选举。

第三届国会（新新国会）

1920年8月安福国会解散之后，大总统徐世昌于10月30日宣布，根据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开展新一届国会的选举。1921年夏开始选举，参加选举的地区只有江苏、安徽、山东、山西、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十二省区。该届国会议员选举获得奉系张作霖的支持。而北京所处的直隶地区，因直系军阀反对，没有办成。各省选出的议员，也始终未能集会，因此本届国会是一届流产的国会。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国会议长

参议院议长

张继

王家襄

梁士诒

李盛铎

王家襄

众议院议长

汤化龙

吴景濂

王揖唐

吴景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AD%B7%E5%8F%B2

中华民国史

（引述1949年以前部分；有删节）

中华民国的历史始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为首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爱新觉

罗溥仪退位，中华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疆域。建国初期由北洋军阀为首的北洋政府所领政，政治争斗不断，同时民主与各种学术思想发展较为自由。

1923年，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进入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三步走路线，并于1924年正式订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8年6月3日北伐结束后，北洋政府被中国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取代，国民政府实施以党领政的训政体制，以推展经济与文化的上现代化建设为重心，中华民国经历黄金十年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国民党陷于与中国共产党、残余军阀和日本的政治及军事冲突之中；1937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接管台湾。1947年底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行宪之中华民国政府，同时间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爆发内战，失利后于1949年12月7日退守台湾，仅统治台澎金马地区，形成与中共建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相隔台湾海峡两岸分治之局面。

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在台湾施行威权统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建设。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附属组织的“中国”席位，许多国家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国际地位转趋低落。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解严恢复宪政，并实施民主化改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政治交流也逐渐恢复。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首次执政，国民党首次在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开展，国家体制渐与台湾社会相融合，文化发展上则从中华文化本位转为以台湾本土文化为重心，公民社会开始成形。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返执政。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二次执政，并首次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首次完全执政。

现今的中华民国于国际间常因地理位置通称为“台湾”、或因政治因素权宜被称为“中华台北”、“台湾地区”等，以经济成就闻名于世。

建国之初

辛亥革命

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自上而下改革以及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相信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废除掉旧有的制度和体制，并建立新的制度和体制才是有效的方法。这个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一个反清的共和主义者，开始在海外华人、留学生，特别是日本的留学生间受到瞩目。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他在《中国同盟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并为未来实现共和制度的中国取"中华民国"的国号。孙中山和另一个同样受到瞩目的中国革命领袖黄兴建立中国同盟会。中国国内的一些地区军阀、百日维新后流亡海外的改革派以及海外的华人对这个运动给以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1897年形成，1905年首次在东京发表，并在1920年代早期作过一些修改。他的理论集中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号召人民推翻满族的统治以及结束外国霸权在中国的势力；民权表达孙中山期望建立一个普选的共和政府的理想；民生，通常被描述成为社会主义，是指通过对生产方式所有制的规范来帮助平民。

1911年，清廷为了控制保路运动，将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使得武昌防守空虚。革命党人黄兴利用这个机会，打算在10月底发动一场起义。10月9日反清的革命计划被暴露，由革命党人组成的新军被逼提前起义。这就是"武昌起义"，也是中华民国国庆双十节的来源。武昌起义成功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于1911年10月11日在湖北武昌成立。这是中华民国第一个省级军政府，同时代行中央军政府之职责。起义发动者临时推举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都督，改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为都督府，并根据孙中山编定的《革命方略》的原则精神，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这次起义迅速扩展到邻近的省会城市，并得到遍布全中国的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支持。11月底，22个行省中有15个宣布从清政府独立。中国本土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独立。消息传到西藏，引发辛亥拉萨动乱，西藏驻军被解除武装，同清朝官员一起被驱逐回中国内地。

当时在美国的孙中山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之后，开始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取得英国、法国和四国银行团对于革命党人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并且还从海外华人和美国的同情者间为这次革命筹集资金。日本也秘密运送军火给革命党人占领的南京。12月25日，孙中山返回中国。12月29日，各省代表以16赞成票对1反对票推选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临时副总统，黄兴任陆军部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存在时间约3个月。此时，南京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推翻北京的清朝政府，实现统一。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实施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由北京临时政府继承。

民国肇建

1911年10月27日，清朝任命已隐退的袁世凯为钦差大臣镇压革命党。11月1日，袁世凯更进一步被授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2日之后，袁世凯指挥清军开始进攻革命军，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使得革命党人不得不与袁世凯和谈。此时，国内外舆论对于袁世凯任大总统也表示相当大的支持。即便是在革命党人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袁世凯是迫使清帝退位及避免继续内战的不可或缺的人物。1911年12月29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立博克多汗国，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外蒙古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唐努乌梁海仍为外蒙古统治。而后帝俄趁机占领唐努乌梁海，并怂恿其脱离外蒙古独

立。

1912年1月22日，孙中山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退位并同意共和，就可以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于是袁世凯开始利用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一直逼迫朝廷退位。1912年2月12日，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发布退位诏书。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至北京。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与正副大总统依序选出，中华民国从临时政府时期走向北洋政府时期。

此时共和的进程比孙中山及其盟友所预料的要慢，因在袁世凯身边尽是一大班前清官僚（包括袁氏本人），他们一直不习惯、甚至反对议会制约行政的权力，并极力排挤革命党人。1912年8月，孙中山的盟友宋教仁建立国民党，这个政党是以同盟会中主张议会责任内阁制的成员为核心，再联合其他小党派结成。1912年12月，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了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1912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重掌西藏。1913年1月11日，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人在蒙古库伦签订《蒙藏条约》，互相承认独立。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是对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之通称，因此时期的政府体系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所掌握而得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是1912年至1928年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1916年）、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1920年）、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1924年）、以及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928年）等4个阶段。

革命与法制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以“原则上承继前清法制”的方式作为过渡。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届国会两院选举，宋教仁以反对袁世凯统治的口号参选。大选的结果是国民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占据下议院596席中的269席，上议院274席中的123席。

1913年2月21日，司法部通令各省改组法院：“在各省省城设高等审判厅，在地区级行政区及商埠设地方审判厅，县级地方设初级审判厅”。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

孙中山因此对袁世凯的不满开始增加，1913年7月，他指挥南部的几个省叛变反对袁世凯，称为“二次革命”。叛变后来被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发动者逃亡日本。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孙吸取之前的教训，严格控制组织总部和支部，并享有各级组织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为后来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民主集中制的雏形。1916年，孙回到上海。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1914年袁世凯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

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并没有立即打击国会占多数议席的国民党议员。1913年10月5日，袁世凯通过所谓的公民团（袁手下伪装的士兵警察及便衣特务）威胁国会，并成功被选举为正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取得国际认可，袁世凯同意给予外蒙古和西藏自治权，保证中国虽然是宗主国，但是俄国在外蒙古地区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影响。10月31日，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草案》，采用内阁制来制约袁世凯的权力。11月4日，袁世凯下令以参与二次革命之罪名取缔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逐出国会。这一行动一共取消438名议员的资格，使得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命令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修改1912年的《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1914年，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后将其吞并，并更名为图瓦。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强行通过颁布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以规定他可以终身任职并有权提名继承人。这实际上等于宣告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确立，但是他对此仍不满足。1915年6月9日《中俄蒙协约》签订，外蒙古取消独立，宣布归附中华民国并实行“自治”。

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

1915年8月12日，袁世凯父子促使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劝进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自称受全国国民代表拥戴，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并称帝，将于1916年1月1日改年号为洪宪。这引起全国性的起事，为数众多的行省宣布独立。1915年12月25日云南将军蔡锷、唐继尧首先宣布独立，并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而袁世凯的主将段祺瑞与冯国璋却不愿意担任镇压护国军的任务。这场护国战争中袁世凯的军队在四川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氏宣布取消帝制以谋求续任总统，但被护国军拒绝。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复辟帝制也随之而止。

北洋政权的更迭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长达13年（另一说15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领导人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军阀们展开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

1916年6月7日，作为前革命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史称府院之争。两人的第一次矛盾发生在中华帝国崩溃之后，恢复中华民国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依据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一问题。作为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支持前者，而作为袁世凯亲信的段祺瑞则支持后者。经过争论，两方同意中华民国的恢复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解散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旧国会，并任命段祺瑞为新国会的总理。作为交换，革命党人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1916年7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华民国之意义》之公开演讲中曾解释为什么要称“中华民国”。

1917年，孙中山前往广州与南方的军阀合作，开始护法运动。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

1917年8月25日，广州军政府建立，孙中山成为当时在广州的南方军阀的大元帅。但是桂系军阀私怀野心，迫使孙中山于1918年5月离开军政府，回到上海。

1917年，段祺瑞与黎元洪就中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发生矛盾。1917年5月14日，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的许可，便代表中国对德国宣战，并利用他的亲信将领和军队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反击，黎元洪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使得众多省份宣布独立，并决定向北京进军。这使得黎元洪不得不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年6月7日，张勋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即位，宣布复辟。黎元洪拒绝接受，并协请段祺瑞主持讨伐。复辟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院总理。

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派系通过贿选等手段获得330多席，成功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8月14日，国会通过对德宣战的决议。

在此时，孙中山于1917年7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拥护1912年的《临时约法》，开展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政府。对此问题，作为主和派的冯国璋与主战派的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与前国务卿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学人发起“新文化运动”。1919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该运动开始于中国北京，后遍及全国。参与者以青年学生为主，也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运动形式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10月10日，孙中山重组中国国民党。

出兵外蒙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陷入混乱，许多俄国白军进入外蒙古。1918年8月，外蒙古当局感到威胁，向北洋政府求救。北洋政府同意该要

求，于当年11月7日派遣徐树铮出兵外蒙古。之后，北洋政府宣布外蒙古“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由于徐树铮在外蒙古强制推行新政改革，引发蒙古各界不满，在苏俄支持下，蒙古共产主义者组织开始反抗中国统治。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树铮率主力撤离蒙古。1921年，俄白军将领罗曼・冯・恩琴率兵进入外蒙古，攻占库伦。8月14日，图瓦的布尔什维克建立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

法统分裂

1920年，亲孙的粤系势力在第一次粤桂战争中击败桂系，取回对广州军政府的控制。孙中山于11月底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继续护法运动。

1921年4月2日，军政府取消，改为中华民国政府，由孙中山任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于1921年4月2日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为“非常大总统”。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以反对北洋政府的法统。

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瓦解。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回广州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重新组建军政府。虽然国号都为中华民国，但相对于北京的北洋政府，1921年建立的该广州政府称为国民政府。

第一次国共合作

当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仍然是具有合法性并为西方列强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试图从西方获得援助但却受到忽视，在1921年，他转向刚刚在自己

的革命中取得胜利的苏联救助。苏联试图通过严厉批评西方为“西方帝国主义者”而表示友好的态度对待中国的革命者，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苏联领导人采取双重的策略，即同时支持孙中山和刚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苏联期盼著两方的合并，但是同时也准备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从此，开展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的斗争。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举行，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及《九国公约》。其中《九国公约》保证中国主权独立、土地行政完整。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和军阀的联盟破裂，孙中山再次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

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

苏联顾问也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政治机构，培训宣传人员动员群众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宪法》（曹锟宪法）。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中华民国这个名词，是兄弟从前创称的，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部产生支持与反对的两个派系。支持联俄容共的称为左派，以汪兆铭为代表，反对联俄容共的称为右派，以胡汉民等老国民党员为代表。左派认为目前国民党尚须要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右派则担心未来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共产党员，可能会并吞国民党。由于当时由孙中山掌控大局，因此左右两派暂时无事。

1925年3月，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却没有交代接替人选。汪兆铭在北京安葬孙中山后，在回到广州前，先到汕头与蒋中正会面，希望能与蒋合作，与右派势力竞争。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汪兆铭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并非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外交部长一职形同空壳）。

1925年9月，财政部长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左派趁此机会实施戒严，蒋中正率黄埔军逮捕右派军系的粤军领袖许崇智等人，将粤军编入黄埔军中。至此，左派可谓完全掌握局势。

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国民政府北伐

宁汉分裂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蒋开除他的苏联顾问，并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

5月，湖北军阀吴佩孚入侵湖南，当时湖南军阀唐生智不敌，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成为蒋介石发起的北伐理由。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中正率军攻入湖南后，李济深、湘军唐生智等人攻入湖北，打垮吴佩孚。

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条约，将其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并肯定其独立地位。

1927年4月12日，蒋下令“清党”，动用军队及地方帮派人士，搜捕并处决共产党员。这段历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最高法院组织暂行条例》，实行四级三审制。“四级”即在中央设最高法院，在地方设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在不设地方法院的县设司法处；“三审”即同一案件可经三级法院审判。规定在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各级检察厅一律撤销。根据这个条例，各省高等审判厅改为高等法院，地方审判厅改称地方法院。各级检察厅改为检察处，废去厅长职务，另设首席检察官。检察处为各省省府的一部分，受司法部和省政府的指挥监督。

这时中国有三个中央政府：获得国际承认的位于北京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建立的武汉政府，以及国民党右派组成的南京政府。

宁汉合流后，蒋中正整合军队，向北方步步进迫，在保定之战中击败奉军。大军当到山东之时，日本为了阻碍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借口保护侨民，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蒋中正绕道北伐，进迫北京。张作霖见大势而去，被迫退出关外，途中，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是为皇姑屯事件。

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中国共产党积极在湖南湖北一带农村推动“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汪兆铭在1927年7月15日宣布“分共”，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退党，国共合作至此结束。这段历史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称之为“宁汉合流”。

当时共产党进入一个低潮期：原本第三国际希望能借由与国民党的合作来发展共产势力，因此对国民政府投入大量的经济与人力资源，现在不但黄埔军为反共的蒋介石所支配，也失去与国民党左派的同盟关系。共产党于是决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势力，1927年8月1日，发起南昌起义。原本计划攻入广东，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进入江西的山区。同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也发起秋收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28日到达江西萍乡和宜春之间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武装会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势力于是长期在此地发展，称为“中央苏区”，并在中华民国境内先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等苏维埃政权。

国民政府

形式上统一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该事件的制造者关东军意图鼓动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独立，但被张学良拒绝。同时张学良秘密和基本上已经统一南方的蒋中正联系，准备宣布东北归于南方中央政府统治。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北洋政府被南京国民政府取代。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五色旗更换为国民政府使用的青天白日满地

红国旗，意即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领导。至此，除外蒙古地区，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

黄金十年

1928年，全中国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而国民政府也获得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现在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军政），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训政），也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发展，至人民有施行宪政的能力后，再还政于民。

1928年10月3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中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规定中央和地方的普通审判机关，由原来的四级改为三级，即：中央设最高法院，省设高等法院，县设地方法院。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筹画《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发表五五宪草，这是今天《中华民国宪法》的雏形。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政府巩固和取得成就的一个时期。外国在中国的特权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缓解，政府积极地进行立法和刑法系统的现代化、稳定物价、分期偿还负债、改革银行和货币体系、建设公路和铁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并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同时，教育界也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就，以期通过一个普及国语和克服方言差异的计划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更进一步鼓励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这一段时间因国民政府在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而被称为"黄金十年"。

攘外与安内

安内

1930年的中原大战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对共产党展开围剿。

攘外

日本于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动占取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由前清朝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傀儡政权。满洲国是日本结合部分清朝宗室以及汉人将领和权贵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国家，首都设于新京，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

日本开始从长城南部向中国北部以及沿海省份推进。中国人民对日本感到愤怒，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在外交上不断的表面退让，另一方面节节抵抗日本军阀，又一方面调动军队围剿红军。后来，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合作谈判抗日。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7日，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阀在北平（现今北京）城外起冲突；西北军于芦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接着，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指责日本军阀的侵略、呼吁全国百姓团结而立。同时这也促进国共反对日本而建立的第二次联盟的形成。中国政府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先迁往武汉。

1937年7月之后，日本陆续攻陷华北各地。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本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市后，首都南京市于12月沦陷，日本发动震惊国际的南京大屠杀。而后南北日本军欲会师徐州市时，国军在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因战争爆发，立宪被迫延后。

对于抗战，国府方面定下的作战方针是，现有部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拖延日本军阀，将华北、沿岸一带的广大空间换为宝贵的时间；而真正的战场，则是华中一带。不过，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抗战的决心、并且激励士气，国府调动最精锐的第五军等七十万部队，投入淞沪地区与日本军阀展开血战，彻底粉碎日本皇军"三日攻下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夸词。之后，历经台儿庄会战等战役，日本军阀于一年后占领武汉。此时，战线过于拉长而导致兵力分散的日本军阀，面对已有充分准备的国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中日战争至此陷入拉锯战。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红军约6万人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加入抗战。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本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以发展军事力量，较有名的对日战役为平型关战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本军攻下武汉市。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市并侵略华南。由于战线拉长，中日转入相持阶段。

1939年期间中日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日本军三次南下长沙市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

1941年—1943年，国军与日本军多次在中原地区和湘浙赣地区争夺，先后爆发多次会战，但总体保持平衡对峙态势。

在沦陷区，国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日本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

1940年，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陆续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及汪精卫政权。汪精卫政权是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所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故又被称为汪精卫国民政府，实际上为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1940年，该政权在大日本帝国陆军支那派遣军扶持下成立于南京，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和李士群为主要成员，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由于日本一方开出的停战条件过高使中华民国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谈最后破裂。

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对日禁运。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

中华民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约瑟夫·史迪威任参谋长。

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

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华民国仍未减轻负担。

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英国。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对英美盟军宣战。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发表《开罗宣言》。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中华民国临时首都重庆市。

1944年10月11日，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

1945年，太平洋同盟国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本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

日本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鄂西会战与湘西会战，国军皆抵御成功。

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市与长崎市先后投下核子弹，苏联亦依据《雅尔塔密约》对日本发动八月风暴行动，攻灭满洲国并占领中国东北。

日本战败后，溥仪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

最终日本昭和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伏文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市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虽然国军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本军，在整体战争中处于劣势。但是国军成功拖住部分日本军主要战力，并在部分战役中获得胜利，使盟军得以在战略上顺利对付日本军。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投降，中华民国也因抗战胜利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府军队为争夺受降权发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摩擦，由此在美国调停下，国共双方展开一年半之久的政治谈判。谈判的目的不仅为制止国共冲突，也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宪政而共同协商努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最终彻底破裂，内战再度爆发。《中华民国宪法》在1947年施行，中华民国政府也于次年投入运作。

施行宪政

《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华民国的根本大法，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理论基础建立。三民主义主张各民族和他国之间平等相处的民族主义、公民得以行使政治权利管理政府的民权主义，以及政府应为人民服务且建构繁荣经济社会的民生主义，因此《中华民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而五权宪法则确立司法制度独立于其他行政权、立法权、考试权及监察权。宪法除了明确规定五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体制与地方自治制度，还明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限划分采取均权制度以及明列基本国策等。

1946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在国共分裂的背景下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基于同年国共两党商定之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经国大三读通过。

1947年元旦，《中华民国宪法》公布。1947年4月，国民政府基于政协决议改组政府；同年11月21日，开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直选；同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正式施行。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但国共内战导致许多条文失去效力。

1948年3月，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并于4月选举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与副总统，分别由蒋中正与李宗仁当选。同年5月20日，蒋中正及李宗仁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改为总统，并延续至今。新的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运作之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开始运作，国民政府步入历史，国家进入建国大纲的第三阶段，即宪政阶段。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势力扩大，国共两党再起冲突。自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与中央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区域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市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

年底，美国派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双方，于1946年1月签订一月停战令，并召开各党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同年春，国共爆发政治摩擦，4月，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5月，孙立人在第二次四平战役取胜后追击林彪率领的中国共产党部队，直逼哈尔滨市。此间美国马歇尔威胁要求停战，国军被迫停止追击。

1947年初，中国共产党三次拒绝国府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后才能实现和平，至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2月，美国宣布完全退出国共调停，并开始在中华民国撤军。

3月，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逐出南京市；胡宗南率军攻进延安市，国共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其控制区称为解放区。

战争初期，国军在各个战场呈进攻态势，几经挫折，终在1947年秋占据全国大部分地区，同时损失大量有生力量。

1947年入冬开始，解放军反攻驻守于大城市的国民政府军，相继占领石家庄，四平等。

1948年夏，国军困守城市，失去周围农村拱护，战局对政府不利。

1948年9月辽西会战爆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率领下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锦州、沈阳先后被解放军攻下，东北失守，政府内部要

求蒋辞职呼声甚高。

在关内，早在9月济南战役后，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领有山东并南下。11月爆发徐蚌会战，黄百韬部集结途中被围，国军自徐州东进解围失败，黄维部自华中前往解救，也于宿县附近被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包围。中华民国政府令杜聿明放弃徐州，撤退途中被分割包围，于隔年1月溃败。

前两次战役使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野战军入关，切断华北国军海运退路。在天津市失守后，北平守将傅作义投诚，华北大部被解放军占领。

1949年1月17日，苏、英、美、法先后拒绝调停中国内战。

1月19日，“外交部通知各国使节迁往广州。”。

1月20日，政府由外交部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谓“四强已先后答复我方本月八日所发出之照会。咸称：‘甚愿中国早日恢复和平；但在目前情况下，碍难出任媒介。’”

1月21日，蒋中正宣布下野，但仍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李宗仁“发表文告，宣布就代总统职。”

2月5日，“行政院迁广州正式开始办公”。

2月6日，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招待中外记者，“强调贯彻和平主张，政府迁地办公，决非放弃和平。”

2月9日，湘、桂、赣、皖、豫、闽、鄂、汉等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联合会”，“在汉口开始为期三日的会议”。

2月23日，行政院政务会议“通过财政经济改革草案”。

2月28日，立法院第一届第三期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

1949年4月，李宗仁与中国共产党开启北平和谈，李宗仁期望“划江而治”。然而中国共产党提出逮捕民国正副总统等“43名战犯”的要求使中华民国政府无法接受，谈判宣告破裂。不久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

4月20日，江阴要塞守备部队投降。

4月23日，国军撤离南京。

1949年5月4日，杭州失陷。

5月6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

5月20日，西安撤守。

5月22日，上海市区被解放军攻占。武汉市相继失陷。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广州市。

1949年8月至10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于陆续占领华南地区。

8月16日，国军撤离福州。

8月20日，赣州失守。

9月10日，衡阳失守。

9月20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开幕，政府代表团向大会提出控苏案。

9月30日，立法院在广州复会。

10月3日，苏联通知绝交。外交部正式声明：“对俄断绝邦交。”并呼吁联合国，应充分注意苏联侵略中国，“威胁远东之行为”。

10月5日，外交部发表声明；与波兰、捷克两国，“断绝邦交”。

10月7日，韶关失守。

10月12日，“政府宣布自广州迁重庆办公”。

10月13日，广州失守。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占福建。

10月16日，国军撤离厦门，“退守金门”。在金门战役中，解放军登陆金门失利。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于11月攻重庆。

11月14日，桂林失守。

11月25日，贵阳失守。

11月29日，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重庆已受包围”。

11月30日，广西南宁失守。中华民国政府三迁成都，西昌成为国共内战末期指挥中心。

1949年12月1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

12月7日，行政院电令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

12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设置总指挥部”；包括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的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纷纷离开成都飞抵台北。

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飞往台北。解放军占领四川省。

1950年，海南、西昌被解放军攻占。

1951年底，解放军进入西藏。

1952年，大陆全面被解放军攻占。

经过几年小型战斗，舟山群岛被解放军所占领，1955年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以及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区域仅限于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澎湖、金门、马祖及若干南海诸岛（东沙、太平）等地，并延续迄今。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国军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5%9B%BD%E5%86%9B%E9%98%80

民国军阀是指在20世纪初影响中华民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名义上归属“中央政府”领导，但实际上在各地自行建立地方割据势力并采用各种手段扩权、以军队作为主要政治资本的势力，在其势力强大时即成为当时中国的正式主导政府（即北洋政府）。在实质上依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割据势力。中国共产党认为民国军阀的出现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表现。主要势力早期为北洋军阀、滇系军阀、粤系军阀、旧桂系军阀等。后期则由中国共产党、新桂系军阀、直系军阀、奉系军阀与川军等取代。这些民初时期的军阀主要兴起于1916年袁世凯之死到1928年东北易帜的13年间（也有说到1930年中原大战为止），这段时间史称军阀割据时期或军阀时代（Warlord Era）。1928年之后，虽然以蒋中正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各路新旧军阀依然对中央政府及其国民革命军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军事上与政治上的明争暗斗或略有式微却并未停止，这导致了日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统一的国家军政体系始终未能彻底的建立。

背景

民国军阀的地域性最早来自于清朝末年，其中央军队八旗和绿营战斗力低下，在征讨太平天国等势力时，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比较著名的有湘军和淮军。随着清廷的衰落及日益腐败，地方团练的势力也日趋扩大，已经可以影响到中央的政策决定。民国军阀无不于这些地方团练有千丝万缕的瓜葛。

清朝末年，由于庚子拳乱引发的八国联军，清廷受到严重打击，慈禧太后体认到面对西方势力的冲击诉诸传统武力乃毫无作用，因此开始主导新政执行。其中一环乃新军建立，此新军之核心部队由袁世凯建立，乃日后的北洋六镇。此新军计划原先预定扩展至全国建立36镇约五十万正规军，并成为全国主要武力核心。

新军的计划本身就有极大的问题。由于当时中央为了庚子赔款之财源筹措已经阮囊羞涩，除了北洋六镇之新军之外清廷根本拿不出经费来建设各地新军，因此各地新军之经费筹措基本上是各省自行办理；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减少中央财政负担，但显而立见的负面影响就是这些新军基本上都是地方自筹自招自练，中央根本无法掌握其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注定了各地军阀出现之必然定局。

除了各地自筹之新军以外，位于中央的北洋六镇在忠诚性问题上对于清廷也是极大的隐忧，北洋新军在核心架构上是以袁世凯于小站练兵时所训练的军官做为军队骨干，对于袁世凯个人的效忠性还比清朝廷来的大；此点清廷并非不知情，因此袁世凯在光绪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失势，基本上就是为了削弱袁世凯对新军之影响力，不过此作法完全失败，辛亥革命发生时，北洋六镇虽接获清廷讨伐革命党的命令，但是却赓续地观望，没有进行任何动作，清廷不得已重新重用袁世凯以抵抗革命军的力量，这些原来效忠清廷的北洋新军高阶军官们，就成了后来的北洋军阀。一般历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军阀之父”：㈠袁世凯统领北洋军，北洋军是军阀部队前身；㈡袁世凯当总统时故意将北洋军人势力扩展至中国中南部；㈢袁世

凯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形成“政治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politics）”；袁世凯在1914年把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只管军事，另设巡按使掌民政，牵制地方军人力量；袁世凯死后出现军阀割据，两者关系重大，但绝非他个人希望。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推派各省都督进行军政治理，都督在各省掌握了政经大权之地位，成为了军阀养成之温床。“军阀”是指拥有私人军队，企图或实际控制地盘、一心为己利益之将领。而地方新军则成为各地军阀之骨干。护国战争之后，各地军阀正式成型。军阀割据与晚清地方势力抬头有相同：代表离心力量，使权力分散甚至地方分离；也有不同：㈠军阀出身复杂，有军校、农兵、土匪等，晚清地方领袖出身儒家科举，㈡军阀税收自留、官吏自行任命，晚清地方领袖效忠中央，㈢军阀互相争斗，晚清地方领袖听命中央。

缘起及发展

军阀割据可说是军人参与、干涉、把持政治之过程：㈠清末新政——新式武备学堂与新式军人出现，部分军人对政治感兴趣，使军人政治化，如新军参与革命活动；㈡清朝覆灭，共和成立——皇权崩溃，法统危机出现，革命打倒皇权“天命”，却未能树立新权威，“皇帝”根深蒂固，人们仍未完全接受“总统”；㈢共和理想幻灭——革命退却，军人渗透中国，“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孙中山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人席卷中国；㈣袁氏独裁——议会制度崩溃，一切依赖武力解决，即政治军事化；㈤讨袁之役——以武力反复辟，加剧政治军事化，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蔡锷建立护国军以武力解决问题，各省响应；㈥南北战争——“护法运动”出现，加剧法统危机，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来领导“护法运动”，以1912年《临时约法》为正统，而北洋政府则以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为正统，人们对法统争持不休，无法达成共识；㈦势均力敌局面出现——军阀割据现象持续，出现许多军阀大小不一，无一能消灭其他军阀，因此需要联

盟。

政治方面

北洋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当时，北洋政府是中华民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唯一合法政权，取得北洋政府的领导权意味着可以获得关税收入和外国贷款。因此，三系最重要的争夺目标是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在整个军阀割据时期，北洋政府的控制权经历了从皖系到直系再到奉系的更迭。

1926年至1928年间，1,300个大、小军阀打过140场大、小战争，主要是争夺地盘：大军阀争夺中央政权，以合法举借外债，发行公债，把持中央财政；小军阀争夺地盘征税和招募兵马，使政局动荡不稳，政权频频易手，影响行政效率。1916年至1920年为皖系控制北洋政府的时期。在第一次府院之争中，作为总理的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矛盾重重。在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在段祺瑞的压力下被迫下台，总统职位由冯国璋续任。在之后的第二次府院之争中，段祺瑞与冯国璋在对护法运动和西南军阀的意见上不合，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于1918年10月共同下野，由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选出徐世昌接任总统一职，而段祺瑞则通过安福国会在背后操纵政权。

1919年12月冯国璋去世，直系军阀开始由曹锟领导。由于曹锟落选副总统、吴佩孚反对安福国会，直皖矛盾激化。1920年4月，曹锟与奉系等八省军阀结成反皖同盟，同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和奉系获胜。战后，安福国会被解散，其主要成员的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10人被通缉，皖系势力被严重削弱，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直皖战争后，直系与奉系由于战果分配问题发生摩擦，第一次直奉战争于1922年爆发，张作霖被击败，退出关外，直系取得北京政权。1923年6月，曹锟通过贿选当选总统。1924年，为了反对直系的领导地位，奉系联合皖系残部和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共同讨伐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将领冯玉祥受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五十万献金，遂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导致直系溃败。然而，冯玉祥与奉系的合作并未长久。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段祺瑞和孙中山进京，并改编其部为国民军，坐镇北京，与奉系分裂。

1925年，直系败将吴佩孚发动反奉战争，驱逐苏皖等地的奉系势力。1926年，张作霖联合日本势力挥师南下入关，冯玉祥退出北京至昌平南口防守，奉系占领京城。此时，张作霖与吴佩孚实现了直奉联合，组成"讨赤联军"，将冯玉祥的势力赶至绥远。然而事后，张作霖并未给予吴佩孚好处，北洋政府自此之后一直都被奉系所控制，直到北伐结束。

1926年7月，蒋介石开始北伐战争，吴佩孚、孙传芳等被击败，冯玉祥、阎锡山等加入国民革命军。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往关外，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南京国民政府得到国际承认成为代表中国的合法中央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势力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各个地方军阀势力依旧盘根错节，心怀鬼胎，蠢蠢欲动。

西南

在南方，桂系、滇系、粤系和亲孙中山势力围绕着两广地区和广州政府的控制权争斗。湘系（湖南军阀）、川系（四川军阀）则长时间维持了自主性，主要围绕在省内的斗争，并未参与正统权之争。闽系（福建军阀）则

主要依附在北京政府之下，未有实质作为。

在广西，清朝广西提督陆荣廷借由支持辛亥革命和“桂人治桂”的政策成为了广西都督，之后更通过参与护国战争巩固了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史称旧桂系。护国战争胜利后，黎元洪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但原广东督军龙济光不愿退职。陆荣廷遂派桂军进攻，击败龙济光，广东成为旧桂系的势力范围。由于不满黎元洪被架空和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陆荣廷宣布两广自主。

同时，滇系统帅蔡锷于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不久后去世，唐继尧掌权，坐镇云南和贵州，与川系军阀时有摩擦。1921年，滇系将领顾品珍叛变，滇系分裂为顾品珍部和唐继尧部。

与北京政府不同的是南方军阀最初缺少正统政府的名义，因此在北京政府府院互斗后，南方军阀开始找寻可以拥戴的正统象征。陆荣廷与唐继尧借着1917年7月护法运动的机会招揽孙中山与部分国会议员到广州另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则任元帅，意图北伐对抗北京政府。然而护法军内部各主要军阀势力主要盘算是将广东收归自己的统治，而非实际推翻北京政府，因此三人渐生嫌隙。1918年4月，滇系和桂系开始排挤孙中山，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邀西南各省军阀为总裁，由于职权遭到架空，孙中山在1918年5月4日辞职，离开广东到上海。护法军政府在此之后开始内战，桂系试图清除在广东的滇系战力，因此逮捕滇系将领张开儒、枪杀崔文藻，将滇系军队逐出广东，陆荣廷的桂系势力达到其权力之顶峰。

1920年，直皖战争在北方爆发，与此同时，桂系发动第一次粤桂战争，派兵攻打亲孙中山的粤系陈炯明和许崇智所辖军队，却被击败，退回广西。孙中山遂从上海返回广州，于1921年4月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召开非常国会，就任非常大总统。6月，桂系为夺回对广东的控制权，发动了第二次粤桂战争，却再次败于粤军。二度战败导致了桂系实力弱化，进而分裂。

以保定军校毕业的青壮派军官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部队在随后的广西内战中逐步崛起，并击败了清朝时代的旧军头陆荣廷、沈鸿英，再次统一广西，成为广西军阀的新领袖，被称为新桂系。

另一方面，1922年，孙中山在第二次粤桂战争胜利后，要求陈炯明北伐，陈不从，被免职。然而，在北方，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再次就任大总统，护法运动目的达成，各方要求孙中山卸下其非常大总统一职。陈炯明部下叶举为迫使孙中山下野，出兵围攻广州总统府，孙逃亡，再赴上海，史称六·一六事变。

1923年1月，孙中山联合滇系杨希闵部（顾品珍派）、桂系刘震寰部及倒戈的粤军，共同讨伐陈炯明。2月陈炯明被击败，退守东江。孙中山也于2月回到广州，再任大元帅，但是广州仍然被杨希闵与刘震寰给主掌，孙中山的立场并没有比1918年要更为稳固。孙中山鉴于缺少忠于自己的武力，选择了与苏联联手，在1924年开办黄埔军校，组成国民革命军，成为南方军阀的一部分。

1925年起，蒋中正指挥国民革命军开始扫除广东内反孙中山势力，并两次东征陈炯明，并在其间歼灭了试图反叛的杨希闵与刘震寰。在1925年3月孙中山病死，国民革命军于广东持续内战期间，滇系唐继尧部决定支持陈炯明，欲与新桂系联手向广东发兵歼灭广州国民政府，但李宗仁回绝这个同盟构想，唐继尧组成贵州、四川与云南省军阀联合军（川黔滇联军）企图歼灭新桂系，却反遭击溃，是为滇桂战争。陈炯明最后遭到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及国民革命军给消灭，逃往香港避居。

国民革命军北伐前，新桂系与广州国民政府结盟，形式上完成统一，并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随后以唐生智为省的部分少壮派湘系军阀在省内内战失势后转投广州政府，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后，国民革命军陆续将击败旧有的湘系与闽系军阀，黔军王天培、彭汉章在1926年7月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川系刘湘在1926年12月与接受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

1927年4月，贵州督办周西成归顺国民政府，任贵州省政务委员会主席。1928年，滇系龙云在二六政变中推翻唐继尧，并打败对手胡若愚后，也于名义上归顺蒋介石，任云南省主席。

在龙云归顺后，西南军阀割据时期结束。广西、贵州、四川、云南是以名义上归顺改编，因此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省务仍维持半独立的地位。福建、湖南则是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遭到清除，由亲国民政府的军阀主政。广东则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由地方实力派军人陈济棠结合以胡汉民为首的反蒋中正派国民党元老重新取得了半独立地位。

社会方面

军阀混战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政权分裂无法落实区域性经济发展计划，阻碍中国现代化；军阀往往把控制范围内资源、物力花于战争和其他军事用途。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发展：外因是第一次大战期间，国际市场对中国民用工业制成品及中国农矿初级产品原料需求大增；内因是北洋政府大部精力争夺地盘，放松控制现代经济，有助民族工商业兴起；同时留学生出国学习盛极一时，使中国培育第一批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经理和技术人员，形成新社会力量，有助工商业发展。

由于战争和天灾，到处出现饥荒，军阀割据使传统全国性官方救济机构停顿，大量农民离开村庄，人口大迁移，社会动荡。

中央政权崩溃后出现思想革命，社会文化出现自春秋战国后另一次百家争鸣。

中华民国军阀与地区政权列表

皖系：段祺瑞、倪嗣冲、张敬尧、陈树藩、卢永祥、张怀芝、曲同丰、王永泉

直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齐燮元、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寇英杰、彭寿莘

奉系：张作霖、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冯占海、郭松龄、杨宇霆、常荫槐

晋系：阎锡山、傅作义、商震

冯玉祥国民一军：冯玉祥 、宋哲元、石友三、吉鸿昌、张之江（原直系，后变节自立）

胡景翼国民二军：胡景翼、邓宝珊、岳维峻

孙岳国民三军：孙岳、庞炳勋、刘汝贤

镇嵩军：刘镇华、憨玉琨、张治公

湘系：赵恒惕、唐生智、程潜、谭延闿、何键

滇系：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

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林虎、谭浩明、莫荣新

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夏威

粤系：（前）陈炯明、邓本殷、（后）陈济棠

黔系：刘显世、王天培、彭汉章、周西成、王家烈、袁祖铭

川军：刘湘、邓锡侯、杨森、刘文辉、刘存厚、李家钰、田颂尧

直鲁联军：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徐源泉、孙殿英

五省联军：孙传芳、孟昭月、卢香亭、陈调元、白宝山

马家军：马鸿宾、马鸿逵、马麒、马麟、马步芳、马步青、马仲英

陕西：杨虎城、郭坚、党玉琨

新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

曾宣布独立的民族政权

外蒙古：博克多汗国

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

内蒙古：蒙古军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东北：满洲国

新疆：阿勒泰哈萨克复兴委员会、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其他

山东：韩复榘（原西北军，后投蒋介石，并取得山东省的统治权）、刘珍年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中国工农红军及苏区：中共中央革命军委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周恩来

==

==

==

==

==

=================

四一二事变

【1923年的国共】

1922年，广州的国民党和军阀的联盟破裂，孙中山再次逃往上海。这时孙开始意识到他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1923年，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苏联将协助中国的国家统一。

苏联的顾问，当时第三国际的鲍罗廷于1923年抵达中国以帮助国民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要求下开始与国民党合作，中共成员被鼓励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并保持其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小党派，在1922年时只有300名党员，到1925年时也只有1,500名党员。而国民党在1922年时已经有150,000名党员。

苏联顾问也帮助国民党建立起政治机构，培训宣传人员动员群众的技巧，并于1923年派遣孙中山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担任陆军上尉的蒋中正到莫斯科进行为期几个月的政治和军事培训。蒋中正于1923年底回国后参与建立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1924年，蒋中正成为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成为政治部主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4%B8%80%E4%BA%8C%E4%BA%8B%E4%BB%B6

（引述维基百科相关文字）（对于原始历史资料不清的部分内容有所删节）

四一二事件，是中国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共产党称此事件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领导中国国民党右派党员，在上海青帮的帮助下，大规模逮捕、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取缔苏联顾问。

背景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中国国民党，提出联俄容共。大量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等，协助国民党建立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广州市长洲岛成立黄埔军校，准备北伐。

西山会议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分化。汪精卫掌握政权，蒋中正则掌握军权。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并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是为西山会议派。

会后，此派人士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政治纲领是反共，反对汪精卫的“联共”，长期与支持“联俄容共”的以廖仲恺、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不合。

苏共影响

1926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顾问鲍罗廷影响下，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后”为理由，在国民革命军中发表北伐必败论，并于广州市区散发传单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讨论北伐统一问题，并通过反对北伐的重大决议。

1926年春，苏联领袖加米涅夫、共产国际领袖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组成新反对派，向托洛茨基倾斜，双方组成反对同盟（联合反对派），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在争论中，中国北伐成为争论热点。斯大林忽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选择一条较实际政策。他告诉中国共产党停止煽动下层群众，遵守中国国民党命令。与列宁一样，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资产阶级在中国可以打败西方帝国主义并完成革命。而托洛茨基则想让中国共产

党继续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反对中国国民党。在北伐中，斯大林资助中国国民党。在秘密谈话中，斯大林反驳托派批评，认为蒋介石右翼代表是中国唯一可以击败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仅如此，富有商人还可以资助蒋介石，因此可以像柠檬一样在被榨干用处之前利用他的军队。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蒋介石武力平息中山舰事件，和鲍罗廷及中国共产党间产生龃龉，国共关系陷入危机。陈独秀、鲍罗廷对中国国民党右派妥协。5月15日至5月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国共产党。主要内容有：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

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

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

北伐期间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口，11月8日攻占南昌，蒋到南昌指挥进攻孙传芳。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则极力主张迁都他控制的南昌。11月22日，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大会，布哈林批评中国共产党在暴力夺取土地所有者土地方面不够坚决，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支持民族革命同时，着手解决农民觊觎地主土地问题。会后便采取所谓土地革命与国民革命上的双重

支持策略。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一个月后，南昌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央党部驻南昌。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2月21日，中国国民党武汉中央决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要求苏俄第三国际撤回鲍罗廷。【蒋手下少壮派陈果夫、陈立夫、温建刚等，一面全力夺取其军力所及之各地党政权力，一面加紧准备与武汉破裂之条件。其中关键之处，是取得北伐军所过法理上之党政大权。随着南昌会议召开，原本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占优势的中国国民党部相继被捣毁。3月6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杀。随着蒋军向北向东推进，这股夺权风潮由江西、安徽、福建、浙江，迅速扩展，陆续在九江、安庆、宁波和南京捣毁中国国民党左派报社、工人总工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党部，枪杀、逮捕中国共产党员与抗议游行之工人群众。】【本书编者注：此段文字存疑，原始历史资料来源不清；该段文字中细节也含混不清；北伐以前，江西等地都被军阀统治，中共势力以及国民党势力在当地应其实很小，因此其实应不存在所谓蒋部“夺权风潮”；另外，正如下文所述，中共及其所控制和煽动的工会、农会在各地进行许多暴力、私刑活动，因此导致许多冲突。由于维基百科是开放式编辑平台，所以这段文字很可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内部御用文人翻墙出来所添加的内容】。

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中国国民党左派亦占三分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中国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全权把持。

会议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中国共产党员苏兆征任劳工部部长、谭平山任农政部部长、林伯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武装卫队，动私刑杀害他们判定之工贼。斯大林派罗易到武汉协助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成为有武装权力的组织。

在武汉，鲍罗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介石北伐途中剥夺蒋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全会结束后不久，武汉国民政府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江右军总指挥程潜执行，但程潜没有执行。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决计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与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驱逐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解决办法，建议蒋亲自去武汉说服中国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争夺上海

192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上海工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第一次武装暴动”失败。1927年起，在苏联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持续排外，上海财阀虞洽卿和钱永铭到南昌亲访蒋，答应为蒋筹集军费，条件是要求蒋“维持上海现状，反对赤化”。

2月19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占领杭州。

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第二次武装暴动”，再次失败。

3月20日晚，国民革命军东路军进入龙华，包围上海。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国民党钮永建和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等领导下，发起“第三次武装暴动”，占领租界外的上海市区，建立一支工人纠察队2,700人。

3月22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上海。北伐军先后克复上海、南京。

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中路军攻下南京。国民革命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等部杀害、掠夺外侨。英、美、日领事分别报告，以大量事例证明抢劫领事馆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蒋下令追查负责任者。英美军舰以此为由炮击南京，遂形成国际冲突，是为“南京事件”。入南京部队与英国人发生冲突，英舰炮击南京，蒋严电阻止事态扩大，静候政府以外交解决。

3月25日，白崇禧说：“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将负责缴械。”

3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在上海提出护党救国案。

3月29日，中国共产党请示苏联，强调准备抵抗。

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烈钧等）举发中国共产党破坏革命，危害国本之逆谋，决议非常紧急处置案。白崇禧任淞沪卫戍司令，配合蒋在上海清党。

中国国民党右派，如蒋等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势力日益膨胀，“党中有党”，如不早日剪除，今后会更难控制。”

另外，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攻克的地方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

策，“无端杀害其所谓阶级敌人，并剥夺其合法财产”，也被视为清党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

在国民革命军北上过程中，长江流域约有上千名传教士逃离驻地，前往上海避难。1927年初，汉口英租界和九江英租界受到冲击并被国民政府收回，于是，上海2个租界当局采取空前行动，以确保租界安全。

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参加者包括蔡元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进行反共清党准备工作。

4月1日，汪精卫穿越西伯利亚再转苏联邮轮，从欧洲赶回上海。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向汪投诉中国共产党问题。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陈书面答复汪精卫，并要求他签字，于4月5日以《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在报上发表，强调国共团结。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则命蒋介石未得政府命令前，不得发表外交意见，改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解除了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武汉政府下令，突免蒋公职。4月6日，汪精卫离开上海赴武汉。

4月5日，青帮、洪门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组织右派团体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上海总工会。

另一个造成紧张的要因，是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

蒋张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张作霖在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了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苏联全面指挥取代中国政府运动；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

同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辉、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

4月11日，蒋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4月12日， 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蒋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彻底清除中国共产党份子。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各级政府、公家机

构及军队中处决或禁锢，死亡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抗议【本书编者注：维基百科文字在这里有一些关于蒋介石武装镇压的血腥过程的绘声绘色的描写，但是没有相关历史资料来源】。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

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马日事变）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月17日，蒋与一批右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

4月18日，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发表告民众书。蒋等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

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

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

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把二十名逮到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有事实证据联合苏联密谋颠覆中国政府，执行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

5月，蒋组织清党委员会，全国各省厉行清党。

5月21日，湖南的武汉国民政府属下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

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中国共产党掌控武汉国民政府，并处决所谓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

7月15日，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并全面控制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合谋武力夺取武汉国民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中国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汪精卫在得知苏联与中共合作夺取政权的计划后，武汉也宣布进行和平分共取缔中国共产党及苏联顾问，但仍坚持要蒋下野。

8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南昌起义”（国民政府称为南昌暴动）进行全面摊牌。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不久汪精卫又鼓励唐生智与张发奎分别于10月爆发宁汉战争、11月爆发广州张黄事变，但南京国民政府皆获得战争之胜利，迫使唐生智、张发奎等出国流亡。

因苏俄驻华使领馆掩护及扶持中国共产党武装革命，国民政府于1927年12

月14日宣布与苏俄断交。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

。。。。。。。。。。。。。。。。。。。。。。。。。。。。。。。。

。。。。。。。。。。。。。。。。。。。。。。。。。。。。。。。。

。。。。。。。。。。。。。。。。。。。。。。。。。。。。。。。。

。。。。。。。。。。。。。。。。。。。。。。。。。。。。。。。。

。。。。。。。。。。。。。。。。。。。。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914/1173843.html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被掩埋的真相！

作者： 祝春亭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当人们对比当局刻意封存的史料，问题就来了，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还是自诩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背叛国民党？

大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命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今天一群人拿枪气势汹汹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当局会作何反应？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1、国共合作，是国共双方的权宜之计，合是暂时的，分是必然的

后人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是为党派之争编造出的谎言。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钱文军说：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孙中山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他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孙中山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中山不赞同共产革命的一套，为何要“联俄”、“容共”呢？孙中山搞共和四处碰壁，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联俄”是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苏俄是共产党政权，那么他必须“容共”。所以说，孙中

山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广州军政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只是一时的策略。

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也在算计国民党。

我们必须明确，经列宁“创立”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专政的新政权”。这句简缩之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北伐战争（当时叫大革命），尽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权却落到国民党手中，共产党没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夺国民党的权，让共产党真正掌权。

2、共产党计划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

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3、北伐军在前面卖命，共产党在后面革命

尽管共产党人大量向北伐军渗透，但是大部队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们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勋卓着。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革命之火烧到哪里。

由于长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圣的。其实，“革命”本是一个中性词，即激烈或颠覆性的变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带有颠覆性，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荡。国民党在军事获胜后希望稳定，而共产党希望社会大动荡，大动荡有利于他们夺权。

共产党跟在北伐军后面烧革命之火，是通过“扶助工农”进行的，为他们以后建立政权打下民心基础。

“扶助工农”绝非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革命筹款主要依靠富人：华侨或资本家。“扶助工农”是孙中山讨好苏俄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共产党政权自称是工农政权，其实就是依靠并利用工农建立的党政权。【本书编者注：此文作者在此文字有失偏颇；孙中山的确对于“扶助工农”这样的理念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认同，因为孙中山的理想就是那样一个平民主义的所谓中华民国。】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工人要做贵族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

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不会有人想做老板，再不会有人投资办厂开店。

提出异想天开要求的，当然不止是赣州的店员，北伐最先拿下的两个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员中的“积极份子”提出的奢求，一点也不比赣州的店员逊色！

千万别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纵容工人实现“贵族”的梦想。实现贵族梦想的是打江山的领导层，号称“红色贵族”，所谓工农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在新政权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举行罢工，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无情镇压。

5、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更令人胆战心寒！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

“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6、共产党在后方捣乱，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拚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

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共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共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8、中共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共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暗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此举远在“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练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自称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共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

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份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

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立三，秘书长刘少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份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共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产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鲍威尔继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自卫，杀反动派，为死者报仇，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枝。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

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势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抽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抽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产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枝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即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产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暴徒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暴徒，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四一二事变，蒋介石没下命令，这场事变究竟有多血腥？

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而是驻沪守军情急之下的报复性自卫。其后几天，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工人骨干，以及普通劳众，主要是杜月笙为首的帮会出面干的。

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挽救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导：“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老毛“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
。。。。。。。。。。。。。。。。。。。。。。。。。。。。。。。。
。。。。。。。。。。。。。。。。。。。。。。。。。。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7/12/27/n9996650.htm

揭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历史真相（上）

作者：袁斌

在所有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中都写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中共建党之初，中国人中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人居多，而相信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则很少。为了让中共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俄共根据自身

的经验，指使中共加入国民党，“借国民党的躯壳，以发展自身的组织”。

而此时的孙中山因为建立新政府受挫，对于苏俄多次派人来寻求合作的意愿也未拒绝，但并不同意将国民党更名为共产党，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于是，苏俄一方面命令全体中共党员迅速加入国民党，一方面派代表与孙中山联合发表宣言，称“绝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以此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而希望借助苏俄势力的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容共”的做法，但他一再提到的原则就是“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便应该服从纪律，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

但中共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却根本不遵从孙中山提出的原则，一方面，以亲俄亲共和远俄反共为界限，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左派和右派之分，开始了左派对右派的反对和斗争，甚至将不亲俄亲共的国民党人骂成了“反革命派”，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另一方面，中共借着孙中山“联俄容共”的契机，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进入了国民党的宣传、组织部门以及黄埔军校，从而从内部控制了国民党；中共还违背自身“决不在国民党中组织共产党党团”的公开声明，在国民党中组织地下党团，在黄埔军校建立地下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地下中共党员。

为了苏俄的利益，中共甚至将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比如当1924年7月，苏俄煽动外蒙独立，国民党公开指责苏俄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却没有一人与国民党同持应有的反对立场。相反，由于苏俄与北京军阀政府建交并订立“中俄协定”，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等，竟在苏俄指示下立即承认北京政府，公开违背参加国民党时所发表的关于反对和不承认北

京军阀政府的声明，并支援苏俄强行在外蒙驻军，甚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此外，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还全然不顾孙中山提出的“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原则，在中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等不断地登载批评国民党组织上的缺陷和缺点的文章。

由是可知，共产党员虽然参加了国民党，却非但未以国民党为本党，甚至为听命苏俄，而不惜公开反对自身亦在其中的国民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员的不满。在国民党中处于上升势力的蒋介石为了护党，于1926年3月26日利用“中山舰事件”，提出了整理党务，限制国民党内共产党的领导权，并进而提出继续北伐，在数月之内统一了中国南方。

为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壮大，苏俄与中共首先坚决反对北伐，当反对不成时便利用北伐在所到之地发动共产革命，继而破坏北伐。1927年4月，鉴于苏俄和中共在北伐中的种种行为，鉴于孙中山先生“坚持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推进国民革命、反对共产革命，主张人民民权，反对共产专政，建立共和国家、反对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之联俄容共做法的根本原则已为苏俄与中共所毁，鉴于国民党再度分裂、国民革命阵营内乱频生，叛乱将至，北伐已经无以为继，鉴于需要一个真正的国民革命政权和一个真正中国人的政府，来领导国民革命和完成北伐，蒋介石决心实行“清党”，并重建中华民国南京政权。

由于中共为夺取上海政权，一是在军阀驻沪军队已经表示向北伐军投降、上海即将和平解放之时，曾抢前发动三次暴动，并自组“上海市民政府”，更宣布这个市民政府“就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苏维埃、巴黎公社。”；二是陈独秀、罗亦农等推动“武力进攻蒋军”，并驱使工人纠察队袭击租界，意

在激怒列强，挑起国际事端，并认为“此一决斗，实比对直鲁军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三是煽动工人罢工闹市，无了无休，使沪上商人“自国军临沪以来即处于憔悴呻吟之下”，而中共在上海的各级工会不仅自持武装，并且拥有一支两千人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已造成另有一个上海政权的存在；因而，在国民党中央监委已一致决定“清党”以后，1927年4月12日晨，驻沪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即在白崇禧指挥下，解除了上海各处工人纠察队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召开市民大会，发表“全面罢工”宣言，并于会后持枪武装集合进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部，迅为第二师弹压。中共叛乱武装当场被逮捕九十多人，其中竟有四十多人身藏直鲁匪军特遣证章。随后，国民革命军又接收了中共在上海的总指挥部 —— 上海总工会。这就是中共恨之入骨的所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那么，这次事变是否如中共所言，是一次“反革命政变”呢？对此，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反革命’究竟是谁？在共产党的教科书里，这个‘反革命’就是国民党，而今天在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反革命’不是国民党，因为那个时候的反革命只有一个人是军阀，北伐打倒军阀，就是在打这个反革命，在打这个打反革命的过程当中，第一，全国人民都是非常赞成和支持的；第二，凡是打这个反革命军阀的，那他就是革命的，凡是不打这个军阀的，制造混乱的，那他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那么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军正在打这一伙军阀，你怎么能说他是反革命的呢？而恰恰在打军阀的过程当中，在斯大林亲自命令之下，中共一次又一次的破坏北伐，甚至于要用武装暴动的办法提出‘南伐’，要打回广东去，以阻止中国国民党打垮北洋军阀，统一全中国，你想到底谁是在逆革命而动呢？到底是谁在做着有利于北洋军阀的事情呢？那是共产党。”历史的事实是，中共明明要政

变北伐成功后的国民革命新政权，却将国民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而扑灭政变的不得已手段，不仅垢之为“政变”，甚至反污为“反革命”，此亦无非是中共一己的“逻辑”，即政治的谎言罢了。

。。。。。。。。。。。。。。。。。。。。。。。。。。。。。。。。
。。。。。。。。。。。。。。。。。。。。。。。。。。。。。。。。
。。。。。。。。。。。。。。。。。。。。。。。。。。

==========================

宁汉分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A7%E6%BC%A2%E5%88%86%E8%A3%82

（有删节）

宁汉分裂是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期间，国民党内部以南京蒋介石为首的清共势力和武汉汪精卫为首的容共势力发生分裂的事件。宁、汉分别指南京（旧称江宁）和武汉。

经过

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9月7日，北伐军攻占汉口，11月8日攻占南昌，蒋到南昌指挥进攻孙传芳。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武汉。

1927年1月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移驻南昌。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在武汉召开。会后以汪兆铭、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2月26日，蒋介石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要求苏俄共产国际撤回鲍罗廷。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凭借中国国民党会议增设劳工部、农政部以中国共产党员苏兆征、谭平山担任部长，中国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另组成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向忠发、刘少奇、李立三为首，组织武装卫队滥动私刑，杀害他们所判定的工贼。斯大林也派罗易到武汉协助鲍罗廷组织农工阶层展开土地革命，农民协会、土地委员会成为权力武装组织。随后鲍罗廷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决议“迎汪复职，以与蒋分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

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同时为防止蒋独揽专权，会议缺席，选举汪兆铭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并决议不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改为7人集体领导，免去原来由蒋担任上述职务，将蒋降为普通委员。

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说“革命责任，不容诿卸”，“誓必负责完成北伐”，并力劝同志“坚守国民革命立场，维持国家社会秩序，团结一致，解救民众痛苦”。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决计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回国的汪兆铭商讨发动清党工作，驱逐苏联顾问，同中国共产党决裂。汪兆铭提出避免过激解决办法，建议蒋亲自去武汉规劝说服中国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党部迁到南京。

1927年3月24日，中国共产党成功策动南京事件的排外行动，洗劫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打死法人一，英人二，及多人受伤，引发国民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间的国际事件。

1927年4月1日，汪兆铭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到上海与蒋会面，汪承诺阻止武汉反蒋，而蒋则支持汪主持党务。4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等在上海开紧急会议。会议中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

4月6日，汪兆铭抵武汉。

同日，张作霖得到了公使团的同意，派遣中国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的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的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

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

1927年4月9日，蒋离开上海赴南京。

4月12日，蒋中正联合上海青帮、洪门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的“上海共进会”，联同军队在上海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上海总工会等组织，捕杀一批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是为“清党”（清除有中国共产党员身份的中国国民党员）。

广西、广东则亦分别在黄绍竑、李济深主持下开始清共。

1927年4月17日，位于武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并开除党籍。在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中正、柏文蔚等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宁汉正式分裂。武汉方面即下令开除蒋中正的党籍并予以通缉，南京亦下令通缉约二百名共产党人。

4月19日，苏联召回其在北京的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

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

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兆铭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之分裂行为。形成“宁汉对立”。

1927年5月中，经过李宗仁及朱培德居中斡旋，武汉及南京避免开战，决定暂时分头继续北伐。月底，共产国际决议改变中国共产党方略，准备武装工农成立新军、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但仍然留在中国国民党内，意图使中

国国民党及武汉政府成为工农革命独裁机构。

另一起因

4月底，何键率军北上，至河北一带与张作霖奉军作战。

与此同时，郭亮、柳直荀、夏曦等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分子，于1926年中起在湖南展开土地改革，于各地成立农会组织，斗争地主及富农，并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土豪劣绅”。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官多为湖南士绅阶层出身，为数不少军官家庭于后方受中国共产党批斗。何键父亲在长沙被抄家，逮捕后游街示众。

湖南军界中于是逐渐出现严重反共情绪，最终在1927年5月21日引发马日事变。三十五军驻长沙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在内政部暗中指示下进行清党，封锁中国共产党各机关，解除中国共产党武装、逮捕和处决中国共产党人。月中，冯玉祥先后会武汉及南京政府后决定支持南京，在其军中亦展开清党。

1927年7月，武汉的汪兆铭政府识破苏联侵华企图，知悉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遂决定在武汉和平分共，取缔中国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

7月2日，武汉政府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机关，同时调掌握之各军沿长江而下，准备东征南京。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之共产党员。

7月15日，武汉政府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两广和湖南等省亦分别在李宗仁、李济深、何键、朱培德等主持下开始清共。

中国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退到农村地区发展。

8月1日，武汉政府军事主力，张发奎部下之中国共产党员在南昌发动兵变。武汉国民政府事后承认疏于防共，宣布通缉中国共产党员。

8月14日，蒋中正下野。

8月19日，武汉政府宣布迁都南京。9月初，汪兆铭亲抵南京，宁汉正式复合，是为“宁汉合流”，但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决裂，持续十年斗争。

===
===
===
===
===
===
===
===
==

===
===
===
===
===
===

民国初期的东北、张作霖、张学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8%9C%E5%8C%97%E5%9C%B0%E5%8C%BA%E5%8E%86%E5%8F%B2#近代

清朝早期，满洲被列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进入。

鸦片战争之后满洲地区的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1861年至1880年代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1882年（光绪八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1885年设立吉林电报局，1883年，满洲第一家近代机器工业制造厂吉林机器局投产。光绪末年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与日俄战争严重动摇清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迫使其废除满洲的旗民分治制度，设立行省。

1896年，帝俄通过《中俄密约》得到了在满洲境内修建铁路的特权，并于1898年取得了旅顺-大连租借地。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渐加强向满洲的扩张。日本于1906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公司的名义在满洲实行殖民经略，并且鼓励朝鲜人向满洲大量移民。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八日（1907年4月20日），废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地将军衙门，改设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盛京将军改称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为总理三省军、政、旗务最高长官，建署于奉天。徐

世昌首任东三省总督。各省设巡抚一员，为本省之长。唐绍仪首任奉天巡抚。随后裁撤各城副都统、总管，所有旗民统归行省管辖。实行省、道、府（直隶厅、州）、县（散厅、属州）四级制。更定东三省官制。设置行省公署，并奏准创行同署办公新制，奉天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设左、右参赞，分领承宣、谘议两厅，另设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蒙务7司，及提法使、督练处等官，分掌全省民政、财赋、司法监督等各项政务。自此，行省公署成为统一的地方行政中枢。1909年6月12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奏准裁撤奉天左、右参赞及承宣、咨议两厅，裁减各司道局处冗员，每年可节省银40余万两。

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波及69个县（大连、北京、天津、保定、旅顺、芝罘、济南等地先后都曾出现鼠疫患者），共死亡6万余人，除了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之外，还严重影响经济。在奉天出现了挤兑风潮。在铁岭、锦州、营口、安东等地，因交通阻断，市面缺货，大量商铺倒闭，商品价格疯涨。在哈尔滨，因货物减少，关税的征收受到影响。学校和工矿也纷纷停课和停产。

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省领八府、八厅、六州、三十三县；吉林省领十一府、一州、五厅、十八县；黑龙江省领七府、六厅、一州、七县。

东北人口在1850年还只有291万人，1880年452万，1910年已经暴增到了1842万。

中华民国时期

奉系军阀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由于局势变化而未能实现。日本随后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满洲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不完全听从日本人的控制，1928年兵败于国民党蒋介石北伐军队，自燕京退回奉天时，被日本关东军的铁路炸弹所刺杀。

1929年其子张学良继位，宣布东北易帜，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红旗，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

满洲国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进攻东三省，张学良退出，满洲地区被日本控制，1932年至1945年，日军扶植清朝宣统帝，在满登基称帝，是为满洲国时期。1932年9月15日，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勤民殿签署《日满议定书》。《日满议定书》规定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并在满洲国驻军担负满洲国的国防。在附件中规定由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此外，还约定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日本有权开发矿山，日本人有权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1934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村举行登基典礼，改“满洲国”为“满洲帝国”，溥仪称帝，改年号“康德”。

抗战后

苏联进军中国东北

1945年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降低美国的损失，于是于1945年在雅尔塔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三国领袖达成《雅尔塔协议》，要求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对日本宣战，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虏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

奸、处死、酷刑)据说这些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5万左右，红军高层军官默许对俘虏的虐待，苏联因为战后男女人口严重失调，苏联女兵和苏联男兵将目光注视到俘虏，进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据说苏联俘虏日本兵的总数是60万，从西伯利亚送回日本的俘虏在20万左右，外加几船的骨灰。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的。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过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在三十年代开始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东北亚最先进的工业基地之一，著名的沈阳铁西区就在东北区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紧邻苏联的关系，许多重工业建设项目也都被安排在东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主要以两个经济带为主进行深入发展，分别是北起哈尔滨，中至长春、南沈阳、大连；另外一条则是辅助经

济带，位于东北东部靠近俄罗斯，朝鲜以及日本海的一些城市：北起牡丹江向南延伸，途径延吉、丹东、锦州、葫芦岛南至大连。其中第一个经济带城市主要以重型工业为基础发展经济，第二个辅助经济带主要以边贸以及旅游业发展为主，以牡丹江做为中心城市发展对俄贸易，以丹东和延吉做为中心城市发展对朝鲜半岛的贸易，另外大连亦可作为一个工业城市亦可作为一个重型的港口边贸城市发展双边贸易。

在共和国后的工业化时代，东北民众的住屋由单位分配的，民众冬季取暖用煤，是作为报酬的一部分由单位承担。当时所谓居民区，其实只是公家单位的员工宿舍。而东北当时的国有企业，产业结构几乎都集中机械加工工业。

东北的经济作物为春麦、大豆、马铃薯、玉米、甜菜、高粱，其农作物分布有些微的区域差异，北部盛产大豆、甜菜、大米等；中部则盛产高粱、小米、棉、花生等，南部则盛产温带水果、玉米、棉花等，有云“寒暖农分异，干湿林牧全，麦菽遍北地，花果布南山”，即说明了当地的农作物分布现象。大连地区盛产苹果、梨、桃等水果，沿海地区盛产海参、鲍鱼、牡蛎、对虾及各种鱼类。黑龙江省的三江平原是中国最大的稻米生产基地。东北也拥有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吉林黄金玉米带，其中长春平原（东北中部平原）被誉为“黑土地之乡”，东北农业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

。。。。。。。。。。。。。。。。。。。。。。。。。。。。。。。。

。。。。。。。。。。。。。。。。。。。。。。。。。。。。。。。。

。。。。。。。。。。。。。。。。。。。。。。。。。。。。。。。。

。。。。。。。。。。。。。。。。。。。。。。。。。。。。。。。。

。。。。。。。。。。。。。。。。。。。。。。。。。。。。。。。。

。。。。。。。。。。。。。。。。。。。。。。。。。。。。。。。。

。。。。。。。。。。。。。。。。。。。。。。。。。。。。。。。。

。。。。。。。。。。。。

苏联战争罪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E6%88%B0%E7%88%AD%E7%BD%AA%E8%A1%8C

苏联战争罪行概略描述苏联军队在1919年至1990年间，其领导人和数目不详成员所犯之严重、并可能违反国际法之战争行为，包括1944年至1945年初在东欧与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战争或武力镇压，特别是谋杀和强奸。至今未有任何国际军事裁判组织对红军领导阶层任何一人就战争罪行在法庭起诉追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红军和大屠杀

早期的苏联领导人曾公开谴责反犹太主义，威廉·科雷写道：“自30年代末以来，反犹太歧视就已成为苏维埃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苏联当局努力遏制反犹太人的偏见，特别是在俄罗斯内战期间，红军部队进行大屠杀时，以及在1919-1920年在巴拉诺维奇的苏波战争期间。

大屠杀受到了红军最高指挥部的谴责，有罪的部队被解除武装，而个别大屠杀者被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有罪的人被处决。仅管此后仍发生了乌克兰红军部队的大屠杀，但犹太人认为红军是唯一愿意保护他们的力量。据估计，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有3,450人，占犹太受害者的2.3%，这些人是由布尔什维克军队谋杀的。

相比之下，根据《摩根索报告》，在涉及波兰责任的所有事件中，总共约有300名犹太人丧生。该委员会还发现，波兰军事和民政当局已尽最大努力防止此类事件及其将来的再次发生。摩根索报告指出，对犹太人的某些形式的歧视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反犹太性质，因此特别避免使用“大屠杀”一词，并指出该词的使用范围广泛。没有具体定义。

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

1922年2月6日，契卡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部分，即国家政治保卫局或格别乌。内务人民委员部宣布其职能是保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通过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来实现的。在实施政治镇压方面，红军经常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支持。作为古拉格的内部安全部队和狱警特遣队，在整个苏维埃历史上的军事敌对时期，内部部队压制了持不同政见者并从事战争罪。他们专门负责维持古拉格的秩序、进行大规模驱逐和强迫重新安置。后者针对的是苏维埃当局假定对其政策怀有敌意并可能与敌人合作的许多民族，包括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朝鲜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

背景

在轴心国方面，种族意识形态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并导致苏联平民在1941-45年德国入侵和占领期间遭受许多战争罪行，估计约两千万苏联平民在战争期间因战斗波及和系统性消灭政策直接导致死亡。

在苏联方面，红军自成立第一天就是意识形态灌输和取向，它是苏联共产政权为了在血腥的俄国内战中保护新政权而设立。红军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利用宣传、思想灌输和无情恐怖来击败白军。因蓄意饥荒、恐怖行动、集体处死、放逐和其他报复惩罚导致的后果，使得俄国内战中平民人口的死伤远高于战斗员，一些研究显示死于此内战的平民人数是战地部队的九倍。这使得红军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执行残暴命令和方针的部队。更甚者，苏联不承认沙皇俄国同意的海牙公约对新政权有约束力，直到1955年才签署。

随着击退德国进攻，苏联部队在1944年进入德国和匈牙利，战争罪行、掠夺、谋杀平民和特别是强奸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数十年来，西方学者一般将在德国和匈牙利所发生的这些暴行简单解释为苏联对德国在苏联境内的暴行，和屠杀苏联战俘的复仇（520万战俘中有360万死亡）。此说法现受军事历史学家如安东尼·比弗的质疑，至少在关于大量强奸的部分。比弗认为红军士兵也强奸俄国和波兰自集中营解放的妇女，并强调这弱化了

复仇解释的可信度。大量强奸也发生在红军占领的波兰城市，例如，在克拉科夫，苏军的到达为波兰人带来的是妇女和女孩被苏联士兵大量强奸，私人财产被残暴劫掠。

自1941年起，斯大林即有意不惜代价向东线反攻，并以极端残暴方式（包括对他自己的士兵）领导战争。红军在二战的死伤高过任何其他军队，部分是因为高人力耗损和训练时间不足。面对装备差劲，几乎无能抵抗机关枪、坦克和火炮的步兵单位，苏联指挥官所使用的战术常是以人海为基本，使自己的部队遭受惨重损伤。此战术并没有被用来清理雷区；利用步兵波次“进攻”以清除地雷的说法本身只是冷战期间的妖魔化宣传，苏联本身也有扫雷坦克以及类似美军的除雷部队投入战场。在苏联最高司令部命令下，撤退的士兵或甚至踌躇不前的士兵将被后方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射杀，斯大林在1941年8月16日第270号命令表示，若发生任何撤退或投降事件，所有参与军官和士兵就地枪决，并可能对他们的家人进行报复惩罚，不过这项命令内容暗示政委只会在后方进行惩处，后来也因为本身无法解释政委在战场上的高死伤率而不全属实，射杀败退官兵的命令本身也因会严重打击士气大多不被指挥官们实行。

在苏联和现今俄国关于“大爱国战争”的历史书，此命令和其他俄国在二次大战的暴行，除少数例外外极少提及。这些证据随着冷战后一些苏联档案向外公开，被西方历史学者发掘和公布。

红军在1939至1941年间，和1944至1949年间，在占领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所犯之罪行，发生后便铭记在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觉中，不过仍然，系统性、由公众控制的研讨只在苏联垮台后才成为可能。这点对苏联在1945年毁弃与日

本的中立条约后在满洲国和千岛群岛的占领地也同样适用。

平民死伤

冬季战争期间

冬季战争，或称苏芬战争，随着苏联在1939年11月30日进攻芬兰展开。在2006年11月，芬兰官方解密了苏联士兵和游击队向芬兰平民进行跨国境突袭的照片，其中包括众多被杀害妇女和小孩的照片以及被吃掉的士兵的人皮照，这些照片被隐匿了如此久的时间以避免扰乱与这个东方强邻的关系。

1939年-1942年

在德苏密约条款下，苏联在德国进攻波兰16日后，入侵并占领了波兰东部，并在这之后如同与纳粹政权商议的，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小国、部分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苏联在所有新控制地区的政策是残暴的，表现出了强烈种族清洗成分。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跟在红军之后清洗占领地的“反苏份子”。波兰历史学家托马斯·恩伯注意到德国特别行动队与此部队的近似。

许多人试图逃离苏联NKVD。那些失败的人极可能成为红军囚犯，并在之后放逐至西伯利亚和/或死在“古拉格”。

1939-1941年期间在前波兰苏联控制区内，近一百五十万名居民被放逐，其中63.1%为波兰人和其他民族，7.4%为犹太人，这些被放逐者绝少活过战争。

依据美国教授卡罗尔·奎格利的研究，红军在1939年俘虏的32万波兰战俘

中至少10万人被消灭。

放逐、处死、酷刑、强奸以及其他各种对人民罪行（谋杀、绑架人质、烧平村落）随着红军在1941年的败退更变本加厉。许多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政治犯被屠杀，以避免让他们落到德国手上。

在波罗的海三小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被捕的反抗份子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附属部队处决，而非留在当地。苏联的这些行为增长了对那些曾帮助苏联的人，或被怀疑为苏联盟友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增长波兰人和其他民族对苏联的仇恨。

1943年-1945年

在战争转折点后，红军与德军战斗时不再撤退，反而主要开始重夺东线失去的土地。对所有被控通敌者进行的复仇行动，导致与D-Day之后在解放法国对通敌者的审判类似的结果。 在波兰，纳粹暴行在1944年末结束，但苏联的压迫仍在持续。在华沙起义期间红军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受争论并被一些历史学家质疑。一些波兰家园军的士兵被迫害、囚禁，并常在假审判后处死（例如维托尔德-皮尔基，奥斯威辛反抗势力组织者）。

德国1945年

根据历史学家诺曼·奈马克，苏联军报的宣传和苏联最高司令部的命令两者皆对红军人员的暴行有责任，其文章一般文意为红军以复仇者的身份来到德国，并有权惩罚。

苏联作家伊尔亚·爱伦堡在1945年1月31日写道:“德国人已在奥佩伦、哥尼斯堡和布雷斯劳受到惩罚，他们已受到惩罚，但仍不够，一些已受到惩

罚，但还未达全部...”。

此外，苏联将军的呼吁也鼓动了士兵，在1945年1月12日，陆军将领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向他的部队发表以下言论:“无论对谁都不应有任何怜悯，因为我们也未得到任何怜悯...法西斯的土地必须成为沙漠...”

在德国方面，即使红军已在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侵入德国领土，任何对市民的有组织撤离皆为纳粹政府所禁止，以提升部队士气。不过，德国市民从来自东线服役的朋友和亲人的消息，很清楚红军对平民的战争方式，并害怕红军。另外，纳粹的宣传 – 为巩固民防以详细画面和阴森方式描述红军暴行如内默尔朵尔夫大屠杀 – 引火烧身使得民间出现恐慌。结果，在纳粹官员撤离后，平民开始自动自发的向西逃窜，逃离推进中的红军。超过两百万德国东部省份（东普鲁士、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的人民死于寒冷和饥饿、战后种族清洗或因卷入战场被杀，很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当难民列被红军部队追上时，他们被坦克撵过、洗劫、枪击、谋杀，妇人和女孩被强奸后遗弃，任其自灭。苏联空军的战斗轰炸机穿透前线好几公里并向难民列攻击。

战后红军将在东线或被苏联俘虏的德军、女兵、市民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和不人道虐待(殴打、处死、酷刑、强奸)，因为战后苏联男女人口严重失调，红军高层军官默许红军在俘虏随意虐待俘虏。这当中也包含了德国女兵被红军的军士官兵轮奸，东线战场也发生许多战争性犯罪，尤其是红军攻破柏林的时候，许多德国女人也沦为红军的施暴对象。

二战中,总共有600万德国平民和士兵沦为俘虏，光是斯大林格勒一次战役中,就有近10万德军被苏联红军俘获。美国人也俘获了大量的德国战俘，这些德国俘虏中,被关押在美国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战俘营里，算是比较走

运的。

而不幸被关押在苏联战俘营里的大约300万德国战俘,命运最为悲惨。他们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再没有踏上故土，在当时，许多德国战俘并不是军人，而是来自平民。德国被苏联人划区占领后，如果一个苏联军人要带走一个德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许多被带走的德国人,原以为登记一下就会回来,所以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但是他们错了。以为两个小时后就能回来的德国人不计其数,他们在战俘营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是一去不返。1955年,战后西德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为了要回关在苏联的最后一万名战俘,不惜访问莫斯科,并低三下四地接受了许多苛刻的条件,才在数年后把这一万名幸存者带回了德国。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骨肉团聚活动。它意味着一万多个家庭得以归于完整。但是另有达100万名的德国战俘就此再无踪影。

那些走的人须承受红军统治的重负:谋杀、强奸、抢劫和放逐。例如，在东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红军占领此城时大约有10万名德国市民居住于此，当德国人终于在1948年被驱逐出哥尼斯堡时，只剩约两万人仍然存活。红军在德国的暴虐在占领期间不断持续，并导致如德明镇之类事件发生。此小城在1945年被苏联部队占领，尽管德明和周边在未有任何抵抗下无条件向红军投降，近900人在苏联指挥官宣布德明开放洗劫三天后自杀。

虽然并未经常有红军大规模屠杀平民的报导，却有小规模处决市民的照片以及案件，例如在特罗恩布里珍有一件已知事件，至少88名男性市民在1945年5月1日在被集合后枪决，此暴行发生在苏联士兵的胜利庆祝之后，庆祝中众多特罗恩布里珍女孩被强奸并且有一名红军中校被不知名人士枪

击。一些研究表示此事件中高达一千人被处死。

波兰1944-1953年

在据有波兰被德军占领的土地后，苏联士兵经常对波兰人进行的劫掠、强奸和盗匪行径，将人民对苏联的态度转变成厌恶、恐惧、甚至仇恨。红军部队也参与了反波兰行为（如追击奥古斯图夫政权，约600人死去）。

中国东北1945-1946年

1945年美国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降低美国的损失，于是于1945年在雅尔塔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三国领袖达成《雅尔塔协议》，要求苏联进军中国东北。苏联于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对日本宣战，进军东北，占领城市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联红军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苏联屠杀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许多来不及撤回日本的侨民被苏军屠杀。

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和葛根庙屠杀。此外还有来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虏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亚集中营强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殴打、强奸、处死、酷刑)。

据说这些日本俘虏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每年死亡人数大约5万左右。红军高层军官默许对俘虏的虐待。苏联因为战后男女人口严重失调，苏联女兵和苏联男兵将目光注视到俘虏，进行强奸或轮奸的行为。据说苏联俘虏日本兵的总数是60万，从西伯利亚送回日本的俘虏在20万左右，外加几船的

骨灰。

同时，苏联亦对中国东北的平民进行骚扰。当时，苏联占领军统帅部是设在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其首领为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而沈阳市的防卫，则是由俄国城防司令卡尔可夫少将负责的。然而，苏联军队军纪败坏，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来往行人。

在市内，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因为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反而会被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

年轻的妇女们，早把头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紧束起来，穿上男人装，以求自保。

苏联士兵甚至使用机关枪射杀，对孩童施暴。

龙应台对此评论道，在纪念碑落成、要求"长春各界人士"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在大街上对妇女施行强暴；连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因制止苏联红军抢劫而遭枪击致死。而苏联军队任意进入住宅，以刀枪威吓强夺物品与奸杀妇女。

苏联当地进行的抢劫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东北人均抱怨："走了个小鼻子，来了个大鼻子。"当地人对苏联红军的厌恶远超过日本殖民者。在此期间苏军的行为甚至影响了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

强奸和绥靖

德国

根据以下资料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强奸了超过两百万德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对1944年至1945年间被红军强奸的受害人数估计如下：——东部省份1,400,000人。苏联占领区（不包括柏林）500,000人。柏林100,000人。另外，许多受害者多次被强奸，一些多达60至70次。

自1945年夏起，被捉到强奸的苏联士兵通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从拘留到处死。不过强奸仍然层出不穷，直到1947-48年冬，苏联部队被官方限制在严密看管的驻地和军营，将他们与东德居住人口完全分离才解决问题。

诺曼·奈马克在《俄国人在德国:苏联占领区的历史、1945-1949》中写道:“不只每个受害者都被迫在她的余生背负创伤，整个东德也遭受到巨大的集体创伤...强奸犯罪在占领的第一天就刻在苏联占领区人们的心里，历经1949年秋东德的成立，并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到今天。”

匈牙利

仅只占领布达佩斯期间，就估计约有五万这个城市的妇女被强奸。匈牙利女孩大多被带到苏联军营监禁、强奸，有时也被杀害，受害者的国籍对这些士兵并没有意义，甚至还攻击瑞典公使馆。

南斯拉夫

虽然红军在1944年仅经过南斯拉夫东北很少部分，但它的行径仍引起当地共产党游击队的严重关切，忧虑他们的共产党盟友做的强奸和掠夺会降低他们在人们中的声望。至少有121件强奸被记录，其中111件也关系到谋杀，另外有1,204件暴力洗劫被记录。斯大林对一位南斯拉夫游击队领袖向他抗议红军行为的回应是“难道他不能理解一位横过数千公里血、火和死亡的士兵找个女人快乐并拿些小玩意吗?”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领袖拉多·克莱门蒂向科涅夫元帅抗议苏联部队在斯洛伐克的行为，得到回应是将之归咎红军逃兵。

保加利亚

因为托尔布欣元帅的部队较好的纪律、相对相近的文化、近一世纪的友善关系和对苏联部队的公开欢迎，强奸相对而言不存在，特别是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被占领状况相比。

波兰

红军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对付波兰的游击队和平民。在1945追击奥古斯图夫政权期间，超过2000名波兰人被俘，其中约600人死亡。

中国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当街殴打中国民众，并众目睽睽下追逐与强暴妇女，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城市的破坏和掠夺

大至上，红军军官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所有城市、村落、农庄皆公然开放掠夺和洗劫。虽然书面命令并不存在，不过有好几份文件描述了红军的行为模式，其中一份文件是布达佩斯瑞士公使馆的报告，描述1945年红军进入此城发生的事，内中说:“在布达佩斯包围战和其后的悲惨数周，俄国（苏联）部队随意洗劫城市，他们事实上进入所有屋子，无论是最穷的或最有钱的，拿走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特别是食物、衣物和贵重品。每一栋公寓、商店、银行，诸多此类，皆被洗劫多次，拿不走的家具和较大的艺术品之类，经常被直接破坏。在许多案例中，洗劫后还将房子付之一炬，造成庞大损失，银行保险箱无一例外的被清空--甚至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保险箱也是--无论找到的什么全部拿走。”

Walter Kilian，柏林夏洛登堡行政区战后由苏联指派的第一位市长，报告了红军士兵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广泛洗劫:“个人、百货公司、商店、公寓...全部被盲目抢劫。”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向斯大林报告，苏联士兵进行的洗劫和强奸可能会导致德国人口对苏联的负面反应和伤害整个东德社会主义的未来，斯大林对他德国同志的忧虑的回答是：“我不会容忍任何人弄污红军的荣誉。”

所有证据，例如报告、照片和其他关于红军洗劫、强奸、烧毁农庄和村落的文件，因而全部自所有在苏联德国占领区（后成为东德）的档案库内抹消。不过在私人记忆、日记和相片簿，1945事件的被尽力保留了下来。

许多时候苏联士兵将建筑、村落、城市部分点火，然后射击任何意图熄火的人。例如在1945年5月1日，苏联士兵将Demmin市中心点火，并阻止任何人熄火，市场周围的所有建筑中，在烈焰后仅尖塔留存。大多数的红军暴行发生在被归类为敌对地域的地方，尽管如此，红军士兵和NKVD人员在1944和1945年经常在波兰洗劫运输火车。

苏联军队占领中国东北后，以‘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建立纪念碑，并掠夺日本做为中国赔款的工厂设施，运回苏联，据统计其金额高达80亿美元，超过德境三倍。

战俘的处置

苏联命令、1945:“一些陆军人员的行为导致了庞大的物质损坏，因为他们破坏东普鲁士城市和乡村里的高价财产，烧毁现已属于苏联的建筑和整个村落...此外发现案例陆军人员使用武器对付德国平民，特别是对女性和老人。发现众多案例战俘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被恶意射杀。”此命令之后继续说明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方式。

在1955年前，苏联并不承认沙皇俄国加入的海牙公约对其有约束力并拒绝签署。这已导致1919-21年波苏战争期间波兰和苏联双方对战俘的野蛮对待。在1955年之前，苏联也拒绝签署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相应的，苏联自二战开始就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先是波兰、之后德国、德国盟友和日本的战俘。

1941年期间，紧急降落的德国飞行组员经常被射杀。酷刑、致残、谋杀和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自1941年6月成为家常便饭。在1941/42年冬，红军每个月大约抓到10,000名德国士兵为战俘，但死亡率高到反而使战俘的绝对人数减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波兰东部及周边国家（主要是现代西白俄罗斯）和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地区的战俘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处决。整体死亡人数仍然未知。

特罗恩布里珍大屠杀

特罗伊恩布里岑大屠杀发生在1945年4月最后一日和5月第一日，在艰苦战斗攻下这个村落后，红军集合了约一千名平民并在附近森林将他们处死，据说这是为了一位苏联高阶军官死于占领此村落的战斗进行的报复。

冷战

根据联合国为匈牙利问题（1956）设立的特别委员会： 苏联坦克向所有他们认为攻击他们的建筑进行无差别射击。委员会收到大量的报告，苏联在没有遭袭的情况以迫击炮和火炮射击城内有人居住的Buda区。委员会收到随性射击无防备路人的报告。根据许多证人，苏联部队向正在商店外排队的人们开火，据述多数受害者为妇女和小孩。亦有许多苏军向救护车和红十字车辆开火的案例被报告。

。。。。。。。。。。。。。。。。。。。。。。。。。。。。。。。。

。。。。。。。。。。。。。。。。。。。。。。。。。。。。。。。。

。。。。。。。。。。。。。。。。。。。。。。。。。。。。。。。。

。。。。。。。。。。。。。。。。。。。。。。。。。。。。。。。。

。。。。。。。。。。。。。。。。。。。。。。。。。。。。。。。。

。。。。。。。。。。。。。。。。。。。。。。。。。。。。。。。。

。。。。。。。。。。。。。。。。。。。。。。。。。。。。。。。。

。。。。。。。。。。。。。。。。。。。。。。。。。。。。。。。。

。。。。。。。。。。。。。。。。。。。。。。。。。。。。。。。。
。。。。。。。。。。。。

继续讲述满洲历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BF%E6%B4%B2%E6%AD%B7%E5%8F%B2

1616年，女真族人努尔哈赤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国称汗，建立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又称为兴京（今辽宁新宾）。1636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定国号为“大清”，当时其领土仅止于满洲地区，但已对退守长城以南的明朝造成重大威胁。

1644年，起兵叛明的李自成建国大顺，并于同年攻陷北京城，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借口协助吴三桂部等原明朝军队对抗李自成而进入山海关内，随后违反约定攻占北京盘据不走，全面展开对中国本土的入侵行动。

从清军入关到其后的数十年时间内，清军陆续消灭华北残余明朝势力、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国、南明和明郑等势力，统一中国全境。

历经康熙、雍正及乾隆三帝，清朝的综合国力及经济文化逐步得到恢复和

发展，建立庞大的领土与藩属国，史称康雍乾盛世，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有学者认为，因为清廷推行文字狱与“首崇满洲”政策而不认同康乾盛世为文化意义上的盛世，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价值极大，清代辑佚学的发展亦修复了不少在古代已失传了的文献著作，而清代文人崇实学、重证据以及注重考辨和考据精神亦在推动汉学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历史，使中国由东亚的中心变成列强环伺的国家。西方列强陆续与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不少在华利益。清朝在抵抗外侮与内忧的同时，也一直处于改革派与守旧派拉锯的局面。在列强入侵的同时西方科学与文化亦引入中国，让清朝发起一连串的改革与革命，如自强运动，促使中国文化的成长与革新。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并使列强瓜分中国。而维新运动随守旧派抵制而告终。在义和团排外失败、引来八国联军后，清廷也推动清末新政，虽取得一些成效，但部分内容让许多立宪派知识分子失望，转而支持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成立，同年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于2月12日退位，清朝正式灭亡。清朝从后金时期算起，共经历十二个皇帝，十三个年号，历时296年，又有满清十三皇朝之称，自1644年进攻中国并迁都北京以来，一共十帝，历时268年。

顺治年间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在汉民聚居之处，置府、州、县、厅，如同内地。

居于黑龙江、嫩江中上游的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族，编入八旗，由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楞等渔猎部落则分设姓长、乡长，由三姓副都统管辖。

由于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因此清兵入关之后对这一地区采取了封禁措施，修建了柳条边，禁止汉族移民进入其腹地。但是在整个18世纪，清政府日益举棋不定，时而封锁移民，时而对汉人渗入柳条边佯作不知。

在19世纪末，满洲因为日本和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而为世界所熟知。俄国向满洲的扩张始于17世纪上半叶。

1858年和1860年，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61年牛庄（营口）开埠，西方势力开始进入满洲南部。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德国德茂洋行、瑞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纷纷在营口开业，各国先后在营口设立领事馆，清朝也设立了营口海关。从1865年至1891年，满洲地区大量出口大豆、豆油、柞蚕丝、以及人参等土特产，进口鸦片、棉纺织品和其它消费品。

清朝早期，满洲被列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进入。由于清朝末年俄国的南下势力抬头，以及朝鲜移民越过图们江开垦长白山地区的情况趋于严重，满洲地区的边疆危机日甚，清朝被迫开放边禁，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

1861年至1880年代陆续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1882年（光绪八年）首先在吉林招垦，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开垦。1885年设立吉林电报局，

1883年，满洲第一家近代机器工业制造厂——吉林机器局投产。

1896年，帝俄通过《中俄密约》得到了在满洲境内修建铁路的特权，并于1898年取得了旅顺-大连租借地。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渐加强向满洲的扩张。

1904年，爆发日俄战争，俄国战败，被迫退出南满。此后日本、俄国和中国三方均加速对满洲的开发。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时称东三省，设巡抚，并设东三省总督。日本于1906年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公司的名义在满洲实行殖民经略，并且鼓励朝鲜人向满洲大量移民。

近代

奉系军阀时期

奉系是中国近代的东北军阀派系，属于北洋系，先后以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为首，并一度成为中国境内最大的军政府。二十世纪初，奉系张作霖接受招安。奉系受到日本支持。1918年，张作霖统一内满洲。后联合皖系与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

日本满洲国政权

1911年清朝灭亡，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由于局势变化而未能实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满洲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张初期与日本交好，之后关系转差，1928年兵败于国民党北伐，自燕京退回奉天时，被日本关东军的铁路炸弹所刺杀。1929年其子张学良继位，宣布东北易帜，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红旗，名义上归顺中国国民政府。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满洲）后，结合部分清朝宗室以及汉人将领、权贵建立的国家，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扶持的傀儡政权[12]:2557其首都设于新京（今长春），1945年8月后迁至通化（今吉林省白山市境内）。领土包括现今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不含关东州），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原热河省）。

满洲国初期为共和体制，以清朝逊帝溥仪为元首，称号为“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3月改政体为帝国，国号满洲帝国（又称大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康德”。虽然名义上为独立国家，但日本透过签订《日满议定书》、关东军持续驻扎满洲等方式，使满洲国变相成为日本殖民地。

1945年8月，日本本土受到美国原子弹的攻击，苏联红军进攻关东军和满洲国军，日本战败；同年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溥仪在通化临江县（今临

江市）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日语：礦山株式會社技工養成所，今临江市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退位诏书》。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获。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满洲国正式灭亡。

苏联军事占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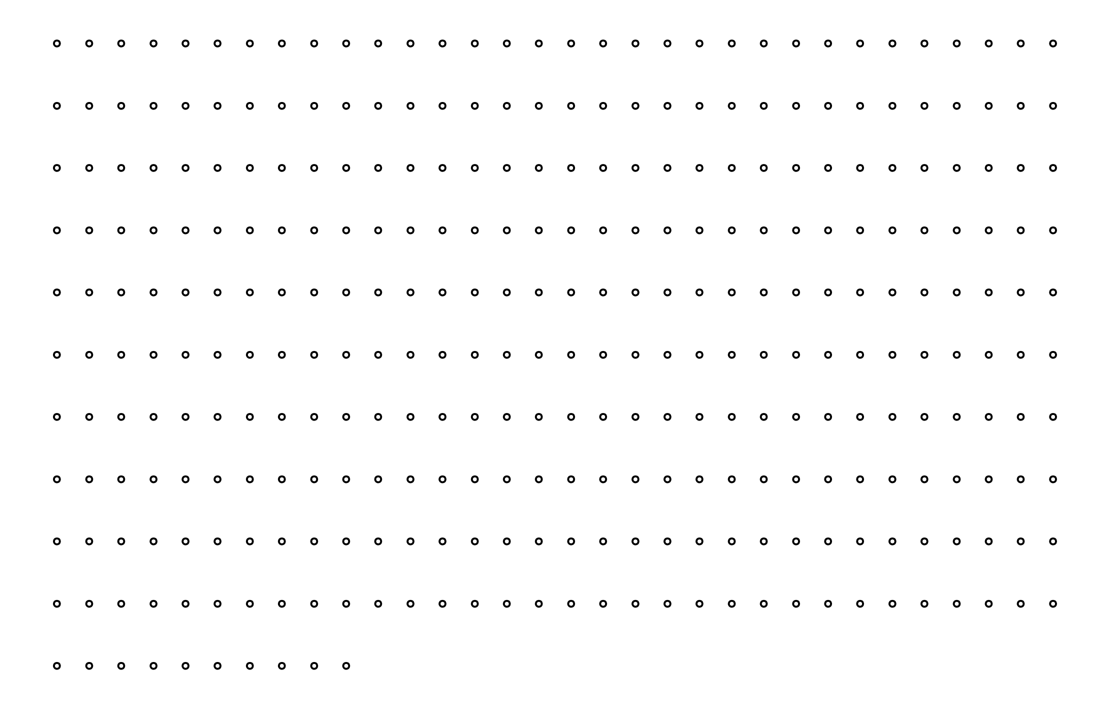
1945年八月，苏联红军进攻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日本战败后满洲国随之解散，后由苏联依据雅尔塔协定进行军事占领。战后因苏联迟未将满洲归还中华民国及运走大量满洲国遗留之物资设备，导致中国爆发反苏运动，苏联最终于1946年5月撤出内满洲，并将其归还给中国。

现代

中国东北地区

1948年，国民政府在辽沈战役中失利，该地区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并在1949年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三省。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以下引述网文）

https://finance.sina.cn/zl/2020-10-29/zl-iiznctkc8355920.d.html?cre=wappage&mod=r&loc=4&r=0&rfunc=52&tj=wap_news_relate

王洪章：新中国成立以前东北经济历史情况

东北亚经济研究院

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第一讲）

本文作者：王洪章（东北亚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

东北经济的历史，其实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情况，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东北经济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我们在此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同时也进行适当的分析和研究。

一、闯关东：东北独特的历史现象

讲到东北经济的历史，不能不提及耳熟能详的“闯关东”现象。“闯关东”是中国东北独特的历史现象。大家都知道，一说“闯关东”，那就是关里人往关外走。“闯关东”的现象对东北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

我们往前追溯到1840年，当时东北人口是300万人，全国的人口大概是4亿人左右。到了1910年，由于“闯关东”，东北的人口增加至1 800万人。新中国成立前期，东北的人口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人。

“闯关东”的由来从近代史上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对中国东北的疆土虎视眈眈，清政府的国力越来越衰弱，对边疆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当时的沙俄始终在觊觎中国的北方领土，不断地骚扰和入侵中国北方边境。有资料记载，1858年到1878年，沙俄派了10多批远征军，非法侵入松花江及其支流，驶抵呼兰、伯都纳、三姓等地。从咸丰十年（1860年）起，清政府对黑龙江实行了局部开禁的政策，主要是对黑龙江正式地提出了“弛禁放荒、开禁放垦”政策，鼓励移民边疆，这时候增加了一部分人口。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彻底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禁令，着手向该地区大范围移民，并且明确提出了“移民实边”“开放官荒”的对内开放政策，通过增加人口抵御外来入侵，振兴关外经济，增加边疆人员。关内大量贫困农民为了谋生计来到赫哲族世居的三江平原，当时也有少量的朝鲜流民来东北采参、挖金。

黑龙江和东北肥沃的土地、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得关内的百姓开始大规模向黑龙江迁徙，使略显荒芜的黑龙江地区人口急剧增加。在开放边荒的最

初时期，黑龙江有40多万人，1895年达到150万人，增长了3倍。为了固守边疆，清政府在黑龙江边界推行的这些政策，增加了边疆的人口，保证了疆域和领土的完整，在当时有一定成效。

其次，19世纪以来，黄河下游连年遭灾，从河南的桃花峪以下的这一河段的长度大概是七八百公里，流域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作为黄河的下游，从郑州开始，包括濮阳、德州、聊城、滨州、济南，一直到东营这一带，连年遭灾，而且连年歉收，甚至是绝收，所以陷入绝境的农民纷纷背井离乡"闯关东"。

到1897年，在清政府对黑龙江全面开禁的政策下，"闯关东"的洪流汹涌澎湃。当时"闯关东"的大部分是山东人，平均每年大概是40多万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总数超过了1830万。如果再加上河南、河北"闯关东"的人口，有资料记载，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闯关东"的人口一度占到东北人口的70%以上。虽然有些"闯关东"的人后来陆续返回故乡，没有留在东北，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4000万东北人口中有3000多万人是"闯关东"过来的。"闯关东"可以算得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也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壮举。

（二）经济技术与文化融合形成发达经济形态

1840年以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航海技术、船舶技术，包括导航技术，发展得比较快，海上的航线使人们突破了海域限制。从山东半岛一直

到关内，包括华东地区，可以通过海路到东北，这就意味着中原的农耕文化已经大规模地与东北的游牧文化融合。山东、河北、河南的以村庄为基础的居住文化和零散居住的游牧文化结合起来，逐渐在东北扎下了根，这实际上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的基本原型在东北得以维系。

另外，“闯关东”带动采矿、挖掘、伐木、淘金等行业的发展，各行各业的工人也产生了，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技能，推动东北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和改进。过去，东北主要是游牧文化，鲜卑族、满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文化的输入，以及东北丰厚的自然资源，再加上从东亚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现代经济模式，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使东北经济一度形成一种有东北特色的发达的经济形态。

这说明，“闯关东”对东北的经济影响很大。近代以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北经济发达到什么程度呢？简单地说，国内领先、亚洲先进、全球同步。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东北长期居于领先的位置，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0年至1930年，主要是军阀统治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930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主要是东北沦陷时期。

二、1910—1930年 军阀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是军阀统治时期，代表人物是张作霖（1875—1928）。从1910年

以后，张作霖在东北逐渐积聚势力，统治东北三省近20年。张作霖作为旧中国的军阀，在政治上反对民主主义，屠戮共产党人。他既是一个军阀，也是恶霸和反革命者。他在1927年逮捕并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同时，他时刻提防沙俄和日本对东北的政治野心，并且多次拒绝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因而成为日本的“眼中钉”。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史称“皇姑屯事件”，当日被送回沈阳官邸后就去世了。

在军阀张作霖占据下的东北，在当时称得上是东亚最富庶的地区，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地区。当时东北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日本的50%，而且东北物产丰富、工业发达，当时东北拥有一流的军工厂、炼钢厂和造船厂，其中钢产量相当于日本的40%，加上煤炭、铁矿石、矿产资源等，东北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农业方面，东北也凭借着富饶的黑土地，使粮食产量居于东亚第一，大豆的产量更是达到了整个世界的60%~70%。

在军阀张作霖占据东北时期，哈尔滨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有当时亚洲最大的面粉、面包、酒精、啤酒生产基地。在通信方面，哈尔滨已经与欧洲实现了双向通信。有研究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北平、上海派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要通过沈阳转经东北。沈阳可以直通欧洲，哈尔滨也可以直通欧洲。到了1931年的时候，整个东北铁路的通车里程是7000公里，而且东北的很多县市都通了公路。东北的工业化水平当时也超过了长江流域。这是东北在经济、工业方面的情况。

在金融方面，20世纪20年代东北就已经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尔滨开设分支机构，而且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有业务往来。在哈尔滨经营

的所有外国商业机构达到1800多个。当时哈尔滨的金融动态可以说还左右着远东的金融形势。1928年从海关收益来说，哈尔滨的滨江海关已经稳居全国六大海关的头把交椅。

东北曾经在金融上与全世界同步，从金融板块的其他方面来看，东北的证券交易和期货交易不比天津和上海晚，而且比上海的规模更大。1919年3月，哈尔滨的商人陈绍清、张凤亭、诸汾泊、于喜亭、张南均、傅巨川、王魏卿、王揆喜8个人发起组建了哈尔滨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交易所，4月下旬就正式开张营业。而上海的股票交易所是在1920年开始营业的，它是由上海的股票商业公会改组成立的，当时被称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由此可见，在证券交易所方面，哈尔滨早于我国的其他地区和城市。

在期货交易方面，1916年海关监督侯延爽和清朝议员孟荣升发起成立了滨江农产品交易信托公司。1922年10月1日，滨江的农产品交易信托公司改名为“哈尔滨证券粮食交易所”，一直经营了十多年，而上海的纱布交易所是1921年7月才成立的，比哈尔滨晚了5年。所以，当年东北这些所谓“新世界”的环境，给东北的商圈提供了多种可能，东北在这个阶段成为我们国家，包括东亚经济发展的翘楚。

三、19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东北沦陷时期

东北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建立了当时亚洲比较完备先进的工业体系，

包括铁路运输、航空、航海、煤炭、钢铁、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沦陷的东北已经悄然地超越了日本，成为亚洲的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已经超过了上海和武汉。

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经济中心。1933年上海的工厂数占全国12个大城市的36%，资本额占全国的60%。1931年外国人在上海的投资达到了11.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的34%。

东北沦陷时期，经济上有几个特点：

一是投入大。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的扶植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潜逃至东北，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到1945年止，日本加大了对东北的投入，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其中1944年达到了顶峰，在日本对全国的61.63亿美元投资中，对东北的投资是52.79亿美元。

另外，日本在金融方面为了阻止当时的国民政府拥有作为近代民主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统一货币体系，于1932年6月在伪满洲国成立中央银行，并进行了货币系统的“整治”，妄图建立日元区。随着1937年日本在上海制造的“八一三”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阻击日本的金融侵略，1937年8月15日发布了非常时期的《金融稳定法》，封锁储备金、控制支付。针对日本的外汇掠夺政策引起的法币汇率的动摇，国民政府取消了无限制供应外汇的法币发行

基本原则，并实施限制汇款和限制返还的法令。

日本对东北的投入是比较大的，虽然东北在生产总值上与当时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苏联和英国等）相比不一定具有可比性，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和追求高水平技术发展方面，仍然具有可比之处。

二是工业基础比较完备。日本在东北沦陷时期进行大量投入，源于其战略野心。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极力想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扶植一个伪政权。从1945年的结果来看，日本经过10多年的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北经济实力已经一度超越了日本本土。日本在东北的投入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选择。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就把东北作为日本本土的延伸，依托东北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市场，全力把东北打造成日本的战略后方。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东北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工业基地，以钢铁、机械、汽车为主的重工业体系已经相对完备。

当时从沈阳到大连这一线工厂及其所在城市是相当密集的，工业化水平直追日本。到1945年时，钢产量已经达到了150万吨，机械、水泥等工业产量占到亚洲的一半以上。反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本土的工业体系已经被美国为首的盟军彻底摧毁了，工业生产能力急剧下降。因此，当时的东北工业在速度、规模和质量上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亚洲的第一经济体。日本妄图长期霸占东北，把东北变成日本的战略后方，才对东北

进行大量的投入，这充分暴露了日本的政治野心和经济野心，是彻头彻尾带有侵略性质的。

三是城市化水平较高。从城市化水平来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11.5%，1942年达到了23.8%。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才达到18.96%。

直到现在，东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全国来看仍然是很高的，2018年达到了62.68%，全国的平均水平为59.58%。从城镇化水平来看，东北也是比较高的。

四是交通发达。从交通运输来看，1932年的时候，东北三省已经开辟了空中航线1.5万公里。而1949年，全国其他地区的空中航线仅为1.14万公里。1943年，东北三省的公路总里程为6万公里。而1949年全国的公路总里程才8万多公里，其中东北就6万多公里。在交通方面东北还是比较发达的。

五是经济指标总体良好。从工业经济来看，东北沦陷时期建成的丰满发电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1943年时，发电能力是22亿度。1936年，沦陷时期东北的工业产值达到了8.07亿元，1940年更是达到了26.47亿元，生产力指数的上升幅度超过了60%。

这两个时期，东北经济呈现出与国内甚至亚洲国家不同的特点：

一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因素。为什么在1945年时，东北的经济能够超过我们国家的其他区域呢？主要还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上海当时外国的投资状况、工业企业数量，以及技术、金融等，其规模和质量是很高的，发展也很不错。日本在建设东北的同时，在华东、华北、中南等地大肆侵略中国领土，在“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了。上海的一些关键性的工业企业被迫搬迁到内地（云南、重庆），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些企业没有了，工人也走了，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有史料记载，武汉当时也迁出600多家私人工厂，包括汉阳的钢铁厂，整个武汉迁出的技术人员有42000多人，而且由于战争的破坏，关内的经济遭到了重创，损失严重。东北的经济与国内其他区域相比，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日本不会破坏东北的经济，因为东北是其侵占全中国，甚至称霸亚洲、窥视全世界的大后方。正因如此，那时东北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好于全国，也好于亚洲其他国家。

二是军阀经济特征明显。一方面，军阀对经济实行独裁管理，经济发展较快；另一方面，反动军阀的黩武政策对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经济发展越快，军阀统治和扩张的野心越膨胀，对经济负面的影响就越大。在军阀张作霖统治的后期，东北三省开始出现了局部的货币贬值、工业倒闭和商业惨淡经营的景象。东北人民税赋沉重，在官方规定之外的税收，占实际税负的88.75%，“仓廪足，治安宁”的情景在军阀统治后期已经不在。

三是殖民掠夺特征突出。日本占领东北时期，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物力、技术、人才和资本，发展了经济，另一方面为了达到其侵略的目的，又进行了疯狂掠夺，并妄图以东北作为跳板，侵略亚洲甚至全世界。这个时期

日本是以掠夺为目的的，把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后方，使东北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有利的原料基地、商品倾销售基地和资本输出场所。

四是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殖民统治，都注定了经济增长是短命的，“昙花一现”是它的特征。张作霖占据东北近20年，东北沦陷时期存续10多年，经济上既无长期目标，又无全面系统的规划。

《东北亚大讲堂——东北经济的历史与新生》共5讲，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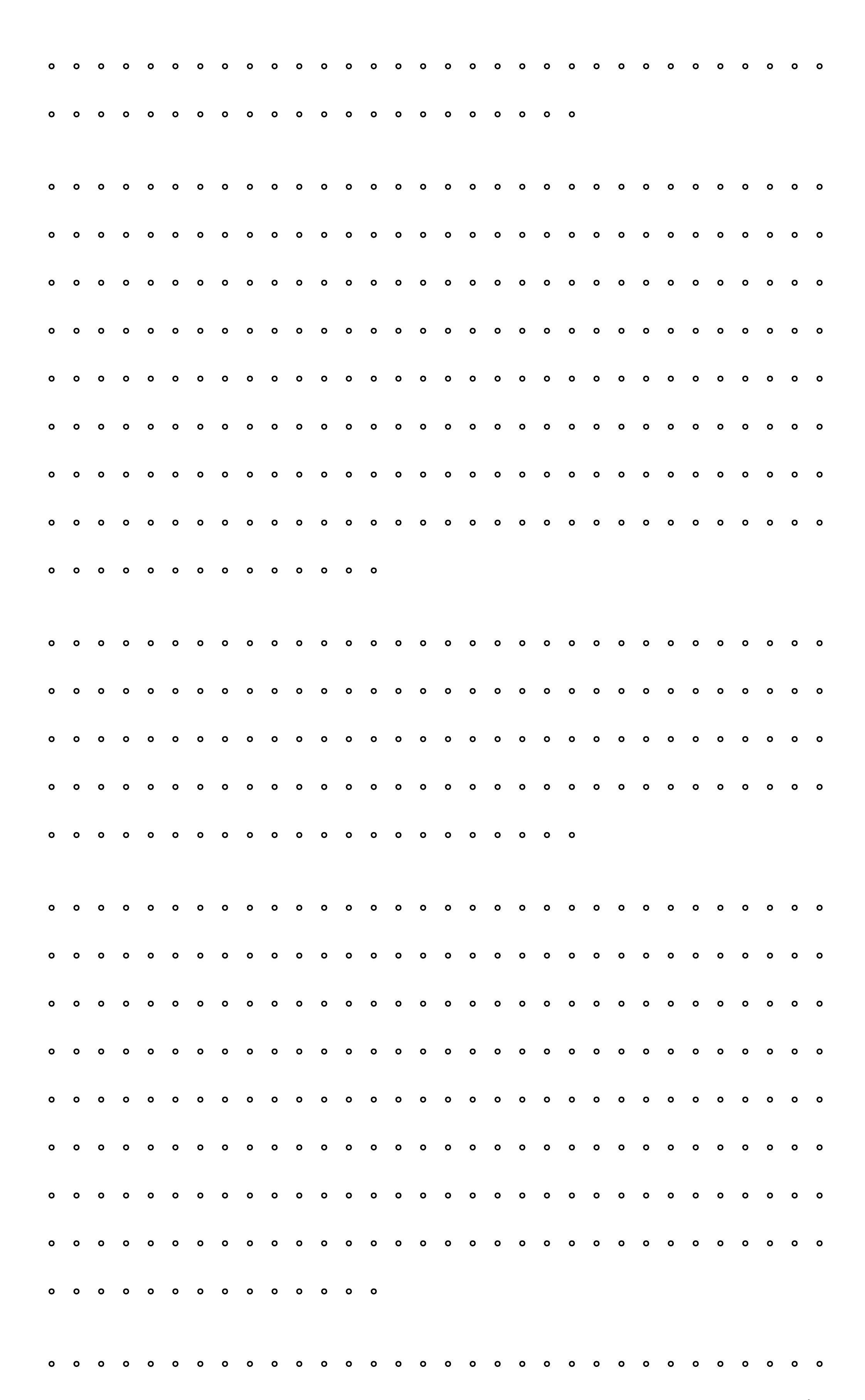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亚经济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汇聚校内外优势资源创建为服务国家面向东北亚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库、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将为建言献策、服务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组织、资源和机制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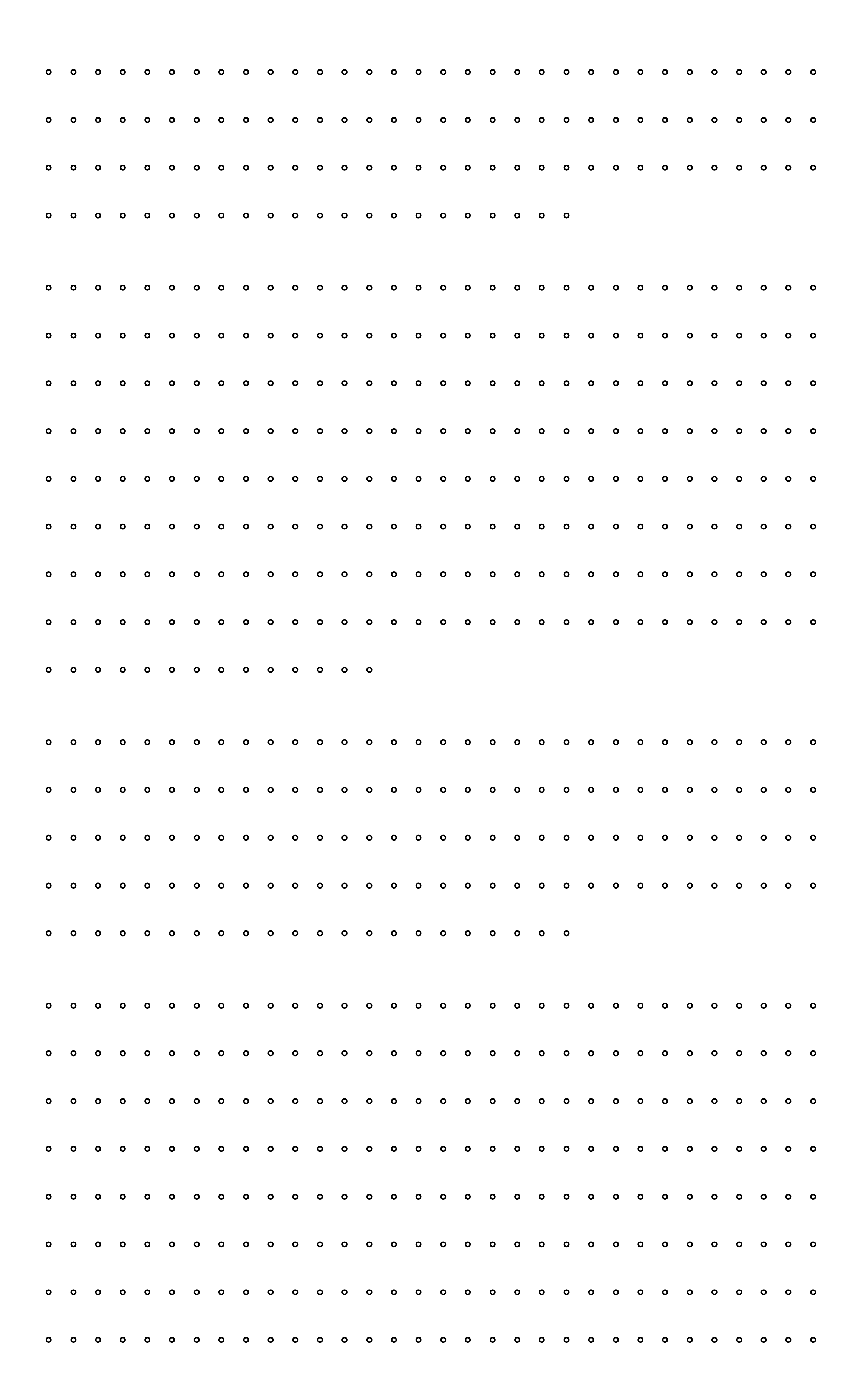
（引述网文结束）

。。。。。。。。。。。。。。。。。。。。。。。。。。。。。。。。

。。。。。。。。。。。。。。。。。。。。。。。。。。。。。。。。

。。。。。。。。。。。。。。。。。。。。。。。。。。。。。。。。





。。。。。。。。。。。。。。。。。。。。。。。。。。。。。。。。
。。。。。。。。。。。。。。。。。。。。。。。。。。。。。。。。
。。。。。。。。。。。。。。

张学良

https://zh.wikipedia.org/zh/%E5%BC%A0%E5%AD%A6%E8%89%AF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奉天省海城（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人，祖籍河北大城。生于台安县桑林，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长子。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和杨虎城向蒋介石“兵谏”，12月25日，张释放蒋介石，并随蒋介石回到南京。12月30日被判刑十年，虽然五日后即被特赦，但而后一直遭到蒋介石软禁。国共内战时，张被安排来台，先后曾居住于高雄寿山、西子 湾、新竹五峰乡清泉部落。蒋经国执政时，张依然遭软禁于台北市复兴岗，直到李登辉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后，90岁的张学良才重获自由、定居美国夏威夷。张的软禁长达半世纪，可说是被两蒋幽禁。晚年移民夏威夷终老，病逝时享嵩寿100岁。

早年经历

出生与幼年

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6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的母亲个性刚毅，他是在八角台的一部马车上出生，幼时很贫穷，母亲只能睡在铺草的炕上。他回忆十岁时，遭逢乱局，母亲曾给他三十个银元，收在一个麻袋里，跟他说："如果有事，你就跑去安定一点的地方，把这三十元给老人，跟他说你是张作霖的儿子，他们会带你去省城找爸爸。"他当时问妈妈："你上哪去？"母亲说："我就走了，你别管我！"（暗示自裁）。张回忆，母亲个性坚毅刚烈，曾经吵架后完全不跟父亲说话非常久。

张自述，因父亲打胜仗，自己又出生，被取小名为"双喜"，但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多次病危，自己都认为自己活不了，最后采取民间信仰仪式，装作被和尚收养，随即用一个纸人写下来替代丢在庙中，当作替身出家，"双喜"这个名字就没了，改用其他名字（代表"双喜"出家了）。依据民间的习俗，他一出庙听到头一个名字，就成为自己小名，当时听到有一个人喊一个小孩"小六子"，于是他的小名又改用"小六子"。

讲武堂毕业

1918年，张作霖在军粮城成立奉天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副司令徐树铮，参谋长杨宇霆；9月，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开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张学良也被调到讲武堂受训。张学良在奉天 讲武堂受训期中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很快关系便亦师亦友。

1920年，张学良由讲武堂以炮兵科第一名结业。张作霖升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力荐郭松龄兼代第二团团长。卫队旅负责保卫张作

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张学良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服务。7月9日，直皖战争起。张学良卫队旅改为奉天第三混成旅，仍由张学良任旅长，郭松龄为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1年，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奉天又添编4个混成旅，吉林和黑龙江各添编2个混成旅；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学良保荐郭松龄任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4月，张作霖即陆续派军入关，奉军号称镇威军，张自任总司令，孙烈臣副之，杨宇霆为参谋长，总部设军粮城。张学良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下辖自兼旅长之第三混成旅、蔡平本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第八混成旅。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张作霖撤职查办，裁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第二天，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6月17日，张学良和孙烈臣代表奉军，和直军代表王承斌，在秦皇岛英国军舰上签订停战和约，终结第一次直奉战争。

整军精武

张作霖为雪此战争失败之耻，回到奉天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张学良负责整个东北军调整与军纪，史称“整军精 武”。经过张学良2年多“整军精武”后，东北军军威大振，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

完败。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榆关（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顺利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戍卫总司令。

1925年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命，率奉军2千余人进驻上海。上海公共租界英法当局见奉军开入上海，联衔向张学良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反奉战争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郭素称东北军第一猛将，率领7万人直取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准备撤守。据奉军军团长王铁汉说，此时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对峙在巨流河，郭手下官兵看见河对岸是张学良，纷纷弃走投奔，郭松龄顿成孤家寡人。郭又遭到日军空袭，仅以身免，只得化装逃跑。后被逮捕，张学良原本想要留其活口，但张作霖已下令将其枪毙，郭夫妇暴尸三日。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

1927年，面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军团长南下联合吴佩孚残部与北伐军作战。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张作霖因战事节节失利，无法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宣布由燕京退守山海关关外，乘火车返奉天。6月4日凌晨5点30分，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二战投降后，同盟国东京军事法庭调查，是日军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并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因张作霖的忌日是农历四月十七日，也是张学良的农历生日；张学良痛苦万分，从此不过生日，说："从此把生日改了。"

东北易帜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日本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军政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的思想，宣布东北地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国民政府北伐正式结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华民国。

诛灭杨常

奉系老将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对张学良世袭东三省军政大权有所不满，认为年轻的少主平日沉溺于声色犬马烟枪并无实才。24岁前的功绩靠郭松龄辅佐；在张作霖被谋杀后明知是日本人所为，27岁的少帅却束手无策，反而趋势投靠曾经的敌人假手压制奉系老臣。杨宇霆自以为老臣，时常对少主张学良不假辞色，倚老卖老，动辄讥讽，诸将深以为大不

敬。杨宇霆还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主其事。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诱杀。处决二人后，张学良罗列杨、常罪状却又送两家各银元一万元奠仪，作为抚恤金，也体现出当时东北军内忧外患。此举引起东北军 上下哗然，军内诸将虽表示对张绝对服从，但裂痕已既成，张试图取得一次胜利证实自己的能力以服众。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在蒋强力支持下，张执行蒋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蒋在战前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

张学良则于1929年8月25日在对中外记者谈话中指出：“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愿破坏 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与张学良商谈。张学良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坚定张学良的抗俄决心。值得注意是，在整个中东路事件过程中，蒋食言，未给张事先承诺好的任何援助与补偿，也体现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中，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共产国际赞誉。

1929年11月26日张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不得不求和，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对铁路的控制，一切回到原点，并承诺“解除白军的武装，将其组织者和煽动者从中国东三省铁路驱逐”。

由于中原大战随即发生，蒋为稳住内政，也默许张对苏妥协，以换取其对蒋中原大战的支持。张因此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是颁授给有功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军职人员，表扬他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贡献。

这次挫败，影响了张以后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式，张认为，整体国防与战争应由中央政府统筹，以避免战事扩大或无谓牺牲。

镇压嘎达梅林

1929年初，张在内蒙古继续其父张作霖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引发蒙古族抗议。以嘎达梅林为首，蒙古族人士发起“独贵龙运动”前往沈阳请愿。7月26日请愿代表嘎达梅林等被捕，11月13日被劫牢救出。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转战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哲里木盟一带。张命张海鹏部一 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在今通辽北包围歼灭抗垦队伍，嘎达梅林战死。九一八事变爆发，张的东北军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中原大战

北伐结束后，蒋见各军阀派系犹在，希望削弱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兵力。1930年3月，反蒋派军人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战爆发。8月，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双方战斗激烈，死伤惨重。战争僵持阶段，双方试 图争取奉系支持。

最终张、蒋协调，张选择支持蒋。9月18日，张发表电报《巧电》（韵目代日，巧为十八），宣布反对中国内战 ，希望各方立刻停战。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二备院部、备委员会勋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备总指挥部、备司令 部、备军、师、旅部、备法团、备报馆仝鉴。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 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坵墟，人民荼炭，伤心惨目，讵忍评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民命灭绝，国 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慄慄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 ，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舒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常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 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

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 ，亦必随时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 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惟希亮督。

张学良叩。沈阳。巧（十八日）电。

这封《巧电》，被反蒋联军拒绝。两日后，张派兵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武装调停”，反蒋联军失败。9月20日，蒋再电张催即日就副司令职。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并进军华北，入主燕京，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获胜，对各地军阀控制能力大增，而张奉系对中国影响力也广受人知。

九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统一的中国主权，和日本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可能性升高。

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特赐荣褒。

1月16日，蒋、张联名代电，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为陆军第三、四、五、六、七军军长；委任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冯鹏翥、孙楚、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分别为陆军第一至第九师师长，傅作义兼任第十师师长，周玳为炮兵监，至此西北编遣问题告一段落。国民政府通电，陆海空军副司令官张学良业已宣誓就职，自本年1月起，总司令部各公文均由张学良副署。

1月21日，张在沈阳东北边防公署接受日本天皇所赠旭日大勋章，日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授勋，东北各军政要员均参加授勋仪式。

2月13日，蒋、张联名电委高桂滋为第十一师师长。

4月17日，张离开沈阳赴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

4月18日抵达北平，驻顺承王府。

4月24日，张召集副司令行营全体职员训话，谓本人不在北平时，行营工作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同日张在私邸接见欧美记者，谓此来北平专为组织行营，将来沈阳设办公处，北平设办事处，本人三分之二时间住沈阳，其余时间分住北平、南京。

4月28日 ，张在北平接见山西、绥远各军将领，对山西、绥远善后提三办法：一、各军自动实行裁减，俾达收支适合； 二、山西、绥远驻军太多，拟请中央调开一部；三、山西、绥远裁厘后，收入甚微，拟整税收，维持现状，核发各军军费。

4月29日，张离开北平赴天津，次日自天津飞南京出席国民代表会议。

5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 案》及《首都建设案》，张列席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北方治安负完全责任。

5月6日，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选定张继、戴季陶、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推派之于右任、国民政府推派之张共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5月9日，国民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张任主席，讨论《教育设施之趋向

案》，蔡元培对该案作详细说明。

5月15日，国民会议开第七次大会，张任主席。

5月28日，张因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

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

6月26日，中国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在该部防区将进行间谍活动之 日本现役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随从三人在四方台附近拘获，经搜查审讯，中村等间谍罪证确凿。

6月26日夜，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为保密计，并焚尸灭迹，所有证物均送往北平呈报张。

7月6日，张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7月12日，蒋密电张，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7月21日，蒋任命张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

9月6日，张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查现在 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9月6日，张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

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日张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本人说“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特权。

9月19日零时20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师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攻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凰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

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回南京主持一切。

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决议三项：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沈阳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

9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表通文：“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求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

9月22日，蒋电告张，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已在南京归为国际交涉。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孙殿英为第四十一军军长。

12月初张学良失去东北大片土地，地方粮、税，还有张作霖经营一生的“东方克虏伯”军工厂，及坦克、飞 机、大口径火炮甚至有毒气炮弹等现代武器，退至锦州。

蒋介石、顾维钧表示“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孙科则命令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南京政府却不出任何支援。最终张弃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40万人退入关内的陕西，令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亲自下达“不抵抗命令”。

而蒋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9至10时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在九一八事发之前，张学良对日本步步紧逼深感不安，多次向蒋请求对策。据洪钫、何柱国等载，乃是蒋多次要求张“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荣臻在事变后提出之报告（节录）：

“……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许，沈阳东北方向，忽闻爆发声音，全城池为之震，此即日军自己炸破其南满本线柳条沟附近铁道之工作也，……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 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46年，曾任张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宣称东北军不抵抗，是因为张接获蒋命令，并且中国大陆长年宣传 张“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张学良日后接受访问时，多次坚持是因为他误判东北情势，下令不抵抗所致，而非蒋介石命令。

据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回忆， 1931年8月16日，蒋曾以“铣电”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 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在中国大陆 所有档案资料馆中，均找不到铣电原件档案。

在海外，21世纪的头几年，一度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 三次口述历史》一书，称“铣电”的原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给窦应泰打电话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足为据”。

据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称， 他曾经翻遍台湾蒋文档最齐全之《蒋介石总统档案》（“大溪档案”），也没有找到“铣电”档案，查无相关迹证。

张晚年亲口否认铣电之存在。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当着张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所谓铣电的关键语句）。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张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诗作指控张学良软弱，令张被称为“不抵抗将军”，然而马君武这指控却是出于两人私怨而凭空诬告。

诗云：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首先，诗中的胡蝶（蝴蝶）不但当时不在北平，终其一生根本未见过张。朱五，即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于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早已成婚，嫁给张的爱将朱光沐，主婚人正是张。

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指出九一八事变当晚，张乃与其参谋何世礼、何父何东爵士晚饭：“当日张学良听完一个电话之后，饭未吃完就离席，原来电话是报告日军突袭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而不是与女士聚会。

而身在其时的马君武写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指控，被认为是因当他听到张对张伯苓办南开大学捐赠巨款，但上门向张要求捐款时却被拒，才故意诬蔑张在重视礼法的年代坏女子名节。据作家高阳所言，朱湄 筠告诉他后来遇上马君武，上前道自己便是他笔下被诬蔑的朱五，“当时马博士的窘态，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结果是不俟终席而遁去”。

1931年11月21日，张委万福麟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参议。12月5日，蒋电张严令 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车，不予通行，以免效尤”。

12月15日，张 电蒋，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同日国民政府准张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2月22日，张电蒋，谓“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最后指针”。

中年经历

弃锦州失热河

1932年1月5日，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通告报告锦州失守经过，略谓：“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皆远胜于我，自其发动以后，竟以飞机、坦克车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 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日失守锦县。”

1月6日， 张邀孙殿英、李服膺、商震、徐永昌等及在北平各将领协商华北军政问题。

1月10日，张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表示拥护统一，安定北方。

1月13日，张电促蒋、汪精卫、胡汉民入南 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 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 一失，断难再复。”

1月18日，张委荣臻为北平绥靖公署参谋长，荣臻1月20日就 职。

1月30日，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张、李石曾、于学忠、徐永昌、周作民5人为 常委。

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通电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为司令长官；第 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江省、福建

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

2月11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理事长为张。

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任命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 为委员，3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3月18日蒋就任。

3月11日，张为遵二中全 会决议，电国民政府恳辞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

4月10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晨访张，晤荣臻 ，询九一八事变经过。

4月12日，国难会议闭幕，通过请政府克日将张撤职查办， 所部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失地等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北平与张、万福麟等原东北军政 官吏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对东北问题作详细之恳谈。

8月1日，张电南京报告热河情形， 称："日方已开始军事行动，形势渐趋严重，榆关亦告紧急。"

8月6日，汪精卫致电 张，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 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 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 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8月7日，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决定辞职，张覆电汪精卫，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 "，同日张并电蒋请北来主持；蒋电张群转劝张，"以大局为重，宜忍隐处之。北方同袍尤不宜亟有抗辩，以 免益陷僵局，更增纠纷"。

8月8日，汪精卫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下野，略 谓：行政院院长人

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 玉、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精卫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 政院长职，指责张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 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覆电汪精卫电请中央罢免本职。

8月9日，蒋电覆张，假拟 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择一而行，勉 出兵收复热河为上策。

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对汪、张辞职拟定方案，汇送中常 会决定：一、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8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设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8人，以万福麟、荣臻、蒋伯诚为常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军分会委员 长；三、再由中常委切实慰留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长。

8月20日，蒋电张群、蒋伯诚转令张， 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裁撤北平绥靖公署。

8月23日，北平政委会例会，张请辞委员职，决议慰留。

8月25日，北平军 事整理委员会举行常会，决议：一、张学良请辞委员职慰留，二、北平军整会改称北平军事训练委员会。

9月1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平“绥靖”公署旧址正式成立，蒋再电张，请以军事委员委员资格主持。

9月3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总报告已完成，各委员及秘书长在北平签字，下午4时该团国长李顿等向张辞行。

10月，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转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

10月25日，国民政府令张全权调处鲁事，同日刘珍年电呈中 央请将该师调离鲁境。

11月6日，张派彭士彬等三人赴济南监视韩复榘、刘珍年自胶东撤 兵。

11月10日，张飞汉口晤见蒋，面商东北、华北问题，并协议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1月12日飞杭州，11月16日复飞汉口见蒋。

1933年1月2日晚，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电张提出“警告”，称榆关事件系中国进兵 热河，宣言抗日所致；张密电蒋，认为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并非即欲作真面目之战斗，仍为借此对我方军事 部署加以试探”，希望“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同时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 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全力以周旋”，并表示自己“决无丝毫犹豫”，要求蒋“迅示机宜，并乞迅饬启宇（ 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所部火速出动，其他军队速行集结”。

1月3日，蒋由奉化到杭州，覆 电张，略谓：“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划，万不可稍有变更，只要能达成此任务，则为缓 寇计，不妨相机应付。”，并表示商震部“调动与接济筹备，弟当负责”。

1月4日，蒋致电张 ，指出：“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提出军分会及张本人“应即 迁保定或张家口，一面与各公使馆交涉，声明北平驻军他移，以北平为文化区，不愿与倭军在北平附近冲 突，并望各国互尊条约，保持平、津之和平”。

1月5日，蒋电林蔚转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 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请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代委员长。

1月7日，蒋返抵南京，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

罗文干商应付榆关事件， 随后接见张代表鲍文樾，听取榆变经过。

1月8日，张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 话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所引起之谬论，谓“榆关事变与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如出一辙”，表示“惟有以吾人之精神与赤血，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

1月11日，蒋在 南京陵园私宅与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陈立夫等人商讨对日外交，决定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向 张传达中央对对华北外交方针，当晚刘离开南京赴北平。

1月17日，张致电蒋，谓“热边情 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 四旅”，“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催促蒋“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 万一”。

2月5日，张电蒋，报告“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有军队实属 不敷分配”，要求蒋“筹定大计”，蒋批复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表示：“吾人处此忧患，横逆 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

2月12日，张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之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 ，由蒋兼任总司令，张任副总司令。

2月25日，热河战役爆发，国民政府中央力促 张抵抗，并协助调动八个军组编为八个集团军，未料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军长， 张旗下东北军系）放弃职守，再次不战而退。

3月3日，蒋准备取代张兵权，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 绍竑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3月5日抵北平，黄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

3月4日，蒋为承德弃守致电张，指示“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　力图反攻，冀挽颓势”。

3月5日，张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　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将热河 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

3月6日，蒋致电杨杰转示张、何应钦，指示反攻战略：“以宋（哲元）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冷口，袭取凌源、平 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则必得策”，又电杨杰转示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将领，望“协同一致，力图 反攻，力图反攻，以报党国”。

3月7日，张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略称：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 ，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不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 各职，以示惩儆。

3月8日，蒋到达河北石家庄，何应钦由北平往见，张拟同行，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拒绝，同日 宋子文亦奉蒋召由上海到石家庄，预商张下野办法。

3月9日，蒋召张在保定会晤，蒋先授 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宋转达蒋意：热河失守，张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责无旁贷，蒋也同样受到国人攻击，“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 沉没”，张只得接受辞职，下午4时蒋到保定

与张晤面，准其去职。

3月10日，张召于学忠、 万福麟、荣臻、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要员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及原因，并宣布已与蒋商定军事善后，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

3月10日，张发出 辞职通电。

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 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并表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 健儿"，期望"中央俯察彼等劳苦"，"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 飘泊，于愿斯足"。

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离开 北平飞上海，何到会接任。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

7月22日，张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7月30日飞抵英国伦敦。

12月15日，张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

1933年至1934年间，张戒毒、游欧，身形从过去清瘦而增胖。

。。。。

围剿红军

1934年1月6日，张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途经香港登岸访胡汉民。胡汉民劝 他不要跟蒋合作，但当时张认为，法西斯才能救中国。胡汉民对他说，汪精卫是办外交的人，不会说真话， 而胡自己则是乱说话，因此出了乱子。张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

2月1日，蒋由南京抵杭州 ，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

2月7日，国民 政府特派张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

2月9日，蒋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 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

3月1日 ，张在汉口任豫鄂三省“剿匪”副司令职，3月5日武昌设立行营。

6月，正当蒋第五次围剿 红军在江西激战时，张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

6月18日，张出巡豫鄂边区，是日抵达潢川，6月21日在潢川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反共军事，之后再赴商城及皖西立煌、六安，6月 27日张回武汉。

10月9日，蒋在张、刘峙等陪同下离开武汉北上，前往豫、陕、甘、宁各省视察，翌日蒋等经郑州抵达洛阳主持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由北平抵达洛阳晤见蒋。

10月12日，蒋偕张抵达西安。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撤销，主任张，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

4月，蒋命令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但却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被全歼， 张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4月2日，国民政府任阎锡山、冯玉祥、张、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

4月14日，武昌行营主任张由重庆飞贵州见蒋，河南保安处长冯占飞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偕行，4月17日张回汉口。

9月13日，张由汉口飞西安 ，与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军事。

9月19日，张飞天水视察。

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

9月21日张 飞返西安，与阎锡山代表张维清商围攻陕北红军，9月24日又偕杨虎城、邓宝珊飞兰州与朱绍良分商防共。

10月16日，张由西安飞抵武昌，办理行营结束事宜，10月19日返西安，10月20日武昌行营结束。同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

将。

此时，日军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更是猖獗，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

。。。。

改换门庭

1935年11月13日，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奉共产国际指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

11月，张在南京参加完 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因"新生事件"而获罪之东北籍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此次见面，张向杜倾诉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之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

11月下旬，张到上海会见尚在狱中之老友杜重远，杜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等人影响。

1935年12月，张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刘鼎经过考虑 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

西安事变之前，张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

1936年，国民政府于1月7日授予张一等云麾勋章。

1月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与杨虎城自西安飞抵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 陕北红军北攻榆林、绥德。

2月19日，张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到苏区；2月27日，董、张到达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张与中共合作，声称是因为国仇家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

3月2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张之联络工作应分进行。

3月4日，毛、彭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政府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带着中共中央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覆命。张支持中国共产党分离主义政策，认为有筹组西北大联合之必要，反对内战。

3月中旬， 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汇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周恩来也到；北方局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同杨虎城谈判情况，并报告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经过。张在旅欧期间，会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在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一部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有必要抗日，但 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中国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苏仍举棋不定；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张不满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偏颇，不顾地方派系军队，当时减俸达20%，且未给予兵力补充、阵亡将士抚恤。

。。。。

洛川会谈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

1月初，张刚从上海回到西安 ，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

1月17日，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王以哲见面。

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 会谈；张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陕西洛川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张会谈，李说明中央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对外之主张。

1月21日晚，张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密晤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克农，李表示拥张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暗示能获得苏联军火援助。

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

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 、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 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10日，周恩来指示李克

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

2月2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之训令，指出张同意抗日，愿意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

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洛川。

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

2月26日，张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

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

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主要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第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予以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

1936年3月2日，张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

看法。

3月3日，张由南京飞返要西安，次日即飞洛川与李克农第二次会谈，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并要求中共派全权代表作进一步会谈，3月7日李克农离开洛川。

3月4日，张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

张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

3月，张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克农一一作回答，但在联合蒋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

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恩来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

3月16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恩来为代表到肤施同张谈判，李克农也同去。张再晤李克农，请中国共产党介绍自己代表与苏联直接商谈军火援助问题。

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之东楼内。

张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刘鼎反复请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根本原因和战略战术。刘鼎到西安第二天，张在家里接见他；张严肃地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 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三、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严重损失。

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见面，刘对张说：一、张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四个月，日寇就占领东三省，当然遭到人民辱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样，在这个问题，不能不表示态度；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动，苏联指责张先生绝非无中生有；三、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采取自卫还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有人民支持之新式军队，百万大军都无可奈可。

当天张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张行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曾致电蒋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覆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

周恩来参加3月20日到3月日之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之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之问题；

3月27日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

离。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

。。。。

肤施会谈

1936年4月6日，毛、彭联名致电张，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妥为布 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4月，张到肤施密晤周恩来，周劝张反蒋，张则劝周联蒋。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在肤施会谈。 周恩来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

张说全国之力合到一起，难以打败日本，不要把有抗日愿望而又实力 最强之蒋拒之门外；张表示若劝蒋联共不成，便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张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 西恐难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之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为北上之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根据他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如蒋投日，当离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之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 内"之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之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

张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之中国国民党将军，已和红军秘 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

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虑 ，愿将张之意见回去慎重研究。张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协议。

会谈一直进行到4月10日晨4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张学良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握别时，张学良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之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张学良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

联共

这时，中共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约书来西安，张拿出巨额银元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

4月22日，周恩来写亲笔信给张，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把信交给刘鼎，信内称：九日会谈 ，"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信中诚恳忠告张"为抗日固足惜蒋氏 ，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

处，诸维鉴察。”

几天后，张和刘鼎乘专机到西安，到西安后，把刘鼎安置在公馆之东楼上，对刘鼎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中多活动，并多多帮助我。”因此，那时人们叫刘鼎为“秘书”，在张公馆进出，张还亲自嘱咐随从应德田和孙铭九，要好好招待和保护刘鼎，以后又给刘鼎发自卫手枪。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刘鼎到西安积极设法架设秘密电台，着手建设从西安到苏区、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秘密交通，利用关系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一个两进四合院，做为秘密交通站；通过东北军关系买商用交通车，把宋庆龄介绍之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潘汉年、丁玲、张子华等去苏区，经过西安七贤庄交通站，送往洛川转陕北；中央从陕北派邓发或王稼祥等到新疆或转苏联，叶剑英、汪锋、张文彬、张经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过秘密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936年6月30日，张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由于父亲张作霖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7月，张筹建“抗日同志会”，9月正式成立，作为秘密核心组织团结 东北军，吸收有积极抗日思想分子，开始主要成员是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苗勃然（两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等，刘鼎也参加；以后向军、师、旅长发展，共达70多人，张自任会长，联共抗日、培养抗日干部。

7月初，张住在王曲时，把刘鼎拉去跟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和他们纠

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劫，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

刘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万火急密电报告中共党中央，乘张专机到肤施后，步行50里到达安塞；党中央机关刚从瓦窑堡撤向保安，得到刘鼎电报后，毛、张闻天、周恩来于7月5日赶到安塞城，立即召开会议，毛、张、周都到会，李克农也列席会议；毛最后说："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叫 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

刘鼎回到西安见到张，详细谈了安塞中央会议，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你 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

张耐心听后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意思，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然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张为整训部队军官，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张接受刘鼎建议，吸收瓦窑堡红军大学之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之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废除打骂，提倡官兵平等，团结官兵。

训练团第一期张就住在王曲，亲自给学员作报告，公开对学员说："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东北军要站在抗日第一线，……东北土地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

张、杨讲话，都讲抗日救国道理。

刘鼎又建议张办学兵队，从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学生到西安军训；张同意后，由中共秘密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协助招生，学兵队由张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领导，由卫队二营派送管理干部；学兵队共300多人，设在西安东门城楼上，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要害部门和各部队。

刘鼎还和刘澜波等推动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团结东北人抗日救亡；又从上海请来文化界秘密党员吴奚如到西安，主编抗日同志会刊物《文化周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上之重大转变；而洛川和肤施会谈中，张一再认为蒋有可能抗日，应该内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之意见，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这种决策提供重要根据。9月，张向红军提供大量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红军过冬燃眉之急。

日本历史学家宫胁淳子确信张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他认为证据是后来共产国际颁授勋章给张学良。另有关张与共产党的关系，可参见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 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等文，张学良在1936年提出加入共产党，不是加入中共，此事需中共向共产国际汇报，最后以“特殊党员”之身份加入，即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

劝蒋抗日

1936年10月20日，在蒋来西安前夕，张密赴太原，向阎锡山坦述自己联共联苏以便抗日之内幕，阎答应与张袂劝蒋联共，“倘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

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表示把固阳等5个县让给红军。同时，蒋来前，为确保安全，已指定以西安城东之临潼华清池为其行馆，钱大钧已提请前派张玉荪到该处安排布置，但杨虎城以“华清池离西安太远，往来不便”为由，建议以城内九爷府为行馆，张赞同此议。

10月22日，蒋一行人飞抵西安机场，张要张玉荪向蒋报告，已在城内九爷府和城外华清池准备好两处行馆，请蒋指示前往何处，蒋“楞了一下，便回头望着”钱大钧，钱说到华清池。当晚，张恳劝蒋联共抗日，“历时甚久”，两人争辩，蒋连骂不止，“响遏云霄”。

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蒋决定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 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一个方面之总指挥。

10月31日，张邀阎同赴洛阳，为蒋祝寿，并联袂劝蒋。张飞洛阳为大寿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1月初，张到叶剑英住室，商讨办法停止内战，最后张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日文 外来语“クーデター”，源自法语coup d’État，意即政变）。”；

叶电告中共中央，回电让叶转告张“要慎重”。

11月17日，蒋自洛阳亲赴太原晤见阎锡山，11月18日在绥靖公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一切应以坚固守静之态度沉着处理。中共屡屡致电张，请其迟滞进剿；

11月27日，张回电说，“永不进展实难办到”，目前只能将进剿改为封锁，以延长时间，“速请内中早决大计 ”。

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张如蒙所请，东北军

转进绥远，既能满足东北军强烈抗日要求，又不致与红军隔离，还可接通外蒙和苏联；蒋仍令其剿共。张请求率部增援绥远东部，蒋未准其请。禁不住张一再恳求，始准派骑兵第七师开往绥远作战（该师实际上并未开去），仍未允东北军全部出动，张深感不满。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苏皖闽；12月2日，张赴洛阳劝蒋，并表示“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这是实情，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担心，如继续剿共，东北军下层官兵就会造反）；蒋明知西安不稳，但为完成其剿共事业，毅然答应前往。

12月3 日，张乘军用机飞洛阳见蒋，请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前线抗日，蒋坚决主张“剿共”，仍令即日回陕，张央求释放救国会负责人，蒋亦拒不采纳。

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

12月4日，蒋由张等陪同，自洛阳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亦先后到达。蒋抵西安，仍住华清池。中央军纷开潼关，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在西安机场降落。

12月6日起蒋在华清池排次召见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听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杨提出：服从“剿共”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大军军在后接应督战，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陕 、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往福

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蒋向张、杨表示：一是进剿红军；二是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给中央军剿共。

12月7日，张到华清池见蒋“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局势严重，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共产党，团结抗日，被蒋拒绝，晚上张、杨密议捉蒋，实行“兵谏”。

12月7日下午，张到华清池同蒋单独会谈，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 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对张大发火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 ，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12月8日上午，杨在张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杨见蒋态度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

张回到西安把见蒋之情况告诉杨，两人认为蒋不会改变主意。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

12月9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1.5万余名学生和市民游行请愿，要求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宪兵二团及武装警察开枪击伤1名小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决定徒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请愿，蒋令张武力阻止，“格杀勿论”，张驱车至浐桥，签应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抗日救国之要求，将学生劝回。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蒋

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 "，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张追上学生队伍。张立即赶到去临潼之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他说大家太辛苦了。他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分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同声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牺牲。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 。学生们见张态度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西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 放他呢？"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 进行抗日。

12月12日，张致电宋美龄，保证蒋生命安全。

12月13日，张部队由渭南向临潼集中，洛川、庆阳均放弃，中国工农红军即由陕北南下，配合张部抗击中央军。

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晤张，携有宋美龄致张和蒋的信，致蒋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一语，晚上张偕端纳探视蒋。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12月15日，端纳飞洛阳，电宋美龄告蒋平安并张、杨主张，称张希望孔祥熙与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12月17日，张学良偕蒋鼎文再见蒋，蒋当即写给何应钦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为要！"

12月19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召开会议，何应钦、孙科、居正、宋子文、宋美龄、 叶楚伧、王宠惠等出席，经过激烈辩论，决定："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 、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

12月20日，宋子文应张电邀与端纳同机自洛阳飞抵西安，12月21日宋子文与端纳飞回南京，报告与张、杨、周晤谈情况。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飞抵西安与张 、杨谈判，蒋授意宋子文、宋美龄负责谈判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同意联俄容共等；张、杨与周恩来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之基础，签应蒋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商定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与张、杨正式开始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下午，宋子文与张、杨、周恩来继续谈判，宋首先提出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以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

12月24日上午，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与张、杨、周恩来谈判，达成释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西安协定》：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停止 "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抗战发动，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

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 长职；晚上，周恩来会见蒋，向蒋说明中共抗日救国之政策以及西安方面之意图，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

下午2时半，张、杨见蒋。杨一向尊重张，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下午3时半，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张送蒋乘机离开西安，先把宋美龄送上飞机，再让蒋乔装到张的部队中登机脱逃，周恩来甚至赶到机场想把他们追回来。下午5时半，蒋由张护送离开西安飞抵洛阳。

下午，张、杨释放蒋，张亲自陪蒋飞洛阳，临行张写手令交杨，令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归杨虎城指挥；全国民众庆祝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将此消息向全国及海外播放，首都及各地报社发放“号外”。

12月26日午，蒋由洛阳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到机场迎接，随后张与宋子文陪同由洛阳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变结果，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宣布停止推动分离主义与土地革命，建立苏联所期望的形式上中国抗日战争统一战线。

受审

1936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军法会审。同日，

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12月31日， 张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当天下午，蒋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

12月31日下午，蒋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力自赎"。

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锺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10时开庭审判，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 为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蒋向国民政府呈请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勋，努力自赎。"

被囚禁的后半生

1937年1月3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密电国民政府，请特赦张。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国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特予赦免张，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张从此失去自由，过着被幽禁之生活。徒刑有期限；交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严加管束，管束没有期限。莫德惠、刘哲、戢翼翘自北平应邀至南京，劝慰张学良。

1月7日，蒋致书张，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要旨为：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由张学良推荐一人率领前往；二、杨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队在西

安，使其行使绥靖职权；嘱其与顾祝同切商办法，余应 照已发电令办理；并谓“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张致函蒋，提出解决陕、甘问题意见书，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略谓：“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 。……二、调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三、余（张学良）陪同墨三（顾祝同）到洛阳 ，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商震）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乙、匪不剿：一、 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刘经扶（刘峙）为西北行营主任。……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 ，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张学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张的囚禁之地曾五次变更。

1月13日，张在贺耀祖、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岭学校内；蒋以修订之善后方案送张征求意见。张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张由南京乘专机往到浙江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 。1月23日，经蒋同意后，戴笠陪同李志刚至雪窦寺中国旅行社往见张与赵庵，张慨叹说：“ 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

2月1日，张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

2月4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

2月17日，国民政府令准蒋所请，张着予恢复公权。

2月22日，王树常、莫德惠过杭州赴溪口访张。

3月30日，于学忠赴奉化往见张。

1937年9月中秋节，张到妙高台过节，晚上写信给蒋，请求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

1938年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

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

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9年蒋撤退台湾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张则是先押解到台湾。张晚年表示，蒋原本是要枪毙他的，是宋美龄求情，他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对待杨虎城。他曾劝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出国，回国没有好处。

1949年1月，蒋在南京宣布下野，当时于右任建议他放了张与杨虎城，蒋不耐烦的说，去找李宗仁，但李宗仁不知道两人关在哪里。之后蒋就下令杀掉杨虎城一家。蒋原本也想杀了张，而是宋美龄表示，若你对张不利， 我立刻离开台湾、公布这些事情。张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事，是美国公使派人抄的这些对话给他看的。

台湾的幽禁生活及言论

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但未获蒋同意。随即逐步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

10月，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

10月底，张被带离重庆。

11月1日，张与赵一荻被送达台北松山机场，在台湾继续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隔日就转移至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二二八事件时， 竹东区公所被民众攻占。负责看管的军统少将刘乙光命令如果到最后无法阻挡民众劫人，即杀掉张与赵一荻。由于此时缺乏食物，张曾回忆当时是靠原住民给

蕃薯才有饭吃。

1947年3月8日，二二八事件 后，保密局长郑介民派遣刘戈青抵台，同保密局台湾负责人陈达元，协助长官公署工作，并确认张安危。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赴台湾，以私人资格探视张。

1949年，先搬至高雄寿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温泉，直至1957年10月，张移至高雄西子湾。

张生前表示他最爱高雄故居，住在高雄最快乐。起初住在高雄寿山“高雄小白宫”（1949-1950）。1957年再次移到高雄西子湾（1957-1959，后为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今国立中山大学西湾艺 廊）。

1957年初，张尊蒋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

5月5日，蒋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

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2月7日，张致函宋美龄，称起居饮食，一切舒适，惟当前国势艰难，同胞多处水深火热，而张蒙此优厚待遇，实感不安，不知何以报国。蒋氏父子先后接见，使张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再被移居到台北北投幽雅招待所（今少帅禅园）。7月25日，张与宋

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

1961年，开始解除“管束”（即软禁），可以外出旅行、购物、上馆子和会客，但皆需事先请示且受到监视。张选择移居北投复兴岗自建屋舍。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这东西不 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卜少夫称：“西安事变发生时，张三十六岁。张在回忆录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

感情经历

1919年，张作霖命张和辽宁省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女儿于凤至结婚。张与原配夫人于凤至， 生三子一女。

1922年7月，谷瑞玉在二姐夫的家宴上与张相识。

1924年10月，张与谷瑞玉婚外同居。然而，张始终没能将她带回沈阳的大帅府。据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于凤至难以接受她。其后，张、谷之间产生了不少摩擦。

1927年夏天两人分居。

1931年初，张便与谷瑞玉分手。张与谷瑞玉没有子女。

1927年在北京饭店舞会上，与溥杰当时的妻子唐怡莹相见了，此后双方约会频繁，成为张学良的情妇。

1926年在天津蔡公馆举办的一次生日舞会上与赵一荻相识，不久之后赵一荻独自跑到东北与张同居。父亲赵庆华曾任津、沪等铁路局局长及交通次长等职。公开登报斥责女儿不知廉耻，与女儿断绝关系。赵庆华有6男4女。赵一荻是丫鬟所生的庶女，在四女中排行第四，故人们又称她为赵四小姐。

赵一荻跪求于凤至，说自己没有退路了，求于给她一条活路，承诺终生不要名分，于凤至心软同意。从此， 赵一荻成为张的情妇，住在于凤至出资修建的小楼里，以秘书身份陪伴在张身边。

1961年秋，当张被解禁后，移居自行选择新建一座小别墅，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三路70号复兴冈居所。

张久被软禁，很自然对宗教发生兴趣，他最早笃信佛教，并看一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甚至在新竹时，还与一些佛教法师一起讨论佛法。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宋美龄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兴趣，就 说要领导张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宋先感化赵四小姐成为虔诚基督徒，渐渐张自己也就相信。张早年读教会学校，据说曾受洗。1955年，张皈依基督教。

1961年初，在蒋家同意下，才迁入自己出资盖的两层楼房，位于台北市复兴三路70号，是他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

1964年张正式信入基督教，受洗。依照一夫一妻规则，也为保全张在台湾安全，于凤至被迫提出离婚。

1964年7月4日，张在台北与赵一荻正式举行婚礼。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蒋经国仍然没有释放张，是执行蒋遗志。

1982年10月17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近据匪报透露共匪又放出邀请张学良返回大陆参加其父张作霖墓园重修典礼之空言

此类统战邪恶

匪必层出不穷谚云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我亦唯有作如是观耳

晚秋寒意深至恳母亲起居倍加珍护肃叩福安儿经 国跪禀十月十七日”

10月2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

“……张汉卿在东北人心中尚有其影响力

此之所以诡匪尚有利用者也

若统战热化时汉卿默然无声则又可大做其文章

余数十年中为其排难开脱说项在灵心上引介其信仰上帝

再忆汉卿曾对汝痛苦流涕悔其当初铸成大错

谅需要其可为我亿万大陆受难同胞作一严正表示

根据事实痛斥共匪伪谲害人之毒辣

对其个人亦是有利其可对中国历史有一交代

且须在交代中预防匪方谓并非出诸自愿等妄言

故须斥文中事前杜绝之

犹如余对廖函先予预防其反击及可能滥言故对匪毒先打防疾剂也

母”

10月22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关于共匪企图邀请张学良返回大陆参加张作霖墓园重修仪式之说

系香港匪‘文汇报’十月十日转载

匪英文‘中国日报’试探性之消息

目前匪尚无进一步之动作

而张学良亦尚一无所知

大人所示当依情况发展谋求对策

专肃奉禀敬叩福安儿经国跪禀十月二十二日”

赴美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初期未有改变软禁张政策，直到1990年将其释放。

1990年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为张重获自由并于圆山饭店九十寿辰举行隆重庆祝，在当时接受访问，他说道，自己虚度了90年、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惭愧万分，哪有什么寿可以做，他还引述圣经，暗示自己是罪人之魁。

1991年3月10日，张携夫人赴美国探访亲友。

6月初，返回台北，其后于12月接受香港无线新闻专访，表示想在适当时候回到位于东北的家乡探亲，并对两岸分治表示痛心。

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

1993年12月15日，张夫妇定居夏威夷。

1994年获得绿卡，长居夏威夷。

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 逝世，享寿100岁。10月19日，总统府明令褒扬，褒扬令全文为：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授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遽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　陈水扁

张虽然长寿，却始终没有回中国东北老家，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关系的政治原因。

轶事

张作霖起初并不支持张就读讲武堂，因为军人的危险性太高，张说："父亲最反对我当兵，他要我学别的什么东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说：'军人是赌脑袋的，几个活着回家？'我坚持，他也顺了我，说：'你这么倔， 要便要罢，记得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送给人家。'"另一方面，张作霖怕张吃不了苦，曾对张 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 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张在东北时为了要自制汽车，曾购买一台瑞雪汽车，拆解后设法让辽宁迫击炮厂制作，最后在1931年5月问世，汽车名称为"民生号"。这是中国汽车业历史上，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汽车。

1929年初冬，为欢迎九世班禅再次来沈阳，张学良令省政府妥善接待，租房66间，免费为招待班禅事务处安设了4部电话，同时，拨款5万多元，于皇寺后楼筹设了招待处。班禅抵沈阳后，张学良亲自为其设家 宴洗尘。九世班禅1930年离沈阳前，曾致电张学良："自去岁来沈，备承优遇，东道隆情，铭感无似。"

1934年初，透过湖北省主席张群的居中连系，请当时在汉口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用飞机带藏传佛教的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到四川成都去见蒋委员长。因张学良尚有要事在身，不能立即将诺那呼图克图带到四川去，因此礼请诺那呼图克图在张学良家中小住数日。在此间，张学良以出

家人吃素问题与诺那呼图克图有过谈话，并谈到军人战争的问题，初步认识到佛教中，菩萨为救大多数人而杀恶人，并愿承担业报的观念。张学良深受其话语感动，日后并在其回忆录中以及记者访谈中，多次提及此事。这也是张 学良第二次接触藏传佛教的僧侣，诺那呼图克图与其谈话使其对佛法有初步认识。

张十分钦佩李登辉，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个很好的学者，无论什么事，李登辉都有很好的研究。

张对宋美龄满怀感激之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张生前与蒋、宋美龄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备极保护、关怀，屡次劝阻蒋对他下杀手。宋美龄与张往来信函反映两人深厚情谊，张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张说，他少年时代就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也在教会学校读书，“早就受洗过了”，不过当时主要是在教会练习英文与打篮球，只是形式上的，根本没信仰基督教。事实上张起初笃信佛教，能背诵《金刚经》，在软禁期间时常与佛教法师讨论佛法、禅理。张因为宋美龄的传教，在1964年再度受洗，改宗基督教，后为纪念改信基督，曾请美国画家油画一幅基督像，并在晚年将此画赠与其副官。

张与夫人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岗的故居，已改建为主题公园“少帅禅园”，供游人体验当年张氏夫妇的生 活，及品尝张氏生前最爱的美食。

吸毒和戒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开始吸食鸦片。1925年，张在讲武堂教官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奉系情况危急，张压力过大借毒排愁，因此渐渐吸毒成瘾。1928年夏，张决心戒掉鸦片，听了杨宇霆建议采用据说对戒除

鸦片有特效的日本进口注射药巴文耐鲁，并让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但后来才知巴文耐鲁含有少量海洛因，但张已因长期使用对吗啡针成瘾，张后来迁怒马医生不知药效，遂辞退马医生。1933 ，后来张在上海身体愈加衰弱，宋子文、端纳劝张出国前再次戒毒。张跟福音传教士米勒耳医师（Dr.　H. W. Miller）早有情谊，他是孔祥熙朋友。米勒耳医师给张打上抗生剂。在其戒毒后，张捐10万块银元帮他。自此，张已完全根除毒瘾。

自述公开

张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在台湾的访问，是由公共电视委托郭冠英与周玉蔻联合采访，制作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后来又与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制作《张学良口述历 史》（台北：远流出版，2009年3月1日）。"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张生前没有"第一手"交代。《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未能写完，许多关键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亲口解密。根据张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公布张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张学良相关内容）。

关于张为何推辞解密历史，张在接受华视采访时说："我不愿意写历史，我说假话？——有意思么？那我写什么给后人？我写自己好，臭表功？我写别人不好，那更不能！还有好多我有忌讳，我不能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事实我知道太多了，我不能。我的长官、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比方说对冯玉祥，我对冯玉祥知道得最详细，我不愿意说这些事情，我不应该说这些。""我不能骂我自己，骂我自己人家也不信 ，何必呢？我看人家写好多回忆录，我就笑一笑，那有什么意思呢？历史是别人来写，不是我自己来写。""评论就让别人去评论去，我不在意。你看我一生，我争权夺利过吗？我从来没为我自己争权夺利过 ，我能给国家，给人民贡

献，我尽我力量。我个人地位，我随便怎样，我就走开，就完了。”

1989年中，张向历史教授王冀（王树常子）说西安事变是因为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起。张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 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家庭

祖父：张有财=祖母：王氏

外祖父：赵占元

父：张作霖=母：赵春桂

姊：张首芳

张学良=于凤至，谷瑞玉（妾），赵一荻（情妇）

长子：张闾珣（1918-1986）（于氏生）

次子：张闾玗（1919-1981）（于氏生）

长孙：张居仁

长孙女：张居禹

次孙女：特里

三子：张闾琪（1919-1929）（于氏生）

长女：张闾瑛（1916-）（于氏生）=陶鹏飞

养子：萧朝智（于氏收养）

养女：张桂兰（于氏收养）

养女：胡文秀（谷氏收养）

子：张闾琳（1930-）（赵氏生）=陈淑贞

庶孙：张居信

庶孙：张居仰

二弟：张学铭（1908年-1983年）=姚夫人，朱洛筠

三弟：张学曾

四弟：张学思

五弟：张学森

侄女：张闾蘅，自1967年开始就长期照顾张学良的生活，至张学良在夏威夷逝世。

侄女：张闾芝

六弟：张学俊，1973年在台湾去世，曾供职于军统；

七弟：张学英，贫病交加在香港去世；

八弟：张学铨，一直留在天津，1992年去世。

侄女：张闾娥（姚氏生）

侄子：张元冲，张鹏

评价

张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他对他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是非非自我批评，也是非不定，虽然他在口头上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唐德刚说这是张亲口向他讲的，但张也认真地说，自己如是蒋，一定会把张学良枪毙。他自己部下如果犯上作乱，他早就枪毙他们。因此他被蒋关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 ，蒋在他心目中，始终"亲如骨肉"，是抗日救国统帅、民族大英雄。他在幽居台北时写《忏悔录》 开场白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将张称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同时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观点的领导人，能够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先生具有一定声望。

国民党的评价

汪精卫："去岁（1931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宋美龄于1980年10月2日函电蒋经国："……密经国览

近日共匪连续报导对张汉卿颂扬备至

并谓汉卿在囹圄中已有四十四年

共匪对西安事变所以强聒不舍

不外图利用此事为一悬案造成公论为统战之新颖口号及资料

否则时有四十余年何必再提况汉卿在台生活恬澹自得且经常研究圣经复极有领悟

共匪今后所能运用者乃不外当时军事法庭审讯之判决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管教十年

汉卿当时受共产党之诱惑所为固属荒唐

胜利后大陆沦沉其当时鲁莽逆行影响殊大毫无疑义

但被能及时幡然觉悟且在千钧一发中

说服疑忌百出之杨虎城使父亲生还

再次领导应战中国有史以来抗御敌虏之成功

又令全国人民不由然而然自动放爆竹庆祝脱险

且令许多半独立省份之军人蓦觉父亲乃唯一可领导抗战之领袖

除共匪之八路军新四军不听命令外

各军人大体上言均能除门户之分团结以赴此

乃西安事变不幸中之最大收获

固非张汉卿始能料及但是不期然而然所产生之奇迹

我政府以往对宣传及阐明政策方针方面向逊共匪

岂祇一筹汝所谂知故余意不必正驳斥祇须

……彼参加公开会集多予露面则对共匪之伎俩不攻自破汝亦有同样想法否

母十月二日”

西安事变时与蒋一道在西安被扣之部下张玉荪称：“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蒋）自己写的，或是夫人（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己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捉蒋）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

共产党的评价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 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历史学者的评价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应："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 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张最难能可贵，是在情场、战场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 、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

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 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柏杨：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松本一男：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招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 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历史学家、学者、文人的评价

胡适："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旅美作家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 假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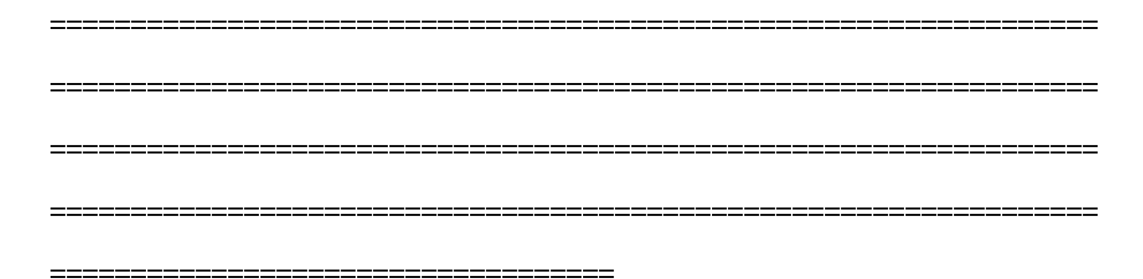
历史学家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 ，而是蒋介石的命令，"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卷37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大家多读点书吧"。

小说家卜宁：张学良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小时候不学无术，吃

喝嫖赌。长大后，眼见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置国仇家恨于不顾，率领兵强马壮的东北军狼狈逃入关内，把东北的土地拱手让与日本关东军。彼时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之实力完全可以与关东军几万人奋死一战也。张学良在东北背叛北洋政府投靠蒋介石之国民政府，入关后又背叛蒋介石，投靠共产党。晚年后又背弃中华民族，投入基督上帝怀抱。此君完全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胆识，没有主见，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小人也，比吴三桂有过而无不及也。

===
===
===
======================================

===
===
===
===
===
===
===
===
===
===
===
===
===



http://www.wellsofgrace.com/resources/test/zhang.htm

张学良将军的基督教信仰

作者：张天社

张学良将军，字汉卿，号毅庵，生于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4月17日），殁于2001年10月15日。这位与20世纪同步的百岁将军，无疑是中华民族中在上个世纪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迫使一向主张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张学良成为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的名字。

熟悉张学良生平的人都知道，晚年的张学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虔诚

的基督徒。于是，研究张学良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原因和过程，成为张学良将军生平研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也成为许多愿意深入了解张学良的人们希望了解的内容。笔者不属张学良生平的研究者，所以本文的目的不在研究张学良将军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只在向对张学良的基督教信仰感兴趣的

一

由于张学良将军正式接受基督教信仰是晚年之时的事情，所以许多人以为这是因为此时的张学良心灵孤寂，为要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而为之。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是对张学良将军的一种误解。有关资料显示，虽然张学良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在晚年之时，但接触基督教信仰却不在晚年，而在早年。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接触，对张学良后来接受基督教信仰不能说没有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年仅11岁的张学良随其父张作霖来到奉天（今沈阳）。此时的奉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都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在这里设有领事馆和商务机构。这样的环境，促使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可能会接受更多从国外而来的新生事物。在这个城市里，20世纪初就成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加入其中。张学良来到奉天不久，就常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便结识了许多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并认识了许多英美等国的朋友。不久后，张学良就对基督教的精神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917年，张学良正式加入基督教青年会，之后还担任过董事，与该会总干事约瑟夫•普赖德（Joseph Platt）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里，他学会了乒乓球、网球和高尔夫球，学会了跳舞，还学会了英文。他时常参加青年会举办的体育比赛、娱乐活动、学术讲演会、时事报告会、读书报告会等，结识了众多各界友人，如后来成为他顾问的端纳、成为他私人管家的伊雅格、爱国进步人士阎宝航、杜重远等人，都是在此时结识的。

不过，虽然此时的张学良对基督教有浓厚的兴趣，但他所喜爱的只是基督教中的诚实、博爱、和平等基本精神，对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

1919年，张学良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毕业后便统兵作战，之后很少再有接触基督教的机会。1937年，张学良被囚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时，励志社总干事黄霖仁在看他时送一本圣经给他，但他只是随便翻看，并未认真阅读。

二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辗转到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地。这一时期，张学良主要以研究明史来打发时间。去到台湾之后，张学良强烈地意识到需要有一种信仰，需要一个心灵的依靠。此时，情报局派去监护张学良的是个佛教徒，时常与他谈起佛教。此人发现张学良对佛教稍有兴趣时，就特意安排他见了几位佛教法师。之后，张学良陆续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

许多佛教的书籍来研究。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学良在高雄寿山幽居。一次，宋美龄前去居所看望他，和他有一席较为深入的谈话，这次谈话对张学良后来接受基督教信仰有重要的影响。张学良后来回忆说："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此次谈话中，宋美龄向张学良表示，希望他能用心研究一下基督教。张学良对此表示赞同。由此，宋美龄成为带领张学良进入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引路人。

除宋美龄之外，还有三个人对张学良接受基督教信仰有深远的影响，他们分别是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

董显光，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驻日大使"等职。宋美龄到高雄看望张学良之后，就请刚从美国卸任归来的董显光去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主要帮助张学良学习英文。董显光信仰基督教，其夫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向张学良谈起基督教信仰。董显光夫妇还送给张学良一本《马丁·路德传》，张学良认真阅读了此书，并感深受启发。此后，董显光就用宋美龄送给张学良的一本英文版的基督教图书《THEY MET AT CALVARY》（中译为《相逢在髑髅地》）作为课本，教他学习英语。后来，张学良把此书译作中文，并且出版。1956年，张学良在董显光的引导下正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1959年3月，蒋介石解除了对张学良的约束，并同意张学良从高雄搬往台北居住。1961年8月，张学良正式迁居台北北投区复兴岗。迁入新居之后，董显光夫妇去了美国，张学良不能继续得到他们在信仰上的帮助。此时，宋美龄派人陪他到士林镇凯歌堂做礼拜。在这里，张学良认识了凯歌堂的主任牧师周联华。认识周联华牧师不久，张学良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定在周联华的帮助下学习神学。周联华建议张学良申请美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张学良开始潜心研究神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拿到了毕业证。

董显光去美国之后，曾约农（曾任台湾东海大学校长）成为张学良的私人教师，帮助他学习圣经及英文。因此，曾约农成为影响张学良信仰的又一位重要人物。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张学良和曾约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张学良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及关于其父张作霖的著作和他与蒋经国的行谊资料全部赠给了东海大学。东海大学也特意在图书馆开辟专栏，向读者展示张学良所赠的这些重要文献。

1964年7月，张学良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组织中的一员，成为天国的子民。在他追寻信仰的漫长过程中，上述几位对他的帮助和影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70年，张学良以“曾显华”的笔名在香港正式公开出版了译著《相逢在髑髅地》，而“曾显华”正是从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三个名字而来的，可见张学良很看重此三人在信仰中给他带来的影响。

三

接受洗礼之后，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继续潜心研究基督教神学，在信仰上竭力追求，并抓住一切机会向好友传福音。

1994年4月，美国移民局正式核发“绿卡”给张学良及其夫人，张学良夫妇决定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安度晚年。到美国定居后不久，张学良夫妇便被亲友带到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堂去做礼拜，几乎每个主日都是如此。1995年感恩节聚会时，张学良在这所教堂公开向参加礼拜的信徒做了自己的见证，向人们表述了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真实领悟。正是这个见证及后来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我信基督教的经历》，为人们了解他的基督教信仰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笔者的此篇文章也正得益于此。在这次见证中，张学良如此说：“我真是感谢主，在我这一生中，他引领我，磨炼我，教导我，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使我能成为他有用的仆人，能为他工作。我现在所有的喜乐平安都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为他作见证，传福音。”由此可见，此时的张学良对基督教信仰是何等笃诚。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老人在安详中走完了人生旅途，10月24日，张学良的葬礼及追思礼拜在檀香山波扶域殡仪馆举行，周联华牧师在礼拜中证道，他推崇张学良效忠祖国的伟大精神。追思礼拜结束后，张学良将军的遗体安置在自己早已设计好的墓园里。墓园的一块大理石上，以中英文刻着一段经文：“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并用英文刻有“以马内利”。张将军自己设计墓园，又自己选择以这段经文作为墓志铭，可见他对死亡的豁达，而这种豁达，正好体现了他对信仰的深刻理解和虔诚追随。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在艰辛的人生旅程中，基督教信仰无疑给了他莫大的力量。正如一位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所言：“正是依靠信仰的力量和爱谛的支撑，张学良和赵一荻共历患难，才度过了那些难熬的岁月。基督教使他们生活充实，给予了他们更多的信心和勇气，成为他们生存和前进的精神动力。那时，仰求上帝，也许是张学良唯一的选择。只有上帝，才能抚平他内心的创伤，只有上帝，才能安抚他心灵的痛苦。”（张天社著：《张学良的后半生》）

张学良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主历2001年10月14日晚8时50分(北京时间15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安睡主怀，在世101年。谨此纪念。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我怎么会信基督教。我现在就把我信基督教的经过，讲一讲。我想上帝既然赐给我这么长的寿命，就是要我为他作见证、传福音，引领人来信上帝和耶稣基督而得救。

我年轻的时候，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球。在那里认识了不少的基督徒。有时候我到那里去听演讲。我很敬仰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和上海青年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先生，尤其是那时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莱特先生，他很爱护我，并且愿意给我安排到美国去读书。他们都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无形中，我也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我进奉天讲武堂。毕业以后到军队里去做事，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

往。

以后，我从浙江，江西，湖南到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教，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人吗？"她说她希望我也研究研究基督教。我就告诉她，我很希望读点英文。她就去请刚从美国卸任回来的董显光大使来帮助我。

他们来了之后，就常到我们那里来。董显光的夫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来了就同我们谈基督教。他们送给我一本《马丁·路得传》，我看了很受感动。以后我和董先生就拿蒋夫人送给我的一本英文基督教的书《相逢在髑髅地》（英文名"THEY MET AT CALVARY"）作为课本，我就把这本书译为中文。

我们搬回台北不久董先生夫妇就到美国去了。蒋夫人就派人来陪我到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听道。我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经和研究神学。因为中译的神学书不合用，周牧师就建议申请姜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我就研究神学。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来的功课必须由周牧师译为中文，录在录音带上。我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再由周牧师译为英文寄回神学院去。有一段时期，周牧师出国，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读。所以用

了这么长的时间。感谢主，在我读圣经的时候，上帝的光，照到了我的心里，使我明白他的旨意和圣经里的话，他的大能改变了我。他的爱，使我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我因信那稣基督而得救。我在1964年受洗。

上帝给我所安排的实在是非常奇妙。他先使我跟基督徒接触，又叫他的仆人和使女来带领我，又再给我安静的环境和很长的时间去研究神学，然后给我安排到夏威夷来。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夏威夷来。来了之后，不久就被我们的亲友带到基督教公理会来做礼拜，听程嘉禾牧师讲道。在1994年1月21日我在教堂作见证。以下就是我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

我张学良虽然已经94岁，感谢主，我还没有糊涂。今天看到诸位真是非常的高兴。我年轻的时候在军队里，可以说什么事都做。在内战的时候，我参加了许多战役。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作基督徒，实在是主的恩典。我们要作基督徒，很简单，只要心里真正地相信，口里承认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现在无论大事小事随时祷告。应该做的求主领导，不应该做的求主拦阻。我曾是一个放荡的人。现在我把自己交给那稣基督。一切事情归荣与主。大家对我有种种的说法。有人说我好，我也不见得有那么好；说我坏我也没有那么坏，上帝他知道，我这个出身行伍在军队里混的人，今天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完全是主的恩典。主实在是恩待我，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我现在很自由，无论什么都无所畏惧。我希望诸位都能信主。但是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从内心里，不是在口头上，也不是在外表上，而是要真正的信上帝和那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把自己投入主的怀抱中。谢谢各位。

我真是感谢主，在我这一生中，他引领我、磨炼我、教导我，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使我能成为他有用的仆人，能为他工作。我现在所有的喜乐平安都是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为他作见证，传福音。

最后请大家看两段圣经。

1.“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林前15:10)

2.“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着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弗2:8)

1995.11.19感恩节礼拜 于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

==

==

===
===

===
===

===
===

===
===

关于张学良一生的反思

。。。。

政治方面：张学良的历史功过，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中，如果说

有哪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作用最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个人或许就是张学良；因为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在西安事变中，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灭顶之灾的命运，并进而改变、影响了中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与历史面貌，甚至直到今天。

如果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西安事变，那么，以蒋介石的决绝的决心，可能会真的一边加强建设现代化机械师，一边彻底围剿逃避盘踞在陕北的中共，并在彻底消灭中共武装力量以后，才开始进行全面抗日战争。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中国就会像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一样，逐步走向自由民主法制的现代化政治道路，正如今天的台湾中华民国一样。并且，中国或许会成为西方世界的朋友，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繁荣的大国，会成为追求自由民主、真理与公义的平安幸福之地。

当然，如果中国历史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没有发生日本侵华战争，或是如果俄国没有发生1918年的苏维埃武装暴动、从而中共不会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得到苏联支持，等等，那么，二战以后的中国也不会被共产主义窃取政权，而是会沿着中华民国制宪道路、逐步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但是，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假设。今天，当我们抚今追昔的时候，摆在我

们面前的中国历史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暗中大力帮助扶持下，与中华民国政府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并在1949年成立了一个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从此，中国人民被铁链、铁拳、铁蹄统治，大面积地、系统性地，丧失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信息自由、甚至经济自由、迁徙自由、人身自由、从业自由、公平正义、等等等等，直至今日，已经超过整整七十年。

在这七十年中，在中国大地上，虽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方面，因着近现代以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普及性的福泽，中国也发生了许多巨大的、甚至天翻地覆的、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在中国更发生了许多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大跃进、大饥荒、六四天安门屠杀、等等惨绝人寰的事情，更发生了许许多多贪污腐败、堕落、欺谎、败坏、欺压、不公不义之事。

最关键的核心是，在中共七十年以来至今的统治中，始终实行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特有的、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系统性的、残酷压制人民自由的统治体系。在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只有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包括中国、朝鲜、古巴等国家中，才有愚昧落后的所谓户口制度。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的近三十年来，在整个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朝鲜、古巴等很少的三、四个国家才仍然会实行残忍而愚昧落后的户籍制度。在这样的体系下，人民被人为地、强迫地、局限于各自的

居住区域、工农从业领域，被人为地分成三六九等，在工作、迁徙、子女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婚姻、生育、就业、职业规划与发展、等等无数方面，都存在着深刻的、普遍的、涉及到普通人生活几乎每一个方面和角落的、系统性的不公不义。不但如此，更在国家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真理探索、求知、信仰、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建设发展、等等领域，在出版、结社、言论、文字、新闻、政经讨论、等等重要领域，实行着严酷的、系统化的、桎梏性的、在人类历史上罕有甚至空前绝后的严厉封锁性统治。

自从1949年以来的七十多年中，全体中国人民就一直处于这样的系统性恐怖统治之下，直至今日；甚至不知道中国人民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够推翻这样的残酷政权与铁拳统治。

这样的系统性严厉封锁禁锢与统治，在七十多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历史中，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心灵中深深地刻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内心愚昧偏激、远胜1900年义和团的、仇视西方、盲目自大的普通百姓们。这种状态，势必给今后百年甚至更漫长时间内，中国的现代民主主义道路、文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患难与深刻的鸿沟。

在1980年代，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随着中国经济在文革以后面临几乎崩溃的边缘，因着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处于极其贫穷落后的状态、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蓬勃发展的经济体系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所以，中国共产党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全面实行了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从那时至今的四十年来，尤其是随着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体系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中国这艘经济巨轮已经航行了很远、很远。今天，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面貌，与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固然，中国近四十年内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给中国亿万人民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在此，我们必须诚实地指出的是，究其根本而言，这种巨大的物质生活发展方面的益处，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近现代五百年以来、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然而，正如一百多年前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一样，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仅仅是器物层面的革新与演变，而并非是在思想、政治、文明方面的深层次沿革。在骨子里面，许许多多中国人仍然试图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甚至，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器随着经济规模、技术、资金的大幅度繁荣与发展，而在很多方面更进一步加深了对于本国人民的思想钳制、言论统治、强力镇压，更对国际社会的政经秩序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威胁，并在某些方面具有了1930年代德国纳粹政权的许多特征。

在过去四十年中，一方面，中国人民在经济方面、物质方面、迁徙方面等，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有了某些方面的、大幅度的松动和自

由；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在思想精神层面上甚至坠入更加洗脑化、纳粹化、谎言化的社会统治体系之下。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甚至变得更加好战、好勇斗狠、苦毒、猥琐、自私自利、仇恨、欺谎、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甚至在思想政治层面上变得更加流氓无耻，信奉——“人至贱则无敌”、以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关于1949年以后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景况与发展演变，本书集的其余部分将会有更加深入全面的总结和反思，我们就暂时先不在这里赘述。

=========

因而，如果我们追述、回顾历史，思考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怎样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并且又是突然地、落入马克思列宁主义铁拳统治体系之下，甚至延续了漫长的七十年之久、直到今天，那么，任何诚实的人都会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1936年的确是最危险的、生死存亡的时间。那时，正是蒋介石统一中国政权以后、经历了将近十年建国黄金时期、政经大发展的年代，正是蒋介石的政治声望在中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当然，日本人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对于东北的强行占领以及后来满洲国的成立，对于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耻辱，也是令全体中国

人极其愤慨之事】，也正是中华民国军事发展建设在德国帮助之下如火如荼发展的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国政府围剿之下，只剩下了区区几万人，奄奄一息、甚至很快就将要全军覆没。

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在西安所发动的西安事变，固然是出于急切想要挽救东北、寻求抗日的迫切心理，但是，西安事变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大地位和作用，无疑正是，——它在客观上挽救了垂死挣扎的中国共产党，并直接导致了后来抗日时期的中共悄悄壮大自己、乃至后来打败整个中华民国军队，从而改变了整个中国在二战以后的历史路线。当二战结束以后，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现代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演变与沿革的时候，中国却堕入了黑暗的专制时代，直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今天。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整个二十世纪，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对于中国的现代民主主义政治道路而言，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最具有破坏性作用的事件，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在整个二十世纪，就中国的历史道路路线以及历史发展意义而言，中国最大的千秋罪人之一，就是张学良。

。。。。

张学良的思想与动机

但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人物的时候，我们固然不应当简单地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也不应当简单地仅仅以他所作的事情、或是他所做之事所带来的后果，来评价衡量人；而是，我们更应当客观公正地、深入地思考和分析，在一个人的心灵、动机、心底深处之中的真正光景是什么。

那无限圣洁公义、满有恩典慈爱的永生之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因此，作为上帝子民、神之儿女的我们，也应当以公义恩慈的态度与心灵，来看待一切世事、对待一切世人；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显然，如果我们公道地思考1936年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时的动机与思想状态，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张学良的心中，一定非常想要通过胁迫蒋介石、迫使其与中国共产党和谈、而达到使得中国早日进入全面抗日的战争局面，——从而，张学良希望，或许能够因此而把东北广大地区人民从日本的铁蹄统治之下挽救回来【否则，随着满洲国的成立发展，随着日本在东北所推行的奴化教育，东北地区或许真的会在将来很长时间中，脱离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时，没有人知道二战将会爆发，更没有人预先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的即将发动、过程、以及二战以后世界在英美等西欧国家领导之下而将要建立起来的民主自由世界国际新秩序】。

显然，当时的张学良一定非常难于深刻洞察和预见到，中国共产党、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和动机究竟是什么【显然，张学良本人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士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在1936年的中国，除了少数在政治国事等方面具有非常敏锐洞察力、分析能力的人士之外，其实很少有中国人会预想到几十年后、二十世纪下半叶、当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中国社会在中共统治之下将要沦落入怎样的一个强权压制、铁拳统治的境地【甚至，当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1956年之前的十年建国初期阶段内，还有很多海内外知识分子们飞蛾扑火一般地投向共产党的怀抱；直到反右运动等思想镇压行动开始以后，世人才开始逐渐看见共产党的丑恶与邪僻暴戾的嘴脸；直至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民中间，人们仍然落在共产党所谓发展经济的思想牢笼网罗之下，被罪恶所羁绊捆绑而不自知】。

事实上，在1911年满清灭亡以后、在1936年以前的喧嚣混乱的中国政坛上，充满了军阀混战、各种政治势力彼此倾轧、兵戎相见、你争我夺、诡诈暴戾，——因此，看起来，中国共产党除了有时会搅起局部性的工农暴力造反行动之外【例如，1920年代末期，他们在上海、武汉、南昌、湖南等地，发动了一些局部性的武装暴力革命；但是，这些都无一例外地被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力量成功地武力镇压下去了】，——对于当时许多的中国人而言，共产党似乎并非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什么心腹大患。

在1936年以前的许多中国政治人士，甚至包括孙中山、宋庆龄、汪精卫等著名政治领导人物或风云人物，都对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等，存在着美好的幻想和良好的看法。那时，苏联与中华民国的关系，相比于其他欧美国家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相对而言更加友好平等互助的关系；苏联甚至【出于各种现实性的地缘政治性质的动机；——当时，由于苏维埃政权通过暴力革命窃取了俄国政权、并残酷地在本国推行无神论主义统治、迫害本国基督教人士等等，而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疏远、冷落、甚至制裁；因此，苏联迫切地想要扶持中国（尤其是中国内部的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的政治势力），并以此对抗西方、防范日本、等等】对中国进行了很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投资，试图帮助中国现代建设等等。

而当时的1936年的中国政坛，由于并非是像后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共产党专制统治时期的言论思想钳制、万马齐喑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非常活跃、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状态，所以，仍然存在着许多对于共产主义

思想同情、帮助、倾向的政治势力、人物、影响等等【——尽管，此时，经过蒋介石政府自从1927年以来的、针对共产党的、坚决扫除和镇压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士在中华民国政府内部已经式微，基本上丧失了一切正式的、台面上的、政治影响力】。

此时，已故的中华民国精神上的国父、孙中山在去世前一段时期所推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仍然对于许多社会思想舆论、国民党左派势力和人士（例如汪精卫、宋庆龄、等等）有着很大的潜移默化影响。【这个政策既是出于孙中山本人的一部分政治理念（孙中山本人由于所受基督教信仰和教育的影响，对底层贫苦百姓有着很大的同情），也是出于孙中山生前的现实地缘政治的考虑；——在1911年后的、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中，苏联对于孙中山等中国国民党人士的经济军事等资源帮助，从孙中山、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实用的现实意义。（不过，苏联当时的帮助国民党的前提条件是，苏联要扶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正是因此，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虽然有着一些比较强大的亲英美的政治势力——尤其是在江浙地区；甚至在1910-1920年代有着比较显著的基督教人士的影响；但是，中国后来的历史显明了，最终，是那些反西方、反英美、亲苏联、亲无神论主义的、政治思想与势力人士在中国占了上风）】。而这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社会著名人士等等，则继而对整个中国社会舆论和社会思想趋势产生某种间接的、但却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有力地显明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虽然也属于威权时代，但其思想舆论之宽松环境、以及民主自由政治框架，要远远地好于几十年后、1949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铁拳统治】。

1930年代，由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张学良不得不率领手下数十万士兵的军队，退到关内。此时，张学良以及所有部下都背井离乡，内心极其落寞，并受到全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指责，——因为他们在侵略东北的日军面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抵抗。

1930年代中期，落寞的张学良，正是在上海通过宋庆龄等人的暗中间接联系，从而与躲避在陕北一隅的共产党人士建立了联络。而此时，张学良对于中华民国政府极其失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或许以为，不久后全中国军队就会开始与日本开战、全面抗日，而东北军就可以反攻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但是，张学良等了整整五年，一直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任何迹象。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张学良决心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背后的苏联国家力量】建立联系，甚至想要与中共一同迫使蒋介石改变心意、立刻与日本全面开战。

在政治理念上，张学良虽然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一个思想浅薄、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但他并非是一个没心没肺、愚顽笨拙的人。事实上，他虽然在政治上的很多见解与理念很幼稚，但是，相对于当时很多中国政坛上的军阀与各种政治势力以及达官贵人而言，张学良并非是一个良心泯灭的人。同时，他也并非是一个没有心机、没有筹谋的人。

一方面，张学良厌倦于所看到的中国政治分裂局面与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他因着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而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的认同。这都促成了他对于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环境中，张学良与许许多多的其他政治人士、文化人士、国家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有影响力的人士一样，对于无神论主义政治思想，丝毫没有任何警惕性，也根本不会想到其中会有什么危害。【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传统，并不强调对于宇宙天地之造物主、世人生命之主的敬畏、敬拜、热爱、寻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仅仅是那样一种模模糊糊的概念；虽然中国古人也在某些方面讲究敬神畏天，但是，他们并没有清晰的、那样一种对于生命之主的深深眷恋、敬爱、遵从、敬拜】。【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对于无神论主义思想的彻底贯彻；在政治现实中，必然引致对于世人之个体生命价值的忽视，——并必将会引致其一味地强调：“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要远远地胜于个体之生命价值”。在共产主义思想架构中，个体生命的唯一价值，不是在于敬神畏天的信仰之中，而唯独是在于集体社会主义的团体价值之中。正是这一点，使得共产主义理论与政治实践——必然会导致专制主义、专政主义，必然会导致个体生命的价值、自由的价值、等等被肆意藐视和践踏】。

简略而言，张学良之所以会与共产党联络、并发动西安事变，包含了以下

原因或心境因素：

（1） 厌倦看到中国各种势力之间勾心斗角、彼此分裂、内部争斗、兵戎相见。

（2）对于社会底层人民同情，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共产主义思想中的均贫富、扶助工农的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厌恶之情，甚至反而有一些好感。

（3）对于无神论主义缺乏警惕性；对于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认识与洞见；没有深刻成熟的政治分析能力与战略性思考能力。

（4）对于日本侵略东北而有着深刻的国仇家恨的迫切心情。

（5）十岁以前，张学良与性格刚强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十岁丧母以后，张学良来到父亲张作霖面前、在养尊处优环境中长大；长大成人以后，在外人的眼中，张学良或许是一个纨绔子弟、公子哥、少帅；但是，在张学良的心底深处，仍然有着一定的正义感，以及对于民间疾苦的同情。他的人生路线，包含着复杂的内容，其中既有酸甜苦辣，又有年少轻狂、胆大妄为。

（6）我们不得不指出，张学良虽然驻守西安、手握重兵、身居高位，但是，一方面，他既在政治战略层面上非常幼稚、意气用事、并不真的明白国家大事、也并没有真正的洞察能力，然而同时，另一方面，他在政治战术方面又有着相当丰富的阅历、心机与能力。这种政治战略能力与政治战术能力的两方面的不匹配，也是导致张学良悍然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因素，合在一起终于导致了，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军事政变、劫持了国家统帅蒋介石【本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就因日本侵略东北、国内政治声调不一致，而处于巨大政治压力之下】，强硬性地改变了关乎整个国家千千万万人、甚至亿万人民前途命运的国家大政方针路线。一时间举国大哗。

西安事变彻底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于水火之中，把中国共产党从灭顶之灾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九年以后，当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八年消极抗日、悄悄发展军事政治力量、壮大自己、不断地接受苏联帮助，尤其是在苏联把二战末期所占领的、从日军手中夺取的、东北地区很多军事资源大量转让给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国共产党终于发展到可以与整个国家——中华民国全部军事力量抗衡的地步。

1936年的西安事变发生仅仅十三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军事战争、暴力革命、大规模生灵涂炭的手段，篡夺国家政权，于1949年建政；从此中国人民仿佛笼中的猪狗一样生活在彻底失去生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息自由等等境地之下，生活在大量的城乡不公平、地区间不公平、工农之间不公平、行业之间不公平、等等恶劣社会制度人文环境之下。

。。。。。。。。。。。。。。。。。。。。。。。。。。。。。。。。

。。。。。。。。。。。。。。。。。。。。。。。。。。。。。。。。

。。。。。。。。。。。。。。。。。。。。。。。。。。。。。。。。

。。。。。。。。。。。。。。。。。。。。。。。。。。。。。。。。

。。。。。。。。。。。。。。。。。。。。。。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苏联、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

那么，让我们在此深刻反思，为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其相应的政治理念，如此具有迷惑性、欺骗性、吸引力呢？

在1936年的中国主流社会中，事实上，同情、甚至倾向于共产党的中国人，绝不仅是张学良一个人。在整个华北、华东、华西、华南的许许多多大专院校中，在整个中国的文化知识分子群体内，都和欧洲的巴黎等地一样，处处充斥着左翼文人的声情并茂的文字、思想、理念与喧嚣。他们以钦佩的目光，仰慕着苏联的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机器的步调统一；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视着敬神畏天的信仰的可贵，忽视或无视着个体生命的高贵价值与尊严；他们向往着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爱

国主义等等，倾慕着世上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的荣耀与繁华。

【这正如十九世纪中叶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说道：“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上空游荡。”】

【请注意，我们并不是要在这里试图论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本身就必然是错误的（事实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感，本应当是人类所应当具有的最美好的道德情操之一；但是，关键问题是，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必须建基于：——公义、生命自由、对于上天的信仰、等等之上）。而是，我们想要深刻地剖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错误在何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述 《论民主》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九章

在一个社会中，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

==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经济的本质

在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有三个人的三本书，起到了重要的支柱性、启迪性作用，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三本书，分别从法治、民主、经济三个角度，勾画出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架构的蓝图，并在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践中，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政治建制与运作，广泛地影响了许多现代人心中的人文政治经济思想。当然，在他们出版了那些相关著作以后，后人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又进行了许多细化、深化、系统化的思想理论建树。但他们三个人的著作都具有代表性、革命性、原创性、开启性的意义。

但是，我们想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在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文明大厦中，如果除去了圣经、除去了基督教信仰的重要影响与深刻的文化土壤，那么，所谓《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等等思想所代表的现代法治、民主、经济架构中，就只有的是贪婪、争斗、战争、私利、一盘散沙、与慵懒、拖沓、低效。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简单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经过、结果，或是研究一下法国大革命的喧嚣混乱【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曾经试图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但很快国家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之中，导致许多内战和屠戮；最后，法国领导人认识到宗教信仰对于国家社会稳定与道德状态的重要意义，才努力地重建曾经被短暂抛弃的基督教信仰】，以及今日法国、希腊、意大利等等政府的腐败与低效，或是环顾一下今天世界上的诸如华尔街、伦敦金融区的无休无止的贪婪与明枪暗箭，或是西方世界里民主政治中的剑拔弩张、互相吵骂，那么，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所表达和代表的法治、民主、经济制度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世人生命与心灵之中的真实光景是什么，世人是否在内心中有敬虔、诚实、恩慈、寻求公义的立场。

在本章，我们简要地讨论现代社会中经济运作机制与民主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____

在英国崛起之前，欧洲曾经先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依次成为海上强国。在英国之前的海军大国西班牙，尤其看重世上的黄金，因此，西班牙的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之一，就是想要在世界各地寻找黄金等物质财宝、财富。

然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间接使得英国的崛起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等海上大国之崛起非常不同的经济道路。

亚当斯密的最大的启迪性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所谓物质性、经济性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根据亚当斯密的定义，所谓经济性财富是指，社会或个人所拥有的、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与能力。

换言之，财富并非是有形的黄金或是土地等等，而是一个人、团体、社

群、社会的劳动创造能力、生产率。

更进一步，根据亚当斯密的思想，真正地增进财富的途径，不是在于囤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贸易；因为人们在贸易中通过彼此交换商品，从而达到“术业有专攻”，生产能力与技术精益求精；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所最擅长的那一种工作。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基础上，整个人类社会就能够走上不断进步、繁荣兴旺的道路。

在亚当斯密的贸易经济思想中的本质是，人类应当、也可以通过相互协作、分工合作、社会化大分工，来共同增进富裕程度。这种思想，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基础和精髓，也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过去两百年内、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所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在自由贸易经济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假设性前提条件，那就是，在人类社会、各个国家、世人心中，人们愿意敞开心扉地、没有嫉恨地、彼此信任、通商贸易，彼此平等地互相对待、相互合作、共同富裕。

如果这个假设性前提条件不成立，那么，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公平、平等、公正的贸易法规环境，人们彼此之间也无法互通有无、进行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

自由贸易必须需要一个公正、成熟、稳定、可预期的、透明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如果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动荡，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彼此猜忌、甚至剑拔弩张、发动战争、互相好勇斗狠、争强好胜、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那么，从根本上说、从长期而言，自由贸易就不可能进行。

而显然，这种公平正义而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唯有是建基于世人心中的公义、正义、平等、诚实、信实，以及对于法律、秩序、规则的遵守和敬畏。

在现代社会，这样的政治法律环境往往是在民主制度的政治框架下所提供的。

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一个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法律规则秩序环境，从长

期而言，唯有是建基于整个国家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境况、以及内心深处的真诚信仰。

如果人们在信仰中是虚伪的、轻轻忽忽的、玩世不恭的；如果人们彼此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羡慕嫉妒恨；如果人们藐视规则与秩序，既贪婪、又喜欢偷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蔑视那些说话算数、老实巴交的人；如果人们凡事都用计策，不是三十六计，就是孙子兵法的“兵者，诡道也”；如果世人的心中没有道德底线，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敬虔的信仰，信奉“人至贱则无敌”；如果在人间道德世界中，真的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所谓的自由贸易，不但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福祉，反而，会激起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仇恨甚至战争，进而导致生灵涂炭的灾难。

____

在现代经济学理念中，人常常被看作是自私的、为了谋求自己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经济动物。

但是，从整个国家、社会、国际的层面而言，上述现代经济学理念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盲点，即，它看不到，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待在秩序规则的笼子里面，以诚实守法的辛勤劳动、以宁可吃亏也不说谎的诚信态度，来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而不是以狂野不羁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见缝插针的方式，来取得财富。

在一个秩序规则法治体系运转良好的国家社会中，或许，那些狂野的、投机取巧的、坑蒙拐骗的行为，会很快受到惩罚；因而，这样的犯规行为并不常见。

然而，随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愈来愈复杂，随着秩序法规越来越疏于坚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社会中许多人信仰越来越不敬虔，越来越虚伪、徒有其表，终有一日，秩序规则体系就会岌岌可危、甚至崩解，从而，自由贸易也会随之消失。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或是在国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敬虔信仰、没有对于法律规则秩序的遵守和敬畏、没有诚信与真挚的道德品格，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就不会有开放式的、

自由竞争式的自由贸易机制。

————————

在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环境中，从国家、社会、国际层面而言，人们必须认识到、并深刻地尊重两点。

第一点是，人们必须由衷地、从心底深处，真诚地尊重、遵守、敬畏秩序规则体系，而不是——处处喜欢要小聪明，把别人的诚实和诚信，当作是愚蠢；把自己的诡诈，当作是智慧。

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也应当是如此。

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从根本层面、终极意义上而言，人们不应当把人类世界看作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所主宰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世界，而应

当是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真诚相处、公义、正直、恩慈的世界。

第二点是，在国际关系之间、国家内部关系等等之中，大多数人们必须有一颗诚实的、信实的、“爱人如己”的心灵。

所谓“爱人如己”是指，在人类中间，在人与人之间，应当彼此有博爱的心。这种博爱的情感是，每一个人在心灵中应当关爱他人，就像关爱自己一样。

请注意这里，并非是否定、放弃我们自己的正当、合理的利益，而是强调，我们应当关爱别人，正如同我们关爱自己。换言之，这正是我们在本书开始之处所引用的圣经话语：“我们应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

弥迦书6章

6我朝见耶和华，

在至高的　神面前叩拜，当献上甚么呢？

我朝见他的时候，当献上燔祭，

当献上一岁的牛犊吗？

7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油河吗？

为我的过犯，我可以献上我的长子吗？

为我的罪恶，献上我亲生的孩子吗？

8世人哪！耶和华已经指示你甚么是善，

他向你所要的又是甚么；

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谦虚谨慎与你的　神同行。

马太福音22章：

37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38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39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40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____

上述两点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宗教信仰，其中又有许多迷信【即，以占卜性质观念看待世事与自然世界，并试图从中操弄、筹划，以期得到自己的属世利益；例如，风水、算卦、趋吉避凶、生辰八字、占星术、炼金术、交鬼、画符、拜拜并给神灵烧金纸、等等】以及偶像恶俗【即，把神灵物化为人手所作的偶像，例如金、银、石、木、泥像等等；或是用雕像来代替上天、神鬼；或是把信仰的对象当作是人臆想出来的、属世性质的对象、或是人出于自义自傲而杜撰的、没有诚实完整事实根据的玄学深奥之理，例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玄学主义，等等；即，人以属世之利或是自己的自义、自己的心思意念为偶像】。

在这个世上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中，只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有着强大的历史渊源背景、相对而言完整的理论支撑、比较完全的组织体系、以及正规宗教经典系统为核心内容。它们是，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可兰经为核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以及以系列佛经为核心的佛教信仰

体系。以下我们引述一些简单的比较和反思。

+++
+++
+++
+++
+++
+++
+++
+++
++

【【【引述 《从金刚经说起》前言】】】

前言

世上的宗教有很多。然而，在世上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的、千差万别的宗教信仰、以及相应文化传统中，成体系的、有详尽而系统化的宗教经书与教义为支撑的，有强大理论背景支撑的，能够构成一个相对而言完整神学、

信仰理论体系基础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宗教，或三个宗教体系，即，以圣经为中心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以及，可兰经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信仰体系；还有，一系列佛经为中心的佛教信仰体系。

在本书中，我们以佛教经典中的一本最重要的核心教义性书籍《金刚经》为聚焦点（以后，我们也会讨论佛教经典中的其它重要典籍、书籍），从中分析、评介、剖析佛教的教义与思想，以及它在社会中、世人生命之中产生的相应影响。

无论是世上哪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试图回答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

所以，如果，我们要分析、评介、剖析一个宗教的精髓与核心体系内容，那么，我们就应当来仔细地、认真地看一看，它们在关于上面五个方面的观念中，是如何阐述的。

正如《世界佛教共识宣言》中所说，也正如几乎每一本佛教经典中的思想核心所表达的，——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创造宇宙天地的、终极的造物主。

由于在佛教中没有造物主、或不相信有造物主，因而，这一特征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等领域中的一系列深

刻的理念与观点。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往往是泛神主义哲学所共有的。

这些理念与观点的特征，就是：——在世界观上，它们往往把世界看作是无珍贵价值、无隽永意义的，而不是把世界看为瑰丽、奇妙、意义深刻的。它们往往强调，世事无常，人不应当被世事羁绊，而是应当醒悟，看清世界与世事的虚无等等。在人生观上，它们往往把人的生命、心灵、位格等等看作是并无深刻价值意义的。

这种泛神主义哲学体系，由于没有造物主为中心的世界观、人生观，所以总是会指出，物质世界的虚浮性、不可倚靠性。然而，即使，这样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错，并且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缺失了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它们不能看见世界被造的奇妙性、美丽性、智慧性，也看不见世人生命的珍贵与独特、心灵的奇妙、思想的可贵。人的这种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是宇宙世界中一种最为独特、奇妙、珍贵的能力与品质，是来自于造物主、创造生命之主自己的无限能力与完美品质；这样的能力与品质，正是道德的基础，是爱的根源。

总而言之，它们把人生、世事、价值等等，往往都看为羁绊人的东西，提倡要离弃、舍得、放下，而不是要有满腔热忱的、执著的向往、盼望与信念。

究其原因，无论是人们在思考世界观、还是在思考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信仰观的时候，如果离开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全能之

造物主，那么，世界就是冰冷、荒芜、混乱、无意义、虚浮的，而人生也就在本质上是苦的；因而，根据泛神主义哲学，这些就都应当被看破、看空、舍弃，放弃执著，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

在本书评析《金刚经》的过程中，我们会清晰地看见上述特征。

++
++
++
++
++
++
++
++
++

【【【引述 关于伊斯兰教的综述】】】

《关于基督教信仰证据的反思》

世上存在的谎言，并不能证伪真理。许多人相信谎言，这恰恰证明了，世人生活在轻忽、自私、满了罪性与罪行的生命之中。世上存在许许多多的骗子，这并不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诚实"这件事。

世上那些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们，常常用伊斯兰教为例，以此说明——："一个广泛传播、被许多人相信的宗教信仰，并非只有基督教信仰一个宗教；因而，人们就并不能说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信仰或者都是真实的，或者就都是虚假的。"

所以，我们在本章这里，仔细分析，看一看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我们承认，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也是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就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到了世界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我们也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可兰经的著者（他或许有一两位助手帮助他写完此书）。我们也进一步承认，穆罕默德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以至于他能够以非同寻常的决心和毅力，把他的事业一直进行到底。我们也不否认，可兰经中讲述了很多关于上帝的完美性等内容，以及教导人应当道德高尚等。可兰经的语言看似优美，

具有阿拉伯语的纯粹风格；这一点，许多伊斯兰教学者都同意，很多基督徒学者也都不反对。但是，穆罕默德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特别启示；——关于这一点，却没有任何外在证据能够证实；并且，从可兰经的教义内容中，我们能够看见大量的证据，显明了，伊斯兰教绝非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为了让这一点能够得到更加清楚的说明，让我们公正无偏地考虑以下几项事实：

1. 关于穆罕默德的自我宣称，既没有任何神迹的支撑，也没有任何预言的证明。

事实上，穆罕默德经常性地被他的反对者要求提出确凿的证据，来显明他的身份与使命的真实性；但是，他总是以轻蔑的语气拒绝，并用一系列理由来推搪。可兰经里面写道："真主对穆罕默德说：——完全可以差遣你，让到地上来行神迹；但是，以前的国家民族用谎言败坏了神迹，所以，你只是一个传道者。""如果你行神迹，百姓不会相信你；因为从前摩西、耶稣、以及众先知行神迹的时候，百姓也弃绝了他们；所以，你不要行什么神迹。"

PALEY博士曾经列出了可兰经中至少十三处不同的地方，都以与上文相似的理由，来解释穆罕默德为什么没有行神迹的能力。的确，穆罕默德用很多华丽的辞藻，讲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任何能力，来施行哪怕一点神迹。所以，他一生的传道都是空口无凭的。

在穆罕默德去世几百年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假意讲述了一些穆罕默德所行的神迹；但是，这些事情不但没有任何见证（即，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见证人的见证），更是与可兰经的内容直接违背的；因为可兰经多次重申，穆罕默德没有行神迹的能力。并且，那些几百年后追随者们所编造的神迹，本身也没有任何深刻或重大的价值与意义，而仅仅是一些虚浮的、博人眼球、哗众取宠的事情；这些类似的事情，世上有很多迷信的风俗与赝品；比如，树木可以行走，石头可以向他打招呼，水泉可以说话，骆驼可以抱怨，羊肉说自己里面有毒，等等。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的教义本身中，并没有任何神迹的内容，而仅仅是一个自我谎称者的、空口无凭的宣称。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教义，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有着深刻而本质的区别，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神迹（这是整本圣经内容的核心，是整个基督教信仰教义的中心与基础；此事有着深刻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斩钉截铁的、令人无可

置疑的历史见证；基督使徒们为此而甘洒热血，走遍天涯海角传这和平的美好福音；整本圣经旧约，在跨越上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以令人无可推诿的清晰预言，证明了这件事情的历史真实性）；后者则没有任何证据的痕迹和影子；没有任何人能够显明，伊斯兰教教义是来自天上的启示。

2. 我们也可以从道德教导与特征的角度，来比较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不同。对此，我们有充足的历史和文献证据，能够显明我们的比较结果。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无害的、毫无罪污、毫无瑕疵；在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罪性与罪行。基督的生命是纯洁的；即使基督的敌人，也无法找到他的任何罪与错。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了完美生命的榜样；他有着热忱的信仰，纯洁的爱心，柔和谦卑；这些无限美好的品格，都是世人所从未见过的。

穆罕默德的生命品格则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品格完全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穆罕默德的生命中，充满野心、淫欲、残忍、不公不义；他的生命中充斥着许多最血腥、最残暴的罪行。亵渎、撒谎、谋杀、通奸、淫欲、掠夺，等等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几乎都是每天发生的家常便饭之事。而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避免其他人的效仿，他谎称自己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真主的直接启示、旨意。他无耻地宣称，是真主给了他那些特权，使他可以随意行那些丑恶的罪行。这些事情的数量如此大，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我不愿在这里过于详细地谈论它们的细节，免得它们玷污了本书的纸张，也免得玷污了读者的情感。

3. 对于一个公正不偏、心态诚实的人来说，可兰经本身的内容，与圣经新约的内容根本无法相比。可兰经的内容，基本就是一些所谓高尚情感、道德教导、宗法礼制的大杂烩、堆砌；其中也包含了许多匪夷所思、荒谬的故事；处处显出谎言与自相矛盾的特征。穆罕默德自己也承认其中的内容包含许多矛盾；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他的真主就是这样告诉他的；所以上一章的内容，有时在下一章就被否决掉。这种矛盾的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很难向一个穆斯林证明可兰经的内容是错的；因为他常可以找到相反的内容来为自己辩护。

可兰经的内容，并非是超出人的想象；它巧计地融合了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的宗教信仰观念；它激励人心中的最强烈的、最暴戾的情感；它鼓励人的野心、权力、复仇、战争；它打开淫欲的大门；它宣称人们在天国可以得到这方面的、属肉体的奖赏；这些，都是为了引发人心中不洁的动机。它不鼓励、拒绝、甚至禁止人们自由地发问；它禁止人们进行任何教义上的反思、思索、自由讨论。可兰经中的那些优秀的部分，都是由于抄袭、模仿了圣经；而可兰经中那些不同于圣经的部分，即，那些穆罕默德按着自己的判断或想象而添加的内容，则充斥着虚假、敬虔、荒谬。

4. 穆罕默德传教的方式，与福音传播的方式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如果，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就是，这两者都在刚建立的短期时间内，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且，两者都自从建立以后，就一直持续地存在下去，直到今日。

但是，当我们仔细认真地考察两者的传播方式的时候，就会更加惊讶地发现，两者之间不仅一点相似性都没有，而且甚至是完全相反，互相形成了鲜明对比。

穆罕默德在一开始传教的时候，的确想用劝服和计谋的方法；但是，他这样持续进行了十二年以后，收效甚微。前三年，他只有十四个门徒；七年中，他只有八十多门徒；十二年后，他从麦加逃走的时候，跟从的人数很少。

在这个时期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基督教信仰的早期传播根本没有可比性。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是极其迅速的，如同闪电爆发一样，从天的一边照到另一边。在短短数年之内，没有什么属世的势力与权力的帮助，面对着重重阻力与反对的势力，基督教信仰却很快就传遍了罗马帝国

的疆域，甚至传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许多角落。但是，伊斯兰教却在十二年内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而且，与基督教信仰所针对的、文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内的各地百姓（即，公元一世纪的罗马人不会轻信一个外来的信仰）不同，伊斯兰教在公元六世纪，即，在其开始建立的时代，所针对的是无知、轻信、没有什么文化的阿拉伯地区人民。然而，在这个期间，伊斯兰教的拓展却极其缓慢。

事实上，若没有刀剑，这个宗教信仰根本就不可能在人类的社会与历史中泛起一点涟漪。当MEDINA的居民开始支持穆罕默德以后，穆罕默德改变了他的整个计划；他正式宣称，要用武力的方式开始传教。从这时起，穆罕默德就变成了一个军事战斗家。他开始频繁地袭击、劫掠商队；当武力增长以后，他开始征服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部落、国家。有时，他会大规模杀死战俘，或是把战俘卖为奴隶。起先，他的命令是杀死一切不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后来，随着他武力征服的区域越来越多，他的命令逐渐变为："可兰经，或死亡，或上贡"。

不过，我们不要产生误解，不要错误地认为穆罕默德的征服区域极广；其实，在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他的统治区域从未超出过阿拉伯地区，除了叙利亚的一两个省份之外。是他的后继者、哈里发们，用刀剑与火，把伊斯兰教的疆域扩展到亚洲以及埃及的部分区域。在这些拓展过程中，除了血腥的杀戮，还能有什么事情呢？

因此，虽然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很快、范围很广，但是，这些都是通过刀剑、杀戮、血腥、征服而达到的；这与基督教信仰的和平温柔的传播过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凭靠野蛮的武力，后者是来自天上的祝福。

5. 伊斯兰教的教义内容，及其在人生命中所带来的影响，与基督教信仰内容和影响相比，完全不同、天壤之别。

不论基督教信仰传播到哪里，它都给所到之处带来祝福与温馨；那些真正贯彻实施基督教信仰教义原则的人，以及受到这些美好教义原则的影响的人们、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得到了极大的益处。如果我们放眼查看世界地图，就会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真正文明的国家、民族和地区，那些科学与文化发达、经济得到蓬勃发展的区域，都在哪里呢？什么地方，有真正的欣欣向荣的气象呢？相对而言，什么地方，有良好的道德风貌、和谐的社会秩序呢？穷人和受苦难的人，在哪里会得到最好的帮助、救济呢？人民在哪里能够得到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享有自由呢？妇女在哪里受到尊重，在社会中享有应得的、受尊敬的地位呢？针对年轻人的普及教育事业，在哪里得到最好的发展呢？人们在哪里最恩慈、良善、幸福呢？

显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以上问题的答案：——是在那些基督教信仰发扬光大、基督徒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有相对而言的很大影响力的地区。并且，在那些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当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全、自由、和平程度，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的实质情况、敬虔的景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相反，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当今那些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地区，就能够清晰地看见，满目苍夷、民不聊生、极其荒凉的景况。在今天的中东地区，那曾经是艺术、文学、精致工艺都很繁荣的地区，现在早已凋零破败。许多古代的良好礼制都已经无影无踪。在中东各个国家中，到处是暴君与专制政权的铁腕统治；那曾经的安宁社会生活，已经变成了无知与奴役制度遍地的境况。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各地禁止、或不鼓励教育、学识、做学问。人们不能自由地探索真理；国家的统治政权、伊斯兰教的统治，所要求于人民的，就是要像奴隶一样顺服。社会中没有正义；或是，正义常常被人们忽视。没有人享有生命与财产权的安全。伊斯兰教任何所及之处，人民就立刻失去了宝贵的自由。与此同时，整个伊斯兰教的传播运动就完全成为一个战争扩张的行为。根据可兰经，一个人最好的行为，就是为了伊斯兰教的扩张而投入战争；最高的荣誉，就是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无疑，可兰经的这些内容，直接导致了穆斯林的圣战士的战争原则，使他们在战争中不怕死亡；使他们期望在战场上战死，然后进入那个充满肉体血气满足之乐的"天国"。穆罕默德在可兰经中说道："刀剑是进入天国的钥匙。为了真主

而流出的一滴血，在战场上睡的一晚上觉，超过两个月的禁食和祷告。死在战场的人，罪得赦免。审判日的时候，他的伤口将要铺满玫瑰，香气扑鼻；他的残臂断腿，将要换成天使的翅膀。”

然而，当穆斯林在各个地区的征服战争取得胜利、结束以后，他们的生活就成了慵懒、愚昧、昏昏欲睡的样子。当别的国家在艺术、文化、科技方面取得进步的时候，穆斯林各个国家始终陷入停顿的状态，停滞不前；甚至常常倒退。他们在文学、文化方面，在绘画、科学探索、文艺等方面，再也没有优势。他们的人民常常俯伏在暴君政权的统治之下，没有自由与个人的权利。

++

++

++

++

++

++

++

++

++

【【【引述 基督教信仰与伊斯兰教信仰的比较，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生活与体制的影响】】】

《基督教的证据》

基督教信仰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什么

本章的题目主要局限于基督教信仰在人类社会道德方面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关于福音对于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另外，关于福音对于人生命更深层次问题的深刻作用，我们则将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专门论述。在本章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福音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以及社会整体的生机勃勃、自由而团结的状态。这个题目虽然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但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广泛话题。而且，这个话题在很漫长的历史中都曾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在这里，我只想进行一些言简意赅的、初浅的论述。我的这些论述其实相比于前人的相关著作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如果说与前人的著作有什么稍微不同，那么我想，本章的文字大概更专门地针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缺乏以及所经历的很多具体事情。

我想要论述的一个重点是，关于人与人之间、乃至整个社会之团结状态的概念，在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群，与一个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之间，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差别。在后者而言，这些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天的人群所能够在一起组成的最好的团结状态，就是一个无中心的、散漫邋遢的“共和国”。在前者而言，那些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的人群在一起则会构建起一个“有坚固根基的城”、一个有良好核心、众志成城的“上帝的国度”。

在我们考察基督教信仰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来注意看一下基督教信仰中一些重要的抽象原则，然后再看其在基督徒们的教导中、以及生命中的应用与体现。

当我们讨论基督福音中的抽象原则、及其与人类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会立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而言，我们最缺乏的、最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福音的最根本层面的真理中，社会的存在性与福祉之所需，如何得到了满足？

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需要，取决于构成社会的所有组成分子的需要。社会是

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每一个人都能够单独地站立，面对自我，面对上帝。然而这些个体性的人却生活在一个社会中，通过一个心灵的网络纽带，彼此连结在一起。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通过一些外在的言语行为来彼此影响生活习惯，而且他们在内心的许多观念上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群体的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改变。他们互相影响的程度和力量，取决于社会的团结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一个社会的良好而健康的状态，取决于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自由程度与群体的团结程度之间的平衡。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点是非常难于达到的。即使在理论上，我们也很难判断，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之间的完美平衡点到底应该在哪里。如果个人自由太多，则社会的状态会变得道德堕落、生活散漫邋遢。如果群体团结程度太多，则每一个人在其中的生活可能会非常压抑、束手束脚，人的幸福与创造力也会大大下降。当社会无法达到个人自由与群体团结两方面之间的平衡的时候，社会就往往会陷入周期性的动荡。个人自由散漫现象如果普遍地在社会中发生，社会就会逐渐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堕落状态，并最终导致暴君专制主义的盛行，然后暴君专制又被新一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推翻。这样，社会就会如此周而复始地陷入动乱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主义政府的统治机器是针对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的手术刀。但是，这个手术刀总是在病人的伤口上刻下更深的伤痕，使病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正常的、健康的社会福祉而言，必须同时需要有两个原则得到满足：自由的原则，与团结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建立，部分地取决于政府的官方治理，部分地取决于人民的自由意愿。

一方面，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来说，人们需要自由。自由的意思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一定的范围内采取自由的选择和行动；以及，社会中的每一个由个体组成的社团、群体能够自由地行动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的团结状态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性是社会长久存在、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团结状态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则。社会稳定性的原则独立于、或先于，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原则。

如果没有自由原则，就不可能有人的社会生活，因为人人都成了奴隶，自由思想也更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稳定原则、或团结原则，社会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一个完美的、或相对而言比较健康的社会形态，我们称之为“文明”。这个词本身就蕴涵着这方面的意思。在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应当处事“文明”，享有自由、但要为集体做贡献，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了社会的团结而愿意牺牲自己。

现在我们来思考，基督福音与上述两个根本性社会原则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换句话说，福音向我们启示的社会生活之真正原则是什么？

无疑，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敬拜那位宇宙天地的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永生真神。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的上帝"。"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生命隐藏在他那里"。上帝的圣洁道德律法，要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人类的最好状态、最高理想、最大幸福，就应当是像上帝那样圣洁、公义、恩慈。显然，基督教信仰为上述社会两原则中的稳定性原则提供了重要的真理层面的支撑：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需要一个先于其自由意志之上的、社会成员所共有的道德基础。

有人会就此争辩说："即使社会中的人们不认识上帝、不敬畏上帝，也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会看见我们自己的良心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随从自己的良知，就足以维护社会的基础了"。

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社会"律法"的现实性。不论我们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总之，社会需要这样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治理，而这些律法、或规章

制度总是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意志。这种社会统治的权柄与社会个人自由意志之间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张力，不论两者之间哪一个大，哪一个小。

对于无神论主义者或泛神论主义者而言，这种社会律法的来源是宇宙自然世界，或者基于人性自身的光景。事实上一般而言，无神论主义与泛神论主义【译者注：泛神论主义是指，认为世界本身就是神；这个世界之上并没有那样一位全能的、终极的、有着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的、自有永有的上帝、造物主。因而，在泛神主义者眼中，人在这个宇宙自然世界中，并没有什么终极层面的高贵性；人的自由意志、自我认知并没有什么本质层面的高贵源泉和永存价值】的理论家们，都往往是王权、专制政权的坚决推崇者、坚定拥护者、热烈鼓吹者，因为他们推崇社会的稳定要胜过社会的自由。在他们眼中，个人自由并没有那么珍贵，思想自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甚至，这些个人自由都会被看作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这些都可以为了社会稳定的原因而被裁减、践踏。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人生命的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终极高贵性、尊贵性；在人与自然界宇宙之间的关系上，个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译者注：人的尊严，按着圣经中所述，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尊严与荣耀，因为人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他们的所谓和平与稳定，是压制自由的结果。他们所推崇的统治常常导致社会中属灵状态的荒凉。他们的和平往往是一种扭曲的、徒有其表的外在和平。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无疑，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上来分析，敬拜

全能、全知、公义之上帝的信仰体系，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坚固、最安全的稳定性环境因素。对于个人自由与意志的所划定的界限："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向前逾越"这样的律法，必须是在终极层面意义上来自那位有位格的、能听能看的全能者上帝自己的话语。个人思想与生命就像是大海中匍匐向前的海浪潮水。对这潮水的限制力量，必须是来自天上的力量，来自那位创造和管理宇宙天地万物的上天、独一的真神。

然而一神主义本身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社会在稳定原则与自由原则之间达成平衡。【译者注：一神主义是指，信仰这个世界是由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创造和掌管的。在人类历史中，一神主义的宗教信仰有三个主要宗教形式：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后两者的起源都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经典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否定旧约圣经的主要部分，认为犹太人的祖先篡改了上帝的启示，于是穆罕默德就另起炉灶，另外创建出了伊斯兰教信仰】。这是因为，一神主义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苛刻的管理，以至于达到完全排他主义的程度。比如，伊斯兰教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王权和专制政府的特点。在犹太教的社会中，这种专制倾向不那么严重，因为根据旧约圣经，"耶和华所膏的"人有君王、先知和祭司。君王负责国家政事，先知把上帝的启示向世人传讲，祭司则负责全国百姓与政府人员们的敬拜信仰和仪式。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时代，这三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重合，结果导致百姓担负很重的轭。在地上的国家政权体系中，当君王、祭司、先知三个职事高度重合的时候，社会的统治权力就会很大，而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很大挤压与压制。

而在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一神主义中，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个人完全沦为绝对命运下的被动受体，因为所有人的自由意志都要无条件地完全服从于穆罕默德在国家政权中的统治权力。在伊斯兰教的一神主义下，“一神主义”的概念就成为完全的“真主凌驾世人”。在这样的统治下，每一个个人都是微小的、盲目的、软弱的、罪恶的。真主是至高无上的律法颁布者，是全能的法官。在每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一切都要绝对服从真主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质疑的权力。在这种一神主义统治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外在言语行为上的服从与顺服，看起来是最重要的。人们不应当有，也不需要有任何自由。在这样的一神主义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生活无法在社会的纽带关系中立足。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在政府绝对统治权力之下往往失去了权利与自由的空间，不再有活力和创造力。整个社会变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状态，直到下一次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政府权力与国王被推翻。然后社会进入下一个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周期循环。

有时，上述弊病也成为一些现代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基督教信仰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国家社会也会像伊斯兰教社会那样，变得死气沉沉、没有活力、没有创造力，社会大众就会失去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思想上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与简单的、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中，上帝的启示表明了，上帝与世人的关系不是“上帝凌驾世人”，而是“上帝与人同在”，即，“以马内利”。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使人有

思想、有自由、有意志。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人的自由才有了真正高贵的、终极的、本质性的根基。虽然人是软弱的，虽然人应当谦卑地承认和悔改己罪，虽然人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人的生命本质当中，应当本有自由的属性。正是在这样的、与生命自由息息相关的、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中，上帝才真正是世人的天父，人才真正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在人的心里面作工，不是把人当作无意识的机器，也不是把人当作被压制的奴隶，而是，圣灵净化我们的心灵与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由内而外地、由衷地、忠心地、自由地来到公义圣洁之上帝的面前。福音的奥秘在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与赎罪之祭。在福音中，包含着最令人震惊的事实与真理。保罗把这福音看作是上帝的奇妙大能，看作是基督教信仰最本质、最核心、最深刻的内容。人与上帝是朋友、是同工、是亲人、是至爱。这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的哲理，而是真实的、热忱的、生命的信仰。

这正是福音的奥秘与最迷人、最甜蜜的精髓，正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所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得到自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世人的救恩，是使人得到自由的恩典之约，而不是使人处于被奴役之境地的律法之约。恩典之约使人真正地、衷心地愿意来寻求上帝、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和圣洁的律法典章，因而真正成就了、完全了上帝的律法。这恩典之约使人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有任何优点，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白白地赐下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们每一个愿意相信和接受他救恩之人的罪债被偿清，使我们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和饶恕，因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恩的人是谦卑的，因为我们真心地承认自己本都是该死的罪人。这

样的人是诚实的，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和悔改自己的罪。这样的人是真诚而热忱的，是自由的，因为不再有灵魂之中、罪恶权柄之下的奴役和羁绊。

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应当拥有之自由的价值。这自由是尊贵的，是高尚的，而不是放纵与放荡的代名词。正是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之下，在欧洲古代历史上，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被逐渐废除了，中世纪的农奴制度逐渐消失了，以及在我们当代，美洲境内的奴役制度也这样被最终取消了。

请注意，圣经本身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解放人类奴隶制的“解放神学”，而是指出世人普遍的罪的光景，指出世人对于上帝的背离，以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救恩与大能。人灵魂所处的被奴役光景，真正根源不是外在的奴隶制，而是内在的、人生命处于罪的奴役之中的光景。每一个世人在其生命的本质中都有着倾向于罪的性质。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恩所在。他使我们的生命脱离了罪的辖制和捆绑。我们的真正自由，其核心不是在于外面的、肉体上的自由，而是在于里面的、灵魂之中的、脱离了罪恶捆绑的自由，是脱离了死亡恐惧、有永远生命、天国盼望的自由，是能够过一个圣洁公义之生活的、热忱地爱上帝、完全地归向上帝的自由。

但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福音之中所包含着的这种最根本的关于人生命之真正自由的思想，的确对于社会学中的个人自由具有重大影响和价值意义。这以生命自由为中心实质的教义，这以自由为基础的信仰、思想、行为、规范，是对任何专制政权、暴君统治、强迫压制、寡头政治、强奸民意等等社会暴虐法权机制的本质性的反对。

基督教信仰的这种特点，正是导致世上的那些想要奴役人民的政权讨厌、排斥、压制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比如，TRAJAN以及MARCUS AURELIUS等等专制政权，都极力想要反对和排挤基督教信仰。在基督教历史上，在历世历代中，在各个国家的历史里面，都曾经有许多基督徒殉道者。这些殉道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福音刚刚传到一个国家的时候，或是那里正在经受信仰上的逼迫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殉道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自由而死的殉道者。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谦卑而和平的信仰，为了心中所敬畏的上帝，为了在耶稣基督里所得到的恩典，为了对于上帝的爱，而宁肯丧失性命，也不愿放弃这宝贵的信仰。他们愿意在一切世事上温和地、和平地、恩慈地、勤劳、谨守地生活，愿意在一切世事上遵从在上掌权者，尊重政府权力和法律，遵守社会中的一切法律典章制度。但是在信仰之事上、属灵之事上，他们却绝不愿意在任何属世的权力面前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绝不愿意听从人而不听从上帝。他们知道，有一个属天的、终极的律法赐予者，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立法者；上帝的典章，要远远地高于世上一切的规章制度与法律。

这种既谦卑温和、又坚毅稳定的信仰，不仅仅是历史上那些无数基督徒殉

道者们的信仰，也更是历世历代以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普通平凡而真诚之基督徒的信仰。每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仰都应是如此。这种信仰中包含着一种与世俗中的好勇斗狠的英勇主义完全不同的、谦卑温和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中，有着对于人灵魂自由的高尚本质的追求和尊重。在人的心灵土壤上，在人的信仰之中，只有上帝自己才能亲自来掌权。上帝以道成肉身的、舍命牺牲的、救赎性的爱，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以任何属世的人为我们灵魂之主。

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革命；但至少在名义上，这些革命更多地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为了要真诚地、按着圣经所教导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为了信仰的自由，而不是完全为了属世的政治权利的自由。在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信仰中，如果没有对于个人自由的尊重和重视，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就已经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真理。

所以，我在这里想要提出这个论述的结论和论点，即，基督教信仰是最适合人类社会健康蓬勃发展的宗教信仰，因为它不仅满足了一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团结稳定原则，也满足了这个正常健康社会所需要的个人自由原则。正是因着基督教信仰，社会才能够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因为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可以生机勃勃、充满创造力、勤奋谨守、享有自由和尊严，但却不会滑入道德堕落、无政府主义、刁酸尖滑、彼此猜疑、毫无信任、好勇斗狠的混乱与败坏的深渊。当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渐渐失去基督教信仰、沉迷于饮酒宴乐、骄奢淫逸、彼此争斗不休的时候，就是他们逐渐走

向败坏与崩塌的时候。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在社会团结稳定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两者之间试图进行某种调和，或是给出某种明确的界限和公式。圣经福音书中，当有人来问耶稣基督是否要纳税的时候，耶稣给出了一个在历世历代以来非常著名、人所熟知的回答。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在什么是属世、什么是属天的事情上，划出一个明确的、楚河汉界一般的界限，而就是说："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要归给上帝"。当然，耶稣对那个具体问题的回答意思是说，应当纳税。但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说，在这一点上、在这方面的本质性问题上，耶稣基督的有限度的沉默，以及有限度的澄清，给了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

无疑，在历史上我们常常会看见，基督教的教会、团体、会众要起来，以和平的精神，为社会公义而发声；在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上，常常需要挺身而出、为弱者呼吁、秉公行义、抵挡罪恶，无论这罪恶是来自高举稳定大旗的政府权力、还是来自高举自由主义的社会个人、甚至暴民。然而，无论基督教信仰、福音针对社会具体问题所采取的具体立场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那种具体立场本身，并不是永恒的价值原则，而仅仅是此时此地的、福音之永恒价值与原则的一个具体应用。只有福音原则本身才是永恒的。在福音中，既包括了对于自由主义的强调，也包括了对于集体主义、团结主义的强调。这两者虽然看似矛盾，但却都是重要的、高尚的，因为都是来自上帝的律法："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你们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

更进一步说，究其本质，基督徒们的真正终极的归宿和盼望，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繁荣与富强、或是公义与和平，而是在于天上的永远国度，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盼望，那没有死亡和眼泪、没有痛苦与别离的属天国度，那个与上帝同在的、永远的、真实的家园。所以，无论是贫是富、是显赫还是卑微，基督徒们都能在这个世上和平地、谦卑地、忍耐地度日。基督教信仰不是遁世的信仰，而是积极入世的信仰；基督徒们要在这个世上作光和盐，发光发热，竭尽全力、毕其一生爱上帝、爱世人。然而同时，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以这个世界为归宿、倚靠、终极价值的思想体系。

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中，基督教信仰都会把真正的福祉带给那个社会，并渐渐地也把个人自由和长治久安带到那里。无论是在稳定不动的东方，还是在活泼变化的西方；无论是在早期的、以家庭为单位与核心的、简单社会中，还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纽带所连接的、庞杂社会环境中；基督教都能够把人心灵所饥渴的、渴慕的信仰与精神支柱带给人。并且，因着基督教信仰的广传与普及，社会道德风貌得到大大提高，社会更加稳定和谐，人民同时享有更多丰富美好的自由。

如果，在历史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基督教只强调稳定原则或是自由原则

中的一方，而不强调另外一方，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特定社会形态中，稳定与自由这两个原则因素之间不平衡，一方太大太多、而另一方太小太少。

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现象是，许多国家的社会随着个人主义的解放而导致道德失序、社会混乱。但是，当那些国家的社会从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中经过重整、进入法律秩序状态中的时候，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政权上台，公民自由被一扫而光。当今，在许多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或是许多明确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中，专制极权主义常常被当成针对社会淫乱放荡、混乱、失序、道德败坏的解药。他们的国家社会形态如同钟摆一样，在极权与放荡之间摆来摆去，总是不能停歇、不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在他们的社会中，或是没有自由，或是没有稳定，二者总是不能兼得。

综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益处。从久远的历史层面来说，从漫长的时间见证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只有真正的、以圣经为唯一根基的基督教信仰，才能给人类带来一个这样的社会：——既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自由、充满温馨博爱、同情弱者、鼓励强者、彼此平等、满怀热忱情感的社会；又是稳定繁荣、长治久安、和平安宁、不断奋进地进取的社会。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如此独具特点的基督教信仰，居然成为了千古以来无数哲人志士所苦苦思索的、一直找不到答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极其惊奇诧异的事情。关于人类究竟应当怎样才能彼此和谐相处，历史上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都曾经对此思索不已。许许多多的人都在这方面有汗牛充栋的著述。世上也有许多流派和学院，不断在探讨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或是流于一些象牙塔内的文字游戏、而对真实的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或是导致一些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做出来却尽是假冒为善的虚伪之辈所组成的社会。而基督教从诞生到发展，从卑微的开始到逐渐的增长，看似平淡无奇、和平温柔，却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无数世人的生命，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国家、民族、与文化，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没有什么，比这些历史更加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十字架救恩，我们永生与天国的盼望，等等这些教义，即使是最没有文化的文盲，最简朴的公众也都能够理解。我们如果否认这些教义，就不能理解基督教信仰在人类历史上的奇妙作为，不能理解教会的永存性，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

++

++

++

++

++

++

++

++

++

+++

+++

+++

+++

+++

+++

+++

+++

++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阐述，在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其中重要的两点前提性原则【即，第一，人们必须由衷地有一颗愿意谨守、敬畏、顺服秩序法规法律体系的心灵；第二，人们必须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灵】都与基督教信仰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

以圣经为核心基础的基督教信仰，对我们的教导是：——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就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慈爱恩典、无限智慧的、上天、上帝、造物主。并且，我们应当爱人如己。

人与人之间的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的根基与源泉，是来自于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爱里面，既应当包含着，对于良善、公平、正义、公义的追求和秉持，也应当包含着，对于罪恶的憎恶和离弃。我们的爱的本质，应当是憎恨罪，爱罪人。

哥林多前书13章：

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 1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2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甚么。3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5不作失礼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存不息的。先知的讲道终必过去，方言终必停止，知识终必消失。9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只是一部分；10等那完全的来到，这部分的就要过去了。11我作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

像孩子，想法像孩子，既然长大了，就把孩子的事都丢弃了。12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象主完全知道我一样。13现在常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什么是良善？遵从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良善。

什么是罪恶？悖逆那永生之神、上天、上帝、造物主就是罪恶。

上帝自己是分别良善与罪恶的根基与基准。分别善恶的终极权柄，唯有是属于神。他是道德律法的终极颁布者，更是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谦卑顺服，就也不会在他人的面前诚实、信实【宁肯吃亏也不愿说谎；宁肯吃亏也不愿违反规则与承诺】，也不会在秩序、法律、规则、法规面前由衷地顺服、敬畏、谨守。【许多世人在这个世上之所以暂时表面上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世上法律的惩罚。如果有法律的空子，或是如果人们意识到，违反法律规则、撒谎、占便宜、玩弄规则等等不会受到立刻的、严重的惩罚，——那么，我们就会看见这世上许许多多人的内心真实光景如何；看见他们以欺谎、虚伪度日；看见他们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玩弄秩序，毫无真诚敬畏之心。】

人在内心中，若没有在上帝面前的真诚信仰、倚靠、热忱，就也不会真正地爱人如己。在这个世界上，在一切被造的世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没有罪污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深处，充满着深刻的、本质性的罪性与罪行。我们对于他人的真诚之爱，唯有是建基于我们首先的、对于上帝的爱中。这正如，在一个大家庭中，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有着许多的缺点）之间的爱，首先是建基于他们对父母的爱。只有在我们心里对于上帝的热忱真挚之爱，才使我们有力量去真诚地饶恕别人、接纳别人。

____

在现代的世界，自由贸易是经济的基础与根本支撑。自由贸易的本质是整个人类进行社会化大分工、大生产；在人类社会中间，各样不同的人群各司其职、各专其长、各尽其事，从而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整个社会做出最大的、最高效的贡献。

在各种不同的、五花八门的劳动生产活动中，都往往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熟能生巧；即，如果我们大批量地专门做同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人类）就能够便于发明出极其快捷甚至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模式，从而使得商品的成本变得极低、价格变得非常便宜。例如，今天的大规模汽车生产线工厂，可以平均不到一秒钟就能够生产组装完成一辆汽车，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正是在此。

在过去五百年来，近现代化工业文明，除了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诞生与爆炸性发展以外，其巨大成功的奥秘就是在于，自由贸易所导致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

____

但是，上述的人类整体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大分工模式，必须依赖于良好运行的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否则，从长期而言，所谓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不可能的。

现代经济学中所常常忽视、甚至无视的，就是我们在本章前文中所阐述的重要前提性假设。那就是，在整个自由贸易体制系统内，所涉及到的人们、社会、各个国家，必须应当有着谨守和敬畏秩序规则法律法规体系的心灵，以及，必须应当有着爱人如己的心灵【在这些背后，就是公平、正义、公义、顺服、谦卑、敬畏与敬虔的信仰】。否则，所谓自由贸易，不但不会给人类带来福祉，反而会引发巨大的冲突甚至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和许许多多的直接间接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德国体系与英法体系等等之间因贸易冲突而逐渐激化所导致的深刻结构性矛盾。今天，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随着中国得益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而得到飞跃性发展、但却不愿意遵守许多承诺和世界贸易规则秩序，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导致战争。这种冲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政治经济背景环境，在某些角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源自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它在一百年前开始在俄国付诸实践，并直接导致了世上许多的专政暴政，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甚至数以亿计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因专制统治者人为谬误国家政策而引致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数以百万计人被关进劳改营、集中营、监狱、强迫下放劳动、甚至被直接屠杀等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北朝鲜、以及南美等国家地区，这样的思想仍然还很有市场、很有号召力，仍然得到许多人在内心的真诚信从。

那么，社会主义的错误根源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它这样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在二战以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鼎盛时期，曾经席卷了世界上俄罗斯、中国、东欧各国、越南、北朝鲜、柬埔寨、古巴、南美洲【当然，许多东欧等国家往往都是在苏联的武力逼迫之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内部、包括曾经的东德内部，都有很多真心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们】、等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呢？甚至，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西方高等学校的文科院系中，在西方左派政治势力中，甚至在西方（包括美国）的选举政治中，仍然很有市场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于什么呢？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真理吗？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想的致命性错误是什么？

———————————

有人说，在马克思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之间，有以下两个共同点。

——————————

第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否认、或远离对于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它们都推崇人自身的伟大性、光辉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劳动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在纳粹主义中，日耳曼人民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光辉的。然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上，由于它们所推崇的劳动人民或是日耳曼人民需要一个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代表、反

映者，于是，它们就必然推举出一位伟人，来真实地体现它们的推崇对象。因而，它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都聚焦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以及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日成等领袖独裁人物。在纳粹主义思想体系和政治实践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希特勒这样的领袖独裁人物。

它们所诞生的文化土壤，都与其文化思想氛围中的无神主义影响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德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是德国十九世纪无神主义哲学兴起的直接结果。在十九世纪，当年在德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盛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族优越论思想、无神主义思想；以至于著名哲学家尼采在著作中写道："上帝死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德国主流哲学界，盛行着自然神主义、泛神主义思想【即，否定上帝的位格性，否定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的，否定上帝的自由意志，或是把上帝与世界本身看为同等，或是把上帝看作是无知无觉、没有意志的一种超自然之理、意识流、规律、因果逻辑、等等；或者，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以后就撒手不管了；除了用自然规律管理世界以外，上帝并不干预和涉入这个世界中的事务和自然现象；等等】。这些思潮【也包括德国以外、诸如法国思想界许多学者、英国学术界的一些教授，等等】，终于导致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突然流行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纳粹主义者。

正是因为他们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以及其中万有、创造世人生

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那生命之主，那无限全能、全知、全在、全备，那能听、能看、能言的，那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那圣经中所启示的救赎主；——所以，他们才把心灵的眼目转向地上的被造之人，把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己的生命的倚靠、心灵之锚、心灵的归依。

在世人的心灵中有一个空洞，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然而可叹的是，世人却常常离弃和悖逆那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生命的主，那道德律法的根源与终极颁布者，那对于世人生命之道德价值的终极鉴察者、终极审判者。这正是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充满的、本质性的、普遍性的罪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罗马书1章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作使徒，奉派传　神的福音。2这福音是　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3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4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5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6其中也有你们这蒙耶稣基督所召的人。7我写信给各位住在罗马，为　神所爱，蒙召为圣徒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　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

8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　神，因为你们的信心传遍天下。9我在传扬他儿子福音的事上，用心灵事奉的　神，可以作证我是怎样不断地记念你们，10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也许我可以照着他的旨意，终于能够顺利地到你们那里去。11因为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定；12也使我在你们中间，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大家一同得到安慰。13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好几次预先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为了要在你们中间也得一些果子，像在其他的民族中间一样，可是直到现在还有阻碍。14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是愚笨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15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都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17　神的义就是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本于信而归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18　神的震怒，从天上向所有不虔不义的人显露出来，就是向那些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显露出来。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　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20其实自从创世以来，　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21因为他们虽然知道　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22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却成了愚蠢的。23他们用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形象，取代了永不朽坏的　神的荣耀。

24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作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

身体。25他们用虚谎取代了　神的真理，敬拜事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事奉造物的主。他是永远可称颂的，阿们。26因此，　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原来的性的功能，变成违反自然的功能；27同样地，男人也舍弃了女人原来的性功能，彼此欲火攻心，男人与男人作出可耻的事。他们这样妄为，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28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　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29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30毁谤人的、憎恨　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制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31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32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　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

\-\-\-\-\-\-\-\-\-\-\-\-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伟大劳动人民，还是纳粹主义所推崇的伟大日耳曼人民，都显明了，世人在内心深处的自以为义、自高、自傲。

我们绝不是在这里说，劳动人民就不好，或是日耳曼人民就不好。固然，在劳动人民的身上，在日耳曼人民的身上，从世事的角度而言，有着许多美好的优点、品格、道德素养、聪明、富有才干、智慧、勤劳、等等。但

是，我们必须清醒而谦卑地认识到，从根本的本质层面而言，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人群、任何团体、任何阶级、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是完美至善的，都不可能是没有瑕疵与本质性罪污的；也都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心灵的偶像，供世人来顶礼膜拜。恰恰相反，在人类中间，我们彼此之间在本质上应当是平等的，应当彼此是弟兄姐妹，应当一同地把我们的心灵归向那公义圣洁、慈爱恩典的天父，应当单单地仰望和敬拜事奉他。

凡自高的，必降卑

马太福音23章

1那时，耶稣对群众和他的门徒说：2“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座位上，3所以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谨守，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会说而不去作。4他们把重担捆起来，压在人的肩头上，但自己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5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要作给人看：他们把经文的匣子做大了，衣服的繸子做长了；6他们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7又喜欢人在市中心向他们问安，称呼他们‘拉比’。8然而你们不要被人称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都是弟兄。9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父。10你们也不要被人称为师傅，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傅，就是基督。11你们中间最大的，必作你们的仆人。12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

____

第二个共同点是，关于人类社会事务层面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之事，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都认为，人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可调和的、不可原谅的矛盾；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一方彻底地消灭另一方，来得到解决。

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阶级斗争的矛盾。在纳粹主义中，这种深刻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种族斗争的矛盾。因而，马克思主义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联合起来，进行本质性的、暴力性的社会政治革命，彻底地、暴力性地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正如毛泽东先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画画绣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而纳粹主义的种族灭绝行动以及专制暴政就更加令人震惊、举世皆知、臭名昭著，我们就不在此赘言。

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在世上其它思想体系、伦理系统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等）中，我们也常会见到，——这种推崇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消灭敌人、打倒敌人的思想文化。这种思想文化，就像是在中国共产党员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说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

样残酷无情。”

上述思想文化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征，即，在世上的许多道德伦理体系或是宗教信仰体系中，往往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的。

所谓“因行为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是通过他的外在的、言语行为等等来决定的。

所谓“因信称义”是指，这样的思想体系认为，——人的道德价值，从终极性、根本性而言，不是因他外在的言语行为而决定的，而是因他在心灵与灵魂深处、对于上帝之救赎恩典的信靠，而决定的。

因行为称义与因信称义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在于，人究竟是自以为义，还是以上帝（以及他的救赎恩典）为义。如果人自以为义，即，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自己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力、道德、品格，而得到正义，甚至成为正义的化身，——那么，在这样人的内心深

处，就必然是骄傲自高的。当人信奉因行为称义的思想文化、伦理体系的时候，人就会在行为上互相攀比、比较，并进而俾倪他人、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互相争斗不息。

相比之下，因信称义的思想，不是以人自己的义为中心，而是恰恰相反，从谦卑承认和悔改人自己的罪性为基点，寻求和倚靠上帝的救赎恩典，完完全全地信靠上帝的救赎、饶恕与赦免。

罗马书3章

9那又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控诉过，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10正如经上所说：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12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13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他们嘴里有虺蛇的毒，

14满口是咒骂和恶毒；

15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

16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

17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

18他们的眼中也不怕　神。”

19然而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使全世界的人都伏在　神的审判之下。20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　神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

21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　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22就是　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地临到所有信的人。23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24但他们却因着　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25　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　神的义；因为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27这样，有甚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甚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说的。28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29难道　神只是犹太人的　神吗？不也是外族人的神吗？是的，他也是外族人的　神。30　神既然只有一位，他就以信为准则称受割礼的为义，也要以信为准则称没有受割礼的为义。31这样说来，我们以信废掉了律法吗？绝对不是，倒是巩固了律法。

____

请注意，因信称义的教义思想体系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就不重要。恰恰相反，我们外在的言语行为，正是我们内在真实信心的写照与表现。然而从根本上、终极角度说，我们的义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更不是由我们的外在行为所决定和体现【否则人就在心中自以为义，自高自傲，俾倪、藐视他人，甚至憎恨他人、争斗不息】。我们的义，唯有是建基于上帝自己所赐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之人的永生恩典。

雅各书2章

14我的弟兄们，人若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甚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15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少食，16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甚么用处呢？17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

18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19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鬼魔也信，却是战兢。20愚昧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

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吗？21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22你看，他的信心与行为是一致的，信心就因着行为得到完全了；23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也被称为　神的朋友。24可见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仅是因着信心。25照样，妓女喇合接待了探子，又从另一条路把他们送走，不也是因行为称义吗？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____

正是由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的信仰，我们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义，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完完全全地在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地是出于他的圣洁无罪，出于他为我们而死、承担了我们所本应承受的罪债与刑罚、所成就的赦罪之恩典。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对我们的饶恕，所以，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得到赦免，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和好。因此，我们在任何世人面前，就无以自夸，更无法自以为义。因而，我们才深刻地知道，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应当以饶恕的心，去对待他人。

马太福音18章

21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22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23因此，天国好象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帐，24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六千万银币的人来。25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26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27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的仆人，就抓住他，扼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29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30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31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32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33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象我怜悯你一样吗？'34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35如果你们各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

____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两点共同点的比较中，我们能够看见，其根本性的、本质性的症结就是在于，人在心灵与灵魂深处，背离、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上帝、造物主，背离了那道德法则的终极基准与颁布者、那道德律法的终极审判者；因而，人在内心中自以为义；从而，人在面对世上他人的时候，————（1）或是以之为自己心灵生命的归依【即，对于领袖、对于权力的无限个人崇拜】，从而不可

避免地导致专制独裁；（2）或是以之为自己的敌人、死敌，甚至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彻底消灭对方，而心中没有本质性的谦卑、饶恕与恩慈的态度。

———————————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应当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消极遁世。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倚靠那天地之主、我们生命救主的人，应当以热忱而勤勉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世上努力地生活、去做好一切当作之事，而不应当慵懒懈怠、更不应当唯唯诺诺、胆小懦弱。我们应当努力地秉公行义，寻求正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应当憎恨罪，但是要爱罪人。我们所争战的对象，不是世人，而是罪。在这个世上，我们所爱的对象，不应当是罪，而是罪人。

以弗所书6章

10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大力，在他里面刚强。11要穿戴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12因为我们的争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13所以要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作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14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15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16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17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　神的道，18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事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

马太福音5章

43"你们听过有这样的吩咐：'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44可是我告诉你们，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45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如果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47如果你们单问候你们的弟兄，有甚么特别呢？教外人不也是这样作吗？48所以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

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与精髓，及其与资本主义之

间的比较。

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建基于无神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以及人类共同享有和均分财富的乌托邦社会思想。【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地上的财富和国度为世人生命与心灵的终极归依；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讨论、阐述上帝之国与地上之国之间的异同与关系。】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子集，所强调的是：——社会经济财产分配原则，倾向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分配、劫富济贫等等特征。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并非是完全彻底错误的。其所重视的关于社会财产尽量平均分配、避免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等等，是有其道理与价值的。事实上，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就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其强调了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福利政策等。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中，直到今天，一直有着强烈的造福于大众的主旨和内涵，这并非是受到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是受到自古以来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巨大推动和深刻影响。

公道地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避免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内容，并非是错误的。

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体制的致命错误在于，（1）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否定人的生命独特价值与人的生命自由；（2）思想控制与言论控制；（3）专制主义思想，邪恶与欺骗；（4）社会经济发展上的乌托邦主义，以及国家经济道路的荒谬性；（5）无神主义内核；否定公平竞争；平均主义、大锅饭；丑恶的社会管理机制与控制；思想层面、理念层面的空洞、荒芜、荒谬、谎言；统治者的自私、腐败、欺谎。

____

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制中，通过经济资本的置配、自由流动、分配管理、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等等机制，促进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与高效化，从而为人类社会整体创造更大的物质性财富。

相对而言，社会主义是一个更大一些范畴的政治经济词汇，因为它不仅包含了经济运作思想与原则，也包含了政治思想理念、社会思想理念体系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由于其对于集体主义的强调、对于个体主义的践踏和压制，因此，其政治思想理念与社会思想体系往往是专制独裁的，因而往往是邪恶、欺骗的；并且，它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们的思想，消灭个体的生命与思想自由，试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国家机器上的某一个无知无觉的零件与螺丝钉。所以，社会主义往往与专制主义有着强烈的姻亲关系。

资本主义则往往具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尽管两者之间并不一定严格划等号。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比较狭义的术语，仅仅包含经济运作范畴的含义，而不像社会主义这个术语那样，既包含了经济、又包含了政治性意涵。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由于其对于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市场经济公开竞争的鼓励，因此，资本主义往往最终会强烈地倾向于民主主义制度，倾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开化、自由化、民主化、去中心化、平民化。

然而请注意，正如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本身一样，资本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具

有道德好坏、善恶的意涵。

正如本书所开宗明义地指出的，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人民。譬如，在圣经创世纪中所记述的所多玛、俄摩拉，虽然看似是由主流民意所驱动的社会结构，但是，他们所行的事情却是恶事；他们所作的，在耶和华永生之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民主制度是圣洁自由之民所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换言之，如果人民、百姓不是自由而圣洁的，如果人民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寻求真相、渴望真理，没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心灵，那么，在这样的人民中，所谓民主制度并不能长期地存在；在这样的人民社会中，即使短暂地出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也会是昙花一现、很快会陷入无政府主义混乱喧嚣状态、并很快会因此被专制主义野心家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革命、篡权、推翻。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混乱喧嚣的历史。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鼓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制度，与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一样，严格地说，从长远、长期的稳定状态而言【而不是从短暂的、短期不稳定的状态来看】，也应当是建基于自由圣洁之民所组成的社会体系之上。

这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人民大多数成员在社会事务上、公共世事上都没有正直之心，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若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利用、欺压、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贫富严重不均。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不能长久而稳定地运行；饥饿之民就会常常起来造反、打家劫舍，或是像马克思主义所煽动的那样，——政治集团利用所谓无产阶级来推翻资产阶级。

____

这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虽然是夸张的、偏颇的、别有用心的；但是，却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____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马克思本人的不道德的私生活，也不说马克思理论体

系中所推崇的狂风暴雨般暴力革命中的不义、不公、欺谎、罪恶、甚至邪恶，及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所引致的数以亿计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与苦难。而是，我们在这里指出，仅仅作为一个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暴力征服与谎言欺骗的形式达到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意义上的影响性】了人类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思想家，马克思【以及他所代表的、启发的无数后世思想家、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中的致命性漏洞和谬误。

的确，马克思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但是，他却无视、甚至故意忽视了，从十七世纪以来，一直到他所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巨大益处和福祉。

马克思的思想既是浅薄的【因为它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缺陷与弊病的真正病根与医治之法】，也是偏颇的【因为它忽视、无视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巨大益处；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也并不深刻理解，这种巨大益处是来自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其本质原因和机理究竟是在于什么。换言之，它并不真正理解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公平竞争体制的本质精髓与益处所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性谬误，也正是它邪恶所在之处，就是在于，它完

全地误解了、谬解了、错待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在于什么。

马克思主义思想，就像是一个庸医，看见战场上一个战士的胳膊上中了箭伤，箭杆露在皮肤外面，箭头插在肉里面；于是，这个庸医拿出剪刀，剪断箭杆，并用一个锤子在那受伤的胳膊上狠狠地砸下去，让箭头在肌肉里面陷得更深；然后，庸医自豪地大声宣布说，这个人的箭伤被治好了，因为露在皮肤外面的箭杆已经看不见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地看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却彻底地扭曲了、玷污了、糟蹋了文明的真正价值，彻底地毁坏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个体生命价值本身是没有终极意义的；人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唯有能够在集体中体现、实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专制主义、国家集权主义、独裁主义、甚至纳粹主义异曲同工的本质原因】。

马克思主义决绝地宣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它公然地、厚颜无耻地宣告，无神主义思想是伟大的、光辉的。它欺谎地、诡诈地对世人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救赎主、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然而在政治现实主张中，它却剥夺人的自由与生命的高贵价值，把人置于思想奴役、身体奴役、经济奴役的铁链之下。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在这里说，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好的。事实上，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重要优秀道德品质之一。但是，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基于公平、正义、平等、公义、良善的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公义圣洁的道德法则基础之上，必须建基于我们对于那无限全能、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天、上帝、造物主的信仰的基础之上。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上天、造物主、上帝的时候，人就会迷失在世事的喧嚣之中，就会看不清人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于何处，看不见人的心灵与灵魂的隽永价值和意义。

当人在内心中离弃了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的永生之神的时候，世人良心中的道德法则也就失去了隽永的价值和意义，真理就成为了强权的丫鬟，政权就成为了枪杆子的机器，国家就在本质上与黑社会无异。在死亡面前，任何以属世之事为根基和归依的道德说教，都是苍白的，甚至是滑稽的。

只有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与无限智慧，看见他的公义圣洁与恩典慈爱，我们才能够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什么。

我们都不仅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且是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在人的里面，有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的能力，有心灵和灵魂，有思想、智慧、意识、理性、情感、爱、等等的美好能力。

正是因此，人的生命与自由才是高贵的。

人的生命与自由是珍贵的，因为那本是能够指向永远的、圣洁属神的生命。

在这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上，在世人生命的里面，都普遍性地、本质性地遍满了罪。在每一个世人的心中，都是背离神、不愿意寻求公义的；都是自以为义的，是自高而自傲的；都是在为了属世之利而活着，以属世之事为自己生命与心灵的归依。但是，那内心谦卑、看见己罪、承认己罪、并真诚愿意悔改己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

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马太福音5章

1耶稣看见群众，就上了山；他坐下之后，门徒来到他跟前，2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3“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4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5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6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悯。

8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　神。

9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

10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11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12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

===============

在一个国家社会中，如果人们都是敬虔而真诚地信靠上帝，倚靠他的救赎与恩典，饥渴慕义，勤勉而公义圣洁地生活与工作，——那么，这样的国家中就根本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眼中所看见的那些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世事中，常常看见好坏参杂的因素、泥沙俱下的局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也是如此。

一方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信仰在思想与文化上，对于西方各个国家产生的深刻影响，早已经在许许多多历史记忆与文化土壤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整个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包含着深刻广泛的博爱之心，包含着对于社会全体大众、乃至全人类的巨大福祉。任何看不见这一点、或是故意无视、忽视、蔑视、否认这一点的——人、思想、主义，就像是马克思主义一样，——不但是浅薄的、虚伪的、欺谎的、自私的，而且是罪恶的、邪恶的。

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利益与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福祉，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贸易经济、乃至现代民主主义制度，并非是终极的真理，并非是我们心灵的归依和倚靠。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近现代科学技术、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或是自由贸易经济，当被应用于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敬虔、没有敬畏的社会大众文化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们所带来的，就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灾难，甚至是巨大的灾祸。

在满清末年、民国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曾经喊出“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的口号。他们以为，用民主和科学，就能拯救中国脱离愚昧、落后、黑暗、败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局面。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民主与科学本身，并不能向我们指明，人生命与自由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它们本身，也不能带给我们敬虔的信仰、良善的道德、恩慈的心灵、公义的信念。固然，现代民主主义的诞生，正如现代科

学的起源一样【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有着深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们本身却不能代替：——那真正的、诚实的、真挚热忱的，对于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上帝的敬拜与信仰。

====================

单从经济制度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是好的，但它们必须应当被置于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之下。

这样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体系，应当是保障和重视人的生命与自由的。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应当是鼓励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的。但同时，它不仅是应当“行公义”的，而且更应当是“好怜悯”的；应当是注重避免社会贫富严重分化，避免贫穷百姓得不到照顾。

____

当年，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以及十七世纪，那些伟大的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正是认识到了科学【即他们当时所说的自然哲学，或第二哲学】的内在局限性【即，科学本身，应当是人以谦卑的心态对于自然规律与现象本身的、基于客观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应当是：——（1）人凭着自己的骄傲自义之心所进行的主观臆想、（2）或是牵强附会的关于人生意义与自然现象之间关系的生搬硬套、生拉硬扯、人为地进行瞎联系，（3）或是占卜性质、“万物有灵”性质的臆测；——就像是占星术、炼金术、星座性格属相、或是亚里斯多德的主观臆想之宇宙论，或是中国的风水、算卦等等。————因为，关于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在于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之中，是在于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之救赎恩典之中，是在于上帝所放置在世人良知之中的圣洁公义的道德律法之中】，从而深刻地批驳了罗马天主教廷所秉持的、与圣经本身没有关系的、古希腊罗马的亚里斯多德与托勒密等人的主观臆想、玄学主义等等试图在自然世界中赋予臆测性、占卜性、万物有灵涵义【就像占星术、炼金术、星座属相、或是中国的风水与算卦那样】之系列思想的根深蒂固的谬误，进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诞生和爆炸性发展。【详情请见《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书。】

简言之，现代科学之开启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于那些现代科学开启者们、基督徒思想家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内在局限性，才纠正了从前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根本性错误与方向性偏差，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与方法论的起源、诞生与成功发展。这个重要原因，正是来自于、建基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中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信仰观。正是由于基督教信仰的巨大而深刻广泛的影响，才使许许多多的世人认识

到，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应当到哪里去寻求；同时，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研究自然世界，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更重要的是，不应当到自然世界中去寻找什么。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才导致了现代科学体系的诞生、成功与发展。

与此类似地，现代民主主义制度，以及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由贸易制度，它们的诞生、成功与发展，也是如此。它们的成功原因，正是在于它们首先认识到了它们自己的局限之处的本质在于什么。

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成功，正是因为它在制度体系化设计中，不是假设人是无罪的、无辜的，而是恰恰相反，它清醒地看到，在世人的心中，普遍地存在着罪性。因而，它在体系设计与规划中，处处尽量实现和体现权力分散化、制衡化、去中心化的原则，同时尽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尽量保障政府行政部门的有效性、有力性。

请注意，这并不与我们在本书的主旨中所反复申明的内容——“民主是圣洁

自由之民在这个世界上进行自我管理的政治组织形式”——相矛盾。

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人心中普遍的罪性，并从而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权力制衡的规则化设计。

另一方面，一个成功的民主主义制度，必须建基于人民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体系中，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被罪所羁绊，但是，在人民大多数成员心中，必须愿意寻求真理和公义，必须愿意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必须有饥渴慕义的心，有真诚与敬畏的情感。

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公平竞争制度，也是同样如此。

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的心态基础之上。

一方面，它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世人心中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所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采取规则秩序体系与制衡机制框架】。另一方面，它们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和意义【所以，尊重和推崇人思想与生命的珍贵价值和自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没有看到上述两个方面的精髓本质，因而望文生义地、彻底地误解了、扭曲了、歪曲了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

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思想体系的致命性症结根源，就是在于，它们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出发点，与现代民主主义政治、现代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竞争经济制度的出发点，是完全相反的。在上述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现代民主等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南辕北辙。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假设人性是无罪的、无辜的，劳动人民是伟大光荣的；它们看见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的不完美，于是提出，彻底砸烂那些制度，重新建立一种建基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所谓完美制度；然而，在这样的所谓完美制度中，却既不尊重人的生命与自由的高贵价值意义，也不明白，人

生命与自由的真正珍贵意义，究竟来自何处。

上文所述，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之中，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它们应当在公平正义的规则秩序体系的约束与制衡框架之下（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罪性）；另一方面，它们应当建基于人民普遍诚实、愿意寻求公义的心态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生命与自由所本来应有的高贵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都与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系，是直接地来自于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

这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应当认识到，在世人生命与心灵深处所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的罪；也应当认识到，人生命与心灵本所应有的高贵价值和隽永意义。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是创造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都是上

帝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因此，人的生命在这个宇宙天地之中，是最高贵的、最奇妙的。

圣经也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人的生命本所应有的圣洁与高贵价值意义，所以，我们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世人常常说谎、占便宜、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没有信仰与敬虔人生态度、等等，从本质而言，是多么地污秽鄙陋、罪恶不堪。

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良心之中都无可置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的罪污、欺谎、不义，所以我们才珍视那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救赎恩典、圣洁信仰，更在内心深处为罪而忧伤痛悔、饥渴慕义，真心真意地愿意悔改己罪、完全归向我们的生命之主、救赎之主，得着那真正圣洁没有瑕疵的、能够直到永远的属神生命。

========================

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晰地指出，现代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自由贸易制度、自由平等竞争的经济制度，正如现代科学的起源与意义一样，——它们之所以诞生，正是由于直接地受到了以圣经为核心的基督教信仰文化土壤的深刻影响而导致的。它们是来自于上帝所启示的、那真实的、指出世人生命之罪、并赐下救赎恩典的信仰。

然而，我们却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是我们思想的偶像，而是恰恰相反，应当深刻地、清醒地认识到，它们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和隽永的意义。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的心灵所期盼、归依和倚靠的终极真理。它们绝不应当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的生命、心灵与灵魂所期盼、归依、倚靠的对象，应当是那创造宇宙天地、创造世人生命之主，就是那全能、全知、全在、全备的、至善至美的、公义圣洁、恩典慈爱的上帝。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在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良善与公义。他是我们的永生之神，是那属天国度的君王，是把饶恕与赦罪恩典赐给我们的伟大救赎者。他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那位伟大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永生真神。圣经是他的完全而全备的话语、启示和旨意。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谦卑诚实地看见己罪、承认己罪、悔改己罪，真挚地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人，是有福的，因

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是属乎天国的百姓，必将进入那无限幸福美好的永生国度之中。

===

自由贸易与社会分工

自由贸易经济的本质，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协作、共同生产、共同致富。自由贸易经济的成功正是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化的大分工、大生产。在今天的经济产业链中，有数以亿计的、甚至更多的不同产品、零件、食品、用具、硬件、软件、服务。在整个人类社会中，一般性而言，每一个人都勤勉地工作，并专注于各自擅长的事项，从而在国家社会整体上，乃至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国际合作中间，人们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精细分工、深度协作。

这种大规模的、大分工的社会机制所必需的，正是公平、正义、平等、公义的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固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秩序、法律、规则体系框架是完美的，但是，一般性而言，就主流性质来说，整个国家社会、乃至整

个国际秩序，应当是基本上公平正义的，是互助互利的；一般性而言，人们应当基本上彼此诚信、信任、以善相待；人们应当以宽容良善的心、而不是仇恨的心态看待彼此；——否则，从长期性、根本性来说，自由贸易制度就不会真的成功。

===

财富的定义

在人类经济体制中，如果人们在心底以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为心灵的终极性归依，那么，人们就往往会为自己积聚财物、金钱、房屋等等；而不愿意走出去与人交换商品、或是消费商品、促进商品经济流通。从而，繁荣发达的自由贸易经济就往往不会发生。如果人们的心灵沉浸于积聚此世的物质性财富与黄金等等，如果人们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中自满自足、裹足不前，以之为自己的心灵的归依、生命的归宿，而不思进取，那么，除非迫不得已，人们就往往不会愿意主动地去与他人进行分工合作，更不会想到去与异国他乡的人进行大规模产业协作。

因而，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现代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划时代贡献，正是让世人

看到，财富的定义，不是在于有形的、物质性的东西，而是在于生产物质商品的能力、生产率、知识技巧。换言之，财富不仅是一件关乎身体的事情，更是一件关乎心灵的事情。

正如本书上文所言，现代经济制度本身并不应当被我们看作是终极真理，因为它是有所局限的。如果说，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它对人类社会有益，那么，它之所以有益，其益处正是因为它来自于基督教信仰的文化土壤，并深刻地受到了基督教信仰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某些正面性的、积极性的影响。正是因此，现代经济制度虽然是讲述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但是，从一般性、整体性、主流性而言，它迄今为止并没有把西方世界拖入自私自利的彻底混战局面之中，而是相反，通过国家社会的大规模协作，使数量巨大的世人脱离贫困之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人们忘记了上述这一点的时候，当人们离弃了敬虔真挚的信仰的时候，当人们心中的罪愈来愈泛滥，而不是谦卑真诚地悔改己罪、寻求公义、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自由贸易等等现代经济制度，就会显明其深刻内在局限性，显明人心中之罪的丑恶，甚至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更深的冲突、混战与灾祸。

===============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不是那地上的财宝、那些必朽坏的东西；而是我们生命、心灵、灵魂中的那属天的品质，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与幸福，是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悦纳与恩赐。

++
++
++
++
++
++
++
++
+++

【引述圣经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

马太福音6章

19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因为地上有虫蛀，有锈侵蚀，也有贼挖洞

来偷。20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那里没有虫蛀锈蚀，也没有贼挖洞来偷。21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22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健全，全身就都明亮；23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全身就都黑暗。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这是多么的黑暗！24一个人不能服事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事 神，又服事金钱。

【马太亨利圣经注释】

19-24节

除了虚伪之外，另一个常常在人的灵魂中得逞的撒旦试探、诡计是——贪恋世界。没有什么其它事情，比“虚伪”和“贪恋世界”这两件事情，更能够经常地掩藏在表面敬虔信仰的面纱之下。所以，基督在上文中警告了我们关于信仰虚伪之人的事情以后，在这里继续警告我们，不可贪恋世界。我们必须不可像那些信仰虚伪之人一样；他们的根本性错误，其实就是：——他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是他们的奖赏；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世人的称赞，就是属世的利益和好处。在我们选择财富、目标、主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的这两个罪——虚伪的信仰，以及贪恋世界的心。

I。我们应当以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一个人，总会在生命中、在心底深处，把一些东西当作是他的财富、他的份、他的倚靠。他会尽力地去积累这些财富，并把这些财富积累当作是为未来所需而进行的预备。传道书2章3节："我 心 里 察 究 ， 如 何 用 酒 使 我 肉 体 舒 畅 ， 我 心 却 仍 以 智 慧 引 导 我 。 又 如 何 持 住 愚 昧 ， 等 我 看 明 世 人 ， 在 天 下 一 生 当 行 何 事 为 美"。在我们的灵魂中，总会把一些事情当作是最好的事情；总会把那些事情当作是我们的喜乐、满足和倚靠。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话，并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财富，而是要指教我们，应当选择什么为我们真正的财富。

1.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把那些可见的、暂时的东西，当作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要把那些东西，当作是我们幸福的所在。不要为你们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基督的门徒们已经抛弃所有、来跟随他；他们应当一直持守着这样的心态。财宝，是那些丰富的、在我们眼中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必须不能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就是说，——（1）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最有用处的东西：——我们不能称这些东西为"荣耀"——就像拉班的儿子们那样。而是，我们要把它们看成是没有荣耀的东西。那真正的荣耀，远远超乎它们之上。（2）我们必须不能贪图这些东西的丰富，不能无止境地、没完没了地搜刮这些东西、加添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把那些东西当成是心里的财宝，就会这样贪婪地去做。（3）我们必须不能信靠、倚靠这些东西，把它们当成是为我们的未来遮风挡雨、给我们带来安慰与安全感的东西。我们

必须不能对黄金说：——你是我的盼望，是我的心系所在。（4）我们必须不能在这些东西中得到满足；必须不能把它们当成是我们的渴望与祈盼。我们应当安于简朴，但不以这个世界为我们的分。这些东西不能是我们的慰藉（路加福音6章24节），不能是我们的喜笑和饱足（路加福音6章25节）。我们真正需要积攒的，不是这个世界中的繁华与财富，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东西。在我们的面前，面临着抉择；我们努力积攒的东西，就是我们看为至宝的东西。我们应当智慧地作出选择；因为无论你为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东西，你自己也就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知道、明白、思想，在我们的里面是何等大，我们的生命是何等长久，那么，我们就会看见，在地上积攒财宝是一件多么愚妄的事情。

2.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不应当在地上积攒财宝：——因为这些都是将要丢失和朽坏的东西。（1）这些地上的财宝，会从里面败坏。世上的财宝总是这样，被虫子咬，从里面锈坏。那些我们以为储藏得最稳妥的属世财宝，最后都会变得破败不堪。路加福音12章16、17节："就 用 比 喻 对 他 们 说 ， 有 一 个 财 主 ， 田 产 丰 盛 。自 己 心 里 思 想 说 ， 我 的 出 产 没 有 地 方 收 藏 ， 怎 么 办 呢 ？" 传道书5章10-12节："贪 爱 银 子 的 ， 不 因 得 银 子 知 足 。 贪 爱 丰 富 的 ， 也 不 因 得 利 益 知 足 。 这 也 是 虚 空 。货 物 增 添 ， 吃 的 人 也 增 添 。 物 主 得 什 么 益 处 呢 ？ 不 过 眼 看 而 已 。劳 碌 的 人 ， 不 拘 吃 多 吃 少 ， 睡 得 香 甜 。 富 足 人 的 丰 满 ， 却 不 容 他 睡 觉 。" 雅各书5章2、3节："你 们 的 财 物 坏 了 ， 衣 服 也 被 虫 子 咬 了 。你 们 的 金 银 都 长 了 锈 。 那 锈 要 证 明 你 们 的 不 是 ， 又 要 吃 你 们 的 肉 ， 如 同 火 烧 。 你 们 在 这 末 世 ， 只 知 积 攒 钱 财"。注意——世上的财

物，在它们之中，有一个朽坏与败坏的律——它们总是逐渐枯萎凋残。（2）这地上的财宝，也会面临暴力的抢夺而失去。贼进来，会把财宝偷走、抢走。强盗、小偷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积攒财宝的房屋和家庭；在这世上的任何属世的财宝之中，没有什么是真正能够安全稳妥的。我不应当把我的信心和倚靠放在属世的财宝上，即使它们看起来华丽炫目；不论这世上的财宝、虚荣、繁华，似乎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属世的暂时好处，我都应当轻看这一切——因为它们都是必将朽坏、轻易失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那些属世的、轻易会失去的、随时被抢夺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财宝，那么，我们就真是太愚妄了。

3.我们应当把那些永恒的、属天的、不可见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真正财宝，当成是我们最美好的东西，当成是我们的幸福、喜乐与荣耀。你们要在天上积攒财宝。（1）是的，在天上的的确确有财宝，是比地上的财宝更真实、更美好、更久远的。我们在天上的拥有，才是我们真正的财宝、富足、荣耀、与喜乐。我们的财宝，在神的右手中；神使我们成为圣洁与完美，也使我们的财宝成为圣洁与完美。（2）只有真正智慧的人，才知道应当在天上积攒财宝；勤勉地为天上的财宝而努力地劳作；我们应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生的确据，并把我们的幸福完全地倚靠在他的身上，仰望他的名；用圣洁的心，轻看这世上的一切——因为，这世上的一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基督美好的救恩相比。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在天上有我们永远的幸福和盼望；并且，以那里的一切为我们的满足；不以这世上的任何事物为我们的满足和慰藉。如果我们是以那天上的东西为我们的财宝，并且勤勉地为我们自己积攒那天上的财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相信他会安全稳妥地保守着我们的财宝。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渴望、情感、努力、勤勉，都应当是以那里为目标。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钱

财所缠累；那些东西只会欺骗我们、压垮我们；而是应当积攒那真正稳妥的财富。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每一个真诚信从基督之人，在天上都有丰富的财宝；这是关乎我们的未来的永久归宿。（3）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我们在天上的财宝，是安全的。只有我们天上的财宝才是安全的。在那里，没有虫子咬；财宝不会朽坏；我们不会被欺诈；也没有人来偷盗或是抢夺。这是那天上的幸福，是超越时间的限制的；是不能朽坏的基业。

4.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因此，我们对财宝的抉择，必须是正确而智慧的。我们的心意，生命的意义，都是取决于此的——或是属世的，或是属灵的；或是属地的，或是属天的。心总是跟随着财宝，正如向日葵总是跟随着太阳。财宝，是我们的价值和眼目的归宿，是我们的恋慕和情感的归宿（歌罗西书3章2节），是我们的渴盼与追求的归宿，是我们的目的与意图的方向，是我们的心所属的地方。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关切和顾虑也在哪里——是我们急切恳求、期望、相信、喜悦、朝思暮想的；是我们心里牵挂、割舍不下、得着慰藉、专注凝思、常常挂念的事情。箴言18章10、11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便得安稳。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诗篇119篇111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 箴言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我们的心，应当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财宝，必须是在神那里；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归向他。

这里所教导的关于财宝的事情，是与前面的警告教诲紧密相连的。我们的信仰，必须是真正的、真诚的；必须是寻求真神的，而不是寻求人的赞誉以及属世的好处。我们的财宝，就是施舍奉献、祷告、禁食，以及这些事情给我们所带来的赏赐。如果我们做奉献、祷告、禁食这些事情，仅仅是为了人的赞誉和称许，那么，我们就是在积攒地上的财宝，因为我们只看重这个世界中的利益与好处。这样做的人是愚妄的，因为，我们所贪图的别人的赞誉，就像是那些地上的财宝，很快就会朽坏，被虫子咬，（传道书10章1节），被别人偷走、夺去。诋毁和谤渎就是像小偷强盗一样，偷走我们为自己积攒的财宝——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名誉地位。若我们把心放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的努力就终将是徒劳的。虚伪的人，在天上没有任何财宝（以赛亚书58章3节："他 们 说 ， 我 们 禁 食 ， 你 为 何 不 看 见 呢 ？ 我 们 刻 苦 己 心 ， 你 为 何 不 理 会 呢 ？ 看 哪 ， 你 们 禁 食 的 日 子 ， 仍 求 利 益 ， 勒 逼 人 为 你 们 作 苦 工 "）；当他们的灵魂被收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资财能够带走，没有任何价值能够存到永远。（约伯记27章8节："不 敬 虔 的 人 虽 然 得 利 ， 神 夺 取 其 命 的 时 候 ， 还 有 什 么 指 望 呢 ？"） 但是，如果我们以真诚而正直的心，来奉献、祷告、禁食，并仰望神、渴盼他的悦纳，那么，我们就是在天上积攒财宝；在神那里，有记念册记录我们的一切（玛拉基书3章16节）；而且，将要有我们的赏赐。当我们来到死亡与坟墓的另外一面的时候，我们就必会得到安慰。虚伪之人的分，是在这个世界上（耶利米书17章13节）；然而属神的信实百姓，他们的名要记录在天上（路加福音10章20节）。神对我们的悦纳，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这财宝是不会朽坏、不会被偷抢的。我们的财宝如果是积攒在神那里，我们的心如果是系在神的身上，那么，还有什么其它地方能更好呢？我们必将在神那里永远站立。

II。在我们的信仰中，必须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这里有两种人的眼睛，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22、23节）。眼睛是身体的灯——因为眼睛寻找、发现对象，并引领着身体的行动。如果没有身体的灯，那么，外面世界的光就对我们没什么用处。箴言15章30节：眼 有 光 使 心 喜 乐 。 好 信 息 使 骨 滋 润 。

1.你 的 眼 睛 若 了 亮 ， 全 身 就 光 明 。如果我们的眼目看重的，是良善之事，那么，我们的心就趋向于那些事情，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督里有完全的光、确据和真诚；我们就会有良善的行为，如同光一样照在人前；我们的信仰在天父的面前，就是纯洁、没有玷污的。但是，如果心里面是罪恶、贪婪、苦毒、嫉妒、怨恨——这些东西常被描述为罪恶的眼目（马太福音20章15节）（马可福音7章22节）（箴言7章22节）——那么，我们的身体和生命就会是黑暗而昏花不明的；我们的言语行为中就会充满罪恶。以赛亚书32章6-8节："因 为 愚 顽 人 ， 必 说 愚 顽 话 ， 心 里 想 作 罪 孽 ， 惯 行 亵 渎 的 事 ， 说 错 谬 的 话 ， 攻 击 耶 和 华 ， 使 饥 饿 的 人 ， 无 食 可 吃 ， 使 口 渴 的 人 ， 无 水 可 喝 。吝 啬 人 所 用 的 法 子 是 恶 的 。 他 图 谋 恶 计 ， 用 谎 言 毁 灭 谦 卑 人 。 穷 乏 人 讲 公 理 的 时 候 ， 他 也 是 这 样 行 。高 明 人 却 谋 高 明 事 ， 在 高 明 事 上 ， 也 必 永 存"。　　如果我们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本应该引领我们的那些良知、情感完全败坏了、失丧了，那么，我们的生命该是多么黑暗而可怕！

2.我们的眼睛，对应的也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明白——我们的认知、判断、引导，等等。如果我们的眼睛了亮，如果我们有真诚而正确的判断，如果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尤其是能够辩明，我们真正的财宝应该是在哪里——那么，我们的情感、行动就会得到正确的引领；我们就会有完全的、恩典的、安慰的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败坏的、被世俗所羁绊的，那么，我们的世界观就会是错误的、昏花不明的；我们的心与生命就会充满了黑暗；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诗篇82篇5节：“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人的灵本应是为主燃亮的蜡烛；但是，生命如果昏花了，将是多么可怕。 以赛亚书5章20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3.我们的眼目，也对应了我们人生的目的与目标。我们用眼睛来为自己设定当前目标、寻找前进方向；并专注地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眼目，引领着我们在信仰中所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追求的，总是我们眼睛所瞩目的什么东西或是事情。如果我们的眼睛是单纯而明亮的，那么，我们就能诚实地设定正确的目标，并正确地向着那个目标努力————我们会纯洁地、单单地仰望神的荣耀，寻求神的名、神的恩惠，在一切事情上都单单地倚靠他。这样，我们的眼目就是纯洁的。保罗说，我活着，是为基督而活。这样，我们的整个身体就是在完全的光中；我们所有的言语行为就会充满了恩典，讨神的喜悦，也令我们自己得到安慰。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是邪恶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单单注目于神的荣耀，我们也不会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会看重人的称许与掌声————甚至，即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表现得想要荣耀神、寻求基督之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

处，却也仍然是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和属世利益。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会是败坏的、不安稳的；我们的根基就摇曳不定。在我们的心里，就会充满了迷乱和罪恶的心思意念。如果你里面的光昏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地大呢。在你的生命中，会有根本性的错误；你所作的一切，都会被这根本性的错误毁掉。目标，决定了行动。在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事，就是确定正确的目标——哥林多后书4章18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信仰虚伪之人，就像是风筝，虽然飞了上去，但是却被地上牵着，随时要落到地面。真诚的基督徒，就像是美丽而自由的云雀，在天空中飞翔得越来越高，把地上的事情放在脑后。

III。我们必须要小心警惕虚伪之罪、以及贪恋世界之罪；我们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主（24节）。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服事两个主的人，眼目不是单纯的。一个信仰真诚的人，会像诗篇123篇1、2节所讲述的那样——"坐在天上的主阿，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严厉而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虚伪之人的欺谎。他们以为，可以在神与世界之间骑墙——既有地上的财宝，也有天上的财宝；既讨人的喜欢，又讨神的喜欢。这些虚伪之人说：为什么不呢？一石两鸟总是好的。他们期望，他们的信仰既可以给他们带来属世的利益，又给他们带来天国的利益。正如那个伪装的母亲，愿意把孩子分成两半；或是，像那个撒玛利亚女子，在偶像与真神之间踌躇。但是，基督说，不，这样绝对不行。提摩太前书6章5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1.这里，有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根本性的原则：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假如一个仆人有两个主人，那么，当这两个主人彼此一致的时候，仆人会高高兴兴地跟随着他们；但是，当这两个主人彼此分开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仆人到底是属于谁的。他不可能同时爱两个主人、遵从两个主人、忠诚于两个主人。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就是真实而实际的局面。

2.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代表的是财利等一切属世的利益。腓立比书3章7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这个世界中，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生命的骄傲，等等，都是玛门。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就是肚腹；这就是他们服事的对象（腓立比书3章19节）。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玛门则是安逸、睡眠、运动、消遣（箴言6章9节）。有的人把世上的财富当作玛门（雅各书4章13节）；有的人把荣誉和进阶当作玛门；有的人把别人的赞扬和掌声当作是玛门，就像法利赛人那样。总之，自我、感官、世俗、等等，就是这个世界的玛门。我们不能同时又事奉这些，又事奉神。否则的话，世界的利益一定会与神相冲突、相争竞。基督没有说，我们必须不要，或是不应该事奉神和玛门。而是，基督说，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事奉这两个主；我们不可能两者都爱。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雅各书4章4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淫乱的人原文作淫妇）岂不知与世

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们不可能两者都遵从、都服事、都信靠、都事奉。因为他们二者是彼此矛盾的。神说：“把你的心给我”。玛门说：“不，把你的心给我”。神说：“你要满足于你现在已有的东西”。玛门说：“你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抓取。钱，钱，你要不择手段地去获取财富”。神说：“不要欺谎，不要欺诈，不要说谎言。在你所说所作的一切事情中，都要诚实”。玛门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什么利益，那么，连你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欺骗”。神说：“要有慈善、慷慨的心”。玛门说：“你要抓紧自己的东西，不要给别人”。神说：“不要为各样事情而忧虑”。玛门说：“你要为每一件事情忧虑”。神说：“要谨守主日、安息日”。玛门说：“你要利用每一天来为自己赚取利益”。在神与玛门之间，是有着本质性矛盾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两个主都事奉。让我们不要在神与巴力之间骑墙，而是要作出选择；你要单单地遵从神，并事奉他。

++

++

++

++

++

++

++

++

++

==

经济贸易与民主社会

在自由贸易经济体系中，往往需要的是自由、开放、平等、公平竞争的政治经济环境；这样，世上的人们才不会被人为的、逼迫性的政治权力所羁绊，而是各自发挥主动积极性，把自己所擅长的生产劳动、工作技能、服务技能做到最好。因此，自由贸易经济体制常常是与民主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相辅相成的。

==

信仰，政治与经济

如本书前文所反复重申指明的，在一个公平、公正、平等、公义的政治经济体系背后，——对于那创造宇宙天地与世人生命之主的上帝的敬虔信

仰，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上文所引用的圣经经文和马太亨利圣经注释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处于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中，但是，我们的心灵的真正归依，应当是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属世之利。我们所真正服事的对象，应当是神，而不是玛门。我们所应当事奉的，不应当是自己的财物，而应当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真正的财宝，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在那永远的天上。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地爱主我们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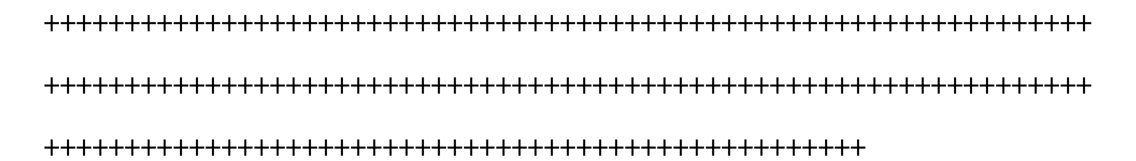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他主义、恩慈、人与人之间爱的根基

让我们继续反思和讲述，在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中，张学良的思想背景以及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正如本书上文所述，张学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与1930年代的很多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抱着一定程度的好感【或至少不讨厌中国共产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思想似乎更加具有怜悯精神，更加体恤劳苦大众。

但是，无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惨痛的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思想给中国所带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怜悯、恩慈，而是暴风骤雨一般的暴戾、革命、杀戮、饥饿、不公、不义、痛苦、贫穷、欺压、腐败、谎言、专制、铁拳、甚至生灵涂炭。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面前，我们应当深刻地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更应当因此而深刻地认识到，所谓"利他主义"、"恩慈"、"人与人之间爱的根基"，究竟应当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爱的根基，首先应当在于，世人与那位永生之神的和好，在于人对于那位伟大天地之主的敬畏、遵从、敬拜、热爱。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当我们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真诚地承认和悔改己罪，寻求上帝的救赎，在基督的救恩之中得到公义与平安，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长久平安、友爱、和平。

【引述 圣经 马太福音22章 律法的总纲】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使撒都该人无话可说，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家，试探耶稣说：

“老师，律法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

他回答：“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　神。

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

全部律法和先知书，都以这两条诫命作为根据。”

。。。。

正义、公义、恩典、恩慈

【圣经 诗篇 57篇】

诗篇.

57.

大卫的金诗，交给诗班长，调用“休要毁坏”，是大卫躲在山洞里逃避扫罗时作的。 神啊，求你恩待我！求你恩待我！因为我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

膀的荫下，直到灾害过去。

我要向至高的 神呼求，就是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 神呼求。

神从天上施恩拯救我，斥责那践踏我的人；（细拉） 神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实。

我躺卧在狮子中间，就是在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中间；他们的牙齿是枪和箭，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网罗，使我低头屈服；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进坑中。（细拉）

神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我要歌唱，我要颂赞。

我的灵（“灵”或译：“荣耀”或“肝”；与 16:9，30:12，108:1同）啊！你要醒过来。琴和瑟啊！你们都要醒过来。我也要唤醒黎明。

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万族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伟大，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云霄。

神啊！愿你被尊崇，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

【圣经 诗篇 97篇】

诗篇.

97.

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都欢喜。

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正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火走在他的前面，烧尽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照亮世界，大地看见了就战栗。

在耶和华面前，就是在全地的主面前，群山都像蜡一般融化。

诸天传扬他的公义，万民得见他的荣耀。

愿所有事奉雕刻的偶像的，以虚无的偶像为夸口的，都蒙羞；众神哪！你们都要拜他。

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各城（“各城”原文作“女子”）也都快乐。

耶和华啊！因为你是全地的至高者；你被尊崇，远超过众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要恨恶罪恶；耶和华保护圣民的性命，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有亮光照耀（“照耀”有古抄本作“散播”）义人，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

义人哪！你们要靠耶和华欢喜，要称赞他的圣名。

。。。。

信仰、佛教、基督教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政府软禁长达数十年，直到老耄之年才被释放、重得自由。在被监禁的生涯中，张学良虽然衣食无忧，但却如笼中雀鸟、插翅难飞。在此期间，张学良先是学习明史，然后又潜心佛学，但最终皈依基督教信仰，成为一名敬虔真挚的基督徒。虽然，张学良或许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千秋罪人，但是，那无限公义恩典之神，是鉴察人内心的神；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在张学良晚年的时候，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临到他的心灵；他成为一个在神眼中蒙恩的人。

虽然，张学良所发动的西安事变，彻底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使之逃脱了灭顶之灾的命运，并因而使得十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窃取、篡夺了中国统治政权、开始了奴役亿万中国人民思想灵魂的七十年统治、直到今天；但是，显然，这些恶果并非张学良所发动西安事变之时的初衷。事实上，在1936年，在喧嚣混乱的中国，可以说无人能够预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在短短十三年后就将要彻底地摧毁中华民国统治政权、并开始全面地奴役中国人民。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时的初衷，仅仅是在于，他迫切地想要促使全中国早日开始全面抗战；仅仅是由于，他厌倦了中国政坛上自从1911年以后长达数十年的权力倾轧、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甚至兵戎相见。

张学良的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正如西安事变本身，正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最大的悲剧。这绝非仅仅是张学良个人一生的悲剧，也绝非仅仅是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的悲剧【西安事变十三年后，中华民国就彻底败于中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之下】；而是，——这更加显明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是中国文化土壤体系的悲剧，是中国现代民主主义制度道路的悲剧，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历史文明进程的悲剧。

但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当我们追溯过去180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反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当政历史的时候，若我们的内心是谦卑、诚实的，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那敬虔真挚的信仰、那真诚寻求天父上帝恩典、倚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信仰，那对于神的信靠，——对于世事而言，对于世上的政治文明制度来说，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根基而言，——是何等地必需。

。。。。

好心、诚实、事与愿违、张学良的一生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着相对而言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理念以及宪政体系。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下，无论是在政府内部高层，还是在民间社会，都处处充满了腐败、私利、喧嚣、不公、不义、等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绝非仅仅是由于欺骗、谎言、假象、或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巧合、因缘际会等偶然因素所导致；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多方面因素的历史必然性。

在1949年以前，在中华民国政府内，在国家社会中，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都有着很多看似“好心”、“诚实”的人们，想要凭着一己之力为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某些贡献。但是，遗憾的是，这样的努力，不但往往是事与愿违，而且常常会被野心家、阴谋家、罪恶之人、专制独裁暴政之人所利用。当人们离弃那敬神畏天的信仰之后，当人们在内心深处远离那宇宙天地造物之主、生命之主的时候，当人们在内心深处离开良知、谦卑与道德法则、而想要凭着功利主义、凭着自己的血气去做各样事情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事情中，就往往会充满了遗憾、缺失与痛苦。这样的遗憾、“事与愿违”本身，就正显明了一个文化信仰体系本身的深刻固有缺失与错谬。

【引述 圣经 箴言 “邦国有罪，君王就多更换”】

箴言.

28.

恶人虽然没有人追赶，仍然逃跑；义人却像狮子，放胆无惧。

国家因有过犯，领袖就经常更换；依赖聪明知识俱备的人，国家才可以长存。

穷人欺压贫寒人，就像暴雨冲没粮食。

离弃律法的，称赞恶人；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

坏人不知公正是什么，寻求耶和华的却完全明白。

行为完全的穷人，胜过行事狡诈的财主。

谨守训诲的，是聪明的人；与贪食的人作伴的，却使父亲蒙羞。

凡是借着高息厚利增加自己财富的，就是为那恩待穷人的人积蓄。

转身不听训诲的，他的祷告也是可厌恶的。

诱惑正直人走上邪路的，必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完全人却必承受福气。

财主自以为有智慧，聪明的穷人却能看透他。

义人得胜的时候，有极大的荣耀；恶人兴起的时候，人就躲避。

遮掩自己过犯的，必不亨通；承认并离弃过犯的，必蒙怜悯。

常存戒惧之心的，这人就为有福；心里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残暴的统治者辖制贫民，就像吼叫的狮子，又像饥饿觅食的熊。

昏庸的君主必多行强暴，憎恶不义之财的，必享长寿。

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逃跑至死，人不可帮助他。

行为完全的，必蒙拯救；行事狡诈的，必立刻跌倒。

耕种自己田地的，必有充足粮食；追求虚幻的，必饱受穷乏之苦。

忠实的人必有大福；急于发财的，不免受罚。

看人的情面是不对的；但有人为了一点食物，竟然犯法。

吝啬的人急切求财，却不知穷乏快要临到。

责备人的，终必得人喜悦，胜过那用舌头谄媚人的。

偷窃自己父母财物，并说："这不是罪过"的，这人是与强盗一伙。

贪心的人，必引起纷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

自恃聪明的，是愚昧人；凭着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

赒济穷人的，必不致缺乏；闭眼不理他们的，必多受咒诅。

恶人兴起的时候，人就躲避；恶人灭亡的时候，义人就增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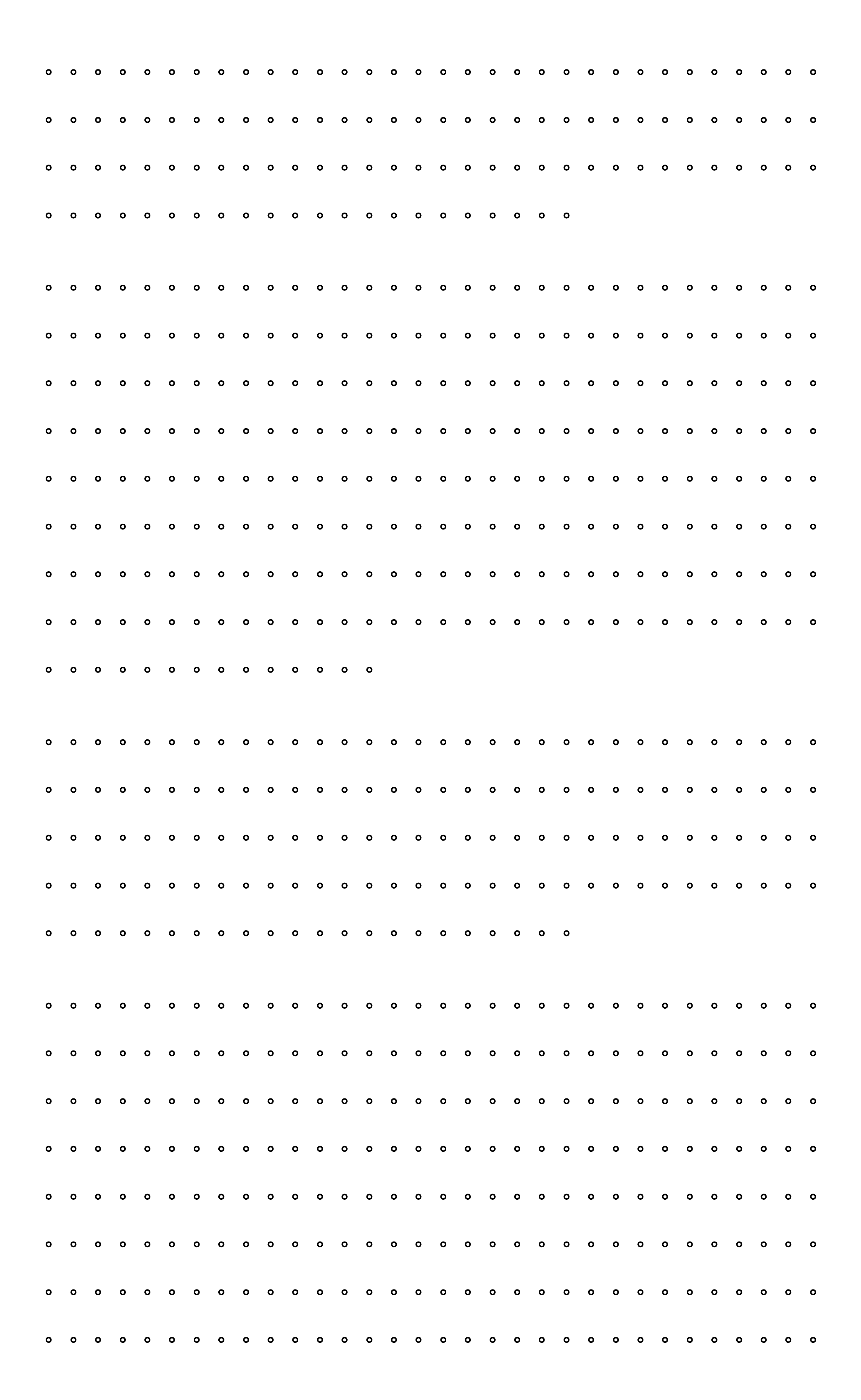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成败论英雄、历史作用、历史价值、历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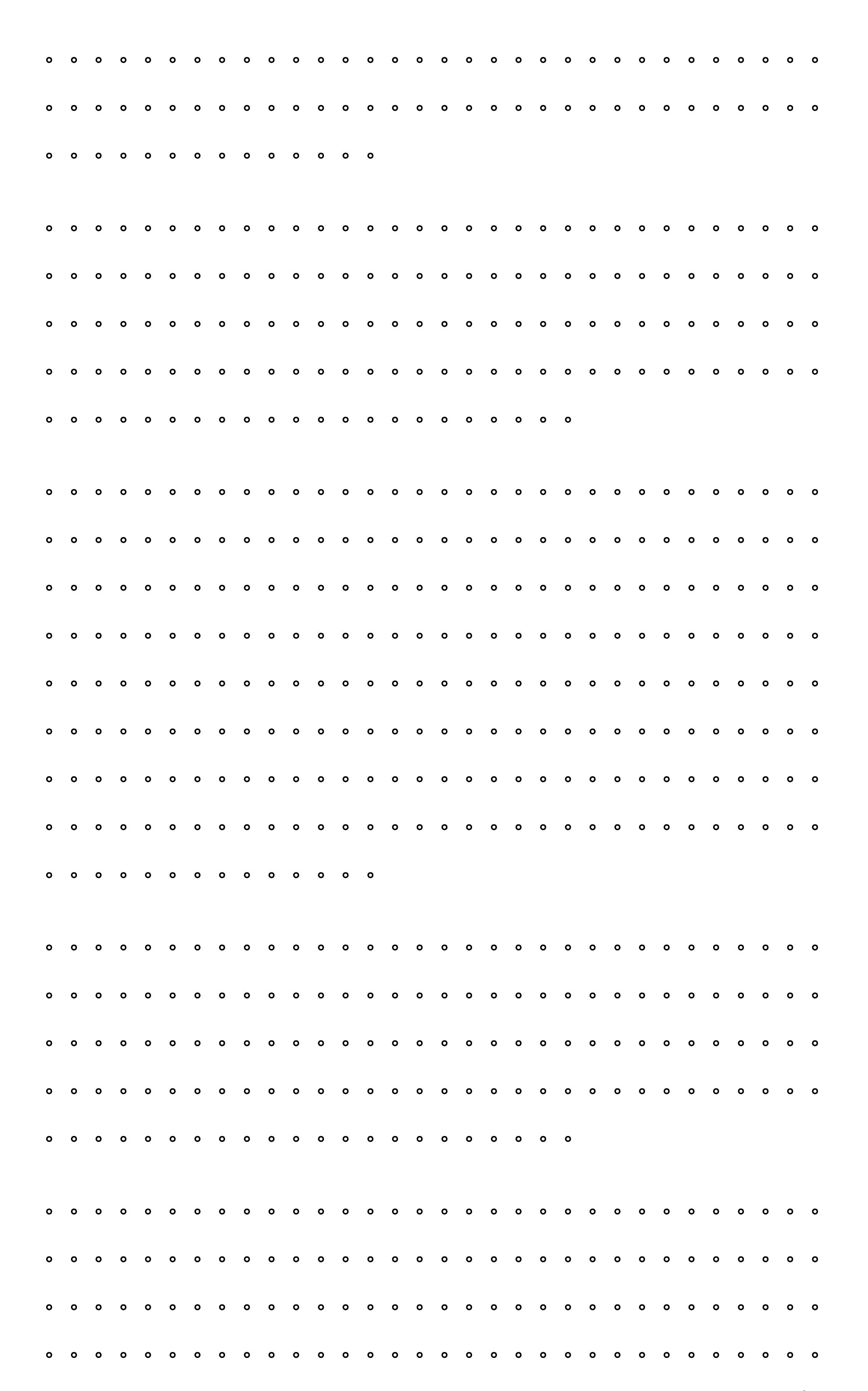
西安事变，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轨迹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分叉点。从世俗政治而言，它扭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民主主义制度的道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专制暴政、进而使得中国人的思想与心灵承受了数千年来历史中所未曾有过如此广泛深刻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系统化的钳制、欺骗与奴役。但是，在西安事变的历史作用与历史意义中，有着更为深沉的机理、教训与功课，值得我们痛定思痛、深刻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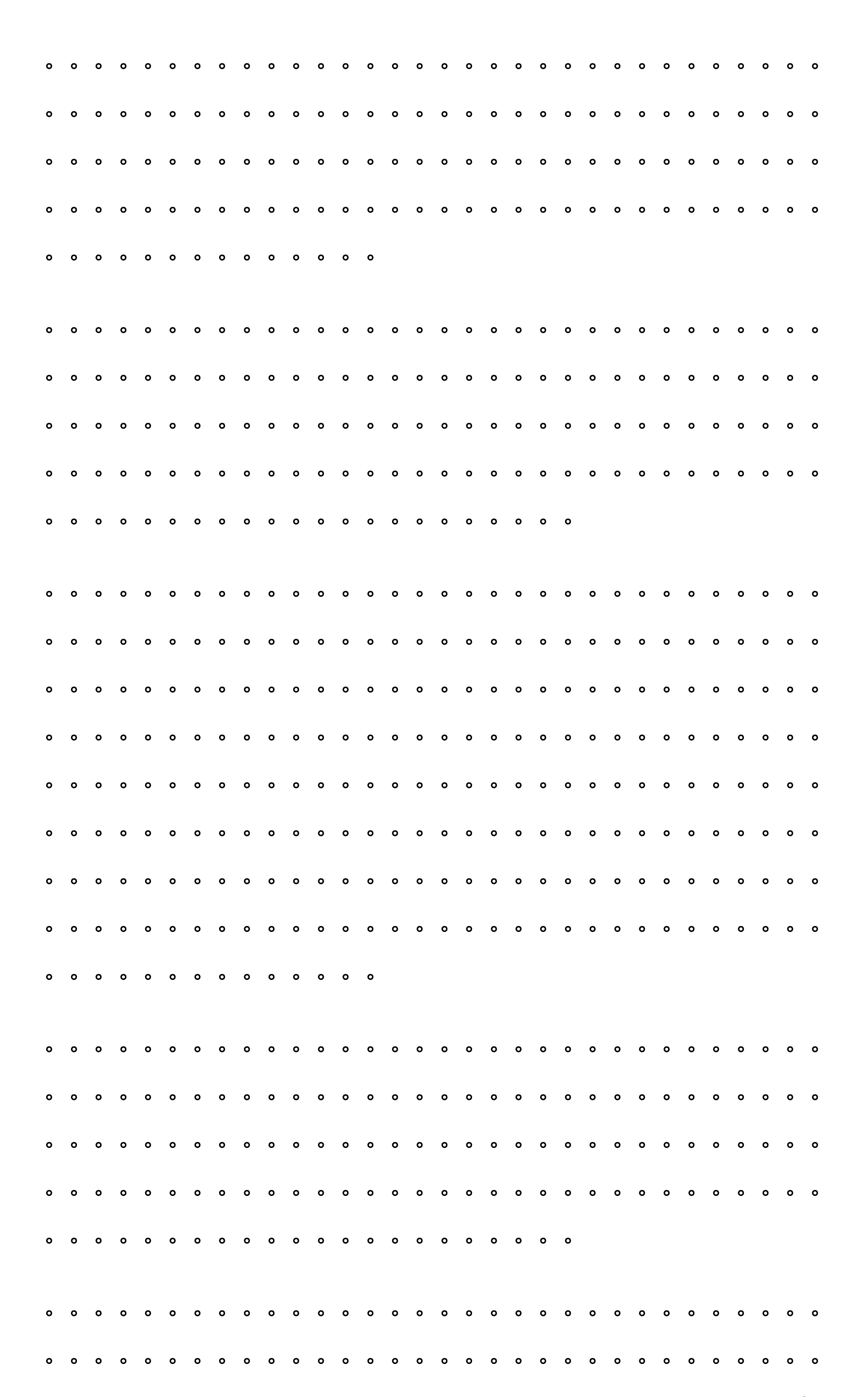
今天，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抚今追昔、回首和追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时候，愿我们不是像传统文化中的那种〝以成败论英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理念所显明的那样；——而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张学良一样，谦卑而诚挚地承认己罪、悔改己罪，寻求和倚靠那无限大能、公义、恩典之神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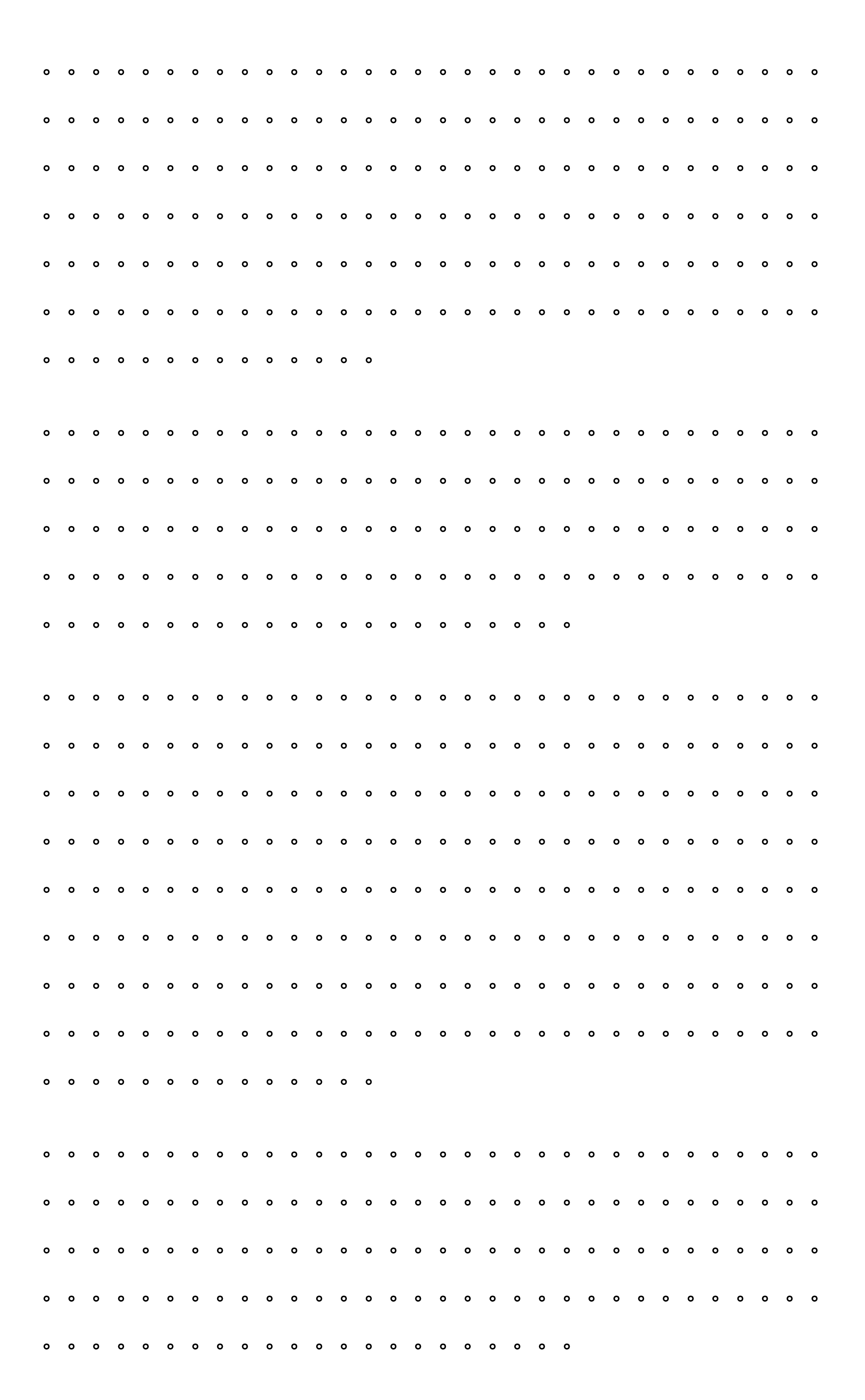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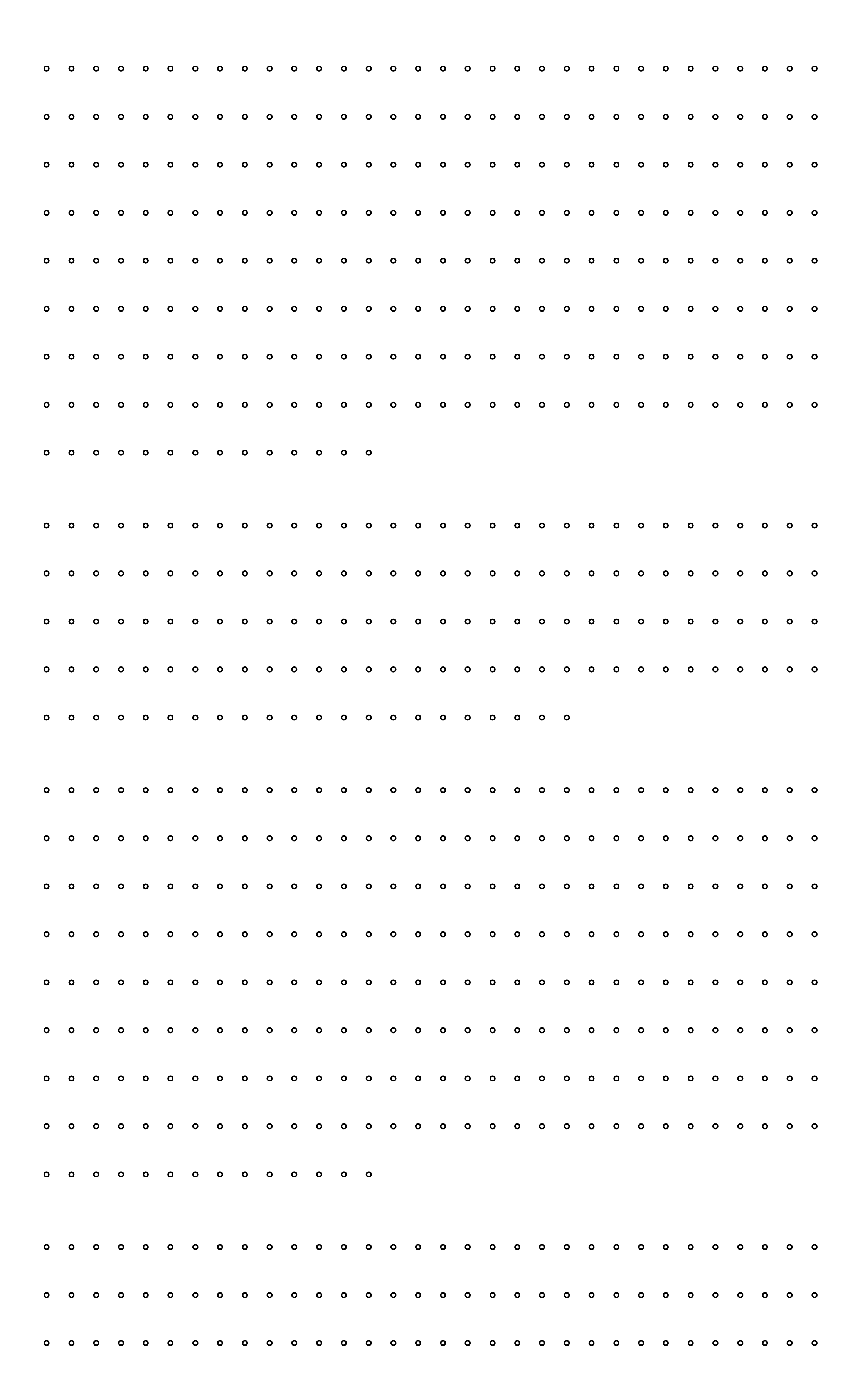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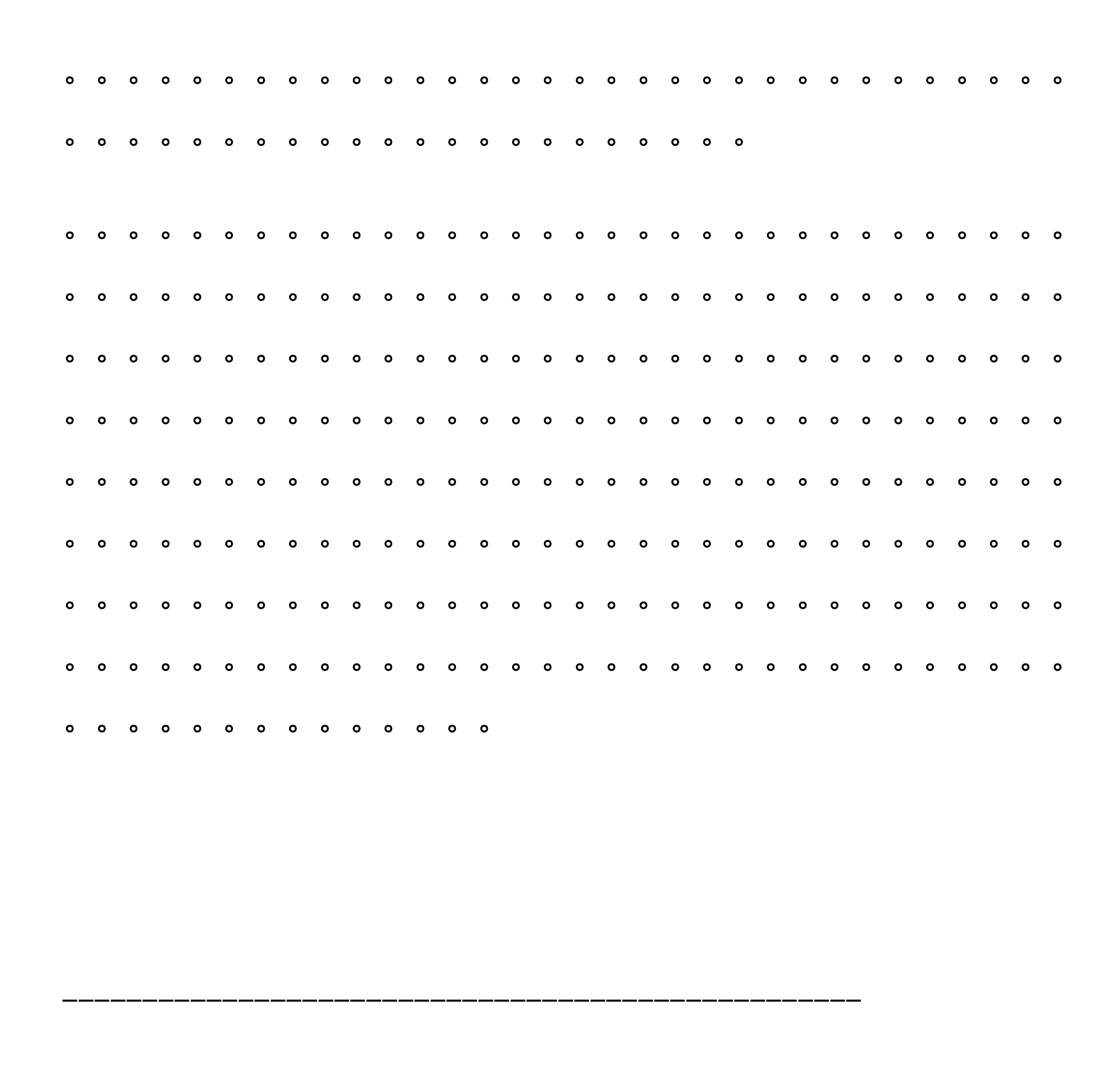












——

孙中山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4%BF%84%E5%AE%B9%E5%85%B1

“联俄容共”是1927年吴稚晖率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将其称为联俄联共），这是孙中山晚年推动的为了引入苏联政治训练、军事及财务的外援，以协助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政策。

而由于当时中国国民党军事力量不足以反抗当时北洋政府，两次目的为保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在两次挫折后，认为必须建造自己的军队，才能统一全国。

在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孙中山援助的情况下，新成立的苏俄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过中国国民党进行共产革命。1922年8月，越飞到北京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

背景

自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后，到1925年孙去世，在孙领导下，胡汉民重在内部策划，汪精卫重在对外联络，蒋介石重在军事任务，三人大致分工合作。从1925年到1936年胡去世，汪蒋合、胡蒋合各两次，胡汪有分无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

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

孙中山对苏联之态度

1923年1月26日，孙和苏联特使越飞发表联合声明。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后，两人发表“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越宣言），开始国民党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的合作关系。孙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最大与最迫切问题，乃在完成全国家统一，与获得完全国家独立。苏俄表示，要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签订之所有不平等条约，外蒙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不能与中国分离。在孙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孙中山根据马克思理论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才日益密切。

经过

1923年，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合作，将大本营迁回广州，对抗北洋政府。列强多不支持孙，孙仅获得苏联支持以因应情势。孙在改组中国国民党同时，实行“联俄容共”。苏俄给予孙大量武器和财政援助，并派出军事及政治顾问鲍罗廷帮助孙建军北伐。隔年，黄埔陆军军校成立。在苏联的影响下，孙中山力排众议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史称“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将其称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方面日后单方宣称孙中山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泽东提出的新三

民主义或苏联人所说三大政策），而这与中国国民党人对“容共”政策理解并不一样：中国国民党人认为，孙允许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是真，但其至始至终只有一个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无所谓新旧。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方针。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国共产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中国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中国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亲共亲苏势力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

从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第一次汪蒋合为时仅半年。1925年10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传部长职务，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常务会议通过，并请毛泽东即日到部任事。10月7日，毛泽东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会议讨论宣传计划和编纂事宜；决定先组织专人对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中外文报刊和工农商学各界“知识之发达次第程序”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作出宣传、编纂计划；会议还决定请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地，以后凡散发各种传单和出版各种报刊有关党义者，均要先交宣传部审查。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3次会议；会议决定对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通告各党员，指出该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

央鉴定”，今后“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调戴季陶来广州工作之提议。10月16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14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指定毛泽东、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编纂党史章程，提请中执委审定。10月20日，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直接筹备召开之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毛泽东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黎樾廷、李谷珍3人组成大会宣言起草委员会，负责宣言之起草工作。10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会，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份，向参加大会之千人发表演说。

1925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同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会议推定毛泽东起草中央通告，将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广州召集四中全会之决议以及此项决议延缓执行之经过详情，告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提出之《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反奉战争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一幕”，而“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恶凶的帝国主义”；大纲提出，在宣传中要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其政治派别的阴谋，以人民为主体，团结各方人物进行反奉战争；大纲认为，人民对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大纲要求各级党部宣传中国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之四项主张，尽快准备真正是人民代表参加的国民会

议；12月3日，毛泽东以代理宣传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奉战争宣传之通告，要求对大纲进行猛力之宣传。11月，毛泽东以宣传部名义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建议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之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将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传部负责管理。12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7次会议，就湖南政治研究会呈请开办短期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理事问题，作出决定：指派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泽东为该讲习班理事。12月，毛泽东写信给中共韶山支部，并送农民协会简章，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之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中共韶山支部根据毛泽东之建议，秘密成立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次年春公开，会员达11,700余人；北伐军经过湘潭时，韶山农民做很多支援军队之工作。

1926年2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汪精卫提议，批准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会议决定继续开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范围扩大，面向全国，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研究农民运动之理论与实施计划之指导”；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农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林伯渠（主席）、陈公博、毛泽东、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萧楚女、阮啸仙、罗绮园。2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报：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代理。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本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讲授农民问题。

结果

孙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发展迅速，控制中国国民党诸多重要职务，引起中国国民党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宁汉分裂。在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派遣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运动。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

武汉亲共派首领汪精卫在偶然获得共产国际关于在颠覆中国政府的策略文件后，也开始和平分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广州、南昌等地组织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进入农村地区发展，推动反国民党政府与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国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到此暂停。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4%B8%89%E6%B0%91%E4%B8%BB%E7%BE%A9

新三民主义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将孙文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之前的作区分而提出的概念。蒋中正等中国国民党高层则曾明确反对将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种。

在苏俄特使鲍罗廷“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基础上的再诠释，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称：“孙中山于1924年1月的广州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新时期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认为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重要依据。蒋中正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则驳斥中共将三民主义划分为新旧之举。

中国国民党认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并非出自孙文之手，这些都只是苏联、中国共产党片面的自我诠释，不符史实。

历史背景

当时孙文的革命活动未能得到类似过往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又刚发生陈炯明事变，急需外界支持。同时俄罗斯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后，在国际上遭到孤立，新生的苏联政府正寻找外交突破口。在中国，吴佩孚、张作霖、陈炯明等军阀又拒绝与苏联合作，失去了其他军阀的苏联就找到

孙文，提出合作协议，苏联提出孙文需接受中国共产党，孙文出于自身考虑，加上觉得可以控制局面，就同意此原则。

孙文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奉令结合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定为三大政策。1927年3月武汉三中全会中，鲍罗廷与中共发动倒蒋，以“提高党权，权力集中于党”为由，在蒋中正北伐的途中剥夺蒋主席职务，降其为普通委员。

毛泽东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内容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1940年2月15日，该演讲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成《新民主主义论》。文中称：“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要反共。不要农工政策，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毛泽东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中国革命时期的领导势力必将由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移交到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手里。1940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共才是革命的正统。

民族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所突出的是“反清”的大汉族主义，矛头指向满族与满清王朝对汉族的统治；新三民主义则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

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书籍的说法

在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书籍多以“联俄、容共、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作为定论。如廖盖隆：“1924年，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广州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订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现国共两党及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

胡绳：“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

何干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就是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

郝梦笔、段浩然：“国民党一大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大会确定的政策统称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杜魏华：“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与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盖军："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就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尚明轩："这次全国大会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与国民党右派份子辩论和斗争，确定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1924年）"1月，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1989年中国《辞海》：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后在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新三民主义。

吴剑杰："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核心，也是新三民主义在当时历史阶段的政策体现。"

真实性质疑

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始终否认有“新三民主义”这个概念存在过，在现今可以查阅到的国民党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记载。因此，所谓“新三民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方面杜撰出来的。孙中山病逝前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此解释为：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因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它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一。

李云汉：“因三民主义里未强调阶级属性而否定其价值，共产党企图以三大政策的口号来取代三民主义，此乃鲍罗廷以三大政策来欺骗国民党人的背景。”

汪兆铭（七一五事件分共之后）：“到了武汉，便觉得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并举是很不妥当的，自从国民党改组以来，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未见过三大政策的名词，这大概是去年才发生的。”

蒋永敬：“陈独秀最早故意将三大政策与三民主义混为一谈，而毛泽东又把三大政策称为新三民主义，显然在拾人牙慧。”

宋进：“陈独秀在1926年11月4日《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成为毛泽东日后提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基础。”

何香凝曾说，1927年4月“越飞到沪，彼此共谈革命（孙越宣言），总理与

廖仲恺遂于那时决定联俄、联共、联农工的三大政策。”

但是，“容共”（共指共产国际）是1927年吴稚晖首先使用后约定俗成的，当时孙中山早已逝世，孙越宣言没有谈到“联共”一词。

西德慕尼黑大学金德曼：“苏联企图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把中国的革命运动永久而牢靠地与苏俄连结在一起，它所运用的战略即是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陈独秀及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苏俄在中国活动的官员，在孙中山逝世后开始使用这名词，大力宣传，企图造成一种心理，使人们以为这三个政策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同样的理论关系和地位，目前已知的证据可以显示C. Martin Wilbur对1920年代初国民党、共产党和苏俄远东政策三者之间关系所作分析的正确性。”C. Martin Wilbur认为，三大政策是中共自行杜撰的。

李云汉：“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鲍罗廷所提出，随后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结合苏联顾问的联俄、联共、农工定为三大政策，并说三大政策为孙中山、廖仲恺所创立，藉以欺蒙国民党党员。”并引用顾孟余在1927年7月15日（即七一五事件当天）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的记录：“国民党在历次的宣言中，本来是有许多政策。但外面宣传所谓三大政策，却找遍了总理的遗教、历次宣言、决议案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东西。实在说：三大政策短，不过只有七个月。何以知道只有七个月？因为三大政策的内容在七个月以前还没有定。今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汉来，才听见鲍罗廷同志说起三大政策，并劝大家要遵守；而当时他所说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联俄、农工。同现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见得三大政策的内容，在正月时还没有定，而且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替我们想出来的。于是各军政治部、各报馆、各团体的宣传，只有三大政策，绝不提起三民主义。但我们要知道：第一、所谓三大政策的历史很短，不出七个月；第二、所谓三大政策，未经过任何会议决定，是共产党的越俎代庖。本来政

策要靠宣传，不过这个政策是共产党代我们定的，也是共产党在替我们宣传，所以弄得外界对于本党很是怀疑。人民方面，有人民方面的联络；党部方面，有党部方面的联络；用什么主义联络？以什么关系联络？这都是要研究的。至于说容共，究竟是有条件的容，还是无条件的容？也须加以考虑。还有农工政策，也要以这样态度来研究。总而言之，所谓政策，一定要将他们的内容解释清楚；不然，使一般人听了，只是迷离徬徨，不知所从。”胡汉民随后提出了“统一口号案”。

崔书琴：“过去，中共常说只有他们才是三民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提出了一种‘革命的三民主义’，使其有别于‘旧有’的三民主义。将联俄、容共与农工的‘三大政策’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们借口孙中山先生说过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来谴责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不应该反共。尤其是宋庆龄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来为投靠中共与俄帝做辩护”。

林家有、周兴梁认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产党人率先使用的，并非出自孙中山本人。

张玉法：“三大政策是武汉国民政府受苏联、中共控制时期所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出，中共再宣传此政策来自于国民党中央，才会以讹传讹。”

中国大陆历史学家金冲及（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和台湾历史学家蒋永敬讨论时，蒋永敬指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也不是国民党一大提出。金冲及查阅资料后认为，蒋永敬的观点可靠，三大政策是后来才提出的。但金冲及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的确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做法，蒋永敬表示他能接受这个观点。

现代新诠释

200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职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又提出“新

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提出新三民主义：“庶民主义，平等机会参与政治；乡民主义，开放资讯网络投票；公民主义，权在民的公民社会。”

2017年3月17日，香港特首选举期间，有一署名“黎太”文章指出香港在中共统治下的未来可能只有三种人：对越趋高压统治逆来顺受的“顺民”、会尝试武力抵抗政府的“暴民”、其余不甘心逆来顺受亦没胆量抵抗政府的就会考虑“移民”离开。文中称之为“新的三民主义”。文章发表后，此“新三民主义”被当地多番引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B0%91%E4%B8%BB%E7%BE%A9

三民主义，又称“孙学”（Sunology）、“国父思想”、“总理遗教”，是由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提出，为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在中华民国宪法前言以“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称呼，并被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提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即民族、民权（民选）和民生。

孙中山表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此纲领在历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变和发展。而国民党领导人与党员、学者，对三民主义也有不同的解读。

历史

三民主义，是随着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之后，利用滞英期间，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极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

要点

民族主义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揭櫫“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却并非主张种族主义。孙中山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

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当初灭汉族的时候，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我们决不如此。”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

民权主义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

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民生主义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 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绝不可“用马克思之法”。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中国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

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乐”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十六讲及其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联俄容共后，孙中山决定系统讲演三民主义，以确保党内思想的稳固。1924年1月到8月间，孙中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的第一句便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胡汉民则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研究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关系。蒋中正则以“国父遗教概要”阐述对三民主义体系的认识，“中国之命运”阐扬对于三民主义在清末革命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及其以后国策上的发挥，“中国经济学说”阐扬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认识。并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试图为三民主义作补充总结。陈立夫则撰写“唯生论”，将孙文学说与民生史观做中国哲学讲读。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在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据此彰显三民主义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宪法实施至今。

后世流变

戴季陶主义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为与党内的共产主义思潮相抗衡，开始了对三民主义的系统性诠释，相继出版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民生哲学系统表》等书册，反对“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合作，认为“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并同时提出，国民党不是资本主义政党，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提倡“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

三民主义的连环性

胡汉民总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发现“（一）民族主义，必须要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才不会变为帝国主义。（二）民权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才不会变为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义，必须要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认为三民主义不是三个主义分立，乃是一个主义的三方面，“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个的连环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并据此批评共产国际参预殖民地解放运动，“列宁在阶级斗争之外，加用一点民族主义，本来已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一派人却辩护说，这不过是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义，正足证明他们非承认民族主义的

事实不可。由马克思和列宁两派的经验，便得两个教训：第一，欧洲阶级革命便不行；第二，东方民族革命才行。”证明了三民主义理论的完备。

民生史观

国民党后世构建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民生主义被作为三民主义哲学的本体，因为孙中山说过：“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因此，戴季陶提出：“三民主义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义之内，其全部著作可名之曰‘民生哲学’。”欲以民生史观对抗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蒋介石甚至补撰民生主义育、乐两篇，提出“仁爱为民生哲学的基础，亦即革命的根本条件。简单一点说：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并且推动三民主义儒学化，认为民生主义与儒家民本思想同源。于经济层面，则“民生主义，要把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具体的说，我们的民生主义，要以人性为基础，以民生为目的，一方面发达国营实业，一方面节制私人资本。阶级斗争的病态，没有发生的客观条件。”

力行哲学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力行哲学”，提倡革命务须力行，宣称“使全国国民都能知‘知’之难而能笃信主义；知‘行’之易而力行主义，从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苟且偷惰空疏颓放的积习，养成严谨勤劳求真崇实振奋进取的心性。”并进一步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说明“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就其内容而言，则为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就其方式而言，则为普通社会教育的运动；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则为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即国民精神建设运动。其意义与作用，与总理关于心理建设的一切遗教，完全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就是心理建设的补充实施办法。我们要完成心理建设，来奠定国家精神的基础，就要

力行新生活。"继而与孙中山讲演所及的"中国人的固有道德"思想相对应，"来实践并发'礼、义、廉、耻'的固有德性和立国精神。"

地位

在中华民国地位

三民主义被列入《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且《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其早期国内各高级中学及大学课程中曾列有三民主义，极力推展反共教育，部分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曾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境内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经常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中华民国宪法》第1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1994年4月19日，考试院全院审查会决议，高普考试将不再考《国父遗教》、《三民主义》，于翌年实施。同年9月24日，教育部招开大学校院长会议，由台大陈维昭校长担任召集，商讨废除大学联考废考《三民主义》。

2000年（民国89年）起大学联考不再考三民主义，至今中华民国各大学之中已无"三民主义研究所"（例如国立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所"）。

现今，三民主义是泛蓝阵营当中中国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无党团结联盟政治主张之一。

文化成果

中国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认为，三民主义理论是产生于近现代中国之

伟大思想文化成果。在长期实践之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和同志们代表着当时之进步潮流，创立此影响深远之理论思想。三民主义之核心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一套能满足多数人意愿之民主主义理论。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独立，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主张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三民主义固然是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发展之伟大成果，但随着时代发展，它必将被更先进、更切合当时社会之理论所取代。作为后来者，对三民主义应该采取批判、继承、发展之态度。从文化角度看，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现代取向中之结晶，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发展之一个极重要里程，但不可能终结中国新文化之发展。对三民主义作不可移易之崇拜，给以传统之语义诠释，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之“道统”，只能是对三民主义之扭曲和背离。

海内外中国大陆民主人士中，以辛灏年、封从德为代表的“民国派”认同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大陆重归中华民国、重新施行《中华民国宪法》。民国派的丁毅认为孙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但不是羁绊，中华民国宪法在这一基础上有创新和发展，孙中山身后各种流派的三民主义诠释和发展（包括国民党主流理论）都不能称作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

中国大陆的民间人士当中，以罗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亦认同三民主义，认为孙文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三民主义是代表自耕农利益的行动纲领。“孙文领导的三民主义运动，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全民民主革命。三民主义倡导全民普选权，也反对资本主义，即‘节制资本’，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分支来源。所以读教科书长大的中国人，动不动就将孙文领导的民主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马列意识形态，与事实完全不符。”

不同观点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之《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提及："《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新三民主义

苏联、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自1924年后，孙中山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进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是反共。近代西方学界以及台湾方面认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并非出自孙中山之手，这些都只是苏联、中国共产党片面的自我诠释，不符史实。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____

黄埔军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9%99%B8%E8%BB%8D%E8%BB%8D%E5%AE%98%E5%AD%B8%E6%A0%A1

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官校、陆官）是中华民国的军校，由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习称孙中山）指示筹办，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由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任首任校长，陆军军官学校创校于广东广州黄埔，故世人也因此称其为“黄埔军校”。学校为苏联支持下成立，因此有许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与将领均出自该校。陆军军官学校同时也是第五首中华民国国歌的发源地，因为该校第一期学生开学日由孙中山颁布之书面训词正是今日中华民国的国歌歌词。陆军军官学校目前隶属于中华民国国防部，而其宗旨和创校目的是为了培养中华民国陆军军官，陆军官校于台湾复校后，便改为大学与专科学制，但专科学制在2004年末届第27期后便取消。

陆军官校创立时，校址位于广东广州黄埔长洲岛，创立时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官校当时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校。1927年，陆军官校迁往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市，改为隶属国民政府，并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陆军官校为避过战争而西迁成都市。

1946年，陆军官校因应军队国家化改称“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重庆陆军官校校本部投共。1950年，陆军官校于台湾高雄凤山第四军官训练班位址复校迄今已70–71年。陆军官校黄埔时期的校址和南京时期的校址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南京校址现亦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而成都时期的校址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司令部及空军机关驻地。

陆军官校在大陆时期（至1949年）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曾经参与北伐、中原大战、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国共内战等战事。而陆军官校于台湾复校后，于台湾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没有参与过战事，这些人大都担负起战备整备等要务，他们的贡献主要在维系台海安全。

校史

建校肇始

1876年，清朝两广总督刘坤一倡议创立“广东西学馆”，并且以8万两白银买下位于黄埔长洲岛的船坞为广东西学馆馆址。 1882年，广东西学馆易名“广东实学馆”。 1884年，张之洞由山西巡抚调升两广总督后，将广东实学馆再度易名，改为“广东博学馆”。张之洞后来于1887年8月3日创建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恰位于广东博学馆原址。至此，广东水陆师学堂成为了中国第一所军官学校。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8月，孙中山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陪同下抵达桂林与孙中山会面，马林建议内容有三：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农民及劳工大众联合、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

基础、与谋求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孙中山对此未予实施。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逃亡上海时，多次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林伯渠、陈独秀等商谈，与苏联政府特使越飞会谈，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列宁派人帮助建党、建军。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2年底，孙中山接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1923年2月，当孙中山准备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时，邀请苏联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协助建军，并提出委派代表团赴苏考察政治、军事，学习苏联办军事学校的经验，谈判军事援助等。孙中山与马林、张太雷、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后，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4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宗山（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于是派遣蒋中正代表团开始访问苏联。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左右，接见他们的苏联领导人包括加里宁、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托洛斯基等。1923年10月6日，苏联派来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投入国民党改组工作，帮助起草由孙中山审定的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纲党章。

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军干部之军官学校。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1月，孙中山正式委派蒋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展开筹备工作。筹备委员7人：王柏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委员会以建立培训军事人才的学校。陆军军官学校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的长洲岛上，以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学校校址，通称“黄埔军校”。然蒋却在2月21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出辞呈，表示“自惟愚陋，不

克胜任”，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不过，蒋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其辞职原因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挟俄自重”，又忧心国民党不能达成扫荡军阀。同日，孙中山接到蒋的辞呈，决定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24年1月，苏联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弗・波里亚克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军事顾问小组成员有：切列潘诺夫、雅・格尔曼（又译作捷尔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波良克等10多人。鲍罗廷把苏联军事顾问小组成员介绍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承袭西方学制的传统军官学校（如保定军官学校），培养一名初阶军官一般需要三年。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则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规划了半年完成初阶军官军事训练的速成学制，还根据修业期限详细安排了各项军事课目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具体进度，并针对各科的具体内容及特点，拟定了实施办法练。

2月23日，孙覆蒋：“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孙复派出戴季陶去奉化，转达其准许蒋不预闻党政，专办军校之要求相约。

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发电报派遣教官。1924年5月，苏军军长帕威尔・安德耶维奇・巴甫洛夫（化名高和罗夫）到达广州，受聘孙中山首席军事顾问、黄埔军校军事总顾问兼军事顾问团团长。5月3日，孙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特任蒋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5月9日任廖仲恺为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并筹集军校经费，之后委任李济深和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和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和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周骏彦和俞飞鹏为军需部正、副主任，宋荣昌和李其芳为军医部正、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而何应钦为总教官，张家瑞和王登云为中、英文秘书，还有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亦获任教官及各方面工作，其中包括张申府、周佛海、聂荣臻、鲁易、恽代英、夏曦、熊雄、萧楚女、张秋人、高语罕、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人。

黄埔时期

1924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通过《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案》，在广东一省公开招生，在其他各省通过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秘密招生。如湖南的招生工作由何叔衡初步选拔后去上海，上海地区的军校招生委员为毛泽东，浙江的招生工作由中共党员胡公冕负责。3月27日，1200名来自各地的考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4月28日，考试成绩揭晓，正取350名，备取100名。湖南考生共产党员蒋先云为第一名，其他学生来自中国各地，包括广东、湖南、湖北、浙江、四川等省，也有来自越南、朝鲜、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青年。陆军官校于5月收录了第一批学生。于5月5日入学，成为陆军军官首批学生，6月16日为开学日，大元帅孙中山至校主持。当日上午6时孙中山身穿白色中山服，头戴“拿破仑”式白帽，偕夫人宋庆龄乘江固舰由大本营出发，江汉舰随同翼卫。抵校时由校长蒋中正与妻子陈洁如及校员生在校前排队奉迎，孙中山接见了主要干部，后于09时20分赴礼堂演说了“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讲话，孙向学生说：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在11时30分于操场的开学式中，孙说之所以择定陈炯明事件两周年这天举行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旨在表明要记住沉痛历史教训，坚决为缔造一支“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而奋斗。后由胡汉民总参议宣读总理的书面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其内容后来更制订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

孙中山决定自办军校的企图基本上不只是广东省，其它省分的军阀皆有所闻，因此或多或少都有阻碍其办校。军校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缺乏武器，在广东兵工厂厂长马超俊同情下，孙中山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至5

月获得该厂军援500把步枪、4挺机关枪与配套子弹，这是黄埔军校获得的第一批军火。滇军将领范石生后因得知此事曾扣押马超俊，最后在杨希闵介入下得以释放。

因黄埔军校持续招生，军火问题成为孙中山向苏联求援的重要课题。7月8日总军事顾问帕威尔·安德耶维奇·巴甫洛夫给苏联政府发电报，要求立即援助孙中山政府急需的武器装备。苏联军援军火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22日自海参崴出航，10月5日抵达虎门卸货，参与这批军火卸货戒护任务的孙元良回忆该舰运了500杆日制三八式步枪与弹药。第二批在10月8日由沃罗夫斯基号通信指挥舰运达，包括8,000杆莫辛-纳甘步枪与配套的每杆500发子弹（共400万发），火炮是在十四年（1925年）底运抵虎门，获得火炮的黄埔军校才从炮兵科毕业的学校教官与抽调部分第二期入伍生成立炮兵营，初期的炮兵营指挥干部皆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专业军官，包括蔡忠笏、陈诚、罗卓英。飞机则是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8月时向苏联采购的英制与德制旧型机，这批也是在年底运抵成军，称为“中山航空队”，由于广州政府缺乏足够的飞行员，因此中山航空队是中国籍与苏联籍飞行员混编。

同时，巴甫洛夫还建议孙中山成立国防委员会，将广州地区分散的地方军阀部队改编为革命军队，以便集中指挥。7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接纳巴甫洛夫的建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并聘请巴甫洛夫为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 1924年7月18日，巴甫洛夫偕同其他苏联军事顾问及航空局飞机师数人乘坐广九列车赴增城考察前线情况。当晚，在石龙河面电船上勘察时，巴甫洛夫失足落水溺亡。8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大会，孙中山与宋庆龄由大本营乘江固舰又亲往参加，称他为“俄国为中国自由而捐躯的第一位先烈”，并手书“急邻之难”条幅以志哀悼。由于总顾问因事故猝逝，在10月军火运输到黄埔军校之际，继任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为首的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包括罗加乔夫（又译为罗嘉觉夫，第二次东征军事顾问）、别夏斯特诺夫、吉列夫（炮兵顾问）、波洛（机枪顾问）、格米

拉、泽涅克、齐利别尔特、马米伊利克等也随船抵校赴任。这些俄国军官随后也参与了广州商团事变。

另为宣传革命思想，军校出版《黄埔潮》与《黄埔日刊》等期刊，有的刊物发行量高达5万份之多，还行销国内外。

1924年8月10日至10月16日，黄埔一期学生首次参与军事行动，为广州商团事变。在海军江固号炮舰协助下，扣押由挪威籍货轮载运的广东省商团采购军械。随后黄埔校军在10月10日后和广州商团军交战，并成功镇压商团军。并以其军火强化黄埔校军的战力。

1925年5月，苏联政府再向黄埔军校派来200人的教官团。知名苏联顾问或教官有：

斯米诺夫（又译为西米诺夫），1924年10月被聘为大本营直辖海军局局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海军局时被解聘。

李糜，1924年10月被大元帅府聘为航空局的顾问，任代理航空处处长兼航空学校校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航空局时被解聘。

尼古拉·古比雪夫（化名“季山嘉”），1925年6月来华负责顾问团工作，1926年2月27日获悉蒋介石、汪精卫要解聘自己时，自动请辞。

伊文诺斯基，被聘为大元帅府军事顾问，1926年4月14日，随被解聘10余人归国。

沙菲为铁甲车队顾问

军事教练顾问长切列帕诺夫

政治顾问喀拉觉夫（又译作格拉觉夫）

步兵顾问兼顾问长白礼别列夫

炮兵顾问嘉列里

工兵顾问瓦林

炮兵教练官捷列沙托夫、梁道夫

通讯顾问科丘别耶夫

后方勤务顾问罗戈夫

战术教官波利亚克、格尔曼、亚科夫列夫等

入学不久，所有学生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连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内。中国共产党有权可推荐若干人进军校各期受训，但中国国民党招募来者占大多数，大多是中等以上阶级的城市居民或地主仕绅之子。后来，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在陆军官校内的势力，中国国民党便于1925年2月将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11月30日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考试及格465人，另有一说，由湘军讲武学堂并入的158人，四川第6队学生的22人也并计入第1期毕业，共645人均为步科，隔年5月19日颁毕业证书，6月25日补行毕业仪式。8月，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一说9月6日）

虽然蒋得到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人支持，但是他用校长身份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关系，掌握新军设计与技术细节，凡此都与他所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有相似之处。当中最大之不同，即曾、戚所建立新军，旨在扶持当时之国家朝廷，但蒋在1925年国家是身处南北分裂，他在孙文指示下创办黄埔，于校门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旨在励志学生，救亡图存。

黄埔第4期入伍生于1925年7月开始招考，招生委员分赴开封、汉口两地，并委托北京、上海各地国民党党部招生。至1926年1月，各地招收之志愿入伍生来粤应试者有7次之多；先后成立入伍生队第1、2、3团。入伍生担负勤务包括广州卫戍，惠州、黄埔、虎门之警戒，各兵舰之监视，廖仲恺遇刺案各要犯之看守、第二次东征时惠州驻防种种。1926年3月8日，入伍生经升学考核转为学生，分步、炮、工、经理、政治五科；共编为步科第1、2团，每团辖9连，共1712人，炮科大队（辖2队）145人，工科大队（辖工兵、通信2队）148人，经理大队（辖2队）213人，政治大队（辖3队）438人，共计2656人，并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由于首次开设政治科，第一批政治教官（高语罕、恽代英、廖划平、汤澄波、罗霞天、张秋人、于树德、韩麟符、陈希濠、李合林、杨道腴、任卓宜、朱雅林、段锡明等）80余人。1926年7月9日北伐誓师至10月4日正式毕业，第四期学生就相继分发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任连长、连党代表、排长、班长等基本干部；成绩优秀的学生调入北伐军总司令部和直属警卫团、补充团等部队服务。

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军事教育有统一之必要，决定改组黄埔军校，合并所辖各军原有各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该会，并以黄埔军校为校舍，任命蒋为校长。1月12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1926年3月13日，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原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化名伊万诺夫斯基）率“苏俄观察团”到广州，对苏联顾问在华的军事、政治工作进行考察，正遇上中山舰事件。黄埔军校教育长兼入伍生部长、代校长方鼎英在《我在军校的经历》中，提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团亦以与中

山舰事件有嫌，同样兴问罪之师，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感到蒋之派兵监视顾问团住宅是极其严重之举，因而让蒋明白提出意见，蒋便将其不满的顾问列一名单，请其撤走，一次便有300余人被撤回国”。

后来，北伐革命军成功攻取武汉，国民政府便于1926年10月27日决定于两湖书院旧址设立政治训练班。后来，政治训练班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并将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的政治科学员全数调至武昌就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将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的炮兵、工兵科学员调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

1927年1月19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正式易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此黄埔时期陆军官校自1924年兴办到1927年共招训学生5期，也即第1期至第5期。

黄埔军校1至5期毕业人数：

学期	开学日	毕业日	毕业人数
黄埔1期	1924年4月28日	1924年11月30日	645人
黄埔2期	1924年8月14日(入学考试)	1925年9月6日	449 人
黄埔3期	1925年7月1日	1926年1月17日	1233人
黄埔4期	1926年3月8日	1926年10月4日	2645人
黄埔5期	1926年4月	1927年8月15日	1480人

南京时期

1927年北伐军攻下南京，广州国民政府北迁南京，随着政府中枢北迁，黄埔军校也计划迁往南京，原订于192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但同年发生中国国民党清党事件，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分裂，并发生宁汉分裂事件。国民党分裂也打乱了黄埔军校北迁计划，使得同时期在南京、武汉、广州的黄埔军校同时存在。

在武汉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由当地国民党人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在1927年3月22日扩建并改组成“（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随即展开讨伐共产党的行动。武汉分共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党为了继续北伐，将武汉分校改制为张发奎的军官教导团，停办该分校，并迫使武汉分校第5期学员退学。这些学员后来编入国民革命军内，成了镇压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的主力部队。

在黄埔原址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未因国民政府北迁而停止招生，并在1927月续招第6期、1928年招收第7期生，副校长李济深于1928年5月将校名改成“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在广东的第6期生于1929年毕业、第7期生于1930年毕业。1930年9月，广州陆官学校正式停办，招收的第8期生则拨交南京方面编为第一总队完成学业。

黄埔军校6至8期毕业人数：

学期	开学日	毕业日	毕业人数
黄埔6期	1926年8月	1929年2月24日	718人
黄埔7期	1928年5月复课	1930年9月26日	666人
黄埔8期	1930年5月	1933年5月20日于南京毕业	305人

在南京的黄埔军校最初名为“（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中正并要求

所有学员宣誓反共，同样在1927年招收第6期、1928年招收第7期生，学制与第2期后同样为1年速成教育。1928年3月，蒋中正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为校长，宗旨在培育陆军初级军官，备充国军干部。

在1929年招收的第8期中央陆军军官军校学员开始调整学制，由原本的1年速成教育转为3年正规教育，此转换在1930年开学之第8期开始。而前7期毕业生部分则由陆军大学速成班补强学资。南京中央陆军官校自1928年兴办到1937年西迁成都止，历时10年，共招训学生7期，也即陆官第6期至第12期。

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高教班）用于培训杂牌部队中层军官，给予中央军校科班学历教育。

高教班第一期：1932年10月1日在南京黄浦路马标成立。由本校军官教育总队尚未卒业之三队、四队及步兵炮队学员改隶。1933年5月2日毕业。班主任徐培根。

高教班第二期：1933年11月各部队选送军官将校入学。1934年6月7日毕业。班主任徐权。

高教班第三期：1934年10月入学，1935年8月毕业。

高教班第四期：1935年10月入学，1936年8月毕业。班主任陈芝馨。

高教班第五期：1936年9月入学，1937年8月毕业。班主任江煌。

高教班第六期：1939年入学，驻成都北校场。1940年6月毕业。班主任刘仲荻。

高教班第七期：1940年9月入学，1941年6月毕业。班主任孙元良。

高教班第八期：1941年9月入学，1942年1月毕业。班主任孙元良。

高教班第九期：1942年9月入学，1943年3月毕业。班主任孙元良。

高教班第十期：1943年8月入学，1944年6月毕业。班主任陈素农/刘伯龙/皮震。

高教班第十一期：1944年9月入学，1945年6月毕业。班主任皮震。

中央军校特训班：

特训班第一期：同军校第10期。1933年7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在江西南昌成立，招收黄埔军校前八期失业毕业生及部分失学青年924人。主任康泽、副主任韩文焕。1933年8月编入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第四营，两周后改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1933年10月3日，研究班学员编入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康泽任总队长、韩文焕总队附，训练班3个大队长马维骥、萧树经、公秉藩分别任别动队三个大队长，开赴南城、临川开展战地实践。

特训班第二期：同军校第11期。1934年训练结业的特别研究班学员编为军委会别动总队第四、第五大队，随“参谋团”入川。别动队第五大队接收了贵州。

特训班第三期：同军校第12期。1935年春改名为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1935年毕业学员编为军委会别动总队第六、第七大队和巡缉大队。1935年底，第2、第7大队开赴陕北。

特训班第四期、第五期：编为军校第13期第二总队。1936年春，原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练处处长潘佑强接任特训班主任，杨文琏为副主任，在全国公开招收军事队、政治队学员各120人。1936年5月1日在星子县入伍，列为第四期。原1935年底设在南京的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所的180名学生也并

入，编为交通学生队（1938年毕业于沙市）。包括朝鲜流亡青年周世敏、李承烨等。1936年冬，潘佑强被解职，康泽回任，由别动队预备队考选学生150人，收容华北流亡学生500人，列为第五期。1938年1月特训班迁往沙市。

特训班第六期：同军校第14期。包括1937年秋冬在庐山招收的政训学生队与交通学生队、1938年春夏在沙市招收东北军编余军官800人及当地学生800人、1938年秋至1939年在丰都招收的均列为第六期共计5308人。其中1937年秋冬在庐山招收的400人，撤退到陕西王曲，称为特训班第六期西北大队，1939年春改为中央军校七分校。

特训班第七期：编为军校第17期第二十总队。1939年底迁往合川县，招考学生3个大队。

特训班第八期：同军校第18期第十四总队。1941年招考学生3个大队，学制三年。1944年毕业。

成都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因应国都迁徙，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1937年8月由南京迁至成都，第13期学生于1937年11月11日在庐山开学。除了成都以外，因前线基层军官匮乏，国民革命军在各战区开设了军官养成学校，这些学校皆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X分校”称呼。大多数分校在1945年组织精简时均停办。

1945年日本投降，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未迁回南京，仍续留成都。由于国防组织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抗战胜利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1946年1月奉命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隶属陆军总部。1947年10月蒋中正卸任校长，由黄埔一期毕业之关麟征接任，蒋中正改任名誉校长，除

了中国籍学生，此时陆军官校开始招收韩国与越南籍人施以军事教育。因国共内战白热化，原本被撤裁的分校重新开办，称为“军官训练班”，其中最知名者为1947年孙立人在台湾高雄县凤山镇的前日本台湾军基地开设之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又称“陆军军官学校台湾训练班”）。在中华民国国军败战趋势明朗化后，成都的陆军军官学校本部也开始筹备迁校事宜。

陆官在大陆最后一期23期学生，在1948年6月、7月间有3000多位考生，于12月1日入学于四川成都的陆军官校，但却提前于1949年12月毕业，毕业典礼是由蒋中正主持，但因四川已遭解放军包围，学生只能在学校待命，9月中有77名23期台籍与特殊状况学生先由政府运送到台湾。1949年9月8日教育处处长李永中少将，总队长萧平波少将，及萧步鹏少将等3人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于1949年11月初蒋中正第二次来陆官时对官生讲话，李永中、萧平波准备扣押蒋，但萧步鹏把计划告诉蒋而逃走。后来李永中以迁校行军总指挥名义安排迁校事宜。11月中旬全校开始行军，为使解放军能顺利接收军校，一个多月时间部队采取让拖等来回游动在川西平原。12月20日军校北上至温江西，已和解放军接上头；西面是罗广文一个军宣布投共；东面是胡宗南的国军。这时由李萧二人召集队长和学生代表，讲了形势和解放军的协议与政策，愿投共的、跟国民党的或回家的都自便，学生大都愿意投共，25日队伍至郫县便由李永中宣布军校投共，而解放军将军校保持原编制，暂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校”。1949年12月，解放军占领成都，成都陆军官校自1937年兴办到1949年共招训学生11期，也即第13期至第23期，由中华民国在大陆开办的陆官到23期停办，至此，陆官的大陆时期终告结束，迈入台湾时期。

陆官在大陆时历次迁徙与设分校有潮州分校、长沙分校、成都分校、洛阳分校（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抗战后迁汉中）、武汉分校（中央军校第二分

校）、南昌分校（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广州分校（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昆明分校（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南宁分校（中央军校第六分校）、西安分校（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武当山分校（中央军校第八分校）、迪化分校（中央军校第九分校，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凤山分校（中央军校第十分校），合共13所。另外，在今深圳设置有非正式的分校及汪伪政权设置的军校。

凤山时期

1950年3月1日，在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总统蒋中正发表关于陆军官校复校的演说。1950年8月复校后，首届校长一职正式由罗友伦中将接任。1950年10月，政府决定以台湾省高雄县凤山镇原第四军官训练班班址为军校校址，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复校。校址为原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武器储存库等设施所在。1951年4月，第四军官训练班的所有学员、教师及设施都被编进学员总队，并且成立第24期学生总队，其训练期为二年。

1952年6月，蒋中正主持陆军军官学校校庆，勉全体师生，抱定光荣战死之决心。9月，蒋介石于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班剀切致训词，说明国家需要革命青年，青年需要革命教育，期以身体生命献与国家，挽回国运。1953年6月，蒋至凤山主持陆军官校校庆，并巡视左营军区，慰劳留越返国将士。

1954年6月16日，蒋至凤山，主持陆军官校三十周年校庆，时官校已改为四年制，其正科毕业生，由教育部授予学士学位，校庆阅兵典礼由当时总统蒋中正主持，与副总统陈诚一起在校庆中阅兵、校阅骑兵队，是迁台后首次举办校庆“阅兵”，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少将也上台致词。1964年6月，陆军官校建校40周年，蒋介石亲临致训，昭示军校师生黄埔一贯精神，乃牺牲精神、团结精神、负责精神。

陆军官校学制于1954年第27期起由两年改为四年，在此之前各期学年不定，并无四年大学制的“正期班”称谓，多以第几期第几年班称谓期别，直至1966年陆军官校开办“专修学生班”制，为区分前后班别之异，原常规班制始改有“正期学生班”之称谓。1970年起正期班毕业年班改授为中尉官阶，于1975年第47期起学制再延长为四年三个月，在1976年第48期起陆官首次授予文学士学位，在1993年毕业正期班第62期起恢复初任少尉，1994年入学正期班第67期开始招收女性学员，1998年开始招收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学生。并为了彰显国民革命军源于陆军官校，中华民国国防部决定将陆军所属各军事院校的“入伍生团训练”集中于陆军官校施训。另外，陆军官校也提供多种短期但无文凭学位的军官训练班，其目的是为充实基层干部。

1965年12月4日国防部长蒋经国命令将所有13期起的各兵科学校之“后补军官班”取消，转纳入为陆军官校开办的“专修学生班”制，1966年1月1日陆总部核定陆军官校开办，同年11月17日首训第13期，此至1969年专修班19期以前，教育期限为一年，20期至25期为二年，26期至43期为一年，44期至47期为一年三个月，48至56期为一年，专修班役期视军种、兵科的不同，分别为四到六年，专修班第13期至56期共结训44期，人数2万8277人，只有军事结业证书，不授予专科或大学学位文凭。

1977年12月6日再将专修班规划为“专科学生班”，增设土木、企管、机械和电机四科。另于1996至1998年招收三期二技班，每期二年三个月，开授管理、电机二个学系，是同与大学部“正期班”、专科部“专科班”有正式授予军、文职文凭毕业证书之班队。“专科班”为二年半学制，1978年4月28日陆军官校专科1期至1982年5月5日专科5期入学期间，还续重叠招收专修48至56期之学生，以后便停止专修班之招收。另国防部为激励爱国情操，于1978年命陆军官校支援拍摄刘家昌导演的军教片电影“黄埔军魂”，与1989年支援拍摄柯受良导演的军教片“壮志豪情”；另2011年国防部为庆祝建国百年，与三立电视合拍军事偶像剧“勇士们（电视剧）”共三个单元15集。专

科学生班后因招收的学生不足，因此自1985年专科8期起，部分期别在每年5月及11月分为甲、乙两班扩大招生。2003年专科班第26期乙班首次招收飞行军官班。在2004年末届召收（2006年停召）第27期后便停止收生，继后的专科班迁往“陆军专科学校”（陆军士校改制）继续招生，也透过“专业军官班”的召募来弥补人才短缺问题，陆官专科班1-27期总计毕业生有1万7077人。2006年8月1日，国防部精进案实施，裁减兵员，并将各官校校长的官阶降为少将。当时，官校校长王根林提前于2006年7月1日退休，而作为继任兼首任少将编阶校长的陈良沛仍未上任，因此校长一职由中华民国陆军副总司令贾辅义代理，而贾辅义仅当校长一个月便离任，陈良沛是第一位出生于台湾的陆官校长。

为维系陆军官校一脉相传之革命感情，发扬黄埔精神，两岸先后创建陆官黄埔同学（校友）会组织。北京于1984年6月14日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台北于1991年1月1日成立“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而“陆军军官学校校友会”于1988年12月4日在陆军官校凤山成立，复于2013年10月26日改制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另“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也于2014年12月14日在台中成立。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所言：“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1924年他在广州石牌手创“文校”中山大学、广州黄埔“武校”陆军官校，合称“一文一武两大学府”。而在民初历史举足轻重的这两校，也在两岸分治后，于1950年在高雄县凤山镇复校陆军官校，1980年在高雄市鼓山复校中山大学，这“一文一武两大学府”实现他的理想。陆军官校建校逾九十年，黄埔出身的名将多参与东征、北伐、抗日与国共内战后的复员工作。官校迁台后，陆军官校的毕业生因战事少而少有参战，因此多担任建军备战的工作，以维系台海安全，尽管陆军官校的专科班仅开办27期，却也产生廿多名将领，并由专科1期主专科班以专科5期为典。

历任校长

创校校长蒋中正军职历任特级上将（五星上将），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与军事委员长，在早期国军中，“校长”一词属蒋介石专有，1947年10月蒋中正首次退位改任名誉校长，由陆官第1期毕业之将领关麟征担任校长。1950年8月在台复校后首届校长由罗友伦中将接任。2006年8月首任少将编阶校长为陈良沛。

任届　任期　姓名与职位　学历

01　1924年5月—1947年10月　蒋中正上将　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炮兵科11期

02　1947年10月—1949年9月　关麟征中将　日本振武学校炮兵科 陆官1期

03　1949年9月—1949年12月　张耀明中将　陆官1期

04　1950年8月—1954年8月　罗友伦中将　陆官7期

05　1954年9月—1957年3月　谢肇齐中将　陆官6期

06　1957年4月—1960年12月　徐汝诚中将　陆官6期

07　1961年1月—1965年3月　艾瑷中将　陆官4期

08　1965年3月—1970年3月　张立夫中将　陆官8期

09　1970年4月—1973年2月　林初耀中将　陆官10期

10　　1973年2月—1976年3月　　秦祖熙中将　陆官11期

11　　1976年4月—1977年12月　言百谦中将　陆官16期

12　　1977年12月—1979年12月　许历农中将　陆官16期

13　　1979年12月—1981年6月　朱致远中将　陆官16期

14　　1981年7月—1983年6月　　卢光义中将　陆官22期

15　　1983年7月—1985年6月　　黄幸强中将　陆官22期

16　　1985年7月—1986年12月　黄耀羽中将　陆官24期

17　　1986年12月—1989年6月　汤元普中将　陆官29期

18　　1989年7月—1991年6月　　胡家麒中将　陆官30期

19　　1991年7月—1993年9月　　杨德智中将　陆官33期

20　　1993年9月—1996年7月　　马登鹤中将　陆官29期

21　　1996年7月—1997年7月　　童兆阳中将　陆官34期

22　　1997年7月—1998年1月　　丁渝洲中将　陆官35期

23　　1998年1月—2002年2月　　张岳衡中将　陆官34期

24　　2002年3月—2005年6月　　杨国强中将　陆官41期

25　　2005年7月—2006年6月　　王根林中将　陆官40期

代理　2006年7月　　贾辅义中将　陆官39期

26　　2006年8月—2010年7月　　陈良沛少将　陆官48期—改为少将编阶

27	2010年7月—2012年7月	全子瑞少将	陆官正51期
28	2012年7月－2015年2月	刘得金少将	陆官正53期
29	2015年2月－2017年9月	张捷少将	陆官正55期
30	2017年9月－2018年12月	陈忠文少将	陆官正56期
30	2018年12月-	陈建义少将	陆官正59期

校制

校徽

“盾牌”象征自信、勇敢及保卫国家安全。“亲爱精诚”为陆官校训。“青天白日国徽”象征中华民国。“指挥刀”代表指挥官的权与责。“瑞穗”代表中华民国陆军对北伐、抗战、动员戡乱等战事中所建立之丰功伟绩，并有着寓兵于农之意。每禾七短，合为双七，又名七七，象征七七事变，以纪念抗战建国，以及发挥抗战建国的精神。校徽上之“亲爱精诚”四字原创为由右至左书写，在2007年配合由左至右横式公文书而改向；但在2011年由国防部长高华柱下令要尊重原创精神与特色，再回复为由右至左书写迄今未变。

校旗

民国13年（1924年）建校之初的校务会议中，指派总教官何应钦设计校旗，以红底、中缀青天白日国徽、外围加上金黄色丝穗为校旗。校旗上方有一荣誉旗（标），为民国46年为表彰功绩并纪念改制（四年制），以提高学校荣誉，由蒋中正亲颁。

校训

陆军官校校训“亲爱精诚”，由首任校长蒋中正拟定及撰写，并由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时核定宣布。孙中山核定“亲爱精诚”为陆军官校校训，是希望由陆军官校培训中国革命军事人才，共同团结为革命的写照。蒋中正于1925年元旦对官校学生训话中阐释：“亲爱”是要所有的革命同志能“相亲相爱”，官校的宗旨“精”是“精益求精”，“诚”是“诚心诚意”；其目的乃在造就顶天立地、继往开来、堂堂正正革命军人，发扬黄埔精神。

校歌

1924年陆官虽有撰定校歌，但仅传唱黄埔1期至黄埔4期：“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本校。以血妆花，以校做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此歌由戴季陶所作，但因词曲韵律不太流畅，而未得推广。军校的学生除了经常唱校歌与《国民革命歌》，另外还请苏联通信顾问科丘别耶夫教唱《国际歌》。

1926年陆官认为有必要制定新校歌，采用了陈祖康写的词与林庆培谱的曲，并将歌词于1927年6月16日在黄埔军校旧址内勒碑立石，复于1977年6月16日在台湾凤山陆官勒石纪念，上面写着-“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发扬吾校精神”。校歌并由黄埔合唱团编唱，此曲于1926年由黄埔5期开始传唱至今。

陈祖康，福建漳平人，1901年生，1919年秋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参加中国少年共产党，与熊雄是留法时的同学。熊雄先陈祖康回国，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推荐，继周续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请陈祖康于1925年春回国，到陆军官校担任少校政治教官。1926年秋，陆官第五期开学，熊雄对陈祖康说：“到现在五期已经开学了，学校万事俱备，惟新校歌尚付阙如。大家都认为你具对诗歌专长，请你撰写一篇校歌的歌词。”于是陈祖康写了这首歌词，并交音乐教官林庆培谱曲。

陆官校歌在2006年陈水扁政府主政推行去蒋化时期，与2016年蔡英文政府时的民进党立委，都要求陆官将唱了几十年的校歌改歌词，把“党旗飞舞”改成“国旗飞舞”。国防部表示，陆官校歌与军歌性质不同，校歌非一般军歌，校歌的作者已经不在了，因为歌词是有版权的，要尊重原著者与维护历史传承，不能更动。而陆军官校于2017年6月29日和2019年4月18日召开的二次校务会议，讨论大学部提案“校歌修改议题”，经表决均以全数不同意票修改、同意修改零票，决议维持原校歌歌词。而面对改词的提议，填词人陈祖康的家属很不认同，认为用“党旗”二字是有历史背景，没必要改变；特别的是，代表家属发言的是陈祖康的孙子陈如山，他正是入围3次金曲奖的四分卫乐团主唱。除陈祖康家属反对，也因各界反弹声浪，而未修改。前民进党金门县党部主任委员陈沧江表示，民进党应该努力做好两岸关系和拼经济才对，却不停搞这些枝枝节节的小事。

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为“牺牲、团结、负责”的精神。要砥励“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的信念，要“为总理、为主义、为革命”而负责、团结与牺牲的精神。蒋中正在1959年（民国48年）6月16日于凤山主持陆军军官学校35周年校庆，亲自做了对“黄埔精神”的阐示。“牺牲精神”的根源，就是“乐死的性质”，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家来奋斗。“团结精神”的根源，就是“亲爱精诚”的校训，凡属革命军人，不但事业是整个的，荣辱是整个的，而其生命、历史都是整个的，所以同学之间不仅是要义共患难，而且是志同生死。而“负责精神”，就是今日的党歌和国歌，那就是黄埔同学对于实现主义，对于保卫民国，对于领导人民的责任。革命军人的责任，就是“以建民国，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的责任，是为总理、为主义、为革命，而负责、团结与牺牲。黄埔还有一套严格的荣誉规约。由于黄埔精神的建立，“黄埔系”在

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扮演举足轻重角色，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较大影响。

校区

黄埔军校大门中央上方横匾上有谭延闿所书“陆军军官学校”几个大字。在二门门口挂着“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对联，二门右侧墙壁上挂有蒋介石手书的校训“亲爱精诚”。黄埔军校校本部是一座日字形的二层砖木结构、三路四进、回廊相通的楼房。军校创办时在原陆军小学堂祠堂式大门前面增建欧陆式大门。中山故居即“史迹陈列室”，建筑面积805平方米，1952年重修，原为清朝海关总税务司。位于中山故居西的学生俱乐部是欧式红色建筑，礼堂讲台中央和两侧分别悬挂孙中山像、总理遗训、中国国民党党旗、中华民国国旗和林则徐焚鸦片、义和团。

东征阵亡烈士墓座落在军校西南的平岗，面积5万多平方米，是1925年中华民国军政府纪念讨伐陈炯明等叛军而阵亡将士修建，于1926年6月落成，葬有516位烈士遗体。墓园前有1928年修建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是一座凯旋门式建筑，上覆民族特色的琉璃瓦，大字由蒋中正书。1936年在墓园正门增建东征阵亡烈士纪功坊和码头，有小黄花岗之称。纪念坊后由墓道、墓冢、纪功坊、入伍生墓碑群构成长数百米的中轴线，墓冢东侧有蔡光举烈士墓，西侧有17位出身军校的将校墓，墓园于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在1984年修缮复原。

北伐纪念碑矗立在长洲岛平岗，是纪念北伐阵亡的军校生建立高10米的花岗石碑。由军校代校务何遂撰写碑文“平冈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万世兮，将以垂纪于无穷”。碑的正面刻“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纪念碑”，碑座的东、西、北三面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等353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但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大部分共产党员阵亡者的名字未能刻记。

军校后山的八卦山顶建有高40米孙总理纪念碑，于1928年奠基，1930年9月26日落成，碑顶塑有孙总理铜像，高达2.6米，重逾2000斤，是中山先生日本好友梅屋庄吉出资，牧田祥哉敬作，篠原金作工场铸造。碑的正面为“孙中山纪念碑”六个隶书大字，背面为总理像，东面为总理遗训，西面为总理开学训词。从山底到山顶的阶梯所在的山壁用石材装饰，表面镶有校训“亲爱精诚”四个大字。

1937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友会利用广州黄埔军校旧址，创办“黄埔中正学校”，学校沿用黄埔军校“亲爱精诚”校训，但创作新校歌。后学校历次迁徙易名为“广东省立黄埔中正中学”、“广东省立黄埔中学”、“广州市第六中学”。

凤山 续学新址

陆军官校腹地约173公顷，大门对面有“亲爱精诚”大型牌楼，大门上方横书“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是蒋中正所书。入门两旁分竖“爱的教育”、“铁的纪律”标语。司令台挂着蒋中正手书的“亲爱精诚”校训。学校设有校史馆，外墙挂有“国家”、“责任”和“荣誉”三个标语（原本第一及第二个标语“主义”和“领袖”已基于军队国家化之《宪法》规范和理念而撤除）。校区分“北营区”、“南营区”（白宫）及“东营区”；“北营区”有志清、敬之、伯韬、清泉、灵甫楼等房舍，而“东营区”现改建为多功能的学生活动中心。中正堂为新式美伦美奂巴洛克式礼堂，原礼堂蒋中正骑马铜像移志清楼。还有人工湖泊“黄埔湖”，沿着湖畔有黄埔公园、觉民楼、岳飞铜像、科学工程馆、金门之虎战车、黄埔宾馆及游泳池；野外训练有先锋路、612与714高地。

学制及生活

大陆时期

陆官的军校教育，虽规定学制为3年，但因初期时的用人迫切，实际上为半年到两年半不等。第1期学生都为步兵科之训练，第2期学生才开始分有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和宪兵等5科。第3期学生起实行入伍生制度，新生经过3个月的入伍教育，考试及格者升为正式学生，第4期学生以后再增设政治、骑兵、交通和无线电等科，后期又增设英、德、法、日等外语教授班。军事教育课目区分学、术科，着重在军事教育训练，而政治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学科教育

学科方面教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与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学识，继教以战术、兵器、交通与筑城等四大教程。而军制学、交通学、军队内务规则、陆军礼节、军语与军队符号等，亦择要讲述。至于战术作业与实地测图，亦按步实施。

术科训练

术科训练内容为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与野外演习等。以单兵徒手教练，习各种步法暨转法，俟操作娴熟，施以班教练及排连营教练，如方向与各种队形之变换。徒手操作熟练后，继施以持枪教练，乃至单兵以至班排连营，凡托枪、下枪、举枪、装退子弹、上下刺刀、各种射击与各种行进，密集、疏开、散开等队形，以及各种战斗教练。除制式教练外，野外演习尤为重要。凡单兵战斗动作，以及行军宿营、战斗方式、连络勤务与构工作业等均按照教育步骤依次实施。此外，夜间演习、实弹射击与阅兵分列各项检查，亦确时教练。在术科方面，对于战斗教练与实弹射击二项更为要求，期能于短时间内收最大之效果。

学员生活

陆军官校在建校初期，学员的生活是艰苦的，学生的服装只是一套灰布的衣服，没有袜子，赤足穿草鞋，住在临时用芦席搭成的棚里，睡的是用竹子做成的床，求学期间，岛四面都是敌人，既要上课，又要打仗。在大陆时期，军校规定每天早上听到军号声起床、穿衣、打绑腿的时间只有3分钟，吃早饭只有10分钟。天气炎热，吃稀饭都会嘴烫。一些来自北方地区的学员还要适应广州的饮食。尽管环境险恶，但军校的日常训练却是严格的。许多学生在黄埔学习七八个月，却从未到过广州市区。

台湾时期

学科教育

在于建立内省的智慧，而军官养成教育贵在内化，进而塑造顶天立地、允文允武、术德兼备的干部，培养“勇、毅、稳、健”的军人气质。在大学部设有外文系、政治系、管理科学系、物理系、化学系、机械系、电机系、资讯系与土木系等九个系，在专科部（1978至2004）则设有企管科、机械科、电机科与土木科等四个科。

军事训练

在于精练体能战技，娴熟班战斗教练及相对编制兵器，以建立军事发展潜力为考量，置重点于培养对军事理论、兵学兴趣与基本战斗技能素养，奠定尔后教育及后续进修之基础。“入伍教育训练”为民转军的初体验，其教育训期共八周，课程排定以体能训练（陆军操、初步运动、战地运动、持枪运动、草坪运动、枕木运动、基本体能测验）、手榴弹投掷、五百米障碍超越、刺枪术等单兵应具之体能要求和初级战技技能课目为主，以奠定尔后军事训练之基础。“寒暑期军事训练”在每学年寒暑假期间实施，训期共计10周（含兵科见学暨军种交织教育），以验证班以下战斗教练、相对编制武器课程与三军联合作战之概念，强化军事基础教育。“分科教育”于完成学年教育后实施，训期共计半年，兵科有步兵、炮兵、装甲兵、海

陆、化学兵、工兵、财经、行政、经理、通信兵、宪兵与航空兵等类，其中以步兵、炮兵、装甲兵、与海陆为战斗主要兵科，而专科1至4期企管科分一般、财经组，财经组是先至财经学校接受学年教育，再回官校接受专精教育，依成绩及志愿分发各兵科学校训练。

步兵校歌：临阵当先，决战致胜，我们步兵为主兵；风雨不足畏，地形任纵横，勇猛顽强，歼敌建功，忠诚精实，名将多出自吾校，不怕苦，不怕难，光民族，复国土，碧血丹心，为国干城，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炮兵校歌：炮声隆隆，导弹升空，这是国军新炮兵。精研新学术，培育新精英，我们是胜利的先声。支援友军，以火力消灭敌人，重联战，讲协同，八二三，建奇功，严格精实，革新作风。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装甲兵校歌：勇猛顽强，迅速机动，发挥装甲兵雄风，恪遵我校训，浩气贯长红，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团结一致，发扬诚爱热精神，我们是锥之尖，我们是刀之刃，凭式飞轮，旋转乾坤，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海军陆战队校歌：万寿山前，太平洋滨。陆战精英，志豪气虹，发扬黄埔精神，三民主义是从，研习联合作战，精练两栖技能，誓永远精诚，为战斗先锋。振兴中华，促进大同。

生活管理

为了塑造学生良好品性与方便生活管理，学校制定了生活公约，要求学生履行。 生活公约内容为：身为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坚持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的荣誉信条，也不纵容他人违反；立志成为允文允武、术德兼备的军事领导人才；信守国家、责任、荣誉、牺牲、团结、勇气、自信的核心价值；具备领导管理、解决问题、语文沟通及持续学习四大能力；发挥“亲

爱精诚”校训；确定“我是最好的”认知；贯彻尊师重道、存诚务实的要求。

早期学生教育是铁的纪律胜过爱的教育，强调服从，入伍训练回话时，更只有“是、不是、没有理由”三句话，不准辩解。而黄埔十道菜又称“黄埔十大酷刑”，是家常便饭，它是陆官来台后早期干部创制，用于处罚学生之方式，强调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不过随着时代演变，现在陆官的教育较讲求人性化之管理。

棉被操：主要处罚内务整理不好者。将棉被盖在身上，头戴钢盔，在棉被内边唱军歌边做俯卧撑，或全副武装抱棉被跑步说我爱你与整叠棉被豆腐干。

大风吹：以最快的动作换床位，上下左右对调。有时甚至会玩到全连队都动了起来，如：第一排换第三排，第二排再换第一排。

灌唱片：以左手食指按在地上为圆心，人绕着自己旋转，大声唱军歌〈九条好汉在一班〉。

黄埔咖啡：又称“巴西咖啡”，主要处罚不依规定吸烟者。将数支香烟，取出烟草，全部用开水泡开，然后倒入钢杯中，甚至是钢盔中喝掉。另一种方式称作“北港朝天宫香炉”，是要求受罚者将许多支烟同时抽完。

人造卫星：这种体罚多半是针对部队行进间答数出差错的人。全连队的人在跑步时，被罚的人再绕着部队跑，像人造卫星一样。

跨海大桥：又叫“桂河大桥”。受罚者身体横跨水沟或两张床铺之间撑著。此外亦有进阶版，要受罚者做俯卧撑；这样的处罚好处是无法偷懒，因为偷懒与乏力者会跌到地下。

游龙地虎：又叫“环游世界”。受罚者由通铺的一端爬到另一端，然后再爬回来。

亲爱精诚：又叫“我佛慈悲”、“大发慈悲”，主要处罚礼仪不佳者。受罚者必须对着树木或柱子大喊数次至数百次“长官好”。

田边俱乐部：又称“五灯奖”，名称出自台湾田边制药赞助之台视综艺节目《五灯奖》。方法是受罚者仅著内裤，赤裸上半身罚站于厕所旁边唱歌、喂蚊子。

黄埔大地震：简称“大地震”。这是最著名的一道“菜”，阿兵哥多视如畏途。新兵训练中心的新兵几乎天天都会品尝到这道“菜”。当部队中有人物品失窃时，也会利用这方法寻找失物。全连的兵所有内务及私人物品全部集中，堆成一座小山，检查是否有违禁品（手机、香烟等），干部一声令下，限时归定位，否则重来一次。进阶版“大地震”是给一个完成不了的时间，玩到干部高兴为止。

黄埔寿歌

虽然入伍操练极为严格，但也注重学生休闲团康与庆生活动，而“黄埔寿歌”是入伍必教唱之歌，用于学校庆生聚会，并带入部队与官兵庆生活动之歌曲。

黄埔寿歌歌词-寿星的脸上微微笑，快乐的诞辰在今宵，祝福你、祝福你，祝你寿比南山高。花常好，月常圆，快乐诞辰在今宵；花常好、月常圆，快乐诞辰在今宵。寿星的脸上微微笑，快乐的诞辰在今宵，祝福你、祝福你，祝你寿比南山高。

创期史

陆官第1期

陆官第1期别称黄埔1期。民国13年（1924年）2月10日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

名额，拟订招324名，另备取50名，惟当时各省多在军阀掌握之下，不易公开招生，故委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3月1日，孙中山任命蒋中正为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与简作祯等人为试验委员。3月27日起三天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试验场，举行入学考，共计考生一千二百余人，4月28日放榜，正取350人，备取120人，加上保举共499人，组成学生总队，编成4个队，每队分3个区队，于5月5日入学，6月16日开学。时任校长蒋中正，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总队长邓演达，第一队队长吕梦熊，第二队队长茅延祯，第三队队长金佛庄，第四队队长李伟章。同年11月30日毕业考试及格465人，民国14年（1925年）5月19日颁毕业证书，6月25日补行毕业仪式。另有一说，由湘军讲武学堂并入的158人，四川第6队学生的22人也并计入第1期毕业，共645人均为步科。黄埔1期最年轻者为时年未满17岁的刘咏尧（1907-1998年），他将自己的年龄报大二岁方得入伍，艺人刘若英之祖父。年纪最长者为胡宗南（1896-1962年）于28岁时就学陆官，前国安会秘书长胡为真之父。而最后在世者为孙元良（1904-2007年）享寿103岁，艺人秦汉之父。

毕业证书有二式："毕业证书"在1924年11月30日发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学生。"卒业证书"在1925年3月1日发脩学期满考试及格学生。

陆官专科班第1期

陆官专科班第1期简称陆官专1期。甄试合格有一千二百余人，于1978年4月28日（外岛区4月27日）入营陆官东、南营区，同专科五校（陆官、政战、中正理工、国防医学院、宪兵）共二千余人于5月1日开学入伍训三个月，7月28日结训，1980年1月28日接受3个月专精教育，4月28日接受半年分科教育 ，1980年10月27日毕业任官少尉授二专文凭，毕业前三名为张堂贵、颜天与黄金庭，总毕业人数1058人。在学学制为二年半，学年教育以机械、

土木科八百余人编一个营5个连，企管科280人（一般组200人、财经组80人）由财经学校学年教育编2个连，许历农与朱致远中将为前后任校长，刘大君与刘宁善上校为前后任指挥官。毕业时机械、土木科797人与企管科一般组193人分发步、炮、装、海陆等兵科共990人，服役六年于1986年10月26日退伍，企管科财经组选财经兵科68人服役十年，总服役人数1058人。将领有王信龙上将、陈健财中将、白永成少将三人，而王信龙于2016年12月1日晋升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历任陆军司令、国防大学校长，更是陆军官校史上专科班出身的最高阶将领，也是中华民国陆军史上第一位专科班出身的上将。

为发扬黄埔精神与校训，凝聚革命情感，专科1期校友于民国101年（2012年）4月28日，在台中市潮港城国际美食馆成立“联谊会”，首届会长由罗财维担任，并通过组织章程、会旗制订与期徽释意：“青天白日国徽”象征效忠国家，保国护疆卫民之意；“亲爱精诚”为陆官校训；“陆军官校专科1期”为校名与期别；“五处盾形光芒”喻五种兵科为部队后盾，光耀1期；“嘉禾”象征国军以农建军，寓兵于民，祥瑞及丰收战果之意，二禾各七组穗粒喻示不管在校七连队同学或毕业后为七连队校友，均如嘉禾成长茁壮；并由专科一期于103年（2014年）12月14日主筹成立专科班校友会。

专科1期于2018年4月28日陆官入学40周年纪念日，上午在云林县二仑慢速垒球场举办连队慢速垒球赛，下午于剑湖山世界王子大饭店召开成立“同学会”，由陈世义主持，并办理联谊餐会，出席百余人，选出第一届理监事，复于2018年5月17日在台中市潮港城国际美食馆召开理监事会议，选出周志祥为首届同学会理事长。

各连人数：机械、土木科：专1连、156人。专2连、176人。专3连、155人。专4连、152人。专5连、158人。企管科：企5、6连：一般组、193人。财经组、68人。总计1058人。

毕业证书有二式："军职毕业证书"在1980年10月27日发毕业学生。"专科毕业证书"在1980年10月29日发毕业学生。

著名校友

中国国民党

在大陆抗战与国共内战时期担任指挥官，及来台湾后担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部长之高级将领有杜聿明、胡宗南、关麟征、黄杰、陈大庆、黄维、郑洞国、宋希濂、孙元良、李仙洲、毛人凤、张灵甫、李默庵、陈明仁、刘安祺、高魁元、康泽、郑介民、李延年、李弥、胡琏、唐生明、俞济时、戴笠、郝柏村、傅桓、蒋仲苓、王昇、沈发藻、刘戡、范汉杰、余程万、邱清泉、彭孟缉、罗列、于豪章、马安澜、黄幸强、陈廷宠、李祯林、汤曜明、霍守业、朱凯生、胡镇埔、赵世璋、杨天啸、陈镇湘、李翔宙、许历农、周仲南、丁渝洲、陈守山、马安澜、薛石民、郑为元、罗本立、高华柱等人。

来台后的陆军官校专科班仅开办了27年（期），也产生了二十多名将领，有王信龙（现任国防大学校长）、白永成、陈健财、邵定谦、黄国明、童盛雄、杨国隆、刘木聪、朱富圆、张性竹、房茂宏、古胜文、何启镇、沈能策、杨基荣、刘丰荃、丁大成、许静芝、赖荣杰、林帝志、傅政荣、黄世贤、张台松、俞文镇、庄有凯、林正廷等人。

中国共产党

陆官在实施清党反共与宁汉分裂前，方有师生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黄埔，

其担任抗战与国共内战时知名指挥官有左权、陈赓、徐向前、林彪、蒋先云、刘志丹、罗瑞卿、周士第、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杨至成、宣侠父、郭天民、陈奇涵、陶铸、郭汝瑰等人。

其他

立法委员：施明德、张光锦、王幸男、帅化民。苏进强（台湾团结联盟前党主席）。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江炳兴

韩国瑜：曾任高雄市市长，专修学生班第40期毕业。

纪念

校庆活动

每年的6月16日定为“校庆日”。1924年6月16日，现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陆军官校，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正式开学，他之所以择定陈炯明叛变事件两周年这天举行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旨在表明要记住沉痛的历史教训，坚决为递造一支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革命武装而奋斗。陆官在大陆时期，因战事多未能大型举办校庆活动，迁台后的首次校庆举办于1954年6月16日，同时也是陆官成立30周年的校庆，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亲临主持，与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一起在校庆中阅兵、校阅骑兵队，另外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少将也上台致词。此后每逢十周年，台湾高雄凤山陆官都会扩大办理校庆活动。

1954年6月16日，总统蒋中正主持陆军官校成立30周年校庆阅兵。

1969年6月16日，总统蒋中正主持陆军官校成立45周年校庆。

1974年6月16日，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主持陆军官校成立50周年校庆，由陆军总司令于豪章上将、陆军官校校长秦祖熙中将陪同与会。

1984年6月16日，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陆军官校建校60周年，陆军总司令蒋仲苓上将、海军总司令刘和谦上将、空军总司令郭汝霖上将均与会，黄埔老师何应钦上将上台发表谈话，黄埔老师顾祝同上将主持黄埔画展揭幕。

1988年6月16日，总统李登辉主持陆军官校64周年校庆。

1994年6月16日，总统李登辉主持陆军官校成立70周年校庆，国防部部长孙震陪同，总统检阅仪队外并致词。

2000年6月16日，总统陈水扁主持陆军官校76周年校庆，主持三军校阅仪式。

2004年6月13日，台北市大安区大安森林公园齐聚来自各地万名黄埔军校校友，举行黄埔军校建校80周年活动。

2004年6月14日，国防部部长李杰与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参观“黄埔军校80周年史迹展”。

2004年6月16日，总统陈水扁主持陆军官校成立80周年校庆，总统主持阅兵并致词。

2008年6月16日，总统马英九主持陆军官校成立84周年周年校庆，总统主持阅兵并致词。

2014年6月16日，总统马英九主持陆军官校成立90周年校庆，总统主持阅兵并致词。

2016年6月16日，总统蔡英文主持陆军官校成立92周年校庆，总统主持阅兵

并致词。

2017年6月16日，陆军司令王信龙上将主持陆军官校成立93周年校庆，阅兵并致词。

2019年6月16日，国防部部长严德发主持陆军官校成立95周年校庆，陆军司令陈宝余上将、海军司令黄曙光上将、空军司令张哲平上将、高雄市市长韩国瑜陪同，部长主持阅兵并致词。

纪念邮票

两岸官方在发行黄埔陆军官校的纪念邮票并不多见，在台湾有1974年6月16日，中华民国交通部发行陆军官校建校50周年邮票2枚，票面为黄埔陆官大门与凤山陆官大门全景。大陆在1994年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纪念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1枚，面值20分，票面为黄埔军校大门全景。此外，台湾的陆官校友会、大陆黄埔军校同学会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也会在纪念黄埔军校建校周年纪念，各自发行有关黄埔军校人物历史事件的邮票。

校友会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

1926年，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中正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除了清除国军干部中的中共党员外，成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以增进黄埔军校毕业生之间的感情，并清除中共在黄埔军校中的影响力。所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成员，需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蒋校长领导，严格禁止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违者以叛逆罪嫌惩处。

黄埔军校同学会

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作为宣传组织。在整风运动中，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的多名成员遭到整肃，活动中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后，至文革结束前，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没有继续活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黄埔军校同学会于1984年6月14日在中国大陆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黄埔1期徐向前任首届会长，程子华、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任副会长，黄埔老师聂荣臻、许德珩任顾问。

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

1990年，黄埔1期邓文仪以探亲为由，访问中国大陆，与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徐向前及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会面。在返回台湾后，推动台湾区的黄埔同学会成立。1991年1月1日，“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于台北成立，由邓文仪、袁朴、刘藩、刘咏尧、丁德隆等138人发起成立，邓文仪任荣誉会长及大会主席，第一任会长由蒋纬国担任。

陆军官校校友总会

“陆军官校校友总会”，其前身为陆军官校校友会，是“中华民国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人民组织团体辖属之分会。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于1988年9月3日在台北中山堂召开成立大会，陆官10期王多年担任第一届理事长，总会复要求于1988年12月4日在高雄县凤山镇由三百名校友召开成立“陆军官校校友会”，陆官14期刘戈仑任首届会长。而改制后的“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于2013年10月26日在台北新店彭园会馆成立，首任总会长由陆官40期胡筑生担任，前行政院长郝柏村、陆阶退役上将、历任官校校长等近一千五百人出席。校友总会每年定期召开会员大会，并于2007年起办理杰出校友表扬，校友总会宗旨在谋取校友权益福祉，增进同学情感，凝聚黄埔子弟的向心与力量。

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

“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于2014年12月14日在台中市召开成立大会，逾二百人与会，陆军官校校友总会副总会长吴斯怀将军出席指导，会中通过组织章程、会徽会旗之释义与制定，由专科1期罗财维担任第一届理事长。校友会之宗旨，在谋取校友权益，凝聚黄埔向心，与投入社会公益，并于2016年度起办理杰出校友奖章之表扬。

大事年表

西元　民国纪年　　大事纪

1921　民国10年　　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9天内进行了三次会谈，国民党的要员胡汉民、许崇智、陈少白、曹业伯、林云陔、朱卓文、李禄超、孙科等人参加，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

1923　民国12年　　8月16日，蒋中正奉孙中山命赴苏俄考察军事教育，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由上海乘“神丸”启程赴俄考察，12月15日上午07时返国船入吴淞口，09时抵沪，将对俄政策及对党务、军事意见上书孙中山先生。

1924　民国13年　　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等7人为委员。

1924　民国13年　　1月28日：孙中山指定黄埔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

1924　民国13年　　2月10日，预订招收学生名额，共324名。

1924　民国13年　　3月27日，黄埔军校试验委员会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入学试验，各地投考生计1千2百余人。

1924　民国13年　　5月2日，孙中山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官校首任校长。

1924　民国13年　　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进校，计正取生350名，备取生120名，加上保举共499人，编4队。

1924　民国13年　　5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入伍生开始预备教育。

1924　民国13年　　6月16日，第1期学生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主持，此后并以是日为校庆日。当日孙中山手书黄埔军校训词，由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邵元冲四人撰文，训词于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通过为党歌，1930年3月24日行政院暂定为国歌，1937年6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为国歌，中华民国国歌曾在1936年夏季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选为世界最佳国歌。

1924　民国13年　　8月10日，蒋中正奉令办理广东省商团私运军械事，于次日将私运军械之挪威船舰押到黄埔，停泊于校门外。9月3日，蒋中正派何应钦总教官筹组教导团。10月12日，蒋中正任命何应钦为教导团团长，任陈继承为教导第2营营长，王俊为教导第3营营长。10月16日，广州商团副团长陈受恭缴械乞和，商团事变遂告敉平。

1924　民国13年　　11月11日，孙中山令广州黄埔新军改称校军。

1924　民国13年　　11月17日，第2期学生先后入校者总计449名（第2期于民国14年9月6日毕业）。11月20日，教导团正式成立。28日任命何应钦为团长。11月30日，第1期学生教育时间为6个月，于11月30日毕业考试及格465人，均步科，隔年5月19日颁毕业证书，6月25日补行毕业仪式。另有一说，由湘军讲武学堂并入的158人，四川第6队学生的22人也并计入第1期毕业，共645人。

1924　民国13年　　12月2日，筹组教导第2团，原教导团改称为教导第1

团。

1925　民国14年　　1月31日，第2、3期及教导第1、2两团等单位，成立“校军”，举行讨伐陈炯明之誓师典礼。

1925　民国14年　　2月，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2月1日，校军开始第1次东征，讨伐陈炯明。2月20日，孙中山病危于北平，乍闻校军2月15日克淡水之讯，深感欣慰，及命随员电“校军”致贺。

1925　民国14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平。3月13日，校军教导第1团千余人，于棉湖之役击溃陈炯明之林虎部万余众；同日获悉孙中山逝世，全校师生至为哀恸。

1925　民国14年　　6月13日，东征军回师克复广州，讨平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部。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并发表成立宣言。8月20日，党代表廖仲恺被刺殒命。8月26日，各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中正任第一军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共5个军。

1925　民国14年　　10月6日，蒋中正自广州出发，再度东征，兵力2万人，俄顾问季山嘉等偕行。10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一纵队攻克惠州，俘敌4千余人；革命军团长刘尧宸阵亡。11月6日，东江陈炯明残余部队全部肃清。12月5日，蒋中正在潮安举行东征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1926　民国15年　　3月，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将黄埔岛陆军军官学校扩大改组，并且在同年3月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3月15日，确定两广统一的方案，广西政治、军事及财政均置于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之下。3月24日，军事委员会改编广西军队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命李宗仁为军长，两广统一遂告完全实现。

1927　民国16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分裂，发生宁汉分裂事件，于广

州、武汉和南京各有建立黄埔陆军军校。3月22日，武汉陆官改组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展开讨伐蒋中正的行动，后因续北伐，便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成张发奎的军官教岛团，迫使正在上课的第5期学生退学，至此，武汉陆官停办。是年底，蒋中正成立“（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8年3月，蒋中正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名义将“（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37　民国26年　　8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官由南京迁至成都。

1946　民国35年　　陆官改回“陆军军官学校”原称，蒋中正首次退位改任名誉校长，由陆官第1期毕业之将领关麟征担任校长。

1947　民国36年　　孙立人奉命在台湾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又称“陆军军官学校台湾训练班”）训练新军，是隶属于成都陆官的分校。

1949　民国38年　　12月，成都为解放军所占领，由中华民国举办的陆官停办，陆官在大陆共开办23期。

1950　民国39年　　3月1日，蒋中正发表了陆官复校的演说。8月，陆军军官学校复校后，首届校长由罗友伦中将接任。10月，位于台湾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正式复校。1951年4月，第四军官训练班的所有学员、教师及设施编进学员总队，并且成立第24期学生总队，其训练期为二年。

1954　民国43年　　6月16日，陆官迁台后的首次校庆，也是陆官成立三十周年的校庆。是年陆官的学制自第27期起，由两年改为四年，旨在文武合一。

1966　民国55年　　国防部长蒋经国命令将所有十三期起的兵科学校之“后补军官班”取消，转纳入为陆官开办的“专修班”制。

1975　民国64年　　第47期起，学制再延长为四年三个月。1976年，第48期起，陆官首次授予文学士的学位。

1978　民国67年　　国防部再将专修班改成“专科班”，并增设土木、机械、电机和企管等四科，是与大学部唯一授与文凭之班队，“专科班”为二年半学制，同年4月28日，陆官专科1期正式入学。专科1期以机械、土木科编一个营5个连，企管科于财经学校学年教育（代训）编2个连。服制章帜与正期班有所区别：领章是专科学生，一年级草绿服是白杠V字形，军便服是蓝杠V字形，二年级草绿服、军便服都是绿色横杠、军常服是金杠。1978至1981年，专科1、2期入伍训为三个月，设机械、土木科、企管等三科，电机科（专科1期无），专科1、2期企管科至财经学校接受学年教育，专科3、4期企管科一般组留校，财经组至财经学校接受学年教育，专5期起企管科不再分组统于陆官学年教育。专科班之兵科分科有步、炮、装、海陆等战斗兵科服役六年，财经组为财经兵科服役十年，军文凭毕业证书同为陆官。1978至1982年，专科1期至专科5期参加学校办理技能检定。国防部令陆官支援拍摄刘家昌导演的军教片电影“黄埔军魂”。

1979　民国68年　　5月18日，林正义（后改名林正谊、林毅夫）台湾省宜兰县人，陆军284师金门马山连连长，泅水叛逃至中国大陆，为台湾大学首位转读之陆官学生，陆官第44期第二名毕业。

1980　民国69年　　5月8日，专科3期入伍，入伍训改为二个月，首届企管科一般组改由陆官学年教育。民国71年5月，草绿服、军便服都改同正期班生是白色横杠、军常服是黑杠。1980年9月，神龙小组张辑善少校甄选专科1期步校20人及炮校4人训练，是陆官专科班神龙小组诞生始序。民国69年10月由专二、三期学生组成千人劈刺枪部队，先期配合侨泰演习操演，70年123自由日首度对外于台南市演出，并赓续于北、中、南县市表演。

1981　民国70年　　4月30日，专科4期入伍，首届由专科班毕业少尉专科1期返校带领专科学弟入伍。10月10日，专科3期参加台北国庆阅兵，为首次

专科班以整个连队参与国庆阅兵活动。陆官派出1个学生营辖3个连参加，第1、2连由学指部组成，第3连由专科3期编成。1982年5月专科3期与专科4期草绿服换挂同正期班白色年级臂章。

1983　民国72年　　10月，专科5期于高雄市立体育场担任侨泰演习千人刺枪术表演，为陆官单期首次千人表演刺枪期别。

1984　民国73年　　5月3日，专科7期一千五百余人入伍，毕业人数1565人。5月，专科5、6、7期换戴同正期班“学生”领章。

1984　民国73年　　6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由黄埔1期徐向前任首届会长。

1985　民国74年　　5月，专科8期入伍，首届由专科班在校最高年班专科6期带领学弟入伍，专科5、15期是两个未带专科入伍生之班队，而专17期是由卫武营士官带入伍之班队。11月，专科8期乙班入伍，为陆官首届因学员不足补梯次招生，原5月入学专科8期改称（甲班）。

1986　民国75年　　05月9日，专科9期1572人入学，为陆官专科班最多人数之期别。

1988　民国77年　　6月16日，总统李登辉参加陆军官校64周年校庆。12月4日：“陆军军官学校校友会”在陆军官校凤山成立，由黄埔14期刘戈仑任首届会长。

1990　民国79年　　1月起，73年班（含）以前领取战士授田凭据补偿金。2月9日，退辅会从民国79年2月9日后（专科81年班含），服役未满10年者，不予核发荣誉国民证。“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荣誉国民证制发作业规定”10月21日：“汉疆演习”机降“钓鱼台”，护卫台湾区运圣火登岛宣示主权，这是陆官专科班干部最接近临战的一次。突击队队长为陆军独立第62旅步4营45连连长，专科6期关至德上尉。

1991　民国80年　　1月1日，台北成立“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由黄埔1期邓文仪任荣誉会长及大会主席，第一任会长由蒋纬国担任。1993年，正期班之毕业中尉任官，自正62期起改少尉任官。1994年，正期班第67期招收女性学员。1998年，招收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学生。1999年，国防部将校枪由57式步枪换装为65K2式步枪，并统一将军职兵籍名牌号码与身份证字号结合使用。

2000　民国89年　　6月16日，总统陈水扁参加陆军官校76周年校庆。

2003　民国92年　　4月，军方依2000年民进党陈水扁执政后要求对废除“踢正步”进行调整研究，在总统府军事会谈中，陈水扁核定废止国军“踢正步”，国防部再下令以踢正步违反人体工学废除国军此项训练，部队一体适用。民国70年初专科二、三期时已有参加台北国庆阅兵典礼。

2004　民国93年　　7月1日，专科1期王信龙晋任少将，为陆官专科班首位将军。7月12日，专科末届第27期入学后，陆官取消了专科学制，继后的专科班迁往“陆军专科学校”（陆军士校改制）继续招生。

2006　民国95年　　8月，国防部精进案实施，并将各官校校长的官阶降为少将。时任官校校长王根林提前于7月1日退休，校长一职暂由陆军副总司令贾辅义代理一个月。8月1日，首任少将编阶校长陈良沛（陆官48期）上任，他也是第一位出生于台湾的校长。

2007　民国96年　　11月7日，帽制更改，民国96年11月7日总统华总一义字第09600147261号令公布陆海空军服制条例，国军所有中校（含）阶的军官，所穿戴的“大盘帽”、“军便帽”均都加“帽饰”……，故同上校帽子已统一式样，即帽檐开花。

2011　民国100年　　1月3日，专科2期邵定谦为陆官专科班毕业生首任军事院校(装甲兵)校长。7月23日，专科5期庆祝建国百年返校参访，与会近八百人，创陆官单日单一期别返校人数最高记录；同日专科5期制颁纪念章，

为专科班首座襟授纪念章。

2012　民国101年　 1月1日，专科1期王信龙晋任中将，为陆官专科班首位中将，并于7月2日接任国防部人事参谋次长。1月8日，专科班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于台中市西屯区东海渔村花园婚礼会馆办理一百年度年终联合餐会，与会七百余人，为专科班毕业后首届人数最多聚会。2月18日，专科5期成立专5期文物馆，为陆官专科班首设文物专网。10月24日，专科5期成立专5期行义团，为陆官专科班首设行义慈善团队。

2013　民国102年　 10月26日，“陆军官校校友总会”在台北新店彭园会馆成立，总会长由胡筑生担任，前行政院长郝柏村、陆阶退役上将、历任官校校长等近一千五百人出席。

2014　民国103年　 6月14日，为纪念黄埔军校90周年校庆，台湾举办黄埔军校创办90周年学术讨论会。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了纪念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2014　民国103年　 6月16日，总统马英九主持陆军官校成立九十周年校庆暨三军官校联合毕业典礼。

2014　民国103年　 12月14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专科班校友会”于台中市潮港城国际美食馆召开成立大会，由专科1期罗财维担任第一届理事长，会中通过组织章程、会徽会旗之制定。

2015　民国104年　 5月19日，专科4期詹彦峰于陆官母校设立“崇学奖学金”，鼓励后进崇学尚武之精神，为专科班首次成立之奖学金。

2016　民国105年　 6月12日，陆官校友总会致旗，由陆官专科班校友会筹组“中兴演习-正步队”参加台北“612凯道阅兵”活动。

2016　民国105年　 6月16日，总统蔡英文参加凤山陆军官校校庆。

2016　民国105年　　12月1日，陆官专科班第1期王信龙晋升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担任陆军司令，是中华民国陆军官校史上专科班出身的最高阶将领，也是中华民国陆军史上第一位专科班出身的上将。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

https://zhuanlan.zhihu.com/p/32262739

黄埔军校究竟有多牛？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说起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名满天下，从这所军校走出的大批军事人才，沙场建功，政坛驰名，在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出出风云激荡的活剧。特别是在国民党的中央系中，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更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亲信，成为他最为倚重的力量，这其中也涌现了众多名闻遐迩的著名将领。

黄埔军校：只在黄埔开了六年，办了七期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所以在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中，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并且分别成为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的中坚。

黄埔军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只是因为校址在黄埔长洲岛上而被叫做黄埔军校，而这个完全是非正式的名称却远远比正式的校名要有名的多。不过真正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从1924年6月开学到1930年9月迁往南京，实际总共只有七期，时间跨度也只有短短的六年多，其中在大革命失败前毕业的只有四期。第五期、六期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开学，七期更是是在国共分裂前才开学的。而且从第五期开始，已经在广州黄埔和南京两处同步开班。所以确切来说，真正能叫黄埔军校的就只有前四期，勉强算上还有部分在黄埔开班的五期、六期和七期，也不过七期，这七期毕业的学生全部加在一起也只有12887人。

但是后来在南京、抗战时在成都，甚至到了台湾凤山延续下去的这所军官学校，都被称为“黄埔军校”，因为这所军校实在太出名了！

在黄埔军校的领导层中，就有蒋介石、廖仲恺、周恩来、李济深、邓演达、王柏龄、戴季陶等人，在教官中有何应钦、叶剑英、陈诚、包惠僧、顾祝同、聂荣臻、张治中、叶剑英、陈继承、陈果夫、刘峙、严重、蒋鼎文、钱大钧、恽代英、肖楚女、周佛海、张国焘、张申府、陈毅、高语罕等人，而在学生中的名人就更多了，如此豪华的师生阵容，和当时中国其他著名的军校相比，无论是保定军校也好，还是云南讲武堂也好，都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30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黄埔师生联手上演的一出出风云激荡的大戏。

名将辈出的摇篮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如此名声显赫，国共双方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身于黄埔，尤其是在国民党军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更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形成了国民党军的“黄埔系”，确切来说，在中央军中的非黄埔出身的不能称为黄埔系，同样在地方杂牌军中的黄埔出身也不能称为黄埔系。只有中央嫡系中的黄埔出身的将领才能被称为“黄埔系”，这是蒋介石最可倚重的嫡系。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关系是相互利用。一方面，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起家，“黄埔系”成了他维持统治的基础力量；另一方面，“黄埔系”的成员也要依靠蒋介石来实现自己在仕途上的步步高升。蒋介石也确实对“黄埔系”格外器重，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各方面都大加关照，给与种种特权；而“黄埔系”也效忠蒋介石，甘愿为其所用。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中“黄埔系”可谓是一枝独秀，将星如云。1935年4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之前混乱不堪的军衔进行整顿重新铨叙，在第一批9名一级上将中，何应钦一人是黄埔教官出身；在第一批20名二级上将中，有刘峙、顾祝同、蒋鼎文三人是黄埔教官。在第一批89名中将中，不算陈诚等教官，仅黄埔学生就有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等三人，后来还有俞济时补叙中将，共4个黄埔学生。在首批少将，有桂永清、黄杰、李玉堂、黄维、霍揆彰、关麟徵、宋希濂、陈琪、刘戡、王敬久、孙元良等人。而此时距离这些学生离开黄埔军校才只不过十年光景，从刚毕业时的少尉中尉，十年之后就升到了少将中将，这样的升迁速度即使是在战时也是相当惊人的。

“黄埔系”在国民党军本来就有超然的地位，出现大批将军也在情理之中。同样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也有大批出身黄埔军校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宣布了36位军事家的名单，其中就有14人是黄埔出身，超过了三分之一。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出自黄埔军校的不完全统计，就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等5名元帅；陈赓、罗瑞卿、许光达等3人大将；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杨至诚、宋时轮、陈伯钧、郭天民等8名上将；阎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际、曾泽生、倪志亮、郭化若、谭希林、王诤等9名中将；袁也烈、曹广化、李逸民、方之中、洪水、廖运周、张开荆、周文在等8名少将，还有数十名担任中央部级以上党政职务的。另外，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左权、刘志丹、卢德铭、李之龙、蒋先云、金佛庄、曾中生、许继慎、方志敏、伍中豪、王尔琢、周逸群、刘畴西、蔡申熙、段德昌、赵尚志、赵一曼等人也都是黄埔出身。

黄埔军校短短六年就出现如此众多的将领，这样的成就也绝不比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军校等知名军校逊色。

有人和更有天时

最初黄埔军校的学制只有半年，只是培养基层连排级军官的短期培训班性质，却能培养出如此之多的将军，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

首先是师生素质较高，教官大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还不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海归精英，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际带兵的经验。学生都是八方英杰，完全是抱着“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的报国热忱来到黄埔。就以第一期为例，申请就有3000人之多，而实际录取的还不到500人（后来还并入了军政部讲武堂学生120余人）。报考黄埔军校至少要经过三关，先是各省初试，合格后再到大地区（如上海、重庆）进行复试，最后是在黄埔军校进行总考试。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先在各自部队进行初试，合格者才送到军校进行复试。至3月底报考总人数已远远超过预期，还有不少人托关系走门道，一时间各种关系的推荐信满天飞，已至于军校试验委员会不得不于4月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谢绝各方推荐信函，声明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3月27日，黄埔军校以广东大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为考场，举行最后一关的入学考试。考试内容有作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分笔试和口试两种。参加考试的有1200多人，考试整整进行了3天，1200人中有三分之一

是中学及专科学校毕业生，在当时情况下绝对是社会的青年才俊，平均素质相当高。再经过军校严格的军事教育，自然都是真正的人中俊杰。

除了师生素质不同寻常，黄埔军校诞生的时候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风云激荡的年代，本来就是孙中山为了给北伐培训军事骨干而创办，军校几乎从建校开始就投身于血与火的战场，开学典礼才四个月后，黄埔军校师生就会同广州工团军、农团军和部分从韶关回师的北伐军一举平定了广州商团的叛乱，第一次经历了实战的磨练。随后于1924年11月，也就是开学半年后就成立了教导团，并作为主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先克淡水，再战棉湖，击溃陈炯明部主力，而教导第1团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全团伤亡过半，9个连长6死3伤，伤亡最重的3营营党代表、副营长阵亡，3个连长2死1伤，9个排长7死1伤，全营385名士兵战后仅剩110人。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又马上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叛乱，接着第二次东征，收复东江地区，彻底肃清陈炯明部。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此时黄埔军校已有4期学员毕业，第5期在读，第6期在进行入伍生训练，加上军士教导队、高级班和各分校学员，总数达3.3万人，直接参战的黄埔师生相当于2个军，而且其中很多人担任北伐军的各级军事主官和党代表，使北伐军的军事和政治素质都大为提高，北伐军仅用了一年就席卷东南各省，连克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从南国的百粤之地到饮马长江。北伐战斗之烈，胜利之迅，军威之盛，堪称奇迹，而黄埔师生在其中居功至伟，同时牺牲也最为惨烈。

两次东征和北伐，黄埔师生牺牲的就有近3000人！其中第1期牺牲300人、第2期牺牲200人、第3期牺牲500人、第4期牺牲700人、第5期牺牲300人，几乎占这五期毕业生总数的27%！接着又是第一次国共内战、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连年的征战，是时代的选择，也让黄埔师生从沙场征伐中脱颖而出，这也正可谓适逢其时。

（引文结束）

。。。。

关于黄埔军校的简单反思

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黄埔军校官兵们的人生，是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缩影。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们的人生故事，显明了中华儿女们为了寻求真理、公义，而甘愿抛弃小我、甚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而寻求救国救亡之道路的执著精神。今天，当我们抚今追昔的时候，更应当以严谨认真、谦卑诚实的心灵、来从历史的迷雾中，从人生的激荡

故事中，寻找到关于人生、信仰、与国家、社会、民族的真理与真谛。

北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9%9D%A9%E5%91%BD%E8%BB%8D%E5%8C%97%E4%BC%90

国民革命军北伐，又称国民政府北伐、中国国民党北伐，是1926年至1928年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动之内战，因为国民革命军战场由南向北推进，故又简称“北伐”或“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担任总司令，起兵广东，连夺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至华中，国民政府内部因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态度不同而分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复合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加入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后，1928年6月攻克北京。奉系军阀、安国军总司令、安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从北京撤往东北，

随后因皇姑屯事件被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底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在北伐战争中，除了透过直属的国民革命军，也吸收中国各地反北洋势力，成功将北洋军阀及其掌控的北洋政府瓦解。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中国统一，成为中国在国际上唯一代表的政权。

历史背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引发各地连串反清，是为辛亥革命，次年中华民国成立，南京的民国临时政府与北京的清廷北洋军领袖袁世凯达成南北议和，由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换得满清宣统帝逊位。为限制袁世凯，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体。

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束，代表南方革命势力的国民党取得议会多数。国民党干事长宋教仁在赴北京组阁途中，被暗杀于上海。国民党断言袁世凯是暗杀主谋，与其势成水火，发动一系列战争反袁及其后的北洋政府。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元洪宪，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护国运动。1916年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响应，江苏都督冯国璋、江西都督李纯、浙江都督朱瑞、湖南都督汤芗铭、山东都督靳云鹏等五大帅联合逼宫，而且各国公使纷纷表示反对，3月袁世凯下令撤销洪宪帝制，6月6日忧愤而卒，袁世凯逝世之后，北洋军人各行其是，内部分裂，形成三股主要的势力：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曹锟为首的直系和张作霖为旁支的奉系。他们为控制北洋政府而多次混战。

1919年，孙将革命势力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代初，孙在苏联帮助

下，组建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本属一种策略，并非放弃其原有立场，共产党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秘密组织党团，把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分为左右两派，联络左派，打击右派，制造党派分裂。1925年7月1日，在讨伐陈炯明后，蒋介石在广州改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为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全国革命形势，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成立，组建国民革命军，为北伐战争准备条件。在广州，革命政府根基尚未稳固，地方军阀仍然盘踞广东各地，尤以东江地区之陈炯明势力最强，威胁最大。

1920年，曹锟与段祺瑞爆发直皖战争。1922年，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张作霖击败直系吴佩孚。

12月4日，孙抵天津，受到盛大欢迎，因劳累并受风寒，身体感觉不适。12月31日，孙扶病至北京，发表《入京宣言》，及对欢迎民众之书面谈话。孙坚持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段祺瑞却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

1925年1月1日，孙因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不能饮食，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救治无效。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逝世。早在孙中山生前，不少中国国民党员已反对改组，孙死后中国共产党员势力扩张，反共人士被迫离开广东。

11月，旅居上海、北京等地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决定取消容共政策，另设中央党部于上海，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不予承认，指为非法，中国国民党遂开始分裂。

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同月，蒋中正率黄埔军校师生共三千人攻打陈炯明，巩固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地。国民革命军东征打败陈炯明，至1926年初，广东全省底定，李宗仁也统一广西，并归附国民政府，两广革命根据地统一，奠定基础发动北伐战争。1925年7月，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

帅大本营改组，并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黄埔学生军和辖下各地方部队。中国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组织国民革命军，并得到苏联派遣顾问及提供武器弹药等援助。同时，加大收编南方各省降部，何应钦、谭延闿、程潜、吴铁城、唐生智等中国近代著名人物，均于此时加入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直至1926年7月，国民政府共收编扩充国民革命军至八个军。

江浙战争

1925年10月，吴佩孚、孙传芳指挥直系军阀于长江流域争夺北洋政府领导权，向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发动反奉战争。1926年4月，国民军撤出北京和天津，退往河北西北部及山西北部，驻守南口、多伦一带；直军、奉军和晋军组成联盟进攻国民军，双方在南口一带激战，到8月国民军不敌，退往绥远、甘肃；吴佩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全力对付国民军而无暇南顾，牵制北洋军阀大量兵力，予北伐军以可乘之机。北洋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削弱，无力顾及国民政府。

在国民政府北伐之前，当时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呈现多方格局，国民政府控制两广一带。1926年奉系张作霖称霸于北方，号称兵力35万。张作霖掌控北洋政府，并辖有华北、东北等地。直系吴佩孚再起后，割据中原，兵力约20万。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和河南三省以及河北、陕西部分地区，同时握有京汉铁路。在东南方面，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约22万。孙传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控制苏浙沪赣等地。三大集团形成鼎足之势，其兵力虽远超广州国民政府，但彼此对立，未能团结一致；此外，国民军倾向革命盘踞西北，而湖南军阀唐生智又愿意归附，都有利于北伐。阎锡山掌握山西。

孙中山一贯主张发动北伐战争以统一中国，在1917～1924先后组军发动三

次北伐（第一、二次护法运动和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皖奉粤联军）。但却先后失败于1918年的南北军阀议和与七总裁制、1922年的六·一六事变及1924的广州商团事变。

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经过

苏联对北伐的态度

1920年代，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最大威胁始终是日本，因此从中国各路势力中寻找反日派系并大力扶持，是苏联外交的核心。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各路军阀中，奉系和皖系残余是亲日派，直系军阀与日本关系最差但其同时对苏联也颇为冷淡，政治倾向亲英美。因此，此时苏联的扶植对象是北方的冯玉祥和南方的汪兆铭、蒋中正（国民党内高层最反苏的许崇智、胡汉民因廖仲恺被刺案已被迫下野），积极参与筹备国民政府北伐。不料，1925年10月10日，江浙军阀孙传芳（直系）突然联合皖、赣、苏、闽组成五省联军起兵反奉，并邀同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出山，吴通电受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兵讨伐奉系张作霖。这一事件使苏联对北伐态度立即逆转，接替鲍罗廷担任联络的季山嘉表示强烈反对北伐。蒋中正对苏联的态度变化大感意外，但他并不了解，季山嘉的态度实际上是莫斯科的意见。因为全力策划反奉战争的莫斯科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吴佩孚、孙传芳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最严重时甚至可能逼迫直系奉系军阀合流共同对抗北伐军。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

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

根据文献记载，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等，中共当时支持和积极配合在广东的国民政府准备北伐。2月，在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提出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主张。3月，蒋怀疑中山舰叛变，逮获中共党员，又限制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中之活动，鲍罗廷力主暂时退让，汪精卫称病出国，蒋掌握大权，仍采容共政策。1990年代起有学者对于以前有观点称陈独秀反对北伐提出反对意见，列出证据认为总的来说陈独秀是赞成北伐的。

誓师北伐

1926年5月，湖南代理省长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5月，北伐军先遣部应唐生智请求进入湖南，进展顺利。与此同时，随着湖南形势的恶化，吴佩孚命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率部进攻唐部。至5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旅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叶挺独立团先期入湘，增援唐生智部，打开北伐前进道路。以防御吴佩孚军队进攻。6月初，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分别在渌田和金兰寺等地击溃叶开鑫一部，双方对峙于渌水、涟水一线。

1926年6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4日，在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向北洋政府发动北伐的理由，其中提到："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宣示北伐之目的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寻求中国之统一和独立自主。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决定采取集中兵力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歼灭吴佩孚军，然后消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初期策略是："先

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国民政府以两广为基地，以主力进军湖南。北伐军兵分三路：主力部队进攻湖南、湖北；中路进入江西；东路驻守广东东部，伺机进入福建。

进军湖南、湖北

在民众大力支援下，北伐军进展迅速。1926年6月初，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分别在渌田（今湖南安仁北）和金兰寺等地击溃叶开鑫一部，双方对峙于渌水、涟水一线。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高州和琼崖两地开拔援湘。7月，北伐军攻下长沙，贵州、四川等军阀宣称归附。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第八军分别在安仁、永丰（今湖南双峰）地区集中后，分路并进。第四军克醴陵，第八军三个师占湘潭，另两个师和第七军一个旅攻宁乡。7月11日，国民革命军进占长沙，迫叶开鑫部退守汨罗江北岸。8月，北伐军攻下湘北重镇岳州，吴佩孚匆忙率兵南下增防。8月12日，国民革命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直取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集结醴陵、攸县，对江西警戒；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8月19日，第四军攻克平江，向通城进击；第七军占领浯口，向羊楼司进发。8月22日，第八军攻克岳阳。叶开鑫部万余人退据粤汉铁路上的要隘汀四桥，吴佩孚急调一个混成旅和一个团驰援，企图凭险固守。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六个团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不克。吴佩孚亲临督战，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互有胜负，湖北汀泗桥几度易手。8月27日，张发奎亲督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迂回吴军侧后，突然猛攻，占领汀泗桥。吴军前后受攻击，退守贺胜桥。吴佩孚亲率两个师增援。

8月3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与吴军展开激战，第八军首先攻入吴军阵地，其他各部随即扩大战果，取得贺胜桥大捷。8月底，北伐军攻下通下往武汉之险要门户汀泗桥和贺胜桥，吴军兵败如山倒，从此一蹶不振。

吴军退守武汉。9月1日，第四军、第七军逼近武昌，9月3日、9月5日两次攻城不克，遂封锁围困。这时，汉阳守军一个师起义，吴佩孚率一部退往河南信阳。第八军9月6日进汉阳，9月7日占汉口，主力乘势进占武胜关。10月初，武昌守军曾两次突围失败。10月8日，守卫城南的吴俊卿第三师准备投诚，10月10日，他打开城门迎接北伐军入城，当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二万多守军全部被歼。生擒刘玉春、陈嘉谟，至此吴佩孚在武汉军力被全部消灭。北伐军占领两湖，声威大振。

进攻江西

北伐初期，孙传芳按兵不动，拟坐收渔利，到北伐军攻下长沙，才派兵增援江西，同时令闽军进犯广东。8月下旬，孙传芳见吴军濒于崩溃，决定从江苏、浙江、安徽调兵十万，会同驻江西部队两万余人，向南浔铁路沿线和江西湖北边境集中，企图截断武昌至长沙铁路，攻取湖南、湖北。蒋于击破吴佩孚后，决进取江西，兵力约五万人。北伐军进抵武汉后，也调兵进攻江西，与孙军发生激战。在江西南部，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协同独立第一师攻占赣县（今赣州市）后，沿赣江北上。在江西西部，第三军和第二军主力出萍乡，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今江西新余)与孙军激战后，分别向高安、樟树（今樟树市）进发。在江西西北部，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先后攻占修水、铜鼓、高安。孙军虽在兵力上占有优势，但指挥不统一，未能协力作战。9月19日第六军第十九师乘势攻占南昌，遭孙军反扑，加之增援的第一军第一师又在牛行（今属南昌市）战败，乃于9月24日退向奉新。蒋加派援军2万人。

10月上旬，第二军主力攻占樟树、丰城，第三军歼灭孙军一部于南昌西山万寿宫地区；由湖北东南部进入江西西北的第七军，在箬溪重创孙军一个师后，攻占德安，形成了围攻南昌的态势。由于孙军回师救援，国民革命军各军又未协同，德安得而复失，第六军攻永修失利，第三军在牛行、乐化受挫。这时，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冒然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被迫于

10月13日撤退。南昌又为孙军夺回。国民革命军吸取教训，决心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之敌，尔后再图南昌，并调第四军由湖北入江西。10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在第二军配合下攻克临川（今抚州），截断江西福建通路。10月，蒋下命令进入福建部队，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调往江西参战；先后攻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孙传芳乞和，蒋拒绝。11月2日开始第三次进攻南昌。第七军再克德安，第四军攻占马回岭，两军又在德安南面的九仙岭击溃孙军两个师，截断南浔铁路。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军负嵎顽抗，蒋亲临督战攻克，孙传芳在江西军力被全部消灭。永修、乐化等地孙军溃逃，在滁槎附近被歼一万五千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歼灭守军万余人。蒋通电各省促人民自决。孙军残部败退安徽南部及江苏浙江一带。孙军大溃，精锐尽丧，为北伐以来规模最大战役。

占领福建

孙传芳军驻福建的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周荫人部四个军三万余人，为策应江西作战，进军粤东，试图将国民革命根据地连根拔除。然而消息于进军前已透露。

1926年9月，蒋命令潮汕部队进攻福建。10月上旬，攻占广东蕉岭、松口、饶平等地。由于周荫人于直隶出生，对闽系来说是客军而非地主，因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决定主动出击击溃其主力，同时蒋介石也派遣李大超前至闽军中收买分化。10月中旬，何应钦整合广东保安团与黄埔军校在学生作为防御主力，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则作为攻击矛头，于10月9日和第十四师主力进袭击周部后方，占领永定，然后回师松口；此时，周部第二军两个师在蕉岭起义，并配合作战，歼灭周部第三军。在福建方面，由于闽军平日横行霸道，民怨极深，各地民军蜂起。由于周部于福建之风评不佳，在永定战斗之役遭受国民革命军与城内民众的联合夹击崩溃，仅带少数侍卫逃出。是日，第十四师冯轶裴则于击溃闽军刘云峰旅。此役国

民革命军俘虏4,000人，缴获4,000余支枪械与十多门火炮。周部第四军和第二军残部退往长汀。北伐军势如破竹，闽军望风而逃。10月13日，第一军于梅县松口战斗击溃刘俊、李宝珩旅，在不到一星期，周荫人主力已损近半。受此影响，曹万顺与杜起云两旅于10月17日接受国民政府收编建议，倒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何应钦则升任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挥军福建。10月下旬，第十七军由上杭沿汀江两岸向北推进，在由江西入福建的第十四军第二师配合下，相继占领龙溪、晋江、莆田、永泰，逼近闽侯。

蒋令入闽部队在攻破周荫人主力后赴赣参战，先后攻下樟树、丰城、建昌、德安、永修、抚州。11月，先后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12月初，自江西东部入福建的第二军第六师进占建瓯，切断福建、浙江孙军的联系。驻福建海军第一舰队起义，于12月2日决定接受广东国民政府改编。周部驻闽侯一个旅投诚，国民革命军于12月9日占领闽侯，周部退往浙江。东路军于12月间占领福建全省，向浙江挺进。

攻取南京

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企图乘机夺占孙、吴的地盘，几一部接防江苏、安徽北部，一部入河南增援吴佩孚。孙传芳收集残部八万余人，分布在沪宁铁路、沪杭铁路沿线和安徽南部地区。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分三路进军。中路军（分江左军和江右军）分别由湖北、江西沿长江向安徽、江苏推进，主攻南京；东路军由福建、江西分路入浙江，进军淞沪，助攻南京；西路军由湖北入河南，钳制北面之敌。1月上旬，东路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富阳遭孙军一部反击，退至衢县（今衢州）。1月27日，第一军协同第二十六军反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2月上旬，进占金华、兰溪，继而在桐庐和富阳击败孙军，2月18日占领杭县（今杭州）。2月底，国民革命军占领浙江全境。3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3月20日，一部经太湖以西进占武进（今常州），截断

沪宁铁路，主力连克松江、吴县（今苏州），逼近上海。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员会决定于当日把工人罢工转入工人武装暴动。计其武装：手枪二百五十支、手榴弹二百枚。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两天一夜占领上海后，东路军才开进市区。中路军(第二军、第六军)的江左军由湖北东部向怀宁（今安庆）挺进，孙军陈调元、王普等部相继起义，怀宁不战而下。中路军的江右军从江西境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3月23日占领南京。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导致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死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蒋拒绝孙传芳求和。3月底基本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军队。

夺取政权与国共分裂

自北伐展开后，中国共产党员加紧夺取领导权，与中国国民党斗争日趋激烈，1927年2月在鲍罗廷控制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设武汉，议决削减蒋权力。1927年3月10日至3月17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中国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中国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在北伐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共产党策动工人起事，企图夺取上海政权，引起商民疑虑。3月24日，发生南京事件，国民党中右派势力称中国共产党策动部分国民革命军针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寺庙、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进行烧杀打劫等排外运动。

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北伐途中剥夺蒋主席职

务，降其为普通委员。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

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指责中国国民党内之中国共产党员受共产国际指使，破坏国民革命，要求对“中共首要”采取紧急处理，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党（或谓四一二政变），4月18日另立南京国民政府。设“清党委员会”，实行武力清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缉捕中国共产党员。鲍罗廷也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中共土地改革路线为：“有土皆豪，凡绅必劣”。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达成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协议。4月6日，“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蒋于北伐途中清党，张作霖即于北京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表明与国民革命军皆反共，不必互相为敌。张作霖得到公使团同意，搜查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58名中国人。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发现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打电报给当时尚是革命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还清查出苏联企图赤化中国之千余文件，查获并向外界公开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企图取代北洋政府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文证企图汇编”），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中国政府的运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4月，汪精卫回国，秘密前往武汉，武汉国民政府迎汪复职，“四一二事变后”开除蒋介石党籍，下令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也调兵遣将，对武汉政府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史称“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此时武汉政府仍受鲍罗廷及共产党员控制，共产党员在湖南、湖北积极推行工农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和没收地主土地，引起军人反抗。当时，入河南奉军五个军约十万人，分布在西平以北铁路线及开封、郑县等地，企图南犯。国民革命军由唐生智率三个纵队五万余人，从驻马

店地区分路北进。

继续北伐

1927年5月，蒋决定继续北伐作战方案，分全军为三路进攻。北伐军先后克复扬州、泰州、徐州、蚌埠。

5月中旬，第二纵队歼灭奉军七个团占领西平、漯河；第一纵队击败奉军一部于上蔡，迫其一个旅投降。奉军约七万人，企图在临颖决战。5月27日，第二纵队发起进攻，受挫，第一纵队驰援，奉军伤亡逾万，向北撤退。5月28日，唐生智部占领临后，分别向郑县、开封挺进。冯玉祥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后，进军甘肃、陕西，转师东进，5月27日攻克洛阳，6月1日与唐生智部会师郑县。6月，克复郑州、许昌。6月7日，清江浦克复，孙传芳通电下野。6月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开封，奉军败走河北、山东。不久，吴佩孚率少数卫队逃往四川。7月，"云南易帜"。四川刘湘通电归附中央。

汪精卫认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受共产国际指使，其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政策，危害国民革命事业，遂决心清除党内中国共产党分子。7月中旬议决取缔共产党，罢免中共党员职务。8月1日，中共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事，武汉政府下令讨伐。7月21日，国民革命军在临城被直鲁军打败，撤往徐州。8月6日，国民革命军又在徐州中败败于直鲁军，被迫南撤。武汉分共后，南京与武汉政府酝酿妥协。8月13日，由于作战指挥失利等原因，蒋中正通电下野辞总司令职，武汉政府宣布迁设南京。至8月19日，宁汉复合。

徐州战斗以后，孙传芳乘机率安国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渡过淮河，攻占滁县、宝应，直抵长江北岸的浦口一带，南京一带长江北岸尽为安国军所陷。武汉方面的"东征军"也向长江下游推进，有合击南京之势。安国军、五省联军于8月24日南渡长江，攻占南京以东的乌龙山、栖霞山。26日，安国军攻占龙潭。27日，夏威率国民革命军打败安国军，取得栖霞山战斗的

胜利。此后国民革命军与安国军反复争夺栖霞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刘峙等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第七军最后于8月31日打败安国军，取得龙潭战斗的胜利。孙传芳率安国军北撤。此战奠定南京国民政府的基业。

统治中国

9月10日，国民革命军在全椒打败安国军。安国军一路北撤。1927年12月3日至12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会议最后一天恢复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进南京呈报正式复职。此时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均愿意归附。蒋致电冯玉祥、阎锡山及各将领准备北伐。2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命统归蒋指挥。

1928年4月，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及李宗仁共同讨伐张作霖。国民革命军所向克捷，连续攻克郯城、台儿庄、郓城、韩庄、临城、枣庄。第三军团在鱼台失利，蒋电令各军赴援。张宗昌下总退却令，惟孙传芳纠集余部，尚图顽抗。是月下旬，屡次攻克巨野、嘉祥，经西关攻克济宁、滕县、界河、鱼台、汶上、邹县、大名。连续攻克宁阳、兖州、曲阜、金乡。连续攻克莱芜、平阴、泰安、肥城。张宗昌部败退滦州，孙传芳在北京宣布下野，张、孙残部向国民革命军投降。

日本为干涉国军北伐，借口保护侨民，派军登陆山东，进驻济南，伺机寻衅。日本于1928年4月19日决定再次出兵山东暗助军阀张宗昌，4月21日驻天津的3个步兵中队抵达济南，4月25至27日，日军又连续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路运兵济南市，到4月28日，驻济日军已达3,000余人。日军在邻接济南城的济南商埠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划为东西两个警备区，构筑工事，

收容日本侨民。1928年5月1日，攻克济南，日军出阻，造成五三惨案，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遇害。国民革命军当时在北军仍掌握制空权下，由第一军团刘峙指挥之顾祝同第九军所辖之第三师，首先攻入济南城内，各路会师完成任务，5月2日蒋总司令抵达济南并要求日军撤退，日军应允并撤出工事。蒋严戒北伐军勿予还击，并严令入济南部队，于5月3日夜退出城郊，派员与日军师团长福田商约束部队，未得要领。蒋同时命令济南驻军一律撤出，免生冲突。5月4日、5月5日，日军仍继续放枪发炮，并引张宗昌以飞机炸北伐军司令部。蒋为完成北伐，忍辱负重，勿予计较，限令北伐军星夜渡河，仅饬留李延年步兵团驻守。不料5月3日上午贺耀祖部队与日军双方发生冲突。5月6日，蒋移节党家庄，继续提兵北进，并吁召汪精卫、胡汉民回国，又切告奉系早日觉悟，日本阻碍北伐之阴谋，于是粉碎。另从外交交涉，向日军司令及日本外交部严重抗议，要日军同时撤出济南，请英美协助调停。北伐军连续攻克平阴、禹城、石家庄、临沂、德州、定县、张家口。蒋无视日本侵略者，与冯玉祥在济南以南党家庄车站会晤，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克复保定。

北伐结束

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后，5月9日，张作霖呼吁双方南北双方停战，合力对抗日本侵略，在通电中表示“佥以国内苦战，外侮趁虚而入”应“以侮释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对内更多符多年国民之要求”。他表示愿意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会议，商讨统一问题。5月底，国军包围京、津地区。6月4日晚，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出山海关外。张作霖坐火车抵达沈阳附近皇姑屯车站（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三洞旱桥）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刺杀。张作霖身负重伤，稍后死亡，为皇姑屯事件。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开入北京，光复京、津，宣布北伐结束，将北京改名北平。两周后，张作霖儿子张学良赶回沈阳，继任父职，东北局势复趋稳定；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全国出现形式上统一局面。

国民革命部队详细资料请参考北伐部队情况条目。北伐前全国兵额约140万，北伐后增至230万人，军饷开支超过国家全部收入，所以亟需裁军，以减少军饷支出。

评价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革命军指导员的英勇奋战，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才迅速发展并取得伟大胜利，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统治。"

包遵信认为，"北伐"只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所设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骤中的"军政"，是以武力扫除一切施行宪政之障碍，统一中国是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实现宪政第一步。

北伐及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引起当时一些中国名人的恐惧及厌恶，梁启超、王国维等保皇派勉强接受辛亥革命但称北伐"毫无道德"，反清派章太炎也将北伐视为"叛国行为"。

____

蒋介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4%A3%E4%B8%AD%E6%AD%A3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浙江奉化人，中国政治人物、军事家，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为了与其子蒋经国区分，又称老蒋，中国大陆多以其字称蒋介石。蒋任中华民国自行宪起的第一至第五任总统，并连续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并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特级上将、陆海空军大元帅及二次大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等。蒋是继孙中山后，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蒋早年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送日本振武学校，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士官候补生；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30年10月受基督新教洗礼。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参与创建黄埔军校，逐步成为国民党核心人物。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任总司令。蒋推翻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全中国，建设黄金十年。蒋统率军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最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国成为五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主持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成立国民大会，当选行宪后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解放军占领中国大陆，蒋和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及国军撤退至台湾。蒋统治台湾地区，直至1975年去世。在台湾省戒严令下，蒋连任总统并由中国国民党统治台湾，主张反攻大陆、反共复国。

蒋统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以及冷战中海峡两岸国共对抗，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和东亚史发展。

称呼名字

性质　名字　解释

谱名　周泰　族谱记载之名字。

幼名　瑞元　乡间名之。

学名　志清　1902年到宁波上学时所取，至少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尚以此名为正名。

名讳　中正　1917年至1918年间所取。典故《易经》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蒋在台湾地区正式名称为“蒋中正”或简称“中正”。蒋逝世后，在台湾戒严时期，多用挪移之尊敬写法：“先总统　蒋公”称呼。

表字　介石　1912年留学日本时于自创杂志《军声》中使用之笔名，后成为字，其名另意为“其介如石”。在中国大陆，一般称为“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先生。

绰号　老蒋　区别于其子蒋经国（小蒋）的称呼。

绰号　蒋光头　　　中国共产党跟蒋军事对抗时取的贬义蔑称。中国大陆民众常用此称呼。

绰号　红脸将军　　16岁在奉化县城凤麓学堂读书时，因好与人争辩，往往弄得面红耳赤，并在代表学生与校方谈判时仍言辞甚激，同学赠此绰号。

尊称　蒋公

党内尊称　　总裁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唯一永久总裁，自蒋过世后，改设中国国民党主席。

化名　石田雄介　　1914年7月冒充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办事处职员，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任务的化名。

英文译名　　Chiang Kai-Shek　此译名源自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和孙中山一样取其姓的国语拼音和其字“介石”的粤语发音。

知名官衔　　委员长（尊称委座）　　　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国民革命军之父　　军方尊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蒋担任黄埔军校校长，透过军校师生形成“嫡系”，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嫡系”部队大幅增加；经由军队整编，军校毕业生完全掌握国军领导权，蒋“国民革命军之父”之地位亦确立。

校长　蒋为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首任校长。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共军官以学生自居，称其为校长。

家庭背景

蒋之家庭属吴越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蒋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岭玉泰盐铺楼上。蒋自称是后梁明州评事蒋宗霸及宋代光禄大夫蒋浚明后人。曾祖父蒋祈增，字怀盛；祖父蒋斯千，字玉表；父亲蒋肇聪，斋号肃庵，或字肃菴；母亲王采玉。蒋家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30亩地使蒋家在溪口镇成为五大首富之一，可谓地方菁英，不过还称不上乡绅阶级。

祖父蒋斯千把农地出租，在村子里开一家盐铺。父亲蒋肇聪继承祖业在奉化溪口镇经营玉泰盐铺，于蒋8岁时去世。蒋肇聪前后娶过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长女蒋瑞春、长子蒋介卿；徐氏死后，续娶萧镇孙氏为继室，孙氏不久亡故，无所出：后又娶嵊县王采玉为填房，生蒋介石、蒋瑞莲姊妹四人，其妹蒋瑞菊和弟蒋瑞青夭亡。蒋瑞春嫁宋周运，曾任蒋家丰

镐房管家，共有三子一女：长子宋涨林在盐务部工作，次子宋涨生在蒋家丰镐房当账房，三子宋祥生在宁波农业银行当职员，女儿宋林香务农嫁给邻村王阿孝。1898年，蒋瑞青4岁而亡，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蒋“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遗产重分，王采玉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

据《蒋介石传》作者严如平在浙江奉化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史料，蒋家世清楚，曾有传说蒋父是河南许昌县衙师爷，蒋母先前嫁给许昌郑氏，蒋是出生在许昌之郑三发子云云，不确。蒋由母亲王采玉抚育成人，对母亲颇为孝顺。1921年6月14日，蒋母亲王太夫人去世，蒋回家奔丧，孙中山派陈果夫作为个人代表参加葬礼，还亲笔题“蒋母之墓”四个字。墓碑两旁刻着蒋自撰之对联：“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在蒋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之心理和性格。

蒋原有妻妾，1901年在家乡同毛福梅结婚，1910年生蒋经国。母亲王采玉挑选毛福梅为儿媳妇。1909年夏，蒋决心休妻，但王太夫人带着媳妇到上海，毛福梅总算怀孕。1921年毛福梅出为王采玉义女。1912年，蒋在上海纳姚冶诚为妾。

1919年夏，蒋于张静江家中认识陈洁如，并展开追求。1921年12月5日，蒋与陈洁如之婚礼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里之大东旅社举行，证婚人为张静江。1924年1月17日，蒋发信叩张静江：“今接璐（陈洁如）君函，以纬国、冶诚来粤，彼即不与吾相见，并作永远之辞。未知如何？现尚在沪否？其意究竟如何？请电复。”1927年8月，陈洁如被劝退，离开上海前往美国。1971年2月11日，定居香港之陈洁如死于家中，享年65岁，死时身边旁无他人，横卧地上，死后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

1922年12月初，宋子文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寓所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宋美龄都参加，二人首次谋面。1926年11月蒋致电宋庆龄："广州宋部长勋鉴：转孙夫人玉鉴：江西克复，东南可平，先生在天之灵，可以告慰大半矣。夫人如驾来，请由海道为便，到沪时，中再派专员迎迓，并请孔夫人与三妹同来一叙为盼。中正叩，庚午。"1927年，蒋赴日本向宋太夫人倪桂珍面见求婚之际，蒋自9月28日起在《民国日报》上，连载《家事启事》3天如下："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覆，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端此奉覆。"12月1日，蒋与宋美龄结婚，当天上海《申报》刊登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一是蒋之离婚声明："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蒋发表文章《我们的今日》，称他们之婚姻是"神圣的结合"："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余二人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结婚典礼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进行，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博士来主持，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由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主持婚礼。1928年10月31日，蒋获知宋美龄当选为立法委员后，"于心喜而不安"。1930年8月，宋流产，事后几度陷入严重忧郁；1931年7月宋母逝世，使宋深受打击，觉得"精神沮丧、凄凉和孤寂"。

早年出身

习文从戎

国内教育

蒋在成长阶段受到两股力量影响，第一是新儒家精神，强调修身养性、自律和自省，并且注重责任、勇气、荣誉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冥想；第二是中国一再丧失领土、主权和自尊之惨痛经历。蒋五岁入塾，自称“幼性顽钝，弗受绳尺”；蒋在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典籍10余年，深受传统文化思想熏陶。通过报刊和其他信息之影响，蒋打算到外面世界去追寻出路。

蒋十五岁娶毛福梅为妻。1903年起，先后转入奉化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公学、奉化龙津中学堂读书，学习新知识。青年和中年时期，蒋也读过一些近代书刊。凤麓学堂与龙津学堂是奉化两所新办学校，学堂开设英文、算学等新课，但教学重心仍在经史子集等旧学。曾经在龙津中学堂担任过蒋之英文教师董显光回忆，蒋给他留下难忘印象，“是他每天抢着上海送到报纸的那种热切期待的表情”。董显光记得蒋每天早起，在寝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时，抿紧双唇，眼神坚定，双臂抱胸，全神贯注在他的目标上。顾清廉鼓励蒋研读王阳明及曾国藩之著作。时值《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腐败，民族危机严重，又因蒋丧父后家庭社会地位低微，乃决心出国学习军事。

1906年秋收过后，溪口老家的蒋母接到村里负责收田赋的庄书的通知，要求蒋家再次上交所有的30亩土地的捐赋，并派人威胁。蒋母于是叫蒋回家处理。蒋依靠自己所学的新式词汇，如“人人平等”、“依法办事”，前往庄书家理论，遭以“刁民抗粮”为名，送进县衙治罪，被关入监狱，后得长久并无往来的岳父毛鼎和相助保释出狱。出狱后，蒋无比愤慨，决心干一番事业以免受人欺负。自此，蒋开始思考未来。同期，日本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也对蒋精神上产生刺激，使之产生了赴日学习军事的念头，在龙津中学学习了3个月日语。

赴日留学

蒋剪掉辫子交给母亲，要求出国学军事，母亲同意要求并提供出国经费。蒋留发出国，到日本把辫子剪掉。1906年4月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清华学校，结识在警监学校学习之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影响。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只好回国。蒋没有像当时许多人那样选择理工及教育等和社会发展有关之科目，而是选择这条和传统中国文化人并不相契之道路。蒋试图就读军校，因为日清协议，他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到日本后，因非公费留学不能入军校。同年冬返回中国，翌年夏考入清政府开办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前身），习炮兵。一次授课中，一位日本军医教官在讲课时把中国比喻为桌上的土块，称土块中有四亿个“微生虫”，就像中国的4亿人口，引发学生不满。蒋当堂走上讲台，将土块掰成8块，对日本教官说“日本有5千万人，是否像5千万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日方教官一时间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地称蒋为“革命党”，并要求校长赵理泰严办，赵理泰并未特别处理。由于蒋在保定军官学校深受校长和教官赏识，第二年就成为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之四人之一。

1908年春被选送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学军事。蒋与陆军速成学堂62名学生，一起到东北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1908年3月进入振武学校。振武学堂是1903年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创立之日本国立军人养成学校，是为了预计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户山学校就读之清国留学生，而特别设置之预备教育学校。按规定凡是进入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学生，先进入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学习，毕业后到日本军队见习1年，然后再入士官学校正式学习。所学课程以军事科目和日本语为主；高度军事化教育，造成蒋强烈军事化思维。随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陈其美比蒋大11岁，成为蒋在政治上之良师益友，后来陈其美之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受到蒋之重用。1910年6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经檀香山到达日本，经陈其美介绍，蒋首次与孙会面，孙告诉他：“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

斗。美国建国有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给蒋留下深刻印象。孙对蒋的印象也很好。

1910年11月从振武学校毕业时，其总成绩在62名毕业生中，排名第55，倒数第八，不能算是优秀。1910年冬振武学校结业后，和张群编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师团当士官候补生，受到严格军事训练。冬天天气严寒，但每天仍需5点前起床，取井中冷水洗漱，用雪擦身，洗冷水澡。部队伙食很差，且无法吃饱。蒋还接触到了一些军事管理常识和日军做法，涉及班长的作用，和对士兵的体罚，对士兵的政治教育。他认为士兵应热爱自己的祖国，对本国历史、地理有正确的理解。不过蒋对体罚士兵不以为然，称要彻底禁止。蒋还接触到了日军军官人手一本的《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巴尔克战术》。蒋分配至日军野战炮兵第19联队实习，表现相当不错。1911年6月，晋升炮兵一等兵；8月，晋升炮兵伍长，原定于当年12月晋升军曹，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放弃深造提前回国。不过，日本方面保留了回国学生的学籍。辛亥革命结束后，包括张群、王柏龄在内的许多振武学校的学生都回到日本完成了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业，但蒋并未选择回炉。蒋为将自己学历作实，以捐会费为名，派其副官陈铭阁到北京米市胡同南兵马司，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同学会总会负责人刘宗纪，要他将蒋说成是日本士官学校第6期毕业，并捐款5万大洋。

蒋在日本振武学校就读三年，1910年第十一期毕业。毕业后，蒋在高田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据师团长长冈外史在回忆录中称，留学时期之蒋君，才能胆略，内蕴不露，说不出有什么出人头地之表现。令师团长吃惊是，蒋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时，特意走访他，这使长冈对此颇感意外，而蒋临走时，特别写下“不负师教”四字。长冈认为，这正是蒋成功之秘诀：“忠诚、感恩。”

参加革命

参加辛亥革命

蒋认为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是日本军事成功之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认为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教育和生产制造，样样讲究纪律、效率，关系到日本现代化；终其一生，蒋认为爱国和民族精神是恢复中国尊严及世界地位之关键。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蒋和张群等即向高田联队请假，长崎乘趁日轮回中国，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陈其美夺取上海，并为攻占南京聚集力量。蒋奉陈其美委派，任敢死队队长，与王金发等人率领队员百余人赴杭州，参加11月4日光复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蒋隶属第二师，师长是黄郛，旅长是张宗昌。时与沪军都督陈其美、督署参谋长黄郛甚为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蒋被认为是党内有数之军事人才。

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因派系之争，陈其美命蒋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病房。另有资料记载是蒋亲手枪杀陶。当时报纸没提蒋涉及此一谋杀案。孙中山下令“严速究缉”，蒋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蒋在日本学习德文，准备去欧洲，还出版《军声》杂志。孙答应辞职让位给袁世凯；蒋和陈其美一样，强烈不赞同孙辞职之决定，但是孙以大局为重胜过权位考量，令蒋大为佩服；蒋后来一生亦多次效法引退。

蒋早年由陈其美的带领下，开始沈迷风尘，尔后也多次前往妓院寻欢作乐，蒋曾在日记中多次记录。有一次蒋来不及等待整理就入房，结果看到床铺脏乱，最后“拂袖而去”。

参加二次革命

蒋说在讨袁之役初起之时，孙才对蒋单独召见，二人之初见该在1913年，当孙在上海之时。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蒋在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指挥下，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沪军都督杨善

德下令缉捕蒋，蒋被迫逃进陈其美之娘姨姚冶诚卧室内，遂纳姚怡诚为侧室。8月各地讨袁军先后失败。蒋于9月1日抵达长崎，10月29日由陈其美结拜兄弟张人杰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4年春奉命回中国组织反袁军事活动，蒋奉孙令主持上海讨伐袁世凯军事，自兼第一路司令，负攻取上海西部之责；袁遂下令严缉蒋，并收买党人王金发加以暗图，蒋觉察走避，应陈电邀赴日本。后奉孙命赴哈尔滨视察东北形势，居月余，上书孙述欧战趋势及倒袁计划。袁下令通缉蒋，在令文中明白指出："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中山主持一切。"蒋在东北策划讨袁工作，但因日本势力控制东北，难有进展，于秋间返回日本。蒋返日本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之著述，并研究军事战略。

1915年9月，陈其美滞留上海，设总机关于法租界，由蒋担任军事职务；10月，蒋奉孙命回上海，拟定"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供陈其美参考；11月10日，陈其美派同志王明山等刺杀袁氏死党郑汝成；制造局守军同志不能及时响应；陈其美偕蒋退回机关部，及法国巡捕房侦探前来搜捕，自露台越屋走避；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刺客刺杀于法租界渔里机关部，蒋闻死载尸归其私寓，经纪丧事，复为文以哭之。

1916年4月，蒋协助杨虎等攻打江阴要塞，杨虎明言与蒋一道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蒋一命。6月初孙中山任命蒋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参谋长，难著成效；及袁氏暴毙，居正去北京，由许崇智代其职，呈请解散，蒋乃赴北京观察政局，同年秋复回上海。蒋先后与张静江、许崇智等人焚香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

辅佐孙中山

1918年2月，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桂系所刺杀，孙益无所恃，乃电召蒋赴广东以为助，3月11日蒋奉派赴汕头，出任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因受排

挤，于7月辞职。8月18日回到上海。蒋奉派到粤军中工作，先任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继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指挥所部攻取大埔、永泰。蒋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10月28日，蒋去日本。

1920年，孙命蒋、朱执信等赴福建漳州，促陈炯明等回师广州；10月5日，蒋抵汕头总部策定作战计划。9月30日，孙派蒋出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蒋仍在前线与桂系军阀残部作战，但于11月12日赶到上海向孙报告，次日再回到浙江老家，探望老母。

作为一个对时事相当敏感之人物，蒋对当时波及全国之新文化浪潮有所了解。孙想要以广东为基地，打算武力统一中国。1921年10月，蒋返回广州，受孙之命拟订进军两广进而统一中国之作战计划。陈炯明则赞同章太炎等倡导“联省自治”，认为中国问题要走美国联邦制才能解决，武力统一只造成中国更糜烂、衰弱；陈炯明认为孙不如先完成广东一省之自治，再徐图其他。1922年1月，蒋应孙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广州巩固后方再图北伐之建议未被孙采纳，于4月返上海。6月16日，陈炯明发动武装，孙避往永丰舰，6月18日电蒋“盼速来”。蒋赶赴上海，找到虞洽卿借到6万银元；蒋带着钜款搭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6月29日，蒋抵广东。蒋接过永丰舰之指挥权，命令驶往下游。自是，蒋每日跟从孙中山，指挥海军沿省河进攻叛军，直到8月9日闻北伐军回师失利消息，蒋始侍孙离粤赴上海，8月14日抵沪。孙还曾对外国记者说：“蒋某此来，不啻增加二万援军也。”蒋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亲为作序，赞蒋“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蒋由此博得孙很大信任和重用，大大提高政治声誉；10月，孙编组“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蒋为第二军参谋长，蒋感到“军中将领，界限甚深，每相排挤”，不久便离开福建回到上海。

11月24日，孙长信致蒋，说：“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

毫无进步，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就如来信云云，子荫当来沪，此事已不成问题，即内部之大难题已得解决，则进步为极大矣！其他纷繁小故，何足介怀？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尔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此候筹祺。孙文。”当时孙派蒋到福建去，和安福系军阀建立联系；在他们帮助下，孙于1923年回到广州。在上海，同乡虞洽卿指点蒋：拜青帮头号老大黄金荣为师。

赴苏联考察

1923年2月17日，孙特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8月，蒋奉孙派遣，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一行四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三月余：蒋对苏联军队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之研究与进步，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但对于苏联没有同意蒋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向北京进攻之军事计划很失望，对于苏联之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认为苏联没有放弃其“侵略”之野心，因而认为苏联对中国之援助是别有用心；蒋还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不能仿效；苏联之行加深蒋对苏联之认识和疑虑。蒋在苏联考察几个月，正值列宁病重，看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内斗，对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风气盛行充满失望。孙在11月22日信中鼓励蒋说：“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其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

11月27日面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蒋说临别赠言：“忍耐和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把它做为成功立业之要素，12月15日回到上海，并写一个考察报告。

与苏联合作

1924年1月16日，蒋到广州向孙覆命。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蒋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0天后，又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2月6日，蒋设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于广州南堤。蒋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孙叫蒋回广州，蒋回信说："中正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一个月后，蒋辞职，开始发放遣散费；4月，孙批复蒋"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4月9日，蒋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讲话，声言"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办法"，获得苏联顾问之好感和信任。4月21日，蒋返回广州。5月3日，孙又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在军校极力树立校长权威，培植个人势力，重用何应钦、王柏龄等人。10月广州发生商团事变，蒋承担孙交给之率黄埔学生平叛之任务。蒋把军校师生编组成教导团，成为保卫南方政权和统一广东根据地之一支武装，于当年10月与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等合力平定广州商团武装事变。11月孙北上，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时，黄埔军校学生组织东征部队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到当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国工作之军事、政治人员已达1千人左右，并且提供中国国民党每个月3万5千元，外加其他补助。

东征之役

1925年2月，蒋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5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应蒋之请，因教导团改称党军，校长名义又不能指挥党军，遂"任命蒋中正为党军司令官"。6月，蒋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7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3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蒋及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以汪为主席；7月7日，蒋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一、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二、革除军队积弊；三、统一财政；四、整理军队；五、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六、统一两广。7月26日，蒋

在军事委员会会议称："统一军政，自统一名称始，如旧日湘军、滇军、桂军、粤军等等，以省为别的名称，都应一律取消，另用统一的称号。在军事委员会曾拟有三个名称：一、国民军；二、革命军；三、国民革命军。其要义不外指明我们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成的军队，是以革命为宗旨，所以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合的名称。"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被害，国民政府组织"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得到苏联顾问鲍罗廷信任和支持之蒋与汪精卫、许崇智为委员，被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及时局。8月24日，蒋当上广州卫戍司令。蒋先支持汪将胡汉民驱送出国，继而又将握有军权之许崇智迫离广州，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成为军事实力首要人物。8月26日，蒋把黄埔军校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自任军长。蒋再次讨伐陈炯明，将粤境叛军全部肃清。汪于9月18日授蒋以广州卫戍司令。汪和蒋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之通过下，派胡汉民前往莫斯科，旋即提名胡汉民为中国国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0月间，黄埔学生军和部分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肃清陈炯明势力。10月27日，由于作战失利师长逃跑，部队在华阳附近被包围，蒋任命侍卫参谋陈赓代理师长阻止溃退但没有成功，准备自杀。在陈赓的劝说下，蒋放弃自杀，陈赓背着蒋得以逃脱。

1926年1月，蒋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事教育有必要统一，决定改组黄埔军校，合并所辖各军原有各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该会，并以黄埔军校为校舍，任命蒋为校长。1月28日，毛泽东和蒋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毛泽东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党工干部百分之七十为中国共产党人，国民革命军中876名政工干部中也有百分之七十五为中国共产党员。2月8日，蒋辞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2月9日再辞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汪精卫既不批准，亦不挽留。

中山舰事件

1926年2月27日、3月8日，蒋迭次访汪，告以季山嘉之专横："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要当不失自主地位。"蒋首先向汪精卫表示制裁共产党。3月14日，汪暗示蒋离粤，蒋之处境益加困难。此时蒋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某些举措将削弱自己军权，甚或被放逐苏联，乃于3月20日称中山舰擅自行动密谋叛乱，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国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卫队和纠察队枪支，制造"中山舰事件"。季山嘉与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密谋，欲趁蒋乘中山舰自广州回黄埔时加以劫持，驶往俄国，以消除其破坏革命之障碍。苏联顾问鲍罗廷承认3月20日以来蒋所取得之权力，并按照蒋之要求，令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批准中国国民党以"同情党"名义参加共产国际，并选蒋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名誉委员"。斯大林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苏联顾问遂向蒋妥协，更阻止汪精卫组织"反蒋联盟"。嗣后蒋诿过于汪精卫，说汪挑拨国共关系，迫使汪离开广州出国。事后鲍罗廷自俄回粤，季山嘉离粤回俄，汪则借口养病，秘密赴欧。

中年经历

北伐

两广统一后，蒋极力主张北伐。由于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命令之妥协方针，蒋在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之"整理党务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国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中国国民党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共产党员任职中国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国民革命军北伐，蒋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制定各个破敌方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于6月4日任命蒋为总司令，直到7月1日下北伐动员令，到7月9日在广州举行大规模誓师典礼。在北伐军7月11日攻克长沙后半个月，蒋率总司令部人员离广州赴前线指挥作战；8月23日在长

沙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上进攻武汉。北伐有两股力量推动：其一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五卅惨案，使民族主义弥漫，形成风潮；其二自苏联援助，人力物力。北伐军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后，于9月6日攻占汉口、汉阳，吴佩孚部死守武昌；蒋急于破城，几次下令北伐军攀城强攻均未奏效。11月9日蒋进驻南昌。11月19日，蒋又电催速将政府迁至武昌："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既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12月2日，鲍罗廷在南昌与蒋见面，对迁都武汉有共识。

间隙日增

北伐军继续分三路进军。蒋于1927年1月3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月12日，蒋到达武汉，欢迎会数万人，鲍罗廷要求蒋尊重武汉方面意见，使蒋愤恨。蒋拒不出席3月在武汉举行之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选出蒋为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于3月20日在武昌宣誓成立。蒋不断派人与英、美、法、日等国联系。3月，蒋在上海，连日召集秘密会议，与汪精卫等人商讨"反共问题"，得到李宗仁等人支持；蒋下令取消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支持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过吴稚晖提出之《查办共产党案》。率部进入南京之程潜，收到武汉中央要求他逮捕蒋之命令，程不予理会。3月26日，蒋到上海，发现工人和学生天天集会示威，要求收回外国租界。

四一二事件

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蒋扩大自己军事实力。1927年，蒋离开上海赴南京，4月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之密令；4月12日蒋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而此时正逢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然而苏联代表鲍罗廷以及中共中央却以"党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后"为理由意图反对北伐；4月18日，蒋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对峙。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州迁移南京，宁汉分裂。四一二事

件使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复杂，其中包括蒋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同时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间不断渗透国民党内部使部分右派党员及将领不满，并且无端于地方发起暴动、迫害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并掠夺其拥有合法财产等因素。据当时《中国周报》记者斯诺估计，被杀害之左倾分子在5,000人以上。上海流氓势力反共清党有功，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5月5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议决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推定叶楚伧、曾养甫等为筹备员，后第九十二次中常会又议决任命蒋兼任校长。5月21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胡汉民、蒋、邓泽如、阎锡山、王伯群为国民政府委员。

一次下野

冯玉祥主张停止宁汉之争，共同北伐。1927年6月13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外交委员会，推胡汉民、蒋、吴敬恒、李石曾、伍朝枢为委员。6月20日至6月21日，蒋、胡汉民、吴敬恒等与冯玉祥会于徐州，协议统一指挥，完成北伐，6月22日由冯致电汪精卫，指责武汉之恐怖政策。7月14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张静江、蒋等为浙江省政府委员。7月，被北伐军击溃之孙传芳在直鲁联军张宗昌帮助下，在津浦铁路上反攻，7月24日攻陷徐州；8月6日蒋退回南京据江而守，威信骤降，拥兵自重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蒋下台；在武汉之汪精卫和唐生智又组织东征军通电讨蒋；而何应钦等嫡系亲信此时亦不愿出来维持蒋之地位；蒋被迫于8月13日宣布辞总司令职下野，回家乡住一个多月后，于9月28日赴日本访问，与日本朝野各界广泛接触，会见了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义一只表示支持蒋反共和统一中国南方，不支持他北伐及统一整个中国。蒋下野后，李宗仁于8月16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精卫翌日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称，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停止办公，汪精卫遂覆电李宗仁，决定迁南京，宁汉合流。9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蒋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蒋欢

迎从德国延揽来之外籍顾问、曾在鲁登道夫元帅麾下担任首席作战官之鲍威尔将军；德国人也制订一套参谋本部制度，一旦蒋回任总司令，即可掌握每个阶段之军事作战和决策。10月3日，蒋到神户，即与宋子文同赴有马温泉见宋母，请其允诺与宋美龄之婚事，宋母允其所请。宋太夫人原不同意蒋宋婚事，其时蒋表示已与妻妾离异，并表示要遵守基督教义，宋母方予允准。10月19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蒋11月8日离日回中国。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蔡元培担任主婚人。宋庆龄不喜欢蒋，但与宋美龄姊妹情深，说蒋与宋美龄是“情投意合”。

1927年11月10日，蒋抵上海，11月16日汪精卫、李宗仁到上海与之商谈取消特委员会和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事，蒋、桂实现联合；12月10日，南京政府任命蒋为总司令。

蒋下令查办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广州成立之中国国民党中执委临时办公室，汪精卫再度被迫出国。1928年1月3日，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2月2日，蒋在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政委主席和军委主席，从此党政军权再度集中于蒋手。3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南京正式成立，以蒋为校长。3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三一次会议，推蒋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对奉系军阀北伐。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蒋集中优势兵力，专门攻击奉鲁军薄弱环节山东地区；而在河北、山西一带则采取守势，只投放有限兵力，比张作霖之战略步署略高一筹。

东北易帜

张作霖不敢恋战，带领文武官员离京出关，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1928年6月9日，蒋发表辞职通电，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称“作战目的完成之时，即总司令职权当然解除之日”，6月12日，又宣布辞去另一实质性职务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其带领下，南京众多高官纷

纷辞职，如丁惟汾、杨树庄、刘峙等；随后，其他政治人物如阎锡山、白崇禧、何应钦、李济深、李宗仁等极力劝阻，冯玉祥表示如果蒋辞职，自己也将辞职；蒋在游览镇江金山寺，回家乡省亲后复职。蒋以南京政府名义，于6月15日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6月19日，张学良发电报给蒋，表达对中国之忠贞以及东北投向中央政府之决心；蒋对张学良之前景颇有疑虑。7月6日，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北京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报告祭”；8月9日，蒋派方本仁到奉天，劝张学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中国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10月3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10月8日产生南京新政府。10月10日，蒋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张学良被提名出任国民政府委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蒋即电覆，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诸兄匡扶党国，表示精神，无任佩慰！……愿与诸公共策之。”

拓权

中原大战

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强调“统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1929年1月，蒋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对各派军事首领委以高官，但夺掉他们兵权。3月蒋桂战争一举打败桂系，收编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通电下野。冯玉祥不肯就范，知蒋必不肯罢休，乃作战略撤退，向豫西移动，以缩短战线，并及时炸毁陇海铁路、京汉铁路之桥梁和隧道，以阻蒋运兵。5月22日蒋下令讨冯，5月23日宣布开除冯党籍，5月24日下令通缉冯，冯部将韩复榘、石友三投蒋，5月27日冯通电下野。韩就任蒋所授之西北军总指挥，石就任蒋委任之第十三军军长。12月张发奎与驻广西桂军联合反蒋，蒋派何应钦将其击败，唐生智和石友三举兵反蒋，不久即被蒋击败。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60万大军；蒋有100万部队，相当大部分驻守各地、维

持治安。蒋用重兵进攻、分化瓦解等办法战胜对手。最重要是从头到尾张学良一直效忠蒋。1930年2月28日，阎锡山迎冯玉祥到太原商议联合反蒋，宣布阎任总司令，冯为副总司令，4月2日蒋下令免阎职拿办，4月5日又下讨伐令，4月6日宣布永远开阎党籍。蒋于5月1日发布讨伐阎冯誓师词。5月11日，中原大战爆发，蒋由济南抵徐州，设行营于陇海铁路，以居中指挥，当晚下总攻击令，以中央军第二军团为主力，沿陇海铁路向归德进攻，与晋军、西北军开展大规模接触，孙殿英部被迫退往鹿邑、亳州，万选才部退至归德附近。5月31日，西北军第二方面军骑兵集团司令郑大章率千余骑兵奇袭中央军后方，进攻附近的朱集车站。实际当时车站守军只有200余人，蒋就在此地。而且，当时蒋的指挥列车有车厢无车头，无法逃脱。郑大章认为车站有重兵把守，干扰后自动离去，蒋因此逃过一劫。在蒋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兼施下，阎、冯军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相继受挫，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挥师入关；8月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和邹鲁、谢持西山会议派联合倒蒋，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无疾而终。战争共有24万人死伤；蒋并没追击已战败之军阀、打进地盘，蒋早已放弃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大规模裁军。蒋10月3日于开封军次，致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告捷。12月6日，国民政府令：教育部新任部长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兼理。

面对中国国民党内部矛盾和纷争，以及社会舆论强烈要求民主、法治，蒋在中国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胡汉民反对；蒋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导致5月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4月30日，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与监察委员邓泽如、萧佛成、林森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电"，指"蒋氏猜忌为心，阴险成性，总理以其长军旅，畀以练兵之任，未及期年，总理逝世，迭乘时变，窃夺军权，浸而盘踞中枢，把持国柄，潜植羽翼，威胁老成。诸同志仰总理之遗志，急国家之危难，庆其才勇，降心相从。乃濒年以来，不知敛抑，肆虐愈深，为祸滋甚"。5月1

日，汪精卫通电中国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略谓蒋祸党祸国，“暴横日甚，言之痛心”，现广东方面奋起讨蒋，“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蒋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略谓古应芬等通电，似以监委资格弹劾本人，而手续不合，似别有作用，本人对此电决不计较，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内平乱，不虞动摇时局。5月2日，蒋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自请议处，略谓广州邓泽如、古应芬等4监委联名通电“指斥中正罪状”，“倘果确实，则在党纪国法皆无可恕”，邓等通电，虽“于正式弹劾手续有所不合，但中正为尊重党纪计，不得不请求中央彻底查办”，并表示“中正理当静候查办，服从党命，决不稍有恋栈”，中监会旋致书蒋，谓邓泽如等通电，“其语皆摭拾浮言，任意指斥”，所言不合弹劾手续，请蒋“暂勿深究”。5月5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开幕。5月6日，出席国民会议之全体代表由蒋带领冒大雨前往中山陵谒陵，并在陵前宣誓，誓毕，一一在誓词上签名盖章。5月8日，国民会议举行第一次大会，于右任任主席，讨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蒋讲演“约法”意义，戴季陶报告“约法”起草经过。5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张继见蒋，商调停粤事。6月，蒋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蒋兼任行政院院长。6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会议推定蒋为政治会议主席。6月21日，蒋离开南京赴南昌亲自组织对江西红军实行第三次大“围剿”。6月26日，蒋为集中一切力量“围剿”红军，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蒋自兼委员长。7月1日，蒋在南昌行营发出第三次“围剿”江西苏区红军之命令，蒋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军事顾问，调集30万国军采取“长驱直入”之战略，即日开始行动。

中东路事件

九一八事变

7月12日，蒋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8月4日，蒋在南昌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坚持“安内可以攘外”，中央对当前国民排日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9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回南京主持一切。9月21日，蒋自江西回南京，在陵园官邸召集在南京中央委员讨论时局及应付日本侵略办法，议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粤，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及党员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际联盟公理处断。蒋请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2万名学生在南京集会，其中1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外交部长王正廷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汪精卫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9月22日，蒋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已在南京归为国际交涉。10月14日，胡汉民离开南京赴上海，结束自2月28日以来被蒋幽禁之生活，陈铭枢、吴铁城、张静江偕行。10月21日，何应钦奉蒋电召由南昌返回南京，南昌行营事务由参谋长贺国光代理。11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谷正伦为宪兵司令，11月7日谷向蒋请示关于组织宪兵司令部及其职权问题；南京“剿匪”总司令部奉蒋令取消，南京卫戍司令部改番号为第八十三师，移防蚌埠。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南京，再次袭击政府高阶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蒋再度和亲信讨论引退一事；蒋不考虑批评者要求对日抗战，因为蒋认为此时抗日将是一场灾难。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代

表341人，中执监委24人，蒋任大会主席。11月15日，全国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主席蒋；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蒋报告经济建设、农工商振兴及交通建设等情况和计划。11月29日，蒋致电汪精卫，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蒋下令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二次下野

蒋迫于各方压力，于12月15日再次辞职；一个月后，他利用政局不稳，和汪精卫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谈，决定两人合作，蒋主军、汪主政。12月15日，蒋通电下野，略谓因粤方“胡汉民等同志微（5）日通电，且有中正必须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欲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得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决议：准蒋辞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职务，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院长；张学良电蒋，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同日国民政府准张学良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12月22日，蒋出席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后，下午偕宋美龄乘飞机赴上海转返原籍浙江奉化，临行前致函于右任等，表示决还乡归田，从此拒绝任何函电来往；张学良电蒋，谓“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最后指针”。1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一、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叶楚伧为秘书长；二、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静江、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蒙、王树翰、薛笃弼、刘尚清、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

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三、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推选蒋、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委，轮流充当会议主席等。前军统沈醉明言，杀中央研究院杨杏佛，为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意。

国共初战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在军事上把主要力量放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由蒋当总统，把五院院长统一置于总统管辖之下。蒋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蒋希望先弭平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蒋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剿匪”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员负责；但是，“苏区”得到三年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张国焘说：中共各“苏区”成长之“主因”是，蒋专注于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间之衡突；战争使全国各地状况恶化，乡村民心背离、创造出成群游荡逃兵溃卒，极易被中共吸收；党派内哄消耗政府力量，使“苏区”在金钱和武器援助下有足够时间去扩张。

1930年7月23日，蒋发布《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中共游击队基地成长，反映出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之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党军贯注同样之精神；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1万5千支步枪，毛之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之关键——“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蒋还建立陈果夫、陈立夫CC系“中统”和黄埔系“军统”，专事破坏中国共产党，并防范中国国民党内反蒋派系；他于9月密令取缔“左联”等团体；12月下令颁布《出版法》，查禁“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之书籍。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门户森严，1938年解散时只有300人左右；蓝衣社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其实，他们每项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断出现抗议和批评蒋及

蓝衣社。在将各派系军队收编改组后，蒋即从1930年12月起，连续五次向中共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先后调动上百万军队，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经过四年鏖战，迫使红军退出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安徽等根据地长征。1931年5月29日，蒋发动之对江西中央苏区之第二次大“围剿”被红军完全打破，15天内，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共歼敌3万余人。

蒋一面在各根据地反复“清剿”，一面命令西南地方军队堵截红军长征，借机“整理”西南诸省军政，逐步掌握云南、贵州、四川三省。1932年1月22日，蒋、汪返抵南京，汪于1月28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3月18日，蒋就任委员长，并兼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蒋设立南昌行营，组织侍从室，到1936年1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9月1日，军政部航空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亲自兼任校长。

对日本帝国主义，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之方针。1934年2月，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谋求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实践“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改造社会、复兴民族；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推动，但收效甚微。5月，蒋任航空委员会委员长。

1935年4月1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为特级上将；蒋在贵阳对记者称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谓：“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个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此国民经济运动，乃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业、开发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整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杂税，减免出口税，与要求新宪法之实施，禁止纸币之滥发，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国与交通三银行之资本，以谋社会经济之安定与农工商业之进步，亦即此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中之一

种。”4月6日，蒋乘调大军入贵州追堵红军之机，压迫贵州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交出军政权力，是日王以“身兼纵队司令，不能兼顾省政”为辞电蒋请辞省主席职，继又辞去军职，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4月13日，蒋派李仲公为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9月1日，周恩来写“正式信件”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蒋指示陈立夫正面回复周恩来。

蒋对日主张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判。陈友仁批评蒋之对日妥协政策：“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1932年2月1日，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团调沪增援。乞示”；蒋覆电：“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致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蒋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战之决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上海市日军高达5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做为回应。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案，尹奉吉当场炸死河端贞次，白川义则重伤而死，植田谦吉、重光葵炸断腿，野村吉三郎炸瞎眼，蒋一改态度，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置韩国人特别班等，积极支援韩国独立运动。在国统区大批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士，查禁书籍；派宋子文去美国签订五千万美元之棉麦贷款协定，实际上是谋取剿共之经济支援。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之“福建事变”。

1933年，胡汉民致陈嘉佑、程潜密函：“西南抗日军队出发，以贤初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师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蒋推行联保连坐法，要各户互相监视。蒋认为农村安定靠地主，故不惜代价扶助地主恢复其威权，对地方乡绅，尤视为反共支柱。6月9日，国民政府派蒋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于7月28日，以“妨害统一政令”为名，

通电迫冯玉祥解散民众抗日军。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

1936年1月，蒋再度向一群大学师生辩护其外交政策，称虽然他“不惧日”，中国仍不够强大到足以和日本一战；其立场不能让中国人民满意，但是中国若按照进度在未来四年继续整军经武，必可在对日抗战时重大发挥；此外，西方民主国家仍未把中国与欧美命运视同一体，完全无意提供实质援助。春，蒋调集中央军5个师入山西，准备打击经过长征实际逃亡进入西北之共军，同时也准备对日本侵犯绥远有限度抵抗。蒋仍然想要武力“剿灭”工农红军，在西安成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一再督饬张学良、杨虎城进兵陕北；张、杨“剿共”受挫，受抗日运动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之影响，主张联共抗日。5月，周恩来在蒋担保其人身安全无虞下，偕同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在上海和陈立夫、张群密会，继续交涉抗日统一战线事宜。中共方针应是“逼蒋抗日”。6月，毛首度通知共产国际，已经成功和张学良、杨虎城有反蒋同盟秘密协议；斯大林8月13日回信，全面反对毛之做法，直接指示毛“立刻正式向国民党及蒋介石提议展开停火谈判，并就共同抗日签署具体协议”，包括成立“统一指挥本部及共同的军事计划”。7月14日，国民政府特派蒋为国防会议议长。冬，蒋赶到西安，催逼张、杨出兵；张、杨反对继续内战，向蒋苦口极谏遭拒，乃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晨将蒋扣押。毛收到来自张之急电，宣读电文，朱德、张国焘等人想立刻把蒋及同行将领处死；毛立刻征询莫斯科之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毛拍发电给张，恭维张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张“惊天动地的举动”，称根本不可能和蒋妥协，暗示张应“坚决地”对付蒋；斯大林命令毛和蒋友好对话，找出方法和平解决，并释放蒋；接到斯大林命令后，毛、周、朱于12月15日同意通电全国，称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贸然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周回到西安，一见到张就称“不能动（蒋）一根汗毛”，中国迫切要要蒋领导，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蒋继续领导中国；周告诉张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接着只

能释放蒋，期待蒋信守诺言。后在中共和张、杨以及宋子文、宋美龄等多方面努力下，达成改组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周告诉宋子文和宋美龄，可以透过宋庆龄和周联系；他们显然都没有向蒋提过，宋庆龄是中共联络人。蒋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2月25日，蒋由张陪同离开西安，到南京后扣押张，随即软禁；继又迫杨辞职、出国，分化瓦解叛变之东北军、西北军，调往河南、安徽。

抗日

全国总动员

1937年7月17日蒋发表庐山声明

“西安事变”后，蒋被迫停止内战，接受抗日。蒋信守承诺、停止“剿匪”，还开始每月拨款给中共部队；共产国际也继续资金提供，于1937年初给中共80万美元。迫于军民要求抗日，蒋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西安行营；先派顾祝同等，以后又亲自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多次谈判国共合作事宜。2月18日，蒋呈请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辞去本兼各职；全会决议：一、陕变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二、恳切慰留蒋。3月4日，蒋以禁烟总会总监名义通电全国，要求切实推行禁政，务期如限肃清烟毒。3月25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准蒋辞国民政府委员职。4月19日，蒋经国带着蒋方良和蒋孝文，回到上海；几个星期后蒋经国在杭州恭迎蒋并跪地磕头。7月4日，庐山暑期训练团第一期学员训练开始。7月芦沟桥事变起，日本发动全面战争；蒋筹划之抗战各项准备工作远未就绪，乃决定“不屈服、不扩大”，应付时局；在军事上紧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即赴保定，“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坚持到底，处处固守”；同时调集九个师向石家庄、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谈话；此时，蒋还企望芦沟桥事件能就地和平解决，以牺牲局部换取全局之苟安，连续接见英、美、法、德国驻华使节，希望列国出面

调停；蒋对宋哲元在北平于日方谈判也“极度容忍”，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调遣部队增援，延误战机，使日军入关轻易击溃第二十九军，而于7月29、30日占领平津地区；蒋急于取得各党各派势力合作和支持，在庐山、南京同周恩来等多次会谈，同意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8月12日，蒋在南京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得到各地各派军事首领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支持和拥护，举为陆海空军大元帅。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统帅全国陆海空三军对日作战；蒋以中日尚未宣战，不宜组织大本营，只扩充军事委员会编制，设第一至第六6个部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等，另有管理部。9月，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淞沪会战，迅速调集73个师约40余万兵力（占当时全国可调动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狭小地区阵地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等再三苦谏，蒋才准予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阵地转移。期间蒋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派志愿空军助战。蒋得知九国公约将于11月3日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政府既收编中共，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愿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中共重申并入革命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调遣；蒋也公开称，中共此一声明代表“全体国人现在都了解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12月2日，蒋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南京，下午5时见陶德曼。12月3日，蒋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11月之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之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将韩处决。

日本在淞沪会战后，展开诱降活动；1937年11月5日，蒋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听取他转述日本提出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七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11月12日日军直指南京，蒋调集共15个师约10余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11月20日，蒋宣布迁都重庆，是为陪都。

193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兼行政院长蒋辞职照准。2月，高宗武奉命在香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暗中与日方联系。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举行开幕典礼；4月1日在武昌举行第四次会议，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为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国民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决定保卫徐州，不让日军主力离开津浦铁路，一面先后调集60万兵力以备决战，一面处决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1938年3月至4月上旬，蒋曾亲赴徐州督导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筹划作战，台儿庄战役大捷，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万人以上；嗣后日军增调兵力占领徐州，趁势沿陇海铁路西进，直扑中原要地郑州，蒋下令于6月9日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洪水泛滥将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及机械化部队困陷其中，战局暂告稳定，但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受淹地区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也受到严重损失；黄河决堤后，日军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日军5月19日攻陷徐州。蒋重新部署武汉防务，以转入山地与湖沼地区作战为主，配置129个师及骑兵、炮兵等共约100万兵力，以及海军、空军，层层进行阵地战，尽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前后达4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迫使日军前后投入40万人以上，消耗军力重大。6月26日，马当要塞失陷。10月25日武汉失守，蒋于10月30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要坚持抗战到底。有位德国前任情报官员斯坦纳斯成为“顾问”，实际上是蒋之卫队长，颇得宋美龄宠信；日后身份曝光，竟是苏联KGB特务。

1938年5月间，蒋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

在“生死关头”；蒋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65架飞机，称中国只剩下10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复，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不久，苏联派到中国之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高达3,665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蒋令，于7月5日自香港抵达神户。日本外相宇垣一成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计划与孔祥熙在军舰上晤面；9月25日马伯援自香港取道河内赴重庆，与蒋、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陆相坂垣征四郎反对和议，外相宇垣被迫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会谈流产。此时谣言又起，传说蒋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之装备，以及追加500架战斗机。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日本政府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总方针。12月19日，龙云电呈蒋：“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蒋在1938年数度向周提起，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新政党——条件是毛、周出国；蒋甚至很严肃地提议，国共合并后，中国共产党不需要正式解散，中国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回答，建议中国共产党员循1920年代往例，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最后，双方都无法做出妥协；数星期后，周终于告诉蒋，这个主意行不通；可以看出，蒋不是坚持意识形态、食古不化者，也不是强烈保守派；事实上，蒋是左派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来指挥蒋如何治理中国，蒋也可以接受反帝国主义之共产国际。

汪精卫投敌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失去上海后，蒋之政治力量基础就受到重创；从1937年至1945年，有1,400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比例相当低——每年只占人口0.4%；相形之下，日本是1.3%，苏联是3%。此后，日本加强“政治谋略”攻势，方针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蒋对于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一批亲日分子与日本方面秘密勾结谈判“和平”之行径，表示严正态度，于1939年元旦主持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议，将汪精卫开除出党，嗣后并下令通缉。河内刺汪案是戴笠奉蒋之命干，戴笠还于2月底3月初亲往河内布置。斯大林告诉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之“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蒋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可是私底下蒋认为，世界事务之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订定密约之可能，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

1939年底，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于1940年1月21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公布汪精卫《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政权。11月30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权，同日华府通过给予中国1亿美元信用融资。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电报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27）日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费，即请转交高君，并覆为荷。弟陈布雷。勘”

中共势力扩大

中共有效率组织占领区正规、游击军与建立地下行政体系，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1937年4万人，增至1940年80万人左右；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堵在指定范围之内。为实施其反共方针，蒋一方面大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以达到维护“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之目的，并在全国推行“新县制”，实行县、乡、保、甲之体制，把政治、武力、教育合为一体，在精神上组织上强化统治；另一方面，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武装磨擦。1939年1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举行第七次大会，确定蒋兼任行政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蒋任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

1940年7月间，重庆中央军事委员会提议新四军和八路军集中到黄河河道北

边；在周面前，蒋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之计划，然后称他“真诚”希望中国共产党会“绝对服从”；然而毛拒绝接受。11月15日，国民政府令：蒋请辞四川省政府主席兼职，派张群兼理。陈布雷称：“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军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

联合欧美

日本除继续采取政治诱降外，又施加军事压力，对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局部进攻。1941年4月13日，蒋称苏日中立条约会使美国更意识到日本对其长期威胁；因此，日本和苏联此一外交动作助长中国军事和政治前景；蒋结论是，日本即将南进，是日本做为世界强权即将完结之开端。美国和日本新一回合之谈判，已订于12月在华府展开；蒋急电赫尔、居里、诺克斯和史汀生，说：“美国一旦放松对日禁运，将使中国抗战悲溃”，并转知丘吉尔；丘吉尔发电给罗斯福，支持中方立场；罗斯福决定对日谈判时不提出放松禁运之方案。12月8日晨1时，日军开始对美国檀香山珍珠港偷袭，同日炸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等，于是英国、加拿大、澳洲、荷兰、美国等对日宣战，美国并宣布对德义两国进入战争状态。蒋口述一封信给罗斯福，由宋美龄译成英文：“现时我两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与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布告对日宣战，并声明对德、义立于战争状态。12月27日，蒋兼理外交部部长。

1942年1月3日，美国宣布蒋为同盟军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

军最高统帅。蒋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美、英等国提供贷款和军用物资，抽调精锐部队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协同美、英军队重创日军。2月4日，蒋偕宋美龄，与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及前英大使卡尔（已离华驻苏）由重庆飞往印度访问，当晚抵腊戌，2月5日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腊戌飞抵印度之加尔各答。2月8日，蒋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加尔各答乘火车赴新德里，2月9日抵新德里；2月10日蒋与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及印度军总司令哈特莱就印度政治、军事、如何团结印度民众共同对抗侵略问题交换意见，旋又会见前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谈印度问题；2月11日蒋会见尼赫鲁及现任印度国大党主席阿柴德，听取其陈述印度国民对太平洋战争之态度，并劝以宜用政治方法完成其志愿；2月12日蒋在新德里会见尼泊尔王国王子巴哈度，伊奉其父卓达王之命前来致敬，并贡献卓达王亲猎之虎皮一张，又以印币五万卢比为救护中国战时难胞之用，蒋欣然接受，又逢尼赫鲁拜访讨论如何使英国给予印度国民以实权等问题；2月13日，蒋视察印度、阿富汗边境之开伯尔山隘要塞，并出席阿富里提等族之欢迎会；2月14日，蒋赴拉合尔，即返新德里接阅甘地函，与印度政府商定两国互派常驻代表；2月16日，蒋偕宋美龄及随行人员由新德里赴加尔各答；2月17日再次会见尼赫鲁并交谈，指出印度革命党利用今日世界大战之机会参加民主战线作战对印度将会有利，同日会见印度回教同盟领袖真纳，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定3月8日为“中国日”感戴蒋访问印度并表示敬佩中国军民；2月18日，蒋偕宋美龄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与甘地会晤，谈话5小时，蒋“希望印度国民大会改变主张，作参战的决定”，并谓“我相信印度参战，对本身有益而无损，且与推倒英国在印度统治权之目的并行不悖，殊途而同归。”蒋告诉甘地，印度继续支持盟国是非常紧要；甘地称他同情中国，所以不会妨碍抵抗日本；几个月之后，甘地写信给蒋：“我认为我们俩在加尔各答那五小时坦率、真诚的讨论，是我这生最满意、最难忘的经验”，称将会继续非暴力反抗英国，但是他“保证（他的）一切行动都将经过审慎盘算，避免有利于日本对中国之侵略”。

1942年缅甸战役，史迪威把战败责任推给中国将领及蒋；英国人怪史迪威和中国人；蒋则怪英国人和史迪威；三方都不无道理，但是战败主要是史迪威严重低估日军实力之后果。

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乘载著名之杜立德轰炸机群空袭东京后，蒋发电给马歇尔，称日军为报复而攻打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地居民拯救美军飞行员，“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

蒋派员交涉，与美国、英国先后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之新约。美国、英国于1942年10月9日声明愿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特权；1943年5月20日中美及中英新约分别在华盛顿、重庆互换批准本，并自即日起生效。

1942年6月，宋子文从华府向蒋报告，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约瑟夫·史迪威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马歇尔和史汀生对缅甸失利，以及史迪威在呈到华府之报告中斥责蒋，都有些吃惊；口信似乎替辞退史迪威开了不错的头。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蒋一再替史迪威背书，显然消除马歇尔和史汀生对史迪威是否适任之疑虑；此后他们俩和史迪威一同反对蒋，甚至到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史迪威。蒋对美国总统代表史迪威想要获得指挥中国军队全权之要求予以拒绝，并迫使罗斯福改派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批蒋不遗余力，也是史迪威好朋友的白修德，在1942年自重庆发出之

报导中即说：“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

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史迪威想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司令”之头衔，对所有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认为蒋若不同意就“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一切对华援助；史迪威之前是一名上校，没有实战经验，现在想成为中国最有权力者，僭取中国军队近20年之首席人物之大位。8月21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称若史迪威不解职则“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有在想此事；宋向蒋报告此对话。9月16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府前也被告知，马歇尔对史迪威不再那么欣赏。宋子文和美国陆军供应司令索摩维尔将军飞回重庆；索摩维尔用尽一切办法，设法劝说蒋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也私底下告诉史迪威，蒋坚持要把他解职，而且罗斯福曾经两度考虑要召他回国；但是，蒋心意未决。10月16日，新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勋爵飞抵重庆，当蒋问起时，蒙巴顿坚持史迪威应该留任，因蒙巴顿刚批示史迪威在本兼各职外，出任其副手；10月17日夜，宋霭龄和宋美龄陪同史迪威见蒋，史迪威称诚心希望帮助中国，若有误解“皆出无心”，保证必不再犯，蒋建议史迪威克制其优越情结。宋子文报告蒋，他终于取得美国政府无条件支持和谅解史迪威去职，宋子文对史迪威留任极失望。11月12日起三天，赫尔利对蒋说，美国战后政策是反对任何形式帝国主义，并且支持自由、强大、民主之中国做为亚洲最主要、稳定之力量。1944年6月底，罗斯福曾派副总统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至重庆，蒋即抱怨史迪威之“不合作态度”，以及不信任史之判断，华莱士随即向罗斯福报告；到9月6日罗斯福派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抵重庆，仍要求“史迪威在中国战场如艾森豪威尔之在

欧洲”。蒋于9月25日要求撤换史迪威后，在10月19日得到罗斯福覆电，同意调回史迪威。1945年1月28日，蒋、赫尔利、魏德迈应美国互通广播公司之请，于是晚10时在重庆播讲《中印公路开辟之意义》，蒋宣布命名该路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史迪威将军打通该路之努力。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选任蒋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选举蒋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夫妇自重庆飞埃及参加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蒋应邀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共同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对日处置方案；会议加强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国际地位，并决定战后中国收复东北、台湾之基本方案，蒋得到美国支持，取得外交成功；对于美国政府派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蒋坚持中共必须先交出军队，实现“军事统一”。

对苏谈判与日本投降

蒋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宪章》批准书，1945年8月24日

经日美海战后，日军丧失作战主动权，美军转入战略大反攻，日军节节败退。1945年6月3日，蒋在重庆会见苏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详谈东北问题，并明白表示中国之态度，“务须达成我抗日目的，即求得东北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彼得罗夫表示不难友好解决，并希望行政院长宋子文尽快访问苏联。7月8日，蒋核准军事委员会设置战地政务委员会。8月7日，苏联对日宣战，近75万红军涌入中国东北。8月14日，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11日，美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英、苏经瑞士答复日本，同意其要求，至8月14日日本天皇遂颁布无条件投降之《敕书》，8月15日国民政府接获日本投降电文。8月15日，同盟国经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裕仁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各项规

定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同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蒋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指出“正义必然战胜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要求人民“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人民为敌。在美国海、空军运输力量帮助下，蒋把长期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之国军迅速运到南京、上海和华东、华北、华中各战略要地；并派出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资产。8月22日，蒋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电麦克阿瑟，授予英军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限。8月29日，中国陆军总部奉蒋之命，将原属中国方面受降之香港及九龙日军投降改由英国接收，并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全权受降，另派罗卓英中将为中国代表、威廉姆森上校为美国代表参加香港受降。

内战

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已在筹划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八年间组建而壮大之武装力量；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两日，蒋调动10个师军队进攻新四军，7月又指令胡宗南调动9个师进攻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鉴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民主，蒋打着“和平建国”旗号，“休养生息”、“民主宪政”、“军队国家化”为内政三方针，主动要求恢复中断之国共两党谈判。1945年8月，蒋连电约毛泽东来到重庆会谈，毛在重庆一个多月，始回延安；8月14日，蒋给毛发出第一封邀电：“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8

月24日，国民政府隆重举行《联合国宪章批准书》签署典礼，蒋亲莅签署批准书，王世杰副署；毛泽东电覆蒋称："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经过43日断续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会谈纪要》，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在蒋批准下，陈诚开始裁撤国军中200多万官兵，理由是他们已不适作战，徒然消耗可用于改善部队战力之资源；白崇禧极力反对，但美方支持，蒋径自推动；结果复员编遣造成愤怒、士气涣散、官兵失业；同时中共扩张，招纳傀儡政府部队、土匪流寇及前国军官兵。9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称："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的信号"。蒋盘算如何"消灭中共"，他秘密下令80万国军沿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平绥铁路沿线进攻中共解放区。

苏联迅速把大批日本武器和军事物资移交给中共。在国际国内和平舆论压力下，蒋被迫于1945年12月31日，同意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虽因人民反对内战，国际舆论也反应强烈，在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调停下，蒋于1946年1月10日向所属部队下达停战令；但是他密令所部趁停战命令下达前占领有利地点，随后又坚持东北地区不在停战范围之内，连续向关外增兵。

1945年，蒋扩建丰镐房，隔壁卖千层饼的周顺房主人却不愿意腾出自己家的地盘。由于周顺房主人是蒋当年的父执辈，蒋得知后也无可奈何，只好苦笑着说："迁不迁，由他去罢！"

1946年1月4日，蒋任命白崇禧代理陆军总司令职务。2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2月1日，蒋与周恩来会谈，蒋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2月19日，蒋在新生活运动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称要全国同胞“务必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振衰起敝，贯彻始终。

蒋在关外以“接收主权”为名，增兵东北。1946年5月5日，蒋率党、政、军要人在南京中山陵举行还都大典，与会者万余人。6月10日在上海成立海军军官学校，蒋亲兼校长，1947年12月1日全国各军事学校改制，蒋辞兼职，任名誉校长。

全面冲突

全国内战爆发开始，蒋实行全面进攻战略。美国政府中断对蒋的支持，自1946年7月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蒋在1946年10月11日国军占领张家口后，立即发布召开国民大会之命令。11月25日，国民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1,248人，蒋任主席。蒋凭借美国政府支持和援助，拥有强大兵力和炮火，在1946年7月至12月半年间占领解放军大小城镇105座，但却损失兵力70余万人。没有捕捉到解放军主力，占领土地与城市使战线愈拉愈长，成为防守负担与消耗，蒋更密令于修复据点后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为解放军攻克击毁，益发加重负担与消耗，而兵力耗损甚巨。

蒋为挽救其政治军事危机，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月23日，国民政府任命蒋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2月底，蒋下令驱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之谈判代表，最后关死和谈大门。3月1日，蒋主持举行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决议：行政院长宋子文辞职照准；蒋兼任行政院长，张群任行政院

副院长；中央政治大学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蒋兼任校长。蒋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3月，他下令胡宗南部20余万人进犯陕北，3月19日占领延安，但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6月4日致电美国国务院说，中国现状悲剧是蒋及其周围之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之渴望，而只相信他们之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诉求，只能用残酷之镇压，实在帮共产党大忙。6月25日，即发布《平字第一九〇六号训令》，通缉毛泽东。白宫于7月11日宣布派出代表团访华，魏德迈做一个多月实地调查，走访南京、台北、广州、上海以及华北、东北等地；魏德迈指出中国国民党文武官员普遍贪污和腐化，征兵极不公平，权贵子弟纷纷出国留学，以逃避兵役，甚至在沈阳直斥熊式辉说不出军中实有人数，暴露国军中吃空额之大弊病，并责骂熊从未到过军医院视察，所以不知道医院中有多少床位；魏德迈于8月24日离开中国前夕，在报端发表谈话，批评蒋政权“精神破产”。8月15日，蒋为党团统一组织发表《告党团同志书》，称党团组织合并统一，造成戡乱建国之动力，更是当前急切之图。10月10日，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之号令。蒋11月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建立中原防御体系，分别组设东北、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国防部汉口指挥部等，加紧调兵遣将，四出巡视督战，力图挽回颓势。

二二八事件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因军纪不佳、政府腐败，加上一连串经济、省籍问题，导致民怨四起，台湾人民对国民政府信心也急速下降。1947年2月28日，由于台湾烟公卖局之查缉私烟，引发流血冲突，一时社会秩序顿形混乱，至3月12日国军登陆。当时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先是安抚群众，并与地方仕绅组成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交涉，之后却致电要求蒋派军回台。3月1日，蒋在中国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留京同学联谊上发表演说，称：

“不出一年半载，‘国家建设障碍’必可排除。”3月2日，蒋电令驻京沪线之第二十一军开赴台湾“平乱”，军部及直属营、连和第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第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限3月8日前到达，该军到台后归陈仪指挥。上岸后迅速开始进行大规模镇压行动，紧接着以“清乡”的名义对全台各地民众进行捕杀。3月6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称“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3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取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省政府。3月8日，台湾全省除高雄、基隆、新竹外，民众控制大部县、市，各级处理委员会实际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并成立治安自卫队；国军第二十一军抵达台湾，在基隆港登陆。3月9日，闽台监察使杨亮功奉监察院命抵达台湾，上午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希望迅速恢复秩序。3月10日，蒋在中枢扩大纪念周演讲，称：“务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自动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3月18日上午8时，蒋经国抵达基隆，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由要塞司令史宏熹陪同视察。3月21日，监察院加派何汉文赴台调查事变情形。3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举行第八次大会，检讨经济、政治，并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三分之一；会议通过将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及取销东北行辕下属之政治、经济两委员会两案。4月2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开会通过三中全会各决议案，主要有：一、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案，请政府立即执行；二、黄金潮案，请行政院、监察院迅予处理。

4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例会通过《国民政府施政方针》（即《公同纲领》），蒋代表中国国民党与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代表在官邸签署；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各级政府、民意机关、人民团体及学校，均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俟国民政府改组后，另定纪念办法。4月17日，《国民政府施政方针》公布；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蒋为国民政府主席；中常会并通过蒋提出之国府五院院长名

单，孙科为国府副主席，张群、孙科、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分别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4月18日，蒋在国府礼堂招待新闻界发表谈话称：国府委员会之改组乃我国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此次改组使各政党及社会贤达得以参加全国最高之决策机构。4月23日，蒋主持国防最高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与中国国民党中常会联合举行，决定中国国民党参加行政院人选；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撤销，其职权根据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由改组成立之国民政府委员会接替，该会秘书厅发出公告，是日起停收文件，办理结束。1950年4月5日，根据蒋指示，行政院决定将二二八事件人犯迅速予以保释。

1947年7月4日，在第六次国务会议上又通过蒋提议之《厉行全国总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案》。蒋于7月5日发布《剿共戡乱令》。7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党团统一组织原则》，决定：一、现任省、市、县支区分团部干事监察，一律改任为省、市、县党部执监委员；二、扩增后之省、市党部执行委员，由中央指定五至九人，组织党团统一委员会，负党团统一组织任务；三、省、市党部设主任委员一人，由中央指定之。9月2日，国民政府免去蒋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职，任命顾毓琇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9月8日，蒋自牯岭返回南京；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关于党团统一之意见。9月9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上午在南京开幕，到会者580余人，蒋在讲话中称："目前本党所遭遇之危机，至为重大。"11月29日，蒋自北平飞返南京；北平行辕公布蒋对收复区人民实行之八条措施：收复区之农地要"归还原业主所有"，佃农对地主交租以正产物之三分之一；农民必须参加当地保甲、参加自卫队、帮助检举共产党干部及其积极分子，对"执迷不悟"之共产党人要逮捕处置等。

制宪选举

1948年4月4日，蒋以总裁身份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总统、副总统选举提名，中央委员们纷纷发言，一致拥护蒋为总统候选人；蒋表明：第一届总统不一定由本党内选出，应该选党外的人；党外的人具有下列条件可当选：忠于宪法，努力推行宪政；有民主精神；有民族国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刻认识。

1948年4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举行选举总统会，蒋以2,43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5月20日，蒋在国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宣誓就职大典，由国民大会主席吴敬恒监誓。

军费开支庞大使财政经济濒临崩溃，财政赤字在1947年达到总支出百分之九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蒋督饬国军、警察、宪兵、特务强化统治与镇压，国统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8年1月，蒋采取重点防御战略，将战区分为20个绥靖区，设司令长官令，掌握军政大权，组训民众，以充实兵源，同时集中兵力于主点、主线之上。8月上旬，蒋召开南京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之战略，并准备撤出东北，确保华中，企图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依托战略要点之坚固阵地坚守防御，同时组成强大兵团机动作战，以攻为守；为此，裁并绥靖区，减少机关，扩大机动兵团，并在大后方加紧编组训练二线兵团；蒋在会上打气说：“我个人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我仍然要百折不回继续奋斗，毫不灰心，毫不气馁，我不忍放弃这剿匪责任。所以，我不能不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定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蒋于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等；还颁布《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强令限制物价；黑市猖獗，不到三个月财政经济即完全破产，金圆券迅速贬值几成废纸，社会更加骚动不安。

三次下野

1948年8月15日，李宗仁离开北平飞往南京前，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恢复“和谈”；12月24日，白崇禧首致电政府停止作战，主张邀请美、苏，联合调停冲突，同时程潜竟通电要求蒋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再度通电主和，张轸亦于同日要蒋下野。12月31日，蒋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竟日，研究下野文告，四易其稿。美国政府对蒋失去信心，在中国公开策动倒蒋活动，中国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要求蒋下野。蒋在考虑下野时，也与少数亲信讨论法律问题，如何保留总统职位。蒋准备撤出大陆，派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把库存277余万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以及大量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运往台湾。

蒋为预作恢复之准备，曾于1949年1月10日，命蒋经国赴上海转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政府库存黄金外汇密运台湾；1月21日，蒋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宣布引退，旋即发布引退谋和文告，下午蒋乘专机离开南京飞杭州，蒋经国等随行；1月22日，蒋转返抵奉化溪口故里。

1月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紧急宣传通报》说：“总裁虽暂不行使总统职权，但仍以总裁地位领导本党。”蒋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力谋与中共和平谈判，派出代表团赴北平；但是蒋认为“毛泽东之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于李宗仁、何应钦等人设想之国共“隔江分治”之和谈方案他也不首肯，坚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以致国共谈判破裂。

代总统李宗仁和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最终亦认为中共八项条件与投降无异，故命代表团拒绝签字，至此国共谈判正式破裂。

败走台湾

4月20日解放军渡江直指南京，蒋于4月22日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秘密会商，决定继续作战。决议如下：政府今后惟有坚决作

战；联合全国自由人士共同奋斗；由何应钦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实行全面动员。4月25日，蒋拜别母坟，然后走上凤凰山，对故乡最后一次眺望。蒋父子离开溪口，乘车到下陈，至宁海团堧村，由象山乘竹筏驶至汽艇上太康号赴上海。蒋乘军舰于4月26日抵吴淞口，召集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部署上海防御。4月26日，蒋驻节复兴岛；4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非常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但在解放军凌厉攻势下，企图利用坚固工事挣扎之20万国军毫无斗志。

5月7日，蒋乘静江轮由上海启程至舟山，预作上海撤退国军停顿之安排；蒋旋即经澎湖飞台北。6月24日，蒋抵达台北，入驻草山第一宾馆。7月10日，蒋应菲律宾总统季里诺邀请，飞马尼拉访问，与季里诺会议于碧瑶，至7月12日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东亚各国成立“亚洲反共联盟”，以抵抗并消除共党势力之威胁。7月蒋至广州，组设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指挥国军作最后抵抗；蒋先后在厦门、广州、重庆一再部署防御，企图负隅顽抗，各路军队无不兵败如山倒。7月20日，中国国民党宣布要在台北成立总裁办公室，黄少谷任秘书长，下设党政组，主任谷正纲；外交组，主任王世杰；财政组，主任俞鸿钧；军事组，主任王东原；秘书处，主任张其昀。8月6日，蒋从定海飞往韩国访问，并发表声明：“余自将借此访问之良机，与李承晚总统充分交换意见，不仅商谈有关中韩两国当前重要诸务，并将讨论远东各国筹组反共联盟问题。”8月7日，蒋和李承晚在韩国镇海举行第一次会议，就中韩关系及组织远东联盟问题交换意见。8月8日，蒋与李承晚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碧瑶会议之联盟主张，并将采取步骤以促成反共联盟之实现。

蒋鉴于局势之严重，于8月23日飞往广州，与李宗仁、阎锡山等筹划战守事宜；8月24日飞重庆主持西南军政人员会议；9月12日飞成都布置防务；9月22日飞昆明与驻军将领会商西南局势，而大势已无法挽回。

蒋为第二次国共内战两岸分治前首任、唯一的中华民国总统。11月14日，蒋自台北飞到重庆。11月29日，主持军事会议，指示重庆外围作战计划，入夜林园行邸已闻枪声，兵工厂爆炸，始至白市驿机场；翌日晨飞抵成都，重庆于同日下午陷落。12月6日，蒋约见邱昌渭及刘士毅，要两人随政府先赴西昌。是晚，蒋认为西昌决不能作国府驻在地。12月7日，蒋指示阎锡山作好当晚离开成都之准备。蒋立即决定国府迁移台北，指示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是晚，行政院举行会议，通过国府迁设台北，随即发布“总统令”：“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大本营，统率陆海空军在大陆指挥作战。此令。”四川军人刘文辉、邓锡侯等，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密谋，欲扣留蒋。蒋12月10日从成都败退到台北后，声称要“反共复国”、“光复大陆”，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

晚年经历

蒋在1949年6月抵达高雄。在中晚年，除特殊情况外，蒋基本上不饮酒，不吸烟，励行规则刻板之生活。蒋还专门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来具体负责向中国大陆骚扰浸透。生活几近吝啬，吃过之苹果也要一一清点；一件衣服通常穿5、6年，且平时不穿高级衣料，除个别出访场合外，拒穿西装；与此同时，他在台湾修建30多座行馆，有些从未去住过。2004年10月18日，周联华牧师在台北接受访问称，蒋受基督教义吸引是因为它强调将道德思想转化为行动，单此一点和儒家学说相符。

固守台澎

蒋认为解放军需要准备1年以攻台，蒋加强军事训练，并努力消除国军各种长期存在弊端；蒋集中管制一切军队财务，杜绝贪污和“吃空缺”。台湾防卫司令部很有纪律，城中每天都枪毙抢劫者，人口涌入并未引发重大卫生

问题。

海南、舟山撤退

1950年春，林彪在闽粤沿海征集数千艘渔船及80万军队，准备进攻海南、台湾；蒋此时有67万兵员，其中只有30万有即战力；国军开始在全台各地碉堡堆积弹药。

薛岳率8万军队及难民撤到海南；蒋下令撤守，7万国军及难民成功撤到台湾。蒋命汤恩伯及舟山群岛12万国军撤退，陈诚、周至柔“极端反对”，5月16日舟山军队全退到台。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认为由于杜鲁门设下限制，空军不能轰炸对岸，金门将难守，故签发“准备撤退令”。后来蒋坚决拒斥撤出外岛。

党务改造

过去军政大员，除白崇禧外，到台湾后几乎完全失去权力。蒋同意蒋经国意见，拒绝杜月笙及上海帮派人物进入台湾，孔宋家族大多移居美国。宋美龄游说美国后返回台湾，受到蒋亲迎。

1949年冬，蒋到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课，讨论国民党为何失败；蒋认为首要原因“军事监察制度”无能；通敌、叛国者层出不穷；其次是下野后所托非人及资深党员内斗自肥；因此蒋辞退很多文官武将并招募青年党员。陈诚批评蒋，但蒋仍拔擢他为行政院长。1950年，陈诚与蒋数度不合欲辞职，蒋依旧不准。1950年春，立法院否决一项蒋的提案，蒋震怒，认为陈立夫要诡计，他立即整肃党务，下令数百位将官退伍。1950年5月，党务改革小组提出草案，扩张国民党对全社会的控制力，被蒋搁置，蒋仅规定高级干部向其效忠。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成员全部与蒋有私人关系，没有陈立夫兄弟、孔宋家族和其他军阀代表；蒋似乎认为在日后或身后多年可以带来一个多党但严格控制之代议制社会，令社会安定和民众幸福。蒋经国担任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归国防部管辖，实施教学和军训；蒋经国还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对党员政治教育；中国国民党亦效仿中国共产党，设立风纪委员会调查贪污，设立小组防止中国共产党渗透；1950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党员约5万人，到1952年已增至28万2千人。各学校和民间组织都有党的小组，政府管控大型工商业，但蒋无意改造人类关系或世界，而是确保政权稳定和建立繁荣的华人社会。

1951年11月19日，蒋曾在草山阳明山庄讲《改造教育与变化气质》：“张横渠说：‘学者须先变化气质。’又说：‘为学大益，在自能变化气质。’这就是说教育的要务，莫要于学者能变化气质……如要完成革命责任，必先要变化气质。”

防谍肃奸与白色恐怖

蒋父子深信最优先是巩固政府权力，蒋授权予蒋经国掌管内部安全、情报和准军事组织；1949年，蒋经国在高雄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由中国大陆迁台之情报和秘密警察机关；当年，安全机关侦讯约1万名台湾人，又监视包括陈诚、孙立人在内所有到台高级将领。1950年上半年，又破获300件匪谍案，涉案逾3,000人；秘密警察在各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发展秘密特务；据王昇称，期间被逮捕者有15%被枪决。

吴国桢、孙立人向美国外交官抱怨逮捕大多是滥权，蒋经国手下逮捕孙立人部属。1950年1月12日，蒋得悉多数高级将领反对其聘请日本教官。3月，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秘密报告华府，孙密谋政变。1953年，蒋拔擢孙为上将，翌年任孙再任陆军总司令。1954年，蒋吴不和，吴国桢拿到护照赴美国，使宋美龄很担忧，蓝钦夫人暗示吴国桢事乃因由。

1959年，胡适、王世杰等呼吁蒋放弃连任，陈诚也有此想法。1960年3月，韩国总统李承晚辞职，蒋认为愚昧之美国人鼓励韩国国内政敌反对反共领袖，加决蒋根除反对势力。《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长期称“反攻无望”，雷震在胡适支持下筹设“中国民主党”，陈诚默许，蒋以叛乱罪名逮捕雷震。为时短暂，蒋首次允许对政治压迫之公开批评，胡适谴责对雷震“罗织罪名”。

从1949年到1987年戒严结束，官方统计“白色恐怖”被捕人数29,407人（谢聪敏称有立法委员说有6-7万人）。

稳定货币

台湾自1945年以来单独发行旧台币。1948年10月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经蒋同意，曾禁止向中国大陆销售或转移粮食，使台湾未受到对岸困境冲击；但到1949年6月，美国认为“几乎不可能建立可运作之政府”，预测台湾经济崩溃；蒋抵南台湾后，发现台湾金融改革所需之黄金和硬币已就位，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发行新台币；台湾省财务厅长严家淦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把新台币与黄金价格挂钩，并准计自由换汇，使新台币获得信任。

1951-1964年，美国共援助台湾15亿美元，占台湾资本形成40%左右。1953年，由于社会安定、美国援助、黄金储备及关税增加，预算赤字只占生产总值6%，1952-1958年通胀率只有6%到7%，薪酬大幅增长。蒋力图削减开支和贸易赤字，他批准设立安定委员会，推行进口替代策略和高关税，发展轻工业，即前两个四年计划主要内容。轻工业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城市经济快速扩张，简朴措施放宽。蒋命李国鼎掌管经济事务，还有许多受过西方教育专家担任中层官员。陈诚与蒋经国厉行反贪，美国也帮助稽查政府账册。1953年美国记者报道称，岛上所有族群都认为政治十分清明。1958年《纽约时报》认为台湾的贪腐已大体根除。

减租授田

蒋在台湾总结在大陆垮台之教训，与副总统陈诚推行减租、公地放领和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放给佃农等政策，竭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稳定财政经济；同时大力“改造”中国国民党，加强统治。国共内战结束时，日本人拥有台湾2/3土地，美方支持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助陈诚开展土地改革，把接收之大部分土地低价卖给台湾贫农；同时实施“三七五减租”（即降低土地佃租至37.5%），初步改革使国民党获得台湾农民支持。土地改革使1950年春季丰收，米价下降。

1953年1月，政府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规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余由政府用征收补偿方法交佃农承租耕种。

地方自治选举

1949年夏，台湾省政府派遣2,000多本省人担任中低阶公务员；乡镇和县市长选举已落实，但只有国民党员和无党派者可参选，地方自治法规到位。

复任总统

复职的目的与使命

总统令（民国39年11月15日）

蒋想办法使李宗仁回到台湾辞职，可是李宗仁也用各种办法来搪塞，一直滞留国外。1949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鉴于中国西南地区战况艰危，决议先设法促请李宗仁回四川视事，否则即请蒋复职。1950年2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在台北宾馆召开，对复职事做最后讨论；蒋在会中说，过去一年来，他健康表面上看似一如往昔，但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中央非常委员，均应邀出席，一致要求蒋复职；蒋为顺应舆情，乃于3月1日在台北复行视事。2,000多位中央机关代表，此后长期挂名执行职权，蒋常在日记称“奈何？”。

修宪后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此项规定。蒋当年反对修宪，但他未表示不要三连任。国民党的策略是修订临时条款，将宪法四十七条的限定总统任期废除，既能让蒋三连任，又能达到蒋“反对修宪”的主张。

中美联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蒋凭台湾之战略地位，重新得到美国支持和庇护。蒋不满杜鲁门决定将台湾和中国大陆合法分治。叶公超建议蒋派出国军到朝鲜参战，为华府拒绝。

1950年7月，蒋高兴麦克阿瑟访问台北。麦声明支持蒋，并派喷射战斗机赴台。麦克阿瑟与杜鲁门严重分歧。

1953年11月，艾森豪政府支持国军进击沿岸土地和通航。1954年，毛泽东高调宣传“解放台湾”，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马，美国第七舰队及大西洋海军赴太平洋。艾森豪和杜勒斯开始认为毛泽东决心占领金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大部分首长除李奇微外，都建议与蒋联手空袭，并遣军入外岛。1954年11月，北京重判13名朝鲜战争期间在中国领空击落之美军战俘，激发美国反共浪潮。1954年12月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1955年初，毛泽东进攻浙江一江山岛和大陈列岛，由于大陈距台湾太远，美国与蒋决定将军民撤出大陈。艾森豪声称可能为保卫金马而与中共核战，赫鲁晓夫同意帮毛泽东建核武器，《人民日报》提出“和平解放”政策。艾森豪希望蒋放弃金马，换取美国帮助国军封锁东南沿海，蒋拒绝，认为是英国人的阴谋。

八二三炮战

1958年8月，解放军猛烈炮击金门，国军布置10万军力应对，美国震动。参

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丁宁（Nathan F. Twining）和到美国游说的宋美龄，希望用核武器解决共产党政权，美军将可搭载核弹的大口径榴弹部署到前线。美国予蒋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中方提议，蒋撤守金马，换取“在相当时间”努力“以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和澎湖”。后毛泽东呼吁停火，彭德怀提议谈判。

1958年10月，杜勒斯到台北，连续两日希望蒋放弃反攻大陆，蒋极生气但保持冷静，通过叶公超表示，宁可放弃国际和联合国席位，也要保留中国大陆同胞对蒋之信心。杜勒斯担心爆发核战，于是在与蒋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让蒋承诺“不使用武力收复大陆”。

反攻大陆

蒋不断宣称要“反攻大陆”的理念，拒绝中共提出之两党协商和平解放台湾之建议；也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抵制美国、日本等势力觊觎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蒋很多活动都以实现其既定之政治目标为出发点，因此，他之文化观念具有强烈政治性质；只有透过政治帷幕，深窥其文化意义，才能深入了解现代中国历史行程中出现之蒋现象，作出科学之评估。蒋于1952年青年节发表文告，号召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10月31日正式成立，由蒋兼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委员。

1954年，蒋在《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建校三十周年纪念训词》中，称自己的话为“训词”，多次自称为“领袖”。

1949年6月来台后，蒋热切提出“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或者“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1950年底，麦克阿瑟希望蒋派

33,000名援军参加朝鲜战争，甚至大举攻击中国大陆。但蒋认为即使美国全面海空支援，至少需要2年准备；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称，若杜鲁门拒绝蒋建议攻击中国大陆，应遭弹劾。1951年2月，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呈“第一号作战计划”，意图进击闽、浙沿海，此后还有第二、三号作战计划、20个目标的作战计划、光计划及开案等。此外蒋积极在东南沿海发动小规模武装突击，如福建湄州岛、南日岛、东山岛战役。1953年7月16日，时值李承晚危机，蒋未与美国协商即出兵，东山岛战役爆发，但解放军很快复占。

蒋认为朝鲜战争是反攻大陆的好机会，数度游说美国援华，开辟第二战场，或由李弥率领的滇缅游击队反攻云南。

1955年前后，蒋经国加紧暗杀和破坏中共高层。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从香港转机，中情局与国军刺杀周未果，蒋在日记中记载：“匪人全部覆灭，惜周恩来未在该机”。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周秘密提议台湾“回归”，国民党继续治台，“会给蒋介石找个合适位子”。1959年，周公开呼吁蒋回中国大陆，可以安排合适职位。

1956年，蒋出版《苏俄在中国》，阐释为何政府要再三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及如何应对。

1957年，蒋指示成立中兴计划作业室，筹备正面反攻，继而又制定黄龙计划，筹备敌后反攻；蒋认为反攻时如美国掣肘，则不惜与美决裂。

1958年，蒋认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已濒于失败，必须积极备战并促进大陆反共革命，于是下令制定“武汉计划”，主要内容为组训空降游击部队，支援缅北的柳元麟部队，期在西南边区建立第一反攻基地，再逐步扩大至整个大陆。1958年底，蒋秘密批准建立核子武器研究实验室。1960年，艾森豪希望结束冷战遇挫，他访问台北，蒋举行盛大欢迎活动，30多万人夹道相迎。蒋要求艾森豪提供飞机和通讯，支持“空投和其他破坏与游击行动”。11月，缅北之役爆发，孟歇、江拉失守，国军撤退到老挝，并且美国

强力施压，武汉计划遂难以为继。

1959年3月，西藏爆发大型叛乱；蒋向中央情报局称，自行空投伞兵到藏区，于是中情局同意与蒋合作。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7年7月28日，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蒋任会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随即推行。蒋紧密地连接政治与文化，使现代中国既产生一批文化附庸从属于政治权威体制，同时也锻炼出一支文化新军积极投身于反对黑暗政治现实政治；单纯之文化建设和纯粹之文化人，在现代中国难以立足生根，这是蒋将文化政治化之必然结果。

外交角力

中日合约

1951年，美国主持召开对日和约谈判，华府既不邀请台北，也不邀请北京，蒋认为抗日八年300万军民牺牲，蒙羞含愤；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对台湾权利，未提及台湾地位，蒋怀疑杜鲁门政府将台湾地位问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之筹码。

后来缔结台北和约，蒋认为台湾“不可无日、美共同合作”，担心日本首相吉田茂预算未来承认北京，因此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并对签署和约让步。蒋反对“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种种“两个中国”论调，表示“中国事可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抵制美国、日本等势力觊觎台湾。

联合国

在外交方面，面对冷战世局，蒋站在自由国家阵营，争取国际支持，保卫联合国席位，后因国际环境转变，外交处境日益困难，终致1971年10月25日失去联合国代表权，抵挡不住中共日益强大和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于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在2758号决议的结果出来前宣布退出联合国。

1950年1月5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写道：此沉重打击犹如1945年“俄国之侵华”。蒋不满英国人，认为其目标是“扼杀亚洲人之精神与灵魂”；蒋认为美副国务卿艾奇逊的祖先一定是英国人，因此其预备出卖美国利益。

国际反共

1949年，毛泽东宣示共产中国是苏联坚定的盟友（包括在战时），也是全球共产革命的支持者；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奥立佛（William Olive）被抓，死在狱中，华府立即召回司徒雷登，准备关闭使领馆。1949年8月，蒋接报美国国务院发表1,000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不满蒋政府。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反对援助蒋。蒋命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并在多个重要职位安插受美国政府重视者。

蒋向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提议组建远东“联盟”，包括台湾、泰国、印尼、韩国、日本和中南半岛，这是东南亚公约组织雏形，美国反对，韩国总统李承晚支持。

1951年1月，麦克阿瑟警告华府：朝鲜半岛已经守不住；但艾奇逊认为其危言耸听；1951年初，美国于联合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但同时建议联合国成立调停小组与北京继续协商解决，蒋对此大为光火。4月5日，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马丁（Joseph W. Martin Jr.）宣读麦克阿瑟信件，提出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杜鲁门愤怒下令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蒋认为“美国政府可悲的愚蠢”。杜鲁门政府同意在1952年给予台湾援助，

但当美国开始与日本、菲律宾、新西兰和澳洲谈判安全条约时，蒋对美国大失所望。

艾森豪称要废除雅尔塔协定、终结朝鲜战争、打开铁幕，放手让蒋对付"赤色中国"，蒋希望其当选。1953年艾森豪胜选后，要求蒋承诺反攻前要与美协商，延续杜鲁门"围堵、不解放"政策，和双轨政策：防卫台湾，和保持美国最终与中国大陆修好之可能，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艾森豪透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蒋向毛泽东传达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否则"毅然决然地放宽武器的使用"。1953年6月22日，蒋接李承晚信，阐述"美国如何出卖韩国"，蒋"不寒而栗"。

1953年9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北，明确"表示美国兵力不能用来支持（蒋）可能发动的任何反攻。"毛泽东援助胡志明对抗法国，蒋向美国说远东不会稳定，艾森豪一度考虑请蒋出兵。日内瓦会议召开，蒋认为和谈的结果是共产党接管越南。

1958年3月，蒋提议杜勒斯推翻亲共印尼总统苏加诺，杜同意，但行动未果。

1960年代，中共与苏联关系恶化，蒋开始跟苏联接触，共谋推翻中共政权：驻墨西哥大使陈志平和苏联驻墨西哥大使暗中谈判；苏联驻英国记者维克多也亲自到台湾接触蒋方。

1970年代后"反攻大陆"无望，蒋积极建设台湾，发展科学和教育，奠定台湾经济起飞基础；后人则多认为是蒋经国功劳。

逝世

1965年，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开始利用统一编号进行编管，蒋拥有"编号第一号"身份证，编号为Y10000001（Y是阳明山管理局的英文代号）；但不知何故，户政单位在蒋身份证的学历栏上，填上"日本士官学校"。其实蒋毕

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预校东京振武学校，而非日本士官学校。

1971年11月，蒋因便秘，要求副官钱如标润滑肛门；钱如标用甘油球为蒋通便，不慎使蒋肛门流血，因此被关了好几年，直到蒋逝世，钱如标才获释。蒋自1972年起多病，于5月连任第五届总统后，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将统治台湾实权交给儿子。1975年4月5日，蒋以突发性心脏病，于下午11时50分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当时告知严家淦及其他要员和家人到士林官邸瞻仰遗容。蒋灵柩暂厝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桃园县大溪慈湖宾馆正厅。

纪念

蒋去世后，慈湖及中正纪念堂设中华民国三军仪队站岗，定每年民族扫墓节（清明节，于1972年起为国定假日）为"蒋总统逝世纪念日（后为先总统蒋公逝世纪念日）"。当时政府规定行文必须挪抬称他为"蒋公"，以示对蒋崇敬之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奉化蒋氏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武岭路，包括丰镐房，分为大门、前庭、内门、前厅、内庭及后堂，两侧且有东西厢房。后堂名"报本堂"，上为吴敬恒手书之黑府金字横匾。两侧是蒋手书楹联，左联是，"报本尊亲是谓至德要道"；右联为"光前裕后所望孝子贤孙"。本堂分四排供奉著蒋从尊祖父以下四代灵位。报本堂屋顶上福、禄、寿三星高照。

另外为纪念蒋过去于二战后对日本采取"以德报怨"的宽容政策，日本乃建立中正神社。以蒋为主神，是附属于爱知县额田郡幸田町贵岭宫的摄末社。

淡水魁星宫亦有祀奉蒋之神像，庙方称之为"蒋公中正天尊"；在彰化花坛的金盾城隍庙则将蒋尊称为"中华禅师"。另外于高雄市旗津区蒋公感恩堂、新竹县宝山玖龙宫也有供奉蒋（庙方尊称为中天玉圣大帝）。

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蒋介石大道亦设有蒋铜像。

去蒋化

在台湾，随着1987年解除戒严后政治民主化，以及社会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民间对蒋的评价逐渐由“神格化”回归正常化；许多台湾人开始追究蒋在二二八事件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所应负的责任，2000年民主进步党首次上台后，时任总统陈水扁大力实行去蒋化，推动移除蒋在台的铜像，并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园区，2008年由时任总统马英九改回原名“中正纪念堂”。

2016年总统蔡英文推动“转型正义运动”。2018年，反蒋团体为纪念二二八事件71周年及对蒋的不满，到桃园慈湖陵寝违法泼红漆。

评价

1975年4月6日，日本副首相福田赳夫谈话称：“蒋总统是世界的一大伟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四巨头中享有高寿的一位。”同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井出一太郎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一个“非官方”谈话：“……蒋总统在本世纪初曾留学日本，并有很多日本友人，为深受日本国民钦佩、敬爱之人物。渠（他）一生与现代中国历史息息相关，亦为一部中国现代史，深信其丰功伟绩将永远留存人类之记忆中。……”同日，日本前首相岸信介表示：“我们失去了一位伟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我们不可能忘记蒋先生为日本所出的力。虽然日本军方在中国造成了一场风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国，不把任何人当作战犯。他反对苏俄分裂日本，并运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们的天皇制度。他协助日本战后的混乱，并协助日本奠下复兴的基础。”同日，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谈话称：“我想大多数日本人都在悲悼亚洲的伟大指导者。尤其蒋总统与日本之关系很深，哀悼之念格外深切。中日间实务关系，因蒋院长早已掌握中华民国之实权，料将不会有影响。惟蒋总统系亚洲伟大的领导人，他的逝

世难免对世界有所影响。”

1975年4月6日，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发表特别声明：“蒋总统不但对导致二次大战盟国胜利有伟大的贡献，而且对韩国的独立运动，也曾予积极的支持。蒋总统对二次大战后为奠定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基础，贡献尤多。他的这些无法数计勋业，将永为韩国人民所难忘……”并对蒋介石逝世发表悼辞称：“……本人和韩国同胞暨全世界所有崇仰其勋业的人们，敬向蒋总统历尽艰困，而仍固守信仰，坚毅不拔的精神致最崇高的敬礼。……”4月11日，大韩民国总理金钟泌谈话称：“蒋总统对韩国独立建国的支持与贡献，载于韩国史册，韩国国民将永志不忘他的恩德。……”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写给蒋母的祭文中认为他与蒋“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并评价蒋是“守经达变”之人。孙书赠蒋之字幅，题中敬称“介石我兄”，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嘱蒋，亦称为后来孙之遗嘱；恪遵蒋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之示。

李宗仁检讨蒋在政治上造成过失，对蒋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蒋介石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历史学家黎东方说：“蒋公是一代英雄，能够对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凭这一点已是千古不朽……他不该屈服于美国压力，不向日本索取赔偿。日本杀了我们如此多的军人与平民，毁了如此多的家园与财产，怎可不要日本赔！倘若蒋公拒绝美国扶植日本，中国政府便有钱抚恤战死者与被残杀者

的家属，医治我们的伤兵，帮助退伍军人就业，帮助失掉家园与财产者重建家园重奠经济基础，那么中国人民何至于在饱尝对日抗战之苦后，又遭受了内战与四人帮的灾难？”

曾孙蒋友柏说：“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在那个时候那个铜像是错的，任何国家领袖在他过世后马上就树立铜像盖纪念馆，这真的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要树立铜像要盖纪念堂，也要等他死后100年（至少也要50年）再盖。”不过，蒋友柏虽然相当程度认同去蒋，却同时反对陈水扁去蒋的动机。他认为民进党每次选举，都拿“去蒋”议题凝聚深绿选民士气。

著作

《蒋介石日记》本为私人日记，目前暂存于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已开放供研究者参阅。蒋一生语论、文电甚多，散见于报刊及内部档案，中国国民党官方曾出版过他之言论集多种，1956年编印过《蒋总统言论汇编》24卷，1984年出版《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1985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都只是有选择收录他部分著述。蒋著有《西安半月记》、《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等。

（维基百科引文结束）（有少量文字编辑整理）